

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Екатерина Рыбас

СТАЛИН
СУДЬБ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斯大林传

命运与战略 上

〔俄罗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林娜·雷巴斯 著

吴昊 张彬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ee more please visit: <https://homeofpdf.com>



2009年在“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话”电视直播交流节目中被问及“概括地说，您对斯大林的行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时，普京回答道：

“我保留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一问题的尖锐性。社会上对此有非常之多的争论，我能看到这里的‘圈套’：你说‘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满意；而你说‘是否定的’，另一部分人又会不满意。”

“不过既然时至今日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话题仍然争论不休，我就特意留下了这一问题。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无法笼统地下结论。显而易见，从1924年至1953年，这个国家，这个当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

“诚然，农业未能得以保留，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农业方面的困境，特别是在集体化的后期，记得人们排着长队去购买食品等等。在这一领域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均未给农村带来任何积极的效应。不过工业化的确实现了。”

“我们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还是要谈损失，你们知道，现在谁也无权指责那些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们，因为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对我国产生的后果将是惨不忍睹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不容置疑、客观存在的正面的东西，但却为之付出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着镇压。这是事实，我们有数千万同胞遭受了镇压的摧残。用这种方式来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不可取的……”

“对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Екатерина Рыбас

СТАЛИН
СУДЬБ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斯大林传^上

命运与战略

〔俄罗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林娜·雷巴斯 著
吴昊 张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俄罗斯)雷巴斯,
(俄罗斯)雷巴斯著;吴昊,张彬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042-6

I. ①斯… II. ①雷…②吴…③张… III. ①斯大林
,J. V. (1879~1953)—传记 IV. ①A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714号

责任编辑 周 峥 曹怡波
封面装帧 张志全

斯大林传

——命运与战略

[俄罗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林娜·雷巴斯 著

吴昊 张彬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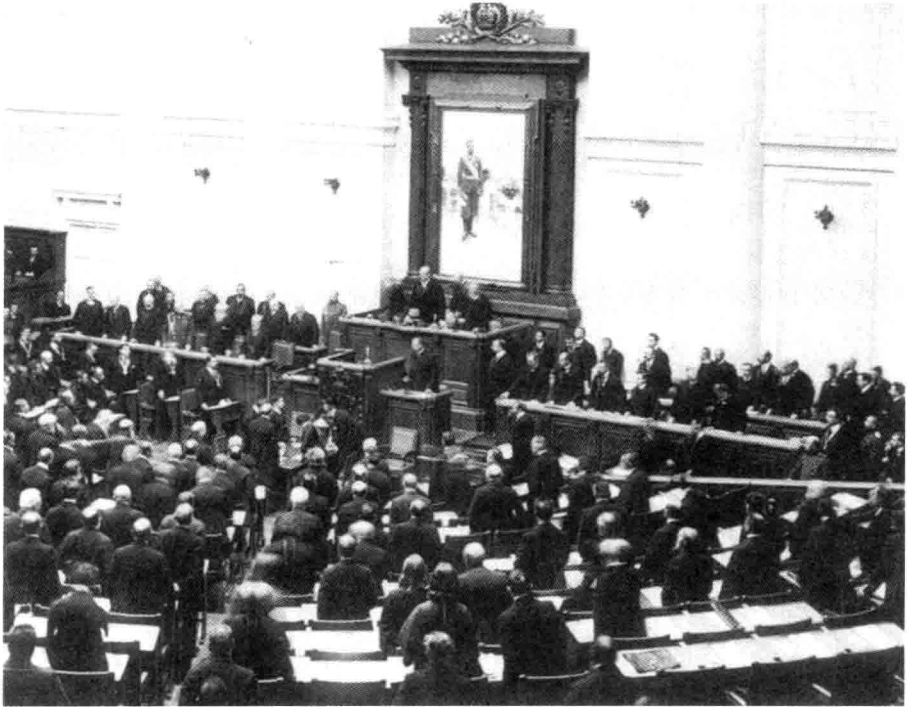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70.5 插页 40 字数 1,364,00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042-6/K·2153

定价 168.00元(上下册)



国家杜马会议

维特



斯托雷平





尼古拉二世



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



斯大林的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

哥里，斯大林的老宅





斯大林，1902年

斯大林，1893 年



斯大林，1908 年



警察局留存的斯大林案卷，1911年

被流放于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
斯大林（二排左三）、加米涅夫（左四）、斯维尔德洛夫（二排右二）



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



托洛茨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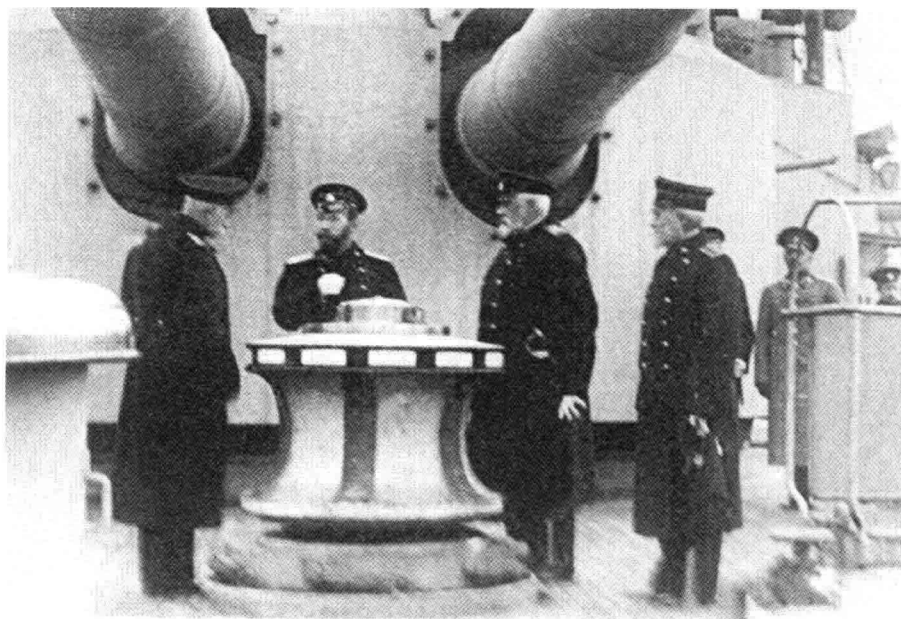




斯大林和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1918年

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布琼尼





尼古拉二世在“叶夫斯塔菲号”巡洋舰上，塞瓦斯托波尔，19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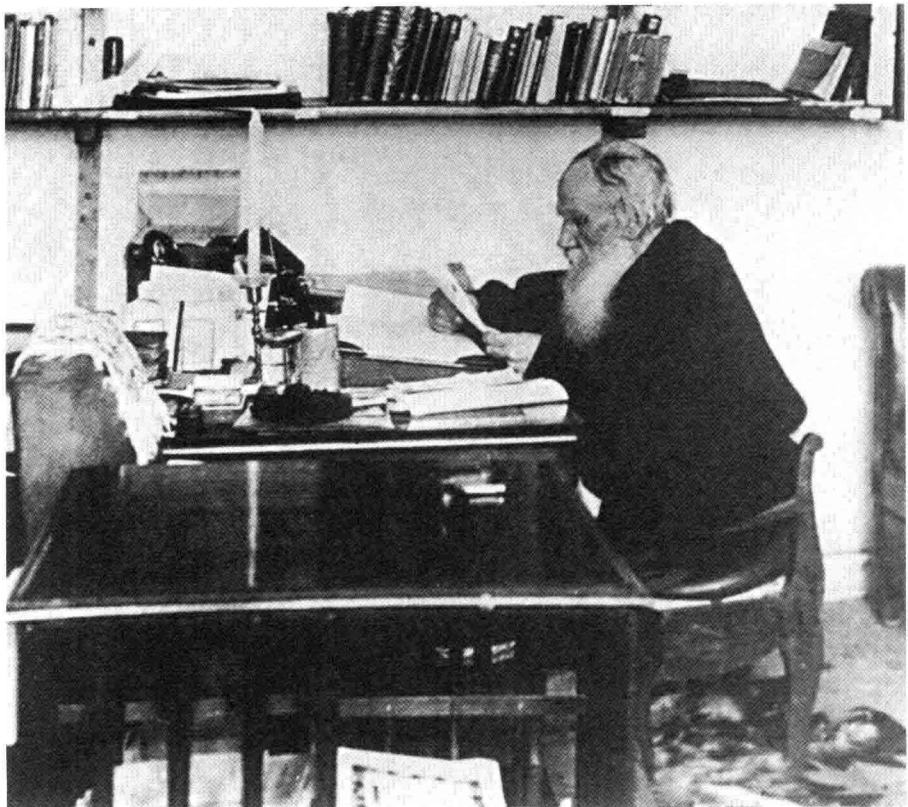
面对士兵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彼得格勒，1917年





马克西姆·高尔基给布尔什维克党储蓄所提供了几十万卢布的经费

列夫·托尔斯泰是帝国国家秩序的反叛者





立宪民主党首领彼得·米留可夫



临时政府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彼得·帕尔钦斯基

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瓦西里·罗将柯



1905年的内务部长彼得·杜尔诺沃





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
奥尔忠尼启则在南方战
线，1919年10月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
察里津战线的战壕中》，
库金画





斯大林，1920年



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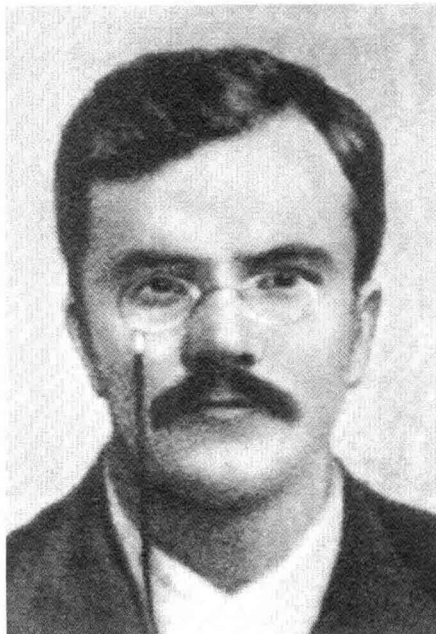


基洛夫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者，1922年4月

莫洛托夫

奥尔忠尼启则





伏龙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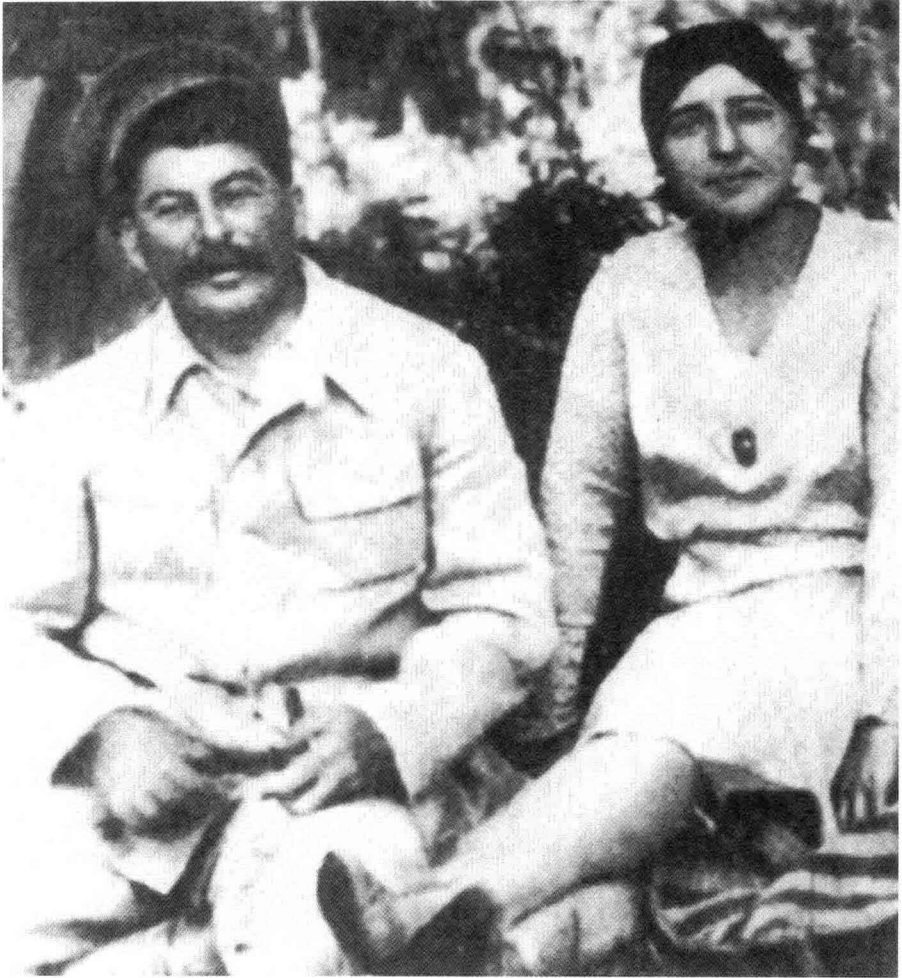
卡冈诺维奇

捷尔任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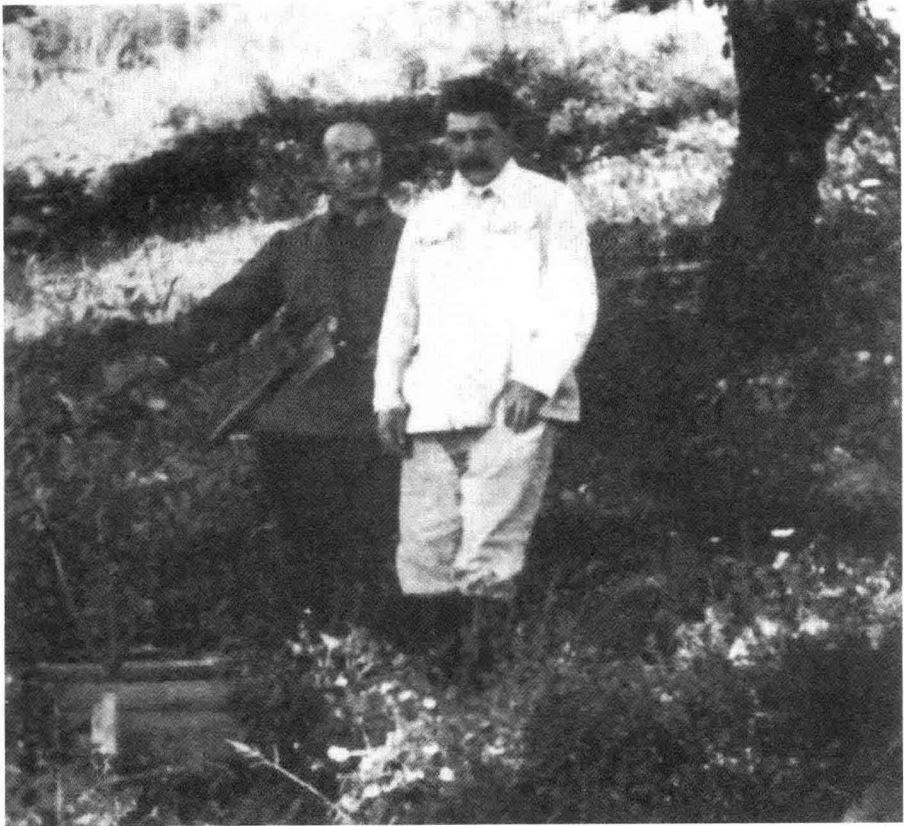


日丹诺夫





斯大林和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



斯大林和贝利亚在索契休假，1932 年

斯大林在基洛夫灵柩边，1934 年





斯大林向莫斯科地铁建设者发表演讲

斯大林在索契休假，
193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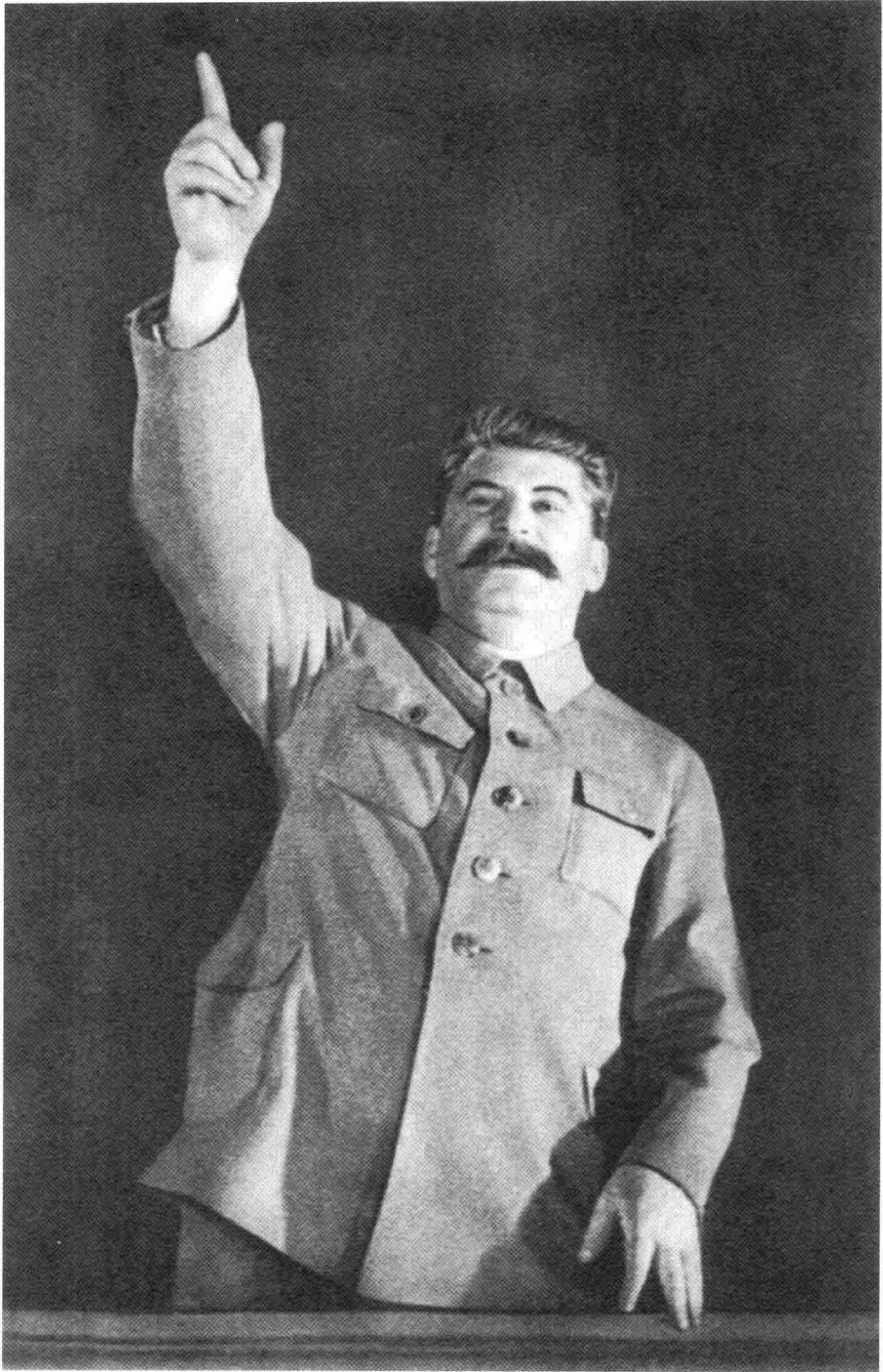


斯大林在休假，1933年8月（照片来源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局汇编并赠送给斯大林的相册）





五十寿辰当天的斯大林，1929年12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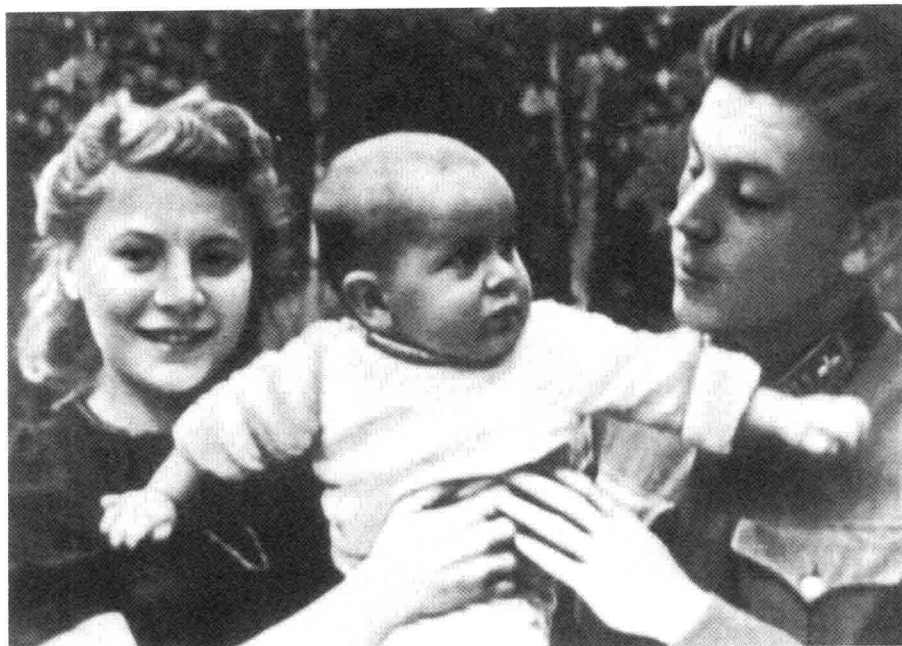
这张照片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曾被众多宣传画所采用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布琼尼妻子的外甥女奥莉加·克利莫维奇、布琼尼、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在索契的9号国家别墅，1934年8月

瓦西里、雅科夫和斯维特兰娜在奶奶床边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上校与妻子加林娜·布尔东斯卡娅和儿子亚历山大，1942年

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





斯大林抬着列宁的灵柩，1924年1月



米高扬、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

“斯大林集团”，左起第一排：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莫洛托夫、基洛夫；第二排：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





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在晓尔科沃机场欢迎完成了从莫斯科至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不着陆飞行的安特-25型飞机的机组人员
斯大林和契卡洛夫拥抱，1936年8月10日

斯大林只带一个警卫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巡视，19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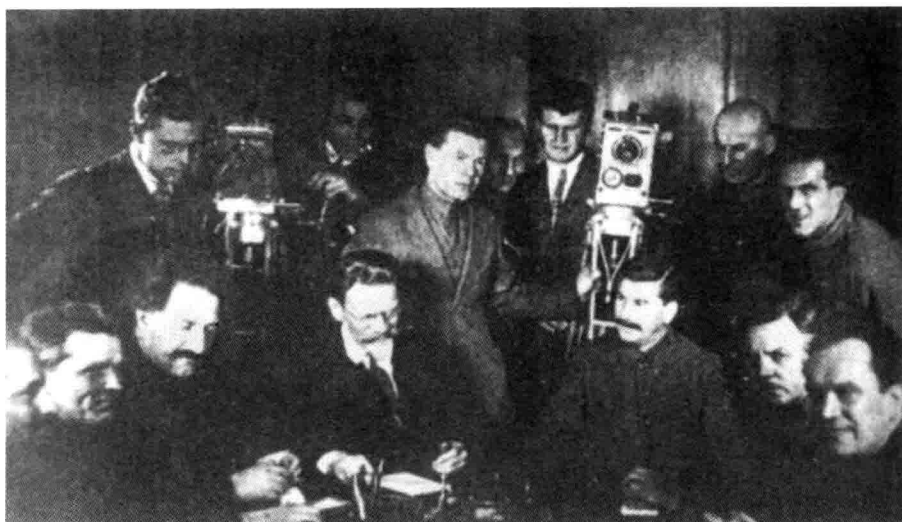
斯大林站在黑海舰队“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的甲板上，1929年7月25日



布尔加宁、日丹诺夫、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出席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1938年1月15日

斯大林在察看“吉斯牌”新型汽车





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从左到右依次是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后排是新闻摄制组的成员

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和亚戈达在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



中译本序：“斯大林就是苏联”



在当今的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多如牛毛。有把斯大林称之为“社会主义圣徒”、“社会主义教父”、“社会主义伟大天才”的著作，也有把斯大林描绘成是“暴君”、“刽子手”、“阴谋家”等等的书籍。因此，在俄罗斯的语言中“Сталиниад”这个词就具有了新的包罗万象的意义，其主要含义就是“斯大林研究的功过评说”。而当代“斯大林研究”中语气铿锵的政治对垒和刀光剑影的杀伐之气却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无论是赞颂说者，还是谴责论者，几乎都是从社会主义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都是从社会主义的领袖这个立场来评价斯大林的。

雷巴斯父女的这部《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却显然让人耳目一新。他们并没有完全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评述斯大林的一生，也没有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书写斯大林的功过。他们借用了斯大林对儿子瓦西里说的一句话作为评价斯大林的最主要线索，这句话就是“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在雷巴斯笔下，斯大林和苏联是同义语，是一个等同的不可分离的事物。

从传记中的描述来看，“斯大林就是苏联”的含义大概有三个层面：首先，斯大林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其次，斯大林是千年俄罗斯传统的继承和东正教文化的符号；最后，评价斯大林就是评价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苏联。因此，“斯大林就是苏联”成了这部传记的大背景，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整个苏联的历史进程都在这一大背景下展现，斯大林个人及其妻儿的生活与变迁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的悲欢离合。采用这种大背景，雷巴斯要告诉读者的是：斯大林传记不仅是他个人的传记，而且是全苏联的“传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评传实际上就是雷巴斯笔下的斯大林时



期的苏联史。

这部苏联史中的主角是斯大林，但是这个苏联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个斯大林也不是在漫长岁月中被歌颂或遭谴责的斯大林。在雷巴斯的笔下，斯大林变成了一个超越时空、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越特定时期特定政治和人文符号的英雄，是千年俄罗斯的承继者，而斯大林对国家的治理也就是自伊万雷帝、彼得大帝伊始的俄罗斯国家管理方式的延续。因此，雷巴斯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是：“要知道斯大林可不是横空出世的，他是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俄罗斯历史环境的产物。俄罗斯立宪民主党人与当局作斗争时曾请求过‘地狱之河’的帮助，他们当时并未料到这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意志坚定、清心寡欲、理智且残酷的领袖的出现，是对那些毁掉了俄罗斯国家的帝国精英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的革命报复。斯大林站在与维特和斯托雷平未完成的改革相反的那一面。他重建了国家，并依靠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将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雷巴斯总的评价是，俄国特有的环境和氛围决定了斯大林的事业。他讲述了三条理由。第一，是俄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的、居民生活远远逊于西方国家的贫穷处境。他说：“国土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特点，是决定国家千年历程的主要因素。恶劣的自然条件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决定了俄罗斯居民的贫穷和执政当局物质资源的有限……形象地说，自古以来，俄罗斯居民就生活在潮湿黑暗的地下室里，而西欧人则住在阳光明媚的高楼大厦里。”第二，“罗斯和俄国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许多代人悲剧式、超限度的承受力，这种承受力使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和大自然所能赐予的之间的鸿沟得以弥补。所以俄罗斯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军事实体，其体制是动员式的，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精英利益所需要的民主协商。几百年来，政权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人民来达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企及的目标”。第三，西方国家的社会基础是精英之间的协约关系，而在俄国则是另一种制度，“一种其贫乏的资源不可能分配给私有者，而只能由最高统治者掌控的制度。为祖国忘我服务的思想成为俄罗斯国家意识的主流就不是偶然的了，而在东正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的爱和仁慈。这与天主教不同，对天主教而言，是信徒与上帝的契约关系。因此俄罗斯一直是带有独特文化符号的或多或少有点神秘的国家。”

因此，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出现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对此，他说了句富含哲理的话：“历史上常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延续千年的偶然就是不可能的了。”非偶然性决定了斯大林一定要为争夺资源而斗争，一定要以动员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定要让社

会自我牺牲地为苏联效劳，在斯大林的“上帝的爱和仁慈”中生存。在这三者之中，动员式的制度是苏联体制的核心，自我牺牲地为苏联效劳是统治意识，而为争夺资源、赶超西方而斗争则是目的。在雷巴斯看来，俄国的精英只要是违反了这一机制，他就要垮台，国家也将遭殃。雷巴斯说：“20世纪初，在俄罗斯历史上，执政当局首次开始尝试由动员到民主的发展机制的转变，然而却导致了灾难。此时俄罗斯居民中不同群体文化和观念的矛盾就成了燃起内战和混乱之火。”

雷巴斯就是这样评述十月革命的，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历史进程中存在的两个集团。雷巴斯说：“布尔什维克出现在了事件的中心，因为他们是最坚定的力量。在这个力量的中心有两个集团：列宁集团和斯大林集团。前者依靠的是侨民，后者依靠的是国家的组织工作者。”换句话说，在雷巴斯的描述中，列宁是一个脱离俄国国内实际情况、紧紧依靠侨民的思想家，而斯大林才是真正了解国情并拥有真正革命者支持的实践家。雷巴斯的这种划分实际上要说明的是，斯大林才是十月革命的真正领导人，斯大林的作用不仅凌驾于列宁之上，而且是其他布尔什维克无法超越的。雷巴斯认为，十月革命前后唯一没有失算，没有犯错误的人就是斯大林。

正是这个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成了“党的‘将军’”，“俄罗斯在苏联的旗帜下再生了。斯大林成为再生的领导人。他重建了类似古希腊模式的国家（政权和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实行独裁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斯大林必须采用动员的办法来进行专制管理并发展经济。

由于俄国是个农村人口占85%的农业国家，因此斯大林的动员制度首先就是针对农民的。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到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国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就是对农民进行动员的全进程。雷巴斯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群体，“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既与红军，也与白军作战，只要他们能让他们安静生活就行。至于说什么工业化，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所以，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是进行的“第三次革命”，是要“按照美国大的谷物工厂的模式将农业转到工业的基础上来”。此外，新经济政策并未能提供发展的资金，党的中下层领导的办事作风和贪污腐败令农民不满意，这是决定实行集体化的原因。“斯大林集团的决定重创了俄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但是不执行集体化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计划上都绝对是不行的。”

雷巴斯在书中肯定了集体化的进程，但他同时也承认，集体化“令整个俄国社会动荡，激起了统治精英、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可是，他仍然坚持一种意见：“如果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另外一些人，比如，尼古拉·布



哈林,那位主张农村渐进(斯托雷平式)发展的人,那多半也是要使国家垮台的。”

对于与集体化相并行的工业化,人们经常提到当时利用囚犯劳动力的问题。而雷巴斯对此是这么描述的:“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去深究,那么由这些犯人所修建的运河、铁路、水电站、港口、工厂、矿场、矿井、油田可以比作俄国北极开垦拓荒的新阶段。这种开拓类似于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创建‘北方的底比斯’时那样:修道院的拓荒建立了北罗斯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空间,因为不具备完成既定任务所必要的资源,其过程是极为艰辛的。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体系中就反映出了俄国几世纪以来‘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传统。”

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斯大林加强和加快了争夺世界资源的斗争。雷巴斯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并渲染了斯大林和罗斯福及丘吉尔之间的争斗。雷巴斯说,在这场争斗中,谁都在欺骗人,而斯大林的骗术高人一等,这种精明的骗术都是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成了高于罗斯福、丘吉尔的战略家,为苏联争得了许多的资源。斯大林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因此,雷巴斯说:“莫斯科曾经充当过第三罗马。而现在它在世界性危机的背景下又成了‘红色罗马’。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雷巴斯看来,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并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而是将军们的差错。雷巴斯借用了民意来评述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在俄罗斯人的历史意识中,6月22日根本不是斯大林失败的象征,而是与蒙古入侵一样的民族大悲剧的标志。就像没能防止国家受到更强大敌人侵略的古俄罗斯大公们一样,斯大林也没有被看成1941年所发生之事的唯一罪人。”

对于战争初期的失利,常有人指责是由于“大清洗”对军队的摧残。而雷巴斯的描述是:“1937年至1938年对指挥人员进行镇压的不良后果,1941年夏季时得到了部分扭转,因此不能把这列为我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那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呢?雷巴斯说:“这不是日期上的失算,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有意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犯了一个错:他过高估计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按师的数量和战斗装备来看,苏联军队要比德国军队强很多,这是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部也同样)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失算之处。”

在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中,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对垒和争斗是根主线。雷巴斯笔下的朱可夫是个骁勇善战的指挥官,但斯大林比他更高一筹。雷巴斯说:“可为什么我们只从军事的角度去衡量他的决断呢?谁说过战争只是

军事行动？何况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军人，而是一位高于军人的人。他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情况。”

雷巴斯对战后斯大林的统治方式有个概括：斯大林把战前的斗争方式搬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他对战后的苏联情况是这样看待的：“实际上，胜利之后，除了情绪高涨之外，非战时的生活并未到来。”雷巴斯对这个结论用事实作了陈述：“所有的苏联民众原来都期盼着，在5月9日之后马上就可以松了一口气，生活可以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他们突然发现，生活不仅一点点都没有轻松起来，反而更加艰难了。现在，工作日又恢复到了8小时工作制，而非11小时：废除了义务加班。但工资却急剧地减少了。军工企业转产民用产品也很不顺利，经常因为原料不足而造成停工，这又影响到了本来就微薄的工资。在战争中消耗巨大的农村同样没有迎来任何曙光。1942年发布的那些提高劳动日义务工作量和对未完成者处以刑事惩罚的命令还在继续执行。他们可被迫在自己的集体农庄里进行长达6个月的劳动改造，并扣除个人工资的25%上交给国家。政府也没有要减轻每户农家都需上缴的农业税的打算。”“总之，苏联的整个农村地区在这些年承受着对于非战争年代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与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相提并论的重负。根据各种估算，当时由于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斯大林极权制度的牺牲品，也可以看成是那场不是斯大林挑起的‘冷战’的牺牲品。如何看待取决于每个人获知的信息和所持的立场。”

在这里，雷巴斯对他们曾经赞扬过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也提出了质疑：“从实际情况来看，战后的苏联经济（包括有近250万犯人在劳动的建筑工地）与战时区别不大。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经济。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人们在消耗自己的体力达到极限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支撑下去吗？”

雷巴斯对战后苏联生活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的苏联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人们生活在政治地位、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差异之中：“但这一事件却也包含了其他发人深省的东西。战后的苏联形成了一个小的享受着很高物质水平的权贵阶层，他们是将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学者、党的领导人和商业人士。这些人获得了对于苏联来说空前的财富（在普遍仍处于贫穷的背景下），他们理应明白，这些财富并不牢靠，并有可能随时失去。”

雷巴斯认为，斯大林一生的宏愿，他的“战略构想”就是“国家利益高于宗派集团和地方主义的利益”。为此目的，在十月革命后的漫长岁月中，他无休无止地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派别之争，也粉碎了要闹山头和搞独立的地方势力。在战后的岁月中，斯大林重操旧业，试图利用战前的手段重建



一个大帝国。尽管他先后除掉了列宁格勒集团和身边的莫洛托夫等“投降派”，但他的这个战略构想却远未能实现。斯大林本人成了斯大林事业的障碍和限制者，所以，雷巴斯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正如我们所见，要想实现我们主人公的战略构想，需要他离开人世，即消除这个构想的主要限制者。”

在历来对苏联历史进程和斯大林本人功过的论述中，有五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一是对 20 世纪 20 年代俄共(布)党内的斗争及“列宁近卫军”的被消灭；二是 30 年代遍及苏联全境的对“人民之敌”的“大清洗”；三是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和直接工业化问题；四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与过；五是战后的斯大林统治。在这本传记中，雷巴斯对这五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承认斯大林在这五个问题上都有过错。雷巴斯在斯大林功过的总评价上说了一句话：“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的，而他犯下的罪行也是可怕的。”在这里，雷巴斯确实是用了“罪行”(грехи)，而不是“错误”或“失误”(ошибки, провал)。

雷巴斯之所以用“罪行”二字，意思是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允许和不可饶恕的。比如，雷巴斯在讲述战后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谋杀时，就指责这是斯大林的预谋：“对于斯大林来说，米霍埃尔斯无疑是应该受到惩办的。那么是否可以进行一场公开的审判，来指控这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从事间谍活动及其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呢？看来，这种方案可能被讨论过。但显然被否决了，因为若是进行公开审判，那么以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作为诱饵和与美国犹太组织勾心斗角就都会暴露出来。斯大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走这一步的。而如果在审判中查出他的亲戚与米霍埃尔斯身边的人有牵连，那么就会让人感觉这有个人报复之嫌。总之，此时这位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人是如此束手无策。他选择了谋杀，这不仅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也分裂了苏联的统治精英阶层。从此之后，他内心的行为准则就变得没有理性可言了。”

当然，在雷巴斯看来，斯大林所犯的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罪行。雷巴斯说：“以牺牲轻工业的代价过度地发展重工业，给农民施加了过重的经济压力，过度强调中央集权而损害了地方的利益。”这是错误。但是，“最主要的错误，大错而特错的，就是把苏联变成了一个由官僚集团控制的官僚主义国家。”

雷巴斯在讲述斯大林的罪行和错误时，没有离开三个判断标准：第一，权力上的；第二，心理上的；第三，环境压力上的。斯大林一生的活动没有离开过这三重压力。执掌政权的压力让他时刻提防权力的丧失，巩固权力的

欲望与行动使斯大林饱受心理压力之苦，为争夺资源的环境压力是斯大林挥之不去的魔影。在这三重压力下，斯大林不得不在成就与错误（罪行）、胜利与失败中负重前行。雷巴斯在讲述斯大林的罪行与错误时，都会引用这“三重压力说”来解读，因此这也就成为雷巴斯在解说斯大林罪行与错误时的辩词。

比如，人们常常指责斯大林的残暴造成了人民的苦难，而雷巴斯说：“不管多么遗憾，苦难从来都不是评价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参数，自古至今，目标和精神的是否崇高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在对斯大林一生的教训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以追求公正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巨峰。”因为在雷巴斯的笔下，斯大林是千年俄罗斯的承继者，是那些曾令这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和骄傲的帝王的后来者，因此，传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从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大帝，他们在生活中都远非天使，也曾让鲜血流淌成河。”雷巴斯还写道：“一提到斯大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统治的强暴和残酷。从人性的角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像看待彼得大帝、拿破仑、克伦威尔、俾斯麦或是毛泽东那样（也只应该这样去看待），那就应该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

对斯大林的残暴，雷巴斯的解释是：“毫无疑问，斯大林相信革命的暴力和世界的公正可以使人们变得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传道者。后来，在围绕着这一思想开始进行国家建设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工程队队长或修道院院长。他明白，传承给他的这个国家不会屈从于直线变革。而其他的一切就都好理解了：社会工程、国家对生活所有领域的干预、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斗争。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少进行一场真正较量所必需的资源，大部分居民又主要生活在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为了国家利益压制个人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结果甚至连他的孩子们也都被压垮了。”

比如，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和30年代的“大清洗”，雷巴斯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当谈论斯大林的镇压和无辜的受害者时应该记住，他们都是同一个革命派别中的人；一旦获得胜利，斯大林的反对者同样会继续推行带来各种后果的工业化。”“如果深入挖掘一下‘党的悲剧’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分党员对另一部分党员的消灭，也就是主张国家强权的人消灭了主张世界性革命的人。当然，一些与此无关的人也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们是‘敌人’的熟人或是同事。这还代表着血腥和残酷的国内战争的彻底结束。”因此，在雷巴斯看来，无论是党内斗争，还是“大清洗”



都没有扩大化：“这表明，可以说 30 年代这些所谓的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不管受审人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其特点都是局限在党内，并且是按照另一些规则在处理。”

比如，在雷巴斯的评传中，斯大林的一生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实质是他的个人生活“国家化”了：“斯大林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但这种孤独是非常独特的：他似乎融入了国家事务之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国家化了。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是怎么对儿子瓦西里说的：‘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这是一个称得上是不幸的人的异乎寻常的悲剧式自白。但问题是：他的自我感觉是否是这样的？想必，有时斯大林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且还特别强烈。也就是为什么他常常用集体进餐、集体看电影和戏剧来填补自己的生活空间。”

雷巴斯还引用了尤里·日丹诺夫回忆录中斯大林亲口说的一句话来为斯大林辩解：“战争表明，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多内部的敌人，不像向我们汇报和我们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是白白蒙冤。人民本应为此让我们卷铺盖滚蛋。我们应该忏悔。”下面这段雷巴斯的话是很有文学味道的：“这个坦白完全推翻了 1937 年是精心策划的、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的标志的传统看法。斯大林明白他犯了错误。有可能，在他的梦中，那些被枪毙的人的幽灵来找过他，并用我们所不知的对话折磨着他。”

雷巴斯用一句话表达了对斯大林罪行和错误评判的结论：“他的有无罪过和他的凯旋式胜利，与他残酷的且屡犯错误的实践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斯大林模式。他要对一切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可以涵盖所有军人的、情报人员的、外交官的和战友们的错误。”

在这部传记的最后一章里，雷巴斯提出，在对斯大林一生功过的评价上，他同意毛泽东关于“三七开”的看法。雷巴斯讲述的下面两段话是很有意思的：“斯大林的命运是悲惨的：不幸的个人生活、妻子自杀、孩子们的失败人生。他缔造的那个国家也已不复存在。历史的流沙正在冷漠地覆盖他所有的事业。留下的只有一件事——共产主义的中国正繁荣昌盛。”“让我们回忆一段往事。1901 年，在清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俄国、英国和德国的军队进入了中国。在北京慈禧太后宫殿里的一次谈判中，一位英国外交官不无讽刺地对老态龙钟的清朝外务大臣说：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们争辩，要知道你们是一个战败国。对此这个中国人回答道：‘让我们过一百年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吧。’也许，这个中国人就是我们主人公的志同道合者。”

上面这些话大概就是雷巴斯所著斯大林传记的主要思想脉络。雷巴斯在写这部传记时反复强调，斯大林不仅仅是斯大林的个人现象，“问题不在

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肯定斯大林及其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斯大林对于国家是一个统一经济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的认知,在后苏联时期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中都表现了出来。”所以,可以看出,雷巴斯是要人们不要完全否定斯大林,因为否定了斯大林就是否定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千年传统和历史。

总之,《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是一部在俄国千年传统的统治制度和思想意识上,从心理、性格、道德等各个层面分析和总结斯大林一生功过的评传作品,它对斯大林的赞誉和肯定是极为清晰的,对他的罪行与错误的讲述与辩解也是另辟蹊径的。雷巴斯把矛盾的多面的甚至是分裂的斯大林归结成了一个意思:“就历史而言,斯大林的残酷、多疑和其它的阴森性格都是无关紧要的,他只不过是重复了在他之前伊万三世、伊万雷帝、彼得大帝做过的事情,而这些帝王的铁腕曾令老百姓处境艰难。”

在这部传记里,俄罗斯民族的千年传统意识在起着明显的作用,作者所呼吁的也正是这种传统:大国的传统,霸主的传统,东正教的传统。作者所期望的是,当今的俄罗斯应该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重新崛起并成为世界的大国、强国,继承祖先的霸业。所以,这部传记的潜在目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述。这部传记于2007年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以“著名人物生平系列丛书”出版时,出版者就加了一个模棱两可,但意图明确的导言:“约瑟夫·斯大林,他是谁?‘人民之父’和世界级的政治家,抑或是那个为政治犯建造劳改营和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人?是致力于建成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得到应有尊重的人,抑或是那个对自己周围的人都不相信的冷酷的和城府极深的国务活动家?是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睿智的和有远见的外交家,抑或是没有家庭幸福、得不到自己亲人和孩子理解的孤家寡人?”

这部传记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誉者有之,诋毁者有之。当年,身为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协会副主席的于尔根斯就这样评述道:这部传记“开始了斯大林研究的新方向。作者令人信服地证实,对俄罗斯的历史是绝不能割裂的,不能沉默的,不能歪曲的。在我国历史上,斯大林过去是怎样的现在还是怎样的,他不应该被抛弃或者被描绘成另外一个人:不管是卓越人物还是铁腕人物。作者讲述了客观事情,真话,还是真话。”

一位叫鲍勃科夫的大将对传记却持不同的看法:“这本书很突出、犀利,所以它是有害的。它将独裁者的概念翻了个个儿,因为它摆在第一位的不



是他的罪行,而是国家间为争夺政治主导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不断的秘密而公开的战争。当然,历史不是涅瓦大街。”

但对垒双方却有一个共同的关心之点:作为大国和强国的苏联(俄罗斯)的利益。这正如一位读者所言:“斯大林的一生,他的事业、斗争、上升和坠落,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是没有一点办法的事,不必对此诋毁和亵渎,而需要从中吸取教益。”

有意思的是,当雷巴斯把此书送给当年的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斯二世时,大牧首回信这样写道:“对我国历史道路和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思考,无疑是件很复杂的事。然而,应当承认,从历史上看,尽管俄国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但始终根据斯拉夫文化和精神的特点,在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里,对国家和亲人的爱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形态里,忘我地为祖国效劳是主要之点。我和你们一样希望,过去的历史不会白白流逝,它们应该被当代人所思考。所以,只有当俄罗斯最终成为精神强大、道德健康和经济发达的国家时,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欢乐。”在这里,大牧首没有直接评价传记的是非得失,而是间接表达了要继承和发扬千年东正教传统的愿望。

一本史书并不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人的专著,即使是最详尽、最具感染力的作品也只是一个人的作品,它同样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承认的历史。在当代的俄罗斯,史书众多,绝不能从一本书来肯定或者否定俄罗斯国家(包括苏联)的历史。那种拿着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就说“这就是苏联史”,“这才是真斯大林”的看法和做法是要不得的。我国有句古话:“别拿鸡毛当令箭。”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俄罗斯史书和历史人物的评说都是一家之见,或者说是一根鸡毛。对于当今的俄罗斯史书,你同意的要读,不同意的也要耐着性子来看。这样,从你同意的史书中会发现你曾经忽略了的或者误解了的东西,从你不同意的史书中你也会找到实情和真知。这种对比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追求真知的过程。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似乎是一把双刃剑,斯大林的赞誉者可以用来作武器,而斯大林的抨击者也会以它来反对反对者。我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雷巴斯也只是传记作者中的一个,书中所表述的也毕竟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我们又何必苦苦地拿它这根俄罗斯鸡毛当令箭呢!顺便说一句,其他的斯大林传记和俄罗斯的史书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读它是为了知道,在当今的俄罗斯存在这样一种对斯大林的看法,即斯大林是千年俄国传统承继者的看法,并且能清楚这种看法对于当今的俄罗斯(对统治者执政和权力,对普通人是民族感情和国家威望)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

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此外，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中国的那句古话“开卷有益”恐怕还是用得着的。看看缤纷世界里有那么多对斯大林的评说，我们自己的一家之言总是会有什么可修正和补充的地方吧。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4年前我才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这部斯大林传记，也才会在今天同意写这篇中译本序，因为这部传记所陈述的不仅是有关斯大林个人的生平，而且（尤其是当今俄罗斯人渴望再度成为大国、强国的愿望）是俄罗斯人要使斯大林成为千年俄国传统的继承人和俄国历代统治精英的又一代伟大领袖的愿望的表达。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较为清晰地了解现在一些俄罗斯人再次为斯大林树碑立传的关键动因。这种愿望虽不能说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但更多地却是与俄国的强国意志与渴求联系在一起，斯大林是作为大国统治者、强国领袖而再次出现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的。

事实上，我在学术观点上与这部传记所述的有不少不同之处，有些甚至有很大的分歧，但我认为并不影响我去读这部书，并不影响我去仔细地推敲书中的观点与结论。我觉得，我从通读这部传记中获得了不少的启迪，对于俄罗斯当今的重述斯大林之风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深入的认识，为我今后更好地理解 and 认识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以及诸如斯大林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提供了必要的营养。

我想有必要说一下传记的两位作者。老雷巴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长期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文学俄罗斯》等媒体工作，是俄罗斯很有名气的传记作家，传记作品有：《斯托雷平的生与死》、《维特传》、《库波捷夫将军》、《萨姆松诺夫将军》等。他还写有中篇小说《英雄之镜》并被拍成电影。在这部传记出版后的第三年，他又出版了《斯大林》一书。他还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修复观察委员会”主席。作为虔诚的东正教信仰者和斯拉夫文化的赞颂者，他获得过“圣谢尔基·拉多涅日斯基勋章”和“神圣莫斯科大公达尼尔勋章”。老雷巴斯现年64岁，当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叶卡捷琳娜·雷巴斯是他的女儿，是当代俄罗斯作家，以小说为主。小雷巴斯是第一次参与老雷巴斯的传记写作工作。

最后，我要说一下本书的译者吴昊先生。也许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吴昊先生和老雷巴斯一样，他的博士学位也是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攻读的，只不过吴昊要晚许多年。吴昊的俄文功底深厚，在文学院的学习使他对文学的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精神的俄罗斯有了与他人不同的深刻感受。文学院毕业后，他一直留在莫斯科做中俄文化交往和中俄友好工作，与莫斯科、



斯大林传 第一卷

(命运与战略)

俄罗斯的各阶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他的俄语口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中，吴昊先生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是我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他翻译这部传记的动因。

吴昊先生在莫斯科的华人中享有盛誉，因此当选为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和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秘书长。此书的翻译工作始于三年之前，三年多来，吴昊先生坚持这项翻译工作，在工作之余，起早贪黑地努力。最后，为了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不得不躲起来，集中精力于本书翻译的合龙工程。真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只闻笔下事。此书的翻译完成，也使吴昊先生对历史的俄罗斯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和认识，这定会为他所从事的中俄文化交流事业增添新的活力，而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其夫人张彬的加盟，使这部翻译作品成了他俩爱情的又一结晶。

译者前言

吴昊 张彬

201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60周年纪念日。上千民众冒着严寒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执委会主席久加诺夫的率领下,向位于红场上的斯大林墓敬献了花圈。久加诺夫对记者表示:“今天是伟大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最高统帅、在苏联掌舵30年并带领它走向胜利之巅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悼念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红场,就是要向斯大林、向苏维埃时期的杰出代表们、向我们取得的伟大胜利致敬。”

从1991年开始,每年的10月30日是俄罗斯政治镇压中受害者的纪念日。2012年的这一天,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会见统一俄罗斯党地区积极分子时说:“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不仅是斯大林,还有一系列其他领导人毫无疑问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因为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是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普京对斯大林最直接最明确的评价,是他2009年12月3日在“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话(续)”电视直播连线交流特别节目中说的一段话。当被问及“概括地说,您对斯大林的行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时,普京回答道:“我保留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一问题的尖锐性。社会上对此有非常之多的争论,我能看到这里的‘圈套’:你说‘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满意;而你说‘是否定的’,另一部分人又会不满意。不过既然时至今日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话题仍然争论不休,我就特意留下了这一问题。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无法笼统地下结论。显而易见,从1924年至1953年,这个国家,这个当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诚然,农业未能得以保留,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农业方面的困境,特别是在集体化的后期,记得人们排着长队去购买食品等等。在



这一领域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均未给农村带来任何积极的效应。不过工业化的确实实现了。我们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还是要谈损失,你们知道,现在谁也无权指责那些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们,因为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对我国产生的后果将是惨不忍睹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不容置疑、客观存在的正面的东西,但却为之付出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着镇压。这是事实,我们有数千万同胞遭受了镇压的摧残。用这种方式来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不可取的……对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普京、梅德韦杰夫和久加诺夫这三位今日俄罗斯最著名的政治家对斯大林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虽然多多少少隐藏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却从不同视角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的认知和看法。由于较长时间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我们在与俄罗斯学者和民众的交往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一些历史真相越来越清晰,但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的评价依然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我们所译的雷巴斯父女的这部斯大林评传出版于2007年。其时俄罗斯主流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已远离了神圣化或妖魔化两个极端。加之苏联档案的解密,使作者有条件更为客观公正地去还原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研究斯大林的成长轨迹,去探寻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去挖掘历史谜团背后的真相。这部传记的独特性是作者没有简单地围绕着斯大林来评说其一生,而是花了大量的笔墨,把斯大林放在纵、横两大时空交汇中去叙写:纵向来说,斯大林是俄罗斯历史长河中的斯大林,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俄罗斯历史的传承者,有了伊万三世、伊万雷帝和彼得大帝,才有了这样的斯大林;横向来讲,斯大林是沙俄革命浪潮中的斯大林,是内战、外战烽火中的斯大林,是家庭生活中的斯大林,是政党、派系和权力斗争中的斯大林,是大国博弈中的斯大林。正是俄罗斯向苏联变轨的历史转折时期,世界各国激烈角逐特别是二战的大棋局这个时空交汇点,将传主的是非得失与俄罗斯民族的荣辱盛衰、世界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雷巴斯笔下的斯大林不仅是作者眼里的斯大林,而且是托洛茨基、卡普琴科、叶梅利亚诺夫、巴扎诺夫、米纳科夫、阿利卢耶娃笔下的斯大林,也是伏罗希洛夫、朱可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贝利亚、赫鲁晓夫口中的斯大林,还是列宁、罗斯福、丘吉尔及希特勒、墨索里尼眼中的斯大林……在作者笔下,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位原姓朱加施维里的小男孩怎么在贫困、监狱、流放的困境中从索索成长为柯巴,再最终成为斯大林(词义是

钢铁)的;怎么从一个国家秩序的反叛者、一个在革命初期就被怀疑为背叛者的人变成一个国家秩序的捍卫者的。这可以说是雷巴斯版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有关这是一部怎样的评传作品、其主要思想脉络,以及俄罗斯各界人士对该传记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资深专家闻一先生在为这部中译本所写的序中作了精辟的阐述,我们就不再赘言了。想补充的一点,是本书作者对传主的两面评价和对自己写作目的之定位。老雷巴斯在与译者交谈中说道:“我的传记有别于其他关于斯大林的著作之处在于,我既把斯大林看成一个大伟人,也看成一个大罪人。对他,我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恶意诋毁。我试图通过这部传记对我们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再反思,以便我们能够整装前行。”在原作之序中,我们也接收到了这一信息:古老的俄罗斯在苏联旗帜下不可思议地再生了。斯大林重建了类似古希腊模式的国家,实现了其结果令人震惊的现代化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强国。然而,苏联最终解体了。“这一命运的教训是什么呢?”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也正是译者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但常常有祸福倚伏、成败相因的历史沧桑感,而且深感应该重视对斯大林这位20世纪最具争议性政治人物的再研究,再认识,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得失成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一面镜子。

翻译是件不容易的事,翻译领袖人物传记更非易事。因为其涉及面极广,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意识形态、民风民俗、方言俚语;从俄罗斯历史、传主的个人史,到与其他国家角逐中的分分合合,与国内外对手较量中的的是是非非,几乎无所不包。这就要求译者有更宽广的知识积累,更深厚的学术功底,更严谨的科学态度,其中的艰辛可能只有译者自己能够体会到。记得只是为了搞清楚俄语中似乎再简单不过的“兄弟(брат)”一词,是译成“哥哥”还是“弟弟”更贴近中文版读者的认知习惯,便在列宁图书馆查了几天相关资料。原作中的日期也是翻译中的两难之事。俄国从前使用的是教会历法,以公元前5508年为创世纪元年。因这种历法不利于俄国与欧洲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和外交活动,1699年12月30日,彼得一世宣布采用儒略历(俗称旧历),纪年从基督诞辰算起;儒略历在俄国一直沿用到1918年1月31日,其后又改用格里历(或称新历、公历)。旧历与公历的换算公式如下:旧历的日期比公历晚,15世纪晚9天,16、17世纪晚10天,18世纪晚11天,19世纪晚12天,20世纪晚13天。本书原作中出现的日期如无特别注解,1918年1月31日之前用的是旧历,之后则是公历。翻译成中文时如果一律改用公历,费时费力事小,译作走样事大。好在中国读者也有以农历、公历



或国号纪年的传统习惯与阅读经验,翻译时就作尊重原作处理了。顺便提一句,译作中也不无走样之处:对原作中因排印等原因而留下的美中不足的讹误,在通过其他中外文献详加考证的基础上作了修正。

在翻译此书的三年中,忙到凌晨一两点钟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睡梦中还冒出把俄文译成中文的呓语。每当夜深人静倦意来袭,或者慨叹翻译犹如蜀道之难时,是师辈的耳提面命,朋辈的支持激励使我们最终完成了这一翻译工程。在我们向俄罗斯语言文学的殿堂登攀之路上,在我们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中,给我们以言传身教的师辈,有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张杰教授,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副院长斯克瓦尔佐夫院士,莫斯科大学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华克生教授等;给我们以支持帮助的朋辈,有与我们情同手足的虞安林会长、刘军、严秀成、高源等活跃在侨界、商界、学界的海外赤子。给我们以认可和提携的,还有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包括李辉大使、邓山林总领事和迟润林文化参赞在内的外交官们,有中央和相关省市涉侨部门的各级负责人,有教育文化界的诸多领导,是他们使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游子深感祖国的温暖。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闻一、刘斌两位老师,不会忘记他们的鼓励、支持和辛勤付出。借此机会,我们对他们,对所有提到名字和没有提名却同样记在心里的师友和亲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俄文版序：约瑟夫·斯大林是典型的俄国领导人

为什么俄罗斯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偏偏是斯大林领导了她？

领土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特点，是许多世纪以来决定国家千年历程的主要因素。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所产生的后果——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决定了俄罗斯居民的贫穷和执政当局有限的物质资源。而西欧则具有更多的可能来积累资本，这就首先影响到这些国家对生活的安置。

在俄罗斯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每年只有五个月（125 到 130 天），在欧洲这个周期要长一倍多因而产量要高得多。形象地说，俄罗斯居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潮湿黑暗的地下室里，而西欧人则住在阳光明媚的高楼大厦里。

尽管如此，俄罗斯人还是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现象。美国研究者理查德·派普斯写道：“大自然……预先决定了俄罗斯是一个由许多独立、自治的共同体组成的割据的国家。”

罗斯和俄国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许多代人悲剧式、超限度的承受力，这种承受力使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和大自然所能给予的之间的鸿沟得以弥补。所以俄罗斯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军事结构，其体制是动员式的，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精英利益所需要的民主协商。几百年来，政权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人民来达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

在不间断地防御来自西方和南方的威胁中，俄罗斯人被迫选择了相应的政治传统。如果说西方的社会基础是精英内部以法律来调节所有权并保护国王与臣民的契约关系，那么在俄罗斯则形成了一种其贫乏的资源不可能在私有者之间分配，而只归最高统治者所掌控的制度。为祖国忘我服务的思想成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就不是偶然的了，而在东正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的爱和仁慈。这与天主教不同，对天主教而言，是与上帝的契约



关系。因此俄罗斯一直是带有独特文化符号的或多或少有点神秘的国家。

尼古拉二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试图急剧改变权力机制的政策，其政治败笔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符号，而奢望通过快速推进国家权力关系的民主化，精英会把俄罗斯变成像美国或英国那样的国家。但是精英们刚一获得政权，国家就开始瓦解。

能否把大公、沙皇和帝王们为强化国家统一与自己的政治精英所进行的几个世纪的斗争视为偶然事件及其恶意的表现呢？历史上常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延续千年的偶然就是不可能的了。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至少曾有过三个俄罗斯：一个在与外敌作战并行使权力；另一个在维持国家的生存；第三个在难以忍受的权力压制下常常出走并叛变。

在文化甚至在宗教方面，同样存在各种群体。20世纪初，欧化的彼得堡统治中枢与平民罗斯的继承者之间少有共同之处，这个平民罗斯首先被分为正规东正教信徒和同时信奉着基督、美人鱼和树精以及红色和黑色“百人团”的魔法东正教信徒。然而，这些人群却联合在沙皇、“受过登极涂油仪式的君主”、国家行政和精神领袖的形象之下。

20世纪初，在俄罗斯历史上，执政当局首次开始尝试由动员到民主的发展机制的转变，然而却导致了灾难。此时俄罗斯居民中不同群体文化和世界观的矛盾就成了燃起内战和混乱之火。沙皇及其家族成员被杀害、政治精英被摧毁、帝国文化的承载者彼得堡统治中枢被驱散。

此后，就发生了类似于1612年混乱时期后一样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俄罗斯在苏联的旗帜下再生了。斯大林成为再生的领导人。他重建了类似古希腊模式的国家(政权和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实行独裁统治)。在他的动员体制下，俄罗斯实现了其结果令人震惊的现代化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强国。就历史而言，斯大林的残酷、多疑和其他的阴森性格都是无关紧要的，他只不过是重复了在他之前伊万三世、伊万雷帝、彼得大帝做过的事情，而这些帝王的铁腕曾令老百姓处境艰难。

然而在斯大林去世后，由于这种政权所固有的内部争斗和缺少与精英利益协调的机制(或者说，民主)，苏联解体了。

这一命运的教训是什么呢？

斯大林及其成就与错误是和千年国家的发展史相吻合的。应该不带愤怒和偏袒地去看他的一生，因为，否则就很难从中吸取对未来或多或少有益的教训了。

归根结蒂，问题不在斯大林或彼得大帝。问题在于对历史道路的思考。

目 录

- 中译本序：“斯大林就是苏联” 闻 一 / 1
译者前言 吴 昊 张 彬 / 1
俄文版序：约瑟夫·斯大林是典型的俄国领导人 / 1

第一卷

- 第一章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 3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家族的崩溃、母亲的个性、教会的影响、初识马克思主义、维特工业化、第一次被捕
- 第二章 流放与逃亡 / 21
流放与逃亡、斯大林成为党的工作人员、俄日战争开始、斯大林参加武装冲突和罢工、“流血的星期日”、娶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为妻、儿子出生、妻子去世、朴次茅斯和约、总罢工、尼古拉二世发布宣言
- 第三章 斯大林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 49
斯大林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杜尔诺沃是革命的镇压者、斯大林与列宁相识、“俄国革命的精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彼得·斯托雷平和国家杜马、社革党的恐怖活动
- 第四章 斯托雷平改革 / 80
斯托雷平改革、梯弗里斯的剥夺、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岗位的冲突、斯大林被流放到维切格达和逃跑、当选党的俄国局成员
- 第五章 第二届杜马 / 99
第二届杜马、斯托雷平压制革命、《路标》——知识分子的忏悔
- 第六章 斯大林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 / 106
斯大林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前往克拉科夫见列宁、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



第七章 欧洲同盟的形成 / 119

欧洲同盟的形成、И. H. 杜尔诺沃的预言、战争前夕的欧洲

第八章 世界大战开始 / 124

世界大战开始、尼古拉二世高尚的情感不合时宜、A. B. 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第二军团做出牺牲、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赞成帝国失败、德国领导层决定从内部瓦解俄国

第九章 将军们建议尼古拉二世实施独裁 / 134

将军们建议尼古拉二世实施独裁、英国人的阴谋、拉斯普廷被杀、二月革命

第十章 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党的临时领导人 / 141

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党的临时领导人、临时政府内的冲突、彼得·帕尔钦斯基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国家的崩溃：彼得的俄国反对平民的罗斯

第十一章 最后的结论：呼吁“上街” / 164

最后的结论：呼吁“上街”、半个起义、逮捕列宁的尝试、工业家们寻求与将军们结盟

第十二章 斯大林，列宁的复制品 / 179

斯大林是列宁的配角、盟国背离克伦斯基、克伦斯基出卖了科尔尼洛夫并转向布尔什维克

第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掌握武器 / 192

布尔什维克获取武器、预备国会、克伦斯基——“俄国的灾难”、斯大林：夺权、党的政治局委员选举、十月革命

第十四章 军官和农民的情绪 / 209

军官和农民的情绪、高尔基试图阻止革命、斯莫尔尼宫的最初冲突、英法在俄国瓜分势力范围、解散立宪会议、国内战争爆发

第十五章 布尔什维克成为“国际论者” / 227

布尔什维克变成了“护国派”、恐怖手段不可避免、斯大林是列宁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副手、歼灭战、察里津的独裁者、娶阿利卢耶娃为妻、与托洛茨基的冲突、斯涅萨廖夫将军

第十六章 苏维埃高层“内战”的萌芽 / 242

苏维埃高层“内战”的萌芽、斯大林输给了托洛茨基、英国和德国在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之争、德国的革命、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为清查彼尔姆失陷而出差

第十七章 斯维尔德洛夫之死 / 253

斯维尔德洛夫之死、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和南方战线、A. И. 邓尼金将军

第十八章 为什么红军能获胜 / 265

红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斯大林解决煤炭问题、波兰战线、转向爱国主义、

II. H. 弗兰格尔将军

第十九章 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 / 285

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斯大林冒犯列宁、“克里米亚国家”的终结

第二十章 在北高加索 / 290

在北高加索、为石油而斗争、东方政策、格鲁吉亚成了苏联的格鲁吉亚

第二十一章 废墟中的国家 / 297

废墟中的国家、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党内的反对派、喀琅施塔得叛乱、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的失败

第二十二章 新经济政策——“第二个布列斯特” / 307

新经济政策——“第二个布列斯特”、全俄电气化计划、坦波夫起义、儿子瓦西里出生

第二十三章 俄国流亡者对苏维埃政权未来的预测 / 313

俄国流亡者对苏维埃政权未来的预测、饥荒、没收教会财产、“伊里奇的看门狗”、当选党的总书记、列宁第一次中风

第二十四章 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成立苏联的争论 / 326

列宁与斯大林关于成立苏联的争论、奥尔忠尼启则与格鲁吉亚领导人的冲突、列宁第二次中风

第二十五章 政权的两个中心——列宁和斯大林 / 334

两个权力中心——列宁与斯大林、“家族”与总书记的冲突、反对斯大林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托洛茨基——继承候选人

第二十六章 党的十二大：斯大林强化了自己的地位 / 344

党的十二大：斯大林巩固地位、季诺维也夫想抵制“斯大林独裁”、红色将领们、德国的革命

第二十七章 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第一案 / 353

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第一案、希特勒的慕尼黑暴动、德国革命失败、红军留在了家里

第二十八章 新经济政策反对工业 / 359

新经济政策是反工业的、托洛茨基呼吁保护工业、军队威胁要干预、在政府机关中进行清洗

第二十九章 列宁之死 / 368

列宁之死、新领袖的成人仪式、斯大林再次当选总书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不喜欢布尔什维克

第三十章 斯大林又提出辞职 / 376

斯大林再次提出辞职、托洛茨基被免职、布哈林建议采用斯托雷平的经验



第三十一章 伏龙芝之死 / 385

伏龙芝之死、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侦查监视、“三驾马车”统治的瓦解、叶赛宁自杀、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新经济政策过时了

第三十二章 在斯大林的世界地图上德国和中国位居第一 / 398

德国和中国在斯大林的世界地图上上升到首位、季诺维也夫失去列宁格勒、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力图报复斯大林、斯大林宣布工业化战略、捷尔任斯基之死

第三十三章 反对派被开除出政治局 / 408

反对派被开除出政治局、“克鲁普斯卡娅是分裂分子”、斯大林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乌克兰在斯大林的掌控中

第三十四章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白卫军”路线 / 421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白卫军”路线、发生在中国的危机、德特丁进行反对苏联的经济战争并资助白卫军恐怖活动、季诺维也夫谴责斯大林的错误国际政策

第三十五章 经济是如何发展的 / 432

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专家们”的双重性、基层党组织竭力追求利润、战争的警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纲领》、装甲车开进了莫斯科的街道、“集体化的代表大会”

第三十六章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 / 448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农民暴动”、新经济政策的终结、雅科夫·朱加施维里试图自杀、“沙赫特案件”、布哈林反对工业化

第三十七章 斯大林戴上桂冠 / 472

斯大林迂回前行、集体化的开端、兴凯湖军事事件、50岁寿辰、农村中的内战

第三十八章 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围绕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冲突 / 495

图哈切夫斯基和伏罗希洛夫：围绕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冲突、十六大——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西方经济危机遏制了工业化、斯大林的干部们

第三十九章 需要一部俄国史 / 504

俄国的历史是用得上的、图哈切夫斯基案、瑟尔佐夫案、“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

第四十章 斯大林的经济间谍 / 566

斯大林的经济情报部门、政治局内的冲突：莫洛托夫与奥尔忠尼启则、“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第二卷

第一章 莫斯科军事哗变的尝试 / 583

莫斯科军事哗变的尝试、斯大林否定了恩格斯、斯克雷普尼克为何自杀、作家协会成立、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洛夫遭暗杀、亚戈达被撤职

第二章 和平与农民 / 610

与农民和解、“莫斯科审判案”、叶努基泽垮台、洛米纳泽为何饮弹自尽、“老革命家们”的倒台

第三章 作为主宰者的斯大林 / 627

作为主宰者的斯大林、整个文化的总导演、苏联国内反对派的境况、国内不应有“影子领袖”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会战 / 638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会战、奥尔忠尼启则的问题、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失势、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斯大林与普希金、布哈林被捕、必选其一的选举

第五章 军事“领袖们”的覆灭 / 679

军事“领袖们”的覆灭、“军事政治阴谋”、地方党委实施反革命行动、全国各地的恐怖活动、“破坏性的”人口普查

第六章 斯大林的政治改革遭失败 / 704

斯大林政治改革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亚洲、莫斯科和伦敦都想利用希特勒、日本情报机关对苏联国防能力的认知、布哈林之死

第七章 希特勒计划好了自己的目的 / 713

希特勒制定了目标、德国将军们在策划政变、慕尼黑协定、苏联预见到对德日之战、与日本的哈桑湖军事冲突、斯大林的私生活：孩子们

第八章 斯大林创作自己的主要著作 / 730

斯大林编撰其主要著作、除掉托洛茨基的命令、马德里沦陷、布拉格被占领、在哈勒欣河与日本的小型战争

第九章 张伯伦、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想战胜对方 / 744

张伯伦、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想玩弄对方、勾心斗角时期的结束、“静坐战争”

第十章 斯大林认为，一切都有可能 / 753

斯大林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列宁反教会的指示被取消、工业转向战争轨道、苏联的底比斯、与芬兰的战争、英法准备轰炸巴库、对军事行动的分析：斯大林对阵“大块头”

第十一章 战争双方的战略观点 / 766

交战各方的战略观点、经济服从于巩固国防的任务、“古拉格”、苏联向西方



推进、斯大林证实了与英美结盟不可避免

第十二章 英国想把苏联与德国分开 / 771

英国想把苏联与德国分开、德国想利用苏联来反对英国、斯大林想使英德相互削弱、罗斯福决定帮助英国、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莫洛托夫—希特勒柏林谈判破裂

第十三章 斯大林的管理方法 / 777

斯大林的管理方法：要么达到目的要么死亡、H. JI. 沃兹涅先斯基和 A. C. 谢尔巴科夫、斯大林与军事技术装备的研制、文化向军事的转轨、刺杀托洛茨基

第十四章 战略的戏剧化行动 / 790

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幕戏剧、情报机关警告德国即将进攻、南斯拉夫政变、德军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关于斯大林没有准备好打仗的过失问题

第十五章 德国进攻苏联 / 804

德国进攻苏联、边境战斗、德国将军们相信将速胜、进攻受阻、德国经济把闪电战钉上十字架

第十六章 苏联抵抗的组织 / 811

苏联抵抗的组织工作、希特勒面临两难的抉择：进攻莫斯科还是基辅、建立战时管理中心——国防委员会、斯大林的讲话重复了谢尔吉都主教的呼吁、铁路运输是决定性因素、希特勒决定消灭莫斯科、保卫基辅是斯大林的战略失误、空袭下的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列宁格勒危机

第十七章 莫洛托夫威胁要枪毙朱可夫 / 826

莫洛托夫威胁要枪毙朱可夫、斯大林集团不得不分享权力、组织机制：动员和爱国主义、在前线的高层领导的孩子们

第十八章 最后的阅兵式 / 836

最后的阅兵、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关系、斯大林高估了红军的实力、罗斯福希望参战、珍珠港、在莫斯科召开的盟国会议

第十九章 斯大林又一次不听从朱可夫 / 847

斯大林又一次不听从朱可夫的意见、哈尔科夫的悲剧、“杀死德国佬”、第 227 号令：“不得退后一步”、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

第二十章 斯大林接见韦尔纳茨基和约费院士 / 860

核问题：斯大林接见韦尔纳茨基和约费院士、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胜利、勒热夫、斯大林：将军剧本的编导演

第二十一章 16 岁的斯维特兰娜爱上了 42 岁的阿列克谢·卡普勒 / 866

16 岁的斯维特兰娜爱上了 42 岁的阿列克谢·卡普勒、瓦西里抛弃了怀孕的

妻子、斯大林打压卡普勒

第二十二章 和丘吉尔单独会见 / 873

与丘吉尔的对决、“火炬”行动、斯大林赢得盟友、库尔斯克弧形圈、罗斯福与丘吉尔对世界格局各持己见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向盟国提出新的世界地图 / 887

斯大林向盟国提出新的世界地图、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以苏联退出战争恫吓丘吉尔、在德黑兰取得胜利

第二十四章 斯大林回归伙伴关系 / 895

斯大林恢复大牧首制、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斗争、马林科夫的高升、限制党的机关的权力、民族主义在各共和国抬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

第二十五章 斯大林和将军们 / 904

斯大林和将军们、只有他才是凯旋统帅、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第二战场开辟——与盟军竞相进军柏林和维也纳、华沙起义

第二十六章 丘吉尔背着罗斯福同斯大林瓜分欧洲 / 912

丘吉尔背着罗斯福同斯大林瓜分欧洲、苏联在战后将主宰欧洲、斯大林不打算将东欧各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盟国雅尔塔会议是斯大林的胜利

第二十七章 胜利是新的战前时期的开始 / 921

胜利是新的战前时期的开始、刺杀希特勒、“我们与美国人谈不到一处”、英国人为何除掉西科斯基将军、斯大林的新想法：建立斯拉夫国家联盟

第二十八章 谁攻占了柏林——红军还是盟军？ / 931

谁先攻占柏林——红军还是盟军？俄罗斯人攻克柏林、德国投降、莫斯科胜利阅兵、斯大林为俄罗斯人民干杯

第二十九章 盟国波茨坦会议 / 942

盟国的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得知美国有了原子弹、在伊朗巩固地位的失败尝试

第三十章 “秘密战争”的开始 / 948

“秘密战争”的开端、斯大林的疾病、莫洛托夫同意制度自由化并被西方誉为“继承人”、斯大林狂怒、对战友加强监控

第三十一章 罗斯福不再归来 / 957

罗斯福永远回不来了、苏联情报机关在加拿大失手、苏联的“新十二月党”、克里姆林官领导层的更迭、“空军领导人案”、美国人拒绝提供贷款

第三十二章 斯大林停留在战前的认识之上 / 964

斯大林停留在战前的认识之上、对选民发表演说：“苏联前所未有地巩固”、兀·凯南的“长电报”、丘吉尔在富尔敦市发表“铁幕演说”



第三十三章 新的继承人 / 968

新的继承人、逮捕空军领导人、马林科夫失宠、“朱可夫案”、将军们的情绪

第三十四章 1946年的饥荒 / 977

1946年的饥荒、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中绝不屈从于西方、斯大林给作家们下达新的任务

第三十五章 马林科夫被宽恕了 / 985

马林科夫得到了宽恕、西方的经济危机和斯大林的新希望、“马歇尔计划”、美苏爱国主义的对抗

第三十六章 为什么米霍埃尔斯被杀死 / 994

米霍埃尔斯为何被杀、斯大林支持以色列建国、铁托有惊人之举、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重视有所提高

第三十七章 斯大林不害怕美国人的原子弹 / 1000

斯大林不怕美国人的原子弹、东欧为何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封锁西柏林

第三十八章 和铁托决裂 / 1006

与铁托决裂、杜勒斯有关分裂苏维埃集团的方案：“爱国者都应该成为斯大林的敌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苏联阵营精英们的分裂

第三十九章 斯大林孩子们的命运 / 1019

斯大林孩子们的命运、青年人的思潮和期望、斯维特兰娜再婚

第四十章 继承人之间 / 1026

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日丹诺夫集团的覆灭、“列宁格勒案件”

第四十一章 恢复时期结束 / 1035

恢复时期结束、对农村的新“殖民”、外国电影上映、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斯大林的70岁寿辰

第四十二章 斯大林在朝鲜的战争 / 1040

斯大林在朝鲜的“适度”战争、苏美歼击机之战、瓦季姆·马茨凯维奇的雷达跟踪器改变了空战的形势

第四十三章 阿巴库莫夫被捕 / 1047

B. 阿巴库莫夫被捕、“医生案件”的内幕、“米格列尔人案件”、新的权力中心、“该治国家政治保卫局了”、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们的被免职

第四十四章 斯大林的遗嘱 / 1055

斯大林的遗嘱、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继承人做了报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退居次位、更换统治精英的尝试、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为中央书记

第四十五章 致斯大林于死地的疾病 / 1066

斯大林弥留之际、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共谋拥戴马林科夫、领袖之死、新的

“三驾马车”、修正斯大林的遗产

第四十六章 斯大林去世后 / 1071

后斯大林时代之始、胜利和灾难、尚未被认识的经验

И. В. 斯大林生平大事年表 / 1080

参考文献 / 1085

第一卷

第一章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家族的崩溃、母亲的个性、教会的影响、初识马克思主义、维特工业化、第一次被捕

每天都有千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关注着他的名字和经历,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延续在神秘莫测的思维里。清晨的太阳一次又一次在高加索群山上升起,恰似母亲温暖的手臂,这是一个名叫约瑟夫的小家伙学步的地方。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基督耶稣人世的父亲、木匠约瑟夫而起的。这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哥里城、格鲁吉亚、俄罗斯帝国。

让我们来细看这里的景色。景色很美,美得如在平静的没有敌意的世界里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几十年前的历史纵深处,在那里,这个孩子的祖祖辈辈重复着自古以来所有人都从事的事情:生儿育女、保障家庭的吃住、防御外族侵入、夭折与老死,再到孙子和曾孙子的出生。

但背景有点模糊。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不出他们的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约瑟夫·斯大林的祖先们是谁?

父亲: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季季利洛村人,鞋匠。

母亲:叶卡捷琳娜·格拉泽,加姆巴列乌利村人,做过富家帮工、洗衣工和裁缝工。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是时间长河中的沙粒还是历史人物呢？

一方面，因为他们给了伟大的总书记以生命，他们是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他们只不过是撒在历史过道上的沙粒。

已经几乎不可能从遥远的混沌岁月中弄清楚，他的祖父和曾祖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家族来自何方，他们的坟墓在哪里。

斯大林的曾祖父居住在姆季乌列基山区（现在在南奥塞梯），是牧羊人。他爱自己的羊群，保护着它们，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焦吉施维里”（畜群之子）的绰号。渐渐地这个绰号的发音变了，叫成了“朱加施维里”。（奥斯特洛夫斯基 A.，《谁站在斯大林的背后》，莫斯科，2002 年，第 82 页）

我们再往姆季乌列基山区的远处看，去看 18 世纪。奥塞梯人从北方入侵，进攻格鲁吉亚的村庄，格鲁吉亚人进行了抵抗。但 18 世纪很快就结束了，19 世纪开始了，斗争以奥塞梯人的胜利而结束。他们征服领地并进行移民，此地后来成为哥里县的北部地区（现在这个地方称为南奥塞梯）。斯大林家族的根就在这里。

他的祖先是奥塞梯人还是格鲁吉亚人，我们永远无法得知。

我们知道的，约瑟夫也知道的这一家族的第一个名字是他的曾祖父扎扎。扎扎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原先住在埃里斯塔维公爵的领地阿纳努拉村（杜舍特县），由于某种原因，他发动同乡一起反抗村里的地主，其后不得不逃往哥里县。他在那里也没有住长，再次造反，藏身于利阿赫温峡谷中少有人能够到达的格里山里，后来又被迫逃离此地，最后在离梯弗利斯（第比利斯的旧称——译注）不远的季季利洛定居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 年，第 83 页）

但是，有格里斯塔维（意为格里之峰）教堂的格里，把相关的记忆残片保留了下来：扎扎的孙子，即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带着妻子叶卡捷琳娜常去那里做祈祷。

“扎扎”是由“约瑟夫”这个名字变化而来的。在季季利洛村的记载里，就是这样称呼第一位来此居住的“朱加施维里”的。

扎扎有瓦诺（即伊万）和格奥尔吉两个孩子。瓦诺干农活，种植葡萄，然后去城里卖。格奥尔吉也是从普通农民中熬出来的，并且成了曼格利斯村路边一个小饭馆的主人，格鲁吉亚贵族们喜欢在这里休息。

造反者的儿子们走上了资产阶级的道路并成功地迈出了最初几步。

但这条道路是何等的困难，未来繁荣的基础是何等的脆弱。疾病，还不清的债务，歉收，还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一切都可能在瞬间崩塌。

正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兄弟俩身上了。瓦诺 50 岁不到就死了。不久，格奥尔吉又被抢劫者杀害。发财致富的梦想破灭了。

瓦诺的儿子维萨里昂（别索），就是斯大林的父亲。他在父亲死后，或许是因欠债，或许是为避税，离开村子跑了。别索是怎样一个人呢？他识字，除了懂格鲁吉亚

语、俄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还可以凭记忆整章整章地讲述绍塔·鲁斯塔维里的《虎皮骑士》，这个故事最主要的思想（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就是为反对封建主的割据、建立统一的国家而斗争。

应该指出，根据 1897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梯弗利斯省只有 8% 的居民识字。这就是说，别索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却属于这少数识字者之列。这既说明了他的才能，也证明了他父亲瓦诺的潜能。

埋葬了父亲之后，还不到 20 岁的年轻别索，如同古往今来的外省年轻人向往去大都市那样，到梯弗利斯去寻找幸福。

他当时干什么，如今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据说，别索先在亚美尼亚商人 I. 阿德里汉诺夫的制鞋厂打过工。1870 年，别索 20 岁左右时来到了哥里，开始为鞋商巴拉莫夫工作，并在俄罗斯人街区租了间房住下来。

在哥里的俄罗斯人街区里，有一支俄罗斯驻防军，它是外省驻军中一支。驻军的生活与当地居民密不可分，包括修鞋或定制新靴子这样的日常小事。

那个时代的鞋匠不仅应该是个好手艺人，而且还应是个经营者：要买皮革、配料，要进行核算。从另一方面讲，这个工作的个体性质也养成了别索的独立、专注和爱思考的倾向。

开始时，别索的业务开展得很顺畅，订鞋量一直在增加，鞋铺还雇了两个帮工。其中之一回忆过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买卖兴旺的细节：“他家里总是有黄油。”（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 年，第 93 页）别索迎娶 18 岁的孤儿凯凯（叶卡捷琳娜）·格拉泽，就是在出现这番兴旺景象的时候。

凯凯的父亲当过制砖匠、制陶匠，后来在离哥里不远的有许多园林的加姆巴列乌利当园艺匠。他早就去世了，过早离开人世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是由居住在哥里俄罗斯人街区的亲戚们带大的。

有关年轻的凯凯，可夸的地方不少。她面容姣好、勤劳能干，还会读书写字，这是非常罕见的。

1874 年 5 月 17 日，在哥里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维萨里昂和叶卡捷琳娜举行了婚礼。约瑟夫，也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米哈伊尔和第二个儿子格奥尔吉幼年夭折。

按照圣母升天大教堂出生登记册上的记载，约瑟夫出生于 1878 年 12 月 6 日（公历 18 日），在 12 月 17 日（公历 29 日），也就是出生 11 天后接受了洗礼。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斯大林出生的真实日期。后来这个日期在圣彼得堡宪兵局的通报和 1920 年斯大林本人回答瑞典《人民政治日报》的调查表上都得到证实。（《苏共中央通报》，1990 年，11 期）

作为活下来的唯一的儿子，他是在母亲不知疲倦的监管下长大的。他体质虚弱，



两岁时生了重病，为此虔诚的凯凯无数次为他祈祷。后来她认为，上帝听到了她的祷告。索索(约瑟夫·斯大林的儿时昵称——译注)得过天花和伤寒，父母为他能够活下来感到高兴。天花在他脸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虽不很明显，但足以让小伙伴们给他起了个“乔普尔”即“麻子”的绰号。

其实，天花痂算不得是灾难，左手臂的损伤要糟糕得多。多年之后，医生在他的病历中写道：“六岁时的碰伤以及随后肘关节部位的长期脓肿造成了左肩与肘关节的萎缩。”(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 年，第 95 页)

据说，小索索是被敞篷马车撞的，他几乎被马蹄踏死。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没有人能知道斯大林了。

但命运却作了另一种安排。

因为伤痛，这个好斗的、勇敢的小男孩就只好站在一旁观看孩子们玩打仗游戏，并且不得不经常自卫。简单说，他打过架，常被打，也常为小小的胜利得意洋洋。其实，所有小男孩的童年都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在冲突和游戏中排出自己的等级并确定自己这一群的领袖，并不会去特别怜悯谁。

一个手臂极其无力的男孩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对争斗的加倍渴望，还是内心的屈从？而他很早就应该感受到，必须摆脱所有的人。这渐渐养成了他的特殊个性。

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山民性格的传统特征，它们是在各部落为争夺微不足道的生存资源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每一个山民都必须善于捍卫自己，甚至不怕死亡。在每一位格鲁吉亚人心里，自己就是“虎皮骑士”。索索喜欢参加独特的“两军对垒”式的“克里维”拳斗，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在那时，命运给他预备了又一场灾难。

不知是什么让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心情颓丧，他开始酗酒，失掉了客户，经常更换住所，全家过起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有好几年时间，小索索被迫不断地去适应新的环境。

哥里虽说是只有近六千居民的小城，但总还是个城市，而且是在某些方面很有特色的城市。它位于利阿赫瓦河与梅德茹杜河两河流入库拉河的地方，在格鲁吉亚三条交通要道的交叉口：一条向西通向黑海，第二条向东通往里海，而第三条则是向北通向俄罗斯。哥里离梯弗利斯 75 公里，乘坐外高加索铁路的火车要三个小时的路程。哥里曾是卡尔特利斯基公国的首都，卡尔特利斯基方言是格鲁吉亚标准语的基础。在这里，在库拉河岸建有军事堡垒以保卫这个战略重地，同时也保护着小城的居民和附近富足庄稼人的宅院，其中也包括有着皇室血统的巴格拉季多夫的庄园。在离哥里不远的波尔若米村，高加索总督(1862—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弟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修建了自己的夏季官邸，皇室成员喜欢到这里来休憩。

顺便提一下，大公的副官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梅津采夫少将（1866—1938年），也就是 A. C. 普希金的孙女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丈夫。

就民族成分而言，哥里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人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亚美尼亚人占多数（超过一半），格鲁吉亚人约为 40%，而俄罗斯人只占大约 5%。从经济方面来讲，做生意的亚美尼亚人占了主导地位。因此，这里有 7 个格里高里教派的教堂、6 个东正教教堂、1 个天主教教堂。这里还有很多学校，其数量要比格鲁吉亚中部地区多得多。在哥里大约每十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学生，其比例超过当时梯弗利斯的 1.5 倍。

因此，对于第一代市民来说，不管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是什么样的人，哥里都给他提供了不少机遇。还有，他母亲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制陶匠，另一个是制砖匠）和叔叔也住在这里。除此之外，哥里人的多数家庭之间都有教亲关系（因洗礼而形成的宗教亲谊关系——译注），而东正教徒有珍视这种关系的传统，亲人、朋友和熟人在日常生活圈内相互维系着。

当然，这种维系并非财产分享之类的承诺，但还是能够相互提供不少帮助的。当索索接近人生道路第一个重要关口的时候，这种帮助就显得非常有效了。

孩子应当上学了。凯凯希望索索当一名教士，别索想让他当鞋匠。父母争吵的结果必然会决定儿子的命运。

凯凯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她看到，她的亲戚和别索仅仅是为了能获得起码的生活保障而辛苦劳作却收入甚微，虽然她无法懂得良好的经济状况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亚美尼亚人的团体在经济生活中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父亲要成为富人的渴望，后来被斯大林作为一个典型写进其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论文章里：“你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鞋匠，他拥有一个小店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而关了铺子，去梯弗利斯的鞋厂给阿德里汉诺夫当了佣工。他进了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但并不是准备一直当佣工，而是想攒些钱，积累点资本，然后再去开自己的铺子……作为无产者的鞋匠干着活，同时也看到攒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工钱几乎仅够维持生存。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已经是无产阶级了，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换言之，这个鞋匠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已经丧失，再也不可能恢复，但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没有消失，其意识落后于他的实际社会地位。”（斯大林 И. В.，《斯大林全集》，第 1 卷，莫斯科，1949 年，第 315、316 页）

母亲具有更坚强的性格。与父亲相比，母亲和儿子更亲近，因此最终由母亲来选择他人生道路的起点。

1886 年，索索已经 7 岁了。他们在位于帕夫洛夫斯基街上的恰尔克维阿尼神甫的两层小楼里租了间房子。父亲已经开始酗酒，压在母亲身上的养家糊口的担子越来越重。她又当洗衣工，又当裁缝。



也许,她以母亲的直觉感到,唯一的儿子生活伊始就在重复祖父和父亲的命运:起初是上升,然后是突然下降。索索那带着创伤和家庭争吵阴影的童年就像在显示这种规律性。

把索索送进哥里教会小学上学的第一次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因为他听不懂授课所用的俄语。由于生活在俄罗斯人街区,索索能够简单地用俄语交流,但水平是很低的。

凯凯,应该为她说句公道话,善于克服障碍。她找了恰尔克维阿尼神甫,让他的孩子们帮助自己的儿子学习俄语。

1888年夏天,恰尔克维阿尼把索索带进教会小学。这里主要是接受神职人员的孩子,但是鞋匠的儿子还是被收进来了。就这样,索索进了预科班,而且是大班预科班,因为此时他已能相当自如地运用俄语了。

9月1日,教会小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位新生。他套着长至膝盖的上衣,腰系皮带,穿着崭新的高筒皮靴,头顶着帽檐闪光发亮的黑色呢绒帽。从他的外表,根本看不出任何贫穷的迹象。衣服是厚实而整洁的。

当然,这一切都来自他身后勤劳的母亲。索索的脸看起来是安详的,没有第一次来到不熟悉的地方、与不熟悉的人在一起的不安和惊慌。他的眼里充满希望。

索索顺利完成了预科班的学习,即将升入一年级基础班。然而不幸又一次降临。

1月,在洗礼仪式上,小街深处阿科普斯基教堂旁边,唱诗班在为洗礼咏唱。歌手中就有索索。突然一辆马车飞奔而来,车杆撞到了索索的面颊上。索索跌倒了,车轮从他腿上轧过。

索索失去了知觉。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受伤了,同样很严重。他被送到梯弗利斯,并在那里的诊所躺了很久。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索索都是侧着身子走路,因此被起了个“格扎”的绰号,意思是“斜着”走路的人。

学业因此而中断了整整一年。这时,父亲想把索索留在梯弗利斯和自己住在一起。凯凯不允许他这样做。她也去了省城,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最终将儿子带回了老家。

1890年9月1日,索索重新上了一年级。

别索再次回到哥里,从早到晚在商人东达罗夫开的商店旁边的木棚里缝制鞋子。有时候会去找凯凯,请求和好。

但凯凯肯定已经对别索的酗酒、脏话及其对儿子教育的不正确态度感到厌倦了。

于是,别索就去找儿子:或者你离开学校跟我走,或者留下来和妈妈过。

索索选择了母亲和学校。

现在已经不可能弄清这次家庭争吵的详情了。但父亲具有不可争议权威的传统崩溃了。

我们可以在 1895 年 8 月 28 日索索写给梯弗利斯神学院院长申请里发现这一悲剧的余波：“作为我没有服从他的意志而是继续学习的一种惩罚，我父亲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抚养我了。”（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 年，第 103 页）

怎么说呢，祸不单行，彼伏此起。索索看来已经习惯了在他身上经常会发生点意外了。

因为没有钱交学费（25 卢布/年），1891 年索索被学校除名了。但他很快被重新接收并转入二年级学习；亲友们没有丢下他不管。

对于一个月只能挣 10 个卢布的凯凯来说，25 卢布是很大一笔钱了。

需要补充一点，索索的母亲并没有指望别人的救济，她没有屈服。凯凯当上了职业女裁缝奇奇戈托娃的助手，并开始学习裁剪和缝纫。

然后凯凯开始自己干裁缝。于是，她就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对于那些不了解女裁缝（或如 19 世纪所说的，是女时装师）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的人，需要说的是，女裁缝在加工订货之前需要给订制衣服的人量身体的尺寸、选择衣服的式样、把量好的尺寸标在衣料上、准确裁剪衣料，然后将衣服的所有部件都连缀起来，让订制者试穿，修改合身，最后才工工整整地缝制成衣。

也就是说这不是个简单的职业，只有非常认真的人才能够掌握它。

总之，等于“守活寡”的凯凯非但没有消沉，反而又登上了一个阶梯。

从这时起，凯凯和索索就结束了流浪生活。他们在教堂街上找到了固定的住处。

学习上，索索是第一名。学校甚至给他发了奖学金，开始是 3 卢布 50 戈比，后来是 7 卢布，每年还发一次公费的校服。

看样子，他的状态稳定了。贫穷的幽灵消逝了。哥里的街坊邻居对他母亲与不幸的顽强抗争给予了同情，而他自己为了闯进一流学生的行列也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在他这样的年纪，通常会对自己的使命进行最初的独立思考，索索也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去做一名神甫吗？当然！母亲希望他献身于上帝。而对母亲是绝不能拒绝的。

但有点什么令他困惑。

索索向他的好友承认，他幻想着学业结束之后去当书记员，去帮助受委屈的人写申诉书和控告信。（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 年，第 104 页）他还是天真的。书记员是乡镇管理机构中的一个职务，也就是副乡长。为什么不去当乡长呢？他很快就有了这种念头。对，应该去当乡长，这样就可以在自己所管辖的乡里建立正常秩序、维护社会公正。

幼稚的梦想。如果当时有人说，索索不仅能当乡长，而且能当超级大国的领导



人，人们一定会当笑话来听。

开始时，约瑟夫实际上有在哥里县，甚至在格鲁吉亚升迁的现实可能性。而就整个俄国的范围来说，他还只是一粒细沙。

不错，是神学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了帝国的伟大、俄罗斯作家和作曲家的感染力以及俄语给他展示的广阔前景。而主要的一点是，让他看清了，俄国所有的东正教徒组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纽带的民族。罗斯教会的一位权威、沃洛科拉姆斯克主教约瑟夫·沃洛茨基的学说，正是通过在一个乡里建立公正秩序的幼稚梦想传给了约瑟夫的。沃洛茨基生活于伊万三世和瓦西里三世在位时期。正是在他所处的这个时期，罗斯得到了统一，最终摆脱了对蒙古人的臣属关系并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思想是斯大林治国理念的一个基本点。但这个思想也是由创立了莫斯科君主政体政治理论的约瑟夫·沃洛茨基提出来的。按照约瑟夫的第一个沙皇学生即伊万雷帝的观点，莫斯科公国的结构复制了天国的制度，而沙皇就是上帝的代理人。这样，东正教就有了政治形式。这种思想使俄罗斯帝国的建立神圣化了，使每一个东正教徒感到自己参与了执行最高使命（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领会到，俄罗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对宗教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物质资源的极度贫乏所决定的，而这些资源必须集中在一个执政集团的手中）。

15岁时，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教会小学（1894年5月），并被推荐进入梯弗利斯神学院学习。这个年龄段的少年都会专心致志地去追求自我认知，他们的智慧会出乎意料地突破常规，而内心在寻觅无法实现的与周围世界的和谐。

这里要强调的是，捍卫东正教的思想贯穿于约瑟夫关于国家的全景之中，因此，这一全景也酝酿着分裂的种子：离开了东正教，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从这里开始到寻找“正义和公平的国家”仅一步之遥。甚至伊万雷帝的独裁和在特辖区内反对大贵族的恐怖手段都具有同样的根源。

索索·朱加施维里对这些思想持什么态度呢？最直接的态度是，整个教会都应该是为此而存在的。

此外，还有教会的状况，在俄国实现建立统一国家和实施国家意志的任务是极其艰难的。这在农村教区中看得更清楚，神职人员在经济上是完全依靠农民的。生存需要迫使神职人员不得不讨好富有的教民，因此在群众中就滋生了神职人员贪婪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并在毁掉教会的权威。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在实现自己的大变革中，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未能对各地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和思想精英的状况给予重新考虑。大变革推动了臣民向个人主义、进取精神的发展，对法律知识以及合理生活结构的其他基本原理的了解，然而

教会仍然一成不变。政府没有能够为未来的俄罗斯培养思想家。（列昂季耶娃 T.，《信仰和进步：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的东正教农村僧侣》，莫斯科，2002 年，第 38 页）

索索同样不可能不感觉到这样的脱离。低沉的来自地下的呼声已经传到了高加索边疆区。索索的一些熟人或熟人的亲戚参加了反对派小组的工作，表达了自由思想，向往着某种变革。

不过，索索此时面临的是要上神学院。此时，索索童年命运中的两条主线再次相遇：微薄的收入和亲戚的援助。神学院的费用是很高的：学费要 40 卢布，食宿费要 100 卢布。除此之外，还需要自己购买制服。

到哪里去弄钱？

哥里教会小学的声乐老师 C. П. 戈格利奇泽向索索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时他已转到梯弗利斯师范学校工作并准备安排自己的这个学生来这里公费上学。但凯凯很倔：只上神学院！

她遵循的是普通人的观点。而这时，她的兄弟桑达尔也搬到了梯弗利斯，就住在神学院管事格奥尔吉·恰古纳瓦的家里。

凯凯带着儿子到自己兄弟那里安顿下来，并向恰古纳瓦求助。恰古纳瓦没有拒绝他们。

当然，这需要索索给他留下好印象。索索给他留下的正是这样的印象。

除此之外，为朱加施维里奔走的还有神学院的老师、历史和考古学家费奥多尔·饶尔丹尼亚。

8 月 22 日，索索递交了参加入学考试的申请书，并在顺利通过这些考试之后于 9 月 2 日被神学院正式录取。

1884 年东正教神学院的章程规定：享受公费录取的只限于孤儿和被证明是“品学兼优”的贫穷家庭的孩子，而这些穷孩子多数来自神职家庭。

录取当天，索索又提出了关于申请食宿免费或者至少半费的书面请求。

在这件事上，凯凯的奔走和熟人的帮助也起了作用。

最终她的儿子取得了免费食宿的机会。当然，学费和服装费还是要交的。不过，做到免费食宿已经是力所能及的最好结果了。

和他一起入学的还有八名来自哥里教会小学的同学。能在一起他们应该是非常快乐的。

神学院的生活是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他们似乎成了沃洛茨基修道院的僧侣了。早 7 点起床、祷告、早点；然后开始上课，值班生咏颂《我们礼赞天主》，做功课到 14 点，再过 1 小时后午餐；短暂的自由活动后，于 17 点集中点名，此后禁止外出，晚上继续做祷告，20 点喝茶；然后在教室里复习功课，22 点睡觉。学生们一整天都是在监督



下度过的。星期日休息。

年轻的朱加施维里来到有六根圆柱的古典回廊的神学院大楼里之时，俄国所有神学院的气氛都有点动荡不安。

神学院是文化的宗教再生产机构，它培养了众多杰出的政治家、行政长官、学者和作家。当然，它的毕业生中也有很多人当了神职人员。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或愿意穿上教士长袍的。在大变革以后的时期，中学生和大学生首先感觉出了社会的自由前景与传统的现实情况之间、上帝和贪婪之间的脱节，于是年轻人的纯真激情积聚成了对出路的寻觅。许多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曾经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而在这个为数不多的群体里，绝大多数人又是与帝国格格不入的。(列昂季耶娃 T.，《信仰和进步：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的东正教农村僧侣》，莫斯科，2002 年，第 88 页)也许，涅任斯基教会小学的毕业生、切尔尼戈夫斯克神学院的学生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年轻时想都没有想过，1917 年 10 月他会成为占领沙皇在圣彼得堡的官邸“冬宫”的指挥员。可以这样说，是教会教育出来的人推翻了君主制度。

在朱加施维里到梯弗利斯的前一年，当地神学院就出现了学生们不服从领导的群体事件，83 名学生因此被开除。而在 1886 年，发生了一桩非常野蛮的事件：19 岁的学生拉吉耶夫杀死了校长、大司祭帕维尔·丘杰茨基，用匕首捅了他好几刀。

索索以全班第八名的一等成绩完成了一年级的课程，品行鉴定是优秀。他的性格开始有了变化。对幼稚游戏的兴趣在消退，变得严肃并且酷爱思考了。

索索去度暑假时，给《伊维利亚报》编辑部送去了自己的诗作(分别在该报的 6 月 17 日、9 月 22 日、10 月 11 日和 25 日发表)。还有一首诗发表于 1896 年 7 月 28 日的《克瓦利报》。

下面是其中的一首：

当被黑暗追逐的英雄
重访自己朴实的土地时，
即使在那阴霾的时刻
他也能偶尔见到太阳；
当低垂至深渊的昏暗
在亲爱的故土消散时，
上天之声将给心
传递信息，带来希望。
我知道，这希望
在我心中永远圣洁。

诗人的心灵渴求飞向蓝天——
而美在内心中滋长成熟。

(列夫·科秋科夫的俄文译文)

这几行诗传递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这位未来的威严的统治者感受到的是什么。显然，那时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上天之声”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暑假，约瑟夫是在家里度过的，也到神学院的同学家做过客，也会见过同样来度假的同乡——莫斯科帝国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们。

他的社交圈在扩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从这“上天之声”里可以听到“为正义而斗争”的声音。

这是些什么人呢？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农艺师、工厂主、神学院的毕业生；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其中就有津格尔缝纫机商店的机械师费奥多尔·叶尔莫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他出生于梯弗利斯省的曼格利斯村，是士兵的儿子，在家里受的教育。阿法纳西耶夫有藏书 1500 本，这个数量在当时是相当大了。他有民粹派情绪。他的住处变成了某种启蒙俱乐部，到 1897 年，有近 200 人来过这里。其中一位读者叫阿列克谢·彼什科夫，也就是未来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他当时住在梯弗利斯。还有一位叫费奥多尔·马约罗夫的工人，他于 1892 年出现在阿法纳西耶夫家里，也就是在那时，他在有近 2500 人工作的铁路工厂创建了自学小组。小组就是通常的那种小组。但这个小组里有一名成员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也就是斯大林未来的岳父。

阿法纳西耶夫藏书的另一位拜访者是伊万·马鲁金，他在铁路机车库创建了小组，成员包括斯大林后来的第一任妻子卡托·斯瓦尼泽的表兄康斯坦丁·德瓦利。

世界是很小的。亲友关系中几条细线出乎意外地把约瑟夫引向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思想，最终引向了另外的命运。

后来(1931 年)，斯大林在与专门撰写名人传记的德国记者 Э. 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指出：从 15 岁开始，他就与“当时生活于高加索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地下小组有联系。这些小组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使我对秘密流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了兴趣”。(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51 年，第 3 卷，第 113 页)

约瑟夫在神学院只读到 1899 年，他没有去参加五年级的考试。

这位优等生、模范学生逐渐偏离了以前选择好的道路，先是变成三分学生，然后成了不及格的学生。他受到学监批评，学监从他那里没收了他从“庸俗图书馆”借来的禁书，关了他禁闭。

与此同时，这个学生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扩大了社交圈，从民粹思想转向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于是，约瑟夫被派去外高加索一些主要铁路工场的总



厂,主持其中青年工人宣传小组的工作。

是的,起初只是言论,如圣经所记述的那样。对于他,这些言论由此就发生了变化:“以革命的方式变革现实。”

1898年,约瑟夫就成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梯弗利斯组织的成员。他当时虽还是神学院的学生,但他与母校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淡薄。情况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他和另一名学学生攻击一位修士,因为这名修士刚从朱加施维里的“衣柜”里拿走了几本禁书。书从修士手上被打落下来,两个学生抢走这些书就逃跑了。

1899年4月,朱加施维里被神学院开除。

说实在的,他母亲期待的宗教前程彻底地破灭了。

总的来讲,这个时期被神学院开除的学生超过20人,就像有一股旋风把他们从那里抛了出去。

于是,索索又没有了容身之处,没有了钱。他20岁了。在神学院颁发的证书上,说他是“优秀的品行”读完四年级的,并且发了各门功课的成绩单。成绩就是成绩:有5分、4分和3分。教了他些什么呢?圣经和圣经史、教会史、神学、实用牧师教程、弥撒仪式、布道术(即进行布道的技能)、语言学和俄罗斯文学、历史——世界史和俄国史、代数、几何、物理、逻辑学、心理学、哲学初级教程、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以及宗教声乐。

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给他的品行打了优秀分呢?

可能是校长怜悯他,不想毁了年轻人的前途吧。也可能是谁求了情。

这样,凭着这个学历证书,约瑟夫可以到教会部门服务,可以当普通小学的老师。不仅如此,其实他有义务到教会部门服务,否则他必须赔偿他上学所花的费用(680卢布),这是一笔巨款。

但他没有给任何人归还任何东西。他能拿什么去还呢?

1899年12月,梯弗利斯自然气象台录用了约瑟夫,他当上了月薪20卢布的观测员。这是一个气象站,在有着木制小阳台的未经粉刷的两层小楼里。楼边的小木屋里有间房子,约瑟夫就住在那里。这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住所,公家的并且极简陋。以后他会有很多住所,而所有的住所都无一例外地留下了简朴和禁欲主义的痕迹。最后,他也将公家的别墅里死去,没有积攒任何个人财产。

在值白班和值夜班时,约瑟夫需要测量气温、气压、降水量,在观测登记簿上做记录,进行计算。可以说,这是份脑力劳动。报酬也不错,起初是20卢布一个月,到1900年4月时已经是月薪25卢布了。

20世纪来临了。套用一句卡尔·马克思的话,“有人类前的时期”结束了。

与资本主义一起进入俄罗斯帝国的一切,在人们身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被印刷在启蒙工人小组的纲领上,还反映在警察部门的通报上、学生的

集会上、地方知识分子的反对活动上、(被市场的革新从庄园中排挤出去的)地主对农民村社解体的不满上。

新的社会产生了,其内部一直存在着斗争。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有时称之为“公民内部战争”。这个新的社会推动着工业、贸易、资本的增长,与此同时,也推动了获得发展、发现自己另有机遇并突然意识到谁是其对手的那些人们。

马克思主义成了理解未来的钥匙,确信公正必将取得胜利。因此,进入 20 世纪时,年轻的约瑟夫受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所鼓舞,也开始成长起来。

1900 年 1 月 1 日,梯弗利斯发生了一桩破天荒的事件:有轨马车被迫停运。虽然是有轨马车,不是现代城市中的地铁,但当时它的停运对于城市当局及市民来说,都是件非常难堪的事。来了警察,开始是劝告,后来试图用武力说服罢工者。罢工者则以武力相对,而在不久以前这还是难以想象的。当局遭到了抵抗。

随后,几个最积极的罢工者被逮捕。最后有轨马车又行驶起来了,但这一破天荒的事件传遍了整个梯弗利斯。

就是在这个月份,约瑟夫也被逮捕了。根据值班记录,他在一月份最初的两个星期里没来观象台上班。

斯大林是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他早期的全部活动只有几个片断。一些人认为,很有可能这份记录的所指不过是叙述了他参加过几十次、几百次行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重要得多,因为它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小人物”开始是在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后来却在整个帝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赢得了极大的威信。

在俄国革命还处于最初的地下阶段时,他就参与了进来,这个阶段人事变动非常快。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漩涡。一部分人出现了,片刻之间又消失了;另一部分人只在地下工厂印刷的传单上留下了一些讲话;第三部分人被警察拘捕过并死于疾病、贫困、悲伤;第四部分人满足于经商和任职于国家机关。简言之,革命的急流过滤了所有的人。

1900 年春天,约瑟夫和他的同志们在梯弗利斯郊区组织了五一节游行。8 月 1 日,铁路总厂开始了罢工,随后其他几个厂的工人也加入进来。往城里增派了武装部队。500 名罢工工人被捕。铁路工人的积极分子中,包括一位被流放到梯弗利斯的犯人——米哈伊尔·加里宁,他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是由 B. И. 列宁领导的,他是苏联未来的领袖。

1901 年 3 月 22 日,朱加施维里在观象台的住处遭到搜查,但并没有能够抓到约瑟夫。从此他便转入地下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917 年,其间有时被“合法化”所中断,也就是被关进监狱或被流放。

1901 年春天,约瑟夫继续指导工人小组的活动,积极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准



备工作。

宪兵总局知道了正在准备的行动。城市实际上已处于戒严状态：哥萨克士兵和骑兵在街上巡逻，广场上守着两到三个步兵连并且架起机关炮，明显地散发着火药味。

但示威游行还是发生了。4月22日，在“士兵集市”广场，三三两两的人群突然汇成人流，也吸引了路过的居民。人群排成纵队，头顶上升起了红旗。

从胡同里冲出了士兵和警察，闯入队伍，开始抓人。殴斗开始了，居民们四散跑开。警察抓了示威者。殴斗的时间不长，约半小时。离公开的国内战争还远着呢。

这成为一个分界线。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人从启蒙小组和带有经济要求的罢工转为与帝国进行政治斗争的分界线。

1901年的春天和夏天，很多积极的党员被捕，他们的队伍减少，重新分了组。11月，召开了全市党代会。有四个人主持了会议，其中一位就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

有没有这样一条界线，可以确定地说：这就是命运作弄人的时刻呢？

俄国，地域辽阔，在迅速积累工业实力，与西方世界第一帝国大不列颠在从高加索到西藏的广大区域进行竞争，法国和德国正在寻求与俄国结盟。为数极为有限的知识分子和还在接受启蒙教育的工人，难道可以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相提并论吗？

不，无法相比。

但是，难以把握的界限正在于此！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那个时期。闪过了这么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两个人：尼古拉二世和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和他们印在一起的是代表工业形象的一位年轻妇女。维特说：“这是工业化。”而尼古拉反驳说：“这是革命！”

他们两个都对。

革命始于农村，那里人口过剩且耕地不足。这使得隐藏在村社屋檐下的失业人口大大增加。革命在商人家庭、在工业家和银行家中间成熟。这些人已经主导着国家的经济，渴望获得政治影响，但彼得堡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革命也渗透到代代相传的地主巢穴，渗透到已经在贵族银行中的大量典藏。

革命甚至渗透到了贵族社会，一些将军和省督的孩子们也被“为解放人民”而自我牺牲的思想所浸染。

19世纪90年代工业的上升导致了生活的空前变化。从1891年到1900年，工业生产增加了一倍（从14.93亿卢布增加到30.83亿卢布）。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年里经济领域的大事可以和以后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相比：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199%，而消费品的生产只增长了38%。蒸汽发动机的功率扩大了三倍。重工业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俄国的南方地区，因其发展迅速获得了“新美洲”的称号——创建

了许多冶金工厂、矿场、金属加工企业。俄国在开采石油方面成为世界上的领跑者。按铁路线的长度，她仅次于当时称为“北方美利坚联邦”的美国。按铁矿的开采量、钢铁产量、机器制造产量、棉花的工业消耗量、糖的产量等，俄国排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第四至第五名。

企业得到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新股份公司纷纷成立。到1901年底，已有1500多家公司在经营，总资本达24.67亿卢布，占工业总投资的三分之二。

这种增长也带动了私人银行的强劲发展。工业资本和私人资本被集中起来，出现了垄断，本国和国外的金融集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并协同发展。

俄国本国的货币是稳定的。根据财政大臣C. Ю. 维特的建议，让黄金参与流通，这使外国资本减少了利润的流失，同时扩大了外国在俄国的投资额。

维特坚信，为了加快“完全独立的民族工业的组建过程”，必须具备三个主要条件：“资本、知识和进取精神。”农民占居民人口的80%，他们被联合进土地村社，不从事商品生产，而是自给自足，在这样的俄国，积蓄的来源非常有限。

维特有许多势力强大的反对者。他们中的一位是内务大臣H. H. 穆拉维约夫，他警告说，随着外国投资进入国内，“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理想和渴望”也将渗透进来，而“成群的异国人借助于托拉斯和辛迪加成了国家自然财富的拥有者和大规模经济体的实际所有者”。（卡列林A.、斯捷潘诺夫C.，《C. Ю. 维特——金融家、政治家和外交家》，莫斯科，1998年，第65页）

总之，工业化引发了当权的精英们之间的冲突。一部分人面对无法预测的变革感到担忧。另一部分人则对无法应对经济变革的传统政治感到气愤或不满。

尼古拉二世是保守分子，是拘泥于传统的人。但他懂得这样的必要，即“要保障臣民附近有教堂和学校、有宜居的住宅和医疗救护设备，总之要通过改善生活，来回工人们的道德和物质需要”。（卡列林A.、斯捷潘诺夫C.，《C. Ю. 维特——金融家、政治家和外交家》，莫斯科，1998年，第65页）

从这位俄国帝王“圣谕”的这些话语里，已经可以听到与年轻的斯大林参与其中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呼应之处了。

尼古拉二世和未来总书记之间有呼应之处，这不是夸张，也不是隐喻。全部历史基本上都是相互联系、此呼彼应的。就像沃尔霍夫水力发电站、第聂伯河水力发电站的建设规划，库兹巴斯的发展，北海航线的开辟，科雷马的金矿开采，还有很多其他的计划，都是在帝国时期就打算做的，但其实施却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

把谢尔盖·维特称之为第一次俄罗斯工业化之父并非偶然。那第二次的工业化之父呢？都知道是谁。

而且维特还是国家经济调控的坚定拥护者，他主张私营企业的利益要服从总的发展战略。



总之,对“工人们道德和物质需要”要予以承认,但无需扩展到政治层面上去。政治是有文化的人所从事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与统治阶层交织在一起并为他们服务。

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工程师、律师、医生、教师和文学家的数量得到增长。由彼得堡人才革新衍生出来的俄国知识分子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

然而,要重新评价俄国知识分子在帝国毁灭中的作用是一件难事。

俄国一位杰出的哲学家 C. JI. 弗兰克对此断言:“按自己的伦理本质,俄国知识分子大概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今,仍是倔强和顽固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上帝就是人民,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他们的道德就在于为此目标服务,这个目标是与禁欲式的弃绝私利,是与对具有自身价值的精神需求的憎恶,或者说鄙视联系在一起……”(《里程碑》,莫斯科,1991 年,第 201 页)

20 世纪初俄国的教育家们试图通过调查咨询来了解青年学生的处世态度。有超过五千名 7 到 16 岁的学生参加了咨询。他们当中三千名是城市普通中学的学生,一千名是城市商业学校的学生,另一千名来自农村学校。给他们提了以下问题:

“您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人?为什么?”(另一种问法:“您认为哪个人最优秀?为什么?”)

“您喜欢哪种职业?为什么?”

在被询问的普通中学的学生里,只有 0.1% 的学生愿当“富人”,而城市商业学校和农村学校的学生就根本没有提到富人,这是有所指的。

普通中学的学生和城市商业学校的学生只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物质成就排在第 18 位(最后),而农村学生排到第 2 位。(米罗诺夫 B.,《帝国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史》,第 2 册,圣彼得堡,1999 年,第 324 页)

简而言之,金钱和物质的考虑在其时青年人的理想里远不占主要的位置。这种反资产阶级性,对于一个正在积极建设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来说,是不相称的。

而在政府机关、股份公司、工厂和银行工作,在警察局和军队供职的,恰恰是这些中学生的父母,随后是这些长大成人的、抱着民粹主义崇高信仰而不接受现实生活的中学生自己。

可以猜出我们的主人公就在这群人中间的什么地方。

他在忙什么?

他在加强社会民主党、工人、知识分子的各种小组之间的联系,在宣传,在筹集资金,还在躲避警察的追捕。

总之,这就是普通工作人员的生活。但这不是发生在月球上,也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俄罗斯帝国,发生在俄罗斯历史的进程中。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进程将走向何处。谁也想不到,如此强大的国家可能崩溃。当然,那时也没有任何崩溃

的先决条件。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巴统积极开展工作,他是1901年底搬到这里来的。在这里,他参与了当地党组织的工作,准确地说,他成功完成了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他是党的梯弗利斯委员会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有上级机关的权威的支持。

新年来临之前,他到罗特希尔德炼油厂的板材库工作,每天有1卢布20戈比的薪水。1902年1月3日,库房发生了火灾,所有的工人都参加了灭火。但管理处决定只给工长和技师们发放奖金。朱加施维里感到受辱,他成为罢工的倡议人。罢工者的要求是:给所有参加灭火的人发钱;废除星期日上午。请注意,从1897年开始法律就已经禁止星期日上午了。

也就是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给工人们的世界观带来了新的和非常重要的信息,而这一信息导致了第一次的胜利。

工厂换了领导,新的厂长下令给所有参加灭火者发奖,每人2个卢布,并且废除了星期日上午。这个胜利引发了新的罢工,这次是在曼塔舍夫工厂,那里的工人除了同样要求周日休息外,还要求废除夜班,要求管理当局尊重工人。巴统的警察局长向省督报告了这种“曼塔舍夫工厂工人从未有过的令人不安的行为”。(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年,第181页)

但这一次,一切却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罢工的组织者被解雇,有几个甚至被拘捕。然而,工人们继续进行着抵抗并提出新的要求: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增加30%的工资,归还罚款。此后,管理当局让步了。

这期间,在梯弗利斯有很多党员被捕。朱加施维里离开巴统去了梯弗利斯。

这时,罗特希尔德厂的管理当局也作出了开除积极分子和罢工者的决定。如果考虑到曼塔舍夫工厂冲突的新鲜经验,就可以预料到在这场斗争中会出现新的转折。也就是说,罗特希尔德厂准备采取某种强硬的方案。哪种?这很快就清楚了。

2月26日晚上,工厂管理人员贴出了告示:两周后,即3月12日,因工作量减少将开除389名工人。当时工厂共有900人。

第二天,工厂全体工人罢工了。

2月28日,朱加施维里回到巴统,运来了印刷机和活字。他还召集积极分子,搞了份准备向工厂管理当局提出的要求。工人们拒绝与工厂的监察员和经理处人员见面。

3月2日,库塔伊斯军事总督斯马金抵达巴统。他招来大约400名工人见面。他听了罢工者的讲述,认为工人们的要求是不合法的,让他们立即复工。工人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这位少将下令拘留“罪行最大的人”。

3月7日,斯马金去了梯弗利斯。3月7日夜里,逮捕了30多名积极分子。

3月8日中午,350多名工人要求释放被捕的人或者逮捕所有的人。当局逮捕了



所有的人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

夜里,罢工的组织者们决定设法营救被逮捕者。9日白天,在监狱门口聚集了近400人。而在监狱附近,已经有武装的士兵待命。

工人们开始攻打监狱,被逮捕的工人们砸开锁,冲了出来。

士兵们开枪射击。

小规模的内战开始了。13人被杀,20人受伤。

随后印刷机开始工作,印出了关于罢工和牺牲人员的传单。

朱加施维里经受了战斗的洗礼。

4月5日,他被捕了。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梯弗利斯侦查局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了“朱加施维里的专横霸道”。

在警察局的档案里,他的社会地位有时被定为“知识分子”。

因此,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现行制度的维护者正确地判断了他们面对的力量——这是一群受过教育的人,在帝国现实所提供的范围内,他们已经无法容身了。

20世纪的最初10年,俄国的经济获得了蓬勃发展,但国家也在迅速地走向分裂。

第二章

流放与逃亡

流放与逃亡、斯大林成为党的工作人员、俄日战争开始、斯大林参加武装冲突和罢工、“流血的星期日”、娶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为妻、儿子出生、妻子去世、朴次茅斯和约、总罢工、尼古拉二世发布宣言

当他被捕后，我们便失去了我们的主人公的信息了。这个穿着简朴的年轻人（黑大衣、便帽、黑色西装上衣、黑衬衫、红领带）没有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了现行国家秩序的反叛者。

朱加施维里在巴统的监狱里一直被关到 1903 年 4 月 19 日。

4 月 17 日，当格鲁吉亚主教来监狱探望时，他组织囚犯进行了抗议行动。他，这个过去的神学院学生被主教和当局的沆瀣一气激怒了。

4 月 19 日，这位煽动者被拘转到了库塔伊斯监狱。但在那里，“柯巴”（即难以驯服的意思，这很快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绰号）也表现出了他难以驯服的性格。

在库塔伊斯监狱，囚犯是在地上睡觉，很少洗澡，狱卒对他们极为粗暴。斯大林立即向监狱当局提出了犯人们的要求：安装板床，每两周洗一次澡，杜绝看守们的粗暴、侮辱行为。

当然，这是件超出惯例的事，因此遭到了拒绝。但犯人们开始使劲敲打监狱的铁



门,惊动了整个库塔伊斯。这时,向监狱派来了整整一团人,警官、检察长和州长也来了。还能怎么样呢?犯人的要求被认为是正当的。

当然,此事之后所有的主谋被转到最差的囚室,这是监狱当局对他们小小的报复。一个月后,朱加施维里又一次被转回巴统,并按伊尔库茨克州长的命令,从那里经新罗西斯克、罗斯托夫和车里雅宾斯克流放到西伯利亚。

同志们很关心这位被流放者,转送给他 10 个卢布和一些食物。

透过囚车车厢的窗户,约瑟夫第一次看到了地地道道的俄罗斯。

一年之后,他称自己是“格鲁吉亚族的俄罗斯人”。

11 月 27 日,在零下 30 度的严寒中,约瑟夫被流放到了巴拉干县新乌达村。这里距离县城 70 俄里(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译注),离特列季火车站 120 俄里。

这个村子分上村和称为扎博洛季耶的下村两部分。上村有一个教堂、两个小店、一个看守所、五个小酒馆和一些富裕村民的房子。这位流放者被安排到住在扎博洛季耶的马尔法·伊万诺夫娜·利特温采娃家简陋的房子里。房子有两间屋,未来的领袖就住在其中一间。

大概很难找到像这么难以通行的闭塞之地了。这位穿着薄大衣来到这里的年轻的格鲁吉亚人明白了,等待他的将是毫无希望的艰难生存,甚至可能要把灵魂献给上帝。

这个时期在村里还住着另三位流放者:扬克利-莫夫沙·扎尔马诺维奇·扎孔、叶罗尼姆·伊万诺维奇·林克维奇、阿布拉姆·扎尔马诺维奇·埃京戈夫。

在新乌达村住了一个多月,朱加施维里决定逃跑。

按照 С. Я. 阿利卢耶夫的叙述,朱加施维里曾两次试图逃跑。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刚离开村子,因鼻子和面颊受冻,约瑟夫返回来了。第二次,他有了准备,穿上了皮袄、毡靴,戴上了帽子。1904 年 1 月 5 日,约瑟夫终于逃出来了。当地农民把他送到火车站,尽管一天后县警察局局长报了警,他还是顺利地回到了梯弗利斯。

这是他第一次被流放也是第一次逃跑。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遭流放的社会主义者给俄罗斯荒僻的乡村带去了全新的气象,如同漂泊的传教士和僧侣传播基督教那样。

同样受到流放的斯大林的同龄人,随后成为斯大林主要对手的列夫·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提到了这个情况:“被流放者不想继续留在自己的流放地,逃跑开始流行,排着队地逃。几乎在每一个村庄都可以遇到一些在孩提时代就受到上一代革命者影响的农民。他们偷偷地用小船、用四轮大车、用雪橇,一个传一个地把政治家运走。西伯利亚警察局实际上和我们一样,对此也是无能为力的。广阔的区域既是他们的盟友,也是他们的敌人。要抓住逃走的被流放者是困难的。更多的情况是,被流放者落水而死或者冻死于原始森林。革命运动在更广大的地区发展开来,但步调不是一致

的。每个州、每个城市进行着自己单独的斗争，君主专制却拥有行动统一的绝对优势。此时，许多人费尽心机想着要创建一个集中的政党。”（托洛茨基 JI.，《我的生平》，莫斯科，2001 年，第 138、139 页）

斯大林没有留下回忆录，但他大概不会对托洛茨基的这一描述提出异议。

回到梯弗利斯之后，他与列夫·鲍里索维奇·罗森菲尔德（工程师的儿子，1904 年毕业于梯弗利斯中学并考入莫斯科大学，后来他娶了托洛茨基的妹妹奥莉加为妻）相识了，此人以“加米涅夫”这个名字被载入俄国革命史册。

斯大林是在困难时期来到高加索的：整个一月份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拘捕行动，逮捕了近 150 人。很多联系都中断了。对这位逃亡者来说，这座城市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他只遇到几个熟人。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与工人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认识了，并在 1918 年娶了他的女儿娜杰日达。

留在梯弗利斯是危险的，因此约瑟夫去了巴统，寄希望于当地的同志。

他没有想到会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书记拉米施维里的敌视：因为拉米施维里怀疑他与警察局合作。在巴统逗留了近一个月，斯大林空手而回。

这是第一次打击，正如后来斯大林自己说的那样，他的心“变得像石头一样硬”。被怀疑是背叛者，这不仅是让人难受的，简直就是致命的。当时任何一个对这种怀疑信以为真的人都可以杀掉斯大林。任何一次冲动，甚至一句不适当的玩笑话，都会导致冲突。

最可怕的是，他没有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充分证据。

过了近一百年才证实，所有对斯大林与警察局合作的怀疑和指控，要么是没有根据的，要么是蓄意伪造的。总之，警察局有关秘密特工的文件“使人能弄清楚几乎所有特工人员的名单”。（佩列古多娃 3.，《俄罗斯的政治侦查》，莫斯科，2000 年，第 238 页）所以，无论多少次重复（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加里宁、伏龙芝）斯大林所谓“无可争议的秘密活动”，也只能当作未经证实的传言。

顺便说一下，关于斯大林“干过秘密警察”的“猜想”，在 1937 年“军人阴谋”时期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又一张王牌。

1904 年 3 月 1 日，在巴统举行了游行，随后组织游行的委员会的几乎所有委员都被逮捕了。由于这个情况，约瑟夫再次来到巴统。这一次对他友善的。委员会的领导人是他朋友拉多·克茨霍韦利的同事 Г. С. 索戈罗施维里。斯大林获得了参加一些党的会议的机会，如果不是一件使他当众受辱的事件，大概他很快可以完全参与党的工作了。

5 月 1 日，党员们在海上举行了五一秘密集会。在小船上爆发了争吵，并发展成了岸边的斗殴。约瑟夫被打得很重。



约瑟夫的好战性格使他想在巴统人里占据更显著的地位,但这个愿望遇到了阻力。

巴统再一次将我们的主人公拒之门外。

他回到故乡哥里,在亲舅舅格拉赫·格拉泽的家里冷静下来。

没有证件,没有钱,被同志们排斥,未来的领袖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他已经处于生死边缘。不管怎样,合理的出路是看不到的。

这时斯大林利用了最后的机会:他找了党的上级机关,阐述了对党内官僚主义危害性的直觉。

但是,也许说“党的官僚主义”为时尚早,他,这个当年神学院的学生所遵循的是教会官僚主义。不管有没有官僚主义,约瑟夫给年长于自己、革命时间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领导、恰巧也是梯弗利斯神学院毕业生的 M. Γ. 茨哈卡亚委员写了一封信(1903 年举行了高加索社会民主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高加索联盟,并选举产生了它的领导机构——联盟委员会)。

茨哈卡亚同意见面。茨哈卡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次见面:“他向我讲述了他当时在梯弗利斯、在巴统和在监狱里工作和斗争的重大事件,也同样详细地谈了从流放地成功逃跑,然后说了自己去巴统,想在巴统找到他所熟悉的老战友,却与以后的孟什维克派(拉米施维里、奇希奎施维里、霍梅里基-K)发生了冲突……最后提出自己想从上面,即在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当时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开展对未来有效的地下工作。这也是他想见我的原因……他的决定没错。我建议他在梯弗利斯稍微休息一下,并用这段时间来熟悉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保密文件之类……为了使他工作得容易些,我介绍他与两位同志认识——尼娜·阿拉贾洛娃和达图什·沙韦尔多夫,并请他们给他一切可能的协助。”(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 年，第 217 页)

显然,经验丰富的茨哈卡亚决定在接纳约瑟夫加入工作之前,先对他考察一下。在其后的一次会见中,茨哈卡亚向斯大林介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要,并请他写出“自己的 credo(即信仰——译注)”。这个“信仰”就是一年后发表于《无产阶级斗争报》的文章《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这是斯大林早期严肃著作中的一篇,从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位青年人的非凡才能。

“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护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

“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用说,要实

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被阉割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力。必须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就走上了舞台。他们费了许多气力来驳斥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大肆诽谤,劝告格鲁吉亚无产者离开这些人,同时赞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劝它‘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设法加强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他们一再恳求格鲁吉亚无产者说:不要毁灭‘格鲁吉亚’(或许是指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忘掉‘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亲善起来等等。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的甜言蜜语麻醉不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特别是把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变成了一支社会主义队伍的强大的阶级行动,给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他们从战场上赶走了。”(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1卷,莫斯科,1949年,第33、34页)

如果考虑到作者当时只有24岁,那么可以认为,这篇文章给茨哈卡亚留下了良好印象。

又等了一个月,茨哈卡亚派斯大林去库塔伊斯区,以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代表的身份来到依麦列梯亚-米格列尔委员会。

这样,约瑟夫不仅恢复了自己的声誉,还在党的体系内上升了一个小台阶。

很快,茨哈卡亚了解到自己没看错。由于柯巴(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化名)的推动,区内党的工作积极开展了起来,印刷厂开始工作。

由于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委员们相继被逮捕,茨哈卡亚出差回国后,不得不增补委员会的成员。被增补的人正如他自己写的,是“我所信任的我的亲密战友”。在这些被提升的人之中有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现在,整个高加索地区都在斯大林经常关注的范围内了。

对于俄罗斯来说,高加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通过这个枢纽,俄罗斯可以直接影响中亚、土耳其、波斯、黑海,间接影响印度、近东和地中海。

巴库地区的石油开采具有特殊的意义。1901年,世界石油产量大约是2000万吨,其中俄国开采近1000万吨,美国将近900万吨。(奥斯布林格B,《诺贝尔帝国》,莫斯科,2003年,第201页)

工业化对国家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对重油、煤油、汽油、润滑油和柏油的需求越来越多。

社会主义者还不知道,石油成为“世界大战的血液”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但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行动,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到工人那边。

斯大林出现在巴库并非偶然。这个城市是里海沿岸的一个石油工业城。它很国际化,这里居住着俄罗斯人、瑞典人、阿塞拜疆人(当时他们被称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来自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美国人和法国银行家罗特希尔德家族在这里都



有自己的利益。但最主要的是瑞典人，靠给俄国军队供货发了财的诺贝尔兄弟。这对瑞典兄弟是有文化的工业家，他们关心自己工人的平安和健康，采用新设备，建造油船，创立销售体系。

我们的主人公与他们相比是不引人注目的，但有意思的事也在这里。当巴库的以女性名字命名的“尼娜”印刷厂开始运转时，印刷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火星报》和《共产主义宣言报》，而这些报纸的发行正是通过了诺贝尔的销售体系，用船用火车来运送、发行。可以说，是工业用自己的肩膀挑起了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工业正一步一步地对依赖彼得堡封建沙俄帝国遗产生存的贵族政权产生着从上到下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把像朱加施维里、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这样出身不同、受教育不同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呢？

他们都做好了斗争的准备。“只有在专制政体的废墟上，依靠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才能建立社会制度……”这句话摘自青年斯大林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一文。（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 1 卷，莫斯科，1949 年，第 25 页）

他们需要政权。这些青年人不可能预见他们最终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革命的自动电梯一直向历史进程的深处运行，并一步步把他们提升起来。

鲁道夫·迪泽尔的柴油发动机代替了蒸汽机，赖特兄弟的飞机把天空和陆地连成一体，电报联系着城市和国家，罗马教皇发表了关于工人地位的宣言，而在俄国，警察当局产生了对工人给予国家保护的想法。让我们回忆一下尼古拉二世关于“工人们的道德和物质需要”的诏令，难道从中还看不到时代的运转吗？

是的，能够看到这种运转。

但斯大林的时间跑得更快。

离世界大战还有 10 年。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这个期限应该是一样的。

政府应该及时把社会力量吸引到自己一边，对整个俄国的生活进行革新，使得无论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工业家、银行家还是农民，再也看不到由彼得大帝所缔造的俄罗斯帝国里有愚笨和凶狠的敌人。

社会主义者应该或者支持政府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试图推翻它并夺取国家的政权。

巴库石油工业家路德维格和罗伯特的兄弟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的炸药，不仅炸开了高加索山区的管线隧道，也催化了革命。

居民中经济上活跃并有知识的那部分人与国家的“旧式地主般”的性格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每天都在产生新的摩擦。

“民意党”杀害沙皇、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恐怖行动，被新一批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们继承下来。但跟在帝王之后的是上千人的死亡，他们站在隐蔽的街垒这

一边：大臣、州长、总督、军官、神甫、商人、农民、普通居民、妇女和孩子。他们死于“民意党”的继承者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社革党人的意识里只有恐怖行动，恐怖行动，恐怖行动。

被杀害的人有：人民教育大臣 A. П. 博戈列波夫和内务大臣西皮亚金，而在 1904 年 7 月 15 日，则是内务大臣 B. K. 普列韦。这些谋杀是由社革党人的战斗组织执行的，其领导人是 Г. 格尔舒尼、B. 萨文柯夫、E. 阿泽夫。

我们要提及的是，普列韦被害已经是在战争时期了——1904 年 1 月 25 日，日本开始进攻俄国。

应当强调恐怖分子的一个心理特征。下面就是民意党人 M. 弗罗连科的看法：“格尔舒尼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可爱、讨人喜欢、革命思想深入……骨髓。我觉得，按照精神品质，他就像耶稣。这是一个狂热者，但不是俄国的，而是东方的。”（普赖斯曼 Л.，《暗杀者和革命者，守卫者和挑拨者》，莫斯科，2001 年，第 28 页）

再比如，杀害了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被俄国东正教会尊为圣徒的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的丈夫）的凶手伊万·卡利亚耶夫，了解他的人是这样评价的：“我认为，卡利亚耶夫的心是能够接受美妙的真理的。以前，像他这样罗曼蒂克的人都去修道院，用祈祷和斋戒来克服邪恶。在我们充满诱惑的一生里，他被魔鬼所引诱，相信了恐怖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尔科娃-威廉斯 A.，《回忆录》，莫斯科，1998 年，第 282 页）

毫无疑问，恐怖手段需要有相应性格的人去执行，但它主要的基础不在他们本身，而在俄国社会的思想深处。

对杀害俄国大臣感到满意的甚至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整个一生和全部活动似乎都在宣扬不容许流血。B. 柯罗连科讲述了关于 Л. 托尔斯泰对待杀害大臣和劫掠贵族领地的态度：

“契诃夫和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告诉我，当他们把最近一次对劳尼茨的谋杀之事告诉托尔斯泰时，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并气恼地说：大概又一次失手了！……我给他带去很多新闻。当西皮亚金被杀害时我在彼得堡……托尔斯泰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这时，他睁开眼睛说：是，这是事实。我是这样……理解的，恰恰是这方面要来谴责恐怖行动……喏，您是了解我的观点的，毕竟……”

“然后他眼睛又一次睁开，双眉高挑，目光锐利，接着说：毕竟我还是不能不说，这是合理的。托尔斯泰对异己分子进行暗杀做法的这种半认可态度使我大为惊异。当我继而讲述‘掠夺’时，托尔斯泰已经用十分明显的赞许口吻说道：好样的。

“我问道：从什么观点看您认为这是正确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男子汉会为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拼搏。难道您还有另外的想法吗？”（普赖斯曼 Л.，《暗杀者和革命者，守卫者和挑拨者》，莫斯科，2001 年，第 85 页）



政权和社会是相互敌对的。

1904年11月底,在梯弗利斯的一个木工车间里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会议,有12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M.茨哈卡亚、И.朱加施维里、Л.加米涅夫、B.塔鲁塔、A.楚卢基泽、C.邵武勉。

会上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关于党的中央机构”、“关于执行局”、“关于布尔什维克文学”、“关于当前的历史时机”、“关于自由主义者”、“关于执行局的预算”、“关于小册子的出版”、“关于民族主义者”等等。

代表会议做出了关于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决定,选举出了执行局。执行局的组成人员不详,据推测,И.朱加施维里成了执行局的委员。

12月5日,巴库的几家油田开始了罢工,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不认为罢工是适时的。

12月9日,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本应该讨论面临的局势,但没有能够做出任何决定:警察来了,很多人被捕。

12月12日,在一次新的群众大会上,决定支持罢工并使之成为总罢工。

12月13日,所有行业的总罢工开始了。

12月23日,警察开始了逮捕行动。

1905年1月3日,罢工以工人的胜利结束: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签订了集体合同。在帝国的历史上签订这样的合同还是第一次。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制订出了一套对当局施加社会压力的独特方式:1903年,颁布了如下法令:关于企业主承担工人不幸事故责任的条例的6月2日法令;关于在工厂设立组长,以便这些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与企业家和政府部门联络的6月10日法令。

这些法令的出台与3月初发生在兹拉托乌斯特的大规模工潮有关。对采用工资的新结算册不满的工人们包围了厂部办公楼和管理处。3月13日,军队开进工厂,造成45人死亡,83人受伤。

巴库罢工的结果成了社会的新成就。罢工期间,斯大林数次来到巴库。他简直是在巴库和梯弗利斯之间疲于奔命。

但现在他离主要事变的发生地彼得堡还很远!当然,有一些看不见的线把首都的事件和高加索连接起来,如同连接着国家的其他地区一样。也就是说,这种联系同样也连接着我们的主人公并在决定他的命运。

B. K. 普列韦被杀之后,П. Д.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爾斯基公爵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尼古拉从两种政策方案中(继续政治镇压或与社会调解对话)选择了第二种。斯维亚托波尔克-米爾斯基合适做这个工作,并且相信这条路可以走通。他最初的行动获得热烈反应:他废除了农村和军队中的集体惩罚,特赦了部分政治犯,放松了对书

刊等的审查。

但是自由主义者期待进一步的措施：宪法。立宪派的领袖彼得·米留可夫提出了激进的口号：或是宪法，或是战争。

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既寄希望于来自上层的重大政治改革，同时却不太相信这种可能。

1904年9月，在巴黎召开了俄国反对派和革命派团体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芬兰民族主义者K.采利阿库斯提议召开的，此人与日本军事情报机关有联系。自由党人声明拒绝进行武装斗争，表明了支持通过游行和宴会、递交请愿书的形式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想法。

11月6日至9日，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在彼得堡召开。会上，这些通过选举产生的俄罗斯地方自治局的代表们投票通过了实施全国代议制立法会议。

俄国社会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各地地方自治机构里做了大量独立的、建设性的工作，他们谨慎地表示了对君主专制的反对。

一个事实决定了这个决议具有特别意义，即代表大会的召开得到了尼古拉的许可。因此，自由党人认为政府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大会的代表发表了意见：赋予所有俄国国民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来全权颁布法律、监督财政预算和任命政府官员。

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实际上宣布了一致的和清晰的目标。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彼得·司徒卢威做出了这样的展望：

如果我们说11月6日的代表大会开创了俄国政治发展史的新时代，这样说未必是错的。它表明，我们国内政治的转变不是取决于哪一个人的个人意愿。国家真正的主人第一次明确地、坚定地、公开地说出了全社会的主张。这个事件之后，政府任何回避立宪问题公开提案的尝试都将是可鄙的诡计，注定会彻底失败。形形色色的侍从将官们，谢尔盖、克莱格尔斯、库泰索夫所幻想过的镇压措施现在都成了不理智的行为了。尽管帝王和斯维亚托波尔克公爵已经软弱无力，但由于地方自治局代表的坚决和勇敢，立宪变革的和平之路还没有对政府关闭。坚定和果断地走上这条路将是国家起码的明智之举。

它已经准备就绪了吗？

历史给出了自己的，也许是最后的警告。

它能被理解吗？（派普斯P.，《II.司徒卢威——左翼自由主义者》，莫斯科，2001年，第1册，第517页）



由“解放联盟”组织的“宴会运动”启动了全俄罗斯支持立宪的行动。12月3日，彼得堡举行了由作家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主持的没有先例的午宴。被邀请的有著名作家、学者、文化工作者、记者、律师共650人。大家都在建议实行民主宪政的决议上签了名。

紧随其后，类似行动的浪潮席卷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这场运动的见证者，举行了120多次集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国家知识和职业精英的这种示威行动是向当局的公开挑战，在其时的局势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这时起，革命注定了要成功，因为如同任何一场革命一样，为了成功都需要创造这样的局势：在这一局势中，为了维护，而不是破坏现状，就需要许许多多公民的勇敢精神。”（派普斯P.，同上，第518页）

12月初，在梯弗利斯也召开了这样的会议。此后，12月12日，市议会开会；12月20日，举行了人数众多的集会；而12月31日，在艺术家协会大楼里举行了宴会。

一开始制订的举办宴会的方案提出了封闭式措施，后来被取消，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可进入宴会厅。这种情况使得社会民主党人有机会冲上讲坛。在自由党人之后，他们宣读了自己的决议并唱起革命歌曲。斯大林也唱了《敌人的旋风降临在我们头顶》。

有240人签署了请愿书，要求宣布政治自由，废除等级的、民族的和宗教信仰的限制，在普选基础上实行人民代议制（即议会），宣告政治特赦，召开立宪会议讨论国家管理的形式。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已经响彻帝国沉重的大门之前，就像不久前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敲打库塔伊斯监狱的铁门一样。

1904年结束了，革命动荡时期到来了。

虽然到处都有恐怖活动、罢工、会议、代表大会、反对派的请愿，帝国却无暇顾及，它正忙于更重要的任务——与日本苦战，日本还与大不列颠签有盟约。

这场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但时至今日，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关于俄罗斯工业家们（更刻薄的说法，以沙皇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侵略政策和“小日本”的防御行动的说教仍有生命力。

客观地说，这种宣传之词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在朝鲜发生了冲突。日本起初建议俄国进行和谈。日本大使伊藤警告说：否则，日本将与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亚洲扩张势力的国家，也就是英国签署盟约。

实际上俄国渴望在太平洋扩张势力，这自然是源于它的欧亚本性，同时尼古拉二世的“大亚洲计划”自然也遭到了“海洋主宰”和“日出之国”的反对。

所以，彼得堡虽然也不想打仗，但因地缘政治的推动，慢慢走向了战争。

1891年3月31日，还是沙皇继承人的尼古拉在海参崴为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奠

基，往路基上倒了第一车土。铁路于1902年开通。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

美国的俄日战争研究者C. 泰勒的表述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俄国应该在佩切利海湾巩固势力，在其自由的港湾中找到自己的天然出海口。否则所有长期的劳作和牺牲都将是徒劳的，伟大的西伯利亚帝国只不过是一个堵住中国的胡同。”（奥尔登堡C. C.，《尼古拉二世王朝》，华盛顿，1981年，第225页）

战争首先激起了爱国主义高潮。甚至两颗炸弹的爆炸都没有受到特别关注。这两颗炸弹是亚美尼亚武装组织成员投向在巴库任职的正为俄国的胜利祈祷的亚美尼亚神甫的。

如果看得更广一点，当时俄国所处的国际局势是危险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公开声明：如果德国和法国企图与日本开战，他将“立即站到日本一边，并且需要走多远就走多远”。在伦敦开始出版配有插图的评论《日本为自由而斗争》，而美国的报刊同样充满反俄情绪。

作者们的任务不是去描写战争的军事行动，而只是强调这些军事行动不会成功，而且“指挥部的无能”也被夸大了。俄国的确没有为这场“小小的胜仗”作好准备。在漫长的战役中，俄国尽管丧失了大部分海军，但却保存了夺取胜利的全部机会。

德国经济学家卡尔·黑尔费里赫在他的著作《俄日战争中的资金》（柏林，1906年）里，对战争双方财政情况的分析就能够证明这一点。俄国能够在不举新债、不中断收购黄金的情况下继续作战半年的时间，如果动用自己比日本多八倍的黄金储备，还可以坚持整整一年。“不能不承认，俄国在东亚战争和国内动荡的艰难时期，政府的信贷好得令人惊讶。这不是可以争论的看法，这是连盲目的狂热者都不能否定的不争的事实……在遭到如此辱骂的俄国，其金融政策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奥尔登堡C.，同上，第298页）

尼古拉二世不想签订和约，也不会去签订它，如果不是“国内的混乱”的话。

此外，日本使用了现在我们称之为给恐怖分子财政资助的新的政治武器。

今天，这个事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1905年革命在许多方面是由日本资助的。日本驻俄国的武官明石元二郎上校在1902年至1904年间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间谍工作。战争开始后，当大使馆被迁至斯德哥尔摩之后，他的活动变成破坏性的了。明石元二郎建议东京的军事领导支持俄国革命者的恐怖活动。明石元二郎的计划被采纳了，战争期间，提供给俄国的革命和反对派组织的资金不少于100万日元（按现在的行情相当于50亿日元或3500万美元）。战争将近结束阶段，这种资助显得特别积极，因为当时日本希望加速签订和平条约。

是谁拿了这些钱？

第一，社会革命党。

第二，格鲁吉亚社会联邦革命党。



第三,波兰社会党(波兰社会党领袖,也就是其后的波兰国家领导人和元帅约泽夫·毕苏斯基,1904年7月甚至到东京进行会谈)。

第四,芬兰积极抵抗党。

可见,这里没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时期帝国最勇猛的敌人是社会革命党和民族主义者,日本军事间谍机构花出去的钱是非常合算的。在“朴次茅斯和约”签订之后这种资助就马上中止了,这绝非偶然。

俄国的情报机关成功监视到了用日本资金购买的大部分武器的去向。明石元二郎通过芬兰的民族主义者孔尼·采利阿库斯,在轮船“约翰·格拉夫通”(为了保密改称“月亮”)上藏了“维特立”制式步枪和“韦伯利”制式左轮手枪,还有子弹、炸药、雷管、导火线的转运设备。前两次,船员是把军火卸在芬兰,然后再从那儿转运到俄国。第三次,船在多石的浅滩触礁并被船员炸毁。俄国宪兵和边防军人很快就找到了船体并在附近的岛上发现了9670支步枪、720把左轮手枪、超过50万发子弹及其他军用品。

顺便说一下,在12月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的战斗中,义勇队员手持的正是这种“维特立”步枪,而这种步枪俄国军队是没有的。

明石元二郎上校和采利阿库斯还把武器提供到了黑海和高加索。为了这个目的特意买了“天狼”号轮船,装载了8500支步枪和子弹。1905年9月底,轮船从阿姆斯特丹起航。俄国驻荷兰公使恰雷科夫向彼得堡报告了有关“天狼”号的情报,但在轮船驶入高加索海岸时,边防军队没能截获住它。

轮船在波季地区顺利地把货卸到四条小艇上。四条中只有一条小艇被边防军截住。大部分走私的武器都派上了用处(希绍夫 A.,《俄日战争中未知的一页》,莫斯科,2004年,第61—67页)。

尽管这些情况看似简单(民族党人好像是在担任“第五纵队”的角色),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异常复杂的。

获得这些瑞士步枪的未必是斯大林身边的人。不管怎样,1905年9月,柯巴和几位同志在巴库的军需仓库对面租了房,他们的目的就是挖出地道,偷走库存的2000支步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泥土非常结实。

关于武器和资金的获得一直是个非常机密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只能进行一些推测。1905年2月,巴库发生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流血冲突,其时斯大林组织了武装工人义勇队以阻止双方再次械斗。目击者证实:“我们通过某种方法搞到了枪并聚集在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周围,根据斯大林同志布置的任务,我们不能容许在这里发生械斗。”(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年,第230页)

“通过某种方法搞到了”是一种避实求虚的说法。实际上,给义勇队员的枪是集中发放的。但按时间来算,这些并不是日本的走私货。

让我们回到事件的主流中去，目前斯大林还只是在高加索周边参与工作。不过，已经快接近他成为震中的时刻了。

俄罗斯帝国并没有在 1917 年 2 月轰然倒塌，其时政治阶层的最高层已经决定让尼古拉二世交出权力。很多资料显示，这种权力经受了数次动摇根基的颠覆事件。

1905 年 1 月 9 日，就发生了这么一件颠覆事件。这起事件有一个让人吃惊的名称“流血的星期日”，对于多数人来说，皇帝变成了“血腥的尼古拉”。从那以后，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这个星期日的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是普通老百姓和平游行前往冬宫，准备向皇帝递交由守法臣民提出的关于改善生活的请愿书。远离人民生活的皇帝，本应该与这些东正教教民进行交流，但他却对军队下令向游行队伍猛烈射击。

这个场面使上百万有文化的俄罗斯人的心灵受到震惊，而这些人其实应该是国家的支柱。国家这个概念此后在他们心中破灭了。

帝王滥杀无辜。这个帝王是恶棍，已不是作为人民的代表面对上帝的、受过登基涂油仪式的属于主的君王。刹那间，神秘的王国崩塌了。

普列汉诺夫的《火星报》阐明了所发生的革命的实质：“数千人组成的工人队伍向冬宫汇集，要求沙皇亲自走上阳台接受请愿书并发誓保证人民的要求会得到实现。巴士底狱的英雄们就是这样向自己‘仁慈的国王’呼吁并向凡尔赛进军的。当时响起了‘乌拉’声，向按照人们要求来会见人群的君主致敬，但这‘乌拉’声也是对君主制度的死亡判决。”（奥尔登堡 C.，《尼古拉二世王朝》，华盛顿，1981 年，第 268 页）

直截了当地说，1 月 9 日，打着圣像和神幡的游行应属革命的和平阶段，但在开枪之后，君主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自取灭亡了。

不过在这一天，帝王还拥有很多维护者。再过 12 年，这样的维护者就不存在了。

1904 年 12 月 21 日，当柯巴在关注巴库罢工之时，旅顺港沦陷的消息在彼得堡闹得沸沸扬扬。第二天，“工厂工人协会”举行了会议，这个协会是“羁押解送犯人监狱”教堂的神甫格奥尔吉·加邦领导的。

“工厂工人协会”是以莫斯科暗探局局长谢尔盖·祖巴托夫上校为首的工人组织的独特翻版。祖巴托夫设立工人组织的目的是把劳动者与革命党人分开，并在当局的帮助下促进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祖巴托夫得到了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的支持，但大公很快就被卡利亚耶夫杀害了。也就是说，特种机关业已看到，当局已经不能胜任驾驶国家这艘巨轮了。

在彼得堡，气氛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市行政长官富隆在悲剧发生前不久还祝愿加邦的协会“永远能够战胜资本家”，因为他并不清楚，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

12 月 28 日的“协会”会议上，“解放联盟”自由派的代表们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



位,通过了开始行动的决议。

12月29日,“普梯洛夫工厂”管理处提出了开除一名工长的要求,因为这名工长好像非法解雇了四个工人。当谈判还在进行时,1月3日,整个工厂开始罢工了。罢工者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以加邦为首的协会代表与管理处进行了谈判,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救援罢工者基金会,他们手上有不少资金可供此用。

1月5日,已经有几万人停止工作了。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政府却是出奇地平静。1月8日晚上21点左右,在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处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市行政长官富隆总督、内务部副大臣特列波夫、近卫军参谋长同时也是彼得堡总督的梅舍季奇和负责工厂督察的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

科科夫佐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说:“在内政部的代表中和参谋长的说明里没有一丝惊慌。对于我提出的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我开会,使我甚至来不及取出已经掌握的工厂督察材料来说明事情的真相,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回答我:他起初根本不想‘惊动’我,认为事情根本就不严重,而且他在星期四的奏折中已作决定。国君这天不在城里,去加特契纳,警察局将此情况事先通知工人了,当然所有的行动将被制止,冬宫广场也不会出现大批民众。”(科科夫佐夫 B,《我的过去》,第1册,莫斯科,1992年,第62页)

但现实情况却是另一个样子。第一,报纸和印刷厂也罢工了。当局的通告只能在小印刷厂印刷,形式如同不美观的小广告,实际上也没能引起什么注意。

第二,给沙皇的请愿书是由社会民主派的工人起草的,其中包含在效忠君主的言辞掩盖下的政治要求:“立刻主持召集俄罗斯地方代表……领导立宪会议的选举,使其在普遍、秘密和平等投票的条件下进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请求:所有一切都得依赖于此或建立在它之上,这是医治我们创伤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灵丹妙药。”

要求中包含了事实上就是实行议会制共和国的提议。

法国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的通讯员在1月8日(21日)的报纸上写道:“自由派的宴会革命,甚至地方自治局的革命,在工人代表团明天准备呈递给沙皇的要求面前黯然失色。”

历史学家 C. C. 奥尔登堡注意到:“准许示威游行等于无抵抗地投降。”(《尼古拉二世王朝》,第265页)

流血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双方都在向这一点走近,工人们怀着自己正确的信念,当局则相信自己的力量。

双方其实都错了。只有筹划了30万人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是只赢不输的。对于他们来说,尼古拉二世是不能容忍的政敌。

1月9日。步枪的齐射转为革命阶段的对抗。

有130人被杀,几百人受伤。这些被宣传和流言无限夸大的数字引发了报复行动。此时,当局者改善工人处境的努力,以及与地方自治局代表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政治改革的协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斯大林的时间跑得更快了,而尼古拉二世的时间好像只是在鲜血上打滑。

其实,如果尼古拉早一点实施国家杜马(议会)(反正迟早是要实施的!),早一二年解决农业问题,那俄国将会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走下去。

但没有,迟了。远处,已经闪现出叶卡捷琳堡市伊帕季耶夫家的轮廓,在那里尼古拉和他全家被枪决,还有林中的坑,他们被埋在了那里。

总之,1905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加强自己阵地的可能。但此时他们分裂成两派:以B. И. 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以Г. В. 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认为党的组织应是一个严格的集中领导的团队,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全党的纪律。孟什维克觉得,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相当于启蒙阶段独立知识分子的俱乐部,并保留着小圈子的所有特征。除此之外,布尔什维克赞成斗争的革命方式。

斯大林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在“流血的星期日”之后,1月16日,第比利斯总督预见到各城市将发生大规模骚乱,决定采取预防措施。1月17日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组织的很多成员被捕。但斯大林不在其中。

然而,1月23日,第比利斯还是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举着红旗的游行。哥萨克士兵和警察未能像1901年那样及时将游行队伍驱散。示威者进行了积极的反抗,但最后还是当局占了上风。

所有这些事件使社会民主党内的局势白热化。孟什维克利用逮捕行动后自己人数上的优势,获得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再服从委员会并且拒绝交出党的经费、图书馆和印刷厂。分裂变成了现实。

这个时期,斯大林正忙于党内的的工作,同时在阻止巴库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冲突,写传单,组织武装义勇队;他去了巴统、新罗西斯克、库塔伊斯、哥里、奇阿图拉。他简直是无处不在。警察局注意到了柯巴的频繁活动,称他为“工人们的头子”,但暂时还不能拘捕他。

托洛茨基如此评价这个时期的斯大林:“他把推翻当今的权贵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在他心里对权贵的仇恨一直是超过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监狱、流放、受害、贫困这些都没有吓倒他。他能够及时发现危险。同时,他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一系列不足,比如才智迟钝、缺乏天赋、身体和精神面貌平凡。他强烈的虚荣心使他总心怀妒



忌和不友善之感。他的顽强里也包含着复仇的心理。他眼睛的淡黄底色迫使敏感的人立刻警觉起来……在受诱惑的人中间，他不为诱惑所迷；在冲动的人中间，他不因冲动失去理智，而是能迅速冷静下来。他很早就懂得冷静、克制、谨慎特别是狡猾的好处。这种狡猾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变成了阴险。要使这些实际上二流的品质具有二流的意义，所需要的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托洛茨基 JI.，《斯大林》，佛蒙特，美国，第1册，第86页）

在托洛茨基的这段描写中我们注意到，作者不自觉地承认了促使斯大林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的客观性：“需要的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

正是俄国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主人公的命运。其中包括：斯托雷平取代维特走上前台；斯托雷平被尼古拉二世身边的人撤职，后来被杀害；列宁之后斯大林担任了重要职位，并完成了很多维特时期就打算做的事情。这一切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1905年4月2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斯大林没有参加这次大会，M. 茨哈卡亚代表了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确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新的政党，并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

大会的主要决议是：组织武装起义；支持农民的行动，直至以强力没收地主的土地；把政权交给作为国内战争组织者的革命政府。列宁认为，必须组建武装队伍。

但为什么会打国内战争呢？列宁认为，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彼得堡并且处决了尼古拉，全国仍将出现大量的抵抗基地，这些基地需要清除。

一个突出特点是，参加这次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是知识分子，工人数量非常少。

托洛茨基把这解释成是，组建起来的党的机关（“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始起绝对领导作用，尽管列宁的中央集权制原则所意味的是，首先建立以各级委员会为形式的党的组织机构。而且，列宁明白机关官僚化的危险性，并向大会提交了责成党的各级委员会接纳更多工人为委员的决议案。但这个决议案没有被通过。除此之外，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列宁也没有得到支持：在违反列宁意愿的情况下，多数人做出了国外报纸编辑部归属中央委员会监督的决定，也就是委员们也想要对侨民知识分子进行监督。

党如同“宝剑骑士团”（这是斯大林最后的表达）那样开始组建起来了。侨民政治的核心与整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缔造者和思想家，以及居住在本土的党的积极分子之间，已经暴露出内部的矛盾。后来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的上升，以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极端仇恨。

M. 茨哈卡亚从代表大会回来之后，高加索委员会的委员们号召党员着手准备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斯大林开始在奇阿图拉组织战斗队。他像过去一样，往返于东格鲁吉亚的各个城市之间。

这个时候巴库再次发生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冲突,8月22日,事情发展到油田失火。

这次的破坏程度相当大。鞑靼人(阿塞拜疆人)洗劫了油田,杀害亚美尼亚人,抢劫并焚烧亚美尼亚人藏身的房屋。这次惨剧的目击者把这个事件和“庞贝的末日”相提并论。贮油池熊熊燃烧,黑烟遮天蔽日。

《巴库报》证实了这些损失:“连办公室一起被烧掉的有:‘卡斯皮社’、‘鲁诺’、‘图马耶夫’、‘阿尔马卢伊斯’、‘曼塔舍夫’(曼塔舍夫在扎布拉特的整个工厂)‘皮托耶夫’、‘米尔佐耶夫’、‘克拉西利尼科夫’、‘梅利科夫’、‘阿尔马兹德’、‘阿达莫夫’、‘捷尔-阿科波维’、‘瓦坦’厂、‘希尔万’、‘高加索社’、‘高加索’、‘参与者’、‘彩虹’、‘石油’、‘巴拉汉公司’、‘加加林公爵’、‘加利佩林’及其他众多小商行。‘诺贝尔兄弟’被烧得只剩下了三分之二;‘卡斯皮-黑海公司’剩下一半;‘莫斯科-高加索公司’损失较轻,只有四个钻塔被烧,其他都留下来了;‘贝肯道夫’没有受损;‘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有6—7个塔台被烧……‘哈利菲’商行损失很小;‘希巴耶夫’公司只剩下一半作业场地;在罗曼内的‘波兰人’和‘斯特罗泽尔’机械厂被全部保留下来。穆萨·纳吉耶夫和阿萨杜拉耶夫的商行没有受到侵犯。同样保留完整的有在罗马内的‘莫托维利赫’公司的‘比耶林格’机械厂……烧了‘梯弗利斯社’、‘纳巴特社’、‘希霍沃’、‘米洛夫-泰罗夫’、‘祖巴洛夫’,‘哈季索夫’厂……英国商行‘奥列乌姆’、‘希巴耶夫’(库班河)也受到损害,但较轻。”(奥斯特洛夫斯基 A., 同上,第 234 页)

所有这些都如同战争时期的破坏。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和这次破坏没有关系,相反在力求阻止这场骚乱。

结果,曾经成功地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挤出市场的当地繁荣的石油业,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出口(占世界总量的 29%),石油产量降了近一半,一直到 1917 年都没能恢复到原有水平。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相互竞争的石油公司介入了骚乱。1904 年,鞑靼人假冒亚美尼亚人之名,摧毁了属于法国罗特希尔德家族的“布尼托”公司和“重油”公司的油田。与此同时,属于诺贝尔兄弟的油田和石油加工厂受损程度要小得多。

1904 年 12 月,为了表示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诺贝尔兄弟”公司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提供了一笔 5 万卢布的巨资。(奥斯特洛夫斯基 A., 同上,第 504 页)

众所周知,非常多的石油企业主向左倾激进组织捐助过大笔金钱。一般说来,几乎半数的参加石油企业家委员会的巴库石油业主是支持这些激进组织的,这对企业家们施加了十分明确的政治影响。

石油企业家委员会的一些委员都有与各革命政党有联系的亲属。比如,斯大林的领导 M. 茨哈卡亚的妻子就是银行家和“卡斯皮社”经理 И. С. 阿拉贾洛夫的侄女。



不管这种说法如何惊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 Г. С. 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1905 年的政治总罢工是大资本家资助的。至于这些钱是怎么分配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但事实就是事实:革命——不只是纯洁的高尚的理想,也有诡计、生意和两面行为,是一场没有规则的真正的战争。

巴库的塔台还没有来得及烧尽,新的事件又震动了高加索。8 月 29 日,在梯弗里斯市议会大楼里,尼古拉二世所批准的社会团体的代表们正在讨论杜马的法律草案。此时社会民主党人领着工人来了。工人们与打算把他们赶走的警察和哥萨克士兵发生了冲突。再次流血,死了约百人。这实际上是当局在枪杀自己的反对者。

柯巴书写传单,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实际上,武装起义已经开始了,此时正是他试图挖地道到军需仓库拿枪的那个时候。

有意思的是:斗争、牺牲,似乎很紧张,他却陷入了爱河。

毕竟,约瑟夫还不到 26 岁。

他的意中人是 17 岁的叶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泽,一位女裁缝。她与自己的姐妹萨莎、玛莎和兄弟亚历山大,以及萨莎的丈夫米哈伊尔·莫纳谢利泽在第比利斯的弗莱伊林斯克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有一次,亚历山大·斯瓦尼泽把自己的熟人索索·朱加施维里带了回家。

卡托是个朴实的、容易信任人的姑娘。大家都在说,约瑟夫狂热地爱着她。长话短说,1906 年 7 月 16 日夜(多数资料上显示是 1904 年初——译注),柯巴的神学院同学、神甫赫里斯季西·欣瓦列利在圣达维德教堂为他们秘密举行了婚礼。米哈伊尔·茨哈卡亚是婚礼宴会的主持人。

此时新娘已有身孕。1907 年 3 月 18 日,他们的儿子雅科夫出生了。这一年的 12 月 22 日,卡托因伤寒死于约瑟夫的怀中。他的家庭幸福很短暂,似乎是厄运在引导他去从事其他的事业。

他不是个清教徒式的人,还有过一段浪漫史,发生过一些不期而遇的关系。1917 年,他又一次坠入情网,这一次是爱上了女中学生娜佳·阿利卢耶娃,他会给她大段地讲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但那种像对卡托·斯瓦尼泽的爱,他再也不会有了。

在库奎的圣尼娜墓地为卡托举行的葬礼上,他承认,他的心再一次变得像石头一样硬了!

1905 年夏天,俄国到处是一片可怕的情景。毫无疑问,战争,特别是 5 月 14—15 日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的覆灭影响了全社会的情绪。

在波兰的罗兹市,工人和军事部门发生冲突后(12人被杀)爆发了真正的武装起义,三天内有几百人在街垒作战,造成150人被杀,200人受伤。

在敖德萨发生了工人骚动。

在新的“波将金号”装甲舰上,水兵们升起红旗起义了,把军舰开往敖德萨。

7月,莫斯科市行政长官И.И.舒瓦洛夫伯爵被杀。

同月,在下诺夫哥罗德,一群港口工人袭击了有革命情绪的游行示威者并驱散了游行队伍。冲突造成1人死亡,近40人受伤。

这些插曲只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让人奇怪的是,大部分人好像沉静下来了。也不想听政府解释什么,虽然尼古拉正是在6月接见了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团,表示准备组织由人民选举的代表会议,即议会。很快就清楚了,将召开国家杜马会议。26位各省的贵族首领也宣称要立即召集人民代表会议。

虽然尼古拉并不认为议会制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但他还是被迫向民意作出让步。

尼古拉与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们在彼得戈夫(即夏宫——译注)会见后的一个月,举行了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大会表现出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们迅速左倾,其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愿“向国君,而是向人民”呼吁了。

革命席卷的范围越来越大。从这时开始政治生活完全失去了控制。

彼得堡官方力求作出最低限度的让步,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

合法的反对派的真实目的是要从沙皇当局手中夺下大部分权力,并为此要求尽快与日本媾和(接受任何条款)。

军人想打仗,大家都知道,他们拥有打仗所必需的力量。

革命者为了完全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及其帝王、军队和自由主义者,开始了武装行动。

国外合法的俄国左倾刊物,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来换取和约的签订,为此可以让出整个萨哈林岛(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甚至海参崴。

作为对此要求的答复,尼古拉进行了军队系统的人事调整:陆军大臣B. B. 萨哈罗夫上将被A. Ф. 列季格尔斯上将代替,海军上将阿韦兰由比里廖夫上将取代,Ф. Ф. 帕利岑上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进行过两次局部动员,当中没有发生任何麻烦。财政上也一切顺利:在法国拒绝了战争借款之后,德国向俄国提供了一亿五千万卢布的短期借款,另外俄国自己还发行了二亿卢布的国债。国家黄金储备到年中时增长至四千一百万卢布。

在法国对俄国的稳定感到担心的背景下,尼古拉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芬兰岩岛举行了会晤。威廉二世提议签订俄德防守同盟,并且可以吸收法国参加这个同盟。



(虽然法国3月30日与英国缔结了条约:法国放弃在埃及的要求,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利。法国与日本的盟国的这种接近,引发了彼得堡的困惑。)

比约尔条约规定俄国和德国担负在欧洲范围内两国受到侵犯时提供相互帮助的责任。这个条约针对的是日本的盟国英国,对俄国是有利的。

这个纯粹的防御条约不针对法国,正如后来自由派刊物所试图说明的。这一点表明尼古拉渴望继续作战,加强俄国在欧洲舞台上的地位。(提前说一句,是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说服了尼古拉:如果拒绝签署条约,会使德国转向敌方阵营,并导致一场相互敌对的两个大陆性帝国无利可图的恶战。)

一句话,1905年夏天的彼得堡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谁也不知道会怎么结束。

尼古拉批准了召开讨论国家杜马方案的会议。7月18日,在彼得戈夫,大臣们、国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参议员们和大公们齐集一堂,商讨选举法方案的条文。

选举法草案公布于8月6日(19日),这一天是教会的主圣容节。

“布雷金杜马”(以内务大臣的名字命名)无疑是通往议会制的一个突破口。把议会制看成可怕威胁的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人们就曾想实现这个议会制。

尼古拉和他父亲一样,否定议会民主,认为这种民主是唯利是图的。这位未来的国家行政和宗教首领也不可能有另外的想法,国家的大部分人是信仰东正教的农民,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议会。

但他不得不屈从于新时期的局势。

“布雷金杜马”方案提议设立人民代表机构。人民代表机构有权审议法律草案和国家预算,同时可以通过杜马主席直接向帝王表达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所有的农民都拥有选举权,地主也有。城市居民中只有房产主和最大的租房客有选举权。工人、官员、教师等基本上无权参加选举。犹太人总体上准予参加选举。

是的,这是一个突破。当局承认了民主的代表机构。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了。

看样子,尼古拉终于找到了摆脱拖延已久的危机的出路。

但社会是带着讥笑来看待8月6日的命令的。让农民、贵族和富裕的资产者来选出有利于当局的有产者的代表,这能有什么结果?

这是不够的!

在不接受协商杜马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和右倾分子一下子联合起来了。不满都有各自的原因。农民杜马是沙皇所需要的,他相信这样可以与信奉东正教的人民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盟。

还没有起步的尼古拉走向君主立宪的动作并没有能使社会安定下来,反而是火上浇油。

前线已经有五个月保持平静了。双方都在等待。

从7月27日开始,在朴次茅斯进行谈判。日本人提出了媾和的强硬条件: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特权,从满洲里撤军并归还给中国,把旅顺港和辽东半岛让给日本,让出中东铁路的南部支线(从哈尔滨到旅顺港),让出萨哈林及其邻近岛屿(即库页岛——译注),支付战争赔款12亿日元,将隐蔽在中立港口的俄国舰船交出,限制俄国在远东地区拥有舰队的权利,给予日本渔民在太平洋俄罗斯沿岸捕鱼的权利,撤除其在海参崴的军事要塞。

俄方谈判代表是C.维特。他认为,为了签订和约需要作出巨大让步。

但尼古拉提出的底线极大地限制了维特热爱和平的热情。尼古拉提出:不赔一戈比钱,不让一寸俄国土地。

再重复一下,沙皇并不想承认失败,虽然国内的问题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同时他也清楚日本的财政困难,并认识到日本人如果得不到战争赔款是不会签订和约的。

在与美国驻俄国大使梅埃尔会谈时,沙皇说如果需要,他将亲赴前线作战。出人意料的是,日本代表团同意了俄国提出的条件。俄国让出了萨哈林南部区域和千岛群岛,支付了俄国战俘的生活费。

东京实际上承认,在俄国逐步加固防御之后,日本已经无力继续其军事行动。

维特给尼古拉发去电报:“日本接受了您关于签订和约的条件,这样和平将得到恢复,这些都是由于陛下您智慧、果断的决定和准确的预见。俄国保持了它在远东伟大强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保持至今并将永远保持下去。”

尼古拉的反应是显而易见的。他在8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夜里收到维特发来的电报,说关于和约的谈判基本完成。我一整天都像在润滑油上行走。”(顺便提一下,40年后苏联向日本宣战的时候,斯大林想起了朴次茅斯和约。)

尼古拉传的作者是这样评价这次战争的结果的:“俄国没有打赢这场战争,但也没有失去一切。日本正是在已经准备收获其胜利果实的那一刻,感受到了俄国的威力。俄国保存了其亚洲强国的地位。如果俄国为了摆脱战争,而在1903年日本的强求下一味怯懦退缩,将不会拥有这种地位。”(奥尔登堡C.,同上,第300页)

期待已久的和平终于来到了。但它并没有带来也不可能带来国内的稳定。

在获得了自治权的大学里开始了群众集会。

开始罢工。社会民主党人利用学生有自由集会的权利,把工人们带进大学并组织了数千次集会。

当局对此有些麻木不仁,正等着鉴于国家杜马的召开而出现的无法理解的转变。

因朴次茅斯和谈晋封伯爵的维特,正觊觎着国家核心权力者的位置,并主张君主立宪。“除了蠢事,这里什么事也做不了。”维特回到俄国之后这样说。(科科夫佐夫B.,同上,第85页)



C. Ю. 维特：“协商议会，这真是冷酷无情的官僚老爷们的发明。”（维特 C.，《回忆录》，莫斯科，1960年，第2卷，第488页）

对于抵制“农民”杜马的想法，很快在上层人物中流露出了普遍的不确定性。

赞成抵制的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党人，他们采用了从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纲要借来的新式武器，也就是政治总罢工。这可以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现行体制的活动。

9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停运。10月8日，整个中部的铁路枢纽，国家中心地区——雅罗斯拉夫、库尔斯克、下诺夫戈罗德、梁赞-乌拉尔诸铁路线瘫痪。

铁路工人推倒了电线杆，阻断了交通，并在发现罢工破坏者的地方封锁道路。

10月10日，尼古拉铁路停运，莫斯科市开始了总罢工。外省铁路运输也中断了，从而加重了全国的经济瘫痪。

10月11日，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去见维特，宣布了工人们的要求：

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取消强化警卫和戒严；

罢工、结社和集会自由；

8小时工作制。

维特回答说，他不认为立宪会议能起什么大的作用（“在美国资本家是买选票的”），而其他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维特与罢工者在变革的基本意见上是一致的。

10月10日，他呈给尼古拉一份报告，报告的实质归结为要进行选择：或是改革或是专制。

社会提出了这个目标，其意义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因为这个目标中有其正确性。政府应该接受它。“自由”这个口号应成为政府活动的口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挽救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没有选择：或者是成为笼罩着整个国家的运动的领导者，或者被自发的势力撕碎。死刑和流血只会加速爆发。

维特建议接受的宪法是，“把其作为沙皇与人民联系的手段：分享立法权、预算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扩大选举权，扩大波兰和格鲁吉亚的自治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直至“剥夺私人的土地所有权”。

按其实质，维特的纲领重复了最后两次地方自治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是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可见，维特最大限度地加速了帝王时钟到此为止的运转。

与此同时，总罢工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得到了响应。在莫斯科，自来水管停水，药

房和屠宰场关闭。甚至贵族学校学生和中学生也不再去上课，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喧闹。

10月12日，在哈尔科夫，人群与士兵发生冲突，流了血。

10月13日，尼古拉授权维特来主持内阁。同时下令彼得堡军区的部队归属首都总督 Д. Ф. 特列波夫指挥。

然而，维特并没有急着接受新的任命，坚持要求采纳他的全部纲领。有这样的推测，说维特想领导“新俄国”的政府。考虑到维特确实具有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推测是完全可能的。“新俄国”的表述是维特提出的，并与1905年的变革有关。他想让社会舆论称改革就是实施“维特的纲领”。

但尼古拉回答说，这种严肃的决定需要以沙皇的诏令隆重宣告。维特对此不满意。

10月14日，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或彼得堡——译注）开始工作。革命党派的代表们和工厂选举的代表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列夫·托洛茨基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

在这个革命管理机构（政府由于害怕工人罢工而封了它）工作的最初几天中，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一非国家的并行权力体制中获得了实际经验。

10月15日，所有的俄国报纸停刊，只有属于 B. B. 舒利金的继父——皮赫诺教授的《基辅人》没有停止出版。

同一天，在彼得戈夫，尼古拉主持召开了一个漫长的会议，讨论了“自由”和有立法权（不是协商权！）的国家杜马宣言的宣告方案。几个小时的辩论之后，沙皇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只说了句“我再想想”。

就在当天，他还向维特一贯的反对者、前内务大臣 И. Л. 戈列梅金进行了咨询。不过，戈列梅金也建议赐予“自由”。

10月16日，首都一片死寂，紧张不安。发电厂停工了，街道黑暗且行人稀少。

“可怕的寂静的日子来临了——这是尼古拉给母亲、守寡的皇后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的信中的一句话。这种死寂，街面上看似秩序井然，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酝酿着什么。军队等着信号，而一切还没有开始。大家都有仿佛严冬来临的感觉。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奥尔登堡 C.，同上，第 312 页）

尼古拉准确地抓住了这时的主要特性。天平在摇摆。

在莫斯科，相当多的居民生活极为困难。市场上没有食品卖，而停水带来了更大的不便。商人没有机会去挣钱。市民对几天来罢工的主谋者们开始产生强烈的不满。

10月14日和15日，莫斯科街头已经发生普通民众与罢工人群的冲突，开始殴打



大学生。这些大学生躲避在地处莫霍瓦亚街上的大学楼里。夜里，他们砍下大学花园里的树木，点燃后取暖。

10月16日，教会表态。所有的教堂都在宣读弗拉基米尔都主教的呼吁，号召人民与混乱做斗争。

10月17日早晨，开始供水，屠宰场开始接收牲畜，有轨马车开始沿着轨道嘎嘎作响地行驶起来。很快，喀山、雅罗斯拉夫尔和下哥罗德三条铁路线的职工也开始复工。

在叶利齐县，地方自治会议通过决议：“吃饱了的人在罢工，而黑土地地区省份生活无保障的居民随后却要为罢工付出代价。让那些不愿工作的人离开铁路，把工作岗位让给急需工作的农民吧。”

10月17日晚，在特维尔，人群包围了省议会，自治会的工作人员正集中在那里讨论应对罢工的问题。人群放火烧楼，见到从大楼里跑出来的人就打，也不去区分是罢工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

10月16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团要求市杜马给继续罢工、购买武器和组建无产阶级队伍的警察局拨款。

10月17日，出版了第一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这些事件尽管分散于不同地区，但不管是革命一方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方，双方的组织过程都是自发的。而事件的另一方参加者，权力当局，还在思考对策。

尼古拉叙述了他对选择是如何思考的：“面临着二者择其一的选择。任命一位精力充沛的军人并竭尽全力来平定叛乱。这样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但过几个月之后又不得不再次采用武力。这需要以流血为代价，且最后还是要回到目前这个状态。政权的威严虽然得到了体现，但结果还是一样的……另一条路呢，赋予居民们公民权……除此之外，任何法律草案都需经国家杜马通过后才实施——这其实就是立宪。”

换言之，武力还是掌握在国家这边，但大多数居民是反对它的。

10月17日17时，尼古拉签署了宣言，称自己的这一步是“心情沉重的一个决定，虽然他是完全自愿采取的”。

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5时，签署了宣言。经历了这样的一天，头发沉，而且头脑像空了一样。上帝，帮助我们，拯救俄国并赐予其安宁吧！”

这种对上帝的祈求说明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他还不知道，也许，后来他根本未曾想过，他做出这个决定，其实也就预先决定了1917年的革命进程，更预先决定了自己的孩子们的可怕命运。

1917年，这种局势重又出现。但是与现在有一个区别，那时平民的罗斯已经不再去维护国家的秩序了。

仿佛是为了踩灭老百姓自发的抵抗火星，东正教最高会议指责了弗拉基米尔都

主教号召与罢工者斗争的呼吁。

正如瓦西里·罗扎诺夫所指出的，完了，“领头的下台了”。

议会制俄国开始了它短暂的君主立宪时段。社会获得了“自由”和有立法权的杜马。

下一步怎么走，谁也不知道。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高加索，来看看我们的革命主人公。因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制订的方针是起义，那么他就应该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

下面就是 1905 年斯大林提出的问题。

“为了领导起义，作为这个阶级的先头部队，不仅是先锋，也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的我们，是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还是现有的党的机关就足够了？”（斯大林 И.，同上，第 1 卷，第 132 页）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任务就是保障对全俄起义的技术性的领导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方面要听取一个实际工作者的严肃声音：

“在增加武器储备、扩大获取武器的渠道与工厂制造的同时，必须特别注重建立能够使用所获武器的各种各样的武装队伍。绝不允许发生向民众直接发放武器的行为。鉴于我们缺少资金，并且在警察警惕地监视下隐藏武器非常困难，我们不可能去装备如此大量的居民阶层，否则我们就会劳而无功。要是我们建立了专门的作战团体，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的武装队伍，也是军事技术组织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制订自己地区的起义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要配合党中央在全俄的行动方案。找到一个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标出可以发起攻击的那些位置，把所有兵力布置在这个区域，充分掌握城市的地形。这些工作都应该是事先做好的。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措手不及。”（斯大林 И. 同上，第 1 卷，第 135 页）

下面就是斯大林写的传单：

强大的巨人——全俄国的无产阶级又开始行动起来了……其宏伟性不仅是俄国，也是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和无与伦比的。如今已全面展开的政治总罢工，可能会在今天结束，它并没有能形成全民的起义，但这只是为了明天能够再次以更大的力量来震撼国家并形成宏伟的武装起义。只有武装起义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俄国人民与沙皇君主专制的矛盾并打碎这个卑鄙的恶魔的脑袋……

罪恶的沙皇专制制度使我们国家处于灭亡的边缘。一亿人口的俄国，农民破了产、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和贫穷的状态、过度的国家义务和沉重的赋税、所有的居民不享有任何权利、过度的专横和暴力，充斥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里，公民生命和财产全无保障，这就是当今俄国的可怕景象。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期持



续的！造成这些黑暗惨状的专制制度应当被消灭，也一定会被消灭！专制制度正在意识到这一点，而它的这一意识越清醒，惨状就越黑暗，它在自己的权力圈内所跳的邪恶的舞蹈就愈危险。除了在城市街道上被打死的成百上千的和平居民即工人，除了在监狱和流放地受难的数以万计的人民的优秀儿女——工人和知识分子，除了那些由沙皇打手们在全俄农村制造的针对农民阶级的不间断的屠杀和暴力，专制政权在其末日来临之时又琢磨出了新的罪恶手段。它开始在人民之间散布敌视和仇恨，鼓动居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和整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争斗。它把俄国流氓武装起来，派到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它让愚昧和饥饿的俄罗斯人和摩尔达维亚人在比萨拉比亚对抗犹太人，让无知和狂热的鞑靼人对付亚美尼亚人。它在鞑靼人的帮助下摧毁了俄国革命的中心之一，也是高加索革命的中心之一——巴库，并且让整个亚美尼亚地区对革命感到惊恐。它把整个多部族的高加索变成了军营，那里的居民每分钟都在等着不只是来自专制政权，还有来自成了专制政权牺牲品的邻近部族的袭击。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而最终能够停止这一切的只有革命！……

公民们！无产阶级是我们社会中最革命的阶级，时至今日在其肩上承担着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全部重担，也是专制政权最坚决、最忘我、最彻底的反对者，它正在准备开展武装运动。无产阶级号召你们——社会的所有阶级给予帮助和支持。武装起来，帮助无产阶级进行装备，准备决定性的战斗。

公民们！起义的时刻已经临近！我们必须全副武装地迎接它的到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全体的、各地的、同时的武装起义，我们才能战胜卑鄙的敌人——可诅咒的沙皇专制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自由的民主的共和国。

打倒专制政体！

武装总起义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正在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万岁！（斯大林 И. 同上，第1卷，第184页）

传单上所注的日期是1905年10月。10月17日沙皇的宣言此时还没有发表。再看10月19日的传单，是对“宣言”的直接回应：

沙皇不会允许全民立宪会议的出现，沙皇不可能消灭自己的专制制度，他不会这样做！他所“给予”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只是暂时的让步和伪善的承诺，不过如此！当然我们要利用这种让步，我们不拒绝从乌鸦嘴里敲出核桃，然后用这些核桃打破它的脑袋……

沙皇专制制度挡住了人民革命的道路，它想用自己昨天的宣言阻碍这场伟大的运动，很明显，革命的浪涛将吞没和抛弃沙皇专制制度……（斯大林 *И.* 同上，第 1 卷，第 190 页）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作者的个性和其政治水平。应当承认，个性是坚强的，水平是高超的。他是专制制度的绝不妥协的反对者，而专制制度也绝不会从他那里得到宽容。

实际上，此时还不可能看出斯大林会是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伟大的苏维埃领导人。唯一可以充分感觉到的是这位 26 岁的柯巴的潜能。

我们需要强调，他还没有上升到全俄的层面，他还只是一个地区工作人员。

从他被选举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时起，他开始进入了全俄的层面。他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代表，参加了 1905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必须停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党内斗争的决定。

但从 10 月 17 日沙皇宣言的颁布到梯弗利斯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全国出现了“普加乔夫式暴动”的浪潮。

在萨拉托夫省，省长 П. А. 斯托雷平（以后的总理大臣）写给夫人奥莉加·鲍里索夫娜的信中对此的反应是显而易见的。

7 月 12 日，斯托雷平是这样判断局势的：“地主们惊慌失措，但农民们其实还是爱戴沙皇的。”（П. 斯托雷平，《书信集》，莫斯科，2004 年，第 586 页）

请注意“爱戴沙皇”的判断。这是帝国状况的晴雨表。

10 月 28 日，形势急剧恶化：

“事情进展不妙。五个县里连续发生暴乱。几乎没有一个庄园幸免于难。火车上挤满了逃离的人，挤满了被扒了外衣的地主。对于幅员辽阔的省来说军队太少了，而且他们的行动太缓慢。普加乔夫式暴动！……”

“我们怎么到了这种程度？损失成千上万。祖布里洛夫、霍万希纳和其他大量有历史意义的庄园被烧毁。”

似乎俄国的所有历史已处在毁灭边缘。这种感受为没有先例的犯罪现象所加重：“晚上，马利诺夫卡村的教堂遭到亵渎，在那里宰杀了母牛并当着圣者尼古拉的面大便。其他的村民被激怒，杀了 40 人。人数不多的哥萨克砍杀农民，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清醒过来。”虽然此类亵渎行为马上就遭到了惩罚，但并不能改变普遍的状况。一部分居民正与另一部分进行战斗。

“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自己的文章和传单上，斯大林发出了号召。

如果拿斯大林的情绪和此时斯托雷平反映在其书信中的情绪作比较，可以看出，



两人的心情差别很大。斯大林毫不妥协、勇往直前，甚至带有挑衅性。斯托雷平勇敢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不怕被杀害，但担心更多地流血，不希望他的名字与大屠杀连在一起，公开表明了局势稳定之后辞职的意愿。

要知道斯托雷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即使不是帝国最优秀的官员，也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而斯大林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他既名不见经传，又没有公认的声誉，甚至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是一位“能够思考的斩首机”。彼得·司徒卢威是这样评价列宁的，但用在斯大林身上也非常合适。不过，可能不是“斩首机”，而是“步枪”或是“机枪”，即一种可移动的武器。是的，由此出现了一个更现代的形象：斯大林——“革命的终结者”。

这里需要说一下他选择的柯巴这个绰号。这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长篇小说《弑父者》中一个主人公的名字，约瑟夫年轻时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这是一个高尚的山地抵抗者、侠盗、渴求正义的人。也就是说，是被侮辱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

第三章

斯大林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斯大林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杜尔诺沃是革命的镇压者、斯大林与列宁相识、“俄国革命的精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彼得·斯托雷平和国家杜马、社革党的恐怖活动

把我们的主人公定格在 1905 年 10 月，那时尼古拉二世迫于巨大的压力，颁发了俄国走向君主立宪制的宣言。此后，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开始席卷全国。

11 月 26 日，在梯弗利斯召开了为期五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必须停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派系斗争的决定；选举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三位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这个时候开始，斯大林上升至帝国的层面。

这好像有点出人意料，难道不是吗？

其实，从 1898 年还是寄宿生的朱加施维里迈出革命的第一步开始，才过去仅仅 7 年，而他已经脱颖而出。这里是有着某种不解之处的，因而需要去解开谜底。



列夫·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称为“最杰出的庸才”，其依据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仇恨，也有着某种完全解释不了的东西。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顶峰上并没有刻着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斯大林不具备像托洛茨基那样的文笔和口才。约瑟夫是在非俄语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他出色地掌握了俄文书写，但说话时带有明显的格鲁吉亚口音。他的嗓音沙哑、低沉。他清心寡欲。

假如斯大林突然置身于俄国侨民的社会民主人士之中，他远不可能像托洛茨基那样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主要人物。

但在俄国国内、在他所处的高加索地区，在过去七年的实际工作中，斯大林经受了各种各样角色的考验。他当过宣传员，组织过罢工，成立过印刷厂，组建过武装队，筹集过党的经费，安排过侦察和反侦察活动，参加过肃清内奸的工作，组织过剥夺行动，与企业家进行过谈判，分配过党各委员会的资金，筹建过党的委员会，协调过党各委员会之间的活动，当过党的记者，搞过武器。

由此可见，是革命的不断发​​展需要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他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

让我们简单罗列一下他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参加的各种活动，就能佐证他的威信。1904年至1905年，在奇阿图拉开办印刷厂；1904年，参与巴库的十二月罢工；1905年至1906年，募集经费；1905年2月，在平息巴库的亚美尼亚人与鞑靼人的械斗中组织过工人纠察队；1905年夏天，在奇阿图拉组建过“红色百人团”；1905年9月，试图占领库塔伊斯军火库；1905年至1907年，参与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出版发行；1905年秋天，在梯弗利斯组建武装队，参与刺杀Ф. Ф. 格里亚兹诺夫将军的准备工​​作；1905年末至1906年初，制订过梯弗利斯的起义（后未实施）计划；1906年至1907年，派志愿者去波斯，后来自己也去波斯短暂停留；1907年夏天，参与梯弗利斯的没收工作；1907年秋天，在巴库组建自卫队；1907年至1908年，组织袭击巴库军火库。

“1905年，大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组织转由孟什维克领导。依麦列梯亚-米格列尔委员会是少数坚守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堡垒之一。随后布尔什维克在巴库的影响开始恢复，并在1907年掌握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领导权。在当时情况下，И. В. 斯大林作为一位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威望明显降低了，但他作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立场却明显增强。”（奥斯特洛夫斯基 A.，同上，第610、611页）

“高加索的列宁”，早期格鲁吉亚社会党人中的一员、后来成为锰矿工业家的 P. 卡拉泽在1906年就是这样恰如其分地评价斯大林的。在这群人中，更高的评价大概是不存在的。

如果对当时斯大林的党内外活动和日常生活进行一下综述，那么可以说，到1905年此人的性格就定型为：精力旺盛、能力出众、有权力欲、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坚定、自制、顽强、狡猾并爱报复。

类似主人公的有谁呢？

莎士比亚笔下的查理三世？伊万雷帝？成吉思汗？

是的，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像他们。

总之，1905年12月，斯大林及另外两位同志，彼得·蒙京和格奥尔吉·捷利亚从梯弗利斯出发，前往圣彼得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然而，此时政局突变。

发生了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不曾预见到的情况：当局终于表现出了自己的意志。在向政府突然袭来和被梦想着议会制俄国的新总理大臣维特的狡黠计谋所强化的软弱甚至近乎瘫痪之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突遭搜捕，而罢工和武装行动的实际领导恰恰来自这个委员会。正是从这里发出了要求铁路工人把罢工扩展到全国的命令。帝国各个城市都向这里请示并等候指令。在这里完成了工人纠察队的组建。在多数情况下，比如在邮电工作者中间，委员会的威望是非常高的，以至政府不得不请求委员会来传送颁发给各地的命令。

一句话，彼得堡委员会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是和官方权力并存的。

那么它，这个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何而来的？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确切的：苏维埃，这是工人们革命倡议的产物。

实际上并非如此。建立苏维埃的设想，像把俄罗斯所有自由派联盟统一成一个总的联盟以及宴会运动的设想一样，都属于彼得·司徒卢威领导的“解放联盟”。在“流血的星期日”事件之后，政府下令成立了以了解、分析工人的需求为任务的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解放联盟”便利用该委员会为自己作宣传。进入这个委员会的一位工人，赫鲁斯塔廖夫将自己的委员资格转让给了一位律师的助手、自由党人诺萨尔。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因为它的诚信受到怀疑。诺萨尔被驱逐出首都。不过，“解放联盟”的成员将他藏在一节空车厢里，躲过了警察。1905年春天，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组建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将成员扩大到50—60人。

苏维埃在“解放联盟”的印刷厂或私人住所开会，还印刷了号召彼得堡的工人们成立新一届苏维埃的第一份呼吁书。于是，诺萨尔走出了地下状态，领导了这个“革命自我管理的机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

当列宁来到彼得格勒，来到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正在开会的自由经济协会所在地时，他说道：“这里是清谈馆，工人的议会。”而需要的是一个党领导武装起义的布尔什维克机构。于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就受到了战斗的鼓动。

实际上，在苏维埃身上明显反映出了自由党人1905年的全部政策。或者按照古罗马人的说法：“如果我不能说服天上诸神，就去阿赫隆（地狱之河）推波助澜。”拉丁诗人的这句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并暗指自由党人号召社会党人实施武力。



维特指望的是：在10月17日发布宣言时向他作出让步的尼古拉二世，今后同样会作出让步，因此他容忍了“苏维埃”的存在，甚至还有点怕它。

但此时在政权里出现了一位极为勇敢、坚强和智慧的捍卫者。他就是内务大臣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他在政治观点上是保守分子、保皇派。

10月30日，他被任命为大臣。

杜尔诺沃是何许人也？他来自15世纪下半叶的贵族世家，源于托尔斯泰一族。1842年11月23日，他出生于特维尔，是东正教信徒。其父曾先后就任萨拉托夫省和奥洛涅茨省的副省督。1860年，杜尔诺沃毕业于海军士官预备学校，此后作为海军军官在太平洋、北冰洋、大西洋上服役了10年。1870年，他通过军事法律学院的毕业考试，历任检察官，内务部国家警察司的司法处处长、副司长、司长，参议员和内务部副大臣(1900年)等职。从1905年10月30日起，担任国家委员会委员，主管内务部工作。1906年1月1日至4月22日，就任内务部大臣。此后，再次担任国家委员会委员，是右翼党团的主席。1915年9月11日，在彼得格勒去世。

杜尔诺沃称得上是由彼得大帝创建的彼得帝国的典型代表人物。

杜尔诺沃被任命为大臣之时，局势是这样的(托洛茨基的描述)：

“10月10日起，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和雷瓦尔三地举行了政治总罢工。紧接着，11日，在斯摩棱斯克、科兹洛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罗兹；12日，在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萨马拉、萨拉托夫、波尔塔瓦；13日，在彼得堡、奥尔沙、明斯克、克列缅丘格、辛菲罗波尔；14日，在戈梅利、卡利什、顿河畔罗斯托夫、梯弗利斯、伊尔库茨克；15日，在维尔诺、敖德萨和巴统；16日，在奥伦堡；17日，在尤里耶夫、维捷布斯克、托木斯克，都开始了罢工。罢工还在里加、利巴瓦、华沙、普沃茨克、别洛斯托克、科夫诺、德文斯克、普斯科夫、尼古拉耶夫、马里乌波尔、喀山、琴斯托霍瓦、兹拉托乌斯特等地爆发。工业全面衰退，在许多地方甚至连商业活动都停止了。教育机构关闭。知识分子‘联盟’也加入到无产阶级的罢工中来。多数情况下陪审员们拒绝审判，律师拒绝辩护，医生拒绝治疗，治安法官拒绝接待。

罢工者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民众的抗争和当局的惊慌失措同时增长，并相互刺激。街道和广场布满骑兵和步兵巡逻队。哥萨克挑唆罢工者反击：他们冲撞人群，用皮鞭抽，用军刀砍，毫无警告地从角落里开枪。

此时的罢工已经表明，它根本不是简单地因观望而中断工作，也不是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的消极抗议。它是在自卫，并从自卫转为进攻。

在南方的一些城市，罢工者修筑了街垒，占领了武器商店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着即使不能取得胜利，也要进行英勇的反击……

在其他许多城市里，发生了与军队的街头冲突，街垒进行了尝试性修筑。但就总体而言，在整个十月还只是政治性的罢工，是革命的演习，一次整体战斗力的检阅，不

管怎样还不能算是武装起义。即便如此，专制政体还是作出了让步。可怕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全国，来自各省的惊慌失措的报告占了绝对多数，完全不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政府极度的恐慌。军队自身缺乏绝对的信心：士兵们出现在集会上，演讲的军官要人们相信，三分之一的军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此外，铁路罢工又给军事镇压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最后是欧洲交易所，它意识到正在和革命打交道，表示不想继续容忍这种情况。它要求秩序和宪法保障。”（托洛茨基 Л.，《十月罢工》，<http://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1925/trotll129.htm>）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 10 月 17 日“宣言”颁布后，局势也平静不下去了，当局已完全不知所措。

至于杜尔诺沃……曾是内务大臣同事的 В. И. 古尔科说：

“必须指出，在担任内务大臣，能够直接了解国家的总体局势之前，杜尔诺沃并没有预料到国家受威胁的危急程度。当圣彼得堡暗探局局长格拉西莫夫回答他有关‘为恢复首都平静需要铲除多少人’的提问，说是将近 800 人时，杜尔诺沃挖苦道：‘把全市人口的一半去掉岂不更好？’接着他用典型的警察的思维方式评价了这一观点，并补充说道，他永远不会同意这样的尺度。

“不过很快，他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由他召集的首都卫戍部队的军人代表会议给他带来了震撼。除担任谢苗诺夫近卫军团指挥官的米恩将军之外，步兵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一致声称：在发生民众暴动时，他们无法保证能让自己的部队去进行镇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些日子里首都警察的罢工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出现市局和分局警察拒绝履行职责的情况，造成局势复杂至极。

“不过杜尔诺沃并未惊慌失措，他既不操之过急，也不过度焦虑，而是沿着既定方针继续前行。主要领导人的这种强势立刻被其政策的执行者感受到了，无论是首都的，还是地方的执行者都像受了磁电感应一样感到了这种强势。

“革命领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决定趁其尚未得到巩固，尚未恢复失去的感召力，刚刚开始找回对自身力量及威望的信心之前，对当局实施新的打击。正如我所说过的，11 月 2 日，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因波兰王国实行军事管制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受审，开展第二轮政治总罢工。就事情的实质而言，这只是一个借口，甚至不是一个特别恰当的借口。因为遥远的波兰王国与工人们全然无关，光为这个也发动不了工人们。也正如我所言，这次打击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罢工既不普遍，也不充分。产生了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代表苏维埃，换言之，也就是革命的中心丧失了它的一部分吸引力，相反，政府的威信却得到了提高。五天之后，罢工自动平息下来。”（古尔科 В.，《往事如烟：细节与剪影》，莫斯科，2000 年，第 512 页）

古尔科和托洛茨基都是对峙的直接参与者。无可争议的是，他们的见证描绘出



了相当立体的事件全貌。

11月17日,革命给了当局最沉重的打击,使其整个指挥系统陷于瘫痪:邮政局和电报局的工人开始罢工。首都与各省失去了联系。

似乎只要再迈一步,灭亡就会降临。

然而,杜尔诺沃(“一个只有肌肉和神经的瘦小、干巴的人。”B. И. 古尔科语)并不打算屈服。两三天之内,在军人的协助下,他安排好了电报局的工作,在以妇女为主的志愿者的帮助下,分拣好信件,并发送至各家各户。

在莫斯科召开的邮政电报职工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要求杜尔诺沃立即辞职。

作为回应,大臣于11月21日发布命令:11月22日不去上班的所有职工将被解雇。同时逮捕莫斯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并采取保护措施保护回来上班的职工免受来自罢工组织者方的暴力强制。

需要强调的是,革命者到处使用威胁、压力甚至暴力手段,居民对它的恐惧甚于政府。

在这两种对抗的力量中,当局显得更为软弱。自由派(首先是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立宪派)向极左政党寻求支持,并通过他们获得真正的革命武器。左翼政党则致力于起义!

立宪民主党领导人 И. H. 米留可夫提出警告:要防止新的行动变成“针对革命的罪行”。但没人听他的。他引用了维特对《每日新闻报》记者狄龙的谈话,作为政府已对莫斯科起义做好了准备的证明:“俄国社会尚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给它好好上一课。就让它灼伤一下,那时它会自己向政府求助。”(米留可夫 И.，《回忆录》,莫斯科,2000年,第287页)

1905年,杜尔诺沃坚决铲除了叛乱的根源。在明白了法定政府越发强硬和坚定后,邮电职工恢复了上班。

杜尔诺沃通令地方领导人,要逮捕当地革命积极分子。11月27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律师助理赫鲁斯达廖夫-诺萨尔被捕。

托洛茨基取代诺萨尔成为主席。苏维埃决定打击国家的金融系统。

战争在向最高级别推进。

破坏国家的货币体系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专制政府的彻底垮台。

于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连同全俄农民联盟总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发表了自己的《金融宣言》:“我们决定:拒绝缴纳赎金和其他任何付款;要求在进行所有交易和发放工资和薪酬时支付黄金,而当金额少于5卢布时,则用足重的兹翁卡硬币支付;在从信贷所和国家银行取款时,也要求用黄金全额支付……我们决定,当沙皇

政府与人民明显地和公开地进行战争时，绝不允许支付这个政府所签署的任何债款的债务。”(古尔卡 B.，同上，第 516 页)

“宣言”不仅发表在党报上，还刊登在资产阶级的《罗斯报》、《自由俄罗斯报》和《俄罗斯报》上。政府对苏维埃的恐惧加剧！

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有理由指望，因老百姓赶往银行和储蓄所提取自己的存款，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将拒绝同俄国政府合作。

然而，杜尔诺沃给予了最后一击：

12 月 3 日，彼得堡苏维埃的所有成员被逮捕。这位前帆船舰队的军官、不屈不挠的保皇派，此时可以庆祝胜利了。

这个决定让维特一阵绝望。

维特认为，彼得堡全体工人应该立即发表声明，并恢复全俄总罢工。

也就是说，维特(“狡猾的尤利西斯”)想让自由派明白，他准备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唯一的障碍就是沙皇。

12 月 3 日，维特主持大臣会议。杜尔诺沃没有参加。突然间，维特被紧急叫去接电话，回来时，他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地说：“一切都完了。杜尔诺沃对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实施了大逮捕。”但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总理大臣的恐惧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其后，没有出现任何抗议这次逮捕的集会。虽然增添了工人新成员的苏维埃又组建了起来，但这些成员又于 1 月 2 日被捕。

这就是斯大林来到之前帝国首都的局势。很明显，12 月 3 日之后，革命的发展中出现了断裂现象。

如果斯大林稍稍早到几天，那么很有可能也会被捕。但是，他没有早到……

也因此，俄国革命的两位领袖得以会面，即当时的领袖列宁和将来的领袖斯大林。

鉴于可能会遭逮捕，代表大会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举行。

可是，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较少，已称不上是代表大会，而是一个代表会议，并且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比孟什维克人数多。

这次会议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个通报高加索局势的讲坛。他化名为 И. 伊万诺维奇做了发言。应当说，斯大林的发言让列宁产生了应有的印象，根据列宁的提议，会议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高度评价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工作。也就是说，斯大林立刻被作为党的优秀工作者受到了注意。

后来，在代表会议的工作中出现了矛盾。

孟什维克建议利用即将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在省级委员会的复选人里选出立宪大会的代表，而不是国家杜马的代表，按照他们的想法，应该召开立宪会议，并自行宣布立宪会议是俄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布尔什维克反对该计划。在辩论中，斯大林讲了话，列宁支持他的发言。最后，选举出了一个制订代表会议多项决议的委员会。斯大林与列宁、克拉辛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一起入选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确认了抵制各级杜马选举的思想。

当然，当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战斗的革命党人即使是去思考一下议会斗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把 10 月 17 日的“宣言”看成是厚颜无耻的欺骗。（以后，列宁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将参加选举，而斯大林将成为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工作的协调人。）

与列宁相识对于这位高加索党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列宁记住了他。对于党、对于列宁来说，干部的短缺和分裂是个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坚定的、在自己的地区享有威望的拥护者的出现，的确是一份意外的礼物。

列宁几乎比斯大林大十岁，来自俄罗斯有文化的阶层，是一名获得过文凭的律师。

其实，左翼中也有不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列宁的目的是进行一场无情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因年轻时“淘气”参加了学生罢课而被统治精英逐出，后又在穷乡僻壤被流放数年的他，同斯大林一样，对这些精英有一本自己的账。

另外，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也因参与谋杀被誉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被处于绞刑。

就其才能和政治气质而言，列宁在帝国里倍受束缚。在这方面，斯大林与他相像。

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在莫斯科武装起义声中闭幕了。这次起义实际上是被杜尔诺沃搞垮了的那场革命的继续。莫斯科起义这件事，一方面是由维特政府挑起的，其目的是要将革命彻底击溃；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也习惯于渴求战争。不过总体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场危机只能用流血来解决。

B. 古尔科是这样描写革命者们的行动的：“他们心急火燎地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而且实质上几乎是在公开地进行。与此同时，成功消灭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件事鼓舞了维特，他计划将革命一击而亡。他认为允许莫斯科起义公开进行，让它在远离他所在的地方进行，是件好事，可以随之给居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并镇压所有最活跃的革命头面人物。但财政部里一些如 A. И. 普梯洛夫等亲近他的幕僚则对他所说的表示惊讶：为什么政府能够允许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莫斯科如此公开地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他正是这么解释的。”（古尔科 B. И.，同上，第 519 页）

的确，起义是可怕的。如果不是紧急调遣了由果敢的米恩将军指挥的谢苗诺夫军团进驻莫斯科，还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收场。谢苗诺夫军团的士兵如同投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再次罢工的莫斯科-梁赞公路一线，他们抓获了罢工的领导者们并

当场枪决。在莫斯科，谢苗诺夫军团用炮火摧毁了设置在普列斯尼亚路上的街垒。起义者从芬兰偷运过来的瑞士步枪和手枪在近卫军的大炮面前相形见绌。

当局有些迟缓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起义失败了，但革命并未停息下来。从西伯利亚到高加索和波兰，革命的无情进程还将长久地震撼俄国的生活。

12月24日，斯大林从彼得堡返回梯弗利斯。此时城市里正进行着街垒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起义者被高加索军区司令员、Ф. Ф. 格里亚兹诺夫少将指挥的军队击溃。

(1906年1月16日，格里亚兹诺夫将军被刺身亡。斯大林参与了这次暗杀的组织工作。谢苗诺夫军团指挥官、莫斯科街垒战的镇压者米恩将军，同样也被斯大林的同龄人、女教师季娜伊达·卡纳普良尼科娃枪杀身亡。行刑前，卡纳普良尼科娃朗诵了普希金的诗句：“同志，请你相信吧：那颗/迷人的幸福之星必将升起，/俄罗斯会从沉睡中惊醒，/那时在专制制度的废墟上，/人们将铭记我们的名字！”)

当然，斯大林并没有亲手杀死格里亚兹诺夫，同样，将军也没有亲手枪杀起义者。但事实上，他们二人是相互敌视的：一位是为帝国效劳的将军，一位是革命阵营的统领。革命并没有完全失败。

斯大林将1905年1月和12月的起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待12月起义的草率和分歧令人遗憾。“第一，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俄国无产阶级没有被击溃，只是撤退了，而现在正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俄国无产阶级决不会放下血染的旗帜，也不会把起义的领导权让给任何人，它将是俄国革命唯一的能够胜任的领袖。”(斯大林 И.，同上，第202、205页)

从这些在失败之时所写的文字中，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斯大林恰似在擦掉无产阶级被打伤的脸上的鲜血，并宣告未来的胜利。

应该指出，除宣传任务外，这里还明确表达出一种将分裂的党团结起来的渴望，即扩大对自由派人士的影响。

他明白，不能只停留在某些人主张的“革命恫吓”上。

(不久后，他在与党内孟什维克派统一问题上的观点与列宁所持的观点发生分歧，并出现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列宁利用灵活的斗争方式占了上风。)

所以，起义理应继续下去。

斯大林筹备成立工人纠察队，与被从军队开除的军人一起工作，寻找梯弗利斯市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他写了许多文章和传单，也没有忘记到巴库去。

3月，斯大林开始与梯弗里斯的《甘蒂亚迪报》(《黎明报》)和《埃尔瓦报》(《闪电



报》)合作,这两份报纸均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组织出版。

3月8日,他在《甘蒂亚迪报》上发表了《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解释了抵制杜马选举的必要性。

他仍然认为,新的革命浪潮即将出现,因此“杜马,这是一个非驴非马的议会”。“由梯弗里斯省选区推选出的有权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的98名复选人中,只有两名可能是代表工人的,其余96名应该属于其他的阶级……抵制的策略在革命者和那些想借杜马拯救旧制度的非革命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而划清这种界限的行为对于人民的革命启蒙有重大意义。”(斯大林 И., 同上,第207、212页)

对待杜马的这种态度是所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固有的:他们着眼于革命的发展,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自由派的那些合法的斗争方式,并且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会消失于他们的民众之中。

当时俄国的力量对比的确显示出立宪派的力量在连续增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革命受阻时期,这一策略就是一种战略性失败。

其实,当时的气氛中充斥着不接受杜马选举的观念,因为几乎所有有教养的社团都对10月17日的“宣言”不满。

在立宪民主党人中,目标之一是让杜马当选代表宣布召开立宪会议,并由立宪会议宣告成立共和国。

最著名的立宪党人之一——彼得·司徒卢威认为,类似的立场对党来说是自毁性的。他认为不诉诸武力,就不可能建立立宪会议,因为帝国在镇压革命后显示出它还是强大的。此外,任何一个违背现行的政治框架而成立的临时政府都不具合法性,并且不能“把俄国土地上四散分离的宫殿集中起来”,最终将被反革命所推翻。

结果,立宪民主党人入选国家杜马,他们建立了杜马中最大的党团,并对政府逐步施加压力,成为二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

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也改变了自己对俄国议会的观点,不过,他们从未成为杜马中有影响的党团。

斯大林在写文章时,完全沉浸在自身所处的现实中,无法从自己遥远的高加索去看清杜马活动的可能性。没有人想过要在这一问题上指责他。

然而,在其发表于1906年3月《埃爾瓦報》上题为《土地问题》的文章中,斯大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示赞成将土地转交农民直接所有。

他否定土地地方所有、社会主义化和国有化的想法,认为它们逾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并且是“革命的障碍”。

斯大林写道:“很明显,农民夺得的土地应当交给农民自己,给予他们在自己内部

去分配这些土地的可能。应当这样去解决上面提出的这个问题。土地的分配会导致所有权的变动。小有产者将卖出土地而走上无产阶级化之路,富裕者将购得新的土地并改善耕作技术。农村将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将兴起,这样就会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斯大林 И., 同上, 第 1 卷, 第 223 页)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纲领就其本质而言与 П. А. 斯托雷平的纲领相近,斯托雷平也竭力想废除农民土地村社,认为它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也许,在斯托雷平和斯大林之间也存在某种共同的东西?

事实上,他们二人都力图实现俄国的现代化。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引证是不正确的。准确地说,马克思晚年认为,不存在这么一条历史规律:俄国必须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村社的确能够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支点。

马克思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不过,在该信的三篇草稿中,马克思论述了自己的想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唯一严肃的、可以作为铁证的俄国农民的村社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根据在于:追溯遥远的过去,我们看到在西欧到处都有或多或少的古老的村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处都消失了。为什么单单在俄国它避免了同样的命运呢?

我的回答是:因为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农村的村社可以逐渐摆脱自己的原始特征,并可以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集体生产元素而直接发展。正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代的产物,它可以掌握其积极成果,无须经历其所有可怕的波折。俄国并未与现代世界隔绝;与此同时,它不会像东印度那样成为外国征服者的囊中之物。

假如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们否认类似进化的理论的可能性,我会问他们:难道为了引入汽车、船舶、铁路等,俄国就必须像西方那样经历机器生产发展的长时间的孕育期吗?或让他们向我解释,他们是如何一下子就将在西方磨炼了整整几个世纪的整个交易机制(银行、信贷社等)引入俄国的?

假如在解放农民时,农村的村社能够立即处于正常发展的条件之下,假如随后主要依靠农民来偿还的巨额国债,以及由国家为中介(还是依靠农民)提供给变成资本家的那些“新的社会支柱”的其他巨款,所有这些开支都用于农村村社的进一步发展,那么现在就没有人会去想村社消灭的“历史必然性”:大家都会承认村社中有着俄国社会复兴的元素和优于其他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桎梏下的国家的元素。(派普斯 P., 同上, 第 1 卷, 第 77、78 页)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1906年,当斯大林写《土地问题》时,他可能并不知道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写过此信,因为这封信当时是不为人知的(该信首次发表是在1886年的《人民意愿公报》上,两年后在《法律通报》上转载)。

然而,斯大林一定知道,社会民主党的长老Г. В. 普列汉诺夫在与民粹派的辩论(见文章《我们的分歧》)中强调:当恐怖分子夺取国家政权后,由于国家处于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状态,他们不可能以社会主义原则来建设经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使成功夺取了政权,也不会将俄国引向社会主义,而是引向“一个类似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般的政治怪胎,即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经过改头换面的君主专制”。(引自:派普斯P.,同上,第1卷,第78、79页)

所有写斯大林的传记作家一致认为,斯大林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正由于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在思想理论辩论中始终居于上风。

在谈及土地问题时,应该记住,帝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而粮食出口是俄国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几乎整个经济都是与农村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农村经济明显地分为农民的和地主的两部分,而且正是大地主的经济生产提供了大部分粮食。)

正是在土地问题上,以斯托雷平为首的自由改革派和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保守派两大派别之间即将发生碰撞。

当然,斯大林提出的土地问题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但是,出现了一个矛盾:在抵制杜马的文章中,斯大林看起来像个迫不及待的革命者,但在有关土地的文章中,他却是普列汉诺夫的进化发展观的拥护者。

这该如何解释呢?

这是斗争的结果。在俄国各种思潮涌现,一个参与过武装斗争的人,不可能立即转向议会制一边。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在快速成长,从高加索的蛮荒之地自信地瞭望着都城中心。

1906年4月15日,在巴库发生了一桩对他来说非常不愉快的事件。

第二天,在《高加索报》上刊登了以下一则简讯:“秘密印刷所。星期六。4月15日,在阿符拉巴尔,距离市急性传染病医院150—200步的地方,在Д. М. 罗斯托玛施维里名下一个无人居住的单门独院里,发现了一个可以坐滑轮上下的深达10俄丈的井。沿着井底地下坑道再向下走7俄丈左右,联通着另一口井,而在这个井里放着一个高5俄丈左右的扶梯。沿此扶梯可以进入第二个地下室,它低于这所房子的第一个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设备相当齐全的印刷所,有20个有俄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铅字的印刷活字分格盘,一台价值1500—2000卢布的手工印刷

机,还发现各种硫酸、爆胶和其他用于制造炸弹的物品,各种非法出版物,军队和机关各部门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装有 15 俄磅甘油炸药的炸弹。印刷所用电石灯照明,并安装了电子信号装置。在院子的小板棚里还发现了 3 个‘装了弹药的炸弹’以及与其配套的套筒等物。与此相关的正在《埃尔瓦报》编辑部开会的 24 人被捕。在搜查该编辑部时,发现大量非法出版物和传单,以及约 20 份空白护照。编辑部被查封。由于这个秘密印刷所有一些通向不同方向的电线,所以现在正在挖掘,希望找到其他的地下室。在这个印刷所搜出的物品装了 5 大马车。当天晚上又拘捕了其他 3 名同谋。当被捕人被押往监狱时,他们一直唱着《马赛曲》。”(雅科夫列夫 H.,《斯大林:上升之路》,莫斯科,2000 年,第 51、52 页)

我们抛弃旧世界,
从我们的脚上抖落掉它的尘埃……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在这场战斗中败北,这些人的精神依然高涨。

是的。大概,正是那条带走了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地狱之河”——阿赫隆河带走了他们。

杀人(刺杀格里亚兹诺夫将军或其他人)对于各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说都是滔天罪孽。

但是在革命者中没有信教者,他们的上帝是理智(“我们愤怒的理智在沸腾”——他们是这么来唱《马赛曲》的),从法国大革命起就开始否定上帝。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作了相当鲜明的表述:“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准许的。”

俄国革命的大罪人谢尔盖·涅恰耶夫(他的职业还是教师),只因自己的同志不愿服从革命恐怖活动的残酷法则而将其杀死,却成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革命者们崇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象征。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偶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涅恰耶夫就是“恶魔”中的一员。总之,俄国革命的“恶魔”(或“英雄”)非常多,多到哲学家 H. A. 别尔佳耶夫用“俄国革命的精神”这个定义把俄国革命的民族特性从地下拉上天堂。

“但请试着透过革命的俄国的表层进入到深处。在那里您会认清旧俄国,遇到熟悉的老面孔。俄国革命的每一步都能遇到像赫列斯达科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斯梅尔佳科夫这样一些不朽的典型人物,他们对俄国革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并攀到了权力的顶峰。”(别尔佳耶夫 H.,《革命精神——从深处》,莫斯科,1991 年,第 52 页)

这里让人想起 B. 列宁的文章《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但让别尔佳耶夫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农民情绪镜子的托尔斯泰,而是“有着俄罗斯人典型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道德高尚的托尔斯泰”。



“被俄国作家描写和创作出来的俄国恶魔有很多：满口谎言、偷梁换柱的魔鬼，平等的魔鬼，不幸的魔鬼，否定的魔鬼，不予抵抗的魔鬼等等。所有这些虚构的恶魔长期困扰着俄国。”(别尔佳耶夫 H.，同上，第 53 页)

我们要问：这与斯大林有何关系？

关系在于：“渴望革命并寄予它巨大期望的俄国人相信，当革命风暴清除掉我们的一切污秽后，果戈理笔下俄国的面目狰狞的那些人物将会消失……这就是革命意识产生的谬误，它未能洞察到生活的深邃。”(别尔佳耶夫 H.，同上，第 57 页)

斯大林同样对革命寄托着“巨大期望”。他期望的是什么呢？浪漫的兄弟情谊、大公无私、准备为伟大的目标去牺牲自我——难道这些可以被革命者及其继承者们今天堕落蜕化的事实所勾销吗？

不，不可能被一笔勾销。

毫不意外，在题为《纪念 Г. 捷利亚》的悼念文章中，斯大林满腔热忱地描述了这位年仅 27 岁死于肺结核的社会民主党人：

“惊人的才能、无穷的精力、独立的精神、对事业的热爱、英勇不屈的气概、宣传的天赋——这就是对捷利亚同志的评价。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才能遇到捷利亚这样的人，只有无产阶级才会努力去向这个吞噬了自己的同志、工人 Г. 捷利亚的可恶制度复仇。”(斯大林 H.，同上，第 2 卷，第 31 页)

捷利亚刚和斯大林一同参加了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而现在这位年轻党员已不在人世了。

悼念文章表达出一种伤痛的失落感，斯大林有节奏的反复强调的文风像是教堂的祷告。他称死者为英雄。也许，他实际上是一位诚实坚强的人，对人间公正持有新的信仰的使徒。

但对于传统的俄国来说，这个捷利亚就是“魔鬼附身”，他的死意味着摆脱了一个魔鬼。

这里横贯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地狱之河在其底部流淌。

在别尔佳耶夫有关清除污秽这个无法实现的奢望的话语中，既给捷利亚，也给托尔斯泰伯爵敲响了丧钟，后者希望向人群投掷炸弹的恐怖分子获得成功。

说托尔斯泰支持恐怖活动，似乎难以想象，近乎虚构杜撰。但并非如此，这一切都是事实。而且，这也许就是托尔斯泰主义的精髓。在任何情况下，别尔佳耶夫的论断都证实了这一点：“托尔斯泰是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就道德和唯心主义原理而言，他是任何国家体制的敌人。托尔斯泰否定国家，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牺牲和痛苦的基础上的，还认为国家是邪恶的根源，在他看来是这种邪恶导致了暴力。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和托尔斯泰对国家体制的仇恨在俄国民众中同样占了上风。托尔斯泰

是俄国人民反对国家体制和无政府主义天性的代言人，他给予了这种天性道德和宗教的认可。他是摧毁俄罗斯国家的罪人之一。”(别尔佳耶夫 H. ,同上,第 83 页)

因此，参与谋杀格里亚兹诺夫将军的斯大林和这位伟大作家是同路人，“俄国革命的精神”照亮了他的道路。

1906 年 4 月 6 日，斯大林离开梯弗利斯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在那里，他遇见了在塔墨尔福斯相识的熟人——B. И. 列宁、Л. Б. 克拉辛、Н. К. 克鲁普斯卡娅、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等。在会上，他看到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元老 Г. В. 普列汉诺夫和 П. Б. 阿克谢里罗尔，认识了一些后来成为他战友的人：К. Е. 伏罗希洛夫、Ф. Э. 捷尔任斯基、Ф. А. 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М. В. 伏龙芝。他和克利姆·伏罗希洛夫住在宾馆的同一个房间里。

与会代表里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А. В. 卢那察尔斯基、B. В. 沃夫斯基、Я. С. 加涅茨基、А. И. 李可夫、М. И. 加里宁、А. П. 斯米尔诺夫、О. А. 叶尔曼斯基、И. А. 特奥多罗维奇。

托洛茨基未能参加会议，他在流放中，但很快便逃了出来。

在大会上，斯大林就土地问题与列宁进行了辩论，因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众所周知，“伊万诺维奇”(斯大林参加该代表会议时用的化名)主张把土地直接交给农民。

列宁则持另一种立场：在权力交给人民的情况下，土地应收归国有。

应当指出，会议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进行的，用普列汉诺夫的经典名言来表述就是：“不应该拿起武器。”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方针是与之对立的——主张武装起义。

土地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所有发言者都同意，一旦革命取得胜利，未来的民主共和国应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下一步呢？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一致认为，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小私有者，农民在土地变革后将转向反对革命。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俄国没有坚实的基础，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不愿再去支持工人。

这就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列宁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未来的民主成果是不可能保住的，有可能的只是短期夺取政权。因此，不能把土地分给将是未来对手(现在是暂时的盟友)的农民，只能是从地主手中没收并转为国家所有。

斯大林就更为坚决：因为与农民的联盟是暂时的，所以应当支持农民提出的那些不违反经济发展趋势和革命进程的要求。(然后呢，正如我们在他的《土地问题》一文中所看到的，相当数量的独立农场主将破产，自然，也就将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来。正如我们将在 1918 年夏天看到的，布尔什维克为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利用这个想法，通过贫农委员会来造成农村的社会分裂。)

在争论农民(土地)问题时，与会者试图展望不久的将来，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



非常实际。

实际上,俄国的政治分裂是沿着主要经济力量——大的土地所有者及与其亲近的官僚、工业资产阶级和小土地所有者的不同方向进行的。

如果说自由派得到了以工业资产阶级和部分官员为代表的重要力量的支持,那么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因此,农民阶级转向谁,实际上将决定一切。

数月后,沙皇政府将宣布实行“斯托雷平改革”,此举必将夺走社会民主党人控制农民阶级这一庞然大物的机会。

列宁加入到伊万诺维奇(即斯大林——译注)所在的小组里来。当然,加入这个小组并不代表同意这个小组的主张,而是因为他不赞成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纲领(土地转归地方所有)意味着对自由派的妥协。

革命退却了。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的数量上占了优势。未来会怎样?谁都不知道。

3月份,进行了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但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杜马选举(4月份取消了抵制),以至前景被描绘得相当黯淡。

4月底,由于这一抵制,在竞选名单中,立宪民主党成为最左的政党,并获得了34%的席位,有153名代表(后来这一数字上升到179人,即37.4%)。有时,立宪民主党被称为“教授党”。“毫无疑问,加入该党的是俄国知识分子中最具有政治意识的阶层。”(П. Н. 米留可夫语)这些人经过了在地方医院、农业站、兽医站、学校的各种社会工作(有时甚至是忘我的工作)的考验,他们倾向于日复一日的改良活动,不善于也不愿意从事纯粹的革命活动。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他们的另一个名称)是未被准予享有政治和分配职能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根据意大利哲学家维里福列多·帕累托关于精英更替的规则,类似的群体被称为反精英,他们觊觎通过排挤掉统治集团,来领导国家并进行必要的改革。

比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党团更左的“劳动派”逐渐形成(占107席)。

政府想依靠农民代表并由他们组建自己政党的企图未能实现。总的来说,选举结果让政府大失所望。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成为摇摆不定的多数,但是,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重整了撤离满洲里的军队的应有秩序之后,当局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此外,尼古拉二世改变了自己对维特的看法。

沙皇给母亲写信说:“维特在莫斯科的一系列事件后发生了急剧变化,现在他想把所有人都绞死和枪毙。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变色龙……由于其性格的这个特征,几乎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他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自我毁灭。”(奥尔登堡C.,同上,第337页)

4月初,几乎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在皇村对基本法(即宪法)的修改草案进行了讨论。

草案的第4条有关“最高专制权力属于全俄的皇帝”的说法引起了最大争议。在以前的版本中使用的是另外的表述:“专制的和无限的”。

4月9日,尼古拉在会议上说: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整整一个月来我都随身带着这份草案。我一直被一种感觉折磨着,面对我的列祖列宗,我是否有权改变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权力的范围……”

“10月17日法令的颁布是我完全自愿的,而且我下决心要把它进行到底。但是我不认为有为此放弃权利的必要性,有必要改变对最高权力的定义。这个定义写在现行基本法的第1条,已经存在了109年。也许,有关不真诚的指责不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我本人?我接受对我的责备,但是他们代表哪一方?我相信,百分之八十的人民会和我站在一起。这事关我的良心,我自己来解决它。”

皇帝的声明在会上引起了异常的骚动:

维特:“这个问题将决定俄国的整个未来……”

皇帝:“是的。”

维特:“如果陛下认为您不能放弃无限的权力,那么就不能修正其他什么了。基本法也就不可能重新颁布了。”

帕伦伯爵:“我是不赞同‘10月17日宣言的’,但它确已存在。陛下,您需要限制自己的权力。”

M. Г. 阿基莫夫:“如果说‘无限的’,这就意味着挑战。如果已颁布的法律正在毁坏俄国,那么您必须作出抉择。但现在还绝不能这样说。”

国家委员会委员萨布罗夫、索里斯基伯爵和弗里施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0月17日宣言中已经删去了‘无限的’一词。”

П. И. 杜尔诺沃:“在10月17日法令和2月20日事件之后,无限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

A. Д. 奥博伦斯基公爵:“建议删去‘无限的’,保留‘专制的’。”

皇帝:“以后再告诉你们我的决定。”

该草案的讨论从4月11日一直持续到4月13日。会议结束后,索里斯基伯爵向皇帝请教:“有关保留或删除‘无限的’一词,您如何下令?”

皇帝:“我决定保留大臣会议的版本。”

索里斯基伯爵:“也就是删除‘无限的’一词?”

皇帝:“是的,删除。”(奥尔登堡 C., 同上, 第342、343页)

整整一个月零五天,尼古拉痛苦地思考着自己的选择。最终选择了(确认)议会



道路。

这让我们回忆起 1880 年 3 月 1 日，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皇帝被炸身亡之时。那时亚历山大二世正准备成立一个“公众委员会”（包括地方自治和大城市代表参加的委员会，相当于议会的雏形）。原定 3 月 4 日要对已被皇帝许可的方案进行最后的讨论，但这一切未能如愿。

4 月 23 日，维特内阁全体宣布辞职，杜尔诺沃也被解除职务。尼古拉用这种方式表明，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4 月 26 日，新的基本法颁布。

此后，在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根据其领导人 П. Н. 米留可夫的建议，在代表会议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项致命的决议：

“在国家杜马召开前夕，政府决定对俄国人民进行新的挑战。政府企图将国家杜马——这个孕育着我们饱受磨难的国家所有希望的核心贬为官僚政府仆从的角色。

“政府所制造的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人民代表履行人民赋予他们的使命。”

这一声明可以与 1880 年 3 月 1 日的炸弹相提并论。毫不奇怪，立宪民主党人不赞同与当局开展建设性合作，于是他们便召唤“阿赫隆的神灵”，后来他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这些“神灵”了。

4 月 26 日，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结束了。斯大林是 6 月 20 日返回梯弗利斯的，他在德国作了短暂逗留，并从那里带回了出版合法报纸《阿哈列·茨霍夫列巴报》（即《新生活报》）的资金。斯大林在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怎么办？》、《媒体》、《梯弗利斯之变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府》等。这 13 篇文章，还有《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小册子及系列文章《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开篇，都是斯大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写成的。

7 月 14 日，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之后，报纸立即遭到查封。

与此同时，俄国正经历一些异乎寻常的事件。维特之后，聪明、谨慎的保守分子伊万·罗京诺维奇·戈列梅金出任总理大臣，萨拉托夫省长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尼古拉二世彻底调整了彼得堡的统治集团，将最重要的部交给了外省人士，而不是首都的精英。

皇帝用可靠的官僚戈列梅金取代了政治走向无法预测的维特，这是相当明显的一着棋。这位 66 岁的总理大臣出身于 17 世纪的贵族家庭，其父是省里的官员。戈列梅金毕业于法学院，曾在省级机关任职，担任过波兰凯尔采省副省长，曾在参议院委员会研究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两省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法律地位，担任过司法部副大臣、参议员、内务部副大臣，此后任内务大臣，被任命为国家委员会委员，从 1905 年 3

月开始担任巩固农民土地所有权措施特别会议主席。

戈列梅金喜爱舒适,避免冲突,并忠于君主。

斯托雷平与他完全相反。

首先,他并不想接任按重要性讲排名第三的这个职务。有两位前任(布雷金和普列韦)被杀害和两位被免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和杜尔诺沃)的前车之鉴,斯托雷平大可不必急于去上断头台。

但在尼古拉对他说了“我命令您”后,斯托雷平亲吻了尼古拉的手,表示同意。这一幕看起来有些动人,但必须承认,就天性而言,斯托雷平的言行举止非常富有感染力。

与戈列梅金不同,他是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时局正需要这样的人。

1862年4月2日,斯托雷平生于一个16世纪的贵族之家,父亲是炮兵将军,母亲是一等文官A.戈尔恰科夫的侄女。斯托雷平毕业于维尔诺中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的自然部,曾就职于国有资产部的农业和农村工业局,担任过科夫诺县的首席贵族、格罗德诺省省长,然后是萨拉托夫省省长。

然而,在他接受最后一个职务时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动荡,而他并没有掉脑袋,而是顺利地应付了过去。

第一届杜马工作的整个阶段始于希望政府与杜马能有共同之点,而到后来它就完全被撇到了一旁。

像所有拥护武装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奉行的那样,斯大林是鄙视杜马的。

在《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一文中,他充满激情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从另一方面,人民深恶痛绝的反革命分子正在积聚力量并逐渐强大起来。它已把佞臣组织起来,它号召一切黑势力汇集到自己的旗下,它成为黑色百人团‘运动’的头领,它准备着向人民革命发动新的袭击,它把嗜血成性的地主和工厂主纠集在自己的周围。可见,反革命分子准备摧毁人民革命。

“局势愈发展,国家就愈益尖锐地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这两个阵营的两个首领即无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对抗越残酷,就越能说明沟通它们之间的所有桥梁都已烧毁。两种可能必居其一:或是革命胜利,实现人民专政;或是反革命胜利,实行君主专制。谁要脚踏两只船,谁就是出卖革命。谁不和我们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可怜的杜马和那些同样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正是脚踏着两只船。它想调和革命和反革命,让狼和羊在一起吃草,以此‘一举’镇压革命。所以杜马至今只不过是石臼里踏水,因为它不能把任何民众召集在自己的周围,不具备立足的基础而只能晃荡在空中。”(斯大林Ⅺ,同上,第1卷,第251、252页)



斯大林痛苦地写道,代表大会否定了主张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认同了孟什维克的革命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也就是说,代表大会不清楚现在所发生的事件的本质,这样一定会犯新的错误。

杜马是什么呢?它没有“特别大的权力”,“它受到由武装到牙齿的沙皇政府保护的国家委员会的监视”。要是杜马不满足于只有发言权的角色,沙皇政府就“‘有权’解散它”。

“立宪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呢?能不能称他们为革命者呢?当然不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立宪民主党就是一个由妥协分子组成的党:他们想限制沙皇的权利,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人民胜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想用资产阶级专制,而不是用人民专政来代替沙皇专制(见他们的纲领)。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和稀泥,让人民抑制自己的革命精神,收回自己的革命要求,并尽量向沙皇妥协。

“可见,杜马中的大多数一定是由妥协分子组成,而不是由革命者组成。这一点早在四月上旬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斯大林 II., 同上,第 1 卷,第 261 页)

斯大林不同意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份决议把杜马看成是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削弱当局地位的潜在力量。斯大林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但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判断失误了。正是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在推翻帝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为此还会发生世界大战。

杜马召开前几天,举行了立宪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从讲台传出一则新闻:基辅总督 A. П. 伊格纳季耶夫被杀。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立即就有人愤怒地痛斥那些鼓掌的未来的杜马代表们。但事实就是事实,人民选出的代表不打算谴责恐怖行为。

如果斯大林听到了这样的掌声,他也会和他们一起鼓掌。

总之,第一届俄国议会是平息革命的战斗机关。它的代表们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也不清楚千年俄国权力传承的历史奥秘是应该掌握的,不能一笔勾销,不能炸毁,而是去掌控。

杜马初期活动的见证者、杜马记者,也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状况:“他们不明白,历史交到他们这些毫无经验者手中的能够改造俄罗斯生活的工具是多么珍贵。反对派和政府一样,都不知道如何运用国家杜马,不知道从中能够也应该获得什么样的益处。人民代表沉迷于斗争,罢工、起义、恐怖活动,杀戮声震耳欲聋。他们陶醉于政治上的高谈阔论、揭发和要求之中,不善于立即去做杜马应做之事,也就是着手立法工作。要知道,杜马的召开是他们以坚强的毅力才争取到的。他们的激情过于澎湃,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

不可抑制的奢求过于膨胀，高喊出以前只敢窃窃私语的要求。虽然随着人民代表制度的出现，这些呼声和口号的一部分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意义。”（特尔科娃-威廉姆斯 A.，《不会再发生的事情》，莫斯科，1998年，第396页）

政府也不知道，杜马会释放出怎样的能量和应该如何应对它。

1905年12月6日尼古拉二世签署国家杜马选举条例时，维特说道：

“陛下，对于您来说，国家杜马将是您遇到困难时的帮手。”

沙皇答道：“唉，算了吧，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我完全清楚，我签署成立的这个机构将是我的敌人。但我考虑的是未来，考虑的是我的儿子。我必须建立国家新的权力机制，它应该使国家的整个状况得到巩固。”

尼古拉二世完全清楚将从议会得到的是什么，也希望借机使俄国得到巩固，不过他无法去正面推动杜马。

但是，他尝试过。

4月2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尼古拉二世从皇村乘自己的“施坦达特”号游艇返回彼得堡。在彼得-保罗要塞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墓室边，尼古拉久久祈祷。皇帝即将为杜马代表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因而正在认真地准备与人民代表们的会见。

在冬宫圣乔治大厅里放着一把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华盖，华盖下是御座，御座上铺着一件镶有貂皮的紫红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亲自把它摆出了富有艺术感的低垂的褶皱。

大厅被天鹅绒绳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供代表们所用，另一部分是给达官显贵们用的。

隆重的仪式在低沉的国歌声中开始了。穿着古代服装的随从走进大厅，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是穿着金线绣饰的制服、佩戴钻石星形勋章的高官大臣，他们捧着从莫斯科运来的俄国皇权标志：国旗、国剑、权杖、金球和皇冠。

接着进来的是身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制服的皇帝，随后是皇后和皇后的母亲，两人均着白色无袖长衫、佩戴珍珠盾环头饰。接着是大公和他们的妻子、御前大臣、穿着俄式服装的女侍从官和侍卫将军们。

与这种帝王的豪华相比，杜马代表们看上去非常朴素：大多数人穿着日常的礼服和农民的服装。

尼古拉二世慢慢坐到御座上。过了半分钟，宫廷大臣福列杰里科递给他一张纸。沙皇站起来，宣读了他亲手写的这份诏书：

至高无上的主的旨意托付我照管祖国的福祉，这促使我呼吁民众选出的代表来协助进行立法工作。

带着对俄国光明前程的炽热信心，我欢迎以你们为代表的优秀民众。你们



是我责成我心爱的臣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

你们面临着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相信，对祖国的热爱和为之效劳的热切愿望将鼓舞你们，并使你们团结一致。

我将使我所颁布的法令保持稳定。我坚信，你们将付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为祖国忘我地效劳，了解与我心心相印的农民的需求，推进民众的启蒙，提高民众的福利。但请务必铭记，实现灵魂的崇高和国家的幸福，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还需要在法律基础上的秩序。

是的，我的殷切希望是会实现的。我希望看到我的民众幸福，希望留给我儿子的是一个强大、完整和开明的国家。

上帝保佑我连同国家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共同面临的任務能够顺利完成。从此以后，俄国大地的精神面貌将焕然一新，它的优秀力量将得以复兴。

请怀着敬仰之情去做我要求你们进行的工作，不要辜负沙皇和民众对你们的无比信任。上帝会帮助你们和我的。

尼古拉二世的嗓音低沉有力，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响起了掌声。当然，杜马这边的掌声并不那么响亮。

讲话的确经过深思熟虑并充满诚意。从中可见其纲领：俄国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尼古拉二世向杜马伸出了自己的手。

杜马是如何回应的呢？

A. 特尔科娃说：“短促且缺乏任何私人交流的沙皇招待会，对于他们来说虽场景如画，但不过是一个僵化的形式……人民代表知道，他们是不受欢迎、强加给沙皇的工作人员……”

“这是两支正在作战的军队……他们认为政府软弱且思想谬误；他们确信人民的力量和自己思想的正确性。”（特尔科娃-威廉姆斯 A.，同上，第 397 页）

当然，杜马成员里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坦率地说：“如果在人民中有这样的声音，说他们将不管一切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杜马应该对这样的人说‘闭嘴’。这是疯人的叫喊，这是罪犯的叫喊。一千年来，是人民的汗水和鲜血创立并建成了俄国。俄国属于所有的人，而不仅仅属于我们这狂暴的一代。”

说这些话的是第一届杜马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 M. A. 斯塔霍维奇。尽管是用了较为现代的语言表述的，但这些话与尼古拉二世的想想法明显相似。

总之，当时的这个政治阶层的行为是令人困惑的。按地位和教育而言，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派都属于这个阶层。

为什么这些人——贵族、公爵、伯爵、大臣的子弟、教授和律师，目光竟是如此之短浅，他们不是耐心地进行革新，而是去促使自己的祖国毁灭？

在常见的和自由社会主义的编年史中，所有的指控都落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身上。而我们的看法是，他是寻求相互理解的第一人。

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一首预言诗中表达出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首诗写于1905年10月18日，即签署“宣言”的第二天：

灰色的天空还是那么美丽，
 灰色的远方还是那么无望。
 乞求食物的人们还是那么不幸，
 没有人怜悯，没有人怜悯！
 海湾之上暴徒的声音
 消失了，消散在涅瓦河的梦乡。
 野蛮的叫喊：“打倒它！哦，打倒它！”
 在令人昏睡的波涛声里引不起同情……
 灰色天空上的寒光
 笼罩着沙皇的冬宫，
 一身黑色的披甲兵不予回答，
 直到朝霞照到他的身上。
 当深渊之上霞光显现，
 就让他阴沉地放下剑，
 去与无知的贱民进行徒劳的斗争
 为一个古老的谎言横尸疆场……

黑色披甲兵——这是俄罗斯帝国的象征，是冬宫屋顶的雕像。

勃洛克预见了一切。

多年之后，苏联时期的诗人叶夫根尼·维诺库罗夫用小诗回应了他：

用得上伏尔泰主义的一句格言
 走到下一步的路并不漫长：
 用“马克西姆”制式机枪
 从“塔昌卡”上向黑暗射击。

“塔昌卡”，这是国内战争时期机动骑兵的用车，斯大林和布琼尼都曾使用过。但诗人这样对照，更准确千倍。

最终，实证主义的理性不仅在法国制造出雅各宾恐怖活动，而且也在俄罗斯历史



上增添了很多血腥的修正。

总之，还在彼得大帝时期就已开始的俄国政治阶层的分化，以及也是由他的改革所产生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潮，三百年来，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成了这个阶层内部所有悲剧的根源。

正如斯托雷平所说，立宪民主党人是“国家的大脑”，而这个大脑用偏激、急躁和狂热毒害了俄国。不过，正是这个清楚立宪民主主义另一面的斯托雷平要竭力“拔出立宪民主主义的毒刺”。

立宪民主党人、罗马法学教授 C. A. 穆罗姆采夫当选为杜马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当他坐到自己的扶手椅上后，就不顾任何顺序，让自己的党内同事 И. И. 彼得伦克维奇首先发言。

彼得伦克维奇的提案给政府和整个国家的根基以非常沉重的打击：他要求宣布政治大赦。

（“良心的责任、荣誉的责任要求我们，从这个讲台上说出的第一句自由的话应该献给那些争取俄国政治自由的人们……自由的俄国要求释放所有为争取自由而受难的人们。”）

沙皇政权应该如何来回应呢？

不错，可以同意特尔科娃的看法，在代表中有许多正直和有思想的人。

但这些人也否认国家有保卫的责任，并赞成革命者有权不经法庭审判而杀人。

杜马赦免恐怖分子的呼吁是与杜马代表不愿在道义上谴责恐怖主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的。M. A. 斯塔霍维奇提交的谴责政治暗杀的修正案未能通过！

当局合作的期望跟杜马挑衅性攻击之间的极端矛盾使许多人大为吃惊。

法国报纸《Revue des deux Mondes》（《两大洲评论》——译注）写道：“犯罪呢？抢劫呢？谋杀呢？人们建议杜马反对这一切，但杜马没有这样做。”（奥尔登堡 C.，同上，第 353 页）

此外，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些领导人还说，不可能谴责恐怖活动，因为这样党将失去道义上的威信。

如果是斯大林发出这样的声明，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么说的却是政治阶层的代表人物们！

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混乱还远未结束。

下面就是日复一日的血腥情景：

1906 年 5 月 1 日，圣彼得堡港口长官、海军中将 K·库兹米奇遇刺身亡。

5 月 14 日，发生了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司令员涅普留耶夫将军的谋杀。一枚炸弹爆炸，7 人被炸成碎块，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涅普留耶夫幸存。

6月下旬,黑海舰队司令员丘贺宁将军在塞瓦斯托波尔遇刺身亡。

恐怖事件造成死亡的人数,5月份是122人,6月份是127人。

7月,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和斯韦阿勃尔克要塞开始起义。

7月19日,“亚速夫记忆”号巡洋舰队发生暴动。

8月2日,波兰社会党人在波兰王国针对士兵和警察实施了几次恐怖袭击,造成33名士兵和警察死亡。

为了响应华沙所发生的事件,列宁写道:“我们建议我们党的所有战斗组织结束自己的无所事事,采取一系列游击行动。”(托洛茨基Л.,同上,第1卷,第141页)

8月14日,Н.沃恩里亚尔斯基总督在华沙遇刺身亡。

在莫斯科,战斗人员乘坐“福特”轿车四处出击,向正在站岗的警察开枪。

所有这些活动发生在杜马开会期间,对于政府而言,要认清这种局势是极其艰难的。不,政府并不是害怕。帝国的军事力量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如何处理公众的情绪?如何恢复“法律基础上的秩序”?

此外,杜马正在书写《致陛下函》(回应尼古拉二世的讲话)。公函里罗列出立宪民主党人几乎所有的纲领:撤销国家委员会,规定大臣要对杜马负责,全民投票,集会、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废除特权阶层,对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最后就是政治大赦。

作为回应,戈列梅金总理大臣在杜马宣读了政府的声明(由В.И.古尔科书写):“杜马提出的意见,有一部分是超出杜马权限的,还有一部分政府是不赞同的,而建立在强迫征用私人土地基础上的土地改革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此外,大臣会议认为:“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赦免参与杀人、抢劫等暴力活动的罪犯,无益于国家的福祉。”

这是当局的回应。

杜马愤怒了,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的决议。但这个决议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接下来又怎么样了呢?戈列梅金很快公开表示,他将杜马视为一群麻烦人的集会,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不会再和他们会谈。

但政府(和尼古拉二世)作为这场冲突中主导的一方必须采取什么行动,以阻止杜马的改革并使国家摆脱动荡?

杜马火上浇油,提出了几项土地法草案,草案的基础就是强行没收大的所有者的土地。

必须再次令人信服地对此作出回答,否则这个长期受土地饥荒困扰的农业国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政府的。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立宪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处理在该党引起了不大的争执。



萨拉托夫代表、富有的地主 H. H. 李沃夫就表示抗议。他是一位真正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参加过解放联盟，为宪法进行过斗争，出席过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在党团的一次会议上，他突然声明，减少私人庄园、特别是老的地主庄园将不是增加，而是降低农业生产率，而且没有什么好处。

无论多么奇怪，但李沃夫是正确的。

农村主要的副产品都是由大贵族经济提供的。早在 1898 年，П. 司徒卢威就得出结论，1861 年解放农奴的改革并不是在农业衰退的情况下发生的，恰恰相反，当时的农业已经迈上了“最快的上升之路”。“由此可见，绝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引发了农奴制的废除。相反，按照经济观点，废除农奴制其实是一种倒退。”（派普斯 P.，同上，第 1 卷，第 287 页）

也许，H. H. 李沃夫不知道自己党内同事 П. B. 司徒卢威的这种想法，他的依据是自己丰富的经验。

事实上，李沃夫并不是发现了新大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规模化生产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但他企图侵犯最神圣的东西，所以谁也不听他的。

此时，立宪民主党人较之接近国家利益，更接近社会民主党人，更接近斯大林。

农业大臣 A. C. 斯季申斯基和内务副大臣古尔科代表政府就土地问题在杜马发言。

弗拉基米尔·约瑟法维奇·古尔科是元帅、俄土战争的英雄之子，以其思想深邃、意志坚定和独特气质而显得卓尔不群。

正是他制订了后来被称为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未来总理大臣的强烈支持。

B. И. 古尔科、П. A. 斯托雷平、П. H. 杜尔诺沃三人的例子表明，在政府的阵营里有不少强有力的政治家。

在杜马代表面前发言时，古尔科说，即使在征用了所有地主土地的情况下，农民能获得的土地也并不多（约每人一俄亩），但这样对他们来说就丧失了农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做短工的可能性。然而，他的基本观点反映在下面的表述中：“不废除私人土地所有制，不破坏土地所有权，而是将土地完全交给农民全权使用，只有这样，国家杜马，为国务着想的人们的会议才能赢得俄国人民巨大的感谢。”（古尔科 B.，同上，第 560 页）

立宪民主党人 M. И. 赫尔岑施泰因反对古尔科的看法，但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是危言耸听，许多人将之视为侮辱，这也是他不久之后遇刺身亡的原因：“也许你们觉得烧掉萨拉托夫省 150 个庄园的五月火光还不够吧？”

赫尔岑施泰因是犹太人，考虑到当时犹太问题的尖锐性，而且恐怖分子中有很多犹太人，他的话暗含某种威胁意味。

几个星期后，他被枪杀。传言暗杀是俄国人民联盟所为，尽管右翼本身竭力否认，并且他们的报纸《俄国旗帜报》声称凶手应受绞刑。

斯大林正从远方关注所有这些事件，对他来说，毫无疑问，决定性的危机正飞速逼近。他完全没想到，政府竟然有能力与杜马对抗。

只有从资产阶级手中将革命的领导权夺过来，胜利才属于无产阶级。

这绝不是一个外省人天真的希望。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持有这种观点。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在准备主持政府，宫廷卫戍司令官 Д. Ф. 特列波夫甚至还和他们就此进行了会谈。当然，特列波夫是希望利用立宪民主党内阁的错误，永远不再讨论君主立宪这个议题。

与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交涉的还有对自由主义者持同情态度的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

如果认为精英和反精英之间横贯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自由派和保守派无法达成妥协，这是错误的。

伊兹沃利斯基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计划把立宪民主党人列入政府名单，给予他们部分职权，从而抽空反对派的主要核心。

例如，6月24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Д. Ф. 特列波夫直言：“只有当杜马中间派被邀请加入政府时，杜马中间派和劳动派的联盟才会破裂。因此，我认为最理想的是，新内阁由杜马中间派成员来组成。”“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记者问道。“是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杜马中最大的政党。无论是联合政府，还是由杜马以外的成员组成的内阁，都不会使国家获得稳定。”

立宪民主党人对合作的提议是认真对待的。

伊兹沃利斯基向尼古拉二世递交了必须组建立宪民主党人政府的报告：

杜马和以大臣会议为主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正常，已对帝国秩序的建立产生实际威胁……

这正是那种应该对俄国遭遇一切灾难承担责任的官僚主义，国家充塞着混乱和破坏，完全如同俄日战争失败时的情景，并且绝不可否认，无论这些指责正确与否，它们总是针对任何一个官僚内阁的……

在杜马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城市知识分子和稍有知识的农业领域代表。没有知识的农民群众认为，杜马无所不能，可以把土地分给所有居民，使他们摆脱失业和饥饿。

这一情况使政府和杜马之间的隔阂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危险。唯一能够防



止这一情况发生的是，恢复这两个机构间的正常关系，而这，不用新大臣们取代现行内阁是不可能做到的。

必须要把能与杜马达成理解的人请进政府。

……由一党成员组成的内阁有可能会被自己过去的状况所牵制，导致内阁工作瘫痪。至关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的走向改变应由君主自由倡导，而不是他因受到这个或那个党的影响而不得不为。

新形势需要新人。有杜马议员参与的内阁的组建，除了会对社会舆论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也将使反对派陷入混乱状态。

胜任大臣会议主席职位的候选人，找不到比现任杜马主席穆罗姆采夫更合适的了，他在杜马议员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选择穆罗姆采夫，一个冷静、审慎和才智出众的人，比选择其他任何社会活动家都要合适，而且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他的政治行动不会因属于哪个党派而受到牵扯。其出色的自制能力和沉着高效让他在行政机关赢得了声望……

最难的是内务大臣的人选。显然，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革命运动的职责只能交给这样的人：他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决定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同时能够在自己部里恢复必要的秩序和纪律。

适合这个职位的人必须舍身忘我地忠于自己对国家的职责，因为这个职务在现阶段需要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因此，这个大臣的人选可以是现任内阁成员斯托雷平或是穆罗姆采夫，只有他们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把大臣会议主席和内务大臣的职责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情况下，他将充当如自己的同事穆哈诺夫或李沃夫公爵的角色。（雷巴斯 C.，《斯托雷平》，莫斯科，2003 年，第 70、71、73 页）

皇帝读完报告，对伊兹沃利斯基说，他“被报告中论据的力量和公正所震惊”，并委托伊兹沃利斯基和斯托雷平两人就建立联合政府着手会谈。

伊兹沃利斯基和斯托雷平开始与立宪民主党人进行磋商。

斯托雷平会见了他们的领导人米留可夫，讨论了在下列条件下组建“杜马内阁”的方案：宫廷、军事、海军、外交和内务五部的大臣由沙皇任命，其他职位由立宪民主党来提名。

请对此予以关注！俄国的命运再次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似乎，只要此时爱国的、智慧的米留可夫说一声“是”，革命就会立刻烟消云散，国家将会获得安宁，生产力将开始快速增长。

即使在今天，一个世纪之后，我都想大声疾呼：“喂，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您还迟疑什么？为了祖国，同意吧！”

可怜的，可怜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他没有同意，而是要求获得内务大臣

的职位。

斯托雷平说：“你们无法制止恐怖行为也无法维持国家秩序。”

米留可夫反驳道：“我们并不害怕这一点。如果需要，我们将在广场安置断头台，并将无情地镇压所有反对人民所信任的政府的人。”（雷巴斯 C.，同上，第 76 页）

当然，断头台是一个有力的理由，但尼古拉二世期待的并不是这个。顺便提醒一句，B. И. 列宁同样讲过断头台。

谈判陷入僵局。

同时，在杜马发生了一件预示着联合内阁前景的事件。

在杜马会议上，总军事检察长帕夫洛夫讲话，要求就关于废除死刑在杜马立法作出解释。

在他讲话前，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在杜马讲坛上说道：“在俄国大地上，每天都发生着令人愤慨的政治谋杀事件，导致了不是忠于职守的官员死亡……废除死刑就等于国家拒绝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忠实的公仆。”他还提醒说，10 月 21 日大赦后，恐怖活动更加剧了。

而现在，曾是几次革命刺杀案公诉人的帕夫洛夫将军站在了讲台之上。

看见帕夫洛夫后，代表们简直气炸了。

“滚出去！刽子手！凶手！滚出去！双手沾满血的家伙！滚出去！”

他们不让他讲话。他们跺脚，敲桌子，从座位上跳起来。将军试图说些什么，但只挥了一下手，就走下了讲台。

12 月 27 日，他被杀死在位于莫伊卡运河旁的军事法庭大楼里。

在所有讨论的问题里，杜马没有就任何一个问题与政权找到共同语言。

II. A. 斯托雷平指出过：“被革命占领的主要阵地就是国家杜马。从它如同城堡般高大的不可侵犯的围墙内，传出的是不折不扣地号召摧毁私有制、摧毁国家的无耻呼吁，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厚颜无耻，一天比一天更肆无忌惮，威胁到最高当局的声音频频传出。”（引自：奥尔登堡 C.，同上，第 359 页）

已经越来越明显，必须解散杜马。

但这应该怎么去做呢？需要一个理由。如果没有理由，政府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杜马自己提供了这个理由。7 月 4 日，它通过决定，就土地问题向民众做出“解释”，说杜马“不会在强行征用私有土地问题上退缩，并将否决一切与此相悖的提案”。

这事实上就是一种继续保持农业混乱并威胁政府的呼吁。

尼古拉二世担心引起新一轮革命风潮，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并在与戈列梅金和斯托雷平长谈之后，决定解散杜马。7 月 9 日，杜马解散。确定了新人。议会试验并没有中断。

斯托雷平成了总理大臣，并保留内务大臣的职位。



7月11日，他在自己的第一个通令中表示：“对于公开的混乱必须给予毫不手软的还击。应该用一切合法手段制止革命的企图……这场斗争不是针对社会，而是针对社会的敌人。因此，不能进行盲目镇压……旧制度将被更新。”这时，斯托雷平（与尼古拉二世在一起）回到了建立联合内阁的想法。他会见温和派代表，提议H. H. 李沃夫担任农业大臣、A. И. 古契科夫担任商务大臣、Ф. Д. 萨马林担任主教公会（东正教最高会议——译注）总监。

但是，谈判时中间派提出了非常过分的限制性要求：要求给“社会”代表们五个大臣职位，并宣布他们的纲领将是整个政府的纲领。

尼古拉二世感到失望，他在给斯托雷平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和每一个人都谈了一个小时。现在的大臣们并不合适，他们不是干事业的人。”

在给母亲的信中尼古拉又补充了一点：“他们把个人之见置于爱国主义之上，还有大可不必的沽名钓誉。”

斯托雷平也感到失望。在萨拉托夫省的工作实践中，他已经具备了团结省级官僚和地方自治活动家的经验，他希望能延续这种经验。

但是，如同与米留可夫所发生的事一样，不是命运使然。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关口，悲剧开始重演。1911年9月1日，就在尼古拉二世眼皮底下，斯托雷平在基辅的剧院中被博格罗夫枪杀了。

不，命运对任何人都不宽恕。

继一个不知名的警察被杀，继斯托雷平被杀之后，1917年12月，极力想避免动荡的戈理梅金在黑海省索契镇自己的别墅里被杀，随后，被杀害的还有大臣们、将军们、海军上将们、大公们、皇帝一家和尼古拉二世本人。他们所有的人都对俄国发生的一切负有罪责。

但是，如果不讲一下其他人的过失将是错误的。他们也要为自己的罪孽、为没能准备好为国家献身、为匆忙行事付出代价。正是他们打开了俄国的潘多拉魔盒，从里面飞出了对反对者进行残酷斗争的毫不妥协的幽灵。

在这个意义上，米留可夫就像是斯大林的亲兄弟。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像斯大林担心的那样，成为妥协分子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

时至今日，对这种罪孽的清算还在进行，尽管那些不可和解的敌人们的遗骸早已在潮湿的土地里腐烂。

不过，让我们再来谈谈我们的主人公。家庭的组建给斯大林的疾风暴雨般的生活带来些什么？也许，让他睁开双眼，看见了与传播社会仇恨和不妥协的革命禁欲生活不同的另一种人生？

和从前一样，他仍然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他像一匹被猎人围捕的狼。甚至去见他心爱的卡托，都不得不躲躲藏藏。而卡托本人有一天也被逮捕并关进了警察局，当然，时间不长。

和从前一样，斯大林在工人和穷苦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募集资金，书写传单和报刊文章，痛斥政府和孟什维克，躲避暗探。

难道这就是他的人生使命？

他没有了人的传统形象。他是被撵出天国的天使，是国内战争的传道者，是撒旦。

“撒旦之翼的影子越来越黑，越来越深不可测。”俄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贵族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如是写道。

这就是那个时期斯大林的形象。

“毫无疑问，阶级斗争之火将更加剧烈地燃烧。”1906年12月，他在《阿哈里·德罗耶巴报》（《新时代报》）上写道：“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斗争中引进有组织性的体系和特性。”（斯大林 II，同上，第1卷，第285页）

几天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斯大林 II，同上，第293页）

开始向革命之神祈祷的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没有忘记宗教寄宿生的风尚。正是这个时候，1906年底，他写了自己的著名论文《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在这一长篇论文里，这个还很年轻的人显示出，他以对高加索实际情况的个人观察为依据，进行着严肃和独立的思考。他谈到政治运动的演进和革命阶段，充满强烈的传教士般的乐观主义。托洛茨基认为这篇论文是“平淡的”，指责作者“转述了他人的论点”。但这只不过是托洛茨基心存偏见。

我们要强调，11月9日，国家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很快就被保守记者 M. O. 缅什科夫称为“静悄悄的革命”的事件。尼古拉二世签署了一项由斯托雷平起草的命令：允许农民自由脱离村社，并获得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

政府着手在正发生革命的地方采取果断行动，土地改革开始了。

斯大林对此事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认为“为时尚早”。

第四章

斯托雷平改革

斯托雷平改革、梯弗利斯的剥夺、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岗位的冲突、斯大林被流放到维切格达和逃跑、当选党的俄国局成员

当时俄国的总改革家斯托雷平，在杜马解散后给自己提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当他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距离下一届国家杜马会议还有 180 天。我们应该尽力利用这一点，以便在下届杜马召开前，已经有一系列改革得以实现。这将证明政府有真诚的愿望：尽自己一切可能消除现存制度中所有与时代精神不相符的东西。’”（古尔科 B.，同上，第 582 页）

B. 古尔科从事土地改革已有四年，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比斯托雷平要清楚得多，他因此而嫉妒斯托雷平。他指出，总理大臣的主要目的“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是完善管理国家的制度，而是加强国家的权力，提高它的威信并调和它与有教养人士的关系”。（古尔科 B.，同上，第 582 页）

B. 古尔科是从自己的视角看问题，这当然是对的。所以，成为改革者的不是他，而是斯托雷平。因为后者了解时代的主要问题：巩固国家，安抚社会的有教养人士和反精英阶层。

为此，在总理大臣的公文包里不只是土地改革一项方案，而是一揽子计划：宗教信仰自由、人身不可侵犯和公民平等、改善农民土地所有制、改善工人的生活、国家保

险、地方自治改革、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西部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在波兰王国实行地方和城市自治、地方法院改革、中等和高等学校改革、实施所得税、合并警察和宪兵以及颁布一项关于紧急状态的新法律。此外，还打算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包括 C. Ю. 维特在内，没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革新方案。要是再拖延实施这些方案，已经是极其危险的了。

1906年8月12日，这天是星期六，斯托雷平在位于阿普杰卡尔岛的国家别墅接待访问者，他的女儿娜塔莎和儿子阿尔卡季与保姆柳德米拉·奥斯坦科维奇（克拉斯诺斯托克女子修道院的年轻修女）正在阳台上玩耍，一辆租来的四座马车载着三个年轻男子驶向房子。两人身穿宪兵军官制服，一人身着便装。他们是前来暗杀斯托雷平的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分子。

但是，门卫拦住了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一身当时国家安全局人员的穿戴而表现出犹疑。他们试图从门卫身边冲过，但被两名警卫截住，于是他们引爆了藏在公文包里的两枚炸弹。

当场死了24人，受伤者以及受伤之后死亡的还有25人。房子的正面被炸塌。

斯托雷平没有受伤，只是满身落满了砖块和玻璃碎片，他的后脑勺上沾满了从打翻的墨水瓶里流出的墨水。他的两个孩子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女儿双腿被炸断，儿子断了一条腿，头部受伤。他们的保姆死亡。

第一个赶到事故现场的是圣彼得堡市市长弗拉基米尔·冯·劳尼茨，未来的坦波夫省督，在镇压农民暴动中表现突出（但不久后被暗杀）。随后，相继赶到的是内务部副大臣 B. 古尔科和财政大臣 B. 科科夫佐夫。

在接下来下达指令时，斯托雷平始终保持着足够的镇静。这些指令包括第一批针对孩子们的指令。

B. 古尔科证明：“斯托雷平站在面向花园的狭小更衣室里，脱下外套，尽力洗掉洒在头上的墨汁。在他的一侧站着科科夫佐夫，另一边站着我。斯托雷平浑身湿透，水从他身上成串地流下来。他激动而急切地说：‘这不应该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必须继续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拯救俄国。’这不是装腔作势。斯托雷平在这个时期，在国家改造的第一波热潮中，的确完全沉浸于对俄国改革的思索中，并只想着这些。”（古尔科 B.，同上，第586页）

几天后举行大臣会议时，斯托雷平从信使手中接过尼古拉二世发来的公文。他中断会议并宣读了公文。公文是这样开头的：“为了能够按照战时法律进行审判，我希望立即设立战地法庭。”接着解释了这是针对的哪些罪行：恐怖主义活动，反对国家秩序的武装行动等等。

出席这次内阁会议的 B. 古尔科指出：“1906年，革命党人与国家政权进行了公开的斗争，在我看来，后者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国家免于崩溃



并确保管理国家的正常秩序。对国家之敌所表现出的虚假的悲天悯人和虚伪的自由主义反映在国家管理的整个过程之中,因而也就破坏了千百万人的利益。”(古尔科 B., 同上, 第 587 页)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斯托雷平本人也反对战地法庭,他认为混乱可以通过社会的和平革新得以平息。他没有失去与社会中有教养的那部分人进行互信对话的信心。这个群体有史以来对于俄国就非常珍贵。

支持他的有 A. И. 古契科夫领导的“10 月 17 日联盟”党,还有部分立宪民主党人,这些人在他的纲领中听到了与他们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的东西。其实,不应该把斯托雷平描绘成这么一个政治领域的长毛绒玩具熊。他是一个权力在握、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的人。

当海军上将杜巴索夫请求尼古拉二世赦免企图谋杀海军将军的年轻人时,总理大臣写信给皇帝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理解杜巴索夫的道德动机。当叛乱分子在莫斯科企图谋害他人生命时,难道不正是他用铁腕制止了暴乱吗?不幸的是,并且也正是我们的不幸,只有处死少数人才能防止血流成河……”(斯托雷平 П., 同上, 第 20 页)

斯托雷平改革进行得非常迅速,很快接近其主要目标。1906 年 11 月 9 日,颁布了关于允许农民退出村社的命令(《农民的第二次解放》)。

命令责成农民银行在收购地主的地产和出卖地块时,应以最低利率和优惠价提供贷款。除此之外,斯托雷平成功地做到了把大部分封地和草地,以及属于王室的土地转交给农民银行。阿尔泰地区的土地则用于安置移民。

只要通过村长递交申请,即可退出村社,并从村社获得自己的土地。

稍早一些,在 10 月,还颁布了《关于废除对农村居民和其他前纳税阶层人士权利的某些限制》的命令。农民被允许无需经过村社同意而自由获取身份证,取消了在工作聘用上的一些限制,允许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地方长官失去了不经法院判决就对农民进行罚款和逮捕的权利。

农民获得了所有的公民权。

改革压缩了所有左翼激进主义政治家存在的土壤。

农民土地银行是改革的金融工具。它收购了数百万俄亩土地(1 俄亩等于 2400 俄丈或 1.09 公顷——译注),然后发放贷款把土地出售给农民。银行提供的购买土地的贷款达到被购买土地总值的 90%—95%。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既不出售给地主,甚至也不出售给农民合作社,只作为个人财产出售给农民!

大部分购买者都是中农和贫农。

可以在 B. 列宁那个时期的文章中找到他对改革作出的令人信服的评价。

他在《新土地政策》(刊登于1908年2月19日的《无产者报》)中写道:

沙皇政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十月党人)朝着新土地政策的彻底改变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指当前的革命,而且还有今后可能发生的民主革命,其命运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一政策的成功或失败……

反革命的政府是明白这一点的。斯托雷平正确地认识到:不摧毁旧的土地所有制,就不能保障俄国经济的发展。斯托雷平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用最无情的方式摧毁了地主和富农随意洗劫农民大众的旧制度。

列宁还写道:“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直接和公开地抛弃所有的‘土地纲领’,因为按斯托雷平那种思想‘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任何其他能够真正改变农民大众经济生活条件的革命都不可能存在了。这里就存在一个俄国资产阶级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的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第32页)

我们不清楚斯大林有无类似的分析,但是从他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和发言来看,他对斯托雷平变革的看法与列宁完全相同:斯托雷平是革命的敌人。

改革能否拯救俄国?

提出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俄国农村人口比例过大这一因素。村社养活了“多余的人口”,但也阻碍了它的发展。

村社大会及其平均主义的法则和传统,不仅限制了强大的主人对弱者的权力,而且首先要管理农村的一切:帮助病人、孤儿、遭受火灾者,确立土地和森林利用的总体规则,关注道德等等。

这就是优劣并存的村社社会主义,它的前身萌芽于神圣罗斯时期。

村社的社会功能具有特别意义,因为从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以来,农村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人口过剩(失业)的问题又只能靠出于对亲朋邻里的怜悯而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和抑制效率来解决。

当然,时至20世纪,村社已经在资本主义法则影响下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金钱需要的是有效的经营。

斯托雷平了解村社的社会作用,并说不应当在它仍有生命力的地方去干扰其作用。

但国家机器已经按照改革的程序开始运转,随之而来的极端措施、冲突,甚至暴动都是不可避免的。斯托雷平改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应该是把农民迁移到不大适宜居住的亚洲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以便大大减少隐性失业。

政府虽然打开了进入农村之门,然而却并不清楚,相当多的农民并不愿意为创业



而冒风险。

实际上,维护农村村社共产主义的这部分人并不希望农村的另一部分人靠蚕食更为弱小的人来致富。

的确,彼得堡县雷巴茨基乡的村社在自己的决议中详细叙述了他们拒绝改革的理由:“农民的意见是,这项法令……会损害没有任何财产和拥有少量财产的农民。我们看到,每一个户主都能从村社分离出来并获得自己私有的土地。但我们感到,这样会使所有的年轻人和所有目前居民的后代失去生计。因为土地从总体上是属于整个村社的,不仅属于它现在的成员,还属于他们的子孙后代……”(《农民的委托书和判决书——俄罗斯农民的命运》,莫斯科,1996年,第72页)

这些话中有着对未来的思考,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效益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然,这份委托书中还表达出村社农民的社会责任感。

这样的农民村社有数千个。

因此,斯托雷平的成功还远远没有保证。而列宁“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假设,本身就为继续斗争提供了现实依据:如果坚持不下去呢?

1907年2月,斯大林与И. А. 贾帕里泽、С. Г. 邵武勉和С. С. 斯潘达良一起,开始编辑出版《巴库无产者报》。

3月18日,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出生。

同样在3月,在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梯弗利斯,选举了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代表都是清一色的孟什维克。于是,3月28日,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德罗报》上刊登呼吁书,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并委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截至4月8日,共收集到了572票,斯大林被选为代表。当然是斯大林!这已经没有人会感到意外了。

不过,他的家庭怎样呢?他记得基督的话:“人的敌人也是他的亲人。”妻子和儿子是无法使他脱离革命事业的。而且,他的家小是岳父在抚养着。柯巴是很高兴能提供帮助的,但他没有钱。

4月30日,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一直持续到5月19日。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人数势均力敌——90人比85人。也就是说在第一届杜马选举后,布尔什维克开始占据上风。

5月12日,列宁在发言时承认,革命正在经历艰难时刻,需要用不懈的毅力、顽强的自制力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一致,去与缺乏信心、斗志衰退、冷漠无情、放弃斗争的情绪相抗衡。

然而，大会却通过了一项因革命运动进入低潮而缩减工人战斗队的决议。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列宁是游击战争的主要发起者。果不其然，表决时，列宁投了反对票，以免被这项决议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的确，一个革命政党无需受制于负有责任的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见机行事。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发言，并保持着低调。

6月初，他回到梯弗利斯，然后前往巴库。那里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需要“加强党的组织”。

6月12日，他又一次回到梯弗利斯。

开始准备袭击运送钱币的国库马车。

尽管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做出了禁止剥夺行动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却不承认这个纯粹的孟什维克的决定。所以斯大林不受约束。此外，他是“实践家”，而不是侨居国外的理论家。斯大林认为在国外的党员脱离了国内的斗争现实。

6月13日，在梯弗利斯的埃里温广场，由斯大林儿时的朋友C. A. 捷尔-彼得罗相(卡莫)领导的一组社会民主党人武装袭击了一辆运载着25万卢布的马车。

这次袭击考虑周密，行动大胆。10点45分，按确定的顺序投掷了几颗威力强大的炸弹。三名押送员被炸死，约50人受伤。袭击者无一被捕。

尽管存在一种不言而喻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知道这次行动，甚至还参与了其准备工作，但并未发现他参与其事的任何证据。

至于参与了筹备则确有其事。但对参加具体袭击行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轻松地加以反驳：党的这种级别的领导从未参加过“剥夺行动”。

不过也有人说：6月13日白天，斯大林来过埃里温广场，观察过卡莫武装队员的行动。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传记作家们对他是否与这次流血袭击有牵连的叙述大相径庭。那些不隐瞒对其有偏见的人断言，斯大林参与其事；而那些持客观态度的人则说，并无应有的证据。

实际上，那天他是否扔了炸弹，对于了解那时的斯大林并没有重要意义。

重要的是，孟什维克占主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外高加索)委员会要求把参与剥夺行动的分子开除出党，并展开了自己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确认斯大林与此有关。

梯弗利斯委员会把袭击国库马车并掠走25万卢布(孟什维克从中没有分到一戈比)的事件视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挑战，因为大会已通过了停止游击行动和解散工人战斗队的决议。

斯大林被认为是“剥夺行动”的组织者，他与其他参与者一起被开除出党。



这一决议被通报给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但在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占了大多数，因而梯弗利斯孟什维克的决议被束之高阁。（尽管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不得不承受来自欧洲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巨大压力：欧洲人不能接受搞武装抢劫的活动。）

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原则立场给斯大林带来严重后果：作为一个职业的党务工作者，他是靠党来养活的。现在，他处于破产和贫困的边缘。

事实上，斯大林被挤出了格鲁吉亚。他与家人一起迁居到巴库，住在一个石油工人的房子里，并投入了积极的工作。鉴于梯弗利斯的情况，他必须加强自己在巴库的影响，在这里孟什维克的影响比较小。

他在毕比-艾伊巴茨基油田的工人中专心地展开了工作。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自1907年夏季以来，正是在无产阶级聚居的巴库聚集了一大批来自梯弗利斯、巴统、奇阿图拉、库塔伊斯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人：M. 达维塔什维利、П. 贾帕里泽、K. 奥尔忠尼启则、C. 斯潘达良、C. 邵武勉。这里聚集的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著名活动家 C. 韦恩斯坦、B. 克努尼扬茨、K. 伏罗希洛夫、P. 泽姆利亚奇卡、Ю. 拉林（卢里耶）、M. 奥里明斯基、E. 斯塔索娃和 M. 弗鲁姆金。

当时在市里开始发行两份工人报纸——《巴库无产者报》和《汽笛报》。

总之，巴库成了布尔什维克党最大的活动中心之一。

6月20日，《巴库无产者报》的创刊号问世，上面刊登了斯大林的两篇文章：《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和一篇长文的第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

7月10日，发行了刊有《札记》续篇的第二期。不过整个文章并未能够全部登完，因为7月25日夜，警方搜查了印刷厂，查封了基本排好待印的第三期的活字版。

8月12日，《汽笛报》开始发行，斯大林在此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斯大林是提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进行改选的发起人之一，因此后来中央委员会一级的孟什维克曾加罪（“分裂”罪）于他。

8月24日，在五个区级组织和穆斯林社会民主党小组“古美特”的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召开城市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之一。

10月26日，斯大林获得了胜利：代表会议选举出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他本人成为委员会的委员。

自斯大林被逐出梯弗利斯之后，这一事件应当使他振奋：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特殊的组织才能，才使得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击退了孟什维克，迫使后者交出了城市委员会的领导权。

但这时他又受到了打击：卡托染上伤寒，两周后死在他的怀里。

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位意志坚强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可爱、温柔、笃信上帝的卡托，与他永别了……

当然，也许他可以告诉他的同志们，他的妻子病重，需要钱治疗，但他未必产生过这个想法。

埋葬了妻子后，他把儿子留在岳父家，再次成为无家可归的孤独的斗士。

1908年初，斯大林前往瑞士和列宁商讨问题。确认此行的证据是间接的，但对此的描述使人相信，在梯弗利斯的丑闻之后，斯大林需要从党的领袖那里得到通过武力获取资金的许可。要知道，由于革命热情普遍下降和同情者资助的减少，党的经费也减少了。

托洛茨基写道：“显然，根据高加索剥夺行动的经验，他(列宁)认为柯巴是一个能够自己或者带领他人走到底的人。”(托洛茨基 JI., 同上, 第 158 页)

“在腥风血雨的年代，他(斯大林)不属于成千上万脱党者中的一员，而是属于那些任何情况下都忠于党的为数不多的几百名党员中的一个。”(托洛茨基 JI., 同上, 第 163 页)

回到巴库后，斯大林乘政府用船从阿斯特拉罕给突厥斯坦边疆区政府运送四百万卢布到巴库之机着手准备新的“剥夺行动”。

武装积极分子开始在巴库聚集：C. 卡夫塔拉泽、托马·丘比泽、斯捷潘(瓦诺)·伊茨基尔维利，他们被委托管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武装组织的仓库，购买了武器。此外，他们还袭击了海军军械库，并为领导工人战斗队组建了自卫指挥部。不过，警方调查出是谁袭击了军械库，四名战斗队员被捕。斯大林也应该被逮捕的，但他得以逃脱。3月15日，斯大林参加了市党代会，再次差点被宪兵抓住。

不过在3月25日，持有化名尼日拉泽身份证的他还是被捕了。几乎立即就弄清楚了他的真名。

被捕期间，柯巴被关押在巴伊洛夫监狱。在那里，复活节的第一天，警卫对囚犯们进行了一次独特的折磨：把他们列成一队，然后用枪托殴打他们。斯大林也挨了打。但是目击者证实，他行走时昂着头，手中拿着马克思《资本论》的小册子。

如果考虑到体罚是发生在这样特殊的一天，则这一场面就具有了宗教的意义：斯大林手中拿的就是自己信仰的福音书。

1908年8月4日，巴库省宪兵管理局长官 E. M. 科津采夫少将签署了一项决定：“我认为应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置于东西伯利亚的警察监视之下，为期三年。”(奥斯基特洛夫斯基 A., 同上, 第 297 页)

巴库市行政长官 M. A. 福尔鲍姆少将支持这个建议。

9月26日，内务部特别会议审核了提交上来的有关这群革命者的材料。



一些被捕者的流放期从三年缩至两年,其中包括朱加施维里。而且,东西伯利亚也被换成了相对不太远的沃洛格达省。

9月29日,内务大臣 П. А. 斯托雷平批准了特别会议的该项决定。

在这里两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的命运直接交叠在了一起。一个是现存政权的捍卫者和革命的镇压者,而另一个是国家制度的破坏者和君主制度的叛逆者。如果斯托雷平能够知道,在由他签署的文件中一闪而过的这位格鲁吉亚流浪汉、社会民主党人的姓氏背后,站着的是他的俄国现代化的实际继承人,他一定会感到震惊。这位当时的总理大臣可能会问:“帝国难道注定要灭亡?”

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如果不讲述社会民主党指挥的特点,也就是说,如果不讲述 В. И. 列宁在这个阶段的活动情况,那么斯大林的传记将是不完整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由几个杰出人物领导的。他们不仅在斗争方法和目标上持不同观点(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而且对党内关系的特性也持不同观点。另外,志向不同,预见未来的天赋也不同。

列宁坚定不移地向既定目标迈进。此时斯大林成为他的第一个学生。

在列宁的社会活动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毫不犹豫地逾越了通行的准则,因为他经常处于需要做出新决定的危机状态下。

在梯弗利斯剥夺行动及其后果中,就鲜明地反映出这一点。当然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后果是非常痛苦的。

总体上说,剥夺行动触犯了许多有影响人物的利益和感情,其中包括那些同情和支持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物。简单地说,剥夺行动就是有政治目的的掠夺,超出了政府可承受的底线,侵犯了私人财产,造成了无辜百姓的伤亡,也对工人战斗队员自身产生了腐蚀作用。在工人战斗队员中,远不是所有人都像斯大林和卡莫那样对金钱有免疫力的。

总之,经费问题变得非常尖锐。没有钱就根本谈不上任何管理。所以说,谁掌管了党的经费,谁实际上就是党的总经理。

1906至1909年间,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统一的政党时,它的布尔什维克派由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经理办公室”是由 В. И. 列宁、А. А. 波格丹诺夫和 Л. Б. 克拉辛三驾马车组成的。正是他们负责搞钱并确定支出的规则。

工程师克拉辛是个组织天才。他建立了一整套实验室、生产车间和印刷厂,它们不仅支持了本党党员的活动,还帮助了其他革命者。例如,8月12日,在斯托雷平总理大臣别墅引爆的炸弹,就是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

正如国外历史学家们所证实的那样:列宁预见到了党内派别的冲突,并力图加强其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即反对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马利诺夫斯基)1873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他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是位医生。在第三届代表大会(伦敦大会)上,他做了关于武装起义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的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数次被捕,被流放。他是四卷本《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作者,编辑过非法的工人报纸《前进报》。

列昂尼德·鲍里斯维奇·克拉辛 1870年出生在库尔干。他曾在圣彼得堡工学院和哈尔科夫工学院学习,并毕业于哈尔科夫工学院,是1903年巴库罢工的组织者之一,同年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彼得堡负责过照明电缆网的工作,曾在德国担任过工程师,也曾数次被捕,被流放。

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具有天才和坚毅的禀性。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列宁对他们的嫉妒。列宁第一个领悟了革命的局势,就让他们靠边站了。

波格丹诺夫在自传中有过简短的记述:“1907年底,我作为‘三驾马车’的成员(与列宁和因诺肯季一起)被派往国外从事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因诺肯季是杜勃洛文斯基的化名——作者注)。1909年夏天,我与Л. Б. 克拉辛一起,作为布尔什维克左派,被排挤出布尔什维克中央,并在1910年1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党团合并时,被排挤出党的中央委员会。”(《苏联及俄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选自《格拉纳特百科辞典》),莫斯科,1989年,第363页)

这就是说,波格丹诺夫承认在中央委员会有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

1904年,在列宁的政治生涯中可谓危机四伏:他与《火星报》和《火星报》领导小组,也是俄国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克拉辛、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诺斯科夫等)决裂,成为孤家寡人。

“如果没有波格丹诺夫和他朋友们在政治、文献资料和物质上的帮助,列宁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党派。波格丹诺夫站到了列宁的一边,从政治上挽救了列宁。正是波格丹诺夫在1905年让克拉辛回到列宁一边,使得列宁和他们一起成为1905—1906年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主力。”(尼古拉耶夫斯基 Б.,《历史的秘密篇章》,莫斯科,1995年,第16页)

因此,如果深入事情的本质,那么列宁在与波格丹诺夫发生冲突之始就认识到,为了领导党,他必须排除有影响力的竞争对手。

不过,个人竞争的问题实在是老生常谈。列宁具有这种竞争的思想基础。

在这里,一切都错综复杂地堆在一起:对资金的需求,与孟什维克的问题,与尚处在革命狂热中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经费有两个来源:捐赠和剥夺。

在第一种来源获取的资金中,所谓的“Н. П. 施密特遗产”(约28万卢布)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美国募集到的捐款数额极为庞大(好几万)。



И. И. 施密特是莫罗佐夫纺织品企业世家的家族成员之一，他同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施密特不幸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对他的一个兄弟和两个姐妹施加巨大压力，想得到原属于他们的遗产。迫于巨大的压力，施密特的兄弟放弃了属于他的那份遗产。

两姐妹中一人的丈夫名叫 H. A. 安德里卡尼斯，是莫斯科的律师，也是党员。他向同事们争取到了获得遗产中自己份额的一半的权利，让同事们留下另一半（留给布尔什维克中央），不用分给孟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克多·塔拉图塔娶了另一人——高等女校的年轻学生伊丽莎白·施密特。不排除塔拉图塔这个人是个为了达到自己目标的婚姻骗子。

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个委员 H. A. 罗日科夫根据自己的情报，把塔拉图塔定义为“臭名远扬的坏蛋”。对此，列宁回答道：“这才是好样的，无论在什么面前都不会停止下来。这样吧，您就直截了当地说，您能为了钱去靠一个富商家庭的姑娘养活吗？不去？我也不会去，我不可能强迫自己。而维克多这样做了……这个人是不可替代的。”（尼古拉耶夫斯基 B.，同上，第 36 页）

当然，列宁明白，他承担着怎样的罪过，以及他的同志们是怎样批评地看待这件事的。但是，没有施密特的钱，党就会极为困难。

随后，列宁不止一次表明，他具有一种天才的能力：能够及时把方向盘朝需要的方向扭转。

商人的女儿又怎么样呢！我们超前说一下，后来他对德国不也要了这么一招吗。当时他，这位“护国派”、“齐美尔瓦尔得派”（指参加 1915 年 9 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左派）第一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译注），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向德意志帝国的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并导致威廉二世退位。

至于“三驾马车”，列宁则用尽了一切办法，使自己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唯一领导人。迫使他这样做的还有变化了的局势。

波格丹诺夫也不是一个迟钝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经典名言：“在巷战中，窃贼—惯犯比普列汉诺夫更有用。”所以必须坚决把他挪开。

为使冲突激化，列宁突然非常尖锐地批评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著作，甚至为此还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尽管该文从原则上说与党和革命的问题相去甚远。

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

斯大林同样不明白列宁想干什么，并称辩论是“杯水风暴”。这种提法首先是指这场哲学争论的实用价值不高。

但是，斯大林从巴库并没有看到一切。列宁不仅是在跟他“三驾马车”的同事们争论哲学观点，还在争夺领导权。

列宁和克拉辛的斗争更加困难。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中央财政、军事、秘密活动

和印刷工作的核心人物。党正是通过他筹集到很多钱,也正是他提出了印制伪钞的想法。他牢牢地把党的预算掌握在手中,控制着所有的开支,并决定哪些应该支付,哪些不应该支付。

为了削弱克拉辛的地位,列宁利用了斯大林幕后指挥的梯弗利斯剥夺行动。

强盗般的抢劫这一事实本身,如前所述,在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中)引起了极大愤慨。

在梯弗利斯事件发生的同时,某些俄国人又在英国、瑞士、美国制造了一些袭击事件,引发了西方对俄国侨民的不满情绪。总之,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支持过俄国同事的“游击战争”,而是认为应该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夺权。

结果,梯弗利斯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而在克拉辛试图同时在斯德哥尔摩、柏林、日内瓦、巴黎和慕尼黑兑换由卡莫抢劫来的大额纸币(共有 10 万张面值 500 卢布的钞票,按现在的行情相当于一千万美元)未获成功之后,这种关注更强化了:列宁周围被安插了警察局的暗探,行动失败了。

卡莫在柏林被捕。他面临被引渡到俄国和被处死的威胁。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处境非常困难。事实上,虽然这件事只有少数人知道。但线索是从斯大林和卡莫那里被引向“三驾马车”的所在地——芬兰的库奥卡拉的。

总之,埃里温广场的掠夺将布尔什维克党人逼上了绝境。

开始时,在梯弗利斯事件上,列宁是把自己与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联系在一起的。但很快就急剧改变了观点,开始反对诸如此类的“剥夺主义”。很明显,他选择了与“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划清界限的立场。

这种手腕使他分裂了“三驾马车”。列宁明白,从克拉辛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答应卡莫会保守一切秘密,于是他提出指控,指责克拉辛“擅自从梯弗利斯剥夺来的经费中截留了 14 万卢布”。(尼古拉耶夫斯基 B., 同上,第 69 页)

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各方都明白,任何对此的声张都可能对卡莫的处境造成悲剧性的影响。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感到难堪。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留钱财以拯救卡莫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当对他们提出‘侵吞党的财产’的指控时,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不认为有做出任何解释的可能,而且他们对列宁此举特别愤懑。因为列宁作为‘三人委员会’的第三个成员,当时参与了与‘高加索小组’协议的签订,但是现在列宁不仅允许他最亲密的同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塔拉图塔)要求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向他们提交这些款项的支出报表,而且显然在支持他们。准确地说,列宁甚至在煽动他们加强在这方面的挑衅。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只要列宁说一句话,他那三个忠诚的助手就会停止攻击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尼古拉耶夫斯基 B., 同上,第 70 页)

后来,中央委员会就这个冲突做出特别决议,指出任何一方都没有恶意,“每一方



从主观上都是以理性和党性为出发点的”，并提出“通过个别解释来消除一切个人性质的冲突”。

列宁是唯一一个对决议投反对票的人，因为决议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克拉辛的意见含有私人感情因素。但是，列宁处于战略优势地位，他第一个认识到，在革命衰退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党团的领导组成。可以说，由他领导的这部机车需要来一个急转弯，而急转弯必须由他亲自掌握方向盘。

最终，老布尔什维克派还是分裂了。党的经费完全处于列宁的控制之下，很快他毫不迟疑地利用这一点，限制给自己的政治对手发放经费。

在此背景下，斯大林在巴库与占领市委员会这块阵地相联系的活动就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孟什维克指责他搞分裂活动。一群天真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他的指责其实就是赞扬。

1908年11月9日，斯大林被押往沃洛格达流放地。他被分派到索里维切戈茨克，并于1909年2月27日到达。流放者们称他为“职业革命家，重要的工作者”。

6月24日，他又一次逃跑了。先是沿着维切格达河和北德维纳河坐小船，然后乘旅客列车从科特拉斯到达彼得堡。

7月15日，在巴库，斯大林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在监视报告中他的代号是“产奶的”。

7月17日，警察局的密探“米哈伊尔”报告：“‘柯巴’来到了巴库，他是高加索地区著名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他来自西伯利亚，大概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因为1909年他被流放到那里。他是州委员会中来自巴库组织的代表，已经几次出席了代表大会。在这里他将占据中心地位，现已着手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基 A.，同上，第313页）

于是，斯大林又回到了熟悉的环境中。这个时期，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改变，后来他把这种改变称为“从学徒”到“师傅”的转变。

8月1日，在《巴库无产者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他的文章《党的危机和我们的任务》。文章说，“党病了”，它“在群众中拥有广泛的思想影响”，但这种影响“被组织固守的狭隘性所消除，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脱离的根源就在这里”。

斯大林指出，在国外的党的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报》、《呼声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能力使俄国的党组织团结起来。

他提出了与“反复无常的知识分子”相对立的建议，在各个工厂里组建党的委员会，以捍卫工人的日常利益。这些委员会是“党的基本堡垒”。这些委员会应该按地区联合起来。最后形成按行业和区域组建的党的结构格局，这也是苏维埃政权时期苏联国家体制的基本特点。

接着，斯大林强调，必须在俄国（而不是在国外！）发行全俄合法的机关报纸，这是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任务。

“此外，我们肯定，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使中央委员会从虚设的中心转变为真正的、全党的中心，这个中心在实际上联系全党并为党的工作定调子。”（斯大林 И.，同上，第 2 卷，第 156 页）

文章的字里行间清楚地显示出对列宁和“虚设的中央委员会”的批评。这是实践的呼声，是敢于大声直言的呼声。

或许，在这篇文章中，有人可能再次看到分裂的征兆，但局势确实非常紧迫，党需要新的思路。

斯大林建议建立一个渗透全国的组织体系，使中央委员会以地区为依靠，而地区又把大、中、小的各级党组织联合成一个网络。

这样，斯大林显示出了他已上升到那些侨居国外的理论家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他们。

列宁把党的巴库组织和基辅组织一起称为“1910 和 1911 年度俄国的模范和先进组织”，这并非偶然。

但是，列宁还未看到，在布尔什维克党团内部出现了反精英派，他们是由“实践家”组成的，斯大林成为他们观点的代言人。

不过，列宁凭直觉把握到了这一趋势，但并没有给它加上对抗的意义，甚至还仗它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斗争，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他也不是万能的。

此外，斯大林的一系列文章，例如《高加索来信》，引起了列宁的浓厚兴趣。在这些文章中，斯大林对采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阐述了党和工会组织在与石油工业资本家斗争中的相互关系。在斯大林的工作中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任何有理智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与这种生活背道而驰。

1910 年 1 月 22 日，巴库委员会通过决议，继续执行斯大林提出的改组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斯大林本人撰写了决议文本。

《决议》首先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

一段时期内左右了俄国革命主导力量的沮丧和麻痹状态开始过去了。沙皇政权在巴尔干、波斯和远东的政策失败了。政府想借助使贫者失地、富者更富的 11 月 9 日法令来安抚农民的荒谬而无效的努力，政府使工人失去了起码自由并使他们成为资本掠夺者牺牲品的“工人政策”，国库债务的增长和俄国部分土地被出售给外国资本，军需官和铁路掌管人的偷盗、警察局密探的讹诈和警卫队的欺诈所显示的行政机关的彻底崩溃等等，所有这一切，让民众看清反革命明显无力与蓄势待发的革命力量进行较量，最近数月来的工人活动明显活跃起来，激发



了他们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兴趣,引出了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和向何处去等等。
(斯大林 И., 同上, 第 197 页)

那斯大林建议的是什么呢?

巴库委员会认为,在一系列必要的措施中首先应该解决的是:

1. 把实际的(领导)中心迁回俄国来;
2. 创办可联系各地的全俄性的指导性报纸,该报应在俄国国内出版,并由上面所说的实际中心来编辑;
3. 在最重要的工人运动中心(乌拉尔、顿涅茨克煤田、彼得堡、莫斯科,巴库等地)组建地方出版机关。

巴库委员会坚信,上述策略的具体实施就可以把一切真正有党性的人士不分派别地团结到社会民主党里来,创造进行广泛政治宣传的可能性,并为壮大和巩固我们党,实质性地简化广泛利用“合法可能性”的事务。

因此,巴库委员会建议党的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讨论上述问题。(斯大林 И., 同上, 第 198、199 页)

这样一个关乎全局的建议意味深长。

在列宁看来,只有西方国家进行了革命,俄国革命才能成功。对此,斯大林进行了补充,甚至把党在俄国国内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

这与中央委员会内的普遍情绪并不矛盾。巴库委员会的决议就是向“实际工作”转移的论据之一。

1910年1月2日至23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决定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组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斯大林被推荐进入俄国局。这是斯大林命运中最重要的一步。他成为全俄层面的党的领导者之一。

不过,他的计划受到其他力量的干预。3月23日,斯大林被捕。

巴库暗探科科长 П. П. 马丁诺夫大尉在3月24日提交给警察局的报告中写道:

在两份月度报告中提到的(见我去年8月11日提交的2681号和今年3月6日提交的1014号报告),代号为“产奶的”那个人,是组织里的名人,绰号“柯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委员,最活跃的党务工作者。柯巴承担着以前普罗科菲·贾帕里泽所起的领导角色(贾帕里泽于去年10月11日被捕,见我同年10月16日的3302号报告)。根据我的命令,今年3月23日他被外部监督官员拘捕。必须逮捕“产奶的”,是因为完全无法进一步对他进行监视,原因是所有

的密探他都能识破,甚至从梯弗利斯派来的密探也很快失去了作用。而且每一次“产奶的”都能成功骗过监视,并向与他见面的同志指出监视之人,这当然已经明显危害了行动。

他居无定所,从未进行过户口登记,经常住在与他同居的女人斯杰芬妮·列昂德罗娃-彼得罗夫斯卡娅那里。“产奶的”去年曾拥有一本名字为奥塔涅斯·瓦尔塔诺夫·托托米亚涅茨的护照。(奥斯基特洛夫斯基 A., 同上,第 325 页)

经过审讯,1910 年 9 月 20 日,斯大林被押解流放至索里维切戈茨克服刑。他所从事的党的活动中断。

当然,这个昏昏沉沉小城的氛围不利于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小城最先是商人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世袭领地,他们正是从这里派遣叶尔马克军团去占领西伯利亚的。然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愿来到这里的人们在这里进行政治辩论,他们订阅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与同志们通信,到当地的剧院看戏,甚至谈恋爱。斯大林住在寡妇玛丽娅·库扎科娃家里,当他离开小城后库扎科娃生了一个儿子。传言说,其父就是这位流放者(后来这个传言得到证实)。

1911 年 6 月 27 日,流放期结束了;7 月 6 日,斯大林被遣送到沃洛格达临时居留。

斯大林需要从他跌倒的地方重新参与党的生活。于是,流放期间,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信。信上注明的日期是 1910 年 12 月 31 日。也就是说这封信写于新年前夜,此时所有的人都心平气和,在为过节做准备。

主要的是,组织要在俄国进行工作……意见分歧的问题不是在辩论中,而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在原则运用的过程中来加以解决。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组织在俄国的工作……

可我们总在“准备着”,还停留在排练阶段。据我看,对我们来说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就是中心(俄国国内的)小组的组建,这个小组应该首先把各主要中心(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南方)秘密的、半公开的和公开的工作统一起来。叫它什么名称都可以,叫“中央委员会俄国分部”或者叫中央委员会直属辅助小组,都没有关系。但我们对这样一个小组的需要就像对空气和面包一样不可或缺。目前各地的工作者都茫然无知、孤孤单单、互相隔离、灰心丧气。这个小组却能使工作活跃起来,并使思想明确起来。这样就会扫清一条真正利用合法机会的道路。据我看,从这一点可以开始党的复兴……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还剩下六个月。期满之后,我就可以完全听候支配。如果真是现在就急需工作者,我可以立刻溜之大吉……(斯大林 И., 同上,第 2 卷,第 211、212 页)



换句话说,他已经准备好再次逃跑。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会议上,讨论了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孟什维克反对召开全会,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于是,他们在会议上宣布对中央委员会外国局不再信任,并开始筹备代表会议。为了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向国内派遣了几个人,其中包括奥尔忠尼启则、李可夫、施瓦尔茨曼。

1911年夏天,决定吸收斯大林参加该项工作,由他承担中央委员会外联代表的职责。

此时,他差点又被逮捕。沃洛格达宪兵局建议莫斯科暗探科在斯大林住处进行搜查并逮捕他,但未获得行动的许可。莫斯科宪兵需要摸清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关系。

8月初,尽管处于公开监视中,斯大林仍得以到达首都,在那里与奥尔忠尼启则会面。奥尔忠尼启则告诉他,列宁邀请斯大林出国讨论党的处境问题。正是在这里,斯大林了解到,为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国外组织委员会进行了改组。

来到沃洛格达两个月后,斯大林离开了这个城市。在沃洛格达火车站,进行公开监视的侦探记录了他的离去过程:“中午3时45分,他来到‘高加索人’车站广场,随身携带有两件行李:一个不大的箱子和一个看似被褥的包袱,乘坐3次列车的一个三等车厢,于4时15分前往彼得堡。”

在首都,对他同样安排了监视。他暂住在“俄罗斯”宾馆,早上去了С. Я. 阿利卢耶夫的住所。晚上在工人扎别林家里过夜。

9月9日,他被警察逮捕,关押在彼得堡羁押所。

12月5日,内务部特别会议做出决定,确定了惩罚他的措施:“判处朱加施维里处于警察公开监视之下,除首都和首都周围的省份之外,由其自己选择居住地,为期三年,从1911年12月5日开始执行。”

斯大林选择了沃洛格达,在那里此前已有54名流放者。1911年12月24日,他又来到这座城市。

斯大林不走运:1月5日,在布拉格召开了 he 梦想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4人来自俄国国内的党组织,仅有4人来自国外。会议决定出版合法的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并参加杜马的选举活动。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В. И. 列宁、Г. Е. 季诺维也夫、Г. К. 奥尔忠尼启则、Ф. И. 戈洛谢金、С. С. 斯潘达良、Д. М. 施瓦尔茨曼)。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增补斯大林和 И. С. 别洛斯托茨基为委员,确定了完全失败情况下的候补委员:А. С. 布勃诺夫、М. И. 加里宁、А. П. 斯米尔诺夫、Е. Д. 斯塔索娃和 С. Г. 邵武勉。会议还选出中央委员

会俄国局委员,斯大林入选其中。规定发给俄国局委员每月 50 卢布的薪水。

实际上,斯大林在《巴库无产者报》上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得以实现。这位沃洛格达的流放者成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政治局委员了。这是对其声望的一种认可。

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列宁与孟什维克决裂。从此,他成为党的唯一领导人,成了领袖。

代表会议结束后,奥尔忠尼启则来到沃洛格达,通告斯大林关于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层的委员资格,告诉斯大林接头暗号并转交给他由列宁亲自批准的用于逃跑的经费。

2月28日,斯大林再次离开沃洛格达。

他以后的活动是按这条路线进行的:莫斯科——彼得堡——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库——顿河畔罗斯托夫——莫斯科。

4月7日,他在莫斯科会见了奥尔忠尼启则。从这里他们给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发了一封信,通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已经重建,并建议归还存放在她那里的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经费。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组建了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财经委员会。

我们要记住这个情况。从中可得出结论,他们是受中央委员会委托或指派的,这就更能显示出斯大林的作用。

他们在莫斯科逗留时间并不长,随后去了彼得堡。

在那里,斯大林住在 H. T. 波列塔耶夫家中。波列塔耶夫是国家杜马议员,他的住所享有议员豁免权。斯大林开始为《星报》撰稿,刊登了几篇文章。他的文笔简朴易懂,语言形式(俄语)和思想内容完美结合,得心应手。在其文章《新时期》中,这些特点清晰可见:

伴随着工人的经济运动而来的是他们的政治运动。伴随着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而来的是因勒拿枪杀案而引发的抗议、集会和政治罢工。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里加和基辅、在萨拉托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在巴库和尼古拉耶夫,在所有这些地方,在俄国的各个角落,工人们都昂起头声援自己在勒拿被杀害的同志们。“我们朝气蓬勃,永不枯竭的力量的火焰使我们的热血沸腾!”

工人运动正在自己的日趋活跃中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是在反革命血腥屠杀之后。

两年前,工人们还在试图反抗那些贪得无厌的雇主们日甚一日的压榨。这是防御性的罢工,只有个别地方出现了进攻性的罢工,这就是运动活跃的表现。这是第一个阶段,莫斯科地区是肇始之地。



一年半以前，工人们完全转入了进攻性的罢工。他们不断提出新的经济要求，不断赢得在1905年至1906年反革命猖獗时被剥夺的权益。这是第二个阶段，西部边疆区是肇始之地。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进入了政治运动的时期。

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

这应当是意料中的事情。各主要工业部门在发展；资本的利润在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资产阶级行业和政治的组织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工人组织横遭破坏；生活用品的价格日益上涨，地主的收入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三千万农民忍饥挨饿，被穷困所迫的父母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儿女。这一切不可能不给工人阶级队伍带来政治上的活跃。

勒拿的枪声不过是一个信号。

看来，“在希普卡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这种情形连那些急急忙忙准备作出“和解”的政府代表也感觉到了。这显然也反映到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上……

关于政治性抗议罢工的消息仍不断地传来。

显然，解放运动的地下力量开始动作了……

向你们致敬，报春的燕子！（斯大林 И.，同上，第225、226页）

这篇文章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气息，自由之鸟的形象对于那些经常用自由来冒险的人来说，明白易懂而又亲切可爱。

还有一个事件发生于他在首都停留期间：《真理报》第一期出版。斯大林是这份后来成为苏维埃国家主要报纸的事实上的接生婆：他是这期出版于4月22日——星期日的报纸的编辑、组织者和作者之一。

那时，斯大林认识了还是彼得堡工学院学生的B. M. 斯克里亚宾。这位大学生就是后来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我们要强调的是，此时斯大林不在出生以来就生活在那里因而熟悉其一切的高加索，不在不需要渊博学识，只需要坚强的监狱的狭窄空间里，也不在交往受到限制的人数不多的流放者的社团之中。他在彼得堡，在帝国的首都，在议员的私宅里。

他已经是领导人，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以前，我们曾将他与成吉思汗以及堕落的天使撒旦进行过比较。当然，这都是假定的形象。从这个时刻起，他们就不需要了，因为今后我们要从政治当权人物的角度来看待他。从现在起，斯大林将逐渐成为自己政治领域里反精英人士的实际领导人。随着俄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和政府的错误（政府企图压制10月17日“宣言”赋予民众的自由），反精英人士将获得发动进攻的新动力，革命胜利的新希望。

第五章

第二届杜马

第二届杜马、斯托雷平压制革命、
《路标》——知识分子的忏悔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新局势？

第二届国家杜马存在时间很短，从1907年2月20日至6月3日。右翼占了五分之一，立宪民主党人与其穆斯林追随者刚刚超过五分之一，社会党人则超过五分之一。

在这种力量分配的情况下，波兰代表（“波兰科洛”）（指沙俄国家杜马中波兰各民族主义党派的议员团——译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波兰科洛”支持社会党人，他们联合起来可以将右翼和立宪民主党人孤立为少数派。

正是在这届国家杜马里，斯托雷平的演说天才得以崭露头角。下面这段讲话成了经典名言：

政府欢迎对任何混乱现象进行公开的揭发……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去面对这种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增长的指责，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准备好应对公开的行动。

这些指责指望的是当局思想和意志的瘫痪，所有这些归结起来就是两个词“举手投降”。对于这两个词，先生们，政府可以十分镇静地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也用两个词来回答“不要恐吓”。



还有一段话是：“国家制度的反对者想选择一条激进的道路，一条从俄国既往史中解放出来、从文化传统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他们需要强烈的动荡，而我们则需要一个强大的俄国！”

6月3日，第二届杜马解散并实行新的选举法，新选举法改变了全体选民中各个团体的比重。赋予受过教育和生活有保障的群体较大的优先权，降低了民族边疆区代表的比例。

在与第一届及第二届杜马合作失败后，政府决定一定程度地“冻结”政局，但并未放弃走议会道路。

1907年6月3日，革命结束。

政治稳定、工业繁荣及“斯托雷平反动”的时期开始了。

9月和10月举行了第三届杜马选举。442名代表中约有300人是十月党人和右翼，也就是说那些有意与政府合作的人。

著名斯拉夫主义者的儿子H. A. 霍米亚科夫当选为杜马主席。

尼古拉二世总体上对杜马的最初举措感到满意，并责成斯托雷平协调与杜马的关系。总理大臣得以着手进行改革，因为得到了来自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的支持。П. Б. 司徒卢威在《俄国思想报》上写道：“就对俄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而言，只有解放农民和修建铁路才能与土地改革、废除村社相提并论。”（奥尔登堡C.，同上，第413页）

形象地说，每天数千名土地规划员在数百个县级土地规划委员会指导下打掉村社大门的门闩，解放出农民，给予他们自由。

以下省份的居民最支持变革：塔夫里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赫尔松、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西部边疆区（波罗的海沿岸）、萨拉托夫、萨马拉。

在村社互助自救比土地的自由支配更为重要的北方省份，对改革反应冷淡。俄国中部省份对此也兴趣不大。

（这种情况正好与国内战争的情况相符，其时“村社农民”支持红军，但“独立庄园主”支持白军。显然，斯托雷平改革在社会阶层分化上含有巨大的风险，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将其化为乌有。）

然而，在进行改革的最初14个月里，农民银行收购了7617户地主庄园，面积达870万俄亩（收购面积超过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并出售或以优惠价格租赁给农民。

国家的经济面貌迅速地发生变化。

B. И. 古尔科在1909年初召开的贵族联盟代表大会上说：“每天有三千俄亩耕地被哄抢成一块块零星的土地。我们正处于社会民主纲领最积极的执行进程之中。众

所周知,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将迫使所有地主从我们的农村地区迁出去。”

此外,古尔科还指出,这项政策必然导致一部分居民的经济破产。而政府赋予了这部分居民“在杜马选举时享有决定性的政治作用”。

事实上,古尔科正确地指出了矛盾所在。贵族的帝国开始现代化必然要破坏自己的结构。这不可能长久下去。不可避免的,或是改革受阻,或是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活进一步自由化。俄国出现飞速的经济增长,这加速促使统治精英们做出决定性的选择。斯托雷平“一边轻刹车,一边向前行”的口号不能让出演这个剧本的任何一位主要演员满意。斯托雷平曾说过:“给我 20 年国内外稳定的时间,你们就将认不出俄国来。”但这些话只是空谈而已。

当权的政治阶层(以皇帝为首的贵族保守派和贵族自由派,加上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可调和的两部分。极左翼更是无法调和,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认为斗争就是以暴力推翻现行的制度。

受到斯托雷平自由激发的农民们,开始不安地骚动起来。

什么稳定的 20 年,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 谁会给您这 20 年?

对于 1906 年 11 月 9 日的斯托雷平法令,列宁当时回应道:“应当收回土地,但不是为了将其转交给农民;这与阶级斗争的加剧是背道而驰的,不应该将其出售为私有财产。”(奥尔登堡 C., 同上,第 417 页)

第三届杜马讨论 11 月 9 日的法令时,投票赞成这项法令的有十月党人、右翼温和派、民族主义者、部分右翼“波兰科洛”、部分自由保皇党党员;反对的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左翼和部分极右翼。法令以绝大多数票赞成予以通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很快成为事实。然而,土地改革还在继续,并以非暴力方式自愿地继续着。

如果考虑到 1905 年至 1907 年的农业混乱中,农民村社是始作俑者的话,那么政府促使农民脱离村社则是平抑革命的安抚手段。与此同时,村社已大大丧失了其作为公正和传统捍卫者的协调功能——资本主义侵蚀了它。根据当代历史学家 Б. Н. 米罗诺夫的数据,在斯托雷平改革的初期,39%的村社农民不信任村社或对它感到失望。在 1907 年至 1916 年的改革进程中,近三分之一的农民(28%)脱离村社,成了个体农户。如果考虑到不存在来自上层的强制性的“解散村社”,相反,脱离村社时,73%的脱离者还受到了留在村社中人们的阻挠,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三分之二的俄国农村人口继续生活在传统村社制度下,这就是一股庞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在 1917 年的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斯托雷平(“第三届杜马”)时期的大致情景。

农作物产量、工业生产及居民人口的增长预示着乐观的前景,尽管统治阶级和农民的深刻矛盾在社会深处继续燃烧着。



此情此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极为强烈的,以致法国银行家们派来的经济专栏记者爱德蒙·特里在其报告《俄国在 1914 年:经济概述》中引述了下列情况:

从 1902 年至 1912 年,国家铁路网络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增加了 4708 俄里,在亚洲部分增加了 1539 俄里;

在 1908 年至 1912 年间,消除了因俄日战争和 1905 年政治风潮引发的金融危机;

新的宪法政体开始正常发挥职能;

实现了土地改革;

居民人口增长了 3200 万人;

从 1901 年至 1911 年,粮食出口增加 113.6%;

人民教育经费增加 156.2%;

国防支出增加 50.1%。

我们要补充的是,1904 至 1913 年 10 年间,工业生产增长 88%。

特里得出结论:“正是俄国农业取得的成就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克服了因 1904 年战争和 1905 年的政治事件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也正是这个成就使俄国在未来只要做出一些必要的牺牲就能控制住广阔的领土,捍卫自己的国界。”(特里 3,《俄国在 1914 年:经济概述》,巴黎,1986 年,第 90 页)

特里对俄国前景的基本预测是:如果俄国按照 1900 年至 1912 年间的速度发展,那么到 20 世纪中叶,它不仅在政治上,并且在经济和财政上都将在欧洲起主导作用。

致力于变革的斯托雷平越来越多地限制贵族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在政治方面,他对工业资产阶级也相当冷淡,这一点不可能不被企业家们所注意。

总体而言,斯托雷平不属于任何团体,这使得他既自由,又孤单。

为了加快改革,斯托雷平要求农民银行发行 5 亿卢布的债券,但财政大臣 B. H. 科科夫佐夫(“会计师”)表示反对,而且斯托雷平也未能得到尼古拉二世的支持。

原因在于,铁路建设和军队更新装备,以及为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工业所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都需要更多的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最重要的利益间相互发生冲突。为吸引资金购买“农民债券”,需要让这些债券比政府有价证券或铁路债券更具吸引力,也就是说要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并转交给另一部分人。

问题在于预算资金是有限的。当然,可以为经济加热而增加通货膨胀,但科科夫佐夫不想这么做。

因此,鉴于贵族、企业家、皇帝身边政治圈的反应以及资金有限,斯托雷平的立场也不像起初那样坚定了。他“一手持枪,一手扶犁”(舒利金 B. 的说法)地平息了革

命,但当混乱越来越成为过去,总理大臣就越来越不为人所需要。“摩尔人完成了他的事业”,这种意见在沙皇周围的人中越来越常听见。

斯托雷平由于性格倔强,如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所感觉的那样,简直让尼古拉二世黯然失色。因此,总理大臣不像皇室那样把杜马看成是竞争者,而是盟友,一个执拗和任性的政治盟友,这就不足为怪了。

总理大臣和沙皇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

斯托雷平与斯大林更接近一些,二人都在从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而且正如我们还会看到的,为使共产主义政权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斯大林还试图引入真正的议会制度。

除了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政府还积极开展军队的改组和装备更新工作,促进国民教育的发展。1908年秋,制订了逐步推行全民初级教育的20年规划(从1909年至1928年)。

国家局势在发生变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失去了数千名自己的党员并不是偶然的——平静的生活来临了。

甚至左翼知识分子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09年,出版了《路标》文集,它被公众视为对革命知识分子的起诉书。作者中有П. В. 司徒卢威(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宣言的作者)、М. О. 格尔申宗、Н. А. 别尔佳耶夫、С. Н. 布尔加科夫(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亲戚)、С. Л. 弗兰克、В. А. 基斯佳科夫斯基、И. С. 伊兹戈耶夫。

司徒卢威提出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无信仰背叛”的说法。

格尔申宗敢于抨击知识分子脱离人民,说人民“感觉不到其身上有人性的气息”。换句话说,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是杜马制俄国的捍卫者。

《路标》文集的出版引发了辩论的高潮。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将其看做是对资产阶级改革的思想辩护及对革命的“忏悔”、“反文化的暴乱”(П. 米留可夫)。

“路标派”反对者之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М. И.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与斯大林直接相关的论题。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写道,与资产阶级已成为强大的民族历史文化当代载体的西方相比,“俄国知识分子不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原因之一是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文化”。作者继续写道,俄国的历史文化主要表现在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建立上,而对这种文化和这个国家的敌视是与它进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最典型特征之一。

最后,文章明确了俄国知识分子力量和信仰的源泉:“这场要求全身心投入的斗争需要热情,而这种热情只源于对明确的社会理想的信仰。究竟什么可以成为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呢?自由主义理想早已失去其行动的力量,也激发不了任何热情;而



政治和公民自由,也早已无人相信,无论它曾是多么广泛地被民众接受,还是曾宣称自己能如何成功地解决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能够使大家共同富裕。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在知识分子的灵魂中得不到任何的回应,他们一直在与这个国家的现存政权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因此,只有对社会主义理想,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才是敞开的。”(《路标——知识分子在俄罗斯》,莫斯科,1991年,第423页)

这似乎也是在说斯大林。

在任何情况下,他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所有领导一样,对“路标的倾诉”是彻底否定的,对于帝国的历史传统也是如此。但原因并不在于《路标》本身。这本文集只是一面镜子,但不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是俄国发展的镜子,它所指望的是“20年国内外稳定的时间”。

而这20年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尼古拉二世、政府、统治精英们,其次才取决于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

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受过洗礼的犹太人(犹太人一般是极端政治化的民族团体)转向政府一方,这证明斯托雷平的政策是成功的。

接下来会怎样呢?

改革后的国家建设所赖以支撑的基础是议会制度。以经济增长和政治安定为羽翼的皇族政权开始逐渐侵入杜马的活动领域,希望减少10月17日“宣言”赋予杜马的权利,将会在这一点上开始出现看不见的裂痕。这些裂痕要到晚一些时候才会显现出来。

斯托雷平看到了这一点,尼古拉二世则没有。

在П. А. 斯托雷平1911年7月28日写给А. П. 伊兹沃利斯基的信中,还反映出时代及其主人公们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您是知道我的观点的——我们需要和平:未来几年的战争,特别是对于人民而言无法理解起因的战争,对于俄国和王朝将是毁灭性的。相反,和平每延续一年,无论从陆军和海军角度,还是从金融和经济角度来看,俄国都将得到巩固。此外,重要的是,俄国正逐年走向成熟:正在形成自我意识和社会舆论。不要嘲笑我们的议会制机构。尽管它不怎么好,但在其影响下,俄国在五年内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主动出击敌人的时刻终将来临。俄国将坚持到底,成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者。”(斯托雷平 П., 同上,第425、426页)

在这封写于死亡前夕的信中,斯托雷平仿佛遗嘱般地定下了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方向:议会制与和平!

在国家委员会极右翼委员的报告中留有斯托雷平的另一条批语(它于1911年9月11日公布,那时它的作者已被埋葬在基辅-佩彻斯克修道院):“在革命时期进行改革是必要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制度的缺陷滋长了革命。如果仅与革命进行

斗争,那么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消除革命的后果,而不是起因:治愈了溃疡,但被感染的血液将引起新的溃烂。此外,改革之路已庄严宣告,国家杜马已经建立,不能走回头路。如果在政府战胜革命的地方(普鲁士、奥地利),走回头路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政府的成功不仅是靠强权,还在于‘以实力为基础’勇敢地成为改革的领导者。把政府所有的运作都变成警察措施,这是当权者无能的表现。”(斯托雷平 П., 同上,第 674 页)

斯托雷平是正确的。但他死后,俄国的政治生活走了另一条道路,另一些规律开始决定我们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提醒一下:“第二次解放”农民引起的农村分化、知识分子的分化和统治精英的分化——这些就是慢性质变过程的可怕征兆。如果国家三分之二的居民站在基督教未传入罗斯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村社这一边,那么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具有何种力量,才能避免这场灾难性的断裂?在趋于瓦解,但仍有生命力的村社中,隐藏着一种烈性爆炸物。只要农民们还“爱戴沙皇”,只要他们对公正分配土地尚存希望,帝国就将是稳固的。但是,沙皇政权究竟犯了多少错,才使村社社会成了革命浪潮的基础温床?是一个还是一百个?无人知晓。

第六章

斯大林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

斯大林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前往克拉科夫见列宁、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

1912年春天，社会情绪发生急剧变化。当时，在属于俄国和英国股东的勒拿金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当地警察（35人）面对五千名工人无能为力，工人们实际已占领了小镇。从伊尔库茨克调去的士兵与人数众多的愤怒的人群发生冲突。士兵开了枪，打死约150人，200余人受伤。

这一被称为“勒拿枪杀案”的事件震惊全国。它被称为“第二个流血的星期日”。在4月11日的杜马会议上，内务大臣A. A. 马卡罗夫在解释警察的行为时说：“当时，人群失去理智，在恶意煽动的影响下，向部队猛扑，这样部队除了射击，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这次是这样处理了，今后也还会这样处理。”

报纸立即抓住“这次是这样处理了，今后也还会这样处理”这句话，将其视为是对所有工人和对整个自由运动的恫吓，从而导致数千次罢工席卷全国。

当局立即开始转变姿态，任命了一个以前司法大臣C. C. 玛努辛为首的委员会进行检查，勒拿金矿管理委员会被迫辞职，当地警察局局长被移交法院惩处。然而，根据官方数据，1912年的罢工人数达到725000人，这说明新一轮的国内动荡开始了。

身处彼得堡的斯大林在《星报》上做出回应：“勒拿的枪击打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潮水开始涌动……现行制度中的一切罪恶，多灾多难的俄国所经受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反映在一个事实上，集中在勒拿事件上。”

1912年7月18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坐船去北方。他在科尔帕舍夫村住了整整一周，等待前往纳雷姆的轮船，最后终于到达纳雷姆。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小城里，在鄂毕河岸的森林和沼泽中，一共只有150户人家，斯大林在此住了38天后再次逃跑。

他坐船来到托木斯克，从那里沿着铁路支线，他被送到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的泰加火车站，再从泰加火车站搭乘过路的火车。9月12日，斯大林来到彼得堡。

此时已经开始了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活动，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了竞选活动。抵制选举的策略成为过去。

因此，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经验丰富的宣传员，斯大林出现得正是时候。

他出现在首都的街头，长满黑色络腮胡，黑色衬衫上套着旧夹克，穿着皱巴巴的裤子，戴着皱巴巴的鸭舌帽，脚蹬磨损了的鞋子，一副无产者的神态。联想起尼古拉·古米廖夫的诗句，这个神态给人的感觉是：他将铸造“用来把我杀死”的子弹。

安顿好住所之后，斯大林去了俄国局秘书E. Д. 斯塔索娃的家(她已被捕)，并拿到了她留在兄弟那里的文件，而最重要的是，他掌握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金库。也就是说，他行使了刚刚赋予他的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权利。这些钱在竞选前的斗争中是非常有用的。

彼得堡当局预料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积极行动，于9月14日前夜实施了大规模逮捕，党的首都委员会成员几乎全部被捕。不过由党的委员会事先组建的竞选委员会开始运转了。他们中包括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律师、银行职员。但不是他们，而是斯大林成为竞选斗争的领导人。正是他写下了《彼得堡工人给自己代表的委托书》。

文章从分析当前局势落笔，主要内容是：“1905年运动所提出的俄国人民的要求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在列举尚未解决的问题时，他似乎在针对被杀害的斯托雷平的话说：不，不会有20年的稳定！

斯大林写道：“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与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又要与寻求跟旧政权结盟的自由资产阶级作斗争。这就是未来的人民运动应当采取的方式。杜马讲台在目前条件下是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最好的手段之一。”他还寄语未来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希望党团能够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步调一致。”

列宁喜欢上了这份《委托书》，他建议“用大号字体将其刊登在《真理报》的显著位置上”。省特派员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委托书》。

总之，斯大林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他召集会议，对工人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和传单。正是他，一个身穿黑衬衫、脚蹬破鞋的格鲁吉亚人，领导了整个



运动。

彼得堡工人选民的选举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个运动的主要口号是由列宁从克拉科夫(波兰的省会城市——译注)提出来的:议会制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

而在彼得堡市,斯大林充当了列宁第一助手的角色。甚至托洛茨基也承认这一点:“选举的初始阶段需要直接与工人选民打交道,对于这一阶段选举的结果,斯大林未能起到较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口才较差,而且还因为归他管辖还不到四天。而他在极其复杂的下一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需要依靠秘密机构来团结特派员,并在幕后领导他们。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更胜任。”(托洛茨基 JI., 同上,第 201 页)

首都和工业地区的选举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在俄国六个最主要的工业地区获胜,这里集中了大约 80% 的俄国工人阶级。还有 7 位孟什维克(“取消派”)由小资产阶级投票当选。

从议会斗争的法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制订出工作和联合的总原则。斯大林正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列宁有不同的看法。他不打算团结那些孟什维克“取消派”,不打算和他们分享党内的权力。

为了进行相应的指导,列宁把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召集到自己这里来,而斯大林应当负责这些代表的安排。

然而,只有两位代表来到克拉科夫:P. B. 马利诺夫斯基和 M. K. 穆拉诺夫。除了他们,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

在讨论党的统一问题时,斯大林主张和孟什维克联合。显然,他与列宁的分歧并不具有对立的性质,不过的确存在。

指出下述情况是很重要的:当局试图取消彼得堡一些大型工厂的选举结果,但按斯大林的倡议,这些工厂进行了抗议罢工,选举结果得到承认。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杜马党团里联合问题上的独立见解,引发了不久后“克拉科夫与彼得堡之间”的斗争。在《真理报》的决议上,党团全体成员都承认“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非常必要”,赞成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与孟什维克的《光线报》合并,并建议两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同一个编辑部工作。不久,编辑部工作人员名单出现了相应的增加。此外,《光线报》上还刊登了一个名字——马克西姆·高尔基,一位无产阶级作家。

“调和主义又一次占了上风,这意味着,就实质而言,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精神和文字被推翻。”(托洛茨基 JI., 同上,第 202 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与孟什维克决裂,并推举斯大林担任中央

委员会委员。

那么,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和《真理报》的监护人辜负了领袖的希望?

托洛茨基认为,列宁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他坚持按照那条终将成为国内战争导火线的路线进行分裂。对于列宁来说,所有政策归根到底是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如果选举结束后杜马党团仍是统一的,那么竞选活动期间的斗争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有必要的是让工人们通过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举措、每一个事件确信,布尔什维克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与其他政治团体有很大的不同。”(托洛茨基 Л., 同上, 第 203 页)

1912 年 12 月,斯大林在写给 Л. Б. 加米涅夫的信中解释了自己的策略,同时与列宁进行了争论:“伊里奇(列宁的父称,指列宁——译注)建议在党团内部实行六人小组的‘强硬政策’,实行威胁党团多数派的政策,实行向基层群众呼吁的政策等,来反对党团中的多数派,但伊里奇必将让步,因为事情本身很清楚,对于这种强硬政策而言,六人小组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做好准备。首先需要加强这六人小组,然后用它打败党团中的多数派,如同伊利亚·穆罗梅茨(勇士,俄罗斯 12—16 世纪《壮士歌》中的主人公之一——译注)利用鞑靼人击败鞑靼人一样。此外,很可能在两三个月后,我们将成为党团中的多数派(有希望将一两个人拉过来),那时我们就有成为取消派党团的可能性,这样将更为有利。因此,需要工作,并继续实行强硬的政策。”(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特维尔,2004 年,第 17 卷,第 23 页)

这些解释表明,斯大林更多地沉浸在俄国的现实之中。他没有看到任何国内战争的迹象。这样的战争从何而来?发生战争的条件何在?

因此,他想很巧妙地击败孟什维克。

领袖和中央委员会新委员的冲突是原则性的,但列宁没有去激化它。因为这将削弱他的地位。

斯大林表现出了个性,但仍是党最重要的工作人员。

不管怎样,列宁还是非常生气的。他的气愤发泄在书信和细微的动作中。例如,他组织了巴库工人反对代表“联合”的抗议信(《他们现在从哪里来的与死人联合的愿望?》)。列宁激烈地争辩着,并抨击党团和编辑部,似乎快要与斯大林决裂了。这时,他们尝试达成一致意见的会面尚未举行。

于是,列宁召请斯大林到自己这里来开会。

И. 克鲁普斯卡娅在一封信中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要催瓦西里耶夫尽快到这里来,不然就没救了。需要他,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做了。”瓦西里耶夫就是斯大林。

在另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她写道:“当然,我们当然坚决主张您来这里。”

斯大林不能不去了。

离开前,他参与了党的彼得堡委员会的重组工作。



的确,最重要的事情斯大林已经做了。

克拉科夫的会议由列宁主持,会议选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局和国外局。斯大林与 Я. М. 斯维尔德洛夫以及会议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入选俄国局。

列宁“原谅”了他。此外,由于资金严重短缺,中央委员会只能拨出一份工资给自己在俄国的代表,这份工资(每月 60 卢布)发给了斯大林,尽管斯大林表示拒绝。

不过,他没有立刻返回。列宁说服他留下来撰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柯巴的态度,出人意料地热情:“对于民族主义,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应当更加严肃地研究它。我们有一个神奇的格鲁吉亚人,他收集了所有奥地利的和其他的资料,此时正坐在这里为《启蒙》杂志写一大篇文章。”

也就是说,斯大林暂时离开了俄国国内的工作。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列宁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扣留“神奇的格鲁吉亚人”的一个借口,而且也是迫切的需要。在列宁眼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一个统一的政党改组成了一个由各个社会民族小组构成的联邦制联盟——德国人小组、捷克人小组、波兰人小组、意大利人小组、罗马尼亚人小组和南斯拉夫人小组。当然,列宁担心,类似的过程也可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发生,何况“崩得”(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简称——译注)已经表示赞同“文化民族自治”。把这项工作托付给斯大林的时候,列宁还不可能知道,多年以后,在开始组建苏联时,他将与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冲突。列宁赞成民族共和国的联邦,而斯大林则赞成在统一的俄罗斯框架内的自治。换句话说,列宁在苏联的国家结构问题上,将是他在 1913 年所反对的观点的支持者。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运动之势。犹太人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强化,波兰的沙文主义的蓬勃发展,鞑靼人中泛伊斯兰主义的盛行,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居民反犹太主义的普遍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斯大林 II, 同上,第 2 卷,第 291 页)

斯大林指出了用资产阶级的“民族性原则”来代替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危险性。因为这样,“统一的无产阶级运动就会分化为一些单独的民族小溪”。

在批评“崩得”要求给犹太人提供特殊条件时,斯大林也同样关注高加索地区,他说:“只有从本质上把落后的民族和部族吸纳入高级文明的普遍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斯大林 II, 同上,第 2 卷,第 351 页)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不谈,那么后来被称为“斯大林大国霸权”的倾向变得很明显。

在谈论民族自决权时,斯大林仿佛并不想承认这种权利,于是就说道:“唯一正确的决定就是地区自治,如同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已划定地区的自治。”

列宁高度评价这项研究，人前人后赞扬它，支持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刊登在合法杂志《启蒙》上的建议。他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文章很好。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反对崩得这群败类的原则立场上我们将寸步不让。”（引自：雅科夫列夫 H.，同上，第 73 页）

1913 年 2 月中旬，斯大林回到彼得堡。

他不在期间，《真理报》由列宁派去的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编辑部已进行了改组。但 1 月 10 日，斯维尔德洛夫被捕，他的位置由加米涅夫接替。

继斯维尔德洛夫之后，又一名中央委员会委员来到首都，这令警察部门颇为不安，而警察局实际上已经通过为自己充当密探的马利诺夫斯基这个党派来首都的代表监控着党内所发生的一切。

警察局竭力要阻止的正是社会民主党团的联合。为此，它利用马利诺夫斯基，并支持列宁的分裂方针。于是，警察就通过马利诺夫斯基来监视列宁的行动。

斯维尔德洛夫的被捕使马利诺夫斯基成为党在首都的主要代表，但斯大林的出现使他失去了这一主要地位。因此，柯巴的自由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但斯大林对此并不清楚，他心情愉快，精力充沛。他未来妻子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在那些日子里看见他是这样一副模样：

“我记得这年冬天到处是雪堆、严寒和冰冻的雪橇路。2 月，当谢肉节来临时，街上就满是装饰着彩带、铃铛叮当作响的低矮的芬兰雪橇。”

在这样一个还未脱离孩子气的小姑娘的节日记忆里，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这次到彼得堡，他已不是第一次来我们家。我们现在更了解索索了。我们知道，他完全是个率直、快活的人，但通常总是沉默寡言和恪守分寸。在讲有趣的故事时，他常常像年轻人那样发笑和开玩笑。他善于发现人们的可笑之处，然后再讲出来，让人们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有一次，这位客人请大家去滑雪橇。大家都喜气洋洋、兴高采烈。雪橇飞驰，在雪上轧出吱吱的响声。

在滑雪橇的人当中有位叫娜佳·阿利卢耶娃的女中学生。

她 12 岁。她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善良和神秘的人。如果当时有人预言，她将成为他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她会哈哈大笑起来。

2 月 23 日，斯大林因马利诺夫斯基告密而被捕。三个月的狱中监禁之后，他被流放到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期限四年。

7 月 20 日，列宁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波罗宁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组织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出来。从波兰回来后，马利诺夫斯基



立即将此事通报给警方。8月25日,叶尼塞宪兵局得知了有关这一逃跑的策划事宜。

此时,斯大林被安置在科斯季诺村,而斯维尔德洛夫就住在附近的谢里瓦尼霍村。

10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上,批准了组织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的决定。但这一次实施起来将会很困难。

11月10日,斯大林在发给名为 T. A. 斯拉乌京斯卡娅的信中写道:

11月10日。由于邮路不通,信在我这里已经放了两个星期了。塔季亚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但又没有办法,贫困使然呀。我身无分文,而且所有的储备品都用完了。我曾有点钱,但买了保暖的衣服、鞋子和食品了,这些东西在这里出奇的贵。暂时还能赊账,但以后会发生什么,我真不知道……能否找找熟人(比如克利斯廷斯基),搞个20—30卢布?或许再多一点!这简直就是救命了,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这里正是隆冬季节(昨天是零下33度),但木柴没有买够,储备快要用完了。我相信,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就可以弄到。所以,去办吧,亲爱的。不然,眼看着你就见不着我这个“来自卡拉什尼科沃集市的高加索人”了(完蛋了)……您知道地址的,请直接寄给我(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叶尼塞省科斯季诺村等等)。如果有必要,您可以找找索科洛夫,那就可能弄到30多卢布。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节日。

11月12日。可爱的,亲爱的塔季亚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包裹收到了。不过我并没有向您要新床单,我只要了自己的旧床单,但您买了新的,破费了。其实,您的钱太少了。我不知道如何偿还您,亲爱的,可爱的-可爱的。

11月20日。可爱的。我的需求与时俱增,我处于绝望的境地,此外还生病了,开始令人担心地咳嗽。需要牛奶,但是……钱,没有钱。亲爱的,如果弄到了钱,请立即通过电汇寄给我。无法再等了……(奥斯特洛夫斯基 A., 同上,第396—397页)

信里充满着绝望的情绪。

在另一封给马利诺夫斯基的信中,斯大林简直就是在呻吟了:“难道我注定要在这里煎熬四年?”

1914年1月29日,警察局局长 C. П. 贝列茨基发电报通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面:除了先前汇来的100卢布,1月28日,他们又给朱加施维里和斯维尔德洛夫汇了50卢布,并请求防止逃跑发生。

2月24日,叶尼塞侦查站的秘密工作人员基尔萨诺夫转达了如下情报:“受到公开管制的朱加施维里和斯维尔德洛夫打算从流放地逃跑。如果不能逃往南方,那就

会乘夏天第一艘开往叶尼塞河口的汽船逃离。”

所以说,当局对这次逃跑是有防范的。有关当局在基尔萨诺夫的报告上做出批示:“将朱加施维里和斯维尔德洛夫迁往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以北的小村庄,那里不会有其他流放犯,并专门调派两名警察对他们进行监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1名警察要看守15名流放犯。

1914年3月11日,两位流放犯被遣送到库列伊卡小村,它位于北极圈向北80公里处。在库列伊卡村只有9幢房屋,邮车一年到这里来8至9次。在这里,在沿河狭窄的空间里,在一年中有9个月是冬季的极端严峻的自然条件下,活下来并不发疯都是不容易的。

最初,这两位流放犯(他们是库列伊卡村里唯一的政治犯)同住在一间木屋里,但过亲的近邻关系很快就使他们两人都感到厌烦,于是他们分开住到了不同的房子里。可以想象得到,斯维尔德洛夫低沉的嗓音、他谈话时不容反驳的方式让斯大林颇感不适。但是,最有可能的,这是严重的忧郁造成的,而导致了这种抑郁的是严酷的自然条件和遥无尽头的流放期。

斯大林住在别列普雷金家孤儿们的木屋里。五个小男孩和两个小女孩操持着家务,家里有一头母牛。进入木屋入口要穿过一个暖和的畜栏,斯大林住在侧面增盖的一间小屋里。他经常去原始森林中捕鱼和打猎。从周边村庄来到库列伊卡的一些目击者——流放犯证明,冬天斯大林在叶尼塞河上有一个“私人的冰窟窿”,在这个冰窟窿里他钓到过一条大鱼。

关于斯大林在库列伊卡的生活,警察局警官米哈伊尔·亚里山德罗维奇·梅尔兹利亚科夫以非常朴实的笔墨作过极好的描述:

“1891年,我父亲、一个流放移民(自由人),带着我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在离该城25公里的泽列杰耶夫乡的叶梅里亚诺夫村安家落户。

“1914年,为躲避战争征召,我去了图鲁汉斯克,因为不从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征兵。同年,我进入警察局,担任小警官。1914年6月初,我被派往库列伊卡村,И. В. 斯大林(朱加施维里)就流放在那里。图鲁汉斯克警官吉比洛夫在派我到库列伊卡村时,吩咐我要对监视朱加施维里负全责,而且要严加看管,因为他非常不可靠,已经不止一次从流放地逃跑。库列伊卡村有8至10户人家,住着以下户主:卡拉什尼科夫·阿法纳西、小市民伊万诺夫、全家都是雇农的别列普雷金五兄弟和两姐妹,还有姓塔拉谢夫的六家,名叫雅科夫、斯捷潘、米哈伊尔、费多尔等。

“我住在塔拉谢夫·米哈伊尔家里。政治流放犯除И. В. 朱加施维里之外,还有Я. М. 斯维尔德洛夫,他们没和房东家的人生活在一起,各自住在不同的房子里。И. В. 斯大林住在别列普雷金家(雇农),他家有约纳、德米特里、伊万、格奥尔吉及纳塔利娅、利季娅两姐妹。别列普雷金家的房子不大,破旧肮脏。斯大林睡的是木板床,并



用五根线的煤油灯来照明。

“夏天，斯大林喜欢钓鱼和划船。他用立网来捕鱼。捕鱼用具从过路的商贩那里挑选，然后当场买下。他自己储备木材，喜欢去位于下游 18 公里的叫波罗韦卡的小地方。我放他一个人去那里，也不限制时间，有时候他能在那里钓上 15 天的鱼。

“斯维尔德洛夫由住在索特尼科夫家的霍列夫警员看守。斯维尔德洛夫喜欢下河游泳，喜欢每天清晨划船。他总戴着眼镜，没有捕鱼的爱好。我在那儿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在那儿生活了近两年，然后经吉比洛夫批准去了妻子所在的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他妻子在我儿子根纳季上学的寄宿中学教书。

“当地居民非常喜欢斯大林，经常去他那里做客，他也去他们家里，他们常常整晚与斯大林坐在一起。他喜欢听些简单的音乐，有时也爱听一听居民们的奇闻轶事。斯大林自己做饭、砍柴、用铁炉子上的茶壶煮茶。小木屋比较破旧，因此有些脏，里面总是烟雾缭绕，窗户玻璃也碎了，是用小木板、报纸、书的硬封皮来封住窗户洞的。斯大林生活俭朴、贫困，伙食费不够他开支，当地居民经常接济他。斯大林每次购买食品都支付现钱，在居民需要时给钱帮助他们，特别是帮助雇农别列普雷金一家。我无权扣留邮件，一律都转交给他。邮件……一个月送来一次，总是给他寄来些什么东西。寄来过装有药品的包裹，斯大林拿出药品分给当地居民。有时，斯大林也亲自用药品帮人们治病，在伤口上擦碘酒，撒药粉。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每 15 名流放犯有一个警员监管，而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则一人一个。异族人（通古斯人）也来过斯大林同志这里，比如曼达科夫·加夫里尔等。他们带来鱼和鹿肉，斯大林总是慷慨地付钱给他们。斯大林爱吃生长在叶尼塞河沿岸湖里的一种叫佩利亚特卡的鱼。

“斯大林经常与异族人交谈，能谈很久。我并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只知道他建议他们洗澡、刮脸、剪发，因为异族人非常脏。我记得，他曾帮一个人剃胡子并给了这个人肥皂。异族人尊敬他，对他评价很好。在斯大林居住在乌斯季-库列伊卡期间，也是我，一个派去专门监控斯大林同志的警员在那儿的时候，他和我一起去过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 10 次。夏天我们乘小船去。狗拉着小船行驶，回来时我们划桨。一路上我们不停地交谈，开玩笑。冬天，我们骑马去，在一些小村子过夜，其中一个小村子距离库列伊卡 37 公里，奥京佐夫就住在那里，我们经常在那里停留。斯大林与奥京佐夫是在伊尔库茨克监狱认识的（我并不知道奥京佐夫是为何以及如何来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奥京佐夫住在卡纳谢里辖区。有时斯大林跟我一起能在奥京佐夫家里住上三天，奥京佐夫与家人住在一起。斯大林和奥京佐夫经常一起回忆在伊尔库茨克监狱的生活，我在场时，他们也谈到过伊尔库茨克监狱制度的残酷无情。当着我的面，他们一般避免谈论政治。在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斯大林与其他政治流放犯们见过面，和谁，在哪里，我不清楚。他在那里购买食品，逗留很长时间，有时长达 5 至 7 天。

“这些天他在哪里，住在谁家，在哪儿过夜，我都不知道。是斯大林自己来局里，告诉我必须要回去了，于是我们就离开。一路上，居民们对斯大林态度很好，给他铺最好的床铺(绒毛褥子、兔皮毯子)，给他吃得也很好。来库列伊卡的神职人员从来不去朱加施维里那里。如果长官、商人来到库列伊卡，则在塔拉谢夫·米哈伊尔家过夜，他的房子被当成贵族住所。库列伊卡对于政治犯来说，是最边远，也是最艰苦的流放地。

“我是从拉利京警官那里接管了监管朱加施维里的任务并配发了武器的，他叮嘱我要严密监视斯大林，因为他准备逃跑，但我对他并不严厉。拉利京曾每天早上都去检查朱加施维里一遍，有时甚至在晚上，为此斯大林请求吉比洛夫撤掉拉利京。斯维尔德洛夫也对拉利京有抱怨。结果拉利京被撤换，由我取代了他。我知道，把斯大林流放到库列伊卡，是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流放犯，为此最好是将他与其他流放犯隔离开来，让他无法从那里逃走。根据我的观察，斯大林并不打算从库列伊卡逃走，因为这是毫无希望的事。

“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流放犯来过库列伊卡。1917年初，我、车夫和斯大林乘马车前往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斯大林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而我就有了新的差事……

“斯大林同志在库列伊卡村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东西。他写了什么和读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把书存放在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在那里购买了文具用品。此外，还通过邮寄获得书籍和杂志。来自戈罗希哈村的一个流放犯常到库列伊卡村找斯大林同志，并在他那里逗留了很久，这个流放犯的姓名我不记得了。斯大林非常喜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经常聚集在他那里，他同他们玩游戏，爱抚他们。有时，他张开手臂，与他们在屋内跑来跑去。

“斯大林与当地居民交往很有礼貌，不像我们那样叫对方‘格里什卡’、‘米什卡’等(格里戈里、米哈伊尔的呢称——译注)，而是称呼格里戈里、米哈伊尔，而且用名字加上父称来称呼成年人和老年人。在读报时，斯大林有时会说：‘罗马尼亚又在虚张声势了。’他总是用一个带弯曲烟嘴的烟斗抽烟，抽普通的马合烟，有时也抽其他烟丝。他戴着黑色的帽子，穿弗伦奇式军上衣和黑色斜纹布长裤，脚穿宽头的英式靴子。他在邻居家靠没有烟囱的炉子取暖的(烟气熏人的)浴室洗澡，因为别列普雷金家没有自己的浴室。冬季他穿靴子，外出时，当地居民给了他翁得软底毛皮鞋和索库伊靴，索库伊靴是由鹿皮制成的。斯大林剃掉了下巴处的络腮胡子，留着小胡子和整个向后梳的漂亮长发。库列伊卡当地居民常被蚊虫咬得难受，斯大林就用一张黑纱网来防止蚊虫的袭扰。但在屋里是免不了要被小蚊虫叮咬的，因此斯大林睡在帐子里。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好像记得斯大林的伙食费是一个月 15 卢布。我一个月



能领到 50 卢布,但这些钱从来都不够我用,斯大林更是不够用了,所以他经常处于贫困之中。孩子们在时,斯大林就讲述自己的童年,说自己曾是个调皮的孩子,有时还哭闹,过得不好。在库列伊卡,斯大林常常去散步,但不会走进原始森林的深处,因为蚊子咬得难受。他常常一个人划船,这方面他无所畏惧,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感到惊奇:当他被波浪高高抛起时,是如何独自一人在大浪中游刃有余地驾驭小船的?流经库列伊卡的叶尼塞河有 5 公里宽。斯大林一个人常去对岸的小店购买食品,特别是烟丝,因为在我们这里烟丝经常缺货。И. В. 斯大林绝对是自己做饭。他对外来的商人、长官不感兴趣,从不与他们交谈。

“有一次,我听斯大林同志讲了个笑话,笑话是这样的:一个地主牙痛,他就派自己的仆人去请医生,但他忘了医生的姓氏,就忍着疼痛说道,医生姓科涅夫或热列布佐夫(这两个姓的词根分别是马和小马的意思——译注),但结果医生是姓奥夫相尼科夫(这个姓的词根是燕麦的意思——译注)。要知道马是要吃燕麦的,因此,在这些姓氏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我们大笑不已,因为斯大林同志说得绘声绘色,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笑话,但我不记得了。

“冬季,斯大林参与制造了‘滑车’,自己也坐着它滑着玩,他喜欢这种消遣。他没有手套,为了不冻伤双手,他把袖口扎了起来。此外,斯大林还喜欢滑雪。

“1929 年,当我 62 岁时,我加入了集体农庄。”(伊利扎罗夫 В.,《斯大林的秘密生活》,莫斯科,2003 年,第 300—303 页)

我们需要补充的是,1930 年 2 月,遭到集体农庄拒绝并被划为富农的梅尔兹利亚科夫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求助,斯大林给村苏维埃写信,表示支持梅尔兹利亚科夫,说“他与其他警察不同,给人的印象很好”。

莫洛托夫曾经回忆过:“西伯利亚是给斯大林留下了些什么的。”

这个“什么”不只是打猎的习惯,还有更深层的东西,首先是对辽阔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感情。此后他再也未能像在图鲁汉斯克流放时期那样,与普通百姓如此接近过。

正如我们从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回忆中所看到的,斯大林的行为举止、他的勇气和乐于助人,是与西伯利亚人的基本特征相吻合的。在这里,他成了自己人。

他不害怕走过齐脖深的冰水,去拖拽被春汛冲走的小船。他喜欢唱歌跳舞,常用糖果招待孩子们。这就是未来的极权者、苏联半个世界的主宰者当时的模样。谁会说,这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形象?

不过,我们不打算猜测,当斯大林穿过畜栏,栖身于自己冰冷的陋室,就着煤油灯的光线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或写文章时,他心中孕育的是什么。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还真正地左右着党和国家的命运,鼓动工人参加竞选,监管着党的财政及其主要报纸。而现在却被抛进无望的黑暗之中,在这里他注定或是死去,或是撑到流放结

束获得自由。实际上,与逃跑的人相比,留下的人反而有更多的时间。

巨大的河流、北极光、难以穿越的原始森林。谁会说,这不是流放者人生的终点?

斯大林,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他直到最后一息都是个浪漫主义者……天才总是浪漫的。任何革命都是浪漫主义者完成的,尤其是社会革命。但是,前进,作为一个领袖带领众人跟随自己,而又不当众表现出恐惧情绪,有可能走向的却是深渊。”(伊利扎诺夫 B., 同上,第 197 页)

在库列伊卡的是“另一个斯大林”,一个自然、质朴的斯大林。薇拉·施魏策尔是流放者苏伦·斯潘达良的妻子,她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自己的笔记中,她如此表述当时斯大林生活的环境:

“冬天,我和苏伦·斯潘达良躲开警员,一起去库列伊卡找斯大林。有一系列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在杜马中的党团的审判及与党内事务有关的问题需要解决。

“这是些与没完没了的极夜交融在一起的白昼,寒气刺骨。我们乘坐狗拉雪橇在叶尼塞河上疾驰,中间不作停歇。从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到库列伊卡村有 200 公里。我们在狼的嚎叫声中疾驰。

“库列伊卡河到了。在这里,湍急的库列伊卡河被许多石滩扭折得曲曲弯弯,然后流入澎湃的、高水位的叶尼塞河。河岸上散落着几处木屋,小屋之间相距较远。在紧靠叶尼塞河旁的小山丘上,可以看到一间覆盖着白雪的木屋,斯大林就住在这里。我们驶了过去。狗看到了前面的房子,就全速奔跑起来。人们从各个小屋跑了出来。斯大林走出来迎接我们。当地居民好奇地仔细打量着我们这些极地旅行者。从隔壁的小屋懒洋洋地走出一个警官,缓慢地、神色庄重地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们和约瑟夫的见面令人愉快,充满温情。约瑟夫对我们的意外到来十分高兴。他对我们非常关心。我们走进屋子。这是个不大的正方形房间,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木床,上面的薄被铺得很整齐,对面是捕鱼和打猎用具——网、磨石、钩子。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本人制作的。离窗不远是一张长方形桌子,上面堆满了书,桌子上方挂着煤油灯。房间中间有一个火炉——“小铁炉子”,做烟筒用的铁管通到门厅。房间里很暖和,殷勤的主人为过冬储备了很多木柴。我们还没来得及脱去温暖的极地外衣,约瑟夫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约瑟夫是从河边回来的,肩膀上扛着一条巨大的鲟鱼。苏伦赶快走过去接他,他们把一条 3 普特重(1 普特相当于 16.3 公斤——译注)的活鱼搬进屋子。

“‘在我的冰窟窿里捕到的不会是小鱼’,斯大林边开玩笑,边欣赏着这条美丽的鲟鱼。

“原来,这个经验丰富的‘垂钓者’始终在叶尼塞河上架着他的‘自动捕鱼器’(一



条拴着大钩子的捕鱼绳)。桌上勉强能放下这条鲟鱼。苏伦和我扶着它,而约瑟夫熟练地给大鱼开膛取出内脏。我们就在桌旁谈了起来……”(雅科夫列夫 H., 同上, 第 83 页)

这些发生在地理空间狭小角落里的事件,离世界大国的首都难以想象地遥远。而在首都,政治精英们正越来越敏锐地感受到全球危机的逼近。一场世界大战将从这场危机中产生,所有的帝国都将崩溃,一系列新国家将诞生,民众将走上历史舞台。

因此,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欧洲。大不列颠和日耳曼这两个帝国已经变得拥挤了。

第七章

欧洲同盟的形成

欧洲同盟的形成、П. H. 杜尔诺沃的
预言、战争前夕的欧洲

由于俄国的全面支持,德国得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获得蓬勃发展,在工业、科学、农业和文化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快速推进。19世纪,德国战胜了自己所有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强国。德国总理大臣俾斯麦年轻时曾任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他向德皇威廉二世阐述了自己主要的外交见地:要防止友好的俄国与并不总是友好的英国结盟。

俾斯麦的继承者们不再认为与俄国合作有什么好处,遂拒绝了英国和平解决矛盾的建议,并改变了对与俄国和英国利益发生冲突的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地区的政策。

思想家们是如此判定这个政策的含义的:“斯拉夫民族的涌浪在越来越激烈地冲击日耳曼主义的堤岸。”

他们预言,利用和平时期进行自身发展的俄国将不可避免地在远东、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从事扩张。他们认为,唯一能遏制俄国的就是其国内的动乱。

俾斯麦战友的儿子、德国总参谋部长官赫尔穆特·冯·毛奇认为,由于经济的迅速增长,到1917年俄国将不可战胜,“他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它”。

每一个和平年份都使俄国得到巩固,但同样也巩固了德国。这两个国家改变了现有的力量平衡,并迫使其他国家适应世界格局的重组。



德国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俄日战争时，威廉二世建议尼古拉二世在比约克岛缔结协议，其目的是能使他在欧洲放开手脚。虽然俄国皇帝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协议很快就被否决，因为俄国的政治精英们不愿意俄国只和德国一个国家拴在一起，建议与法国结盟。这一建议使俄国避免了德国霸权的威胁，但从柏林的角度看来，这样一来，比约克协议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其核心作用。

迈出下一步的是英国。伦敦在整个 19 世纪的政策都是反对俄国在亚洲、波斯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此时做出决定，重新定位，与俄国结盟，以便在欧洲大陆与德国抗衡。英国的外交选择了暂时不去考虑来自这个北方帝国对英属印度“如冰川临头般”的威胁和俄国控制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一贯企图，甚至承诺将积极考虑海峡问题。

因此，英国放弃了在所有“前线”与俄国的对抗。

谈判始于 1906 年，涉及西藏、阿富汗和波斯。

俄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些地区雄心勃勃地推进，不止一次使这些地区和国家处于战争的边缘。俄国要实施远征印度的计划，必须先要占领阿富汗。俄国人的推进、铁路建设和维特铺设通往波斯湾石油管道的计划与英国人在该地区的利益（首先是能源利益）发生了碰撞。

但是，这一次不得不做出某些牺牲。1907 年 8 月 18(31)日，英俄宣言签署。英国和俄国承认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俄罗斯放弃对阿富汗的要求，并且两国保证尊重其独立和不可侵犯；波斯被分成三个区域：最富庶的、人口稠密的北部划归俄国的势力范围；毗邻阿富汗和印度的东南部分被认定为英属区域；而这些地区之间为中立地带，其中包括几乎整个波斯湾沿岸。

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扩张受到了限制，因此英俄协定有了新的条款是合乎逻辑的，并且首先是针对其在欧洲的利益的。

俄国放弃了一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实现的要求，但它得到了对中国东北、蒙古和中国新疆的控制权。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的后果实际上被消除了。

到 1908 年夏天，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同盟：俄法英同盟。这个同盟并没有正式预示彼得堡和柏林传统同盟关系的冷却，但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游戏中已经标志着两大集团的形成。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与新同盟相关：俄国的社会舆论将与议会制英国的接近和与“保守柏林”的疏远，理解为沙皇行政当局即将作出让步的前奏。

也就是在 1908 年，奥匈帝国实现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在侮辱俄国，也引起了英国的愤慨。德国完全站在维也纳帝国一边。一时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冲突。

其实，俄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以国内的经济现实为支撑的。

而德国，它的资本、技术、人才在俄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13年，俄国进口产品中德国商品的比重已接近一半，而法国商品的比重尚不足百分之五（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莫斯科，2001年，第27页）。无论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怎么说德国像一条巨蛇正在缠死俄国，如同“缠死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那样（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阿波罗祭司，因警告特洛伊人勿中木马计而被女神雅典娜派去的两条巨蛇缠死——译注），但实际上，与德国人的经济合作给俄国带来了许多益处。

此外，彼得堡没有任何重要的理由与柏林开战，这么说的不仅仅是斯托雷平一个人。

当然，俄国经济界对真正经济独立的渴望，是一个现实的国内政治因素，但这一因素，如同被伤害了的民族感情一样，在国家领导层选择主要发展方向时，不可能自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斯托雷平关于20年和平的呼吁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彼得堡的精英中有两种战略在竞争。第一种战略瞄准了亚洲方向，力图“建立伟大的东方帝国”，把东正教的俄国变成新的世界中心。第二种战略旨在加强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使俄国西化。

由此出现了两种策略不同的路线：或是和平变革，或是与德国日益增长的霸权抗衡。

世纪之初俄国两位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维特和斯托雷平都遵循了和平发展的战略。两人都强烈反对俄国加入对抗同盟，他们认为，牵扯进任何集团都会使国家在政治上依赖于其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这一立场集中反映在1914年2月П. Н. 杜尔诺沃给尼古拉二世的上书里。这位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警告说，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之后，让俄国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评价可能出现的战争时，杜尔诺沃写道，战胜德国不会给俄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波兹南？东普鲁士？但当我们并不那么容易管理俄国自己的波兰人时，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些住满了波兰人的地区？加利西亚？这是一个滋生危险的小俄罗斯分裂主义的温床。”与此同时，假如德国被摧垮，俄国也将失去德国市场，然后就会陷入自己债权盟国的“金融奴役”中。“德国的殖民战争正在受损。Drang nach Osten（剑指东方——译注）成为历史回忆的日子并不遥远。”

结果是杜尔诺沃的预言惊人地准确：“战争的全部重担将落在我们这边。击溃德国防线的使命将落到我们的身上……这场战争的后果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并且也不可能胜利进军柏林。军事失败也将不可避免，我们只能期望局部的胜利。我们在供给上这样或那样的短缺也将不可避免……当我们的社会对这一情况特别神经过敏时，其恶果将被夸大……于是，就会把所有挫折归罪于政府。立法机构也将展开



反对政府的运动……国内将爆发革命运动……失去最可靠骨干的军队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农民对土地自发的普遍渴望的情绪所包围，军心涣散，不可能成为法律和秩序的支柱。立法机构和在居民眼中已失去威信的知识分子反对派们将无力阻止被他们所掀起的已扩展开来的人民浪潮。俄国将陷入没有任何出路和希望的无政府状态。”（奥尔登堡 C.，同上，第 517 页）

国家委员会委员 И. H. 杜尔诺沃实际上在其预测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搞错。他可能不知道某些具体情况，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了残酷的前景。

对他的分析我们再补充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即便在 21 世纪也有重要意义。

1911 年夏天，温斯顿·丘吉尔成了英国海军的领导者。在这项任命之前发生了一场国际危机：1911 年 7 月 1 日，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阿里热季拉斯）出现了德国“潘杰拉号”炮舰，目的是收集法国非洲殖民地的情报并宣告柏林在觊觎“阳光之地”。法国，接着是英国将德国水兵的停靠理解为挑衅。有几周时间，欧洲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中。然后，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德国似乎作出了让步。

领导海军部后，丘吉尔做出了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他认为德国的挑衅不是儿戏，并承诺将利用一切机会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作为准备工作之一，英国舰队用石油取代煤炭用作燃料。

但是，煤炭就在附近，在威尔士，而石油却在近东，在波斯。既然选择了追求工艺先进这个决策，就要承担战略风险，因为失去对油田控制的威胁变成一种完全的现实：德国在加强海军实力。

不过，英国人没有害怕。船舶的锅炉改用重油，将战舰的速度提高了整整四节，这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技术文明、碳氢化合物的时代及为能源安全和全球资源而战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解释自己的决策时，丘吉尔说：“争霸就是这一举措的价值所在。”（耶金 Д.，《战利品——争夺石油、金钱和权力斗争的世界史》，莫斯科，1999 年，第 15 页）

“争霸”，正是这个词有助于弄清现象的本质。多亏了它，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捍卫国家利益时，其余的一切均应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包括自由贸易和民主原则。基于这样的考虑，英国人宁愿用他们拥有 51% 股份的本国的“英国-波斯公司”为供应商，而不用荷兰人亨利·德特丁管理的英国-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伦敦认为，在战争时期外国人或许并不可靠（我们要指出，1935 年，德特丁成为希特勒的崇拜者，这让英国人感到震惊）。

在丘吉尔做出这一决策之后，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随着德国在地中海、巴尔干和近东的每一步推进，伦敦的人们越来越紧张起来。

德国计划在波斯，也就是英国军事能源的核心之地兴建铁路的决定，将大不列颠

和德国的对立带到了命运攸关的边缘，而德国人进入地中海后(通过塞尔维亚)就提出了近东海路的控制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种情况将会重现)。

这种对抗是否侵害了俄国最重要的利益？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没有。

因此，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在叙述此事时，既然已经不能制止尼古拉二世及其统治精英所犯的灾难性错误，至少可以问一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

杜尔诺沃的呈报，总理大臣科科夫佐夫和维特的立场，皇后亲信格里戈里·拉斯普廷的观点——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地表明，大部分精英都知道战争将以什么而告终。

遗憾的是，军人和一些工业家的看法，首先是与军火采购相关的圣彼得堡工业家的看法让尼古拉二世觉得更有说服力。

我们要指出，杜尔诺沃的上书于 1922 年发表在苏联杂志《红色处女地》上，无疑，斯大林是知道此事的。看来，20 世纪 30 年代，在与英国和法国就反对德国进行谈判时，他可能记起了杜尔诺沃的一句话——“击溃德国防线的使命将落到我们的身上”。

但是，此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很远，斯大林还在北极圈内的库列伊卡村经受着严寒之苦，而帝国似乎仍牢不可破。

重要的是：“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对于革命(在整个东欧)应该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但是弗朗茨·约瑟夫和尼古拉沙(尼古拉二世的卑称——译注)不大可能带给我们这种满足。”这当然不是杜尔诺沃的话，这是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1913 年初)中所言，他把即将到来的战争看作是革命的巨大推动力。

的确，为了使这个推动力运转起来，需要把革命和德国军队联合起来，给予俄国政府决定性的一击。从传统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背叛。但是，请回忆一下 1905 年革命及其与日本利益事实上的结合。我们要提醒的是这样一种情绪，即类似于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赞成恐怖行动的情绪。

杜尔诺沃在其上书中没有使用必要的术语，而称之为“社会特别神经过敏”的东西，就是灾难性分裂的引线。需要把反对国家的力量集中到一点上，这样国内的混乱就能推翻国家制度。而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的正是当局自己。



因为这意味着希望反动德国获胜。

而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则完全持无条件的爱国立场。

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国家中，社会民主党人的声音暂时被淹没了。

当局错就错在把这种热情当成某种持续的、不再受到国内矛盾约束的东西。

从1909年到1913年，俄国在军事建设的“伟大规划”框架下积极地重新武装起来，军事开支为40亿卢布。与德国的96个师相比，俄国有114个师。

1914年8月，英国第一任海军大臣丘吉尔直截了当地说：“俄国是不可战胜的。”如此高度评价俄国军事潜力的还有英、法两国的将军和政治家们。但是，这种评价是自我欺骗的结果，因为俄国能够对抗协约国的只有它的陆军。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没有估计到，为了盟国的胜利俄国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根据一般战略原则，在战争初期，俄国统帅部应当从边界撤走自己的军队，以便顺利完成动员工作。但与之相反，应法国直接打击德国主要力量的请求，俄国统帅部采取了向东普鲁士强力推进的行动，最终目标是夺取柏林。德国人开始撤退，柏林开始惊慌失措。然而，俄军未能快速获胜。

德国总参谋部把兴登堡将军和鲁登道夫将军派往最困难的地区。他们利用发达的铁路线，调动主力部队对抗从西南方向攻来的A. B. 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第二军团。同时，德国人很快弄清了俄国人的计划，因为俄国人的所有消息都是直接用文字通过无线电发送的，均未加密。

第二军团被击溃。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萨姆索诺夫18岁时作为旗手参加了解放保加利亚的俄土战争，日俄战争时成为将军，他的人生旅程如同在神灯中显现的未对工业化战争做好准备的俄国士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所有交战各方都对新时期感到措手不及，他们预计的只是两个星期类似骑兵攻击的战役，而绝不是延续四年的煎熬。

顺便提一下，国内战争未来的主人公之一彼得·弗兰格尔参加了东普鲁士战役：作为骑兵，他在卡乌申村附近的战役中因直接进攻德国炮台而声名显赫。炮台被攻占。除弗兰格尔之外，所有的俄国军官都阵亡了。他被授予乔治十字勋章，而阵亡的官兵未被授勋。

至于萨姆索诺夫将军，他为了避免被俘，开枪自杀了。

然而，无论是萨姆索诺夫，还是弗兰格尔，或是不为我们所知的阵亡将士们都不知道，他们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以牺牲为代价，从巴黎吸引开德国人的两个军团和一个师（占德军兵力的五分之一），使得德国在马恩河战役中未能获胜。

8月31日，英国陆军大臣基奇纳电告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弗伦奇：“32个德军

但问题不在于傲慢(或不仅仅在于傲慢)。从拜占庭时期以来,罗斯,而后是俄国,与巴尔干和近东,是以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为纽带的。它被认为是各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的庇护者。

尽管俄国的哲学思想(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对俄国外交政策的斯拉夫主义持完全批评的态度,认为这种外交政策对各南斯拉夫国家和各西斯拉夫国家的忠诚的判断是不现实的,但彼得堡官方和尼古拉二世本人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塞尔维亚。

就本质而言,每当俄国遵循不切实际的政策时,就会局部地再现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土战争(1877—1878年)的情景(正如俄土战争英雄斯科别列夫将军所言,俄国,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只因出于怜悯而打仗的国家)。

尼古拉二世不想打仗。但他该怎样回答塞尔维亚摄政王亚历山大王子7月1日发来的下述电报:“我们不能自卫。因此,恳请陛下尽快给予我们援助……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一呼吁定会在您高贵的斯拉夫心灵中得到回应。”

7月14日,尼古拉这样回复道:“目前只要有能够避免流血的一丝希望,我们就应该尽一切力量朝这个目标努力。如果违背了我们真诚的希望,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陛下尽可放心,在任何情况下俄国都不会对塞尔维亚的命运无动于衷。”

在贝尔格莱德收到这份电报的当天,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了。

这时,俄国除了宣布战争动员,已别无选择。紧接着,德国也宣布了动员,而在按照作战计划进行动员之后,所做的就应该是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所以德国立刻对俄国宣战。

俄国社会对这场战争感到鼓舞。大批群众走上彼得堡街头。当尼古拉二世来到阳台上时,人们在冬宫前面的广场上跪下来,所有人都唱起了国歌。

在国家杜马的特别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对战争进行拨款。

惊人的一幕发生在塔夫里达宫杜马的会议厅里。在尼古拉二世发表讲话后,所有的议员都起立呼喊道:“请带领我们,陛下!”一直沉着镇定的皇帝对此感到吃惊。

虽然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弃权票,但劳动派(A. Ф. 克伦斯基)做出了这样的保留声明:“我们相信,在战场上,在巨大的痛苦中,俄国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将得到加强,并将产生使国家摆脱可怕的内部束缚的统一意志。”(奥尔登堡 C., 同上,第 536 页)

也就是说,尽管出现了普遍的爱国主义热潮,但现存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变得不易察觉。假如沙皇政权能与自由派政治精英进行对话的话,这些矛盾就可以得到抑制;如果不进行对话的话,它们就会再次爆发出来。

而暂时还很少有人能够听到来自克拉科夫的列宁的呼声:“从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体及其军队的战败将是最小的灾难。”甚至他的战友们也不这么认为。托洛茨基在侨报《我们的言论报》中写道,绝不应该希望俄国战败,

第八章

世界大战开始

世界大战开始、尼古拉二世高尚的情感不合时宜、A. B. 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第二军团做出牺牲、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赞成帝国失败、德国领导层决定从内部瓦解俄国

6月28日(新历),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大学生加夫里拉·普林西普枪杀。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么贝尔格莱德完全服从维也纳;要么就向塞尔维亚宣战,如果遭到拒绝的话。

“这是一场欧洲战争。”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一看到奥匈照会的文本就这样说道。

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写道:

“罪恶的傲慢葬送了俄国。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应该卷入与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工业国的战争。俄国曾经有机会避免与德国发生致命的冲突。俄国的政治利益与欧洲中部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将来有一天,俄国能够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使其开放海峡,但就其自己的意愿,它本不该去挑起与欧洲经济巨人的战争,而与这个巨人的联系对俄国的现代化是极其重要的。”(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第43页)

梯队昨天从西线向东线调动以迎击俄军。”

根据德国的计划，战争将在第 39 天获得胜利。多亏了俄国，这一情况并未发生。不久后发生的是所谓的“马恩河畔的奇迹”。

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俄国精锐部队的覆灭，成了未来巨大困难的先兆。高昂的民族情绪很快熄灭，现在所需要的是整个国家长期紧张地动员力量。

到 1914 年底就已经清楚，尽管俄国人对奥地利军队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争的代价非常高昂。最初几周的狂热已经消退，旧的社会分裂的鸿沟再次显现出来。

11 月 4 日，警察在奥泽尔基逮捕了五位国家杜马议员（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编辑 Л. Б. 罗森菲尔德（加米涅夫）和其他几个人。

他们是来参加党的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通过了给大学生的呼吁书：

泛斯拉夫主义和从德、奥统治下将各国人民解放出来，以及用俄国的皮鞭来征服他们的宏愿明显是卑鄙和丑恶的……

必须组织群众，发动他们起来进行革命。时不我待。这一天已经临近。请想一想，俄日战争之后发生了什么。

1915 年 2 月 10 日，所有被捕者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在那里他们很快就与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良组成团体。但在法庭上，这些被捕者担心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试图否认自己的失败主义行为（失败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促使本国政府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译注）。

我们要重申的是：布尔什维克中的失败主义者是一个小团体，尚未能危及国家秩序。但在 5 月，当俄军撤出秋天占领的奥地利普热梅希尔要塞时，爱国热情受到伤害，莫斯科爆发了巨大的骚乱。5 月 27 日，一群一群的普通群众开始在制造厂、加工厂和商店里，检查是否有德国或奥地利公民，开始对德国人进行大规模洗劫和掠夺。受害者中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甚至还有俄国人。大洗劫造成的损失约为 4000 万卢布。

人民的愤怒是对当局自发的警告。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更严重、有组织的警告。在工商业人士代表大会上，企业家们要求政府改组，并组织了军事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从事解决战争之需的自愿动员工作。公开支持政治改革的十月党领导人 А. И. 古契科夫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6 月 6 日，召开了立宪民主党人代表会议。会上同样弥漫着一种受到伤害的爱国主义情绪。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紧急召集国家杜马会议，并成立能够得到公众信任的政府。



可以在党的领导层里上升到列宁亲信的地位。

他们所有的人,甚至列宁都不相信革命即将到来,所以他们只是一些穷困潦倒的思想斗士。

但战争不仅使这些怀有过渡性“失败主义”心态的斗士们走到了第一线,而且还使较为现实的人们走到了第一线。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在得到相应支持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反对整个俄罗斯帝国的秘密武器。

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可能有益于德国。

德国总理大臣贝特曼-霍尔维格曾说过“必要性不管什么法律”,这句话完美地解释了德国外交所展开的加速俄国社会动荡的行动。

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这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怀疑。即使是拿破仑在入侵俄国的紧要关头,也没有去唆使俄国农民进行暴动。

但是,德国处于最困难的状态,军事上的胜利已经一去不复返。东方战线指挥官兴登堡消灭俄军的计划落空,只是迫使俄国军队后退了。德国人处于巨大的包围圈中,战争一天天打下去,它的资源快要耗尽。他们明白,自己在战场上获胜的机会非常渺茫了。

最初,德国试图说服俄国进行单独和谈,向俄国提出各种方案,甚至包括转让海峡给俄国及保持俄国对波兰的控制。

假如俄国同意这些建议,它能够恢复到战前的状况。

再假设下去就不难猜到,接下来的就会先是法国,然后是英国的战败。最终结果是俄国将再次与德国一对一地打仗。

不过,尼古拉二世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没有响应德国的数次尝试。此后,柏林经过长时间犹豫,决定从内部瓦解俄国,将其分裂为几个小国。

这时亚历山大·吉尔方特登上历史舞台,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出生于不太富裕的犹太家庭,曾在瑞士学习经济,是1905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托洛茨基的副手。他以帕尔乌斯博士为人所知,曾向德国人提出破坏俄国稳定的方案。

帕尔乌斯的名字常常是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列宁的“失败主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的颠覆活动连在了一起。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应该称威廉二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实际上,这是具有不同终极目标的完全不同的活动,在1918年德国革命时打击了威廉二世。

俄国出生的吉尔方特,是巴塞尔大学毕业生。他是一个崭露头角、精明强干的人,具有强烈的冒险主义倾向。他比列宁年长三岁,成名更早,是以借革命之名做买

“齐美尔瓦尔得”成为立即停战决议的代名词，传遍了整个欧洲，也传到了俄国，并给工人群众和自由派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沙皇政权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这给金融和工业界带来了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不能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反对政府当局，而对“巨大震动”的预感又不容许他们冷静地对待即将到来的灾难。

例如，军队供应特别会议委员、工业家 A. И. 普梯洛夫在 1915 年夏季就预言了革命不可避免：“军事上的失败、彼得格勒的饥荒或罢工、莫斯科的暴动或是宫廷丑闻都将成为革命的理由。革命将是极具破坏力的，因为在俄国，受过教育的阶层只占居民中的极少数。这个阶层缺乏组织和政治经验，而主要的是，未能与人民建立可靠的联系。俄国资产阶级通过普梯洛夫之口断言，沙皇制度最大的罪行在于，除了官僚主义机构，它没有建立另外的政治生活中心。政治制度如此依赖于官僚机构，以至总有一天，当官员们的权力减弱时，俄罗斯整个国家就将分崩离析。荒谬之处在于，发出革命信号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拯救俄国。但是，俄国将立即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工人革命，而不要多久就将变为农民革命。将开始长达数十年的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第 219 页）

这些思想可以认为是 П. Н. 杜尔诺沃“上书”的延续。它表明，在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人中，有关国家变革的思想正在成熟。要知道，从意识到威胁，到消除威胁办法的制定之路，并不是遥不可及。

此时，在帝国的边疆，几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被排斥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之外，被禁锢于他们的流放生活之中。斯大林、加米涅夫、斯潘达良、斯维尔德洛夫四位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些国家杜马议员及部分地方领导人（包括 Ф. 戈洛谢金，他是未来杀害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成员的参与者），这是一支庞大的、潜在的革命干部队伍，他们似乎静静地生活在这条雄伟的北方河流的两岸。不过，即使在这里，他们仍在为不久前的审判过程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那场审判中，议员党团，特别是加米涅夫宣布自己不赞同“失败主义”。身处瑞士的列宁强烈谴责这种做法是背弃信仰，并在报刊上宣称加米涅夫的行为“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相称”。

但是，流放中的布尔什维克们在争辩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总体上赞同了党团在审判中的行为。斯大林也没有谴责自己的同志们。

对此，托洛茨基指出：“他（斯大林）更多的是从军事技巧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评价加米涅夫在审判中的策略的。”

斯大林对“失败主义”的克制态度对他其后的前程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影响，而且这个图鲁汉斯克流放者在此时此刻怎么可能去梦想什么前程呢！

他更可能的结局是死于肺结核（如同不久后去世的苏伦·斯潘达良），或是掉入河中溺水身亡，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从流放地返回，在异乡四处漂泊，没有任何机会



这意味着,现有政府未获得这样的信任,已经因对外战争而趋于平息的国内矛盾再次成为当务之急。

换言之,立宪民主派要求(尽管不是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尼古拉二世的政府接受社会监督。

6月19日,在莫斯科的地方自治联盟和城市联盟代表大会上,Г. Е. 李沃夫公爵对现行体制给予了致命的抨击:“俄国所面临的任务远不是我们的官僚机构所能胜任的。战争开始十个月了,我们还没有动员起来。”(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第219页)

军队在慢慢退却,而在政治精英(反对派精英)中,一种信念在趋于成熟:正是在战争时期可以完成战前不可能进行的改革。

尼古拉二世让几位大臣辞职,其中包括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他因在武器弹药供应上的严重失误而名声扫地。

在7月19日开幕的国家杜马会议上,抨击的情绪更为激烈,并且几乎毫无阻碍地被刊载在了报纸上。

战争初期出现的国内和平结束了。

为了把俄国牵制在对协约国的战争中,1915年3月20日,英国政府与俄国政府签署了秘密协议。英国人确认俄国对君士坦丁堡、波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一半领土的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在彼得格勒,人们并没有想过,国家是否有能力“消化”并掌控住满伊斯兰教徒的新的属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看来,圣索菲亚大教堂圆顶的闪光让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大臣们眼花缭乱了。国家的内政和外交追求之间的不协调变得极为尖锐。

同时,在国家管理上形成了双重政权:最高统帅部和政府——将军和文职当局。

军官和文官不能相互理解。米亚索耶多夫上校案件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米亚索耶多夫是苏霍姆利诺夫大臣身边的人,因涉嫌背叛,实际是由于和苏霍姆利诺夫的亲近关系,而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作为叛徒被绞死。总之,叛国指控已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武器,而这一武器最终伤及了沙皇的家族。

1915全年,军事失利席卷了俄国15%的领土和30%的工业,难民人数高达一千万。道路上和城市里挤满了这些惶恐不安、怒气冲天的不幸人群。与对俄国局势的普遍悲观情绪遥相呼应,8月23日(旧历),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村召开了来自10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并宣布无产阶级的目的是立即停战。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参加会议的是列宁和季诺维耶夫,《我们的言论报》小组的代表是托洛茨基。

列宁还提出另一项议案:将数百万工人武装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夺取政权。但此提案并未得到与会各党的支持。

卖起家而载入史册的。大学毕业后，他移居德国，加入社会民主党，给卡尔·考茨基出版的杂志供稿。然后成为《撒克逊工人报》的主编，他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的好评。列宁也高度评价了吉尔方特的评论活动。想必，这些评价是公正的。吉尔方特的著作（以笔名帕尔乌斯出版）《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得到列宁的赞许，列宁在自己的书评中竭力建议所有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人关注这本书。

后来，吉尔方特成为《火星报》的撰稿人。1904年，他发表了题为《战争与革命》的系列文章，预言了一些对当时来说令人诧异的事情：日本战胜俄国，随之而来的是俄国革命，这场革命将动摇资本主义国家的根基，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

1905年，吉尔方特来到俄国并成为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我们看来，正是他向贷款给俄国的西方国家提出了警告，说它们资助俄罗斯帝国政府，是在拿他们的资金去冒巨大的风险。

在内务大臣 П. H. 杜尔诺沃采取了果断行动之后，委员会的成员们被捕，并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帕尔乌斯得以从半路逃跑，返回德国。这些事件成为他《革命时期的监狱生活——西伯利亚逃亡》一书的素材。

这时他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作为 A. M. 高尔基的文学代理人，他在德国收到话剧《在底层》的一笔巨额稿费（约十三万马克），其中四分之三根据合同应该转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于解困。但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看到这笔钱。帕尔乌斯将这笔钱挥霍一空。此番诈骗之后，他无论在俄国人中，还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都不再受欢迎。仲裁庭（K. 考茨基、A. 倍倍尔、K. 蔡特金）从道德上判处了他的死刑。

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来到君士坦丁堡，德国的利益已开始在那里得到积极巩固，在那里出现了寻找好运的机会。1911年，帕尔乌斯甚至成为德国总参谋部的代理人，并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做了几笔把粮食从俄国卖到土耳其的交易。此外，他还把在德国已经过时的武器走私到巴尔干地区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帕尔乌斯已经与德国军人和商人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了。由此，到产生利用俄国内部动荡为自己合伙人谋利的想法只有一步之遥了。

帕尔乌斯想出了如何把革命做成生意。

1915年初，他会见了德国驻土耳其大使瓦戈恩海姆，向他陈述了借助俄国社会民主党摧毁沙皇制度并将俄国分解为若干小国的方案。

帕尔乌斯建议“买下俄国革命股份的控股权”。德国人还从来不曾有机会与一个这样的俄国政治组织结成盟友，这个组织有分布各地的人员网络，有强大的思想基础，甚至在议会中还有议员党团。现在，提出这项建议的商人是个参加过社会民主运动并拥有威信的人，而且还是德国商人和军人的合作伙伴。



德国对这项建议非常重视。1915年1月10日,德国外交事务大臣冯·雅戈夫同意接见吉尔方特。他们在2月底进行了会晤。

3月9日,吉尔方特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自己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点子是:

将俄国各分裂主义党派(芬兰、立陶宛、波兰、犹太的崩得、高加索、乌克兰)的力量联合起来。

使最大的工业中心革命化,此外要将重点放在使少数民族边陲,首先是使乌克兰从帝国分裂出去。

接着,帕尔乌斯建议策动在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和所有铁路沿线进行政治罢工,对铁路桥梁实施破坏,在巴库的油井组织纵火,组织出版宣传书刊和报纸,在北美的侨民、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中进行反对俄国的宣传。

吉尔方特提醒说,有别于乌克兰或是芬兰的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从来都不会起来反对俄罗斯帝国”。换句话说,吉尔方特警告说,俄罗斯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并建议首先把重点放在推翻政府和签订和约上,然后才是摧毁帝国。

与雅戈夫会晤后,国家机器运转起来,拨出了必要的款项。吉尔方特申请了两千万马克,作为启动资金先给他划拨了一百万,余款陆续支拨。到1915年底已经划拨了四千万马克。谈到在俄国革命中德国提供的资金时,应该指出,柏林为所谓的“和平宣传”花费了约3.82亿马克,而在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要比在俄国花得更多。

这时,吉尔方特力图把列宁拉到自己一边,但他的所有努力全部落空。

1915年5月底,吉尔方特在伯尔尼一个俄国侨民经常光顾的餐厅找到列宁。吉尔方特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德国胜利后,俄国才有发动革命的可能性。

列宁相当粗暴地打断了谈话,宣称,他认为对话者是已成为沙文主义者的德国社会党人的代理人,不再想与吉尔方特交谈。

然而,吉尔方特并未收手。他在哥本哈根组织了“战争原因和后果研究所”,并吸引很多社会民主党人(Я. С. 弗尔斯滕堡,即加涅茨基、Г. И. 丘德诺夫斯基、А. Г. 祖拉博夫、М. С. 乌里茨基)为其撰稿。

正是加涅茨基接受了吉尔方特微妙的委托。总之,他负责实施众多秘密金融交易,其中包括在20世纪20年代出售皇室珠宝制品。而在1915年,吉尔方特从德国财政部获得500万马克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特别许可证,并通过加涅茨基与俄国进行非法贸易。

吉尔方特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其贸易活动遍及荷兰、土耳其、英国、北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但主要交易还是在俄国:向俄国提供了机床、化学制品、药品、外科手术器械,从俄国向德国运去粮食、铜、锡。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贸易是在德国全面贸易封锁和俄国半封锁的条件下进

行的(通过黑海和西部边境的传统商路被中断)。

所以,吉尔方特的冒险主义靠的既是德国的,也是俄国的实际需求,他所创建的走私网络持续不断地带来了利润。

与此同时,俄国政府成立了限供会——限制敌方供应和贸易委员会(隶属工商部)的活动。领导限供会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彼得·司徒卢威。限供会获取的情报表明,德国的经济状况是极其艰难的。英国情报机关间谍头子塞缪尔·霍尔在评价限供会的工作时说:“如果不是这群俄国知识分子,封锁圈就会瓦解,尽管从南边和西边进行了牢牢的封锁,但这两个‘中央大国’仍可以通过北方和东方的缺口将走私坚持下去。”(派普斯 P.,《司徒卢威——右翼自由主义者》,莫斯科,2001年,第283页)

从俄国两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对立中能清楚地看到的,首先是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只要尼古拉二世的政府还可以得到社会中受过教育的那部分群体的支持,它就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列宁,还是斯大林都不能成功地实现“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这一联系中,我们提及了吉尔方特和司徒卢威的名字,这里所指的是,前者的毁灭性的想法可能只是纯粹的乌托邦空谈。

还要举出这一联系中的另一个情况:1937年11月26日,加涅茨基作为“德国间谍和托洛茨基分子”被枪决。这时,斯大林预料到会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清洗了政治阶层的各个系统,因为他担心“失败主义”会旧病复发,同时也清洗掉了所有与“德国资金”有关联的人。

第九章

将军们建议尼古拉二世实施独裁

将军们建议尼古拉二世实施独裁、
英国人的阴谋、拉斯普廷被杀、二月革命

帝国还有两年寿命。但在 1915 年，它的覆灭尚不明确，还未走到致命的岔路口。也许，斯大林在库列伊卡干了什么，不管是德国外交部将单独媾和强加于俄国，还是从内部将其瓦解的企图，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

俄国遵循自己的命运之路，即将面临自己议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1915 年 8 月，根据杜马和国务委员会温和派的倡议，成立了所谓的议会进步联盟。它的纲领不是反政府的，而是包括下述主要内容：

严格遵守治国法律；

取消与军事行动无关的问题上的双重政权；

改变地方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

制定旨在维护国内安定，消除民族和阶级间纠纷的合理的、持续的政策。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部分特赦政治犯，将流放者按行政区域遣返。完全允许不同宗教信仰的存在。解决俄、波问题。着手废除对犹太人的限制。对芬兰实施怀柔政策。恢复工会的活动。与立法机构协调，实施农民和其他阶层的权利平等。实行乡一级的地方自治。

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顿河区和高加索成立地方自治机关。变更 1890 年的地方自治条例和 1892 年的城市条例。(古尔科 B., 同上, 第 687 页)

事实上, 国家杜马和国务委员会(后者中多人是前任大臣)的委员们建议进一步(在 1905 年 10 月 17 日“宣言”公布之后)加强社会中有文化修养的那部分群体与政府的联系。

依靠什么来加强呢? 依靠把部分责任转移给社会。

因此, 作为帝国唯一支柱的国家官僚机构必须做出选择。

君主制显然已经无法进行管理, 从“联盟”的提议中得出的正是这样的结论。

六个杜马中的党团, 420 名议员中约 300 人加入了“联盟”, 加入“联盟”的还有国务委员会委员中的三个派别(左派、中间派、无党派)。

不过, 当局对待这一建议是非常谨慎的。在皇村, 毫不怀疑的是, 建议所谈的是要把国家管理转交他人之手。正如尼古拉二世王朝史的作者所指出的: “绝不可能去真正指望, 从流放中返回的加米涅夫们和斯大林们会出于感激而突然采取爱国主义立场。”(奥尔登堡 C., 同上, 第 564 页)

作为回应, 尼古拉二世在最高统帅部召开大臣会议。在会上他宣称, 将竭尽全力实现战争的胜利, 但不允许在战时进行政治斗争。他解除了一些“倾向与联盟妥协”的大臣的职务, 其中包括斯托雷平最亲密的战友 A. B. 克里沃舍因。

不过, 尼古拉二世是不彻底的: 原本应该解散已经成为反政府中心的国家杜马(从其逻辑推断), 却保留了它。例如, 在 1914 年至 1917 年间, 奥匈帝国国会没有开过会, 而在英国一切罢工都被禁止。

随着战争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拖延下去, 反对的情绪先从杜马, 然后通过军事工业委员会庞大的结构网络以及有着数十万工人、八千个地方组织的全国地方自治联盟, 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反对情绪也影响到了军官们。

然而, 这种以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为支撑的反对派, 成分各异, 也不团结。分裂主要发生在彼得堡金融工业集团和莫斯科工业集团之间。前者的利益与当权的官僚和外国资本的利益紧密相联, 后者则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格曼-戈卢特维纳 O., 《俄国政治精英: 历史进化的里程碑》, 莫斯科, 2006 年, 第 220 页)。莫斯科人没有获得生产军用物资的必要许可, 与此相反, 彼得堡人却依靠这些订单, 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潜力。先都(指先于彼得堡成为国都的莫斯科——译注)的“精英人士”以及与他们类似的其他外省的资产阶级对政府厚此薄彼的态度十分反感, 这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即便如此, 尼古拉二世的政府还是成功地重建了国家的经济。

如果把 1913 年的经济生产总值作为 100% 的基数, 那么此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情



况如下：

1914年——101.2%，1915年——113.7%，1916年——121.5%，1917年——77.3%（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第 250 页）。

在大炮生产数量上俄国已经超过了法国和英国。大量的卡车、飞机（每月 222 架）、电话开始运往前线。

俄国显示出惊人的实力，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的：“1916 年，一个新的俄国开始出现。”剩下的事就是证明它的生命力，以及圣彼得堡核心人士能否把自己的利益与外省资产阶级和处于底层的平民罗斯的利益协调起来。

此时，前线的局势得以稳定，俄军发起了强大的军事进攻（“布鲁西洛夫突破”），并占领了土耳其所属的亚美尼亚地区。

帝国在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住了。

但是，伴随着民众对战争厌倦的加深，政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却把国家推向了深渊。

为了加强国内秩序，皇帝有可能依靠具有原则区别的另一类治国理念，以军事独裁把军事化的经济与外界隔绝开来。

1916 年 6 月 15 日，俄军参谋长、侍从将官 M. B. 阿列克谢耶夫向尼古拉二世呈交报告，建议实行军事独裁。

为了避免日益临近的、有可能给我们军队和国家带来无法挽救灾难的巨大危机，应当毫不犹豫地立即采取以下特别措施，以确保我们具有采取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的自由。

1. 如同在作战地区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最高统帅一样，在帝国内部所有地区，包括提供军需的大后方，权力也应该集中到一个全权人物的手中，这个全权人物可以称之为最高国务防卫大臣。

必须授予这个获得皇帝陛下高度信任和特命全权的人如下职能：以统一的意志团结、领导和指挥所有部、国家和社会机构在战区之外的行动，使得这些行动能够充分、完全为陛下的军队服务，以获得彻底胜利，并将敌人驱逐出俄国边界。

帝国的所有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以及各部门官员和所有居民，无一例外，必须像执行皇帝陛下的圣旨一样，执行陛下所选中的这位最高国务防卫大臣的命令。

最高国务防卫大臣应该绝对和直接听命于皇帝陛下，其指令和行动只对陛下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当有必要时，可以直接面见陛下；除了皇帝陛下，没有人

可以给他下达命令,也不能要求他向其作出汇报。应授予他有权挑选和委任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对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为自己的工作人员。

2. 对国内的交通运输系统进行整顿,首先要克服一切障碍,立即安排将工人需要的燃料、物资和食品运往那些为国防服务的工厂。

3. 最大规模地组织我国的煤炭和其他类型燃料的开采,以及为国防工作的工厂所必需的金属的开采;首先应立即恢复并大力发展顿涅茨克地区煤炭的开采和金属的生产。

4. 制定并刻不容缓地对我国为国防工作的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

还要立即在这些工厂开设国营商店,保证在整个战争期间向它们提供必需的粮食储备和生活必需品,并以最低价格发放给这类工厂的工人和职员……

7. 在为国防工作的工厂,尤其是在开采燃料和金属的工厂,大规模地使用那些无需服兵役的俄国各族的劳动力,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使用东方民族的劳动力:中国人、日本人、波斯人等。

8. 对于被征召入伍的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人,应让其在国防工业工厂以及在矿井和矿山服兵役,而且应授予那些还只有低级军衔的专业军士高级军事技术人员的称号,薪水应相当于作战部队准尉的级别。要让被征召入伍的各类技师和专家返回国防工厂工作,在需要时凭证明就可返回。今后对接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人才或是对国防工业工厂不可缺少的技师、专家的应征服役,必须经过第一条提及之人(最高国务防卫大臣)的同意……(在此处的页边,尼古拉二世用铅笔批注:“也包括一些对农业生产熟悉的同样必不可少的人员,因为这些人对军队的利益和需求起着保证作用。”)

侍从将官阿列克谢耶夫。1916年6月15日,沙皇最高统帅部。(引自:《尼古拉二世私人档案中的日记和文件》,莫斯科,2003年,第340—342页)

对尼古拉二世来说,像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这样的军队的实际作战领导人的意见应是大混乱即将来临的最后信号。将军们竟然要来干预国家管理事务!

如果皇帝拒绝接受温和的自由进步联盟的建议,那么在军人看来,就要另行其事了。

尽管政治局势和经济情况有着根本性差异,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报告很快将在另一种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付诸实施。从阿列克谢耶夫报告的字里行间已经显露出斯大林的俄国的形象。

在这里,我们来勾勒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中一个令人惊异的片段。柯巴来到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时,在那里发现了不久前去世的流放者 И. Ф. 杜勃洛文斯基



的藏书,他就把这些书拿到了自己住的库列伊卡村。其他流放者对此非常生气,他们认为杜勃洛文斯基的这些书是公共财产。

斯大林传记中的这一事实被人们解释成是这位未来独裁者性格的负面特征,这也许是有一定根据的。

但也有可能是这样:藏书实际上已无人管理,而且有些书大概由于被居民变卖而散失。看到这一情况,斯大林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己来收藏、管理这些图书。

当更加坚定的权力觊觎者尚未出现前,尼古拉二世从参谋长的报告中看到的应该是为使国有经济免于崩溃而提出的激进建议。但尼古拉二世没有按阿列克谢耶夫的报告采取任何措施。

皇帝的这种犹豫不定,即后来被许多历史学家误认为的优柔寡断,导致当局与社会中知识阶层的对立达到了极限。在革命前夕,尼古拉二世仍然认为,人民应该恢复对沙皇的信任,就像人民还处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甚或是伊万三世时期那样。

事实上,君主制度已经临近末日。现在可以把格里戈里·拉斯普廷看成是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他对患有如同绝症血友病的继承人阿列克谢给予了实际的“治疗”,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政治家和实业家,以及与德国单独媾和的拥护者。所以,他的被杀可以视为对国家管理制度公开抗议的开始。

正如一系列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根本没有参与一开始的变革。变革具有统治精英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性质。

1916年12月17日夜,格里戈里·拉斯普廷在Ф.Ф.尤苏波夫公爵家中被杀,尤苏波夫是尼古拉二世的侄女婿。直到2004年才知道,尤苏波夫与英国情报机关驻俄国的间谍头子塞缪尔·霍尔关系密切,英国间谍直接参与了这次暗杀事件,此事曾被英国电视台拍成电影(BBC,2004年)。

英国驻俄国大使Д.布坎南1916年10月18日的报告称,“德国的影响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布坎南Д.,《外交官回忆录》,莫斯科,2001年,第202页)。当然,大使没有谈及组织了谋杀拉斯普廷的霍尔,只是简单地说:“拉斯普廷的地位似乎是不可接近的。他的死有些让人出乎意料,12月30日(新历),彼得格勒因他被杀的消息而动荡不安。”(布坎南Д.,同上,第210页)

也许,布坎南无法控制霍尔的行动,因为他接下来这样写道:“杀死拉斯普廷虽然是出自爱国的动机,但这注定是一个错误。”对大使的这一推论我们不加评论。

现代研究者认为:“谋杀长老的是一名职业杀手,是间谍机关(指英国情报机构——作者注)的工作人员。所有参与暗杀的人都知道他,但没有人敢提到他的名字。”(希什金O.,《谋杀拉斯普廷》,莫斯科,2000年,第149页)

在大使的回忆录中,还有一处重要的指证,即他与尼古拉二世在新年招待会上的

谈话：“因为我听说，陛下怀疑一个年轻的英国人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的中学同学参与了谋杀拉斯普廷，我借此机会要为他担保，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布坎南Ⅱ，同上，第 222 页）

塞缪尔·霍尔就是那个与尤苏波夫在牛津一起学习过的英国人。

布坎南并不知道，尼古拉二世比他想象的更为消息灵通。俄国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破译了英国外交邮政通信的密码。

所以，皇帝坚信，盟国监视着他的行动。

此外，他也显然知道，在他身边的人中，包括参谋长阿列谢耶夫将军在内，早就在酝酿撇开他这个皇帝而对国家实施管理的种种计划，军事独裁就是其中的方案之一。不管怎样，在 1918 年沙皇一家被枪决之后，发现了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记事本，在这个本子上记录有用英国大使馆密码书写的俄国将军和政治家们的姓氏。

因此，当拉斯普廷被杀之后，为维持自己的权力，尼古拉二世能够做的事也只有逮捕数十名高级将领，解散杜马，甚至处死几个阴谋家。

拉斯普廷被杀后，尼古拉二世终于认识到，背叛包围着他，于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来限制反对自己的人的发展机会。

在准备采取的措施中，包括把第一骑兵近卫师调到首都，解散杜马等等。

许多资料表明，军人在准备发动政变。他们的一位代表曾预先告知英国大使馆。

然而，替代政变的是爆发了因粮食供应中断而引发的示威游行。这些游行本身对当局而言尚不可怕，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堡委员会加入了其中，并号召进行总罢工。在街道上出现了“打倒专制”、“打倒战争”的标语。有人被打死。帕夫洛夫团后备营的一个连突然向驱散人群的部队开火。第二天早晨，沃伦斯基团的后备营发动起义。这是一支被称为“圣彼得堡赛跑协会”的部队，他们不想去前线，由一大群不太好管理的青年人组成。继沃伦斯基团的士兵之后，已经安抚下来的帕夫洛夫团的士兵和立陶宛团的士兵也相继起义。

自发生事件充斥首都，其中只有两件是有组织的：瞬间出现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杜马。

拉斯普廷被杀后，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小组”遭到拘捕。士兵们从监狱里释放出这个“工人小组”之后，苏维埃就自动恢复了工作。

苏维埃和杜马代表了两种力量——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为一方，自由主义者为一方。

沙皇政权是否预见到会出现这种混乱？

正如进步联盟参与者之一 B. И. 古尔科所写：“士兵暴动几乎在所有的参战国均有发生。西方国家的政府预见到这一情况，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1915 年德



国水兵在基尔的起义被粉碎。1917年初在米兰爆发了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所组建的革命政府行使了6天的权力，但革命遭到军队的残酷镇压，有数千人被杀死。

为什么俄国政府不能如此果断地采取行动呢？

看来，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它没有可靠的执行者。甚至向首都调遣近卫骑兵都受到了阻挠。

由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主持的各战线指挥官就是不同意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表决，使这种既隐秘又明显的抗争达到了顶点。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其武装力量的指挥官们不愿意支持自己的总司令。

1917年3月2日，尼古拉二世在其日记中写道：“周围充斥着背叛、胆怯和欺骗。”

最后，“胜利在握”(У.丘吉尔语)的帝国垮台了，“被蠕虫吞噬了”。它从根基上崩离析。摧毁它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不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不是米留可夫，也不是列宁、斯大林。那些在战时着手用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的人，以及那些允许这样做的人，都已经无力回天。

因此，当谈及斯大林时，我们必须把俄国皇帝悲惨的命运看作是俄国未来主人公的一面镜子。背叛的是自己人，是大公和将军们；背叛的是高贵的知识分子、议员、企业家和银行家；背叛的是盟友……

当然，尼古拉二世是有平定国内动乱的可能性的。而他相信了杜马反对派的国务能力，这使他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多年之后，尽管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推崇为圣人，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仍然是罪不容恕的。也许，在刽子手准备射击的最后时刻，在叶卡捷琳堡伊帕季耶夫家的地下室里，他承受了可怕的道德折磨。

第十章

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党的临时领导人

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党的临时领导人、临时政府内的冲突、彼得·帕尔钦斯基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国家的崩溃：彼得的俄国反对平民的罗斯

斯大林在阿钦斯克(距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80 公里)得知了革命的消息,此前他和其他流放者一起,就是被运到这里等待应征入伍的。但是,由于左臂肘关节的旧伤,斯大林被认定不适合服役,因此他就留在阿钦斯克服满了即将结束的流放期限。

斯大林、马特维伊·穆拉诺夫和列夫·加米涅夫乘坐的火车在前往彼得格勒的途中,在很多小站都停靠。这几个被流放的人碰到了集会,听到了《马赛曲》,还有演讲。斯大林没有讲演过。“声望比他小得多的人又开始排挤他了。”托洛茨基对此是这样评价的。

3月12日(旧历),他们乘坐的火车抵达首都。列宁当时不在那里。总之,有声望的党的领导当时不在彼得格勒。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一群年轻人组成,他们是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彼得·扎卢茨基和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正是他们领导着党,此时参与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决定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命运。



这帮年轻人对更有经验同志的出现,表现出的态度并不友善。他们就是否吸纳斯大林加入俄国局一事做出了有辱其人格的决议:“关于斯大林,有报告说1912年他是中央委员会代表,因此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是合适的。但鉴于他个人所特有的一些情况,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同意他为只有发言权的成员。”

正如常言所说的,既来之则安之。

此外,在这一决议中故意降低了斯大林的级别:1912年,他已经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不是中央委员会代表。这就相当于把中将叫成了普通的中尉。

3月4日,复刊后的《真理报》第一期刊世,莫洛托夫负责该报的编辑工作,其第二期的出版分行量就已达到了10万份。

该报反对由几乎都是进步联盟成员组成的临时政府,并且呼吁要选举出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党的委员会认为,“在它的活动还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本相符之前”,不应当去反对临时政府。

3月13日,在斯大林的命运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成了他新的仕途上的第一个台阶。

俄国局改变了最初的决定,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真理报》编辑部成员。莫洛托夫借口年轻和缺乏经验离开了编辑委员会。

很有可能,是穆拉诺夫支持了流放中的同志——斯大林。在莫纳斯特尔斯科伊村党的审判会上,在分析穆拉诺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代表的行为时,柯巴的态度是没有敌意的,穆拉诺夫(还有加米涅夫)对此是应该记得的。

此外,斯大林还成为俄国局主席团成员。3月1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穆拉诺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斯大林传记作者之一的罗伯特·斯拉塞尔强调,就在那几天形成了斯大林革命仕途上的第一个联盟。三天内,他进入了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层。而且,在列宁从瑞士回来之前的三个星期里,实际上是斯大林在领导着全党。对此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

在这些日子的《真理报》上,反映了他的活动,尽管远不是全部。

《真理报》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发生了什么,如何对待临时政府,以及如何准备(或者是否准备)社会主义革命?

在他生前出版的传记中,对这个时期描述如下:

“布尔什维克党刚刚走出地下状态。许多最著名的、最积极的党员从流放地和监狱纷纷返回。

“列宁还侨居国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用尽一切手段阻止他归来。在这个关键

时期，斯大林团结全党，为争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斗争。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一起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从斯大林的一系列文章里，布尔什维克获得指导自己工作的原则性指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传略》，莫斯科，1947年，第57页）

在这段文字中，一切都被简化了。事实上，对于选择什么道路，当时没有一个人有清醒的认识，斯大林也是如此。但就主要问题而言，他持有明确的立场：

全力巩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支持“打倒战争”的口号和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建立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立即武装工人；

给不能也不想留在一个完整国家框架中的民族以自治权，但保持国家的统一。

这些思想在斯大林发表于《真理报》3月份的文章中得到阐述，后来收进了他《文集》的第三卷。

但它们并没有勾勒出完整的画面。《真理报》在那些日子里还刊登了加米涅夫支持与反动德国作战的文章（这与列宁的立场是相抵触的），并且登载了斯大林关于与临时政府进行有限合作的文章。

后来，这些文章引发了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的严厉指责，虽然在这些文章中只是反映了现实的情况。

斯大林对临时政府的立场不能称为是左的和不妥协的。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中间派。斯大林认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正在进行革命的改造并监督政府，而政府本身也在强化革命的改造。

3月29日，在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斯大林做了题为《关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的主报告，他这样确定自己的立场：

革命有四种力量。两种是基本力量：工人和士兵；还有两种是次要力量：我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这四种力量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好了轻而易举地、迅速地摧毁沙皇制度的基础。但是，既然是不同的力量，那它们的性质就不相同，目的也就不会相同。上层是资产阶级，我国的和西欧的资产阶级，他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更换舞台布景，用一个沙皇代替另一个沙皇。他们要的是土耳其那样的轻而易举的革命，给予少许自由是为了进行战争，进行小革命是为了大胜利。下层则是工人和士兵，他们想深入进行革命，摧毁旧制度的根基。因此，如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股气流，它们推出了两个政府，两种力量：1. 由英法资本家支持的临时政府；2. 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机构分享权力，没有



一方拥有完整的权力。因此它们之间就会有而且应该有摩擦和斗争。作用也各不相同。工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实际带头人,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构。临时政府实际上起了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作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动员各种力量监督临时政府,它在持之以恒、曲折前进的道路上,起的是巩固他们实际已经夺得的人民成果的作用。这种局势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现在就强化革命的发展,加快与资产阶级各阶层脱离的进程,是对我们不利的。资产阶级自己将来会不可避免地离开我们。我们要阻止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离开,我们必须争取到时间,以便作好与临时政府进行斗争的准备。

但是,这种局面不会永久持续下去。革命在深化,将从政治问题转到社会问题。社会的需求将使我们与资产阶级中等阶层脱离。指望在革命结束前不与资产阶级决裂是缺乏理性的。当裂痕不断加深,临时政府就将从巩固革命成果的机构变成策划反革命的机构。他们已经在进行反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争斗,在部队中进行反对工兵苏维埃的宣传,在宣誓、军队民主化、高级指挥官人事变动问题上,冲突已经开始。反革命势力的动员有自己的旗号:“战斗到最后胜利!”不仅在国内外,而且在外国——在英国、法国,都在进行这种宣传动员。他们的半官方刊物已经开始了反对革命的真正的讨伐。反对两个政权并存的征讨已经开始,而且随着革命的发展,临时政府将(客观上也需要这样)变成反革命的堡垒。不是沙皇在反对革命,这种危险对我们不再有威胁,而是帝国主义在反对革命。准备还击是我们的任务。因此,这个问题会变得复杂。关于支持的问题,暂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临时政府在强化革命的措施就对它支持,如果它反革命了,对它的支持就是不可接受的了。许多来自外省的同志问:现在是否应该考虑夺取政权的问题。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时宜的。临时政府并非如此脆弱。临时政府的实力来自英美资本的支持,来自外省的惯性,来自对它的好感:发给它的贺电纷至沓来。我们需要等待,直到临时政府耗尽自己的力量,直到在实施革命纲领的过程中,临时政府自己名誉扫地。唯一能够在全体范围接管政权的机构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必须等待,让事态的发展暴露出临时政府的空虚无力,同时做好准备,等待时机成熟。而现在要组织一个中心,也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巩固它,这就是目前阶段的任务。(引自:托洛茨基 JI,《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 230—232 页)

托洛茨基称斯大林的这个立场是“妥协性的”,尽管实际上它是现实可行的。

托洛茨基又写道:“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斯大林在中国(1924—1927年)、西班牙(1934—1939年)和对所有遭到厄运的‘人民战线’的固定不变的政策。”(托洛茨基 JI,《斯大林》,第 1 卷,第 263 页)

当然，托洛茨基就自身而言是正确的。在他看来，斯大林确实不是左派，不是革命者。他们立场的差别是原则性的，搞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去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命运。

在斯大林的报告中，还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就是他对局势的充分了解。如果考虑到 17 天前作者刚刚出现在这个革命城市，这无疑令人吃惊的。那么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这份报告收入他的文集中呢？因为其中有与列宁立场的明显分歧。

3 月 19 日，亚历山德拉·科伦泰把列宁的文章《远方来信》送到《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中，列宁强烈反对临时政府，拒绝与它进行任何合作，对它提供任何支持。他称临时政府是“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它在继续进行着“帝国主义大屠杀”，不可能提供“和平、面包和自由”。

当然，列宁有点夸大其词了。国内面包还是有的，自由也是存在的，和平的问题则比较复杂。但怎样才能在不使国家遭受损失的情况下退出战争呢？是签订单独的和约，还是投降？列宁似乎也不知道答案。

他认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者是“俄国的半无产者大众和部分小农居民”，还有“所有交战国，甚至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

列宁认为，依靠这些同盟者，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去并且即将去夺取先是民主共和国和农民对地主斗争的完全胜利……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

可以想象，当收到这篇文章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有多么的为难。他们明白，这位身处国外的党的领导人想得，客气点说，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目前既没有一个应有的分布广泛的组织构架，没有真正的同盟者，也没有武装力量。唯一现实拥有的就是加入于其中的苏维埃，而苏维埃里大部分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我们不清楚，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讨论所出现的问题时的表情怎样：是开了列宁的玩笑还是两手一摊。

最后，他们冒险做出重要决定：文章经过删节后发表，删掉最不恰当的语句和结论。删除的文字相当于全文的 20%，即删掉的内容是相当重要的。

4 月 3 日，列宁返回俄国。第二天，他在全俄党务工作者会议上发言，其中说道：“俄国现在是世界上各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和组织性还远远不够。而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有准备的阶级。如果向人们承诺，说我们可以按照一些人的美好愿望结束战争，这是一种政治欺骗。”（引自：托洛茨基 Л.，《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 281、282 页）

可见，在评估当前形势时，列宁与斯大林分歧不大。“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在实际存在的两个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只不过是监督的另一种形式。而斯大林



也谈到了监督问题。

不过,4月8日发行的《真理报》还是就此原则性问题反驳了列宁:“列宁同志的提纲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是以立刻将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的。”

后来,1924年,在为争夺国家政治权力进行斗争时,斯大林承认自己当时的立场是错误的:“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用苏维埃向临时政府施压的政策,而未能立即前进一步,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

他承认,列宁发表《四月提纲》时,他不赞同“这一错误立场”,并拒绝了它。由于承认了这一臆想的错误,斯大林轻易摆脱了托洛茨基对他的指责。

临时政府是最终被推上权力顶峰的欢庆胜利的知识分子们的大杂烩。正如尼古拉二世预言的那样,他们没有管理国家的行政经验。更糟的是,他们内部不统一。可以说,已经产生分歧的政治精英们在力图达到统一状态。

支持临时政府的是所谓的议会和地方自治的自由主义传统,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是工厂工人和革命军队。临时政府本身就是这两种势力妥协的产物,也是它们斗争的舞台。

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主张忠于盟国并继续进行战争,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则主张重新审视战争的目的(“不割地和不赔款”)。

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支持克伦斯基。对盟国而言,这就是支持克伦斯基的足够证据。

法国大使帕莱奥洛克徒劳地试图说服本国政府:“与克伦斯基在一起,这是苏维埃真正的胜利,即人民激情得以释放,军队垮台,民族的链条断裂,俄罗斯国家最后完蛋。”(引自:米留可夫 П.,《回忆录》,莫斯科,2001年,第606页)但帕莱奥洛克被解除了职务。

我们还要强调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巴黎、伦敦和华盛顿的行动走向与列宁的政策是相同的。同盟国认为他们是在支持“俄国的民主”,给临时政府以沉重打击。重心已经大大地向左移。

此时,在柏林,人们也没有袖手旁观。负责对俄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德国驻丹麦大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在给外交部的信函中建议推进“俄国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混乱”。

“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激化温和派政党和极端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他们矛盾的上升符合我们的利益……应该尽一切可能用三个月时间加快它分裂的进程,到那时我们的军事干预将确保大俄罗斯帝国的垮台。”(引自: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第341页)

吉尔方特-帕尔乌斯从哥本哈根被派到柏林,他表示愿意最大限度地协助俄国

社会党侨民从瑞士回到俄国。吉尔方特断言，列宁由于具有坚强的个性，将把社会党人（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从临时政府中“推向另一边”，“并且做好了立刻签订和约的准备”。

列宁同意取道德国回国，但提出一个条件：护国派社会党人（孟什维克）要和他一起回去。这样一来，他立即表明，他不打算扮演德国间谍的角色。

不但如此，当加涅茨基在斯德哥尔摩向列宁转达吉尔方特希望会面的迫切请求时，列宁断然加以拒绝。不久之后他说，对党而言，与“这种人”接触是有害的。

列宁在瑞典的出现被英国情报机关发现。英国国家情报处少校斯捷潘·埃林在布尔什维克分子到达瑞典之前，曾企图通过瑞典政府来阻止这位危险革命者的到来，但没有成功。瑞典人依然忠于自己的中立立场。

列宁离开斯德哥尔摩后，埃林主动与彼得格勒军区反间谍机关负责人鲍里斯·尼基京会面，并请求他禁止俄国托尔尼奥边防站长官让列宁进入俄国。

然而，尼基京上校什么都不能去做。俄国正在进行政治大赦，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下令不得阻止列宁入境，军事和情报机关也无能为力。

英国人仍然坚持：“光天化日之下，随同列宁进入贵国的是一帮纯粹的德国间谍！”

尼基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心怀感激地评论了和他合作过的这位英国军官和法国情报人员皮埃尔·洛朗，并列出了许多说明临时政府逐渐人心涣散、权力已向苏维埃过渡的例子。他特别注意到加涅茨基（替吉尔方特工作）给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资金援助的问题。

4月3日，列宁在“芬兰”火车站举行的庆祝他回到俄国的欢迎仪式上讲了话，其中有一句应该让德国人不寒而栗。他说，俄国革命将发展成世界革命。

形象地说，列宁给自己的汽车加了德国人的汽油，为的是把德国人送向深渊。

所以，在德国最高统帅Э.鲁登道夫回忆录中，不无惊讶地揭示了这一情况：“我们的政府把列宁派往俄国的同时，自己也就承担了特殊的责任。就军事而言，此举被证明是正确的，俄国应该垮台。但我们的政府也必须关注，以免我们自己也垮台。”（引自：席瑟尔Г.、特拉乌珀曼И.，《俄罗斯轮盘赌——用于俄国革命的德国资金》，莫斯科，2004年，第108页）

无论是对已经灭亡的俄罗斯帝国，还是对注定要灭亡的日耳曼帝国，列宁都不会有一丝的怜悯。

你们不是想要“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混乱”吗？那你们就等着吧！

因此，对于“德国资金”的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看待。客观地说，列宁没有被收买，关于这一点，甚至连他的对手法国大使帕莱奥洛克都可以作证。

德国打错了算盘。



同盟国做了几乎和德国一样的事：正是他们用装甲舰把护国派社会党人 Г. В. 普列汉诺夫和他的 40 位追随者送回俄国。美国人安排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他很快成为第一位外交人民委员，并签发了这个帝国的外交文件，这使美国在俄国和欧洲问题上无法再顾及同盟国的利益。

总之，来自两个方面的对俄国革命的财政和其他支持都是显而易见的。谁也不感兴趣，俄国将发生什么以及它将归谁所有。那么他们对它抱有的唯一希望是什么呢？是结束军事行动，还是相反，继续战争？

革命的原因不仅在于受过教育的阶层不愿意生活在个人的统治之下，不仅在于人民不愿意打仗，其根源还在于大多数居民没有所有权的感觉。俄国大多数农民依然如“大槳战船上的奴隶”，生活在正走向解体、但还残存着的村社里。斯托雷平赋予他们所有权的政策，由于没有所必须的历史时段，并没有达到其主要目标：人民仍然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国家制度，处于无政府状态，指望东正教的沙皇来庇护。庞大的教会机构没有像欧洲宗教改革那样的经验，不能给予人民共同参与新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的方法，面对由“受过大学教育的普加乔夫们”所领导的奋起的民众便束手无策了。

按照 И. 司徒卢威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法纪”还没来得及在俄国获得坚实的基础，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主义本身”却是在其根基之上成长起来的。（司徒卢威 И.，《爱国主义：政治、文化、宗教及社会主义》，莫斯科，1997 年，第 418 页）

因此，农民革命与二月革命领导者们的社会民主倾向少有共同之处。农民革命就其基础而言，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暴乱。

我认为，在这里需要探讨一下列宁的“使战争失败”的根源，正是“使战争失败”控制了这一暴动以及整个俄国军队。

但这正是令人惊讶的地方。1917 年 4 月，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他的表述如同一个“护国派”和国家强权的拥护者。这就是说，他不同于党的领袖，对俄国国家政体还不是很冷酷无情。后来，托洛茨基没有忘记指责他的这一过错。

列宁回国后，斯大林把领导地位让给了他，并不认为此举有什么不正常。

在“芬兰”火车站迎接列宁的人中有苏维埃主席齐赫泽，但斯大林没有去。此时，他正在主持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左派孟什维克联合问题的预备会议。

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去火车站？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与列宁也不是特别的亲近，而他显然也不想参加群众集会。

日常工作开始了。列宁对时局的尖锐评价不仅与斯大林的评价截然相反，而且与马克思本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客观条件成熟后才有可能发生的原理相去

甚远。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16位与会者中只有两个人支持列宁的观点。

所以,斯大林并没有觉得这一错误(在4月6日俄国局的会议上他批评了《四月提纲》)有什么不对!列宁也没有对《真理报》的立场提出尖锐批评,也没有将其归咎于个人。不久前的对立仿佛自动消失了。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列宁在谈到他认为的敌人或对手时,会使用最激烈、最侮辱性的措辞;而对于那些在他看来是党未来可能的领导人选,他能够以惊人的耐心和谅解对待这些党的活动家。”(斯拉塞尔 P.,《斯大林在1917年》,第71页)

但斯拉塞尔忘了,这已远不是斯大林第一次显露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们可以称之为独特体系。1911年,他也在《真理报》上“一意孤行”过。

长期侨居国外的列宁返回俄国后,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在俄国环境中幸存下来的同志们已经成长起来并拥有了稳固的地位。斯大林并不是“候选人”,他已经是一流的领导人了。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它的危机。危机的解决对主张捍卫战争地缘政治目标的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是不利的,而对克伦斯基有利。因为克伦斯基放弃了“君士坦丁堡和波斯”,并支持继续进行“革命战争”。因此克伦斯基得到了苏维埃的支持,而且由于他不再坚持占据对盟国来说敏感的海峡地区,所以西方也支持他。

此时,从彼得一世开始的俄国亲欧的传统实际上出现了裂口。同盟国在抛弃自由派的西欧主义者米留可夫教授和俄国金融工业界利益的代表人物古契科夫之时,并没有想到同时也对实质上尚未形成的政府给予了毁灭性的一击。

布尔什维克利用米留可夫关于临时政府支持战争目标和任务的声明,号召工人和赤卫队员走上街头。旗帜上写着“打倒战争”、“打倒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标语。在涅瓦大街上,游行队伍与身份不明的士兵发生冲突,两名士兵被打死。

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 JI. T. 科尔尼洛夫将军了解到工人的诉求后,下令往冬宫广场调遣两个炮兵旅。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斯大林的参加下)撤销了他的决定,科尔尼洛夫只好收回成命。士兵们仍旧留守军营。

这样,实际上就是临时政府承认,它已经丧失了自己权力的重要部分。正如米留可夫指出的,“资产阶级政府向社会主义党人投降了”。

包括米留可夫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都谈到,这场街头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正是布尔什维克,但没有人谈到具体是谁。

这里应该提出斯大林的名字。回想起自己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运动时积累的关系,他潜入他所熟悉的地下环境,迅速与工人、士兵、流氓无产者找到了共同语



言。类似这样的工作是不会留下任何记录和书面证据的,所以我们要采用间接的证据。例如,有文件证明,斯大林曾积极参与彼得格勒市政选举的组织工作。

这是政治选举的基础层面,而且为了参加竞选运动,需要从事很多具体的日常工作并每天保持与多方面的频繁接触。

4月2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全俄党代表会议。托洛茨基挖苦说,斯大林不在代表会议主席团名单中,但他对斯大林在代表会上入选九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事未作任何评论。更准确地说,作了故作惊讶的评论:对于他如何赢得了列宁的支持,“我们只能推测”。

但是,甚至从托洛茨基这气急败坏的话语中,也透露出真实情况的蛛丝马迹。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很难查到斯大林的动向。他立即被排挤到第三流的位置。《真理报》的编辑工作由列宁主持,并且不像战前那样遥控,而是日复一日地直接领导。党对《真理报》的安排作出调整。在宣传方面,由季诺维也夫主要负责。和从前一样,斯大林仍然不在集会上演讲。对新政策半信半疑的加米涅夫是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的代表。斯大林几乎从苏维埃的舞台上消失了,也不常出现在斯莫尔尼宫。领导组织工作集中在斯维尔德洛夫手中:他分配工人,接待外省来人,解决冲突。除了在《真理报》值班和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斯大林还偶尔负责行政、技术或外交方面的事务,不过这些事务寥寥无几。就天性而言,斯大林懒散。他只有在个人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时,才会努力工作。否则,他更喜欢叼着烟斗,并等待局势的转变。他经历着他人生中非常艰难的阶段。更有地位或者更有才华的人在从各方面排挤他。”(托洛茨基 JI.,《斯大林》,第1卷,第282页)

托洛茨基几乎紧接着说道,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做了报告(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之后),并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6月3日开幕,持续了近三个星期。几十名外省布尔什维克代表淹没在众多的妥协分子里,他们代表着一个成分相当复杂的群体,还远未摆脱3月份的情绪。领导他们并非易事。民粹主义者韦列夏克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他曾在某个时候在巴库监狱里观察过柯巴,他写过的一段有趣的文字正是谈的这件事。他在1928年写道:‘我千方百计地想了解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布尔什维克党里的角色。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克雷连柯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台前就座时,或是当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演讲时,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总是默默地指挥着布尔什维克的党团。这是一种战术力量。这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些人的全部意义。’韦列夏克没有说错。在准备党团投票的幕后工作中,斯大林是个重要人物。他并不总是使用一些带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但他善于令中层领导,特别是外省人感到信服。”(托洛茨基 JI.,《斯大林》,第1卷,第284页)

因此,斯大林(在列宁发表《四月提纲》后,并考虑到改变了的形势)成为领袖忠诚

的战友。他保持甚至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列宁面对占压倒多数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没有动摇，并且显然是正确的，因此他所赢得的就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个人的尊重了。而实际上，临时政府又不是那么稳固！

斯大林感觉到了列宁的人格魅力。显然，他获得了深刻的教训。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是个关键，这赋予了斯大林以组织才能。他认识到自己以前对政治斗争（我们和他们）的看法过于简单，认识到斗争可能有相当多的层面，可能同时包含着几个矢量，需要一些盟友，并且还不得不随局势的变化而改变这些盟友。

未来，斯大林将会精于结盟，取得胜利，并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与新的盟友联合。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阐述提名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的理由时，列宁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代表会议的纪要中是这样写的：

斯大林同志（化名——柯巴）。

列宁（同意）：我们了解柯巴同志已经很多年了。我在曾是我们俄国局所在地的克拉科夫就见过他。他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非常重要，是一位在所有重要工作中都表现良好的工作者。

没有反对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全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会议纪要。（引自：卡普琴科 H.，《斯大林政治传记》，莫斯科，2004 年，第 384 页）

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被选为一个“小委员会”的成员（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后来这个“小委员会”就叫做政治局。

这里要注意两个事实：第一，列宁实际上承认了两位以前的图鲁汉斯克流放者在新的革命阶段的突出作用；第二，如果从这四人中去掉列宁的名字，那么就是一个三人执政的局面，正是他们在领袖去世后，领导党与其他觊觎领导权的人，包括托洛茨基进行对抗。

总之，对许多人而言，在斯大林的快速上升中隐藏了某种奥秘。

有一种比较现实的解释是：“列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草率的失误，同时又对莫洛托夫、施略普尼柯夫和扎卢茨基所持的正确路线没有予以重视。列宁显示出了他对政治领导人才能的高度重视。斯大林证明了自己具有这样的才能，所以他草率的政治失误轻易就可得到原谅，尤其是他表示准备在列宁的庇护下永远不再旧事重提。列宁将得到承认的领袖的一种符号赋予了斯大林，因而也就表明，善于将权力掌握在手中是一种主要的品质，而他最珍惜的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能有这样的品质。至于说到政治，他自己则完全有能力胜任。”（斯拉塞尔 P.，《斯大林在 1917 年》，第 119 页）



如果把“草率的失误”的括号去掉,总体而言这一评价是很有说服力的。忠诚,有意志力,能够独立思考,有足够的学识——这就是斯大林。列宁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战友吗?

事件发展的一个方案就是临时政府的权力不是转交给布尔什维克支持的苏维埃,而是工业家,即有组织的资产阶级。

提出这一路线的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科夫(1862年10月14(26)日生于莫斯科,1936年2月14日卒于巴黎)。他是莫斯科民族资本世家的杰出代表,像莫罗佐夫、列布申斯基、特列季亚科夫、普罗霍罗夫、柯诺瓦洛夫家族一样,是从地道的农民生活的深处成长起来的。正是这个群体积极组织城市自治,创建新的生产企业,主张推动国内资本向国外市场发展。此外,莫斯科的工业家与彼得堡的工业家相比,获得的军事订货比较少,所以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态度就更加强烈。

亚·伊·古契科夫的父亲伊万·叶菲莫维奇·古契科夫是“伊万·古契科夫父子”商行(毛料制品厂和经营呢绒商品)的创始人之一(与兄弟一起),是莫斯科贴现银行的理事会主席。他有4个儿子。长子尼古拉担任过莫斯科市市长(1905年—1913年)。尼古拉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获法学副博士学位,娶维拉·博特金娜为妻,并作为经理参与了博特金的家族企业(“彼得·博特金之子”茶叶贸易公司、“博特金新塔沃尔然卡甜菜制糖厂”公司)的管理。卸任市长一职后,当选为北方保险公司董事会董事,是莫斯科私人商业银行理事会和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土地银行理事会的理事,还是一系列教育和慈善机构(彼得罗夫斯克-巴斯曼市立小学、列福尔托沃穷人学校等等)的监管人。1905年莫斯科起义时,他表现出坚定和善于管理的品质,帮助工人的妻儿从普列斯尼亚疏散,并把他们安置在复活广场上的市杜马大楼里。

尼古拉·古契科夫是一位能干的市政领导人。在他担任市长期间,莫斯科有了俄国最好的有轨电车,初级教育实施了普及和免费。在他当政时,成功地在欧洲发行了一组市政债券。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当选为莫斯科市政府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代表,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就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彼得罗夫 IO.,《20 世纪之初的莫斯科资产阶级:企业活动和政治》,莫斯科,2002年,第395页)

总之,俄国企业家们不仅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而且在社会领域都做了许多益事。托儿所、工厂医院、工人家庭住房、中小学校,所有这些还是在尼古拉帝国时就已建成。世纪初,民族资本非常强劲,并从沙皇当局获得了“发展空间,废除了多余的形式,摆脱了生存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这是1912年4月 П. П. 列布申斯基对 B. П. 科科夫佐夫总理大臣说的话。(引自:彼得罗夫 IO.,同上,第270页)

政府没有能力拨出必要的款项来资助伟大科学家 B. И. 维尔纳茨基进行寻找镭矿的勘察,正是帕维尔·列布申斯基组建了个人的“莫斯科镭矿勘察队”。这里应当补充一下,那个时候维尔纳茨基已经论证并发现了核能。

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是国家杜马议员、莫斯科工业家 A. И. 柯诺瓦洛夫。他是“И. 柯诺瓦洛夫父子”纺织品公司的所有者，也是俄国相互保险联盟理事会的主席、莫斯科银行理事会的理事。此外，他还是进步联盟的组织者之一，在临时政府第一届内阁中担任贸易和工业部部长。他的政治纲领是建立在立宪民主制和不受国家干涉的市场经济的观念之上的。他属于立宪民主党人，但不同于他们的领袖米留可夫，他主张立即与德国进行单独和谈，提出了“理智的和平还是列宁获胜”的命题。

但很有代表性的是，柯诺瓦洛夫和他的同事们不愿也害怕发生内战。在发生布尔什维克迈向夺取政权第一步的“四月危机”时，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 A. И. 古契科夫宣称：“如果出现武装袭击，我们将给予武装回击。”

对此，柯诺瓦洛夫高调回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警告您，只要一出现流血，我就马上辞职！”

他的意见得到了其他部门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古契科夫和米留可夫的辞职。

不过，一个月后柯诺瓦洛夫也辞职了。他不同意政府的经济政策，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国家控制经济和压制私营企业的方针。

其实，不能说俄国的商业没有做出任何对自身有利的事情。例如，在“四月危机”时，最高统帅 M. B.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与各条战线的指挥官开过会后，就提出了陆军部长的两位候选人：司法部长克伦斯基与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

帕尔钦斯基这个人物在今天鲜为人知。不过，如果当时他接替古契科夫担任了陆军部长一职，那么国家的历史可能会按照另一条道路去发展。

他究竟是何许人？在 B. И. 列宁文集二十一卷的人名索引（第 3 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 年）中写着：“帕尔钦斯基是工程师，是与银行界有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辛迪加‘煤炭生产’的组织者，作为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二月革命。任克伦斯基政府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工业家怠工行为的鼓动者。立宪民主党人、彼得格勒州长基什金的助手。1917 年 11 月 7 日（10 月 25 日）任冬宫防卫长官。1919 年，帕尔钦斯基因被指控进行反革命活动而遭到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但按照列宁的命令被释放。现今在苏维埃机关工作。”（引自：加拉耶夫斯卡娅 И.，《彼得·帕尔钦斯基——战争和革命背景下一个工程师的传记》，莫斯科，1996 年，第 5 页）

这一切都是对的，尽管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帕尔钦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是俄国工业的组织者。他具有从事系统工作的天赋。他于 1875 年出生在维亚特卡省，母亲经营一家私人的公共图书馆，父亲另组了家庭。舅舅是著名的民粹主义者 H. B. 柴可夫斯基。著名作家 B. Г. 柯罗连科是帕尔钦斯基的亲戚（即他妻子一方的亲属），而柯罗连科本人又是 B. И. 维尔纳茨基院士的亲戚。帕尔钦斯基毕业于彼得堡矿业学院，曾在杰出的地质学家 Л. И. 卢图金领导下的顿巴斯调查委员会工作，并结识了



米留可夫。

帕尔钦斯基是1905年罢工委员会委员,曾被捕。他后来曾在制订顿巴斯东北部地区铁路运价的委员会工作,制定了铁路运价规程;曾倡议制定工程师经济教程;是《矿业经济概论》一书的作者,欧洲采矿工业代表大会委员会代表。他编写了四卷本的欧洲港口概述,制订了同样是四卷本的《俄国南部矿产品和采矿加工产品出口》手册。他创建了马里乌波尔商业港口的项目,还有黑海的斯卡多夫斯克和霍罗尔的8个港口。

由于才干出众,帕尔钦斯基成为众多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他就是个有原则的“护国主义派”,是与战争相联系的工业促进委员会(从属俄国技术协会)的创建人。从1915年6月起,该委员会改组为军事技术援助委员会。帕尔钦斯基参与了所有促进军事经济发展的工作:用本国货物代替进口货物,培训专家。他进入了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担任军事工业委员会机械部副主任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的监督人。1917年12月前炮兵部门采购的物资,70%都是由军事工业委员会所属企业完成的。

帕尔钦斯基还是保障作战部队供应特别会议的成员,该会议实行支持国内生产的路线。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值得注意:战争期间,帕尔钦斯基加入了一个共济会分会,这个分会里有许多杜马议员,还有进步联盟成员、各个党派的活动家,其中包括未来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H. C. 齐赫泽。

尽管帕尔钦斯基入会不久,但他很了解那些政治上积极的共济会会员,这些人在二月革命后对所有干部的任命都施加过强烈的影响。我们要指出,这一时期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M. B. 罗将柯、Г. E. 李沃夫、П. H. 米留可夫、H. И. 阿斯特罗夫、M. B. 切尔诺科夫都对共济会怀有敌意。(谢尔科夫A.，《俄国共济会发展史//1845年—1945年》，圣彼得堡,1997年,第122页)

战争要求对私营商业进行动员和经常性监控,因为私营贸易的本性就是首先要谋取扩大自己的利润,甚至不惜危害作战任务的完成。在这个时期,帕尔钦斯基的威望上升到高不可攀的程度。似乎,他对战时经济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且任何利用国家工程致富的企图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得以加强,它后来成为苏维埃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帕尔钦斯基是俄国计划经济的缔造者,也是国家经济复兴计划思想的创始人。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交战国的政府都在调整国民经济,让人回忆起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实行专制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基于在经济中强化国有成分的需要。

政府与垄断组织所有者的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1916年1月1日,私产管制法被通过。贸易和工业部获得了监督金属贸易的权力。

维克松冶金厂、普梯洛夫工厂和涅瓦工厂等都遭到了私产管制。国有的冶金、机器制造、化工企业的建设得到广泛发展。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垄断组织的作用被削弱，甚至遭到破坏。

截至 1916 年年底，在俄国金属分配委员会注册的工厂在南部有 18 家，中部地区有 17 家，乌拉尔有 52 家。仅在彼得格勒一市就新建了从事军用物资生产的 40 家新企业。

建立了许多新的产业：化工和制药工业。在卡马河、伏尔加河沿岸出现了车间的厂房，这些厂房不仅考虑到当今的战争目的，而且也考虑到未来——俄国长久的生活。（加拉耶夫斯卡娅 И.，同上，第 58 页）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分析 20 世纪初俄国的经济状况时指出，经济的集中和国家调控仿佛是专门“为以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来实现的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不管怎样，维特——斯托雷平的现代化、帕尔钦斯基的“特别会议”及斯大林的工业化三者之间的联系都是无可争辩的。

无论今天这听起来有多么奇怪，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化在社会中形成了又一个反对沙皇政权的阵线，工业化要求国家管理更加具有组织性。所以，在 1916 年年底，帕尔钦斯基接到了军人提出的希望他加入到军事政变者行列的建议。

虽然在彼得格勒已经有很多人在公开谈论着军事政变，但暂时它还只是一个计划。

1917 年 1 月 30 日，在由社会党人 K. A. 格沃兹杰夫领导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人员遭到逮捕之后，首都的局势突然具有了崩塌的性质。当局摆出了准备自卫的架势，而这被看成是准备进攻的信号。

直到现在，无人问及革命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以及革命组织是如何驾驭人民的自发力量的。领袖们，他们实际上并不是革命的经理人，倒是帕尔钦斯基可以称为二月革命的经理人。

2 月 27 日，当预备连队起义时，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临时执行委员会进驻了杜马旁边的塔夫里达宫。

而就在与塔夫里达宫毗邻的地方，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A. И. 古契科夫、帕尔钦斯基、H. M. 波塔波夫将军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 П. A. 波洛夫采夫将军也在开会。

帕尔钦斯基是副主席。他组织了一切，集中了 60 辆汽车及司机（司机中有一个叫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兵，那位“革命的呐喊者”）。

帕尔钦斯基在发电厂和军工企业周围布置了警卫。

他把杜马议员派到工厂以解释局势和防止屠杀。他还给革命军人提供食品，以



此把他们与塔夫里达宫拴在一起。

他下令检查进入塔夫里达宫的人,颁发通行证,发给军官携带武器的许可证。

2月27日夜,他派出武装部队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邮局、火车站、国家银行、发货站、总参谋部。

3月1日,在塔夫里达宫设立了无线电台;下令扣留了沙皇的列车。

直到3月2日,临时政府才下达了占领所有这些设施的正式命令,确认了帕尔钦斯基决定的正确性。

从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之时起,帕尔钦斯基就是它的成员。

3月22日,他被任命为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国防措施讨论和统一特别会议副主席,并赋予他在涉及金属和燃料问题时代行该会议主席的权力。

此外,他还是国防措施讨论和统一特别会议所属劳动力统计和国防企业劳动力保障联合委员会的主席。

帕尔钦斯基写道:“二月革命后,所有国防方面的工作全都集中到了我手上。”

4月初,帕尔钦斯基在塔夫里达宫听到过列宁的讲话。正如这位工程师的传记作者所写的:“帕尔钦斯基的经济纲领比他本人作为国家控制和调节特别会议领导的实践工作更加温和,他所宣布的要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抽象的。然而,彼得·阿基莫维奇明白,列宁毫不费力、准确无误地指出了当今制度的虚弱之处,并提出了如此简单,如此抽象,又能为形形色色的暴民所接受的观点。塔夫里达宫大厅里的灰绿色(来自于军装的颜色)的队伍在听他讲话,并不想把他赶下讲坛。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帕尔钦斯基试图建立的那种制度的主要的和现实的反对者。”(加拉耶夫斯卡娅 И., 同上,第66页)

所以,在斯大林获得了在党的领导层中稳固地位的日子里,俄国的经济生活也迅速趋向有序。

帕尔钦斯基的命运也已经确定,尽管他还不相信会是这种结局。直到十月革命,帕尔钦斯基还一直在继续着自己规模巨大的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建立了国家经济会议,这是后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雏形,并排除了(或几乎排除了)燃料、金属市场的中间商和投机者。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许多工业家(包括柯诺瓦洛夫)是反对国家调控的。

此外,帕尔钦斯基在粮食问题上的立场也远未让所有人满意,他主张废除农民进行粮食贸易的限制,而政府则相反,把对粮食贸易的调控看成是摆脱危机的出路。实际结果却是,哄抬物价的“黑市”大行其道。

但主要之点是,没有让他当陆军部长,也没有让他来领导政府。实际上,俄国的国家机器,经济的和政治的机器绕过了所需要的转变,在沿着一条未知的道路急速前行。

帕尔钦斯基此后的命运是悲惨的，当然也不可能有另一种命运。

他和整个工业金融精英一起失败了。后者策划了二月革命，但因不了解俄国社会的特性而没有能力较好地进行国家建设。但他没有侨居国外，而是留在了俄国，积极参与了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组建、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制订、第聂伯河水电站的规划和燃料工业的组织等工作。1929年5月22日，根据“奥格布”委员会的判决，他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枪决。

但是，如果从某些值得尊敬的人们的悲剧命运中抽象出具体的东西，那就是俄国的经济形势到1917年夏天已经为开辟道路的“强手”出现在舞台上作好了准备。克伦斯基着手发挥这一作用，命运作弄人，克伦斯基是辛比尔斯克中学校长的儿子，而列宁正是毕业于这所中学。1909年，他在审判中为参与乌拉尔剥夺行动的布尔什维克辩护过，在指控犯有宗教谋杀罪的贝里斯的过程中为其进行过辩护。他是一位知名律师、国家杜马议员、劳动社会党党团的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自1915年起，他担任共济会分会联合会“俄国各族人民的伟大东方”的领导（与H. B. 涅克拉索夫一起）；正因为他是共济会会员，所以就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坚决反对把沙皇的权力转交给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而这导致了帝国国家政体的毁灭和一个软弱的共和国的组成。

作为政治家，他有两面性，他依靠两股主要力量——温和社会党人 and 大资产阶级，而最终结果是被他们所抛弃，错过了稳定局势的机会。

1917年，似乎与俄国革命如出一辙，在法国也几乎发生了革命，军队暴动，三万士兵向巴黎进发。总理大臣克列孟梭反应迅速、严厉。在首都实施逮捕，用机枪拦住住士兵们，军事法庭迅速作出判决，枪毙了组织者。

这些事件的反响波及了彼得格勒，但却是另一种结局。

5月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各战线指挥官、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代表参加的会议。在这里，形式上是和平地交换意见，但事实上，军队领导与新政权发生了决定未来命运的冲突。

将军们是这样说的。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我们的盟国对我们的信任在下降。必须在外交领域内考虑到这一点，而我特别要考虑的是军事领域。

似乎，革命将振奋我们的精神、热情，随之而来的就是胜利。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都错了。革命不仅没有提高热情和振奋精神，反而出现了最卑下的冲动——贪生怕死，忘记了祖国的利益和它的未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在于，一些理论观点灌输给了群众，群众又对此做了不正确的解释。“不割地和不赔款”的口号让人们得出了“现在为什么还要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结论。

你们会问，权力在哪里，信念在哪里，也许，甚至还有肉体上的强迫在哪里？我必须说，还没有被军队消化的改革动摇了它，动摇了它的秩序和纪律。纪律是军队存在的基础。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条路一直走下去，那么将会彻底崩溃。供给不足加速了这种崩溃。还必须考虑到军队中已出现的分裂。军官们非常沮丧，但与此同时，正是军官们领导着民众去战斗。还应当思考一下战争的结局。大家都想着扎堆回家。你们已经知道，休假和逃跑的大量士兵不久前在铁路上引起了怎样一场混乱。要知道，当几百万人想同时向后方转移时，这可能对国家生活和铁路带来一种难以估计的混乱。还请考虑到，当开始复员和武器被抢时可能会发生什么。（邓尼金 A.，《俄国混乱时期概述——政府和军队的崩溃（1917年2月—9月）》，莫斯科，1991年，第302页）

布鲁西洛夫将军：

军官们曾经高兴地欢迎变革。假如我们不是这么心甘情愿迎接变革的话，也许它就不会进展得如此顺利。与此同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给了士兵自由，而军官只能满足于无自由权利的角色……

有一个团发表声明，他们不仅拒绝进攻，而且希望离开前线回家。委员会反对这种趋势，向他们宣布，他们将被免职。我长时间劝说该团，当我询问他们是否同意我的意见时，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做出书面答复。几分钟后，在我的前面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打倒战争”。（邓尼金 A.，同上，第304页）

德拉戈米洛夫将军：

属于伟大人民之列的自豪感已经丧失殆尽，特别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各省的居民中间。“我们不需要德国人的土地，而德国人到不了我们这里，日本人也到不了”。（邓尼金 A.，同上，第307页）

古尔科将军：

你们说“革命还在继续”。请听我们说，我们更加了解部队的心理状态，我们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停止革命吧，让我们这些军人将自己的职责履行到底，使

俄国进入你们能够继续自己工作的状态。否则，我们交给你们的将不是俄国，而是由我们敌人播种和收获的旷野，而你们也将被那种你们想要的民主所诅咒。（邓尼金 A.，同上，第 312 页）

邮政电信部长策列铁里：

你们该怎么走？你们可能有两条路：一条是拒绝苏维埃的政策，但那时你们将不会有任何权力来召集军队并派遣他们去拯救祖国；另一条是经过我们验证过的正确之路，一条与人民意愿和期望相统一的道路。（邓尼金 A.，同上，第 314 页）

陆军部长克伦斯基：

临时政府承认工兵代表苏维埃起了巨大作用，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否则我就不会成为陆军部长。没有人可以指责这个苏维埃。但是，也没有人可以责备军队的指挥人员，因为军官们和全体俄国人民一样，肩负着革命的重担。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现在，当我的同志们进入政府时，就能更容易地完成我们共同要去实现的事业。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拯救我们的自由。（邓尼金 A.，同上，第 315 页）

A. И. 邓尼金将军指出：“总司令们已经分赴各条战线，他们带走的是一个清醒的意识，已经输掉了最后的赌注。”

与此同时，德国对所发生之事的评价少有区别。1917 年 4 月 19 日，鲁登道夫将军声称，已经没有理由担心俄国人的进攻。在他的司令部里，印有《德国的未来》的小册子，小册子里俄国的彩色地图上标出了非俄国居民的居住地，制订了将俄国领土殖民化的任务。

4 月 20 日，威廉二世在克洛因采赫召开的会议上说道：“如果期待中的俄国解体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就应该用武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德国人需要加速行动。1917 年春，德国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工人的粮食定额，这引起了抗议和罢工。

在俄国，政治精英们在放弃了占领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想法后，就已经失去了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因。此时响起了克伦斯基“祖国在危急中”的呼吁，但出乎意料的是，民众并没有响应这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号召，公众对此无动于衷。在瓦尔米，在法国革命军击溃奥普正规军的地方，1792 年战斗的英勇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6 月 16 日，西南战线的进攻开始了。进攻最初几天就抓住了 18000 名俘虏，占领了加利奇市和卡卢什市。科尔尼洛夫将军的第八军冲向油田，若是占领了油田就将



加强对德国的经济封锁。

德国人被迫派出了奥匈增援部队，局势有所好转。随后德国人转入进攻。

俄国人放弃了塔尔诺波尔和斯坦尼斯拉夫城。

这是临时政府的军事失败。尽管盟国把它拖入了没有做好准备的进攻，达到了把德国人从西线引开的目的，但他们也因此减少了保存一个统一的俄国的机会。俄国军队在其他战线上的进攻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

军队受到了震动。

被任命为西南战线司令员的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致电政府：“我声明，祖国将灭亡，因此，虽然没有人向我征求意见，但我要求立即停止所有战线上的进攻，以保存和挽救军队，并在严格纪律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改组，为了不再牺牲为数不多的英雄们的生命，因为他们有权看到美好的明天。”（邓尼金 A.，同上，第 424 页）

他要求对军人的犯罪行为实施死刑。

在前线开始实行死刑，革命军事法庭开始行动。科尔尼洛夫下令枪毙逃兵和抢劫者，把他们的尸体放在道路上示众，并标出相应的罪行。他从军校学员和志愿者中组建了突击队，用来与逃兵和抢劫者作斗争，并禁止公共集会。

他未经政府许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这是阻止国家瓦解的实际创举，这一创举很快就具有了志愿白军的形式。

邓尼金说，这种行动使科尔尼洛夫成为可以拯救国家的人民英雄。

经受了恐惧之后，“士兵的民主”有所缓和。

科尔尼洛夫宣称要当独裁者的角色。克伦斯基需要做出决定。

在大本营举行的有陆军部长参加的会议上，邓尼金将军实际上指责是政府导致了军队的溃败。他是这样结束自己的讲话的：

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军队。我代表在座的部长们呼吁临时政府：请在自由的旗帜下，将俄国人的生活引向正义和光明！但是，请给我们为了这一自由而带领军队在我们的战旗下作战的切合实际的可能。对此不必害怕！独裁者这个词已经从战旗上去掉了，也从我们心中彻底去掉了，不会再有了。但是有祖国，有鲜血汇成的大海，有昔日胜利的光荣。

但是你们，你们把我们的旗帜踩入泥泞。

现在是时候了：高举这些旗帜，向它们敬礼吧。

……如果你们还有良心！（邓尼金 A.，同上，第 440 页）

几天后，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最高统帅，尽管克伦斯基对此任命有所动摇。但军事形势已经是灾难性的了。

科尔尼洛夫(1870年—1918年)的威信非常高。他是一位经验丰富、果断坚决的将军,具有坚定的意志。他的父亲是哥萨克军官,母亲是哈萨克人。他曾在中亚服过役,在阿富汗和波斯领土上的勇猛侦察袭击中表现突出。他担任过驻中国的军事代表(武官),去印度工作过,是有关中国和中亚的几本书的作者。他参加过俄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指挥过一个师,被俘虏过,后来逃跑出来。科尔尼洛夫是一个英雄,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点,但他不懂政治。

他是志愿军的组织者之一,在国内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死了。

所有这些人(科尔尼洛夫、帕尔钦斯基、邓尼金),以及类似他们但出身卑微的人们组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基础。但是,假如问他们,1917年2月、3月、4月,当革命热潮涌现,应该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为什么他们却软弱无力?他们将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出生于彼得时期有官职的知识分子家庭,如同比他们在政治上更有经验的同龄人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一样,比平民百姓们中反对国家制度的那些自发力量更为软弱。

根据现代学者 B. E. 索博列夫的说法,1917年俄国的全部居民是由几个基本核心组成的,它们构成了俄国的民族文化体系,并汇集了大约 9000 万人(为 1914 年帝国总人口的 56%)。

该体系的总体结构如下。

彼得堡核心(1000 万人)由几个主要的社会文化团体组成:

贵族——160 万人;

平民知识分子——450 万人;

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50 万人;

大型和中型企业的工业无产阶级——340 万人。

彼得一世之前的核心由两个团体组成:

“黑色百人团”——500 万人,

“红色百人团”——1500 万人。

平民的罗斯——6000 万人。它由几个社会文化阶层组成,它们又可根据主要的处世态度来加以确定:

国家东正教——2000 万人;

带有多神教元素的民间东正教——2000 万人;

受多神教巨大影响的魔幻东正教——2000 万人。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处世态度的记述的话(例如:索非亚·费多尔琴科的《战争中的人民》),那么就可以发现有多处是关于许多士兵是按多神教来理解所发生事件的描述。

“红色百人团”作为社会文化元素,形成于 17 世纪,与 15 世纪在莫斯科出现的



“黑色百人团”相比,它是大罗斯人的一种新文化人类的典型。(索博列夫 B. ,《斯大林建立了第三罗斯》,《俄罗斯名人录》杂志,2004 年,第 6 期,第 46、47 页)

革命后侨居国外的杰出文化学家弗拉基米尔·魏德勒指出了俄国全体民众的文化分歧和矛盾:

列宁差不多是曾经进行过革命的所有革命者中最具有天赋的一位。

他向参与自己所领导的革命的所有人证明了他作为革命者的惊人才能,这些革命表面看来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的,但事实上源于一种自古就有的朦胧的敌视,这种敌视与其说是俄国人民对富农和财主的,不如说是对贵族老爷的,即是对那种人的,这种人可能不是富人,但穿着西服,衣有衬领,老捧着本书读,过着老百姓无法理解和不需要的生活。

在与人民相遇时,新俄国与古罗斯的传统相互碰撞,而这种遗产并没有经过彼得一世及其登上皇位或者皇位之外的继承者们的改造。

对革命而言,成功的最可靠保证是消灭统治阶层和文化阶层,而列宁正是从人民那里获得了这个保证。

十月革命后,半吊子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而具有更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或是被赶走了,或是被消灭了。(魏德勒 B. ,《艺术的消亡》,莫斯科,2001 年,第 141—143 页、第 255 页)

彼得一世的罗斯与彼得一世之前的罗斯之间的斗争,也引起了彼得堡集团内部的分裂。

这表现在彼得堡核心不同社会文化人士之间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中:金融资产阶级和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来自城市中间阶层的两个社会文化集团之间的斗争——极左翼平民知识分子(红军政委)和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白军军官)。

事实上,1917 年 2 月君主专制的被推翻是一股可怕力量造成的灾变,这个灾变导致两个社会文化核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成为俄罗斯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彼得堡俄国的绝大部分精英被赶出国境。

1917 年十月革命只不过是二月革命的延续,是彼得堡核心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片断。

白军军官和红军政委代表彼得堡俄国的不同方面,他们为争夺在俄国的统治地位彼此之间进行了极端残酷的战争。(B. E. 索博列夫语)

政治阶层内部的爆炸引发了任何人都不曾预见到的具有灾难性的巨大动荡。一开始,看起来像从精英到反精英的权力转移,突然变成一个无法控制的进程。反精英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局势。斯托雷平曾试图使国家形成前就形成的民众生活于其中的村社的基础现代化,但这一努力没有完成,此后,彼得堡的精英们没有能够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俄罗斯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农民王国,有很不开化的多个阶级,有很薄弱的文化阶层,有控制着这个王国并且不允许人民扯碎这个文化阶层的沙皇。”(尼古拉·别尔佳耶夫)

在彼得格勒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中,其中非常明显的就有经典的“拉辛起义”和“普加乔夫起义”的俄国式暴动。

有研究者指出:“俄国暴动是一种非常复杂和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打着废除压迫、专制和独断的旗帜,吸引了许多生活艰难的劳苦大众;另一方面,当起义者的政权建立起来后,所有迹象都表明,社会制度将转向更加可怕和残酷的形式。”(索洛维约夫 B. ,《俄国暴动解剖:斯捷潘·拉辛——神话与现实》;引自:涅夏金 A. 、戈林 H. ,《现代文明中的俄罗斯命运》,莫斯科,2003 年,第 165 页)

考虑到俄国人民的这种内部分裂,临时政府的垮台早是命中注定的事。这个政府曾试图阻止这场海啸,随之驱散它,以便不被保守势力抛下风口浪尖。

第十一章

最后的结论：呼吁“上街”

最后的结论：呼吁“上街”、半个起义、逮捕列宁的尝试、工业家们寻求与将军们结盟

国内战争没有立即以其全部的自发力量爆发，但它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二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浪头出现于7月初，当时突然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起义。托洛茨基称之为“半个起义”。

据苏联的史学记载，列宁主义者并没有准备夺取政权，所发生的是革命化了的军队的自发行动。

但是，对立方称这个事件是国家政变的尝试。

七月事件在前一个月就已经在酝酿，在这个月里斯大林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积累了宝贵经验。

6月3日，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3日至24日)开幕，参加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人数远远少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02比533)。大会没有支持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倡议，这就使后者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地位(顺便提一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除了会场还有“街头”。

列宁原则上的判断是：在事件平稳发展的情况下，已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简直就将使他的党靠边站。因此，在6月4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提出一些被某些历

史学家称为“极具蛊惑性的”呼吁。其中，他提议公布军事订货利润的报告并立即逮捕 50 到 100 名“最有势力的百万富翁”。

不应当认为，列宁会不明白他的提议不会被政府所接受。他指望的是在得到普通民众支持的工厂和军队里的人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孟什维克策列捷里在发言时反诘说，在当今俄国，所有的党都没有做好“全面接管政权”的准备。列宁当即回应道：“有这样一个党！”

这是一个党的领袖在发表声明，而这个党，如果用身材来打比方的话，那时它只到其他主要党派的膝盖那么高。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刻，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此嘲笑讥讽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了大规模行动的准备工作的。

6月6日，在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的联席会议上，列宁提议进行示威游行。

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支持了他：“士兵们将受到触动，而工人们将被我们发动起来。”

几个小时后，在列宁缺席的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更坚决地表示：“我们的责任是组织这次示威游行。这将是对我们力量的检阅。一旦看到武装的士兵，资产阶级就会逃之夭夭。”

然而，由于在临时政府中获得了几个部长职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强化了政府的基础，结果，客观地说，使得斯大林的威胁变成了空谈。

6月9日，准备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了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建议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不要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呼吁，不要上街。这样一来，也就表明了对列宁在“街头”的影响不得不予以承认。

此后，临时政府也对居民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此外还威胁说，“政府当局将尽全力来挫败任何暴力企图”。城里出现了武装巡逻队。

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诺根）看到对手已组织起来，认为最好是暂停行动。列宁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

最后，布尔什维克改变了策略，代表大会对取消示威游行感到满意，并没有严厉谴责他们，而是通过了在6月18日举行支持临时政府游行的决议。也就是说，他们是用一个浪潮击退了另一个浪潮。

布尔什维克最终还是获得了举行示威游行的机会！

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支持最初方案的斯大林和斯米尔加提出了辞职，并解释说，布尔什维克的确还是在摸索着前进。

辞职未被接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对斯大林的一种评价。6月13日，斯大林在《士兵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昨天和今天（革命危机）》的文章，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昨天看来还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因为‘社会主义者’加入了临时政府而变得有了可能。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掩盖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实质，巩固和扩大了正在抬头的反革命的阵地。”(斯大林 И.,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84页)

斯大林对很快将在前线发动进攻的假设表示了反对。

主要的结论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随机应变策略正在变得经不起推敲，必须进行选择：或者是为了将政权转移到劳动群众的手中，为了消灭战争和破坏，为了组织生产和分配而反对资产阶级，或者是支持资产阶级、支持战争等等。

6月18日举行的示威游行聚集了近50万人。“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军队都呼喊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走上街头。代表大会的威望遭受到了无法弥补的打击！”(托洛茨基 Л., 《斯大林》，第1卷，第284页)

结果，示威游行提高了斯大林的威信，他实际上成为……不，不是领袖，而是“街头”组织者。

6月20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游行示威》一文，似乎是在结束“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这一话题：“得到首都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信任的党是不需要‘阴谋’的。”(斯大林 И.,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03页)

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掌握了群众。

对于斯大林来说，6月18日的教训意味深长。布尔什维克一开始是跪着造反的，受到主要的好冒险的政治家、政府和代表大会的敌视，然而由于群众的反战和反政府的本能，并且借助于党的机器的运作，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P. 斯拉塞尔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对社会力量的概念具有不成熟的性质，这使得他不能理解托洛茨基、列宁型的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战略运筹，而他们正是借助于这种运筹来试图证明自己对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是正确的。而在斯大林看来，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纪律严明、严格集中的党组织就足够了，只要把党的机器运转起来，群众的行动就会紧随其后。因此，斯大林的革命观念既反映出他的强势，也反映出他的弱点。他强调组织和领导的艺术——他对这种艺术具有天生的爱好，感到亲切和明了，后来他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要知道，这种艺术既不需要政治理论家的杰出才能，也不需要能够吸引大批听众的能言善辩，而这些品质恰恰是斯大林不具备的。

“6月18日布尔什维克示威游行的胜利强化了斯大林的基本原则，一劳永逸地确定了他夺取政权的方法。所以，当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宣称自己有意夺取政权时，他指望着这些原则，即使在新的情况下也对这些原则信守不渝，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斯拉塞尔 P., 同上，第156页)

当然，这多多少少是一种门缝里看人的夸赞。但如果取出其中的“干货”的话，斯

大林是个胜利者。

让我们回忆一下“革命的精神”和“地狱之河”。也许，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那些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们，在看到6月18日的活力之河时，会震惊不已。

但更严峻的事件是在7月初爆发的。

以下是彼得格勒军区反间谍机关长官鲍里斯·尼基京的证词：

就在7月1日那一天，大约晚上10点，我来到军区指挥部。从汽车上下来后，我在人行道上遇见了正好从指挥部出来的波洛夫佐夫和巴拉宾。

波洛夫佐夫把我拉到一边，当着巴拉宾的面说：“我正好要找你。临时政府处境无望；它在问，你什么时候能够揭发布尔什维克的叛国罪。”

我回答道：“我的材料绰绰有余。但我没有看见我们将攻占克舍辛斯卡娅私邸的那些军队，而有约30个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组织被分派到全城各处。无论如何，请转告临时政府，如果7月7日前我们还看不出什么举措的话，我反正都会在这一天在彼得格勒开始逮捕行动的。”

同时，我还简单向波洛夫佐夫汇报了早上由我下达的一些命令。

后来我明白了，我把这些信息报告给临时政府是严重失算。但那时在我看来，让总司令知道这么重要的决定是完全必要的，况且这些决定要以他的名义去执行。我直接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新组建的最高政权不可能保守任何一个秘密，按照萨文柯夫的准确表述，绝密的决定也会“以朋友的方式”搞得众所周知。每天都有三四名部长到苏维埃主席团来表白自己，尽管他们并不是苏维埃的代表。所以要在孟什维克和在克舍辛斯卡娅私邸开会的他们的旧日同志之间建起一道隔离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和这些同志交谈并劝说他们。这种甚至不用求助专业情报人员就可以得知所有消息的途径还能长久存在下去吗？

从实践经验出发，而且按照这些推测，我可以自信地说，7月1日我给波洛夫佐夫的提交给临时政府的报告不可能不传到布尔什维克那里。

现在已经确切地知道并且具有深长意味的是，正好在第二天，即7月2日，列宁突然匆忙开始制订起义的计划。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们没有隐瞒，对他们中大多数人而言起义来得有些突然。他们辩解说，第一机枪团“由于某种原因”起义，而其余的只是“自发”参加进来。而事实上是，一周后，给我们带来如此之多麻烦的第一机枪团团委员会被捕，其主席团中的三个人（就像龙勃罗梭博物馆中栩栩如生的蜡像）真的是吓坏了（龙勃罗梭，1835年—1909年，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侦查学家——译注），他们承认所有的命令都是来自布尔什维克党中



央委员会；而对于我的问题“为什么如此突然发动了起义”，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可能很快要逮捕他们。

7月3日白天发生的事情不仅对于我们这些人，即使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都非常意外。临时政府比我早两小时了解到会有行动。也许，消息也通过同样，但反方向的渠道传到了临时政府。

我是在指定的时间去的。我知道，布尔什维克将在明天发动武装起义。为此，喀琅施塔得驻军以及周边的卫戍部队将在清晨被派遣过来，以增援彼得格勒的匪徒；其中当然包括来自奥拉宁鲍姆的具有强烈布尔什维克倾向的第二机枪团的士兵。布尔什维克会无视临时政府，前往塔夫里达宫，驱散支持临时政府的那部分代表，宣布将最高权力转交给苏维埃并组建新政府。

大约晚上10时，我来到军区指挥部。传来的消息正如预料的那样，非常糟糕。当得知有几个团不同意不参与任何一方的行动并答应明天不走上街头时，我高兴了一下。第一近卫军步兵师的几个团就是这样向我们保证的。完全相反的消息来自戈列纳杰尔团、芬兰团、帕夫洛夫团和相当于第一预备团的整个第二近卫师，无疑还有早已与我们公开宣战的第一机枪团。所有这些团不仅将走上街头，而且将起义。

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都证实，布尔什维克将进攻塔夫里达宫。

波洛夫佐夫决定和哥萨克士兵一起等待事件的发展，当出现合适的机会时再动用这些哥萨克士兵。

工兵代表苏维埃不受这一切的影响，仍然希望能把某些军队拉到自己这边来。

根据部分情报，我得知，早晨8点，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出发朝我们而来；他们是乘驱逐舰来的。登陆的士兵有五六千人。

罗沙利、拉斯科利尼科夫和喀琅施塔得水兵一起，约11点上了岸。吵吵嚷嚷、队不成形，水手们向克舍辛斯卡娅私邸进发，沿途对平民百姓无端开枪。演说家们从克舍辛斯卡娅私邸出来走向他们，提议去塔夫里达宫，占领它并宣布政权归苏维埃。

午后，部分喀琅施塔得水兵攻占彼得-保罗要塞，其余的水兵又鸣枪朝塔夫里达宫而去。枪声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路上遭遇到的男男女女或死或伤。

除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布尔什维克还从普梯洛夫工厂调来11000名工人。事先我已被电话告知他们会有所行动。维堡地区的工人也赶了过来。其时，塔夫里达宫四周和所有邻近街道上挤满了人。这里面就有第二近卫师的人，正如预料的那样，他们比其他近卫团的人数要多。很明显，在这里还有形形色色看热闹的人。

最初的军事行动还在夜里 12 时就发生了，在艾尔杰列夫胡同的“新时代”印刷厂附近。水兵们是到这里来印刷他们的呼吁书的。他们把带来的两挺机枪架在胡同的角落里，时不时地胡乱开火，他们的同志在火力掩护下给呼吁书排了版。在这里，一个看院的人和两名妇女被打死，几个迟归的过路人被打伤。

一大早，在城里，架着机枪的装甲汽车就在街道上开来开去，既不知向谁开火，也不知为何开火，布尔什维克们还在一些十字路口设置了机枪队，从这里掩护着主要的通道……

这支不知为何被称为雷宾德尔伯爵上校分队的行动过程如下：

小分队从皇官广场出发，策马小跑，在离利捷伊内街和施帕列尔街拐角不远处，突然遭遇芬兰团士兵架设在利捷伊内桥上的机枪的袭击。意外遭到射击的哥萨克骑兵迅速向四周分散。我们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别的办法：对于骑兵小分队而言，在街道上、在机枪的直接射程内进行正面反击差不多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时候，首先应该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起来，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就是沿着街道隐藏在房子后面。

就在同一时间，两门大炮运了过来，开始从双轮车上卸下。但其中一门炮立即被第一预备役团的起义士兵包围，另一门炮载着背后中枪的死亡驭手皮斯库诺夫，得以急速驶上了利捷伊内大街，并从前架上卸了下来，还发射了三枚炮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与志愿者队伍在一起的炮兵上尉察古里亚。

在发射第一枚炮弹时，察古里亚只身一人，身边没有士兵，他自己装了弹药。第一枚炮弹是榴弹，它射向 200 步开外围着第一门炮的那群士兵。榴弹射得很准，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四散逃离。这时自己人朝察古里亚跑了过来：他们是近卫军预备营哥萨克上尉菲利蒙诺夫和骑兵司务长。

第二枚炮弹，察古里亚射向了从涅瓦河北岸向他射击的戈奇基斯炮兵阵地。

最后，第三枚炮弹在克舍辛斯卡娅私邸前爆炸。在那里已经宣布成立了由列宁和罗沙利参加的新政府。窗前的爆炸向布尔什维克们表示，我们不仅存在，而且还在积极抵抗。

在这个事件中，小分队有 6 人死亡，25 人受伤。察古里亚不仅夺回了另一门炮，还逐步把人召集起来。此后，小分队的战斗行动结束了……

我们被几万人的人流紧紧包围着。布尔什维克的确在尽力驱策尽可能多的民众，但正是这么多的参与者导致了他们今天的失败。这都是些什么人？士兵？共产党员？根本不是。只不过是些不知如何给子弹上膛的大老粗。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做了许多离奇的承诺，唆使引诱他们，把他们赶进一大群牲畜之中，而放牧人自己却消失不见了。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是思想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准备好冒着生命危险迎着刺刀而上的？其实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彼此各不相顾，



自己也消失在光怪陆离的人流之中。布尔什维克首先陷入困境。随着新来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失去了控制力。到正午时分,就已经很明显,链条被突破了,封锁也不存在了。到了下午,实施控制的专门手段被民众彻底突破,这一切从民众混乱的行动中就能看出来。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甚至在主阵地上都不得不救援自己的老熟人切尔诺夫。大家乱成一团,紧紧站在一起,无法移动。

但是,人群中开始向冬宫射击,这是列宁下达或同意过的指令,还是已经站烦了的更为果断的人们自己决定转为积极行动?在最初的射击之后,接着是又一轮的射击:混乱的射击就这样开始了,并持续了近半个小时。射击可能是对着空中,但毫无疑问是朝着塔夫里达宫的方向。不是前几排在开枪,而是从人群中开的枪,因为正是在我们敌人的前几排中有几个人中枪受伤,他们被自己人的子弹打中了背部。

这已经足够了:随着第一阵枪响,恐慌骤然而降,这是怎样的一种恐慌呀……人群动摇起来,响起了低沉的说话声,开始四散奔逃。那些靠近塔夫里达宫的人们向宫中冲去,但根本不是端着刺刀冲着我们而来,而是为了躲在墙后避开广场上飞来的子弹。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但毕竟不是立即……

枪声渐渐平息。只能看到士兵、共产党员的武装分队四处奔跑,那些从人群中开火的人也消失于人群之中。他们在奔跑的人群所传出的一叠连声的惊恐面前无法坚持。

“必须要有非凡的意志力,才能对抗这种被恐惧所驱使、因出乎意外而加剧的自发洪流。惊慌失措也冲走了那些肇事者,人群席卷他们而去。

当然,必须预料到,骨干人员将恢复常态,并很快返回来。但是此时,另一个情况帮了我们的忙,也许,在其他条件下这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不顾一切拼命者的低沉情绪之下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使围攻不能立即恢复:射击还未能停息下来,就下起了雨,而且是倾盆大雨。滞留下来的一小撮人匆忙躲起如注的雨水;四周变得空空荡荡……

当然,没有可能一一列举其他开火的所有地点。能够确定的是,除少数情况,如反侦察机关的开枪或是在塔夫里达宫附近的射击之外,开火没有对着我们的部队,而是为了恐吓或由于紧张射向了平民:我们的部队没有反击他们,因为我们根本就没了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团,第一顿河哥萨克团走上了街头。从皇宫广场开始,在短短的距离中,就不时有个别连队离开这个团。其中,在涅瓦大街和海军部大街拐角处有人向其中的一支部队投掷了炸弹,造成了6名哥萨克和20匹马的伤亡。该团在这天的损失是:20人被打死,70名哥萨克和约100匹马受伤。但只是第一哥萨克团,仅仅是这个团!

布尔什维克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城市完全的主人的。（尼基京 Б.，《决定命运的年代》，莫斯科，2000 年，第 103—119 页）

尼基京证明，他从法国同事皮埃尔·洛朗上尉那里得到加涅茨基从哥本哈根汇钱到彼得格勒的电报复印件，其中包括来自列宁的电报。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

走进拨给临时政府的房间后，在里面我碰见了三位部长。门右边站着满脸深红的佩列韦尔泽夫；左边面对着门，涅克拉索夫在一张不大的桌子后气喘吁吁；他对面，脸色苍白如纸的是捷列先科。就捷列先科一人和我说了话。他问道：

“你有足够证据指控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有联系？”

我回答说：“比足够的还要多。”

捷列先科说：“在这种情况下，请开始进行逮捕。”

我说：“已经这么做了。”

捷列先科给我下达的指示，实质就是代表临时政府批准了 7 月 1 日我以总司令名义下发的命令和逮捕令，同样也批准了总检察长佩列韦尔泽夫直接下达给军区指挥部的命令……

关于布尔什维克叛国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所有的人，而且全文在报纸上公布。它闪电一般令民众感受到了震动。一得知列宁叛国的消息后，彼得格勒的士兵马上就转到了我们这边！在得知这些消息后，士兵们才走上街头并开始保卫塔夫里达宫。

受到这极为严重的指控后，那些头头们就立即躲到他们的洞穴中去了。远处个别起义的轰鸣声继续响了两天。（尼基京 Б.，《决定命运的年代》，莫斯科，2000 年，第 122 页）

尼基京上校朴实的记录揭示了法国情报机关的参与，他们对质疑布尔什维克饶有兴趣。他还指出，随后佩列韦尔泽夫突然被解职的原因在于，他“提前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叛国的信息”。

不过，布尔什维克是否得到加涅茨基的资金仍然未能得到证实。清楚的只是，有大笔资金是通过加涅茨基的亲戚叶夫根尼娅·苏缅松办理的。叶夫根尼娅·苏缅松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法比安·克林斯兰股份公司”彼得格勒分公司担任会计，该公司拥有购买和销售各种商品的巨大网络。也许，是通过她把资金转给了布尔什维克。

洛朗所提交的电报副本并不能令人信服，相反，有这样一种意见，洛朗利用尼基京来打击“失败主义者”。



不管怎样,1917年10月,临时政府司法部长П. Н. 马良托维奇召开了司法和检察机关负责人会议,会上侦查员П. А. 亚历山德罗夫报告了对“布尔什维克案件”的侦查结果,他承认侦查的证据是“伪造的”。讨论后,马良托维奇宣布,没有从布尔什维克的行为中发现“邪恶图谋”。会议结论刊登在了《俄罗斯晨报》(1917年10月14日)和《日报》(1917年10月21日)上。而克伦斯基却违反了既定的程序,竟然私自下达了审讯列宁的命令。(兹维亚京采夫 А.，《命运主宰者的沉浮——俄国律师传记中的悲惨篇章》，莫斯科,2006年,第164页)

尽管公开承认自己信奉失败主义,但列宁却不允许吉尔方特-帕尔乌斯前来苏维埃俄国,也从来都不承认获得过资助。不但如此,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德国军方认为吉尔方特的行动极不成功,他本人也差一点被杀。

总之,尼基京笔记尽管有声有色,但却是极为片面的,所以对该笔记必须要有其他的证据来加以补充。

除了一份小报《生动的话语报》之外,没有任何彼得格勒的报纸刊登过尼基京透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拿过“德国资金”的消息。为什么?因为斯大林阻止了文章的出笼。正如 P. 斯拉塞尔所写的,斯大林去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的 H. C. 齐赫泽,“耍了自己与这位格鲁吉亚同乡的友情的手腕”,说服他要以革命阵营的团结为重,阻止“反革命的挑拨离间”。于是,齐赫泽要求各编辑部不得刊登来自政府的消息。

这个表明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政策全然不同的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远不是唯一的。

斯大林虽然阻止了消息的发表,但并不能制止政府的所有行动,但他毕竟在另一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列宁感激他,并且永远记住了这一点。

政府继续积极自卫,布尔什维克被迫撤退,试图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请注意 B. 尼基京所描述的人群自发行动的画面,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就销蚀于其中。整个俄国革命中各方之间的真实关系就是这个样子。

实际情况如下:

开始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起义,而是由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发起的群众性反战争和反政府示威游行。主要口号是拒绝在前线开展新的进攻,将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决定游行示威者情绪的是反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开往前线的意愿。

事实上,在首都都有两起示威游行,一起由社会党人领导,另一起由布尔什维克领导。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证实的那样,反政府的自发行动开始积聚力量,并挣脱了布尔什维克的控制。

“迫于普通党员的压力,以及由于害怕被更左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取代,彼得格勒党组织和‘军队’中的一些迫不及待的分子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针。彼得堡委员会的

一些委员印制和散发传单，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呼吁立即推翻政府，逮捕部长。

“同样，在准备未能成功的6月10日示威游行时，还是这些人制订了自己的方案，计划占领最重要的公共部门及武器弹药仓库。

“6月18日后，当期待已久的俄国军队在前线的进攻开始后，阻止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群众的自发行动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卫戍部队的数千名士兵，包括‘军队’的许多成员，在得知要被派往前线后，要求立即推翻临时政府。

“6月的下半个月，列宁都十分注意阻止自己的支持者中那些有立即行动倾向的人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他还在为将于7月26日开幕的党的代表大会制订党纲草案。这几个星期里超乎寻常的重负和压力，使列宁在月底感到极度疲劳。为了稍事休整，6月27日，他在妹妹玛丽娅的陪同下从彼得格勒出发，前往位于芬兰涅伊沃拉村的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别墅。他在那里休息了几天，在树林里散步，在附近的湖中游泳。”（拉宾诺维奇 A.，《彼得格勒 1917 年的革命》，莫斯科，2003 年，第 34 页）

7月4日早晨，传来彼得格勒发生群众运动的消息，列宁返回首都。

实际上，这是一场自发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一群士兵差一点就逮捕了克伦斯基。苏维埃中的工人部没有服从苏维埃的领导，他们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并组建一个保证政权和平转交的特别委员会。

列宁来到位于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所在地的克舍辛斯卡娅私邸。列宁在阳台上向斗志昂扬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表了演说。他们要投身于战斗。

他试图阻止他们，但完全不清楚该怎么办？

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不再被提起，因为苏维埃的领导放弃了政权并支持临时政府。

列宁呼吁水兵们要坚定、克制和保持警惕。这就等于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对他们说。

这时，局势变得白热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7月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主张阻止民众。但第二天，当看到形势越发混乱时，他们又表示支持民众，不过要和平发展。

布尔什维克的另一些领导人（M. 拉齐斯、И. 斯米尔加、H. 波德沃伊斯基、B. 涅夫斯基）坚持夺取政权的方针。

在这种日益混乱的局面下，苏维埃的领导向北方战线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军人委员会求助，请求他们派军队来建立秩序。

此外，政府公布了作为德国间谍的列宁的活动情况。

“现在已经清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花费了大量资金用于对俄国的破



坏活动,而且其中部分资金是专门拨给布尔什维克的。

“有关这一问题的现有资料表明,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更不用说基层党员,根本不知道这些资助。尽管列宁本人看来是知道‘德国资金’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对他的立场或者党的政策有怎样的影响。归根到底,这种援助对革命的结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至于7月事件,起义是列宁和德国人煽动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正如我们所见,自6月中旬开始,列宁尽一切可能在防止起义。”(拉宾诺维奇 A., 同上,第49页)

结果,“半个起义”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沉痛失败。在彼得格勒,情绪骤变。

7月5日,中央委员会呼吁停止街头行动,但为时已晚:各主要政治力量都明白,应当防止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7月5日,《真理报》编辑部遭到破坏,列宁差点没来得及离开编辑部,编辑部的几位工作人员被捕。

普列汉诺夫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呼吁:“革命必须坚决、迅速、无情地粉碎挡在它道路上的一切。”类似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停止街头行动的文章和呼吁非常之多。

7月7日,临时政府总理Г. Е. 李沃夫辞职。克伦斯基被责成组建新的内阁。

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允许将反政府的人关进监狱,刑期可长达三年;前线指挥官有权向没有得到命令而擅自后退的军人开枪;恢复了死刑。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查封。公布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

加米涅夫被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了起来。

列宁从谢尔盖·阿利卢耶夫那里得知了关于逮捕令的消息。斯大林曾在阿利卢耶夫的寓所住过,他是斯大林在高加索时的老朋友。

斯大林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很坚定:列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当局投降。

大多数战友(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相当轻率地建议列宁去自首,在公开的审判中去揭露政府,使对列宁的审判成为“德雷福斯案件”。

列宁动摇了。7月7日,他发表声明,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确认这一逮捕令,他准备自首。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带着这份声明前往苏维埃,以便获得对列宁安全的保证,并确认审判会迅速和公正地进行。

他们没有得到保证,只是听到了模棱两可的答复,说将尽一切可能确保列宁的权利。

列宁决定不向政府自首,并在供发表的声明中说道:“我们改变了自己原打算服从临时政府逮捕我们命令的意向。原因如下……其实已经很清楚,有关列宁及其他人‘间谍行为’的‘案件’完全是反革命党派蓄意策划出来的……目前在俄国没有任何司法公证的保障。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成立了调查间谍案的委员会,但在反革命势力的压力下解散了该委员会……现在把自己交到当局手中就意味着把自己交给

米留可夫、阿列克辛斯基、彼列耶尔泽夫之流，交到疯狂的反革命分子手中，对他们而言，所有对我们的指控将是国内战争的一个简单插曲。”（引自：拉宾诺维奇 A.，同上，第 70 页）

7 月的失败再次把斯大林推到党领导层的最高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在拉兹利夫，住在窝棚里；加米涅夫在蹲监狱；托洛茨基向当局自首，也在蹲监狱。“小政治局”中只有一位成员处于自由状态，那就是斯大林。

他在保护列宁上采取了积极和坚决的立场，随后又保证了领袖与中央委员会的联系，这使他们的心贴近起来。理论和组织工作是一回事，生死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了。斯大林甚至参与了改变列宁外貌的工作，他亲自为列宁剃去了胡子。转入地下活动后，列宁是应该对这位格鲁吉亚人怀有感激之情的，尽管这个人还没有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还有点粗鲁，在他的身上还不具备像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那样的知识分子风度。

斯大林肩负着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进行有关归还克舍辛斯卡娅私邸、撤出彼得-保罗要塞、水兵返回喀琅施塔得的谈判。布尔什维克失败了，而他在保障撤退。

伊斯梅洛夫团从北方战线来到市里，准备保卫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虽然彼得堡委员会里头脑发热的人们还在号召斗争，并建议宣布总罢工，但一切都表明，革命在退潮。

7 月的“半个起义”是在前线出现灾难的背景之下发生的，按米留可夫的话来说，这导致了“革命民主领导人”的惊慌失措。苏维埃宣称临时政府是“具有无限权力的拯救革命的政府”。

把“无限权力”转交给政府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就终止了自己的权力。布尔什维克旗帜上曾经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现在，布尔什维克已经没有了进行权力斗争的任何合法手段。

然而，政府的“无限权力”不是经由知识分子的坐而论道就能实现的，而应该采取恢复秩序的果断行动。换句话说，选择很简单：要么是列宁，要么是科尔尼洛夫。

经过艰难的争论，五个政党（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人民自由”党人）决定组成联合政府。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社会革命党人鲍里斯·萨文柯夫被任命为陆军部的领导。他以前曾是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的负责人、西南战线的政委，站在他身后的是科尔尼洛夫将军。萨文柯夫本人是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坚定拥护者。

在 Ф. 斯捷布恩的回忆录中充分反映出了萨文柯夫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作用：“萨文柯夫是一个孤独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个大政治家，但意志不坚定。他习惯于充当能够承担一切责任的恐怖组织头目的角色，是天生的阴谋家和独裁者，喜欢夸大



自己对别人的控制力。与其说他竭力拉近与自己喜欢的科尔尼洛夫以及与自己鄙视的克伦斯基的关系,不如说他在自己策划的政治游戏中利用了他们,以免他们泄露他的阴谋。”(引自:约费 Г.,《一九一七年:列宁、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莫斯科,1995年,第96页)

无论克伦斯基如何竭力想守住自己的中心地位,他都应该做出选择了。不管怎样,总理已经没有机会保住自己的职位了。

然而,克伦斯基希望能坚持到立宪会议选举,他甚至认为自己将是俄罗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萨文柯夫在政府的任职表明,总理和他最亲密的伙伴——H. B. 涅克拉索夫和M. И. 捷列先科(他们三人都是共济会“俄国各族人民的伟大东方”分会的成员)倾向与军队的领导结成联盟。

应当认为,对萨文柯夫来说,大多数将军的意向并不是秘密,他们绝不会是皇帝退位的支持者,而是赞成整顿军队和后方的秩序。但在未来的全景图中,既不会看到左翼社会党人,也不会看到温和的社会党人。他们的政治领袖是亚历山大·古契科夫。早在3月份,他就与军方上层进行商讨,因为他明白,革命的自发力量或迟或早会被控制住,而除了军事力量外,俄国主张国家强权的人们手中,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古契科夫设想,如果他能够在1916年底实现军事变革,并且不让革命在首都街头爆发,就可以回到以前的局面。

企业家、银行家A. И. 普梯洛夫与古契科夫协同一致,他创建了“俄国经济复兴协会”,其他一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该协会的成员。

与此同时(1917年4月),П. H. 弗兰格尔将军抵达首都接受新任命,开始组建军事组织,并在寻找领导人。

技术型知识分子的联合组织,“比萨拉比亚铁路协会”、“共和国中心”在思想上很接近古契科夫、普梯洛夫、弗兰格尔。他们也主张实行“强硬制度”,并与“军事联盟”、“哥萨克部队联盟委员会”、“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联盟”、“被俘逃脱者联盟”、“残疾军人联盟”、“突击营委员会”、“军人义务联盟”、“个人榜样同盟”等军事组织建立联系。

在“共和国中心”的军事部里,人们认为:“如果说沙皇制度在许多方面只是不妥当的话,那么临时政府的制度正变得不可容忍……应该结束它。”(引自:约费 Г.,《一九一七年:列宁、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莫斯科,1995年,第70页)

科尔尼洛夫将军和黑海舰队司令员A. B. 高尔察克上将都被认为能起到军事变革领导人的作用。

然而,高尔察克应美国大使馆的邀请去了美国,这样就只剩下了一名潜在人选。

总之,被称为“军官联盟”的组织所联合到的与其说是将军,不如说是更为年轻、更为积极的前线军官。

军官反对派的最好战的代表是第三骑兵团的指挥官 A. M. 克雷莫夫中将，他是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 A. B. 萨姆索诺夫将军的战友。1914 年 8 月，萨姆索诺夫在东普鲁士阵亡。在萨姆索诺夫麾下，上校军衔的克雷莫夫受命履行将军的职责，率兵突围，升迁很快。他与古契科夫关系密切，早在 1915 年他们就有了联系，当时他已经开始在考虑推翻尼古拉二世的可能性。

实质上，“科尔尼洛夫阴谋集团”开始形成时，是一些不同派别的联盟。它的基础既有萨文柯夫的，也有科尔尼洛夫的夺权斗争。

在克伦斯基的记述中，对 1917 年夏季进攻失败后的局势作了评价：“我们的选择总的来说是极小的。在我看来，布鲁西洛夫将军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他也完全不知所措了……而局势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在全部前线采取强硬手段，事情可能会灾难性地快速蔓延开来。预计，德国人的打击将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我必须考虑到，任命一个支持邓尼金计划的人，将会立即导致士兵群众抗议的全面爆发。”（克伦斯基 A.，《科尔尼洛夫案件》，佛蒙特，1987 年，第 15 页）

换句话说，作为新的最高统帅的科尔尼洛夫是能够让大多数人满意的。

7 月 18 日到 19 日的深夜，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随即，他要求给他提供四个“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他要“对自己的良心和全体人民负责”，即他立马企图将自己置于政府之上。

科尔尼洛夫完全证实了布鲁西洛夫对他的刻薄评价：“狮子的野心，公羊的智慧。”他不打算玩弄外交手段。

尽管作为对“条件”的答复，应该立即将其解职，但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认为要把事情压一压。

一周后，科尔尼洛夫来到大本营，当着临时政府 И. 尤列涅夫部长和 A. 彼舍霍诺夫部长的面宣称，必须对后方和铁路实施军事化管理，不仅要“对叛乱分子”和“不服从命令的人”，而且要对“煽动者”实施死刑。从这些话里，可以听到 1916 年夏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对尼古拉二世呼吁的余音。科尔尼洛夫在直接干涉政治，并在公开威胁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

为了镇压不服从命令的部队，他建议建立“制度最严、口粮最少的集中营”。集会、游行和罢工被禁止。

不过，在政府看来，这位将军还是起到了对其任命所起的作用。

科尔尼洛夫两次来到彼得格勒，并与政府讨论自己的建议。最初，克伦斯基倾向于接受这些建议，但后来决定暂不做出最后的决策。

8 月 12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务会议，会上总理和最高统帅进行了公开辩论。

“不管是谁提出了什么样的最后通牒，我都要使他服从最高政权机关的意志，服从我，也就是他的最高领导。”克伦斯基的这番言论明显是针对科尔尼洛夫说的。



总之，总理的立场是矛盾的，他像以前那样力图保持平衡，证明自己正确，还要进行威胁，捍卫“革命成果”。

“克伦斯基歇斯底里的演说”——这就是米留可夫对他这一讲话的印象。

第二天，科尔尼洛夫来到莫斯科。当他走出车厢时，军官们用双手把他抬到了汽车前。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人群的狂热欢呼。

如果客观地评价，他在会场上的演讲中，并没有任何新东西。但这位将军已经成为阻止崩溃的象征，所以尽管克伦斯基在前一天禁止科尔尼洛夫涉及政治话题，但他的讲话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在其他将军的发言中就公开谈到了对抗的话题。

“应该立即严格限制中央与地方委员会和苏维埃对国家权力的窃取。”这是顿河哥萨克部队军事首领 A. M. 卡列金中将的讲话，他公然谈论了当前的政治任务。（米留可夫 П.，《第二次俄国革命史》，莫斯科，2002 年，第 333 页）

总之，莫斯科会议暴露出了左翼和右翼的不可调和以及当局的无能。

表面上，力量平衡得到维护，但在内部，分裂加剧了。

临时政府还有足够的机会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但社会主义政府由于自己的本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科尔尼洛夫、军官们以及他们背后的金融和工业集团、国家机关、技术型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通过政治手段来改变局势的可能。政府无法让他们感到满意。

克伦斯基的寿命很长，活过了自己所有的敌人和战友。所以，他在回忆科尔尼洛夫时，总会谈到将军的诚实，这不是偶然的。显然，克伦斯基不能原谅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列宁和科尔尼洛夫”之间进行选择时，他摧毁了俄国国家政体的整栋脆弱的大厦。（有趣的是，在 1991 年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阴谋”时期，人们曾把当时的苏联总统 M. C. 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与克伦斯基的行为作了比较，因为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间进行平衡的尝试都导致了国家的解体。）

第十二章

斯大林,列宁的复制品

斯大林是列宁的配角、盟国背离克伦斯基、克伦斯基出卖了科尔尼洛夫并转向布尔什维克

在政府试图团结各方的背景下,7月3日事件之后的布尔什维克显得微不足道。不过,所有仍在行动的力量都处于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的不稳定状态。所以,希望仍然存在。

7月,党的领导权落到了两位尚处于自由状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肩上。

在前线局势最终明朗和实施死刑后,士兵委员会的一些心怀不满的代表们纷纷来到首都。托洛茨基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达官显贵们”对他们无话可说,而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则让前方的士兵(29团的代表)与彼得格勒90个工厂的工人们、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们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来参加会议。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做自己的事情。

接着,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做了主题报告。

报告的主要思想是:反革命在当前取得了胜利,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和从前一样,战争还在进行,经济崩溃无法克服,农民没有获得土地,将展开决定性的战斗;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妥协派的苏维埃帮助资产阶级反革命军事力量“击溃了布尔什维克”,解除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自己也因此失去了权力;必须做



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并积蓄力量。

斯大林的报告内容是与列宁商量过的。

尽管令人惊讶,但在第六次(联合)代表大会开幕前,在彼得格勒几乎所有区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看来,党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4月时,党的队伍只有8万人;到7月,已达24万人。

代表大会于7月26日在维堡开幕,斯维尔德洛夫、奥里明斯基、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入选主席团。最后三位代表了所谓的“区联派”(领导人是托洛茨基),他们持介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中间立场。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也是由斯大林作的。他谈到了过去两个月的斗争,并得出结论:“很明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了布尔什维克,同时也出卖了自己,出卖了革命,助长和纵容了反革命势力。反革命专政在后方和前线全力向自由进攻。昨天还在埋怨革命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盟国的报刊,今天突然感到心满意足了。由此可以断定,本国的和盟国的资本家是参加了镇压的‘事业’的。”(斯大林И.,《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8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大林的分析与现实完全相符。

7月30日,斯大林又做了一个题为《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有些同志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所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空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破坏,如果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基础没有动摇,那么他们这样说是对的。所有国家都把干预经济领域的问题当做在战争状态下必须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德国,这个问题也已由实际生活提出来了,不过它的解决没有群众的直接和积极的参与。我们俄国的情况不同。我国破坏的程度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任何国家在战争状态下都没有我国所具有的这种自由。其次,还必须估计到工人的高度组织性:例如在我们彼得堡已经有66%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最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广泛的组织。显然,享有充分自由和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人,如果不想在政治上自杀,就不能拒绝积极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要求俄国在欧洲没有“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暂缓”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可耻的迂腐之见了。哪个国家有更多的可能,那个国家就先“开始”……

革命既然向前迈进了这样一大步,它就不能不引起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它就必然会使反革命受到刺激。这是使反革命动员起来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由前线的进攻政策开始的冒险行为,以及使临时政府威信扫

地,并使反革命鼓舞起来去进攻政府的一连串的前线溃败……

使俄国反革命力量加强起来的还有第三个因素,这就是盟国资本家。既然盟国资本家看到沙皇制度准备单独媾和而背叛过尼古拉政府,那么只要目前的政府无力保持“统一”战线,谁也不能阻止他们和这个政府决裂。米留可夫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俄国在国际市场上被当做人力的供应者,并因此而获得金钱,如果事实表明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新政权无力击溃德国的统一战线,那么这样的政府也就不值得资助了。没有金钱,没有贷款,政府就一定要垮台。立宪民主党人在危机时期所以有很大的力量,其秘密就在这里。克伦斯基以及全体部长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手中的傀儡。立宪民主党人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有盟国资本家的支持。(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3、175页)

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见解很有说服力。大体上,可以重复 P. 斯拉塞尔的评价:“斯大林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参与辩论,总体上显示了高水平。”(斯拉塞尔 P.,《斯大林在1917年》,第218页)

在大会上,斯大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不过在得票最多的前四名中,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列宁获得了总共134张选票中的133张,季诺维也夫得到132张,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都是131票。入选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阿尔乔姆(Ф. А. 谢尔盖耶夫)、Я. А. 别尔津、А. С. 布勃诺夫、Ф. Э. 捷尔任斯基、А. М. 柯伦泰、М. К. 穆拉诺夫、В. П. 诺根、Я. М. 斯维尔德洛夫、М. С. 乌里茨基、С. Г. 邵武勉、Н. И. 布哈林、Н. Н. 克列斯廷斯基、В. П. 米柳京、И. Т. 斯米尔加、Г. Я. 索柯里尼柯夫,候补委员包括:П. А. 贾帕里泽、А. С. 基谢廖夫、Г. И. 洛莫夫、Н. А. 斯克雷普尼克、Е. Д. 斯塔索娃、А. А. 越飞、А. 洛莫夫、Е. А.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В. Н. 雅科夫列夫。

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小圈子”,并成为《真理报》的主编,他获得了竞选该职的最多选票。

请注意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设置,其成员有: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斯塔索娃,它负责处理党的组织事务。斯大林没有表现出加入其中的兴趣。

总之,6月和7月的危机巩固了斯大林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他的一个危险的对手 Л. Д.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具有大众政治家的卓越才华,而这种才华斯大林几乎是不具备的。

其时,斯大林把莫斯科会议后的政治局势定义为“反革命的加冕”。在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8月17日刊登在《交易所公报》上的一则信息,即在莫斯科会议后美国人向临时政府提供了50亿美元的贷款。斯大林认为这是右翼力量得到加强的明显



征兆。

局势决定了轻松获胜是不可能的。如果军人和工业家得到进一步加强,他们很快就会用实力打垮自己的对手。这样,变得更加有趣的一点就需要探究一下,斯大林是如何利用“黑色宣传”的方法与政治反对派进行论战的。

П. П. 列布申斯基在 1917 年 8 月 3 日全俄工商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严厉批评了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首先是粮食垄断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原有的商业体系,又没有建立任何新的体系来代替它。他说道:“……我们知道,事物生存的自然法则有着自己的规律,遗憾的是,这种自然法则将严厉惩罚那些违反经济规律的人们……因此,先生们,我们身不由己地在等待:这场灾难,这一经济崩溃对俄国来说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已经处于灾难的前夕,那所有的人就将亲眼目睹它,也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知道走错了路……我们觉得,我所说的一切是不可避免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却需要用饥饿和贫穷的魔掌,来抓住人民的冒牌朋友、各委员会和各苏维埃委员的喉咙,以便让他们清醒过来。”(引自:彼得罗夫 Ю.,《20 世纪之初的莫斯科资产阶级:企业活动和政治》,第 282 页)

列布申斯基的发言中没有任何反革命,特别是反人民的言论。在冻结谷物的价格后,粮食的垄断未影响到工业产品的价格,结果是 1917 年夏天,一普特(16 公斤)粮食只相当一个铁马掌的价格。

作为对这种公开掠夺的回应,农民不再出售粮食。

斯大林对列布申斯基讲话的理解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挑衅时期》一文(《无产者报》,8 月 22 日)中,他写道:“难道列布申斯基不久以前不是曾经明目张胆地公开威胁说,资产阶级在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忘记求助于‘饥饿和贫穷的魔掌’以减少工人和农民的人口吗?”(斯大林 П.,《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241 页)

但绝不能说,《真理报》的主编是真的误解了他的讲话,而不明白为什么实际上农村停止了粮食垄断。

例如,三天后,斯大林发表了《二者必居其一》一文(《工人日报》,8 月 25 日),其中说道:“农民‘不拿出粮食来’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他们拿粮食换不到什么东西。农民需要花布、鞋子、铁制品、煤油、糖,可是这些产品他们得到的很少;拿粮食去换那些买不到工业品且在不断贬值的纸币,那是没有意义的。”(斯大林 П.,《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252 页)

在这里,提出这样的经济承诺是正确的,它证实有意识地运用宣传武器来反对列布申斯基是对的。列布申斯基是敌人,而反对敌人用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

(我们要提前说一下,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差异的问题,即所谓的“价格剪刀差”的问题,将是党的主要经济政策之一,并且只有在实行强制的集体化之后,在农村成为已经开始的工业现代化的“牺牲品”时,才能对它“划句号”。)

在向“资本家”列布申斯基射出政治炮弹之后,斯大林没有遭到对手的任何辩驳。他们之间的辩论是不可能的。

但在另一事件中,如此放肆的行动引起了他的战友们的愤怒。事情是这样的:

8月13日,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斯大林和斯米尔加应当与军事组织中央局的代表们会面,同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委员会要《士兵报》脱离军事组织的管理,转由中央管辖。交办这件事是非常委婉的。但斯大林表现得十分霸道,他向代表们声称,没什么可谈的,必须“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去执行决议。此外,斯米尔加要求军事组织中央局上交《士兵报》的资金。

结果,爆发了有关隶属关系的不愉快的解释、申诉,“小圈子的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试图安抚那些被伤及的“军派们”。因而替换掉了斯大林,委派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进行此项谈判。

这一事件让许多人,至少是让斯维尔德洛夫想起1911年发生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当时斯大林也主持《真理报》的工作。

怎么说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性格怪僻。也许,有人已经想到:“就不能把他甩掉吗?”但是,不行,可以轻而易举地列举出他的许多长处,于是这种断然的想法也就自动消失了。

实际上,在这些人物中有谁是天使或者哪怕仅仅是个好人呢?

斯大林不抱任何幻想地评估了在他眼前折腾的当权者中的冲突。实际上他并不认为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以及工业家列布申斯基或者将军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冲突各方几乎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敌对势力,并无两样。

当然,他们代表了统治精英,他们的敌对削弱着现政权。如此而已,还能指望什么呢?

科学地说,问题在于方法。如何利用他们的敌对?

他并不知道答案。

可以说,彼得格勒笼罩着政治迷雾。突然,列宁拨开了斯大林眼前的迷雾。在总理和总司令不断升级的冲突中,他看到了希望之光。

得知科尔尼洛夫的行动之后,列宁从中预测到了必然结局。

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我们策略上的改变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同克伦斯基斗争的方式。我们丝毫没有减弱对克伦斯基的敌视,我们决不收回说过的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话,我们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但我们说:应该考虑时机,现在我们不打算推翻克伦斯基,现在要用别的方法来同他斗争,这个方法就是向人民(与科尔尼洛夫作斗争



的人民)说明克伦斯基的软弱和动摇。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做的,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主要的了,改变就在这里。

其次,改变还表现在: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向克伦斯基提出种种“局部要求”,即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彼得格勒工人,调喀琅施塔得、维堡、赫尔辛基的军队到彼得堡来,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罗将柯,通过法律规定地主必须把土地转交农民,实行工人对粮食征购和工厂的监督,等等。这些要求我们不止是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与其说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还不如说应该向投入反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工兵农提出来。我们要带领工兵农向前进,鼓励他们去痛打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竭力促使他们立刻提出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的要求,让他们认识到逮捕罗将柯和米留可夫、解散国家杜马、关闭《言论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对之进行侦查的重要性。特别应该推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这方面走。

如果认为我们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从侧面包抄。此刻与其说应该鼓动直接反对克伦斯基,不如说应该鼓动间接反对他,还是反对他,只是变成了间接反对。所谓间接,就是要求对科尔尼洛夫进行一场积极而又积极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只有这场战争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掌握政权,但鼓动时应该少说这些话(牢牢记住,明天的事变就可能使我们掌握政权,那时我们决不放弃政权)……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战争,应该带领群众,唤起群众,激励群众……(列宁 B.，《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119、120 页)

列宁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如此写道。

的确,军队领导和临时政府的分歧大大削弱了双方的力量,使得布尔什维克鬼使神差地胜出了。

除此之外,7月3日示威游行之后,列宁就预告,为了准备武装起义,需要将党的工作集中到工厂委员会来,将委员会变为起义的机构(这里应当指出,这个观点与斯大林巴库时期的组织思想有着直接联系,斯大林当时就认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是生产部门的党的基层组织)。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行动并不是政府宣传的所谓起义或叛乱。不仅如此,在克伦斯基的完全赞同下,大本营准备在首都实行战时状态并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

8月中旬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市杜马的选举,其结果显现出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稳步增长(他们共得到了183624票,获得了67个席位,只输给了得到205659票和75个席位的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获得的选票与5月的区议会选举相比增长了14%。这次,立宪民主党人共获得了42个市杜马席位,孟什维克获得了8个。

应当指出,刊登在《无产者报》上的斯大林所写的致选民呼吁书,非常令人信服。因此,8月,双方都在开始积聚力量。

8月21日获悉,德国人占领了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港口里加。稍早一点,8月11日,在彼得格勒小奥赫塔区发生火灾,烧毁了四个生产弹药的工厂及大量炮弹;三天后,另一场大火烧毁了喀山的火药制造厂和弹药库;8月16日,彼得格勒的威斯汀豪斯军工厂被大火彻底烧毁。没有人怀疑这一系列火灾是人为的破坏活动。

在这种背景下,8月22日,科尔尼洛夫向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发去电报表示:“需要采取严厉和果断的措施”,“如果政府想挽救首都”免遭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则有必要立即采纳他所提出的措施,并立刻让彼得格勒军区服从他的指挥。

8月23日,萨文柯夫来到莫吉廖夫。在科尔尼洛夫主持的会议上,他说,近期政府就将满足总司令的要求。萨文柯夫提醒,8月28日和29日,在彼得格勒有可能会发生“布尔什维克的重大行动”,因此他请求“命令第三骑兵团在8月底前集结到彼得格勒附近,并交给临时政府指挥”。

“同时,萨文柯夫说道,行动应该是绝对果断和无情的。

“科尔尼洛夫将军对此回答说,他不懂还有什么其他行动可以解决问题,他将发布相应的指令,而且他向来认为在使用军队制止混乱的问题上需要严肃对待,他已经下达命令,将把那些向空中射击的军官交给法庭。至于这一次,既然布尔什维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将有所行动,则同样要竭尽全力镇压。

“站在桌旁的巴拉诺夫斯基上校从自己的角度补充道:‘当然,必须以最果断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且对他们的打击要让整个俄国都能感受到。’

“接着,萨文柯夫向科尔尼洛夫将军说道,为了不出现失误,也是为了不让布尔什维克提早行动,预先把骑兵团集中到彼得格勒是非常必要的,集中好之后就宣布彼得格勒军事戒严,并公布含有一系列限制的新法令。

“为了让临时政府准确知道,应当何时宣布对彼得格勒军事区实行戒严,何时公布新法令,有必要让科尔尼洛夫将军准确电告萨文柯夫骑兵团抵达彼得格勒的时间。

“此后,萨文柯夫和巴拉诺夫斯基就离开了。

“为了证明科尔尼洛夫将军和陆军部副部长萨文柯夫关于向彼得格勒调集第三骑兵团的事,现引用8月27日2点40分发给萨文柯夫的加密电报:‘陆军部副部长:骑兵团将于8月28日晚在彼得格勒附近集中。我请求8月29日宣布彼得格勒戒严。第6394号。科尔尼洛夫将军。’”(《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案件:前最高统帅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及其同谋案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卷宗(1917年8月—1918年6月)》,2卷本,莫斯科,2003年,第2卷,第488—489页)

与此同时,在与萨文柯夫单独交谈时,科尔尼洛夫表示,无论是克伦斯基本人,还是临时政府,他再也不会相信,必须要有新人进入政府,还说苏维埃是没有生命力的。



但同时，科尔尼洛夫又说，他准备尽全力支持克伦斯基。

这里存在着立场的双重性。的确，萨文柯夫对科尔尼洛夫给予克伦斯基的这种形式上的支持是满意的。但在未来的几天，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商定的行动计划就突然破灭了。

接下来发生了如下事件。

1917年8月24日。彼得格勒。克伦斯基致电(第10085—36848号)科尔尼洛夫，电报中说，彼得格勒军区的全部地区交给他全权管辖，除了彼得格勒市及其“周边地区”。

1917年8月24日晚。莫吉廖夫。大本营。在与科尔尼洛夫谈话时，萨文柯夫请求，不要让A. M. 克雷莫夫指挥派往彼得格勒的骑兵军，而且要派遣“正规骑兵”而不是地方师，科尔尼洛夫同意了。接着科尔尼洛夫表示，他将全力支持克伦斯基，“因为这是造福于祖国所需要的”。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一旦骑兵军到达彼得格勒附近，该市立刻宣布戒严。

1917年8月25日16点整。克雷莫夫将军把特别军总司令的命令文本制作了7份，该命令从其公布之时起生效。根据该命令，他的军事行动将推进到芬兰、爱沙特兰、波罗的海舰队和彼得格勒市区。科尔尼洛夫下令要在彼得格勒市区恢复秩序，解除不可靠部队的武装，对付掠夺者、勒索者和逃兵时不排除使用武力。根据该命令，同时将实行戒严，组建一批由三名军官组成的战地法庭，从19点至次日早晨7点禁止上街，禁止开会、集会及未经预先审查的报纸出版。

1917年8月25日。白天。莫吉廖夫。大本营。科尔尼洛夫在与临时政府最高统帅部委员M. M. 菲洛年科谈话时询问他如何看待在俄国建立军事独裁的问题。菲洛年科回答说，他持反对态度，理由是独裁唯一的候选人科尔尼洛夫对国民事务是外行，因此独裁只是装个样子，除了在社会民主阶层中引起愤怒外，一无所获。接着，菲洛年科赞成执政内阁，即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强权内阁。科尔尼洛夫同样表示支持内阁执政。

1917年8月25日晚。克雷莫夫去自己部队的驻地，奉命在接到科尔尼洛夫的相关命令之后，立即向彼得格勒进发，占领城市，解除卫戍部队的武装；派出一个旅去解除喀琅施塔得驻军的武装。同时，禁止他释放被临时政府逮捕的旧政权的拥护者。

1917年8月25日晚。莫吉廖夫。大本营。Л. Г. 科尔尼洛夫接待了自称为“克伦斯基最亲密朋友”的B. H. 李沃夫。李沃夫向总司令打听，在布尔什维克发动新行动的情况下，军队将如何作为。科尔尼洛夫保证，军队将会支持临时政府。随后，李沃夫告诉科尔尼洛夫，他受克伦斯基的委托向科尔尼洛夫递交《明

确的纲领和不同社会团体提出的改组政府方案的要求》。同时,李沃夫指出新政府的成立有三个可能的方案,并说,他亲密的朋友克伦斯基意识到国家正处于走投无路、情况危难之际,完全不考虑自身利益,授权他弄清楚将军对以下政府改组方式的哪一种持支持态度:一、由将军组建没有克伦斯基参加的内阁,克伦斯基归隐;二、由将军组建有克伦斯基参加的内阁,克伦斯基担任司法部长或者其他职位;三、临时政府颁布法令,确认科尔尼洛夫将军个人独裁。科尔尼洛夫请李沃夫第二天早晨再来一趟。

1917年8月26日。上午。莫吉廖夫。大本营。科尔尼洛夫会见了B. H. 李沃夫。科尔尼洛夫告诉李沃夫,他掌握准确消息,8月27日至9月1日期间,布尔什维克准备在彼得格勒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把波罗的海舰队交给德国人,并与他们单独媾和,然后再将这一切通报部队。科尔尼洛夫将军赞同提交给他的政府改组一揽子方案中的第二种方案,但必须要有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参加,他还全权委托李沃夫把这一切转告总理,并补充道,他认为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必须立即来大本营,因为鉴于彼得格勒事态的发展,他无法保证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的个人安全。科尔尼洛夫请萨文柯夫一定向克伦斯基转达这一建议。稍后,他的传令官B. C. 扎沃伊科给李沃夫写了一份应当进入新内阁的人员名单。

不迟于1917年8月26日。莫吉廖夫。大本营。科尔尼洛夫已经准备好了命令,并在命令上亲手写了“26”的日期,命令中写道,根据临时政府的决议,除首都外,彼得格勒军区由他管辖。因此,政府决定成立一支直接听从他指挥的“彼得格勒独立军”,归入独立军的有第42军团、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纳尔瓦阵地和彼得格勒军区的部队。该命令草案的第8项内容是:“转为新隶属关系的时间将单独发电报宣布。”

1917年8月26日。彼得格勒。19点之后。B. H. 李沃夫来见克伦斯基,对他说,他受科尔尼洛夫委托,要求以他的名义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将全部权力交到最高统帅手中;包括总理在内,临时政府的所有部长辞职;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必须立刻前往大本营。根据克伦斯基的建议,李沃夫向克伦斯基书面陈述了科尔尼洛夫的“要求”——这个文件后来被当成了“最后通牒”。此后,科尔尼洛夫被克伦斯基请到陆军部所在地通了直线电话。

1917年8月26日。晚。莫吉廖夫。大本营。菲洛年科、扎沃伊科、阿拉金都聚集到了科尔尼洛夫这里,总司令曾要他们制订出一份能够稳定局势的政权机构和政府成员的方案。他们制订出了成立国防委员会方案,在这个委员会中最高统帅任主席,克伦斯基任副主席,成员包括B. B. 萨文柯夫、M. B.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海军上将A. B. 高尔察克和M. M. 菲洛年科。但确立个人独裁被认为



是不适宜的。

1917年8月26日。20点30分。莫吉廖夫。大本营。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在通直线电话时,请求 А. Ф. 克伦斯基和 Б. В. 萨文柯夫前来大本营。克伦斯基暗示,目前不可能前往莫吉廖夫,但原则上不反对去大本营访问。科尔尼洛夫向 М. В. 罗将柯、Г. Е. 李沃夫公爵和 П. Н. 米留可夫发去电报,请求他们不迟于8月29日前来大本营讨论阻止军队崩溃和稳定国家局势的措施。(《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案件:前最高统帅 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及其同谋案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卷宗(1917年8月—1918年6月)》,2卷本,莫斯科,2003年,第1卷,第534—536页)

正如我们所见,没有发生叛乱。有的只是重新组合和集结力量的尝试。科尔尼洛夫在做尼古拉二世没能做成的事情:他没有抛弃大本营,而是使大本营成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可逾越的权力支柱。

已退休的总检察官 В. Н. 李沃夫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没有任何权力。他的出现可以比作是一场命运的捉弄。科尔尼洛夫把李沃夫当成总理的私人信使,向其陈述了自己的行动方案。

这既不是阴谋,也不是最后通牒。但就其实质而言,这是对克伦斯基中间政策的否定,而克伦斯基力图保持的是领袖地位,是想带领国家实现立宪会议选举,并成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

在给予科尔尼洛夫行动自由时,克伦斯基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明白,将军能恢复秩序,但与此同时他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他成为政府的领导人。总理最亲近的战友涅克拉索夫和捷列先科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应当紧急刹车了。

1917年8月26日。彼得格勒。晚。在与克伦斯基的交谈中,李沃夫证实,科尔尼洛夫提议克伦斯基在新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职务,萨文柯夫担任陆军部长,而关于前往莫吉廖夫的要求所作的解释是因为担心克伦斯基的人身安全。在这之后,克伦斯基宣布逮捕李沃夫,并致电科尔尼洛夫:解除其职务,要求将工作移交给卢科姆斯基。

1917年8月26日晚—8月27日夜。彼得格勒。在临时政府会议上,克伦斯基要求改组政府内阁,授予自己特别权力来与科尔尼洛夫作斗争。与会者劝说克伦斯基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克伦斯基不同意。作为回应,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 Ф. Ф. 科科什金、А. В. 卡尔塔舍夫、С. Ф. 奥尔登堡、П. П. 尤列涅夫宣布辞职,而且他们中的 Ф. Ф. 科科什金指责总理独裁。

1917年8月27日。莫吉廖夫。大本营。2点30分。根据约定,科尔尼洛

夫向陆军部副部长 Б. В. 萨文柯夫发去事先商量好的电报,骑兵军将在 8 月 28 日傍晚集结于彼得格勒郊区,应该在 8 月 29 日宣布彼得格勒戒严。

1917 年 8 月 27 日。5 点 50 分。科尔尼洛夫与萨文柯夫通了直线电话,在谈话过程中,后者证实了克伦斯基电报的真实性。

1917 年 8 月 27 日。莫吉廖夫。大本营。9 点后。科尔尼洛夫召见菲洛年科,并向他出示了克伦斯基命令解除自己的职务、将工作移交给卢科姆斯基的电报。由于电报没有出现临时政府决议这些字样,让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担心这可能是那些实施国家政变的人发来的电报。被请来的卢科姆斯基本人拒绝接替科尔尼洛夫,并宣读了他写给政府的电文,稍后发了出去。

1917 年 8 月 27 日。彼得格勒。10 点 45 分。彼得格勒第 16 区法院值班侦查员舒尔茨在电话中听取了彼得格勒地区法院检察长根据司法部长的口头指示作出的通报:“发现了一个以通过武装起义使临时政府垮台为目的的阴谋”,于是他着手进行初步的调查,为此他前往冬宫,在那里他询问了主要证人 А. Ф. 克伦斯基,随后还询问了 В. Н. 李沃夫。

1917 年 8 月 27 日。彼得格勒。А. Ф. 克伦斯基在报纸上,同时也通过电报和广播宣告要 Я.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把一切职权移交给他,以及他本人已经下令让科尔尼洛夫交出最高统帅一职。

8 月 27 日至 28 日夜。彼得格勒。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国民反对反革命斗争委员会的决议,该委员会后来改称为军事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里,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了多数。

1917 年 8 月 28 日。莫吉廖夫。大本营。科尔尼洛夫发表了《告人民书》,其中声明,“军人的职责、自由俄罗斯公民的舍己精神和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使他“不能服从临时政府的命令,并且保留对人民陆军和海军的最高指挥权”。接下来的内容是呼吁临时政府成员前来能够保障他们安全的大本营,以便和他们共同组建一个“保证能够获胜并带领俄罗斯人民走向伟大未来的人民国防政府……”

1917 年 8 月 29 日。卢加。3 点 45 分。收到一封克伦斯基发给克雷莫夫的电报,命令其兵团开往纳尔瓦执行作战任务。但收到电报的卢加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所以并未上报给克雷莫夫。

1917 年 8 月 29 日。卢加。各种各样的集会举行了一整天。在克雷莫夫的部队中,鼓动人员劝说哥萨克士兵们不要服从“反革命”的命令。

1917 年 8 月 29 日。西南战线执行委员会逮捕了自己的总司令 А. И. 邓尼金,同时该战线所有军队的军人委员会都逮捕了自己的司令员。

1917 年 8 月 30 日。在通过直线电话交谈时,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告诉科尔尼



洛夫,临时政府已授予克伦斯基最高指挥权,他被任命为参谋长,因此,需要顺利交接事务,使得军队的管理不受影响。科尔尼洛夫向阿列克谢耶夫通报了由卢科姆斯基将军起草的电报内容,在电报中他请求停止逮捕将军们的行动,请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前往大本营,要求政府终止再发出有辱自己的命令。而阿列克谢耶夫则请求不要中断作战行动,并承诺会尽快前来大本营。

1917年9月1日。22点。最高统帅办公室主任通过直线电话向参谋长 M. B.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转达了 A. Ф. 克伦斯基的命令:“立刻逮捕科尔尼洛夫将军及其同伙”,理由是“苏维埃大吵大闹,只能通过彰显权力来缓和气氛……”。赶来的阿列克谢耶夫回答说:“晚上22点左右逮捕科尔尼洛夫、卢科姆斯基、罗曼诺夫斯基、普留谢夫斯基-普留希克。”(《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案件:前最高统帅 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及其同谋案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卷宗(1917年8月—1918年6月)》,2卷本,莫斯科,2003年,第1卷,第536、537、539—543页)

在这个大事记中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8月28日,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最令人不安的一天”(这是克伦斯基的说法),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大使拜访了外交部长捷列先科,并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递交了照会。在照会中,他们指出“为了人道主义和避免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愿望”,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俄国所有势力的团结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克伦斯基称这个照会是恬不知耻的。盟国建议他把叛乱的将军看作是“平等的伙伴”。简单地说,盟国不再信任临时政府了。

科尔尼洛夫身后有强大的势力在支持着他。

甚至 A. И. 普梯洛夫妻子的外甥、在总司令部担任小小传令官的 B. C. 扎沃伊科都是俄国大企业家的代理人。此外,扎沃伊科还与石油工业巨头利阿诺佐夫关系密切。正是扎沃伊科成了为科尔尼洛夫所有的声明和政策提出主意并起草的人。

克伦斯基在其回忆录中援引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信,信里揭示出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

1917年12月12日,《消息报》刊登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9月12日写给米留可夫的信。信中说:

“科尔尼洛夫案件并不是一小撮冒险家的行动。它依靠的是我国各阶层广大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帮助……运动的目的是要改变现有的国家制度,而只是想换人,找到那些能够拯救俄国的人……科尔尼洛夫的行动对政府成员而言并不是秘密。科尔尼洛夫就这个问题曾与萨文柯夫、菲洛年科,并通过他们与克伦斯基讨论过。只有幼稚的军事革命法庭可以掩盖这些人曾参与过初步的谈判和

协调。萨文柯夫大概已经在刊物上承认了这一点……

“第三骑兵军各师向彼得格勒的进发完全是执行萨文柯夫转达的克伦斯基的命令……然而当时已不可能阻止军队已开始的行动或让他们放弃行动了。卢科姆斯基将军在8月27日发给克伦斯基的第6406号电报中说道:‘……萨文柯夫和李沃夫来了,以您的名义向科尔尼洛夫将军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并强迫科尔尼洛夫将军做出最后的决定。于是,科尔尼洛夫按照您的建议下达了最后命令,现在取消为时已晚……’

“8月27—31日所有困境的出现,都是由于克伦斯基、萨文柯夫、菲洛年科拒绝开展以建立新班子政府为目的的行动,都是由于罢免科尔尼洛夫职务这样一个事实。事情失败了:见得着的参与者被定为冒险分子、叛国分子和叛乱分子。见不着的参与者或是成为命运的主宰者和审讯的领导人,或是失去了一切,约30人当众受辱、受审或被判死刑。

“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知道,我国社会的一些人士不仅了解整个过程,不仅从思想上予以同情,而且还尽其可能地帮助了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A.《历史转折关头的俄罗斯》,莫斯科,1993年,第299、300页)

这样说并不夸张:给克伦斯基以及温和派的整个社会主义试验(在战争环境下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试验)判刑的是西方国家。盟国并不害怕以列宁为首的左派激进分子的势力得到加强。相反,他们认为,即使列宁夺取了政权,也不会超过三四个星期,那时俄国的政权还是会过渡到右派手中的。

克伦斯基最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民主的西方国家抛弃了他。他强调,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单独媾和的抗议运动的结果”,同时揭示了盟国对推翻君主制度感兴趣,但他未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再支持他。

不过这个情况将一连串事件连接了起来。这些事件从拉斯普廷被杀开始,到反对单独媾和和行动和停止对科尔尼洛夫的支持,再到间接地支持列宁。(这里正好让人想起英国间谍对二月事件的参与,他们花钱来鼓动骚乱的人群。A.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正是写的这个内容。)

所以,当盟国的阴谋得以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中完成,即俄国人毁掉自己国家而作斯大林式的“忏悔”时,整个西方世界都震惊了。阴谋和诡计变成了民族革命。

第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掌握武器

布尔什维克获取武器、预备国会、克伦斯基——“俄国的灾难”、斯大林：夺权、党的政治局委员选举、十月革命

公开爆发的内部冲突摧毁了政权。军队成了一盘散沙，政府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一支新的武装力量登上了舞台：为反击“科尔尼洛夫叛乱”，2万名彼得格勒工人领到了步枪。

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已经拥有了必要的机构和部门，来发动城里所有的工人和士兵对反革命发起打击。

8月27日至30日，在俄国的众多城市里，已建立起了240多个军事革命委员会。

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各三名代表，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执行苏维埃的代表，两名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

军事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部和情报部，还设有政治委员部。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各苏维埃及其他群众组织的联系是通过彼得格勒通讯社来进行的。

军事革命委员会分发武器，监督粮食储备，派遣宣传员前往部队，并与邮电和铁路员工积极配合。

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全俄铁执委会）阻拦了科尔尼洛夫军队的调动，并团结了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所有政治力量。多数情况下，这种政治行动完全是自

发的。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软弱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谢斯特罗列茨克军工厂的工厂委员会再次向由工人组成的赤卫军提供了数千支步枪及弹药。武器的分发工作是直接在彼得-保罗要塞军火库进行的。

在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之下，因参加七月三日起义被抓进监狱的该党党员得以释放。

彼得格勒一批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冶金厂、新海军造船厂）提出要求：“国家政权一分钟都不应该掌握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手里，必须转交到工人、士兵和贫困农民的手中，并向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负责。”

彼得格勒卫戍区的所有部队都发出了类似的声明。波罗的海舰队的 19 个军舰委员会决定在他们的船上悬挂红旗，此项决定得到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支持。

此时，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态度同样明显向左倾斜。经过几个小时辩论，9 月 1 日早上 5 点，代表们通过了加米涅夫提出的声明。声明要求解除所有资产阶级代表的职务，建立由“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政府。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宣告民主共和国成立；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并转交给农民委员会，直至立宪会议做出决定；实施工人监督生产的措施，对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建议交战国人民实现普遍的民主和平。

“决议呼吁立即执行的措施有：停止任何针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镇压，在前线废除死刑，恢复在军队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主活动的充分自由，把反革命指挥人员开除出军队，承认在俄国居住的少数民族享有自决权，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并废除所有的等级特权。”（拉宾诺维奇 A.，《彼得格勒 1917 年的革命》，第 205 页）

我们要强调的是，加米涅夫呼吁保持在对抗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代表了所有社会主义派别中绝大多数人的倾向。

局势对政府来说一天比一天更糟糕。政治危机又因经济危机而深化，1917 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36.4%，给铁路运输带来的打击尤其严重。“饥饿的魔掌”正在伸向现实。

俄国该向何处去？

斯大林在那些日子里写道：“归根结蒂，应该明白的是，失去了信任并且陷于民众仇恨之中的政府，除了是一个挑起‘内战’的政府，就什么也不是。”（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322 页）

斯大林在说到“内战”时加了引号，说明这暂时还只是一个政治用语，而并非现实。

斯大林担心，政府可能会挑唆布尔什维克重演七月三日事件，然后趁机镇压他们。他显然不打算重复以前的错误。在他看来，时间在与克伦斯基这个“小人物”作



对。军事检察官、科尔尼洛夫案件特别委员会成员 H. П. 乌克兰尹采夫就是用“小人物”来称呼总理的。

当然，斯大林与乌克兰尹采夫并不认识。但当时甚至在报纸上都充斥着克伦斯基出卖了科尔尼洛夫的报道，因此，政府的道德威信降至最低点。

当局似乎正慢慢消失在不断增强的蔑视气氛中。再增强一点点，它就会自行崩溃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党人的脚下。

在斯大林亲自校订的一部名著中是这样阐述当时形势的：

其次，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已成长为革命的决定力量，能够击败任何反革命阴谋。当时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它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是作为真正的执政力量起作用的，因为工人和士兵都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它的指令。

最后，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表明，仿佛已经死亡了的苏维埃实际上蕴藏着极大的抵抗力。毫无疑问，正是苏维埃及其革命委员会挡住了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在战胜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第二天，即 8 月 31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彼得格勒苏维埃原来以齐赫泽为首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席团宣布辞职，让位给布尔什维克。9 月 5 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莫斯科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主席团也宣布辞职，让路给布尔什维克。

这就是说，成功的起义所必需的基本前提已经成熟。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重新提上了日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2004 年，第 193、194 页）

这就是斯大林的风格，这里甚至运用了他在 1917 年文章中的表述。

换句话说，他还没有预见到正在逼近的将称之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性巨大转折。

事件发展的逻辑却清晰地显现出来：政权在以另一种方式，即和平的方式由临时政府转归苏维埃。

粉碎科尔尼洛夫之后，列宁立即向“妥协派”，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了妥协和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但对方未予理睬。

9 月 14 日起，在彼得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召开了民主会议，以便巩固执政政治集团的地位。共有 150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分别代表苏维埃、工会、军队的委员会、合作社、民族联合会等团体。其中社会革命党人 532 名，孟什维克 172 名，布尔什维克 136 名。

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的人数明显偏少,但这也反映了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因此,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承认会议的合法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此外,很明显,政府希望利用举行这次会议取代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对群众的压力作出退让。

列宁呼吁抵制民主会议,斯大林支持他。然而,就在民主会议的会场上,布尔什维克党团做出决议:不退出会议,并利用会议讲坛进行宣传。

列宁建议抵制政府的花招绝非偶然,因为他识破了其背后隐藏着改组政府的企图。尽管政府实力减弱,但仍然在很多方面具有行动能力,还能够在冬宫之中撑持下去。

9月14日,彼得格勒市警察局局长下令逮捕列宁。列宁当即和以前一样隐蔽了起来,并通过联络人传递信件与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去《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

克鲁普斯卡娅把信转给了斯大林,而斯大林让中央委员会理解了信件的内容。

多数中央委员对自己的领袖提出的夺取政权的指示感到震惊。列宁明白,政府正慢慢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震动中恢复,如果错失时机,它将积聚力量,镇压革命。

但是,中央委员会给了列宁明显否定的答复。

在会议记录中是这么写的:“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建议,通过如下决议: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了列宁来信之后,否决了信中的具体提议,呼吁所有组织只能遵循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重申,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任何上街的行动都是不能允许的。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要求列宁同志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来详述在他的两封信中所提到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

这项决议未获通过,会议记录中并没有列出表决结果的准确数据。会议记录中反映了中央委员会作出的最后决议:“责成负责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工作的中央委员采取措施,确保在军营和工厂不得发生任何事件。”(斯拉塞尔 P.,《斯大林在1917年》,第247页)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立场较为坚定。他提议把列宁的来信分发给最大的党组织进行讨论,以此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

正因为此,列宁才断言:群众比党左得多,而党比中央委员会左,起义的问题尚不成熟。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对列宁计划的支持不够积极,但也承认:“计划在今天显然尚不可行,但它给中央委员会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新方向。”(托洛茨基 Л.,《斯大林》,第1卷,第308页)

事实证明,斯大林对于列宁来信作出的反应是合情合理的。

几天后,中央委员会打算表明对待民主会议的态度,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起义和



资产阶级共和国之间进行选择。表决的结果是：9 票赞同抵制民主会议，8 票反对。

这一票之差清楚地反映出党领导层的状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明确方向。

民主会议以实际承认由三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来组建社会主义的政府是不可能的而结束，并表决通过把立宪民主党人和其他参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团体清除出联合政府。

这个任务的提出使政府根本无法作为，因此民主会议主席团一致承认，“在有组织的民主派中没有形成能付诸实施的统一意志”。这是俄国有教养的社会阶层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次尝试的失败。

参加这次民主会议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协商机构——共和国临时议会，即预备国会。主席是 H. Д. 阿夫克先季耶夫，他是“社会革命党人中最右的护国主义分子”，曾任第二届联合政府(7 月 24 日至 9 月 2 日)内务部长。

9 月 23 日，公布了联合政府新一届成员的名单，其中包括来自工会和企业界的代表各两名。4 名立宪民主党人进入内阁：A. И. 柯诺瓦洛夫、H. M. 基什金、C. A. 斯米尔诺夫、A. B. 卡尔塔舍夫。社会党人获得大部分内阁职位，捷列先科留任外交部长，克伦斯基续任总理和最高统帅。

预备国会在其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遭到破坏，因为此时布尔什维克向政府宣战了。阿夫克先季耶夫发言，主张强化军队，拥护“有尊严的和平”，赞成与经济崩溃和无政府状态作斗争。就在阿夫克先季耶夫发言之后，托洛茨基走上讲台宣称，克伦斯基通过幕后把戏组建了新政府，在这个政府中“秘密的和公开的科尔尼洛夫分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破坏立宪会议的选举，挑唆农民起义和发动内战。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挑战：“我们要把苏维埃甩到一边，呼吁全俄的工人、士兵和农民提高警惕；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救自己，我们向人民呼吁：立宪会议万岁。”

显然，统治精英的更迭已经成熟。二月革命的领导人是些政治草包，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一项任务。他们没有能解决土地问题、军队改革以及求得和平。

即使在彻底崩溃前夕，10 月 24 日，预备国会在对克伦斯基呼吁帮助的答复中，提出的帮助前提是：政府要履行诺言——和平和土地！

各省举行的城市自治会议员选举(9 月 2 日)显示，不同派别的社会党人在省会城市的选举中共获得了 65% 的席位。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居民已有亲社会主义的倾向。政府没有适应这个潮流，注定要失败。政府是由有修养的，并由经历过良好政治磨炼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但他们不能接受国家生活残酷的法则。他们过于善良，过于软弱，过于轻信。在获取政权之后，他们没有料到，政权不是靠人的高尚道德，而是按照其他的规则生存的。

军队瓦解的场景也显示出政府在控制局势方面的无能为力：“从 10 月 1 日至 9

日,陆军部长查出,国内后方驻军中出现过 16 次屠杀,8 次酗酒闹事,24 次自发骚动,16 次使用武力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米留可夫 П.,《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 586 页)

正如列宁所写,“危机迫近”,“政权崩塌”。

列宁对中央委员会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其讨论起义一事,使得克伦斯基无法完成列宁所说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准备”。

列宁还不知道,政府每天都在失去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当总理在民主会议上发言时,一名年轻士兵冲着他喊:“您是俄国的灾难!”这话反映了群众的心态。

为什么是灾难?

今天很难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情绪,必须向目击者求证。从来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是临时政府驻奥廖尔州的特派员,他从自己的村庄来参加预备国会的会议,看到了下面的场面:

“渐渐地,我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控制:这不是生活,这是戏里的台词,好台词,可这些台词永远只能是戏里的……克伦斯基是个大人物,他看起来高人一等,但只有当你忘却现实并以为自己是坐在剧场时才会有这种感觉。

“在现实生活中,政权不是这样的,它是可怕的。这又是个温顺的政权,它的懦弱适合被艺术家搬上舞台。

“随后,切尔诺夫出场了,他就像是 16 世纪的诡诈的书记官,就农业问题的说话奥妙费解,但他无意中发出的关于‘农业问题的绝对命令’的叫喊暴露出他俄国知识分子真正的侨民政治本性,原来,他也不过是亚历山大剧院里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人,一个没有扮演好书记官和庄稼汉部长角色的坏演员。所有这一切,他所有的谎言和诺言都永远不会变为现实……

“如今真正的、真实的俄国在咒骂的这些布尔什维克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整个俄国竟然是生活在他们的强权之下,他们的力量在哪里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一种信念的力量。他们能极大地集中意志力,这使他们上升得很高,高到可以对成千上万身边人们的死亡不屑一顾……”(普里什文 M.,《日记》,引自:C. 卡拉-穆尔扎,《从起始到伟大胜利的苏联文明》,莫斯科,2004 年,第 153、154 页)

十月革命(或十月变革)前夕,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已经不可逾越。

8 月,几乎与科尔尼洛夫运动的发展同时,农民开始了暴动。在农村,人们要求实现土地国有化。原因是自 3 月份以来,地主就开始出售自己的土地,然而农民要求通过立法禁止这种交易,因为农民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但是,政府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它也不可能去实行土地国有化一样。正如 C. Г. 卡拉-穆尔扎所写:“还在 1916 年,半数地产就被抵押了,实行土地国有化将



使银行破产(而且几乎所有银行都是外国银行)。”

这就是灾难所在。

到了10月24日,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坚持下,预备国会通过了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在立宪会议就土地问题作出最终决议之前,把所有土地转交给地方土地委员会管理。

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夺取政权。孟什维克指望克伦斯基能够快速反应,因为此时克伦斯基还能颁布有关土地与和平的政府决议。

克伦斯基认为预备国会的决议是不适当的。他盼望着他从前线调来的部队马上就能到达。

另一方面,列宁的全民武装起义的想法事实上并未实现。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抗议的军队对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形成威胁之前,未经流血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占领了国家管理的主要部门。

但是,列宁的计划还是起到了动员和导向的作用。中央委员会通过该计划,开动了革命的机器,而这场革命能和平到什么程度,这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

10月10日开始准备起义,此时已戴着假发回到首都的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阐述了夺取政权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拒绝立宪会议的想法,即拒绝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然进程。

12名与会人士中,有包括斯大林在内的10人赞同夺取政权的方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反对。

在这次会议上,还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

10月16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党的军事组织的代表。

关于起义时间的争论极其激烈。列宁建议在定于10月25日开会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夺取政权,这样就可以迫使临时政府下台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对此,斯大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起义的日子应该选择得适当。只能这样来理解决议。有人说,必须等待政府方面的进攻,但是,应该懂得什么是进攻。

“抬高粮价、派遣哥萨克到顿涅茨克地区去等等,这一切已经是进攻了。如果没有军事进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止境地退让,使革命遭到失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保证自己有可能选择起义的日期和条件而不让反革命组织起来呢?”

斯大林接着分析了国际关系,他证明说:“现在应该有更大的信心。这里有两条

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争取革命胜利的方针和环顾一下欧洲，第二条路线是不相信革命，只打算做一个在野党。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不赞同调走军队。舰队已经起义了，已经起来反对克伦斯基。所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上起义的道路。”（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81、382页）

有19人支持武装起义的决议，2人弃权，2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反对。

10月18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非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文中他们阐述了自己反对起义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意见的实质可归结为：他们认为，夺取政权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党还无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这会损害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声誉。他们建议，通过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合法进入政府，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可以得到立宪会议的三分之一的席位。这样，党可以作为反对党积极影响政府，或是与其他左翼政党一起组成执政联盟。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在战术甚至战略上的分歧显而易见。同时，远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列宁对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态度。应该说，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党的领袖的反感，并且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受到当局迫害的革命者的处境：他正受到未经审判的迫害和追踪的威胁，又遭遇最亲密的同志们的反对。因此，他把他们的反对看成是工贼的“重要的”背叛行为。这是违背党的道德标准的。政治风云密布的整个彼得格勒已经充斥着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武装起义的传言，而“工贼们”（列宁语）的文章证实了这些传言，并给政府逮捕党的领导们提供了理由。

列宁要求把反对派开除出党。

作为回应，季诺维也夫给斯大林负责编审的《工人之路报》（《真理报》的另一名称）写信。他建议搁置辩论，“团结起来”。

斯大林刊登了这封信，并附加一个后记：“编者按：我们希望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做出的声明（加米涅夫同志在苏维埃也作出了同样的声明）当成标志，看成是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尽管列宁同志的文章语气尖锐，但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从总体而言，我们仍然志同道合。”（引自：斯拉塞尔 P.，《斯大林在1917年》，第262页）

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流露出与列宁的分歧，去庇护那些人，尽管在起义问题上他并不同意他们的立场？

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们认为，是因为他不相信起义会取得胜利，因此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担心。但是，如果接受这种观点，我们就会忽略，加米涅夫在二月革命后的整个时期都是他的盟友。赞同开除已经承认错误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如果考虑到托洛茨基已经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在聚集力量，那简直就是失算了，因为他会加强托洛茨基的地位。



此外，作为对中央委员会批评其庇护“工贼”的回应，斯大林提出辞去总编一职，但辞职未被接受。

可以认为，列宁开除“工贼”的要求，以及“神奇的格鲁吉亚人”的辞职声明，应该被看作是情绪的迸发，这在危急时刻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具有钢铁意志的列宁后来不再坚持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意味着，这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党的领袖宁愿将其忘掉。

斯大林“反列宁”的立场同样也不是针对列宁的。

还有，就是在这个讨论刊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声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一起被选为军事革命中心的成员，因此，斯大林和列宁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可言。

如果他们之间确有冲突，那么斯大林未必能够入选起义的领导机构。

在10月2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事情就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了。

10月21日，又一次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斯大林被选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斯大林在会上发言，建议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战争、政权、监督、民族和土地问题作出报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委托他来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被推举为布尔什维克党团的领导人。

最初，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决定在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并计划在这个时候举行起义，虽然留给准备的时间非常紧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央委员会内，就起义时间发生过争执），但是，“妥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代表大会开会的时间推迟到25日，于是，布尔什维克赢得了时间。

政府并不清楚将发生什么事。10月14日晚，克伦斯基来到大本营，17日晚才返回。他还打算几天后视察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以便“了解人民的情绪”。

副总理柯诺瓦洛夫好不容易拦住了他，但最终克伦斯基，正如米留可夫所说，“干脆就回避交谈，回避直接回答直率的问题”。

10月1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作战部召开了团级和连级委员会的内部会议。部队代表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苏维埃一声令下，就起来反对政府。甚至最可靠的亲政府的哥萨克部队也宣布中立，只有几个哥萨克分队和突击营同情临时政府。

（必须考虑到，在事件发生之前，政府企图把革命军队从彼得格勒派往前线，这样一来，首都的所有部队都对政府倒戈相向了。）

首都的局势趋向白热化。据10月20日《俄罗斯公报》的描述：“在市郊，在彼得格勒的涅瓦工厂、奥布霍夫工厂和普梯洛夫工厂，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地进行起义的鼓动。工人们群情激奋，做好了随时行动的准备。最近几天，彼得格勒逃兵云集，车站里到处挤满了逃兵。‘华沙’火车站由于出现了形迹可疑的士兵而不能通行，他们眼神热切，面孔兴奋。整个市郊给人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醉醺醺的水兵成群结队

顺着奥布霍特运河的滨河路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有消息说，大群觉得可以大捞一把的盗窃团伙来到了彼得格勒。黑势力在集结，充斥于酒馆、赌窟和淫窝……纳尔瓦分区政委向警察局通报，在波罗的海工厂里出现大批水手……由于知道布尔什维克即将起义，在私人信贷机构里可以看到，储户们强烈要求提取属于他们的钱财。这是因为“广大居民确信，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首先会去摧毁私人商业银行”。（引自：米留可夫 II.，《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 645、646 页）

10 月 23 日晚，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要求赋予他们监督司令部所有命令的权利。这相当于直接要求转交军权。

军区司令员波尔柯夫尼科夫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原因是司令部已经有了一个监督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分部特别会议。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想与多党的亲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分享权力。

在波尔柯夫尼科夫拒绝后，特别会议的成员、士兵分部的奥古尔佐夫斯基就实际转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一边，并声明，拒绝与军区司令部合作。

波尔柯夫尼科夫并没有采取一位军官本该采取的行动，而是联络了所有团级委员会，建议他们派自己的代表前来司令部。由此会产生什么结果是不难预见的。

“团级委员会的代表是选举产生的，但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没有前往波尔柯夫尼科夫的司令部，而是去了斯莫尔尼宫‘以便制定统一的策略和通过如何对待军区司令部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10 月 23 日），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决定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所有部队发送话传电报，电文内容是，军区司令部拒绝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并且与革命的卫戍部队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断绝了关系，正在成为‘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工具’。话传电报接着下达了命令：‘未经军事革命委员会签署的任何有关卫戍部队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明天的所有命令继续有效。卫戍部队的所有军人都有责任提高警惕，保持稳定和服从纪律。革命处于危险之中。革命卫戍部队万岁。’”（米留可夫 II.，《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 647 页）

政府终于惊恐起来。柯诺瓦洛夫要求克伦斯基召集所有部长开会。内阁举行了会议并决定从北方前线调回部队。

但部队拒绝了调动。

10 月 24 日，报上刊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呼吁书：宣布军区司令部是“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工具”，还宣布“未经军事革命委员会签署的任何有关卫戍部队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并且给首都特别重要的据点和军事单位任命了政委。

“这一天，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声明：‘国内战争开始了。已经宣战，军事行动也已经开始。我们必须坚定地对自己说：克伦斯基和他的代理人是我们公开的敌人，不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与敌人无话可说，而是要打败他们。’”（米留可夫 II.，《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 651 页）



10月24日清晨,政府下令查封《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士官生和警察被派到编辑部和印刷厂所在地。印刷好的报纸被没收,一些字模被毁坏,封锁了印刷厂入口并设置了警卫队。

“但是早晨10点前,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赤卫队员和革命军人击退了装甲车,并在印刷厂和编辑部附近加强了警卫。11点前,《工人之路报》开始发行,上面刊登了斯大林撰写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呼吁群众起来推翻临时政府。”(《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传略》,第66页)

分析这篇发表在革命开始当天的文章,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宣传,这是很明显的,“必须以人民承认的,由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选出并对这些代表负责的政府来代替目前这个不是由人民选出、不对人民负责的冒牌政府……”(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89页)二是掩盖了革命的军事性质,强调了政权和平过渡到“苏维埃手中”的可能性。

事情的进程本身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对抗。布尔什维克发动了进攻,政府在退却,变得越来越脆弱。

这天上午,中央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开会,会议提出任务:占领城市中最重要据点。斯大林不在这里,他在编辑部。

在编辑部处理完事务之后,斯大林下午去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会议,并在那里做了有关政治形势的报告。

以下就是米哈伊尔·伊萨科夫代表的陈述:

斯大林做了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最新情况的报告。军队正从前线到我们这里来。一个拉脱维亚团前来镇压我们,但被拦截住了。临时政府摇摆不定。今天五、六点钟派了人来谈判。

(斯大林报告)ЩСЛ(社会革命党)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目标是什么:是起义还是维护秩序?如果是第一种,我们将召回自己的人(委员会里那些干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回答说:是维护秩序,是防卫。他们留下了自己人。水兵们拘捕了50名士官生。在军事革命委员会里有两种意见:一是立即起义,二是首先要集中力量。而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与第二种意见相同。“阿芙乐尔”询问,在试图开桥时是否可以射击。我们建议不要射击。这些桥梁迟早都是我们的,而且彼得-保罗要塞还保卫着三位一体桥。士官生和装甲兵之间关系破裂。我们有打败装甲车的专业工具。《工人之路报》正在排版。电话局暂时还不是我们的(两分钟后得到消息,政府布防在中央火车站的装甲车已是布尔什维克的了,话务员们也已经转到苏维埃一边)。邮政总局已经是我们的了。有两个团从前线赶来帮助我们。奉命来镇压我们的自行车兵从前线派来了代表,代表们

带来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并询问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还是返回前线。（引自：斯拉塞尔 P.，《斯大林在 1917 年》，第 271 页）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起义没有猛烈的攻打，而是慢慢地，一步步地进展的，如同涅瓦河春汛时河水的漫溢。

下午，斯大林在斯莫尔尼宫出现了。后来大家对他缺席中央委员会晨会的原因有各种说法，从说他“放弃职责”到说他在领导备用指挥中心。不久前，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在那些日子，斯大林爱上了娜佳·阿利卢耶娃（当时他住在阿利卢耶夫的家中），因此他缺席一些最为重要的会议正是出于爱情的原因。但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10 月 24 日晚，回到家中的斯大林喜形于色，安娜·阿利卢耶娃可以证明这一点。斯大林说道：“是的，一切准备就绪！明天我们行动。所有的部队都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能夺权……”

在 P. 斯拉塞尔的书中，引用了历史学家 E. A. 卢茨基回忆录中的说法：10 月 25 日夜里 3 点，在斯莫尔尼宫又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次夜间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未来政府的任务，考虑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还讨论了土地法草案。

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也是这么说的，但增加了斯米尔加、米柳京和别尔津的名字。

因此，一些斯大林的传记作家跟在托洛茨基后面说，我们的主人公缺席 10 月 24 日上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放弃革命的职责”，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斯大林不是胆小鬼，不是意志薄弱的人，也不是缺心眼的人。在负责夺取“银行、车站和电报局”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中看不到他的名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况且，有证据表明，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负责党的情报机关的间谍工作，因此对委托给他的工作不可能留下任何记录。后来，从组建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怠工非常委员会（1917 年 12 月 7 日）的第一天起，在政治局这个系统里负责该委员会工作的正是斯大林。

“处于后台，很少出现在革命群众视野里，斯大林是负责秘密工作、在准备武装起义的不同阶段处理日常事务所需要的人。”（沃尔科戈诺夫 兀，《胜利与悲剧》）

“还有一种说法，在十月革命前斯大林一直领导着党的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达马斯金 И.，《斯大林和情报机关》，莫斯科，2004 年，第 15 页）

需要补充的是，正是斯大林保障了列宁在 7 月转入地下状态。用情报人员的话来说，这是一次特别行动。

10 月 25 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波罗的海舰队几个主要基地的舰船委员会提出了



将武装水兵派往首都的请求。从清晨开始，三趟专列从赫尔辛基出发，沿着芬兰铁路线到达首都。由五艘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组成的舰队也从海上出发。

还有五艘战舰从喀琅施塔得出发，一起出发的还有多艘轮式客船和驳船。

驻彼得格勒的部队基本上都已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计划占领预备国会正在开会的玛丽娅宫，解散代表，然后包围冬宫。

预计政府将不战而降。万不得已时，将从“阿芙乐尔”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炮轰冬宫，并用武力占领冬宫。

从早晨开始，列宁就在斯莫尔尼宫等待政府投降的消息。这个消息本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传来的。在事件发生前，约早晨 10 点，列宁写了一份呼吁书，号召把国家政权转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

没有等到占领冬宫，这份呼吁书已经通过彼得格勒电报局(它已掌握在起义者手中)传遍全国。

上午 11 时，克伦斯基离开冬宫，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总参谋部已经不能调度自己的汽车)离开首都驶向西南，希望能够在前线获得支持。

近 14 时，整个城市已控制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只有冬宫仍在顽抗。

原计划是在正午占领冬宫的，后来推迟到 15 点，再后来又定在 18 点。

渐近黄昏，冰凉的雨水淅淅沥沥地开始飘落。

在斯莫尔尼宫的大厅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已经被折磨了几个小时，原定 14 点举行的开幕式，不得不一拖再拖。

冬宫没有投降，帕尔钦斯基指挥着防御。尽管受到“阿芙乐尔”巡洋舰开火的威胁，部长们仍一致决定，他们没有权利投降。

这里有必要强调这些人坚守的道德责任。他们认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履行这个责任是自己的义务。根据法律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能向立宪会议转交权力，而此时立宪会议尚未选举。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但他们不能不战而降，他们要向世人证明他们已经竭尽全力。

冬宫无线电台还在播送：

致全体公民，致全体公民，致全体公民……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宣称临时政府被推翻，要求向其移交政权，并威胁要从彼得-保罗要塞和停靠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炮轰冬宫。

政府只能把政权移交给立宪会议，因此决定决不投降，把自己交给人民和军队保护，并就此给大本营发去电报。而大本营回复，会派军队来。

就让国家和人民来回击布尔什维克在作战军队的后方发动起义的疯狂企图吧。(拉宾诺维奇 A.，《彼得格勒 1917 年的革命》，第 342 页)

21 时 40 分，“阿芙乐尔”巡洋舰从舰炮射出空弹。

约 23 时左右，又发出几发实弹。除了两发，所有的炮弹都在涅瓦河上空爆炸。一发炮弹炸碎宫殿的飞檐，另一发打到了大殿三层的角窗。

如果这个时候彼得大帝从棺木中复活，他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城市里，皇帝的巡洋舰在射击俄国历代沙皇的皇宫！

士官生用步枪和机关枪回射。

久等不见从冬宫传来所期待的消息，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好在 22 时宣布开幕。

与会代表们政治观点各异。670 名代表中，300 名是布尔什维克，193 名是社会革命党人，68 名孟什维克，14 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其余的与会者或是代表着不大的政治派别，或是无党派人士。

虽然布尔什维克是最大的党，但他们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意见，也不覬覦于此。所需要的是应该发生某种不同寻常的事件，以便列宁主义者获得绝对优势。

在远处隆隆的炮声中，马尔托夫要求代表大会运用和平途径解决政治危机。为此他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开始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的的谈判。

“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的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支持马尔托夫的这项提议。而且，很多布尔什维克党人看来也是接受这项提议的。与会者之一的苏哈诺夫环顾了大厅后说道：‘与会的大多数人以其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马尔托夫的发言。’《人民事业报》记者指出：‘马尔托夫的声明淹没在了大厅里多数人雷鸣般的掌声之中。’无需怀疑这些报道的可信度，因为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拥有支持大会成立由苏维埃中各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委任状，而马尔托夫的提议正是致力于这一目标。从公布的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马尔托夫的发言做出回应：‘布尔什维克党团丝毫不反对马尔托夫的建议。’从代表大会的其他文件同样可以看出，马尔托夫的建议立即得到一致通过。”（拉宾诺维奇 A.，《彼得格勒 1917 年的革命》，第 347 页）

可见，局势开始按照另一个脚本发展。

立即又有几个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他们称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是冒险行动。经过激辩，他们声明自己的党团退席。

大多数代表刚刚感到有可能以苏维埃为基础建立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之时，这种可能性突然间又化为乌有了。布尔什维克和追随他们的士兵和工人成了“整个革命舞台上绝对的主宰者”。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团队离开了会议大厅。

这时马尔托夫再次发言。他说，阻止内战发生的唯一可能是在“起义的民主一方



和其他民主组织”之间就组建民主政府达成一致。马尔托夫提议代表大会休会,展开与各方的谈判。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马尔托夫的提议未必合适:中断正在成功进行的起义是危险的。

托洛茨基发表声明回答:“人民群众的起义是不需要去解释其理由的。正在发生的是起义,而不是阴谋。我们在锻炼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激励的是人民群众起义的意志,而不是去密谋……人民群众在我们的旗帜下前进,我们的起义取得了胜利。现在有人却建议我们:放弃自己的胜利吧,作出让步吧,签订协议吧。与谁?我要问,我们应该与谁签订协议呢?与刚刚离开这里并提出这些建议的那可怜的一小撮人吗?但是,我们已看到了他们所有的人,在俄国不会再有更多的人会跟他们走。本次代表大会上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作为平等的两方,应该和他们签订协议吗?这些人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准备好舍弃资产阶级的慈悲了。不,这样的协议是不合适的。我们必须对那些离开这里并提出建议的人说:你们是可怜的几个人,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角色也已经演完了。从今以后去你们应该去的地方吧: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吧……”(拉宾诺维奇 A.,《彼得格勒 1917 年的革命》,第 350、351 页)

马尔托夫忍不住了,喊叫了起来:“那我们离开!”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代表团也离开了。

激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 10 月 26 日夜里 2 时 40 分。

此时,政府的处境越来越恶化。防卫的力量渐渐减弱,冬宫东侧已无人保卫,起义者开始从这里进入宫殿。在枪炮声中,从彼得-保罗要塞射来的炮弹发出的轰隆声压过了所有喧闹。

这枚炮弹在顶层爆炸。进入宫殿的无政府主义水兵们从阳台向大厅投掷了两枚手榴弹。

不过,在聚集着部长们的大厅的附近,一群士官生已准备好慷慨赴死,而不是投降。这些 17 到 19 岁的年轻人虽有改变,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俄国的最后捍卫者。

但抵抗都是象征性的。

很快就清楚了:“防御是徒劳的,牺牲更是没有价值的。”

士官生的指挥官被告知,政府准备投降。

人群闯入大厅,领头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安东诺夫-奥弗申科,个头不高,戴着眼镜。

部长们被逮捕,但奇迹般地逃脱了被私刑杀死,而是被押往彼得-保罗要塞。

这是 1917 年 10 月 26 日夜。

在斯莫尔尼宫的大厅中,疲倦的代表们还是没有找到共同语言。革命成功得轻而易举,受此影响他们处于前所未有的兴奋中。

只有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还试图再谈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的事。但他们的如天使之号般怒吼的声音被列宁所写的呼吁淹没了。

工人们、士兵们和农民们!

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绝大多数苏维埃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妥协派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将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也已被逮捕。

苏维埃政权将向各国人民提议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置;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规定由工人监督生产;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设法把粮食运往城市,把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全部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当地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拉宾诺维奇 A.，《彼得格勒 1917 年的革命》，第 359 页)

传统的俄国从那夜开始悄悄离革命的彼得格勒而去。

在那个夜晚,随传统俄国飘摇离去的,不仅有让罗斯接受东正教洗礼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统一了国家的伊万三世、建立了帝国的彼得一世、打败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还有成千上万的献身者和英雄。

在新成立的国家的上空升起一颗从没有人见过的耀眼的巨星——世界革命。

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这次会议上,选出了苏维埃俄国的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主席,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陆海军事务委员会由 B. A. 安东诺夫-奥弗申科、H. B. 克雷连柯、П. E. 德边科三人组成,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在今天,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一职给人的概念更多的是对革命成功前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宣传工作的重视,而不是管理职能。

10月26日对布尔什维克而言,是一个深刻而又充满戏剧性的分水岭。它把党分隔为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未来两部分。一部分党员永远留在了反政府的斗争中,而另一部分则走进需要实现现代化的苏联。后来,正是从这种分裂中,产生了世界革命



的拥护者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者”之间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

当然,在10月26日,还未必有人能够预见到事态会这样发展下去。

为了进行实际管理,除了人民委员会,还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四驾马车”,其成员为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托洛茨基。正是透过“四驾马车”这个棱镜,更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高位。在“四驾马车”内,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是最亲近、最相互信任的。1917年12月列宁去休假时,他是把“家务”交给斯大林的。这说明了许多问题。

正是在这里,开始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对抗,苏联精英们的一生,直到伟大的卫国战争都是在这一标志下度过的。

俄国所有的新领导人都不具备执政所应有的经验。但是,他们都拥有夺权的经验。

托洛茨基是这样评价斯大林的这种经验的:

“那个有孟什维克和民粹派、一起从事过地下工作或遭监禁和流放过的昨日的同志参加的临时政府,使他更近地看清了一个神秘的实验室,在那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并非神仙才能烧制瓦罐。在君主专制时代把地下革命者与政府隔开的遥不可及的距离一下子消失了。政权成为一个亲近和亲昵的概念。柯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己的外省气息,即使不是在习惯和性格中,也是在政治思维的领域中。他敏锐并遗憾地感悟到自己的欠缺之处,但同时,他也检验了团结在一起的集体的力量,这个集体是由有才能的、有经验的并准备走到底的革命者组成的。群众把党推上执政地位,而他成了公认的党的总部的成员。他不再是柯巴,而最终成了斯大林。”(托洛茨基 JI.,《斯大林》,第1卷,第323页)

这些评价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列宁、托洛茨基和众多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国家反精英的代表们。

那些被他们取而代之的人只能寄希望于历史的进程能倒转过来了!

第十四章

军官和农民的情绪

军官和农民的情绪、高尔基试图阻止革命、斯莫尔尼宫的最初冲突、英法在俄国瓜分势力范围、解散立宪会议、国内战争爆发

在朗读前线作战部队寄给《俄罗斯言论报》编辑部(1917年夏)的诗时,心中不可能不感到苦涩。

慈爱的总编先生!

如有可能,请刊登这首由蹲在战壕里的军官们写的诗,也许,这些军官将永远告别自己的祖国!

让我们仔细阅读这首《一个俄国军官的祈祷》吧。他在向上帝祈祷什么呢?祈祷死亡,祈祷从骤降于国家的痛苦中得到解脱。一切都在结束。

无限崇高、无限神圣的基督啊,
请聆听我的祈祷,
我永恒的保护神啊,请听我说,
请让我在战斗中死亡,



请给我一颗致命的子弹。
要知道您的仁慈不可估量，
上帝啊，请在血战中把我推倒，
让我的生命停止。
返回祖国的路已经消失，
我们的人民在起义反对我们，
他们为我们准备好了灵车
还向我们所有人投掷污垢。
可怕的三年我们都在默默承受煎熬，
并忠诚地牢记祖国的教导，
日日夜夜生活在地狱之中。
我们在与魔鬼斗争，我们也不去计算
每日的分分秒秒。
我们切断了敌人的道路，不是用海报，
不是用夸夸其谈，不是用高谈阔论，
在与敌人的战斗中，
我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土地。
所有的功绩和所有军官的英勇，
无法计量，无需估算，不胜枚举。
为了土地，为了光荣，为了俄国的名誉，
我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付出了生命。
但什么让人民饱受了巨大的痛苦，
如果他们想发泄仇恨，
用我们的鲜血换来的自由
动手处决我们(……)

请快点进入战壕，军官朋友们，
不要等待来自祖国的羞辱，
再次为战友做出榜样。
怎样才能英勇光荣地死去。
对于这份职责和痛苦，对于所有的一切，
我们俄罗斯的人民已百倍偿还给了我们。
谢谢亲人们……谢谢战友们……
谢谢首都……谢谢喀琅施塔得……
你们一边讥笑，一边解除军官的武器，

还从他的肩上扯下肩章。
还向他的勋章和制服吐口水，
杀死了他，侮辱了他……
为了所有的一切，为了所有的一切向你们深鞠一躬(……)
一百年转瞬即逝，一代代前赴后继，
将出现新的梦想，
人民将平静地阅读
这段可怕的战争史。
它将留下众多的例子，
讲述俄国人民如何战斗，
讲述他们如何亲手杀死
自己的战士和军官。
(《时间之河》，第五卷，莫斯科，1996年，第311—313页)

这是圣彼得堡帝国的军人对所有“俄国人”的控诉。不能说这是毫无根据的。

不过，人是形形色色的。在暴动的大背景下，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愿望被调动了起来，显得与众不同，这些人没有尚武精神，并在竭力组织一种新型的平均的村社经济。但不久后，它就同时受到两股力量的冲击。

第一股力量是村社平均主义的自发力量。这股力量始于1917年夏天，它摧毁了地主的庄园和斯托雷平的“独立农户”经济。

第二股力量是新政权。它从农民合作社的自发组织看到了格格不入的人民自主政权的政治倾向。

总之，至今都让人感到惊讶，布尔什维克怎么就能依靠占俄国人口1.5%—2%的无产阶级在这个农民人口占80%的国家夺取政权的！

根据农民写给《土地与意志报》信的内容可以得知，在农村是怎么接受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的。

几天后，士兵们开始成群结队地从前线回来，他们带来了各种消息：布尔什维克起义了、克伦斯基从彼得格勒逃跑、苏维埃占领了斯莫尔尼宫、颁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法令、让军人复员等等。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拦农民在士兵们的带领下夺取土地和地主的几乎所有的财产。民众驾着大车一个一个村庄，甚至同时在几个村庄冲向地主的庄园，有的骑马，有的徒步，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自己：有三英分口径的步枪、旧式别旦步枪、纳甘式转轮手枪、民用左轮手枪、炸弹、猎枪等等，甚至是用大



棒子。

不少地主求饶，只要不杀死他们就行。

正如俗话说，到处都在狂歌乱舞。钱财物品、家畜马具等所有的财产被来到庄园的贫农和中农们一抢而光。而富裕的农民在这一次如同以前一样，完全没有参加反对地主的行动。人们捣毁和焚烧了建筑物，但没有杀死地主。五六个小时后，地主的所有财产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贫农和中农的家里，即出现在那些抢到这些东西的人家里。地主被允许留在他们已家徒四壁的屋里，直至1920年。

农民在抢光地主的财物后，立即开始分割他们的土地，并砍伐树木，重建自己的农舍。

富农看到这些恐怖事件后，担心也会抢走他们的东西，便开始把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藏到地下。藏起来的有食品、衣物、贵重家具、器皿，还有钱。所有被藏起来的物品都遭到彻底破坏，其中75%的物品完全损坏，还有25%的不能继续使用。

这就是1917年12月前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对待教会土地的态度和对待地主土地的态度完全一样，甚至还有牧师被焚烧。农民对待他们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把他们看成是“坑蒙拐骗之徒，是为地主和资产阶级奴役农民的工具”……

我们村子很快就知道了十月革命的事情。知道克伦斯基政府被永远推翻，苏维埃政权开始行使权力，新政权赋予了农民从未梦想过的权利。贫农马上就知道了这些权利，高兴起来。与此同时，富农、小商人和知识分子开始哭泣。农民立刻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人了，并开始报复所有以前欺负过他们的人，强迫那些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住在破旧冰冷的小屋里。他们开始处罚那些因某种原因还没来得及从自己住惯了的窝里逃跑的可恨地主，还打击各级地方自治会官员和其他走狗。（《1917年的农村：农民回忆录》，莫斯科，1967年，第150、151、181、182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尔什维克从农民群众的前国家意识中找到了支点。关于哭泣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就很可能说明这个问题。应当指出，提供主要商品粮的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庄园（还有斯托雷平的独立农庄和独立农户）。农民在摧毁农耕经济的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粮食供应的基础，真正让“饥饿的魔掌”伸向城市。

最先了解到这日益严重威胁的有作家 A. M. 高尔基。正是这位高尔基转给布尔什维克数十万卢布，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高尔基开始在他出版的社会民主文学报《新生活报》上刊登自己的札记《不合时宜的思想》：

布尔什维克中的雏鸟们几乎每天都在对我说,说我已经“脱离了人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钉”在人民身上,以至于发现不了人民的缺点。我没有对这些缺点保持沉默和向俄国人民中的愚昧者唱蛊惑人心颂歌的愿望,因为我不准备向上爬。

如果我看到我的人民被引导去向往卑微的平等,按亚洲的说法,卑微的人生活得很简单、很轻松,又不用负责任。如果我看到这一点,我就应该把它说出来。

如果我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带有“很深的民族主义”,如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不断地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民族主义正是表现为“向贫穷和卑微看齐”,那我有责任痛苦地承认:敌人是对的,布尔什维主义是民族的不幸,因为在这个被它激起的粗俗本能横行的混乱中,有毁灭俄国文化稚嫩幼芽的危险。

我们都有点害怕批评,对自我批评更是近乎厌恶。

我们对辩解的偏好并不亚于对谴责的偏好,但在这种对辩解的偏好中,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关心,而不是对他人的关心。在这种辩解中,为自己个人的未来罪孽辩解的愿望总是显而易见。这种愿望是有远见的,但却是卑鄙的。

俄国生活和文学中的受人爱戴的主人公都是不幸而可怜的失败者,英雄们在我国并不走运。人们喜爱被派去服苦役的犯人们,也非常乐意替自己周围的强者穿上囚衣,戴上镣铐。

在罗斯,人们不爱强者。部分是因为在我国强者是没有生命力的。生活不爱他,文学也不爱他,千方百计地用种种矛盾束缚意志坚强的人,把他赶到走投无路的阴暗角落里。总之,把他降到生活的底层,贬低他并毁灭他。人们追寻和敬爱的不是斗士,不是新生活的建设者,而是把平常人的小罪小恶揽到自己身上的正人君子。

幻想家和书呆子们想用这种材料,即用农村里愚昧而萎靡的人们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精神上的新国家。很清楚,建设者们应当适应这种材料的特点,而农村人的最主要的和最难消除的特点是疯狂自私的个人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将向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展开残酷的战争。

巴黎公社是农民扼杀的,这一点工人阶级必须记住。

但是他们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一点……(高尔基 M.，《不合时宜的思想——革命和文化札记》，莫斯科，1990年，第189、190页)

高尔基认为十月革命是对文化的摧残,它的赌注是群众的兽性本能和惨无人道的经验。



……受尽折磨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马可能死掉。

斯莫尔尼宫的革命家们顾不上俄国，他们冷漠地把俄国变成自己全球革命或欧洲革命梦想的牺牲品。

在俄国目前的生活条件下没有社会革命的位置，因为不可能异想天开地把占国家人口 85% 的农民变成社会主义者，何况农民中还有几千万的异族游牧民。（高尔基 M.，《不合时宜的思想——革命和文化札记》，莫斯科，1990 年，第 182 页）

这就是“光明的革命节日”的画面，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鼓动家之一的世界著名作家眼中的画面。即使从今天来看，高尔基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尽管因官方把他树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半官方的台柱而给他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抢劫、屠杀、私刑、暴力——所有这一切就是革命现实，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这种情况不仅仅让高尔基感到震惊。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无可指责的“阿赫隆河”文学形象（要知道它听起来多么响亮呀！）变成了野兽脸上的血盆大口。

高尔基成为新政权的反对者，他的报纸像其他反对派的报纸一样被查封了，而他移居到了海外。（我们要提前说一下，这位著名作家返回苏联和他支持斯大林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大林残酷地压制住了农民的自发势力。）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人民委员会，看看那些突然获得管理俄国权力的人们。如果试图进入他们的意识，那么他们意识中最主要的多半就是分裂和分化。他们大体上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吸收了可以追溯到尼康牧首的二元文化。当时由于教会改革，在平民大众的意识中“唤起了一种怀疑思想，认为东正教王国，也就是第三罗马受到了破坏，也使真正的信仰受到伤害”（H. 别尔佳耶夫）。根据别尔佳耶夫的思想，另一个“分裂派教徒”彼得大帝和列宁在方法上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只在于，布尔什维克是“通过可怕的暴力行为”激发了下层群众的历史积极性。

在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之后，一些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也认识到，他们正在面对突然出现的政府，于是马上试图在类似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寻求支持。根据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诺根、米柳京、施略普尼柯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开始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组建社会主义联合政府进行谈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意加入人民委员会，条件是给予他们大多数部长的职位，而且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进入政府内阁。

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极不稳定。他们期望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故而建议根据各党在人民委员会中的比例分配政府职位，因为布尔什维克在人民委员会里占有绝对优势。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希望获得更多职位。

加米涅夫准备作出让步。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断然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人指出他们能力有限,给谈判画上了句号。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列宁和斯大林也可能说过类似的话。

强大的铁路员工工会(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赞成组建社会主义联合政府。这就给双方的冲突增添了军事因素。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忘记在阻止科尔尼洛夫军队向彼得格勒进发的过程中,铁路员工曾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需要补充一点,克拉斯诺夫将军亲临时政府的军队开始进攻了。

克伦斯基从首都来到北方面军司令部,向起义的城市派遣了由 П. Н. 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的部队。多亏首都在几天之内就组织好了防御,同样也因为多数将军对克伦斯基的指令持消极态度,反革命的进攻失败了。

最终,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发起人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加米涅夫辞去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斯维尔德洛夫接替。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冲突是通过强力来解决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越飞、布勃诺夫、索科里尼科夫、穆拉洛夫)向妥协派下达了必须服从党的纪律的最后通牒。

其实,联合政府得以组建就能找到协调争执的机制吗?这种机制已经根本不可能存在了。它刚一出现在临时政府的实践中,就在各党的一致胁迫下被摧毁了。

可以说,十月革命后,大多数党派想要阻止国家的毁灭,但少数党派(列宁主义者)利用大众的破坏心理,继续进行摧毁旧国家的毁灭性革命工作。

如果说全国各地的土地问题在颁布了土地法令之后自然得到了解决,那么军队整体上仍然不受布尔什维克控制,随时可以转向任何一方。

高尔基正确地写道:布尔什维克只有士兵和枪炮,但没有国家政权机构。

该机构后来才产生,那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找到了所需要的人并采取了所需要的措施。斯大林在评估形势时,十分激动地进行了描述:“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设在彼得堡的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1400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堡正酝酿着士官生的暴动。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堡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们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掌握到自己手里。’这真是‘冒险的一搏’。但是列宁不怕这‘一搏’,反而乐于如此,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通向和平道路上的



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起来。”（斯大林 H.，《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62、63 页）

斯大林对形势危急的评价相当有说服力，尤其要考虑到他通常是比较谨慎的。克拉斯诺夫的进攻，政府官员们、各政党、媒体的对抗，还有军事学校士官生企图进行的反革命行动，莫斯科的武装对抗——这就是革命后最初几天和最初几周的真实景象。

要是问为什么列宁和他的党能够夺取政权，主要原因之一有时被认为是党的民主性、允许辩论的灵活管理和主动精神，即党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组织。

布尔什维克有议会斗争的经验，而且这是全俄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必须强调的是：各民主党派相互并不是敌人。但在 10 月 25 日之后，形势开始迅速转变。随着每一个“危急的时刻”的来临，显示出过去的国家管理方法已不再适用，为了保住政权需要另一种方法。

斯大林能够参与与最高统帅部的谈判并签署解除司令部长官杜鹤宁的命令，这不是偶然的；他能够和列宁一起签署人民委员会禁止反对派报纸出版的法令，也不是偶然的。

如果对斯大林当时的职务进行分析，那么可以得出这么一个重要的结论：斯大林建立了可被称为“国家体制之母”的体系。他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四人核心小组”成员、人民委员、《真理报》编委会主席和出版监督委员会主席、对乌克兰联系小组负责人、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的监督人和委员。从 1918 年 1 月起，他又是党纲起草委员会委员；从 4 月起，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 9 月起，还是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不久后，党赋予了他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更加特殊的意义——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他，而他则在完成任务中显示出非常擅长使用权力。为了今后能够成为一个强国的领袖，他现在就必须表现出毅力、智慧和组织才能。他的大多数同事并不具备管理的经验。

环境迫使他们迅速作出调整。谁跟不上变化，谁就靠边站。

托洛茨基说得很对，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职位上，斯大林并不一直都很忙，因此他经常有时间完成列宁交给他的重要任务。需要我们补充的是，斯大林总是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不管当时情况多么复杂，斯大林在政府里实际上担任了非正式的副主席的职务，他负责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紧急问题。

丘吉尔生动地描述了此时俄国的状况：“在我们过去盟国的所在地出现了一种以前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没有过的新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一支没有国家的军队和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还有一点他没有说：没有经验的领导者。

退出战争的苏维埃俄国引起盟国们对它的敌视，现在盟国成了它的敌人，并拒绝承认它。

《土地法令》颁布后，处于半解体状态的俄国军队不再把精力用于防御德军，而是想着抢夺地主的庄园，每一个士兵都急于争到较大的一块土地。

因此，除了急切地与德国人开始和谈，人民委员会还能干什么？

被称为“布列斯特和约”的历史现象含有多层意义：

第一，需要清除已解体的反政府的武装力量。

第二，清除这股势力中反对革命的成分。

第三，停止针对四个同盟国（德国、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

第四，确保欧洲革命进程的发展。

第五，与前俄罗斯帝国民族边疆地区建立联盟关系。

在这里，在决定苏维埃俄国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承担着第一位的作用。

那斯大林呢？

他还是在从事一直以来的工作：试图在旧的国家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

11月14日，斯大林在赫尔辛基召开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建议芬兰向俄国提供帮助，建议“芬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结成真诚的联盟”，并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俄国人民的军队团结一致”来进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不过，斯大林的呼吁在芬兰未能得到响应，摇摇欲坠的俄国不具备这样的吸引力。

还在1917年11月7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即议会——译注）就发表了独立“宣言”，德国第一个承认了这个新国家。

另外，1917年9月，在德国占领军的控制下成立的立陶宛委员会（“塔里比”）也于1917年12月11日宣布立陶宛独立，并建立“与德意志帝国永久和牢固的关系”。

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命运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国际军事因素是第一位的。尽管俄国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但盟国还在继续为之争斗，这里包括美国和日本，也包括德国。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足够实力来占领已失去了军队支持的俄国，但它们之间正在打仗，因此正是它们之间利益的冲突事实上使得新生的俄国幸免于难，尽管这种状态只是短暂的。同时，布尔什维克企盼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果然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已极度虚弱的内部迸发出来。

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德国是最接近和最危险的敌人。德国继续着分裂俄国的政策并想侵占高加索、乌克兰、克里米亚，意在获得那些可保证其在与西方作战时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源。德国人计划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而占领俄国应该是扩张



到那里的基础。

怀有这个意图的柏林认为列宁的政府是对其危害较轻的政府，因为任何其他一个政府都会依靠盟国，并把俄国重新拉入与德国的战争。

布尔什维克也需要与德国缔结和约以便进行国内重建。布尔什维克不希望看到国家分裂，不希望德国人占领一些省份，但期望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会把德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在双方对立中，每一方都期望着能够战胜对手。

但是，正在继续的世界大战的东方战线并没有像西方战线那样发挥出作用。在西方战线，以兴登堡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两人为首的德军打算在 1918 年三四月份结束战事，击败联军，并占领巴黎。但东方战线暂时拖住了德国师团，使法军和英军有可能进行有效防御。

俄国退出战争将自己的盟国置于困难的境地，准确地说是无望的绝境。

因此，巴黎和伦敦完全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关注俄国发生的事件。它们是有选择的：或是与人民委员会找到共同语言，或是支持反革命势力。反革命势力以顿河为根据地，其首领有顿河长官卡列金将军，还有来到新切尔卡斯卡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为了完整地理解英、法两国的切身利益所在，需要清楚美、日两国的意图。两国都是德国的敌人，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曾是大洋彼岸区域大国的美国，到 1918 年，在世界经济中已占约 40% 的份额，开始代替过去的领袖——大不列颠王国而成了世界经济领袖。而日本也成为亚洲无可争议的领袖，并觊觎着西伯利亚地区。

这样，德国侵占俄国领土，就促使英国和法国积极参与到俄国事务中来。英国、法国、日本派兵进入俄国，就引起了美国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每一方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必须付出牺牲，经受痛苦。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也不例外。

负责民族边疆地区事务的斯大林，理所当然地成为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的参与者。

1917 年 12 月 11 日，英、法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支持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并划分出它们各自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乌克兰、克里米亚、比萨拉比亚被划入法国的势力范围，顿河、库班、高加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库尔德斯坦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而在俄国的版图上，准备进行内战的各方势力已经整装待发。

布尔什维克如果不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那么它注定了会在春天未到之前就被消灭。

布尔什维克不仅要面对来自国际上的威胁,还要面对来自国内的各种威胁:政府官员和银行职员怠工,抢劫行为,粮食短缺,反革命力量在南方的集结,乌克兰中央拉达对正向顿河进发、准备与卡列金将军的哥萨克军队作战的苏维埃军队的封锁。

此时,斯大林正在处理苏维埃俄国与芬兰和白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他向人民委员会提交了《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的草案,并就立宪会议选举存在的问题作了报告,还与“四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签署了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

他很活跃。

此时,国家的管理体系逐渐形成,并在后来的整个苏联阶段得以沿用。党的组织结构是由政治局、组织局、秘书处、地方党委、生产部门的党组织和军队中的党组织构成的。

与之平行的国家机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

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有化的生产辛迪加(如冶金工厂产品销售公司等)、机械制造联合厂、管理总局、特别会议、委员会和托拉斯来实现的。工业国有化实际上是在战前国家垄断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员进行管理。1917年11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工人监督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工厂委员会的权利,使之成为国家生产管理体系中的基层环节,并给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了履行自己职能的法律基础。

权力的最高环节是党和它的政治局,但具体执行权和经济权却是由其他机构实施的。正是这种结构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导致后来不止一次地产生了动荡。政界的领导们不能容许资产阶级(军事的、科学的)的专业人士拥有充分的执行权。

十月革命后势单力孤的共产党独自承担着巨大的责任,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与他人分担这份责任,所以它将一些特别类型的领导推上了主要位置。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经验与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他们相比明显更加实用。斯大林经历过生存这所大学的考验,并具有管理社会各阶层的经验。

因此,当几乎所有的社会知识群体都不了解或是反对共产主义纲领时,就特别需要那些不惧风险并善于制服对手的人才。1918年1月6日,布尔什维克解散了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彻底与自己潜在的合作伙伴决裂了。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立宪会议的组成(布尔什维克占24%,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占59%,立宪民主党人占17%)完全不能体现十月革命后的政治格局。实权已经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不准备回到1917年4月的局面。

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历史发展进程本身要求俄国布尔什维克推出有能力进行镇压行动的人担任领导。和平的管理技能被放置到第二或第三的位置上了。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是完全认可群众自发的破坏活动的。但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是



借助这股力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被其席卷而去? 如果像后者那样的话,俄国将成为世界大国间杀戮的战场。

到 1917 年底,俄国即使愿意,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必须沿着一条未知的危险道路前进。

列宁迈出了激烈的第一步,他做出决定解散议会,即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对布尔什维克没有作用,因为它是带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二月革命(“半奥勃洛莫夫式和马尼洛夫式的共和革命”,托洛茨基语)的延续。当然,临时政府没有来得及展现出这种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

立宪会议(斯大林当选会议代表)开幕前夕,列宁下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好镇压任何示威游行。从维堡和赫尔辛基调来两千名武装水兵,还从前线调来拉脱维亚兵团。

立宪会议应该召开,但它却完全没有可能长期存在。

1 月 5 日中午,许多手持“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标语的示威者向塔夫里达宫聚集。暴风雪飞扬,天气很恶劣。

负责守卫宫殿的列宁的侍卫队——红色拉脱维亚兵团的步兵下令从利捷伊内大街走来的游行队伍停下来,但示威者不肯服从这个命令。于是步兵们就从数米远处举枪齐射。8 或是 10 人丧生,约 20 人受了重伤,人群散去。拉脱维亚步兵烧毁了被弃的标语。1 小时后,他们又向一支游行队伍射击,又一次焚烧标语。总共近 30 人丧生,200 人受伤。

1918 年 1 月 9 日,也就是在 1905 年沙皇军队在冬宫向示威群众开枪事件的 13 周年纪念日,A. M.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次参加示威游行的有奥布霍夫工厂、弹药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拉脱维亚士兵正是向他们开的枪。

高尔基接着说:“我要问‘人民委员们’,这些委员中也应当有正派和理智的人:‘他们是否明白,这是在往自己的脖颈上套绞索,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扼杀整个俄国民主,并将断送一切革命成果? 他们明白这一点吗? 或者他们是这样想的:要不就是我们当权,要不就让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完蛋!’”(高尔基 A. ,《不合时宜的思想》,第 233 页)

议会在看不见希望的环境下开始工作了。在塔夫里达宫的前厅、走道和回廊里挤满了武装士兵和无政府主义水兵。

即使如此,代表们还是希望能够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利。

一个典型的细节:列宁口袋里揣着一把手枪来到塔夫里达宫,因为四天前有人企图杀害他,向他的汽车开了枪。列宁脱下大衣进了大厅,随后又返回来拿自己的手枪,但大衣口袋却是空的。列宁明白了,这是塔夫里达宫的警卫干的,他严厉训斥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德边科,接过一把新枪再次进入大厅。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用自己有力的男低音宣读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其作者是列宁。

宣言宣告俄国成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一切权力转交给苏维埃；取消私有财产，变为国有财产；建立社会主义红军；实行义务劳动。

根据宣言，立宪会议必须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执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其实，至此立宪会议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然而，尽管多数代表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他们并不同意议会只担任这种角色。经过 13 个小时的辩论，警卫队解散了会议人员。

立宪会议的代表是俄国反精英亮丽（红色）的断面。他们的平均年龄在 36—37 岁之间（斯大林当时是 39 岁），大部分人在监狱、流放和地下活动中获得了政治经验。一半以上的代表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20% 的代表受过初级教育，受过中级教育的代表也占同样的比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斯大林的画像。

革命把知识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推向上层，以使用他们的双手彻底摧毁信誉扫地的旧管理机器。至于如何建立一个新机器，并未谈及。在立宪会议里，年轻的激进分子比经验丰富的上了年纪的保守派多出好几倍。

可以用 O. 施宾格勒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质的认识作个比较：“布尔什维克不是人民，甚至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是一个异己的、西方的阶层。他们如同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是不被承认的，因此充满着卑微的仇恨。正是人民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气概。人民出于治愈疾病的愿望，用这群败类之手摧毁了西方世界，然后又使自己重蹈覆辙。这是一群担忧自己生活、自己宗教和自己未来的人民。”（施宾格勒 O.，《西方的衰落》，第 2 卷，莫斯科，2003 年，第 200 页）

施宾格勒在 1922 年写这些话时，预言了 20 世纪 30 年代对革命精英进行的斯大林大清洗。

立宪会议的最后一个决议是废除俄国的君主制，并实行共和式政体。罗曼诺夫王朝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权利。

第二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批准立宪会议解散。

后来，在这种违宪行为受到严厉批评时，列宁向托洛茨基承认犯了错误：根本不应该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应将其无限期推迟。不过，他用“革命的最高必要性”来安慰自己。

他打了一枪，当然这只是转义。在法令签署生效几个小时后，临时政府的部长盛加略夫和科科什金被闯入马林斯基医院的无政府主义水兵开枪打死。列宁下令追查凶手。他们被查找了出来。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了是否对凶杀行为实行惩办，经过争论，列宁认为最好还是不要与水兵发生冲突。因为包括人民委员德边科在



内,都认为水兵们杀害政治对手不是什么大事。

然而,司法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И. 施泰因贝格警告说,如果不惩罚凶手,今后将难以抑制群众的残暴行为。不过,施泰因贝格的话没起到任何作用。自那时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的合法性”将成为司法的基础,直到建立起一个可以镇压群众自发暴动的国家机器。

但在世界各地,不仅仅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内,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各种价值观了。

1917年11月27日,鲁登道夫同意与布尔什维克进行和平谈判。11月29日,总理赫特林决定以民族自决权作为谈判(及分解俄国)的原则。

此时,日本向西方提议要恢复东方战线:要把自己的军队派往西伯利亚,作为回报,希望多数国家承认其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开采东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特权。

巴黎和伦敦同意了,但美国却意想不到地说“不”。托洛茨基公布的秘密条约向华盛顿表明,盟国不打算尊重美国的战略利益(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侨居过美国,与美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和银行均有联系。正是他公布了俄国外交部的秘密文件,给华盛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自此,从只有美军到达欧洲才能守住盟军的战线这么一个清楚的军事现实,到全球新思想体系的建立,美国都承担着世界领袖的角色。

我们要指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负责处理着乌克兰、顿河和高加索的事务,因而也就要更多地触及国际政治问题。在即将与德国和谈的讨论中,他的独立立场将明确地体现出来。(此外,克列孟梭、劳合·乔治、鲁登道夫、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立场将很快为世界新格局创造条件,新格局的组成之一就是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俄国。)

列强对这个奄奄一息国家的瓜分是如此明目张胆,不可能不在斯大林对世界的认识中形成一种观念:军事实力是生存的唯一手段。

假如说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同志对得到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怀有极大的(其实是无法实现的)期望的话,那么斯大林就要显得现实多了。

10月29日,十月革命四天之后,英国政府了解到在俄国南部的顿河军队驻区,卡列金将军向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武装对抗,于是英国人便开始与他建立联系。当然,为了不把“列宁扔进德国人的魔掌中”,并不是直接与卡列金进行联系,而是通过罗马尼亚来联系的。

盟国尚未丧失说服俄国新政府的信心,希望新政府能够认识到即使是为了自我拯救也不应该签订单独的和约,而必须继续战斗。但俄国对此既缺少作战部队,又缺乏激情。11月26日,总司令克雷连柯向德国司令部提出休战。

12月2日开始谈判。

德国人是有选择的:或者与俄国结为长期战略联盟,而这正是盟国非常担心的;

或者进行武力打击并抢占需要的资源。

德国选择了分裂俄国的旧计划。

老布尔什维克阿道夫·越飞率领俄国代表团来到布列斯特。代表团中有列夫·加米涅夫、列夫·加拉罕、前沙皇将军(军事情报员)A. 萨莫伊洛、历史学家 M. 波克罗夫斯基、海军上将阿尔法杰尔。

当听说不久后德国部队也将接受布尔什维克思想时,东方战线司令员霍夫曼将军大笑起来。但几个月后,他就笑不出来了。

越飞建议休战半年,但德国人只同意不超过 28 天的休战。

此外,越飞提出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全面和约,并且允许自由传播革命著作。

德国人提出自己的条件:他们要强占俄国的 18 个省。

停战协定签订后,苏维埃代表团返回彼得格勒暂休 12 天。

德国人认为,俄国屈服了。

12 月 24 日,中央拉达在基辅宣布乌克兰独立。两天后,德国邀请拉达的代表们前往布列斯特。

很可能,斯大林产生了一种自己受到伤害的感觉,因为乌克兰是“他的领土”。

谈判恢复后,托洛茨基取代了越飞。

在充满动荡的 1 月,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参与罢工的有来自那些最大型工厂的上百万工人,他们也要求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不久,德国人就感受到了这位失去军事力量的人民委员的理论力量。托洛茨基用对全世界的广播呼吁来补充自己在谈判桌上的发言。在呼吁中,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和对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指控发挥了不亚于枪炮齐鸣的威力。

作为回应,德国部长屈尔曼与乌克兰签订了单独的和约,这进一步加深了俄国的分裂。此后,德国控制了黑海和顿河的辽阔区域。

托洛茨基驳斥了屈尔曼,强调中央拉达的代表无权以乌克兰的名义签订和约,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边境尚未确定。当然,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理由。

但此时斯大林帮了托洛茨基的忙。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在哈尔科夫宣布成立,局势迅速发生变化。乌克兰的苏维埃军队轻松占领了基辅,这让托洛茨基有了说刻薄俏皮话的机会。他向乌克兰代表们说,拉达的权力仅限于他们在布列斯特身处的房间里。

后来,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戏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演出中,让斯大林得以看到基辅的沦陷并感受他自己即斯大林活动的重要性。国家土崩瓦解了,像阿列克谢·土尔宾上校这些卓越的人们死去了,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取代了他们。用士官生尼古拉·土尔宾的话来说就是:“先生们,今夜是一个崭新的历史剧的伟大开篇。”



是的，开篇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12月13日，在一些基辅左派报纸上出现了斯大林的文章《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在这篇文章中这位人民委员写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民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冲突，但在人民委员会和拉达总秘书处之间的确产生了冲突。因为，西蒙·彼得留拉陆军部长想把乌克兰的军队和卡列金的哥萨克部队联合起来，以控制工业化城市顿巴斯。而执行前帝国建立“各族人民自由联邦”政策的基辅，则支持顿河和库班的分裂主义。

斯大林指责彼得留拉：正是根据他的命令，基辅的“苏维埃军队”遭到袭击并被解除了武装，还不允许“反对卡列金的革命部队”穿越乌克兰。最重要的是，人民委员会会不会去与总秘书处达成协议，因为在当前情况下这就是自杀。要么拉达与卡列金决裂，要么就是两个兄弟民族兵戎相见。“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动权掌握在乌克兰人民的手中。”

斯大林的警告是以人民委员会部署在哈尔科夫的实实在在的武装力量为后盾的。西韦尔斯和霍夫林的部队(1600人)来到这里，另有5000名由B.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和M.穆拉维约夫率领的士兵也来到这里。

彼得格勒的新政府认为，乌克兰“自治”的领土除了哈尔科夫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赫尔松省和北塔夫里亚之外，由5个省份组成。这就是从临时政府和帝国时代继承下来的行政管理现实。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则这些土地是由俄国征服和开垦的，人民委员会的行动遵循了这一传统。因此，当在哈尔科夫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建立了以叶夫根尼·博什为首的乌克兰政府，并立即得到彼得格勒的承认。

作为回应，彼得留拉向东部派遣了部队，意在取得把乌克兰中心区域与顿河和顿巴斯连接在一起的这条最重要的铁路线的控制权。

后来，这种对抗导致了公开的军事行动。1月5日夜，基辅当局解除了一些特大型工厂(“军械库”厂、“奥托”厂、弹药制造厂、造船厂等)工人赤卫队的武装，逮捕了200人，占领了《无产阶级思想报》的印刷厂。

1918年1月5日，中央拉达宣布独立，这完全是按照德国设计的程序进行的。

法国不支持中央拉达的宣言，因为法国从中看到德国人的势力会因此得到加强。

苏维埃军队向基辅快速推进，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中央拉达已经得知了斯大林准备发动政变的密电。

1月15日，在最大的军工厂“军械库”厂爆发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工人起义。1月16日，起义蔓延到波多拉区和市中心。1月18日，28岁的社会革命党人弗谢沃洛德·戈卢博维奇被任命为总理，就在不久前他曾代表拉达参加了布列斯特谈判。1月21日，在一阵炮击之后，哥萨克士兵们在彼得留拉指挥下攻下了“军械库”厂。

起义的六天中，出动了政府的最好部队，其中三分之一的士兵阵亡。

1月22日，中央拉达通过了《关于在布列斯特与德国签订单独和约的授权》的

决议。

1月23日，苏维埃军队开始强行攻占基辅。强攻又继续了两天，在残酷的巷战中遭到了彼得留拉的哥萨克士兵们的顽强抵抗。总理戈卢博维奇认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未签订和平条约前，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1月26日，基辅被苏维埃军队占领了。

戈卢博维奇呼吁德国向乌克兰派兵。由于双方的努力，分裂俄罗斯帝国的计划开始运转起来。

当然，苏维埃政府并不想俄国被分裂，但它却被自己以前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宣传束缚着。与“资产阶级”自决权思想相对立，它提出团结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的思想，即发动战争。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假如德国不响应中央拉达的请求，彼得格勒的地位一定会得到明显的巩固。

让我们回到斯莫尔尼宫。1月18日，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返回。他的立场（不战不和）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分裂。

托洛茨基的主要根据是革命已经逼近德国。

斯大林看待事情更加理性一些：“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采用革命战争的口号，那我们就帮助了帝国主义。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不能叫做立场的。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那就会加强我国的反革命势力。德国是能够发动进攻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军队——‘近卫军’。10月间我们谈论过反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因为当时有人向我们说，单单‘和平’两个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可是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革会使西方忐忑不安，但是为了实行这种改革，我们需要时间。如果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那我们就会给西方革命运动造成最恶劣的环境。因此，斯大林同志建议通过列宁同志的关于同德国缔结和约的提案。”（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页）

列宁赞同在德国人尚未开始威胁要恢复军事行动之前最大限度地延迟签订和约，开始威胁了，再签不迟。

何处是容许冒险的底线呢？

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洛莫夫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甚至当布尔什维克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时，也不停止。这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为世界革命牺牲一切。

但此时，如果政府同意德国占领辽阔的俄罗斯领土，则必定引起大多数民众的愤怒。总之，在布列斯特谈判恢复后，托洛茨基超越了自己的职权，但没有违背列宁策略的基本逻辑。托洛茨基宣称，苏维埃政府拒绝签订含有俄国退出对德战争、俄国军队解散的兼并性和约。这样，他把全部责任都承担了下来。同时，托洛茨基领导的外



交人民委员部公布了协约国的所有秘密外交文件和协议,这除了在西方产生巨大的宣传作用之外,还使得美国从此不再顾及其欧洲盟友们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苏维埃代表团拒绝签订和平条约让德国人感到惊讶。苏维埃代表团离开了布列斯特。

3天过去了。此时,德军指挥部觉得托洛茨基给了它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指挥部宣布,由于俄方拒绝签订和平条约,将重新恢复军事行动。

德军开始迅速行动起来。

“2月13日,在洪堡会议上,德国军人和政治家们讨论了俄国的命运。屈尔曼和兴登堡意见一致,认为俄国已经分裂为三部分。乌克兰和芬兰已经与德国签订了和约,而军事行动只需在大俄罗斯展开。鲁登道夫赞成立即向彼得堡进军,以便强迫俄国新政府签订符合德国条件的和约。屈尔曼正好相反,他担心占领彼得堡会激起俄国人的民族感情:应当考虑到德俄两国关系的未来,俄罗斯人永远不会原谅德国人从波罗的海击退了他们。

“德国皇帝表示同意军人的意见:如果让俄国保存实力,并让它保持稳定,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必定把它变成经常反对德国的敌手。应该最大限度地削弱俄国,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组织像‘警察行动’一样的运动反对它……”(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第 463 页)

2月的最后一周,德国人占领了日托米尔、戈梅利、杰尔普特、雷瓦尔。2月27日,他们占领了莫吉廖夫,轰炸了彼得格勒。

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冒着辞职的威胁,要求答应德国任何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以拯救世界革命基地——苏维埃俄国。

托洛茨基反对议和,寄希望于德国无产阶级发动起义。

投票结果:有7票支持列宁,6票反对。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的投票比例为: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7人拒绝投票。

会议还决定撤离彼得格勒,将首都迁至莫斯科,竭尽全力进行防御。

3月3日,在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在签字仪式上,苏维埃代表团出人意料地宣读了声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不是建立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自愿基础上的和约。这是手持武器胁迫下的和约。这是革命的俄国咬紧牙关,被迫接受的和约。这是借口‘解放’俄国边陲,实际把它们变为德国的省份并剥夺它们自决权的和约……我们即将签订的是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的、不容任何讨论的和约。”(引自:卡普琴科 H.，《斯大林政治传记》，第 1 卷,第 450 页)

与 1914 年相比,俄国的领土减少了 200 万平方公里。它不得不从乌克兰撤出军队;放弃对乌克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把巴统、卡尔斯、阿尔达汉交还给土耳其;支付 60 亿马克赔款,并让黑海舰队的官兵复员。

第十五章

布尔什维克成为“国际论者”

布尔什维克变成了“护国派”、恐怖手段不可避免、斯大林是列宁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副手、歼灭战、察里津的独裁者、娶阿利卢耶娃为妻、与托洛茨基的冲突、斯涅萨廖夫将军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呼吁书。布尔什维克变成了“护国派”，不再谈及任何有关失败主义的话题。此外，呼吁书中说，要从肉体上消灭给敌人提供帮助的任何人。

“这是列宁抓住每一个适当机会就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思想的阶段。到处都充斥着温情大度的、马尼洛夫习气的、马虎草率的现象，这些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但触动列宁的与其说是这些现象本身，不如说是这种征兆。这种征兆表明甚至工人阶级的高层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而这种任务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完成。‘他们，’他在谈及敌人时说道：‘面临失去一切的危险。与此同时，他们有几十万经过战争磨炼的人。这些人是军官、士官生、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孩子、警察、富农，他们饱食终日，疯狂不羁，为进行任何行动做好了准备。而这些，请原谅我这样表达，这些“革命者们”想象着，我们将会用友善和美好的方式实现革命。他们究竟是在哪里上的学？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独裁的？如果他本人就是笨蛋，对他来说有什么独裁可言？’”（托洛茨基 JI.，《俄国革命史》，莫斯科，1990 年，第 215 页）



但无论如何，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对西方而言，俄国从国家这个角度已经失去了任何重要性。在日益逼近的与德国军队的决战中，它帮不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什么忙了。

但是，一旦德国人战败，布列斯特和约就会立即变成一纸空文。

伴随着俄罗斯帝国退出世界舞台，美国宛如旭日东升。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说：“我们正在为建立以广泛和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而不是为了靠人施舍、支离破碎的和平。”(引自：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第 473 页)

这意味着美国并不赞同分裂俄国。

3 月 12 日，俄国首都迁至莫斯科，俄国历史上的“圣彼得堡时期”结束了。

几天前，即在 3 月 6 日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党更名为共产党(斯大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抗击德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对 2000 名英国士兵在摩尔曼斯克登陆表示欢迎。这些英国士兵来自香港，旨在准备打击德国人将对彼得格勒发起的进攻。托洛茨基询问美国大使弗伦西斯是否有可能提供军事支持(提醒一下，他与美国人是有关系的)，甚至讨论了由美国来控制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的问题。

列宁持最大程度的务实态度，他依据的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起初，他获得了成功：为了防止日本人不受制约地占领西伯利亚，紧随着 7 万日军登陆远东，美国人也向该地区派出了自己的军队。

总之，日本怀着强烈的侵略野心，觊觎着亚洲领袖的角色。这是它第二次进攻俄国。

法国人和英国人决定支持日本出兵，这引起了华盛顿的抗议。

世界地缘政治的天平越来越剧烈地摆动起来。

从前的盟国不再把俄国看作是国际法的主体，这使它处于如同“无主之地”的极其危险的境地。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斯大林正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谈判，这些谈判多多少少起了作用。1 月底，他与一系列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瑞典、美国、英国、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王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亚美尼亚)进行了会晤。会晤得出结论，在具备了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召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

1. 各党同意为了立刻实现和平，走上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道路。
2. 支持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国际局，即共产国际的雏形。

俄国已濒临绝境，但莫斯科并不打算投降，寻求着继续抵抗的各种可能。同时，展开了对苏维埃精英的干部选拔。

斯大林在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副手 C. 佩斯特科夫斯基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

自己的这位领导的：“他是列宁在指挥军事革命行动方面的副手。他监督着顿河、乌克兰和俄国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国家南部的局势是最为危险的，因为德国人和哥萨克人切断了中心地区与粮食、燃料（石油、煤）基地的道路。巴库的油田可能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斯大林深邃的目光前。

佩斯特科夫斯基描绘了一幅别开生面的情景：

“列宁一天都不能离开斯大林。想必，正是为此我们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就位于列宁‘身边’。一天内，他要打无数次电话来召见斯大林，或者直接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并带着斯大林离开。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斯大林是坐在列宁那里的。我不清楚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但有一次，当我走进伊里奇的办公室时，碰上一个有趣的场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俄国地图，地图前放着两把椅子，伊里奇和斯大林站在上面用手指点着北部地区，似乎是芬兰吧。

“夜里，当斯莫尔尼宫的喧嚣稍稍沉寂时，斯大林会走进直线电话间，并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他或是与我们的军队统帅们（安东诺夫、帕夫卢诺夫斯基、穆拉维约夫等），或是与我们的敌人们（如乌克兰拉达的陆军部长珀尔什）进行长时间的通话。有时，当他有什么急事要处理，而此时有电话找他，他就派我去接电话。”（引自：托洛茨基 J.，《斯大林》，第 2 卷，第 37、38 页）

托洛茨基证实“所述事实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但和往常一样，每当谈到他政敌活动的特长时，托洛茨基总会加上一句：“但阐述是片面的。”他做了这样的说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忙于党的组织工作，托洛茨基“或是开会，或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而斯大林“没有确定的事务”，因此“在列宁面前扮演了参谋长或专项事务官员的角色”。

托洛茨基不懂得，他的说明实际上提高了对列宁完全信任的、苏维埃领导层实际的二号人物斯大林的评价。

显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加光彩夺目、才华横溢，但是斯大林更富有系统性，权力欲更强，也更无情。同时也必须指出，托洛茨基也不是一个无主见的老好人。正是他下令枪毙了众多指挥员并在所有团队实行十惩其一的惩罚方法（来自古罗马刑法。在军队集体犯罪或不能确定犯罪者时所采用的十人中抽杀或惩办一人的方法——译注）。

3月4日，成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其成员是：托洛茨基（主席）、邦奇-布鲁耶维奇（军事领导人）、波德沃伊斯基、斯克良斯基、梅霍诺申。

同时，还建立了由 46 个省和 344 个县的军事委员会组成的 8 个军区。

9月2日，成立了由托洛茨基担任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瓦采齐斯任总司令。



11月底,设立了由列宁担任主席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斯大林被任命为享有第一代理签字权的副主席。

正如我们所见,在经济、军事问题的协调方面,列宁依赖着这位已是不可替代的“参谋长”。

为了理解为什么斯大林能够持续上升,我们必须回答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对布置给他的任务,他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要知道,胆子小、不称职、不负责的工作人员是会很快不被重用的。

在有关斯大林的史料研究中,他作为“俄国南部粮食事务领导人”派驻到北高加索和察里津这一段占了重要篇幅。从这里开始,勇敢无畏、对敌人冷酷无情的苏维埃祖国救星的带有某种神话色彩的形象逐渐形成。也是在这里,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发出挑战,并承担了军事领导人的责任。

那么,当时的南方是怎样的呢?

首先,这里的南方是指顿河、库班和乌克兰。正是在这里,各方利益相互交织,有邓尼金将军(此时科尔尼洛夫将军已经阵亡,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重病在身)组建的白卫军,有中央拉达,有德国指挥部,还有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部队。

从科尔尼洛夫将军1月初面对志愿军官第一大队的讲话中,可以感受到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残酷:“你们很快将会投入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你们不得不变得冷酷无情。我们将不能接收俘虏,我向你们下令,非常残酷的一道命令:不接收俘虏!我在上帝和俄国人民面前承担这个命令的责任!”(引自:越飞Г.,《1917年:列宁、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第210页)

国内战争最初的战斗充满了空前的残酷和仇恨。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的投降和约激起了白军异常的愤慨。

在《俄国混乱时期笔记》中,1918年的春天一片血雨腥风:

志愿军人完全不是政治家,他们信守救国思想,作战英勇,忠于科尔尼洛夫。前面等待他们的是重伤,是漂泊,许多人还要面临死亡;在当时,胜利只是遥远的未来。他们在罗斯托夫的要道上作战时就知道,在他们身后,几十万哥萨克士兵和罗斯托夫的资产阶级生活得轻松自在。他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看着富裕的罗斯托夫纵情作乐,但该城的金融显贵们却十分小气地“捐献”给军队200万卢布,而这些钱迅速地花到了它无穷的需要里去了。

他们在社会里遭受的是冷漠,在人民中遭受的是敌意,在革命机构的决议和社会主义报刊上,遭受的是仇恨、污蔑和诽谤。偶然来到杰梅尔尼克(罗斯托夫的工人社区)的单独行动的志愿军人,经常是一去不返……

不久后得知,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所有被他们抓获的志愿军人,死前还对这些

军人进行非人的折磨。对此情况，无需怀疑。志愿军不止一次在一些失而复得的地方看到自己战友伤残的尸体，听到奇迹般从布尔什维克手上逃跑出来的杀人事件目击者令人胆寒的叙述。我记得，当第一次从巴泰斯克运来8位受尽折磨的志愿军人时，我是感到多么的恐怖。他们身上满是砍伤和刺伤，还有那一张张让强忍着悲痛的亲人都差点认不出来的变形的脸……深夜，在远远的货运站的后院里，在众多列车中我发现了一节按罗斯托夫当局的命令被运到这里的装有尸体的车厢，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过激的行动”。这时，在昏暗的烛光下，神父一边怯生生地四处张望，一边念叨“被杀害者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我的心因痛苦而紧缩，再也没了施暴者的宽恕……

我还记得1月中旬我去“塔甘罗格前线”的情况。在卡特维耶夫土岗附近的一个车站，站台上横着一具盖着蒲席的尸体。这是被布尔什维克杀死的站长，因为布尔什维克得知他的儿子们在志愿军中服役。他被砍去了手和脚，腹腔被切开，还活着就被埋入地下。从弯曲的四肢和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手指可以看出，这个不幸的人为了从坟墓中爬出来费了多大的劲。他的两个军官儿子从预备队赶到这里，要把父亲的尸体运回罗斯托夫。装载死者的车厢就挂在我乘坐的列车上。在途中的某一站，其中一个儿子看到有节车厢里是被俘的布尔什维克，狂怒起来，闯入车厢，等哨兵反应过来，他已经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

血雨腥风之中，青年人年轻乐观、纯洁无瑕的心灵饱受摧残。有一次，在罗斯托夫，在帕拉莫诺夫家里，一段愉快的谈话传入我的耳中。说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少尉，几乎还是个孩子，才17岁。我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兴趣。原来，当他像往常一样肩挎着枪走在街上时，正遇到警察在围捕强盗，他加入了进去，并开枪打死了一名强盗：

“我举起枪，砰的一声正中眼睛，强盗哼都没哼一声就这样倒下了！”

他一边讲述着，一边高兴地笑着。

我训斥他：“您应该感到羞愧！难道您不知道您的笑声很厚颜无耻吗？如果是命运安排你杀了人，难道能这样高兴吗？”

在我讲话的时候，少尉的脸开始剧烈地抽搐，眼里充满着泪水，他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事后有人告诉我他的故事。布尔什维克杀死了他的父亲（一位年长的退伍将军）、母亲、姐姐和姐夫（最近一次战争中成了彻底的残疾人）。作为士官生的少尉本人参加了十月份彼得格勒的巷战，被抓，遭到毒打，头骨严重受损，好不容易才得以逃脱。

还有许多这种被生活扭曲、变形的人，他们失去了亲人或者听任远方断粮的家人被汹涌的红色狂潮吞没。虽然并不是他们代表了军队的基本精神面貌，但他们的心理应该得到理解，特别是那些在志愿军十字征途上只看到阴影的人更



应该去理解他们。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国内战争的性质：残杀。

苏维埃“直辖军”杀害和折磨所有的人，与其说是因为在战斗中直接表现出来的野兽般的残忍，不如说是因为受到来自上层的影响。上层使恐怖手段系统化，把它看作是维持自己存在和掌控国家权力的唯一手段。在他们这里，恐怖手段没有腼腆地躲在“自发行为”、“人民的愤怒”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大众心态的后面，而是表现得厚颜无耻和肆无忌惮。西韦尔斯率领的红军向罗斯托夫推进，其代表沃伦斯基在占领城市后的第三天出现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上，当从孟什维克阵营传来“凶手”这个词时，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他说道：

“无论我们要付出多少牺牲，我们将完成我们的事业，并且每一个手持武器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人，都不会活下来。指责我们残忍，这些指责是公正的。但指责者忘记了，国内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在与异国人的大战中，作战的人们是被统治阶级愚弄的兄弟们；而在国内战争中，战斗是在真正的仇敌之间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战争不知道怜悯，为什么我们冷酷无情。”（邓尼金 A.，《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斗争》，莫斯科，1991年，第205—208页）

战争日益地残酷，席卷俄国中部地区的粮食危机也愈激烈。在临时政府时期就遭到破坏的整个供应体系彻底崩溃了。农民们从布尔什维克那里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土地，已没有任何兴趣再去支持他们了。人民委员会不能也不善于对城乡之间正常的商品交换进行调整。

总之，1918年初，在饥荒危机的环境下，居民的不满在增长。许多城市里开始出现自发的抗议、罢工和反共产主义的示威游行。左翼社会革命党迅速发展，而俄共（布）党员的人数急剧减少（4月份，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登记在册的有24000人，到6月底约有80000人）。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尽管受到当局的阻挠，30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是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胜出。同时，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图拉、哈尔科夫、萨马拉的工厂里成立了特派员会议，并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恢复政治自由、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府”（以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为主导的）和结束国内战争。4月，在伊热夫斯克，5月，在萨马拉，6月，在坦波夫，相继出现了起义。6月，在彼得格勒的奥布霍夫工厂和地雷师爆发了武装起义。所有这些行动和起义都遭到坚决无情的镇压。

共产党人的社会基础迅速缩小。所能依靠的只有党组织、军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为此，必须加强纪律、集中管理，从“对劳动者的民主”转变为公开的独裁。

从5月13日开始，实行粮食垄断，当时称为用武力从农民那里夺取粮食。

实际上，新政权手中掌握的唯一管理手段就是被一个美丽词藻“革命的恐怖”所

修饰的暴力。

5月26日,列宁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拟定了行动方案:“1.把军事委员部改为军事粮食委员部,即集中军队十分之九的精力从事一场争夺粮食的战争,并用6月到8月三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战争。2.这期间在全国范围宣布戒严。3.动员军队,从中挑选出健壮的士兵,并征召年满19岁的公民,去进行获取、抢夺、征收及运送粮食与燃料的经常性的军事行动。4.对不守纪律者实施枪决。”(引自:沙姆巴洛夫B.,《国家与革命》,莫斯科,2001年,第94页)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的使者又能做些什么呢?

南下时,斯大林已经做好应对那里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准备。

还是4月29日那几天,他在库尔斯克与中央拉达的代表们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和平条约。乌克兰人依据的是,他们掌握了顿河和北高加索地方“政府”关于退出俄国和接受中央拉达庇护的声明。

至于中央拉达,在德国人占领乌克兰后,它向俄国提出了归还整个黑海舰队、黑海省、斯塔夫罗波尔省、库班、克里米亚和塔甘罗格区、沃罗涅日省的4个县和库尔斯克省的1个县的要求。(萨夫琴科B.,《西蒙·彼得留拉》,哈尔科夫,2004年,第165、166页)

德国人试图“切断乌克兰和中央”的联系,而且不允许乌克兰与苏维埃俄罗斯之间建立关税联盟。德国将军格列涅尔评价乌克兰领导层是“内阁童车里的婴儿”。被派往乌克兰调查的英国军官科林·罗斯在其报告中写道:乌克兰政府是“政治冒险家们的俱乐部,他们依靠德国人的刺刀忙于赚钱的买卖”。

4月30日,德国人解散了中央拉达,因为它试图保持独立。于是,前俄军中将、乌克兰盖特曼伊万·斯科罗帕茨基的后裔、近卫重骑兵军官П. П. 斯科罗帕茨基成了乌克兰的盖特曼。

由于斯科罗帕茨基政权协助德国人强制执行粮食征收,同时还恢复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从1918年5月起,乌克兰开始了自发的农民战争。在被占领后的最初6个月里,约22000名德国官兵和超过30000名盖特曼武装人员被歼灭。据德国陆军元帅艾因霍恩掌握的材料,有两百万农民参与了游击战。由此,称为“穷苦人保卫者”的涅斯托尔·马赫诺人民军成长起来。

这个时候,深入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德国人被迫动用了40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约100万人),但是仍然不够夺取西线胜利之用。此外,他们在征用乌克兰农民粮食的同时,也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欧洲的紧密关系的富有成效的宣传变得毫无意义。

在顿巴斯,仍然保留着苏维埃政权,K. E. 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三和第五军在那里抵抗着德国的进攻。



从1918年6月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斯大林的《关于顿河区域和北高加索》一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南部地区局势的了解。他直言:德国人和“乌克兰-德国人都赞同分裂主义者的要求。

文章结尾是这样的:“如果苏维埃政权不动员一切力量来抗击侵略者和奴役者,那么它就会把自己活活埋葬。但是,苏维埃政权是会做到这一点的。”(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15页)

6月4日,斯大林带着委任状来到察里津,委任状上写着:

人民委员会任命人民委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为人民委员会南俄粮食事务全权领导人。各地方、各区域人民委员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各司令部和各部队长官、各铁路机关和车站站长、各内河和海上商船的组织、各地邮局和粮食机关、所有专员和代表均须执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人民委员会主席 B. 乌里扬诺夫(列宁)(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419、420页)

抵达后,斯大林最大程度地使用了自己的权力。从他发给列宁的电报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6日抵达察里津。尽管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混乱,但还是有可能整顿好的。

在察里津、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粮食垄断和固定价格被苏维埃取消,因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在察里津,现在已经做到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在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也应做到这一点,否则全部粮食都将从投机管道流走。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也出面要求这些苏维埃禁止投机活动。

铁路运输因许多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都热心过问而被完全破坏了。我不得不派专员去主持,他们不顾各委员会的抗议,已经着手整顿。专员们在各地发现许多机车,各委员会没有料想到会有这些机车。根据调查,在察里津-波沃里诺-巴拉绍夫-科兹洛夫-梁赞-莫斯科线上,一天可以行驶8次以上的直达列车。目前在察里津忙着调集列车。

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宣布开展“粮食周”行动,把近百万普特粮食一次性运往莫斯科,由铁路员工专门押运。事前会通知。

由于下诺夫哥罗德不放出轮船(大概因捷克斯洛伐克人之故),水路运输陷于停滞。请下令立即让轮船开来察里津。

听说,在库班、斯塔夫罗波尔有十分可靠的采购经纪人,他们在南部收购过

粮食。从基兹利亚尔通往海岸的线路已经在铺设。哈萨维尤尔特-彼得罗夫斯克线路还没有恢复。请派施略普尼柯夫、建筑工程师、能干的技工以及机车乘务组来。我已经派信使去巴库，日内我就动身南下。商品交换特派员扎伊采夫因为盗窃公家货物、投机倒把，今天将要被捕。请转告施密特不要再派坏蛋来了。让科博泽夫下令，要沃罗涅日的五人委员会即使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别阻挠我的特派员。

据悉，巴泰斯克已被德国人占领了。

人民委员斯大林，1918年6月7日于察里津。（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16、117页）

国家的粮食危机确实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就在人民委员会作出派遣斯大林和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南下决定的会议上，列宁下令动用部队解决问题。

随同斯大林来到察里津的是一支由400名红军战士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100名拉脱维亚步兵。

换句话说，斯大林获得了独裁的权力。因此，那些指责他超越职权、干涉军事的人未必正确。

顺便说一句，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并未使用自己的权力。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一位有经验的秘密工作者、优秀的技术组织工作者和工会运动的优秀实际工作者……完全不是一个政治家……这位极具影响力的工人组织负责人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才能，也没有搞清楚每个阶段实质性的目标。”（苏哈诺夫 И.，《革命札记》，第1卷，莫斯科，1991年，第79页）

在这一对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的评价中（他在1915年甚至领导了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间接反映了斯大林的命运。

再谈谈施略普尼柯夫。正是他在1917年3月反对斯大林重新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受到斯大林的排挤。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部第一次发生尖锐冲突时（发生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施略普尼柯夫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起递交辞职申请，作为对中止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的抗议。这就是说，施略普尼柯夫经历了另一种考验，他代表了社会民主政治的另一趋势，而这种趋势的可行性在十月革命后开始迅速萎缩。

根据斯大林发给列宁的第一封电报判断，他在察里津的行动完全符合“粮食专政”的精神。他被反对者、对手和敌人包围着，这些人有当地党员、转到红军一方的老专家和军官，还有农民、白卫军、哥萨克。他深深触犯了每个集团的利益。过去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载入史册的城市，因此他能够依靠的只有他



以前那个小圈子里的人。

他 17 岁的妻子娜杰日达减轻了他的寂寞，他们在 3 月份就同居了，正好是在人民委员会迁至莫斯科前夕（一年后他们才登记结婚）。

娜杰日达具有坚强的性格，斯大林和她相处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容易。

以下是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她姐姐安娜的儿子对娜杰日达的评价：

娜杰日达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性格坚强。我母亲在《回忆录》中列举了这样一个片断。1911 年，娜佳 10 岁时，为了把她转到另一所学校需要一个参加过圣餐礼的证书。在教堂里，娜杰日达非常独立而且不客气地回答了神甫，以至神甫说了让人吃惊的话。神甫难过地说道：“嗯，你有一个刺儿头妹妹，她应该多读读宗教书籍。”

我以为，娜杰日达性格中一些自然倾向形成于童年时代，她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属于儿童的半合法半非法的家庭中……

娜杰日达很早就成熟了。她的内心脆弱敏感，容易受伤，尽力把内心隐藏在坚强的外表之下，她不喜欢表露出自己的软弱。与生俱来的内心斗争和对自我肯定的渴望仿佛灼伤了她。

家庭争执开始于结婚之初。1918 年来到莫斯科后，蜜月期刚过就发生了长达一个月的纠纷。当作家 A. 贝克为自己的著作《新使命》采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JI. A. 福齐也娃和 B. И. 列宁的女速记员 M. A. 沃洛迪切娃时，她们向他谈及此事。争吵的原因是件小事：斯大林对娜杰日达说话时用“你”相称，而她对他却用“您”，而且怎么也不同意用“你”。

他们就是这样不同的人……（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27、28 页）

把娜杰日达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她童年和少女时期对那个经常出现在她父母住所的浪漫主义英雄的印象，而且还有一种近乎神秘的联系：他救过她的命。当她还是小孩时，曾从巴库的堤岸跌入海里，差点淹死，是柯巴扑进海里把她救了出来。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神秘的联系？因为她被救的生命现在有一部分是属于他的。

也许，娜杰日达举枪自杀时，是拒绝了继续接受他的馈赠。也许，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娜杰日达和斯大林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种联系。

在察里津时，娜杰日达在斯大林的秘书处工作，看到了他十分紧张的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他们是一致的。

当时的形势如果不说是没有希望的，至少也是困难的。北高加索军区的兵力由

几个 300 到 400 人的小“部队”组成。他们驻扎在火车上，里面存储着他们抢来的“战利品”。在前中将 A. E. 斯涅萨廖夫指挥的驻地共约有 10 万人。部队分散，纪律松懈。酗酒、作乐和抢劫盛行。

5 月 26 日，斯涅萨廖夫来到察里津，比斯大林稍早一些。根据他的日记，那些天局势的特点是这样的：“事情很糟，希望渺茫……3 天前在萨列普塔，（察里津当局）解除了第一革命团的武装，从士兵身上找到 105 枚金币和 1 普特 3 俄磅银子（有 800 人）……指挥官扛着麻袋消失了。”（《阿富汗的教训——A. E. 斯涅萨廖夫思想遗产留给未来的结论》，莫斯科，2002 年，第 392 页）

“察里津当局”就是指斯大林。

在这里，斯涅萨廖夫不可避免地与人民委员发生了冲突。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是数学副博士，众多军事科学著作的作者，任西南战线军团司令员。他是基辅和加利西亚都主教、著名院士、历史学家叶夫根尼（博尔霍维季诺夫）的曾孙、牧师的儿子。斯涅萨廖夫一个儿子的教父是他在突厥斯坦服役的战友、未来的将军 JI. Γ. 科尔尼洛夫中校。那时，革命战争的思想对斯涅萨廖夫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在接到去北高加索的任命时，他曾试图说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抵抗德国的入侵必需建立一支特殊的、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正规军队。他的建议显然带有乌托邦性质，未被接受。

根据斯涅萨廖夫的日记，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对于我们了解形势极为重要的意见：“必须把德国人当成主要敌人。”这个意见表明了苏维埃俄国军事领导人的战略方针。

德国因执行分裂俄国并使其殖民化的政策，而成了俄罗斯的头号外部敌人。同时，德国人还支持以 П. H. 克拉斯诺夫将军为首的大顿河军驻守着的自封的缓冲国，也就是说德国是第一批介入俄国国内战争的境外国家。

直至今日，有人还继续试图把当时苏维埃的政策描绘成自觉服从德国人的利益而背叛了俄国的利益，这实在是错误的。

列宁写给 B. 沃罗夫斯基的信使真相得以保存：“……没有任何人向德国人提出过‘援助’的请求，谈妥的是，他们德国人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实现登陆摩尔曼斯克和阿列克谢耶夫的计划。在那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利用这一点，我们就是傻子。”（引自：沙姆巴洛夫 B.，《国家与革命》，第 90 页）

“利益一致”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列宁的政策可以称之为恬不知耻的、残酷无情的，但它是独立自主的。

对此必须补充一点，对斯大林而言这一政策就是科学。

总之，在察里津，命运把斯涅萨廖夫和斯大林交织在了一起。将军不愿意加入这



场自相残杀战争，他注定要失败。

如果注意到，这位司令员不摘下镶金的将军肩章就去教堂祈祷，那么完全可以勾画出一个与革命格格不入的“戴金肩章的人”的肖像。他将军帽上的红星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苏联元帅 C. M. 布琼尼是如此描绘这位将军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 1918 年夏天在察里津郊外（当时他是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在顿河长官克拉斯诺夫率领哥萨克白军从北高加索、顿河和库班向察里津进攻的逼迫下，分散的各红军游击队撤退了。在战斗中，他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得到加强，并被收编为红军的正规部队。A. E. 斯涅萨廖夫积极地参与了这项工作。我记得，安德烈·叶夫根尼耶维奇和红军第 10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И. B. 斯大林一起来到第 37 步兵师驻地。这是一种独特的以检查纪律和部队及分队战斗准备情况为目的的巡视。当向我们这班指挥员们介绍 A. E. 斯涅萨廖夫时，我看见了一个身穿全套俄军旧式中将制服、军容无懈可击的高个子老人。我和其他人一样，首先感到的是惊讶，为什么斯涅萨廖夫佩戴将军肩章：要知道，红军战士们对待‘戴金肩章的人’怀有毫不掩饰的敌意，所以佩戴肩章是不安全的。有人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安德烈·叶夫根尼耶维奇回答说：‘肩章是为祖国立下战功的标志。并且没有人给我降过级。’这是布鲁西洛夫类型的将军：一个在军事和各方面水平都很高的有影响的军事专家。”（引自：《阿富汗的教训——A. E. 斯涅萨廖夫思想遗产留给未来的结论》，莫斯科，2002 年，第 391 页）

7 月初，和斯大林早就相识的 K. E. 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苏维埃第 3 和第 5 集团军的分队来到察里津地区准备作战。“粮食专政”在军事力量上获得了更有力的支持，这支部队是由顿涅茨克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组成的。

后来，政坛领袖斯大林与忠诚的“红色将军”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结合，成为苏维埃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有趣的是，斯涅萨廖夫对伏罗希洛夫的军官素质评价很低。斯涅萨廖夫向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汇报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本人，作为军队的领导，并不具备足够和必需的品质。例如，他在接到用自己的下属部队来替换在克里瓦亚穆兹加阵地驻守的需要休整的察里津警备队的命令后，却没有执行。开始是借口他的部队疲乏，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够执行该命令，后来又改口为察里津警备队似乎自己希望留在阵地上。7 月 13 日，我在察里津车站遇到了伏罗希洛夫同志，而他既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向军区通报谁在代理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指挥部。由此我得出结论，他不够了解军人的职责，没有遵照指挥部的基本规则，因此应尽早解除他占据的职位，而不是把他在博洛茨基属下获得的领导漫长战线复杂行动的任务托付给他……还有他的部队，以前他们是隶属库班-黑海战线司令员加里宁同志的……”（引自：《阿富汗的教训——A. E. 斯涅萨廖夫思想遗产留给未来的结论》，莫斯科，2002 年，第 392 页）

对诚实的安德烈·叶夫根尼耶维奇·斯涅萨廖夫的记忆力，我们只能俯首称臣。他没有想到与“革命指挥员”发生冲突是有致命危险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阻止德国人和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军，保障到达巴库的交通线畅通。他看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就像看待偶遇之人，他必须忍受他们的存在。于是，他去找了自己的直接领导托洛茨基，希望后者能够理解他。

创建了红军的托洛茨基，能够依靠的仅仅是像斯涅萨廖夫这类旧式军官。

这些人是对外战争的优秀专家，但对国内战争而言，他们就不太适合了。

因此，斯大林与斯涅萨廖夫爆发的冲突就成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而且双方都是正确的。

在斯大林给列宁的信件和电报中反映出了事件的发展过程：

列宁同志：

因急赴前线，只写要事。一、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是自己人或其他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多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二、察里津以南有很多粮食装车待运。等铁路打通，我们就用直达列车把粮食运给你们。三、您的通知已经收到。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将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四、已经派信使持信去巴库。五、突厥斯坦的情况不佳，英国正通过阿富汗进行活动。请授予某人（或我）全权（军事性质的），以便在南俄地区及早采取紧急措施。

由于各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很差，必须派一位掌握大权的人常驻当地，以便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如果为此目的任命什么人（不论是谁）来担任，请以直达电报告我，委任状也请用直达电报拍发，否则有重演摩尔曼斯克事件的危险。

送上关于突厥斯坦的电报。暂写至此。

您的斯大林，1918年7月7日于察里津（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18、119页）

这封信中有两个特殊之处。第一，7月6日，莫斯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满布列斯特和约，爆发叛乱，其目的是开始发动反对德国的革命战争，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杀；叛乱被镇压。第二，英国军队占领了巴库油田。

三天后斯大林又给列宁发了一封信：



列宁同志：

只说几句话。一、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虑地乱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顿河区域)、阿弗托诺莫夫(库班区域)、柯培(斯塔夫罗波尔)，乱发证件给法国使团人员(理应予以逮捕)等等，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都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托洛茨基现在的行径正和安东诺夫某一时期的行径一样。请让他牢牢记住，不得到当地人的同意不应该随意委任，否则就会给苏维埃政权丢脸。二、如果不给我们飞机和飞行员、装甲汽车、6 吋口径炮，察里津战线就守不住，铁路也将长期丧失。三、南方粮食很多，但是要得到这些粮食，必须有一个不受各军用列车、各集团军司令员等等阻挠的健全机构。不仅如此，还必须让军人帮助粮食工作人员。粮食问题同军事问题是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拥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上的手续而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不会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

И. 斯大林, 1918 年 7 月 10 日于察里津(斯大林 И., 《斯大林全集》, 第 4 卷, 第 120、121 页)

国家的形势变化惊人地迅速。在实行“粮食专政”之后，人民委员会做出了更严厉的决定：在农村组织贫民委员会，委派他们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然后将部分抢来的粮食分给贫农作为奖励。这样一来，土地再分配后，又在已经安静下来的农村人为地发动了国内战争。还派遣了工人征粮队帮助贫农委员会工作。这导致了农民大规模的抵抗，特别是因为征粮队的行动常伴随着暴力。

“即使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1918 年(主要是下半年)在苏维埃俄国的 32 个省爆发了 258 次暴动。为镇压暴动，仅在 15 个省就有超过 2000 人死亡，而在 24 个省中，‘因暴动’而死亡的人数约为 900 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苏维埃省发生了 8 起暴动，造成约 170 人死亡。反政府的农民战争成为今后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历史与现实》，莫斯科，2004 年，第 390 页)

结果就是，从一个个区域开始的内战变成了整个俄罗斯的国内战争。

5 月 25 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战线顺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从伏尔加河延伸至太平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军的部队都支持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许多基本上是亲社会主义的政府，打出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

红军在东方战线上撤退了。

前线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M. A. 穆拉维约夫决定支持莫斯科的暴动，他被打死。

白军占领了喀山。在南方,英国人入侵里海以东地区(突厥斯坦)和外高加索。

邓尼金的志愿军占领了库班的首府叶卡捷琳诺达尔。现在,苏维埃政权能够控制的只有生活着 6100 万人口的俄罗斯中部区域,这里不到其人口总数的 40%。

1918 年 7 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开始为转入地下做准备工作,以备苏维埃政权陷落。

7 月 5 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恐怖活动。

7 月 16 日至 17 日的夜里,在叶卡捷琳堡枪杀了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孩子和随从。

开始实行在集中营关押和扣留反革命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和斯涅萨廖夫的对抗达到了顶峰。

7 月 16 日斯大林给列宁的信写道:“我认为,军事指挥官斯涅萨廖夫非常巧妙地破坏了清理科捷利尼科沃-季霍列茨克一线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我决定亲自到前线了解情况……由于两周逗留在前线,我确信,如果紧跟着装甲列车调来驻扎在加顺城外、被斯涅萨廖夫的命令束缚了手脚的 1 万 2 千名士兵,铁路线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清理完毕……现在我对您——列宁同志有两个请求:第一:撤走斯涅萨廖夫,他没有能力,不能也不想与其反革命的哥萨克老乡作战。也许,他善于同德国人作战,但在与反革命的战争中他是一个严重的障碍。顺便说一下,铁路线至今仍未得到清理,因为,而且主要是因为斯涅萨廖夫阻碍了此事。第二个要求:请立刻向我们提供 8 辆装甲车。它们将可以弥补,我再次重复,可以弥补我们步兵人数的不足以及组织不力。”(伏罗希洛夫 K.，《斯大林和红军》，莫斯科，1937 年，第 84、85 页)

列宁在回电中写道:“我看,可以同意斯大林的意见。”

7 月 19 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军区司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被捕并押解到被称为“察里津驳船”的浮动监狱。三天后,斯涅萨廖夫被捕。不安的托洛茨基致电斯大林,想让斯大林释放被捕之人并让司令部有可能继续工作。

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上写道:“不予考虑。”

托洛茨基从莫斯科派来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专门小组,小组释放了将军和他的两名助手——诺索维奇和科瓦列夫斯基。其他的军官被宣判死刑。他们因被怀疑策划谋反被枪决,驳船和尸体一起被沉入水底。

第十六章

苏维埃高层“内战”的萌芽

苏维埃高层“内战”的萌芽、斯大林输给了托洛茨基、英国和德国在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之争、德国的革命、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为清查彼尔姆失陷而出差

1918年，苏联红军中76%的指挥员是沙皇军队的军官，而来自工人、士兵和前士官的“革命指挥员”只占12.9%。

然而，不应该认为这些军官是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他们的履历表，这样的人只占极少，绝大多数人除了公职外，既不拥有个人财产，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反映民意的立宪会议选举。在1917年11月的4100万选民中，把票投给社会革命党的有1650万人，投给立宪民主党的不到200万人，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900万人，投给其他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900万人不到一点，投给各民族党派的有450万人。

这种政治观点的比例完全适用于俄国军队的军官们，更何况在战争年代还有成千上万被征召入伍的来自大学生和官员等的所谓“战地军官”。

当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拥护者，难怪列宁建议给每个军官配上两个“长胳膊的”、带着左轮手枪的政治委员。苏维埃政权没有其他来源的军官。

因此,托洛茨基庇护他们,不允许像斯大林这样的共产党员破坏军事专家的威信。但是列宁是支持斯大林的,他不打算阻止这个“神奇的格鲁吉亚人”。

应列宁的坚决要求,托洛茨基被迫给斯大林在察里津前线新的职权:“恢复秩序,把分队整合为正规军,任命合适的指挥人员,驱逐所有不听从指挥的人。”

也就是说,此时列宁并没有明确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相互关系。

伴随着国家机器不可避免的加固以及正规军的成长,历史进程应该通过“内部战争”来加强“革命指挥员”在新管理机构中的地位。但这还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对抗不仅分裂了国家领导层,而且已经表现出了这类或那类人民委员的个人喜好。在布尔什维克上层,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绝不是偶然的。1918年底,中央委员会试图整顿契卡人员的恐怖活动,并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中增加司法人民委员 M. IO. 科兹洛夫斯基为代表,这两件事引起了“革命骑士们”的激烈反对。斯大林受委派来调查这一事件。此事被制止,因为革命领袖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争执。

革命是进步的一种野蛮方式,企图调整它总会遭到各种理由的反对。

与此同时,契卡人员允许逮捕甚至持有列宁亲笔签署的委任状的专家们,此事就发生在察里津肃反委员会。(“现在围绕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身边的这样的恶棍还少吗……如果列宁本人沦为反革命,他同样会被逮捕,像任何一位革命者一样。”一名契卡人员如此说道。)

这些字眼散发着残酷的雅各宾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革命民主派——译注)的气息。只差上断头台了。

然而,托洛茨基的“十惩其一”和斯大林的“察里津驳船”,这些都是革命的野蛮。这些野蛮行径在克伦威尔或罗伯斯庇尔时代都曾发生过。

为了解“内部战争”的性质,有必要在叙述精英们倾向的时候,补充一下对斯托雷平改革的统计和它的分布情况。这场改革实际把国家划分成为“村社社员”的国家和“独立庄园主”的国家。

“村社社员”信奉农民共产主义,而“独立庄园主”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同一社会出身的人会彼此对立,彼此冷酷无情。

当然,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论证。同时,我们还将提醒读者关注在我们国内战争问题上的两个难点。

第一,在俄国中部,农业人口极为过剩,而且俄罗斯平原的气候特点使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这里让农业生产得以充分发展的暖和日子不够多,因此,在农忙时又总是需要大量的人手。这些人手一方面可以弥补自然界短暂的播种和收割期,另一方面,他们额外需要的口粮加重了农村本来就稀缺资源的负担。

我们习惯了按照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把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看成“多余的



人”，他们没有进入帝国的官僚机构，但在 20 世纪初，的确出现了数百万真正的“多余的人”。

在村社的工业现代化及其政治民主进程加速的压力下，这些“多余的人”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人力。

第二，布尔什维克作为彼得执政传统的衍生物，在许多方面和农民群众格格不入，为了国家建设的利益，他们必须阻止农民的自发行动。

(使苏联解体的主要“英雄”——M. C. 戈尔巴乔夫和 B. H. 叶利钦都是苏联时期遭到镇压的农民的儿孙，出现这一情况绝非偶然。还可以列举出成千上万较低级别、不太知名的活动家的例子，作为对这两位政治家的补充，他们也出生在同样的环境中。)

不是农民出身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可以这么说，他们的灵魂是相近的，他们是孪生兄弟。他们坚定地站在基本群众之外，当然是基于不同的文化根基。

因此，英国情报员、外交官罗伯特·洛克尔特回忆录中的一段情节是非常有趣的。他在 1918 年领导过一个驻苏维埃政府的英国专门代办处。洛克尔特援引了 K. 拉狄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话：“当和约获得批准时，他差点含着热泪高呼：‘上帝啊！如果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身后是另一个民族，而不是俄罗斯人，我们就可以颠覆世界。’”(布里斯·洛克尔特 P. T.，《来自内部的历史》，莫斯科，1991 年，第 235 页)

这里什么是主要的？是对“我们”的认知，即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是独立于“民族”之外的。

洛克尔特捕捉到了这个特性。

斯大林不可能说出这样的想法，甚至更接近布尔什维克里的“民族”阶层。尽管如此，他在 1918 年像党的所有领导人一样是“世界公社”的一名委员。他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与托洛茨基的作用是相当的，尽管托洛茨基在所有可能之处都贬低斯大林的这种作用。当然，斯大林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击的。

在 1918 年夏天无休止的战争闹剧中，展开的不仅是军事斗争，也是经济斗争。在这方面，斯大林更接近日常生活，因为他关注的领域通常是粮食、石油和煤炭问题。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

巴库油田也属于北高加索区。从察里津到巴库有一条沿伏尔加河下流的直通河道。喀山在离察里津更远的北方，已经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分子(由铁路运往海参崴的俘虏)占领。

在车里雅宾斯克打架事件后，托洛茨基下令解除捷克斯洛伐克军人的武装。被托洛茨基这种失算和傲慢命令激怒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因此发动了叛乱。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个命令是托洛茨基继布列斯特和约后的第二个极其草率的错误。

其实，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叛乱的客观原因与其说是源于托洛茨基的命令，不如说是因为有法国政府的利益在其中，是法国资助了这些前战俘的调动。

现在，伏尔加河被截断，对白军而言，这就打开了通往莫斯科以及去顿河和高加索的道路。

斯大林在 1918 年 8 月 31 日写给列宁的信中说“争夺南方和里海的斗争正在进行”，并请求派去几艘“轻型驱逐舰和两艘潜水艇”。他关注的地区是巴库和突厥斯坦，尽管它们离察里津很远。他保持着与巴库委员会经常性的联系。

正是在察里津，斯大林参与了世界列强争夺资源的斗争，开始了自己地缘政治的大学生涯。

巴库吸引了德国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德国人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 1916 年 11 月底，当他们突破罗马尼亚防线，靠近普洛耶什蒂油田时，经俄国来到罗马尼亚的英国工程师诺顿-格里菲思在德国人抵达前几小时炸毁了油井，摧毁了约 70 个炼油装置和 80 万吨原油、汽油和煤油。

对于德国军队来说，这一损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1917 全年，德国人能够组织生产的油产量只有 1914 年的三分之一。

因此，在 1918 年，当德国再次集中自己的所有军力，希望在西方战线击溃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时，巴库的石油对他们而言是珍贵的奖品，对布列斯特战利品的补充。

德国人的盟友——土耳其人，同样试图占领巴库。

非常需要保住石油资源的莫斯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1918 年 6 月 3 日，列宁建议巴库公社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受到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占领城市威胁的情况下，“做好全部烧毁巴库油田的充分准备”。（引自：利特文 A.，《1918 年至 1922 年间俄国的红色和白色恐怖》，莫斯科，2004 年，第 64 页）

斯大林就不得不在这两种威胁之间疲于奔命：或者是失去巴库，或者是把它让给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

A. И.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在察里津扣住了一些派往巴库的部队。”（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1999 年，第 77 页）

高加索的局势并不比乌克兰的好到哪里去。巴库公社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一座孤岛。以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为首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允许德国军队通过其领土向巴库推进。面对德国和土耳其的威胁，巴库委员会（孟什维克）宁肯请英国人来帮忙。巴库公社主席、布尔什维克党人斯捷潘·邵武勉发电报给列宁，请求军事援助。

莫斯科回复说：“关于派兵一事我们将采取措施，但无法做出保证。”

8 月 4 日，英国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经里海在巴库登陆，在那里他们确保了波



斯湾油田的安全。在出现土耳其人或德国人占领巴库油田威胁的情况下,英国人应当会重复在罗马尼亚的经验。结果,在到达城市的一个月内,英国人没有让德国人补充到资源。

过了 24 年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局势再次重复。德国部队将冲进巴库,最高统帅斯大林不允许放弃察里津(当时已经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几乎一切都在重复:英勇的防御、与巴库保持运输联系、英雄主义、牺牲和胜利。

1918 年夏秋之季,斯大林在察里津前线不怕与托洛茨基发生激烈的冲突,并在尝试和失误中获得了新的经验和新的地位。

这里还谈不上他个人对托洛茨基的胜利。确切地说,他输了,因为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列宁被迫派遣斯维尔德洛夫去协调冲突,而斯维尔德洛夫把斯大林带回了莫斯科。派出的第二个人是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苏联领导人,列宁借此表明了自己对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评价。

这里还有另一个评价:

斯大林的批示很简短:“枪决。”如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他的两个儿子及和他们一起的大量军官就被逮捕,且未经任何审判被立即枪决。这些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是谋反组织的成员,而另一部分人只是被怀疑参与此事。在随后对后方(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及其下属机关)的白卫军的歼灭和清洗中,诺索维奇(叛逃到白军中的军官——作者注)写道:“这种清洗的特点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央的来电的态度。托洛茨基担心这样会摧毁由他花费力气建成的地区管理体系,在他致电指出应按原状保留司令部和委员部,并给他们提供工作条件的必要性时,斯大林在电报上写下了断然的和具有多重含义的批示:‘不予考虑’。”

这样,这份电报没有得到考虑,而所有的炮兵和部分司令部的管理人员只好继续蹲在察里津的驳船里。

察里津的面貌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这个不久前公园里音乐声还喧闹作响、资产阶级与白军军官公开地成群结队在街头漫步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红色的军事营地,在这里极其严格的秩序和军事纪律高于一切。这种后方的巩固立刻对我们在前线作战部队的情绪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指挥人员、政治人员和全体红军开始感觉到,一只坚强的革命之手在引领着他们。这只手为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进行斗争,无情地惩罚在这场斗争中所有狭路相逢的挡路人。

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并不限于在办公室。当必要秩序得到建立、革命组织得以重建之时,他来到那时绵延 600 多公里的前线。而且需要的就是斯大林,他有出众的组织才能,方可在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斯大林同志从未在军队服过兵

役!),当时又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如此好地处理专业的军事问题。

我现在还记得,1918年8月初,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部队向察里津发起进攻,试图通过集中打击迫使红军退向伏尔加河。许多天来,以全部由顿巴斯工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师为首的红军在组织得很好的哥萨克部队的强攻之下,表现出少见的英勇。这是一段最为紧张的日子。需要看看这个时期的斯大林同志。他一如既往地镇静,有时陷入沉思,连续几天彻夜不眠,在战斗阵地和军队指挥部之间进行着最为紧张的工作。前线的局势几乎是灾难性的。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在菲茨哈拉乌洛夫和马蒙托夫以及其他人的指挥下,经过精心策划,迫使我们疲惫的、遭受了巨大损失的部队步步退却。敌军的战线主力是驻扎在伏尔加河畔侧翼的骑兵,战线一天比一天越收越紧,我们已没有逃脱之路,但斯大林对此并不担心。他只抱有一种意识、一个唯一的想法——胜利,要不惜一切代价击溃敌人。斯大林这种坚不可摧的意志传递给了所有他最亲密的战友,尽管情况近乎绝望,但是没有人怀疑胜利将会到来。

是的,我们胜利了。被击溃了的敌人被远远地赶到顿河河边。(伏罗希洛夫 K.，《斯大林和红军》，第 24—27 页)

毫无疑问,伏罗希洛夫是在唱赞歌,对于斯大林的一些过失只字未提。比如有关 8 月 4 日向卡拉奇和南部季霍列茨克镇方向发动的毫无保障的、以失败告终的进攻。

但整体而言,斯大林的领导尽管带有强制性,却守住了察里津,突破了半个包围圈,把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军队赶到了顿河右岸。

斯大林不同意接收前线司令员派去的军事专家 П. П. 瑟京一事,就实质而言是一件不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前所未有的事件。假如这样做的是其他任何一位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他的前程也就此结束了。

不仅如此,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斯大林被选为 1918 年 11 月 30 日成立的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而在 10 月,他成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他已经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的委员,还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也就是说在察里津之后他的政治威信增加了一倍。

在结束察里津这个阶段时,我们再列举一个列宁对他的评价,这段话是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上讲的:“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伤亡了 6 万人。这太糟糕了……你们说:我们英勇地保卫了察里津……从英雄主义方面来看,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但是从党的路线方面、从认清我们提出的任务方面来看,很显然,我们不能够一下子付出 6 万人的代价。如果那里有军事专家的话,如果有正规军的话,我们可能不用付出这 6 万人……”(引自:《共和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1991 年,第 386 页)



我们想强调两点：英雄主义和可怕的牺牲。

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尽一切努力，与斯大林协同工作”，这绝非偶然。

1918年秋季，出现了军事状况趋于稳定的一些征兆。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些城市保住了。此外，因8月31日列宁遇刺所引起的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不确定性也结束了。列宁活了下来，并迅速康复。

10月19日，由于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而遭到排挤的斯大林离开了察里津。

年底前，他参加了几个大型活动。例如，他进入乌克兰战线委员会，在乌克兰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并当选为乌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外，他主持召开了国防委员会整顿铁路运输工作委员会的会议，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就铁路运输、政治鼓动、军队宿营和粮食供应等问题做了报告。

根据中央委员会10月25日的决定，中央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政治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是：加米涅夫、斯大林、库尔斯基。

他40岁的生日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1918年12月1日，苏维埃俄国被宣布为军营。从12月2日起，所有的铁路进入战时状态。

这是些什么样的生日祝贺啊！

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斯大林是一个物质要求极低的人。

这个刚到不惑之年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呢？不用奇怪，尽管他职务众多，但他只是一个二线的领导人，是列宁任务的执行者。

1918年的秋天最重要的大事件是德国的崩溃。它在既可以称之为英勇的，也可以称之为疯狂的战斗中筋疲力尽了。盟国的西方战线经受住了3月和6月的可怕进攻。德国人输掉了争夺世界资源的战争，其中包括俄国的资源，拥有俄国这些资源可使他们所向披靡。

10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投票支持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出现骚动。武装水兵在基尔起义。11月4日，2万名基尔驻防军的士兵和舰上的全体新兵加入到了这3千水兵之中。11月6日，起义扩展到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威廉港。

在莫斯科，人们紧贴着无线电收音机不放。世界革命开始了！

多数社会党人和国会议员要求威廉二世退位。但大多数人并不支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呼吁工人发动总罢工。11月9日开始罢工。威廉二世皇帝随即退位。

巴伐利亚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社会党人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柏林宣布出任总理，社会党人谢德曼宣布

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卡尔·李卜克内西走得更远：他宣布德意志帝国为苏维埃共和国。

所有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的德国将军都应该记得托洛茨基关于德国革命即将到来的讲话。现在革命来到了他们家里。

正在作战的德国及其疲惫不堪的军队和人民理应在继续具有革命性质的战争还是签订和平协定之间进行选择。

这里，似乎重演了俄国的一幕。

德国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天，列宁向柏林运送了 50 车从饥饿的俄国无产者口中夺下的粮食。

德国社会党人宁可选择向协约国投降，也不愿发动国内战争，因为重演“俄罗斯的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内战。就在 11 月 10 日，德国接受了对手的条件。11 月 11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11 月 1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废除了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

这里要强调一个特别之处。德军此时占领着从法国到高加索的广阔地区。德国既未被占领，也没有遭到破坏，其强大的工业仍完好无损。

西方摆脱了德国的威胁，现在可以自由地对付俄国了。

法国和英国并不知道俄国革命将以什么方式告终，它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

提防着莱茵河邻居的法国开始加强在与其对立的大波兰地区（一直到第聂伯河）的势力，并增强自己在黑海北部沿岸的地位，把敖德萨变成了自己主要的基地。然而，法国的资金非常有限，工业生产与战前水平相比下降了 40%。

这种情况下，法国意识到复活非布尔什维克的统一的俄国是其全球利益所在。因此，在其新战略中，波兰暂时成了一种临时的因素。

与巴黎不同，伦敦采取了更加明确、更加无情的立场。在保持经济发展（通货膨胀只有 20%，而在法国是 450%）和国家秩序的同时，英国认为把俄国赶下国际舞台是下一个战利品。

现在，无须绞尽脑汁像考虑如何保护印度和波斯免遭威胁那样，去考虑该如何处理海峡问题和已解体的土耳其帝国的遗产了。

老牌的殖民强国终于摆脱了竞争对手。

伦敦做出了选择。占领俄国的计划遭到否决，因为俄国气候恶劣、距离遥远，占领它花费过多且难以实现。伦敦决定支持白卫军和实行封锁：波罗的海、芬兰、卡累利阿，北方（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彼尔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海参崴；南面——突厥斯坦、高加索、库班、顿河、黑海；西面——罗马尼亚、波兰。



如果考虑到,早在 1902 年起,同盟条约已经把伦敦和东京联系在一起,那么英国人已在俄国拥有了“控股权”。

1918 年 11 月 16 日,英国军舰进入黑海,并占领了新罗西斯克港口。

11 月 18 日,在鄂木斯克,在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政府担任陆军部长的海军上将 A. B. 高尔察克发动军事政变,并宣布自己是“最高执政”。

1918 年 11 月 14 日,英国政府做出决定向邓尼金的志愿军提供武器和弹药帮助;向西伯利亚增派军官,提供制服,承认鄂木斯克政府并向其提供武器和装备。

1918 年 12 月 3 日,外交大臣贝尔福认识到必须改变俄国“与芬兰、波罗的海诸国、外高加索地区和突厥斯坦”的边界。

如果考虑到,在战争年代协约国在摩尔曼斯克和海参崴已经建立了巨大的军事储备,也就是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了。

11 月 30 日,英国公使馆的武官们(在北方的是普尔将军,在东方的是诺克斯将军)得到指示,英国政府打算在俄国奉行如下立场:拥有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西伯利亚远征,说服捷克斯洛伐克人留守西西伯利亚,占据巴统至巴库的铁路线(石油就是沿该线运输的),向邓尼金将军提供军用物资的援助,向波罗的海各国提供军事装备。

在这种背景下,红军追着逃跑的德国军队展开了进攻,解放了纳尔瓦、普斯科夫、明斯克、里加、米塔瓦、哈尔科夫。

正是在哈尔科夫举行了由斯大林领导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

总之,1918 年底,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这个任务使他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亲近起来。这次去彼尔姆出差的起因是发生了被称之为“彼尔姆失陷”的事件。

灾难发生在高尔察克军队的北乌拉尔编队发动进攻之后:捷克第 2 师向彼尔姆方向进发,佩佩利亚耶夫将军的军团从东北方发动攻击。苏维埃第 3 集团军开始撤退,它与苏维埃第 2 集团军的互相配合遭到破坏。由于军队指挥的拙劣失误以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现有情况估计不足,12 月 25 日彼尔姆被放弃。第 3 集团军伤亡惨重:损失了近 18000 人、37 门炮、约 250 挺机枪。“各部队在后退中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以致红军战士们躺在雪地上,请求同志们开枪打死他们:‘我们站都没有力气了,更不要说走路了,太累了。打死我们吧,同志们’……”(古科夫斯基 A.,《清除彼尔姆灾祸》,莫斯科,1939 年,第 30 页)

画面的确倍感凄凉。29 师抵挡了 5 天,“简直没有一块面包”,在零下 35 度的严寒中;出现多起军事专家叛变、整团整团投敌的事件。

白军的计划是沿着彼尔姆、维亚特卡、科特拉斯一线前进,与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向他们赶来的英国人会合,然后一起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进发。如果他们成功,

苏维埃政权将被摧毁。

收到共产党乌拉尔州委关于此计划的报告后，列宁致电托洛茨基：“收到许多来自彼尔姆地区的党内消息，讲的是军队极危险的状态和酗酒问题……有人请您前往那里。我想派斯大林去……”（引自：《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1991年，第389页）

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任命由中央委员会委员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组成的党的调查委员会，清查彼尔姆失陷和乌拉尔前线最近失败的原因，同时查明由此产生的所有情况。中央委员会授权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第3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所处地域内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伏罗希洛夫 K.，《斯大林和红军》，莫斯科，1937年，第33页）

这一决议缺少军事内容，而且在1919年1月5日由斯大林亲笔起草、由他和捷尔任斯基共同签名写给列宁的第一封信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所发生之事的原因，只是提出了单纯军事改组的措施。

直到1月13日，有关溃败原因的报告才发出：“……敌人进攻前，各部队已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在这之前，我们也没有物资储备；司令部与部队失去联系；集团军司令员管理不善；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对前线的管理，是不能容忍的犯罪方法，它自相矛盾的指令让前线陷于瘫痪，还剥夺了前线快速增援第3集团军的任何可能；从后方派去的增援部队不可靠，原因是补足编制的方法陈旧、后方的极不稳固，以及苏维埃和党组织的完全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伏罗希洛夫 K.，《斯大林和红军》，莫斯科，1937年，第35页）

在这一系列原因中，我们注意到有物资储备、管理不善、补足编制的方法问题。斯大林似乎在继续与托洛茨基进行辩论，并在提醒大家重视军事组织的基础。

在他与捷尔任斯基提交给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重点放在了他们的纯军事和政治的决定上：重新部署各部队和派送物资储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整顿维亚特卡铁路枢纽的工作等等，但主要措施毕竟都是只针对上面已经提出过的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引起了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不安。11月30日，人民委员会做出征收100亿特别税的决定。说起来这个特别税是针对富农而收的，但因沿袭村社传统，此税实际上被分派给了所有农民，而且“转变成了富农手上团结村民反对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武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在批评人民委员会的同时，其实也批评了列宁。

一般认为，正是斯大林的这趟彼尔姆之行恢复并加强了他与托洛茨基在察里津冲突后动摇了的地位。同时，还加深了他与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关系。

在通往维亚特卡漫长的铁路线上，长时间的交谈、不可避免的回忆和讨论使交谈者敞开了心扉。那么，这个捷尔任斯基是何许人也？



他是 41 岁的波兰人，中学教师的儿子。顺便说一句，他的父亲在塔甘罗格中学教书，安东·契诃夫是他的学生之一。如果考虑到斯大林对这位作家的热爱，那么“契诃夫情结”无疑会引起他对同行者更多的感情。除了这位文学大师的因素之外，斯大林尊重捷尔任斯基还有其思想基础。

这二人都非俄罗斯族，他们都拥护在民族自治基础上保持俄国完整，而不是按照“民族自决权”将它们分离。他们相识已久，最早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捷尔任斯基是领导十月起义军事革命中心的成员，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他是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立场的，虽然在最后一刻他投了弃权票。尽管有 11 个年头遭坐牢、被流放并服苦役，但捷尔任斯基保持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他把肃反委员会看作党的一个机构，要求肃反工作人员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定，他赞同赋予肃反委员会不经过法庭审判就进行惩治的权力，但他同时捍卫公开的原则和广泛吸收劳动者参加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原则。

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拥有了一个可靠的盟友。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传记不太友好的作者托洛茨基对于彼尔姆之行只字未提，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第十七章

斯维尔德洛夫之死

斯维尔德洛夫之死、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和南方战线、A. И. 邓尼金将军

不久，在党的八大上（1919年3月18日至29日），在就军事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有了亲自解释相互关系的机会。但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托洛茨基不得不立即赶往东方战线，因为高尔察克的军队在那里又一次发起进攻。由于托洛茨基的缺席，论题转向军队里军事专家和政治委员的比例问题，斯大林没有参与这个讨论。军事专家是必需的，政治委员也是必需的。他持超越于“交锋”之外的立场。在讲话中，斯大林表现出理性解决问题的态度：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

“我必须说，那些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工人分子——农民——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方和前方的许多次骚动，前线的许多次捣乱，都说明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想自愿为共产主义而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以铁的纪律去改造这些人，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引导他们跟随无产阶级前进，使他们为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并在战争的进程中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唯一能够保卫国家的正规军。”（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50页）

就提高自己地位的机会而言，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代表大会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家监察机制的建议。3月30日，他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为国



家监察人民委员。

1919年5月8日,《消息报》刊登了由斯大林签署的关于设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中央控诉和申诉局的通告《告苏维埃共和国全体公民书》。新机构理所当然地扩展了劳动者参与管理国家的可能。

这样,斯大林获得了提高威望的新的空间。国家总监察官、中央委员会委员、组织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俄肃反委员会监察——斯大林身兼数职。

需要特别指出,3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苏维埃的领导层排名第二的Я. М. 斯维尔德洛夫去世。据官方说法,他死于严重的流感,而非官方的说法是他在集会上遭工人毒打致死。

在“小政治局”中剩下了三个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这也提升了斯大林的地位。为什么呢?

因为列宁认为他更亲近、更质朴、更易调度,也就是说,在某一点上类似“党的军事专家”。

3月末,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进入政治局,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加里宁成为候补委员。这没有削弱斯大林的影响,因为把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图鲁汉斯克的旧交和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困难时期的相互支持。斯大林仍是组织局的委员。

3月里,斯大林还参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正值匈牙利发生革命并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这一切都是由列宁派去的贝拉·库恩领导的。(两个星期后,巴伐利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紧接其后的是斯洛伐克。)

1919年3月18日,列宁致电斯大林:“我刚接到来自德国的消息,说柏林正在进行战斗,斯巴达克团控制了城市的一部分。还不知道谁将获胜,但对我们而言,必须最大程度地加快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以便完全腾出手,因为德国的内战可能迫使我们向西进军去帮助那里的共产党人。”(引自:皮亚特尼茨基B.，《历史天平上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明斯克,2004年,第77页)

根据这一任务,红军接到了进入匈牙利和比萨拉比亚的命令。

然而,建立全欧洲苏维埃共和国的初次尝试因遭到波兰军队的打击而受挫。波兰人希望恢复自己在1772年时的国界,他们进入东加利西亚,击败了2万名亲苏维埃的西乌克兰共和国军队,并阻断了乌克兰苏维埃第1集团军的前进之路。

没有得到支持的匈牙利、巴伐利亚和斯洛伐克三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推翻了。1919年4月,具有报复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波兰人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部分。

总之,在整个 20 世纪,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敌对的,因为法国和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建立一个与德国和俄国相抗衡的大波兰国,而在斯大林的世界版图上波兰占有特殊的位置。

要求盟国支持建立边界从海(波罗的海)到海(黑海)大波兰国的波兰领导人一直覬覦着立陶宛和乌克兰的领土,这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波兰外交部长罗曼·德莫夫斯基宣称:“乌克兰国家只是一个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是立陶宛,还是乌克兰,都不能视之为国家。”(引自:乌特金 A.,《俄罗斯的毁灭》,莫斯科,2004 年,第 367 页)

从苏维埃俄国自身来说,1919 年 1 月,向军队提出的任务是向华沙,再向柏林出击,“目标——维斯瓦”。

1 月,在基辅被攻占之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2 月,成立了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积极参与了它们的组织工作。

此时,所有的西方领导人正忙于巴黎和会。俄国作为一个在布列斯特背叛了协约国的国家没有出席会议。如果认为西方国家会采取某种其他方式对待莫斯科,将是很幼稚的。此外,威尔逊总统的最亲密助手和亲信豪斯上校认为,保持世界势力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俄国分裂成几个部分。

假如不是红军实力的增长和世界革命在欧洲爆发(加上在敖德萨的法国占领军和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英国占领军发动起义),同盟国将能够消除反抗,那么到 1919 年年底,世界格局会更加扑朔迷离。

斯大林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军事状况进一步恶化。

5 月 17 日,我们的主人公临危受命。

1919 年春天,尤登尼奇将军的白卫军在执行高尔察克布置的“占领彼得格勒”和把革命军队从东方战线引向自己的任务时,在爱沙尼亚白卫军、芬兰白卫军和英国舰队的帮助下,突然发动强攻,对彼得格勒造成了真正的威胁。局势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在彼得格勒市里又发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其领导者是曾在西方面军司令部、第 7 集团军和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任过职的军事专家们。在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同时,布拉克-巴拉霍维奇于普斯科夫战线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前线开始出现叛变:我们的几个团转而投敌,“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的全体驻军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第 7 集团军手足无措,前线陷入混乱中,敌人逼近了彼得格勒。应当立即挽救危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央委员会再次选择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在三个星期里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很快消除了部队的纪律涣散和惊慌失措,司令部精神振奋,彼得格勒工人和共产党员一个接一



个地被动员起来，无情地去消灭敌人和叛徒。斯大林同志还干预了作战的军事指挥工作。以下是他发给列宁同志的电报：

“继红丘炮台之后，灰马炮台也被我们占领。两个炮台的枪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字迹不清)全部炮台和要塞。海军专家们曾确信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违背了一切海军科学。我只能为这种所谓的科学感到悲哀。红丘炮台之所以能迅速被占领，正是由于我和非军事人员极其严厉地干预了作战行动，严厉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并强迫执行我们自己命令的程度。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声明，我今后还将这样工作，虽然我对科学非常崇尚。斯大林。”

六天后，斯大林同志报告列宁：

“我们的部队开始出现转机。一周来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一起分队或班组逃跑事件。成千上万的逃兵归队。从敌营投向我们阵营的情况更加频繁。一周里，有 400 人投奔我们，多数都带有武器。昨日白天我们开始进攻。虽然答应派来增援的部队尚未到达，但继续停留在我们所处的防线是不行的，这儿离彼得格勒太近了。目前进攻进展顺利，白军溃逃，今天我们已经占领了克尔诺沃-沃罗尼诺-斯列皮诺-卡斯科沃一线。我们抓获了一些俘虏，缴获两门或两门以上大炮及一批冲锋枪和子弹。敌军的舰艇没有出现，看来是害怕已完全属于我们控制的红丘炮台。请火速运送 200 万发子弹交我支配，以供给第六师……”

这两封电报足以充分显示出在消除红色彼得堡面对的险情时，斯大林同志所做出的巨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伏罗希洛夫 K.，《斯大林和红军》，莫斯科，1937 年，第 41—44 页)

斯大林战友的以上所述都是事实。不过，似乎伏罗希洛夫淡化了自己顶头上司的残酷行为：当彼得格勒有人策划暴动时，根据斯大林命令进行了挨家逐户的搜查，甚至包括对一些使馆楼房的搜查，共收缴了 4000 多支步枪，还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内查出一门大炮。一批人质被枪毙。此外，还在工人中进行了征召(有 13000 人被征召入伍)。请注意斯大林命令的语调和内容。比如，在由他和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命令中写道：“所有投奔到白卫军一方分子的家属将被逮捕，而投敌分子本人和任何妖言惑众的人将被就地枪决。”(引自：《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1991 年，第 393 页)

不过，如果只是强调斯大林的异常残酷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更早些，在 1918 年 11 月 24 日，托洛茨基在 65 号命令中就采用了特别措施以加强军纪。下令必须枪毙那些怂恿后退、开小差、不执行战斗命令的人，那些擅自离开战斗岗位、扔下步枪或者出售军服的人，那些抵抗阻击部队以及窝藏逃兵的人。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分别部署了捉拿逃兵的阻击部队，并责成地方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承担每天两次围捕和搜查

的职责，去烧毁那些藏有逃兵的房屋。

这就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曾把自己的这个命令告诉过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他们都没有表示异议。

12月1日，托洛茨基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С. И. 阿拉洛夫，要求他逮捕投敌军官的家人。

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斯维尔德洛夫、Н. Н. 列斯廷斯基、М. Ф. 弗拉基米尔斯基)则要求行动要更坚决。1919年1月24日，在组织局的会议上，他们通过了一份关于对付哥萨克的中央委员会通告，宣布对他们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

通告中写道：

要吸取与哥萨克进行内战时的经验，必须承认，对所有哥萨克骑兵进行最无情打击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将其逐个消灭……

……顿河地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在收到中央委员会这份不能不称之为挑唆的通告后，开始狂热地实施“消灭哥萨克”的政策。布尔什维克党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者们对哥萨克的仇恨胜过了理智，而仇恨引发了最卑劣的本能，并使相信苏维埃政权承诺的顿河人心惊胆颤。在红军占领的顿河地区，行刑机器在不分昼夜地运转，每天有40—60人被送上西天。不管是妇女、儿童，还是老人，无一幸免。“哥萨克”一词也被禁用。哥萨克语中的“镇”改名为俄语的“乡”，而“小村庄”改叫“农村”。与哥萨克有关的一切都遭到干预，包括禁止戴大檐帽，穿带彩色条纹的裤子。哥萨克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并从沃罗涅日省迁来农民落户到曾属于他们的地方。

作为对南线后方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回答，3月11日夜里，米古林斯克、维奥申斯卡亚、喀山和其他一些村镇爆发了起义。前线指挥部要求军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把任何起义的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3月16日，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部队下达命令，要求通过焚烧暴动村庄、每5个或10个男性中枪毙1人、大规模扣押人质等手段迅速平定起义。(克拉斯诺夫B.、代涅斯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年，第136、137页)

哥萨克的反弹如此激烈，以至中央委员会被迫呼吁“暂停压制哥萨克的措施”。当然，各地实际上对这一决议并不重视。

让我们提醒一下读者，斯大林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有关维奥申斯卡亚起义的描述是持矛盾的态度。

但是，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苏维埃政权的残酷行为是有道理的：不能把“俄国变



成一个软弱无力、意志薄弱、贫瘠枯竭、资源被抢劫一空的殖民地”。(这是托洛茨基的话,但这是一句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都会赞同的话。)

在彼得格勒战线,还有一幕战争片断让斯大林记忆犹新:白卫军在进攻初期俘虏了苏维埃舰队的指挥官——前沙皇的将军 A. П. 尼古拉耶夫,他因拒绝加入白军被处以绞刑。

1919年7月8日,斯大林在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说到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一部分俄国军官身上的痼疾(他们的卖身投靠)对波罗的海舰队指挥人员的贻害非常小,因为毕竟有人还有气节,把祖国的尊严和独立看得比英国的黄金宝贵。”(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69、270页)

另外,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自私以及不顾共同利益。但这里就有一个反例:在斯大林从彼得格勒附近发给列宁的便函中写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从东方战线调遣预备军队,因为这会停止对高尔察克的进攻。“与高尔察克相比,罗将柯将军就像是一只苍蝇,因为他在后方既没有面包,没有后退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人力。”)

斯大林断然拒绝对他的帮助,这更能说明,他考虑的是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军事局势,而不仅仅是交给他个人的任务。

5月,向萨马拉逼近的高尔察克军队被歼灭。

7月3日,斯大林被召回,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工作。7月5日,他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还在1919年4月,波兰人就占领了维尔诺,并力图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边境线向东推移。

8月8日,波兰军队转入进攻并占领了明斯克。斯大林向列宁提出请求,并对战局态势与1918年东方战线的情况作了比较:“当时瓦采齐斯和科斯佳耶夫让高尔察克先击溃了第3集团军,接着击溃了第2集团军,然后是第5集团军。”这一次他请求帮助,也得到了援助。

数月之后,战局有了后续发展。

如果西方战线北翼的防御没有得到加固,那么就不可能在1919年10月战胜尤登尼奇的军队,当时彼得格勒的命运正处在千钧一发当中。而且,列宁已经做好了放弃城市的准备。托洛茨基拯救了局势,他劝说领袖派遣他——托洛茨基去组织防御。

总之,1919年夏天是国内战争的转折点。

8月26日,斯大林报告列宁,红军已经占领普斯科夫。9月2日,红军在德文斯克近郊发起反攻。9月26日,斯大林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会,并接受派遣,去南方战线与邓尼金作战。

A. И. 邓尼金中将的志愿军(南俄武装力量)是一支受英国人援助的强有力的军队,主要由军官和哥萨克部队组成。根据苏维埃指挥员的估算,它拥有近10.5万名

步兵和 5.1 万名骑兵。南俄武装力量是由科尔尼洛夫将军那支 4000 人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它在 1918 年 2 月离开罗斯托夫向叶卡捷琳诺达尔进发，与前高加索军队的红军连续作战。

志愿军的特点是有战斗经验、有理想和大无畏精神。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濒死之人。他们有自己的传奇英雄——科尔尼洛夫将军和冰上远征的传奇故事。那是 3 月里的一天，当他们冒雨朝着叶卡捷琳诺达尔进发时，雨水慢慢变成了冰雪，薄冰覆盖了大地。傍晚时分，他们接近了红军占领着的新德米特里耶夫斯卡亚镇。他们没有太多选择：或是在草原上冻僵或是发动突袭。于是，他们涉水过河，用刺刀除掉了红军的警卫。他们在每个农舍都好像注定要死亡似地拼命战斗，并且拿下了该镇！

这场从罗斯托夫到叶卡捷琳诺达尔的冰上远征因此成了一个传奇，而且能直接从军事史上找到它的痕迹：佩罗夫斯基穿越亚洲的冬征、苏沃洛夫横越阿尔卑斯山，后来这一幕在高尔察克属下的将军弗拉基米尔·卡普佩尔史无前例的行军中得到重演。在行军途中，他冻坏了双脚，他被截去脚后跟和脚趾，但他继续骑马前行，目的是不让自己的战士们丧失斗志。

白卫军和他们贫穷的军官，以及过于刻板的将军们就是圣彼得堡俄国的翻版。他们除了想恢复“统一和完整”之外，没有任何社会规划，但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中有一半人赞成君主制，而另一半人则赞同建立民主共和国。

他们是这样认知盟友的，仿佛既没有发生过二月革命，也没有发生过十月革命。邓尼金相信，最好的政策是他的“不预先设定”之路，即先作战，等胜利后再确定建立一个什么政权。在经济领域，他有着一些类似于斯托雷平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已经过时了。

当然，斯大林有关一些军官为了英国的金子而出卖自己的言论不是事实。他们拥有的所有金子是贴身的十字架（而且不是所有人的十字架都是金制的）、东正教教堂的金顶和留恋过去的金色美梦。

如果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邓尼金和斯大林，那么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出生的一致性。将军的父亲伊万·叶菲莫维奇，1807 年生于萨拉托夫省的一个农奴家庭，27 岁时被地主送去当兵，49 岁时以司务长的职务，通过了军官官衔考试，升至边防军少校。未来的将军是个迟来的孩子（他父亲 64 岁第二次结婚后生下了他）。他回忆说，童年是“在极度贫穷之下”度过的，家庭中崇尚相互尊重、公正和对上帝的信仰。安东·伊万诺维奇实验中学毕业，然后考上基辅士官生学校，毕业时以少尉军衔被派往炮兵旅。他的一个同学，帕维尔·瑟京成了将军，并在 1918 年秋天领导了苏维埃俄国北高加索方面军。下达这一任命的是托洛茨基，而斯大林强烈反对。邓尼金在仕途上没有依靠任何提携，像许多将军一样完全是靠自己诚实的战功。即使是阿列克谢耶夫和



科尔尼洛夫,也都是赞同俄罗斯帝国进行改良的。

但毫无疑问,相对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给人民社会公平的纲领,他们无法拿出什么类似方案与其抗衡。因此,白军的机会十分渺茫。

然而,1919年5月起,邓尼金的军队开始向阿斯特拉罕、察里津、顿河和克里米亚等方向发动进攻。在这几场战役中,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第14集团军被击溃。邓尼金是这样评价伏罗希洛夫的:“这个人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但严酷而果断。”

对红军而言,南部局势危机四伏。

“掩护住西方战线的同时,马伊-马耶夫斯基将军接连调动了库捷波夫将军的第一军团和托波尔科夫将军的捷尔斯卡亚师前往哈尔科夫。这支击溃了敌人并不给敌人喘息的军队,在一个月内存军300余俄里。6月1日,托波尔科夫的捷尔斯卡亚师占领了库皮扬斯克;11日前,他们从北部和西北部绕过哈尔科夫,切断了哈尔科夫布尔什维克分队前往沃罗日巴和布良斯克的交通,并击溃了几支前来增援的部队……6月10日,库捷波夫将军的右翼纵队突袭并占领了别尔哥罗德,切断了哈尔科夫与库尔斯克的交通。而11日,也就是在通向哈尔科夫的要道上,经过5天的战斗后,库捷波夫的左翼纵队攻进城内,并在激烈的巷战之后占领了城市。

“6月16日,克里米亚清理完毕。月底前,我们占领了直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整个第聂伯河下游地区。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早在16日就在什库罗将军的动议下被攻占下来。

“敌人在这条战线上溃败是彻底的,我们的战利品数不胜数。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命令中描述的‘第13集团军可耻的溃败’场面,也同样适用于第8集团军、第9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军队处于完全丧失斗志的状态。部队的战斗力下降到最低程度。到处都可以看到失去理智的惊慌失措。自私自利的行为层出不穷……’

“敌军的残余部队在撤退:第13集团军和别列恩科维奇的军团逃向波尔塔瓦,第14集团军和克里米亚军团朝第聂伯河方向撤退。

“5月中旬,顿河军也开始发动进攻。马蒙托夫的第1集团军在强渡顿涅茨克河口上游的顿河后,4昼夜行进了200俄里追击敌人,扫清了顿河右岸,将各村镇发动了起来。5月25日,马蒙托夫已经到达奇尔河。6月6日,突破波沃里诺-察里津铁路线继续前进,部分军队沿着梅德韦季察河逆流而上,而另一部分则赶往察里津的后方。另一编队渡过卡利特瓦河,沿着霍泊尔向波沃里诺进发。第3集团军沿着东南铁路的两侧强行通过顿涅茨克,追击向沃罗涅日撤退的红军第8集团军。与此同时,谢克列捷夫将军的独立骑兵部队径直朝着东北方,向顿河上游的哥萨克起义地区进发。顿河军这次高明和出其不意的进攻使得苏维埃第9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部分部队遭到惨败,同时得以与起义者会合并扫清了整个顿河地区。

“6月，顿河军突破地区边界来到巴拉绍夫-波沃里诺-利斯基-新奥斯科尔一线。在此战线上，六七月，顿河军继续取得胜利，尤其是在沃罗涅日和巴拉绍夫方向上。

“顿河地区群情激昂。6月16日，部队在新切尔卡斯克隆重庆祝被红军占领的土地得以解放。5月中旬只有1万5千名士兵的顿河军此后不断壮大，到6月底已达4万人。”（邓尼金A.，《俄国混乱时期概述（1919年1月—1920年3月）》，明斯克，2002年，第52、53页）

弗兰格尔将军占领了察里津。（邓尼金写道：“这个成功的代价是付出了相当多的鲜血。在其中的一组指挥人员中，有5位师长、2位旅长和11位团级指挥员或死或伤，这说明部队是非常英勇的，特别是库班人。”）

6月末，英国人把里海舰队的所有舰艇移交给了白军，阿斯特拉罕被切断了对外的联系，而红军舰队被封锁在伏尔加河河口。

“截至6月底，南俄军队一边追击败军，一边来到察里津-巴拉绍夫-别尔哥罗德-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赫尔松一线（赫尔松除外），并靠牢固的侧翼防守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驻扎下来。”（邓尼金A.，《俄国混乱时期概述（1919年1月—1920年3月）》，明斯克，2002年，第55页）

6月20日，邓尼金在察里津签署了所谓的《莫斯科令》，下令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当时，其实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前去与高尔察克会师，但此时高尔察克将军的部队已经撤退了。

春季失利后，红军阵营中，苏维埃总司令И. И. 瓦采齐斯被撤职，任命原东方战线指挥官С. С. 加米涅夫担任该职。同时，还展开了新一轮征兵。分别从东方战线调出6.5个师、从西方战线调出3个师来增援南方战线。截至7月中旬，南方战线已屯兵18万。

8月1日，苏维埃第10集团军向察里津发起进攻，但在使用了所有后备部队的激战之后，红军还是被白军击退了。

由前将军谢里瓦切夫指挥的苏维埃突击队本应于8月3日在哈尔科夫战线发动突袭，但进攻未能发起。因为在3天前，库捷波夫将军指挥的第一军团突然发动进攻，并打败了苏维埃第13和14集团军。

激战后，白军志愿军迅速向沃罗涅日、库尔斯克、杰斯纳等地转移。

7月底，顿河军司令员西多林将军（科尔尼洛夫叛乱参与者之一）组建了由马蒙托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团，其任务就是突破红军防线“以打乱红军南方战线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系统”。

马蒙托夫只完成了部分任务，因为袭击的结果是攫取了数额巨大的物资。这些物资堆置在“长达几俄里的辎重车队”上。

8月5日，骑兵军团拿下了坦波夫，然后分别占领了科兹洛夫、列别金、叶列茨、格



里亚济、卡斯托尔纳亚和沃罗涅日。

苏维埃司令部感到灾难临近。

7月1日曾请求辞职的托洛茨基,8月5日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促进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计划:“亚洲可能成为近期发生起义的舞台……看来,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形势,即通向巴黎和伦敦的道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市。”托洛茨基建议组建一支3万到4万人的骑兵军团远征印度,“在乌拉尔或突厥斯坦某处”建立亚洲革命司令部,把必不可少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及当地的“本土革命家”集中起来。(引自:叶梅利亚诺夫 Ю.,《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莫斯科,2002年,第313页)

这个计划绝不能说明托洛茨基有投降主义倾向。但是局势是非常艰难的,应当做好一切准备。

斗争在发展,而且愈发激烈。

8月25日,库捷波夫拿下库尔斯克。10月13日,奥廖尔被占领。志愿军接着向图拉进发。

“10月初,南俄武装力量占领了从与伏尔加河平行的下游水域到察里津的战线,再往下沿着沃罗涅日-奥廖尔-切尔尼戈夫-基辅-敖德萨一线推进。这条战线覆盖了从苏维埃政权手里解放了的整个区域,包括16到18个省和州,幅员81万平方俄里,有200万人口。”(邓尼金 A.,《俄国混乱时期概述(1919年1月—1920年3月)》,明斯克,2002年,第81页)

9月27日,斯大林被任命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历史的天平开始摆动。

“哪怕是鱼贯而行,哪怕是鱼贯而行!但是会到达莫斯科的!”在会议上,南俄武装力量参谋长 И. П. 罗曼诺夫斯基将军高喊着,仿佛预见到志愿军气数将尽。

“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寄希望于它军官们的英勇精神能得到居民的支持。但现实却是另一回事。

“白军志愿军废除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措施:随意征用、枪毙和凌辱教堂。在国内战争条件能够允许的情况下,白军将军们竭力遵守法纪,这有时让居民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看到红军在征用时是毫不客气的。当在库尔斯克的马尔科夫师的骑兵们需要2000个马掌时,志愿军只寄希望于库尔斯克人的乐善好施。但库尔斯克人只捐出了10个。

“‘铁匠和马的主人,’报纸呼吁老乡们,‘你们该感到羞愧!’”

“军队在请求。它完全可以提出要求,但它选择了与自己敌人截然不同的方式。

“随着秋季的到来,指挥部向居民求助,请求提供保暖的衣物。库尔斯克人的捐赠不多不少:一件毛皮大衣。

“《晚报》对此是这样描写的:“现在,正在库尔斯克发生的情况是一幅可怕的画

面：挤满伤员的救护列车开来了，居民中没有人去迎接他们，不愿运送他们的自顾自的马车夫惊慌逃散。从医务所、包扎站和疏散点也传来令人忧心的消息，在那里几乎没有任何来自社会的帮助，在那里军人就像鱼在冰上一样得不到任何支持——所有这一切一分钟都无法令人容忍。’

“能怎么样呢，这就是库尔斯克市。也正是在这座城市，一个不知名的 15 岁的中学生自愿参加了军官部队，却在第二天就牺牲了，临终前还叮嘱父亲把自己最喜欢的书《苏沃洛夫故事集》转交给库捷波夫。

“所有这一切组合成一个画面：英雄和市侩，自我牺牲和冷漠无情……”

“与此同时，那些以前的俄国企业和贸易界的爱国人士，原先也只是对保护自己的市场、对抵制外国竞争对手感兴趣，现在更好像处在一片黑暗之中，无法超越自己的眼前利益。和他们谈爱国主义有什么价值呢？例如，邓尼金的工商管理局呼吁顿涅茨克矿主把煤出卖给志愿军，可有什么用呢？矿主把煤卖到有盟军舰队驻扎的君士坦丁堡更有利可图，而且还能拿到比画有钟王的本国‘钟币’更坚挺的外汇。

“‘这些畜牲冷酷无情地啃噬着用自己果实喂养了他们的大橡树。’《晚报》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

“没有人明白结局会怎样。”（雷巴斯 C.，《库捷波夫将军》，莫斯科，2000 年，第 143、144、145 页）

而这个时候，斯大林致函列宁，建议废除由最高统帅部批准的进攻邓尼金的计划，该计划准备从察里津地区出发，经顿河草原开往新罗西斯克。

“用不着证明，这种在敌视我们的环境，在完全无路可走的条件下的荒谬的（预定进行的）进军，会使我们有完全瓦解的危险。不难推断，这种向哥萨克村镇的进军，正像不久以前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只能使哥萨克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村镇而团结在邓尼金周围来反对我们，只能使邓尼金显得似乎是顿河区的救星，只能给邓尼金建立哥萨克军队创造条件，就是说，只能加强邓尼金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即改变已经被实践摈弃的旧计划，用从沃罗涅日地区经哈尔科夫—顿巴斯向罗斯托夫进行主要突击的计划来代替它。第一，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敌视我们的环境，相反地，是同情我们的环境，这便于我们向前推进。第二，我们将获得最重要的铁路网（顿巴斯铁路网）和邓尼金军队得到补给的主要命脉，即沃罗涅日—罗斯托夫铁路（没有这条铁路，哥萨克军队冬季就得不到补给，因为顿河军队的补给线顿河将要封冻，而东部顿巴斯的里哈亚—察里津铁路将被切断）。第三，我军这样推进能把邓尼金的军队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志愿军，把它留给马赫诺去吃掉；另一部分是哥萨克军队，使它受到后路被抄的危险。第四，我们将有可能使哥萨克人和邓尼金发生纠纷，因为邓尼金在我们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一定会极力设法把哥萨克部队向西转移，而大多数哥萨克人是不会同意的，当然，如果那时我们向



斯大林传 第一卷 (命运与战略)

哥萨克人提出和平问题、和平谈判等问题的话。第五,我们会得到煤,而邓尼金却得不到煤了。”(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6、277页)

斯大林不仅仅是在提出建议,而是在提出要求。他的语调是坚定的:“不这样做,我在南方战线的工作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罪恶的、不必要的了,这就给了我权利,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就是要我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到魔鬼那里去,只是不要留在南方战线。您的斯大林”(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7页)

第十八章

为什么红军能获胜

红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斯大林解决煤炭问题、波兰战线、转向爱国主义、
П. Н. 弗兰格尔将军

在选择进攻路线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后者同样力图通过顿巴斯的线路。而新任总司令加米涅夫则主张通过顿河发起进攻。（“他的视野还相对狭窄，他并不清楚南方战线的社会因素：工人、乌克兰农民、哥萨克。”——托洛茨基 П.，《斯大林》，第 2 卷，第 104—105 页）

但是，托洛茨基无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甚至提出辞职。

正因为如此，在战略的选择上，斯大林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正是他的意见使得政治局的天平发生倾斜，因为开始的时候甚至列宁都在支持加米涅夫的方案。也就是说，斯大林对领袖的意见提出了异议。

后来，南方战线的胜利全部归功于斯大林。

可是，12 月 2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列宁的提议，因彼得格勒和南方战线战功而授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红旗勋章时，很少有人怀疑这一决定的客观性（只有托洛茨基有此可能）。这种奖励显示出列宁的用人战略：用斯大林来平衡托洛茨基。否则，这种因同一场胜利给两位对立的政治局委员同时授勋的现象就难以解释了。

10 月 20 日，红军部队夺回了奥廖尔。在这场激烈异常、接近肉搏的战斗中，红军耍了一个花招：让自己的士兵穿上了白卫军的制服。由于布琼尼的骑兵团在沃罗涅

日地区发动的进攻给白军后方造成了威胁,志愿军被迫撤退。

整个战线都进行着血腥的战斗。

但停顿下来的志愿军失去了攻击力。

此外,因为波兰军队与苏维埃军队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就使得布琼尼可以从波兰战线撤回第12集团军,派它从日托米尔方向袭击并占领基辅。

实际上,波兰人的无所作为加速了邓尼金的溃败。后来在1944年华沙起义时,类似的情况如此重演,当时苏联军队就驻扎在维斯瓦河畔。

与此同时,增加了一个步兵师的布琼尼的军团继续发动进攻,库尔斯克失守。

经过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表现得坚韧不拔的红军,在没有供给和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又向前推进了700公里。邓尼金军队全面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道德的和政治的因素。

红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与他的众多战友一样,南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也不知道答案。

“南部武装力量的斗争以失败告终。这一情况给人们的理解与感受、思想和记忆留下了黑色的阴影。这些人里既有受过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折磨,在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后,再一次回到苏维埃桎梏中的人;又有那些只带着一把故乡的泥土而失去了一切的人,他们失去了祖国、家庭、财产和自己存在的全部意义……那些在小说、报告、回忆录中出现的用亲身经历讲述的过去的画面,往往过滤掉了那些在白色南部历史上有过的积极方面。

“‘人民欢欣鼓舞地跪着迎接他们,送行时却诅咒连天……’。经常这么评判白军的过去。

“诅咒连天! 是否是因为我们这些战败者离开了,留下人民与苏维埃政权面对面地接触? 要知道,跟随我们而来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带来安定。他们的统治是残酷的,他们的苏维埃代表、契卡和其他机构并不比‘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省长们’更人道、更公正;布尔什维克的法院本身违法乱纪、缺乏理智。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人民没有变得更轻松,没有吃得更饱。最后,红军带来的破坏要比白军多得多……”

“尽管白色政权存在诸多消极方面,但它与苏维埃政权的区别还是非常直观和明显的。首先,它废除了恐怖制度,解放了生命,使生命摆脱了笼罩着它的难以忍受的压迫、恐惧、对明天失去信心和相互猜疑。社会、协会、政党、工会组织的生活热火朝天起来,粉碎了束缚个人的和生活的一切个性表现的枷锁,代之以跟共产党的观点不相同的思想、良心。

“煤田的开采量大幅增长,虽然时常发生的交通运输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产量,并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燃料危机,但‘工厂坟地’一天天复苏起来。贸易自由度和经济领域社会自发性的提高促使众多合作公司成立,其中一部分是独立的,一部分

合并成大规模的协会。城市和农村自治几乎全部靠政府拨款。秋季前,开始从半任命制的城市管理向选举制管理过渡。除少数地区,这种过渡使民族和民主的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政府对城市经济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农村饱受国内战争带来的重负和灾难。不幸来自于路过的部队、地方当局的滥用职权以及‘地主返乡车队’,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负担毕竟还是得以控制和得到减轻:第一是自然因素,一方面,在前线阵地和大城市周围以外,‘车队’往往很难甚至无法驶入乡村;另一方面,1919年粮食获得大丰收。第二是政府的措施:禁止擅自侵占他人财产,对非法征用进行补偿,由村社发放播种和征粮贷款,免除或推迟单个农户的服兵役,规范和降低土地租金,颁布了一系列给成了既成事实的土地占有者提供某种司法依据的法令。新土地划归我们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使得这些地区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下降。

“最后,白色制度带来宗教和出版自由,建立了公正的法院和正规的学校。

“所有这些现象都消失在我们尚未形成国家的初期,淹没在那个包罗万象、无坚不摧、毁灭一切的名叫失败的漩涡里。当时过境迁,雷声不再轰鸣,当心灵颤动之时,历史学家冷静的笔尖将驻足在南方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方面。

“而我将不再宣传这些。”(邓尼金 A.,《俄国混乱时期概述(1919年1月—1920年3月)》,明斯克,2002年,第307—309页)

在1919年12月27日《真理报》上的文章里,斯大林解答了胜利的原因。

“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不仅带来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而且还带来了英法资本家的枷锁。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胜利就是使俄国独立的丧失,就是使俄国变成英法钱袋的摇钱树。从这一方面来说,邓尼金-高尔察克政府是极端反人民反民族的政府……”

“俄国内地成了革命的根据地,这里有工业和政治文化的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居民的民族成分是单一的,主要是俄罗斯人。而俄国的各边疆地区,主要是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则成了反革命的根据地,那里没有工业和政治文化的重要中心,居民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一方面包括享有特权的哥萨克殖民者,另一方面包括没有充分权利的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在东部)、乌克兰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民族。

“和边疆地区相反,俄国内地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第一,它在民族方面是单一的和团结的,因为这里十分之九的居民是大俄罗斯人。第二,由于在当地居民中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农民中享有威信并把农民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因而使支援苏维埃军队前线和直接后方的居民易于达成阶级团结。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苏维埃俄国的后方和前线会有这种惊人的联系:只要苏维埃政府一发出支援前线的号召,俄国转瞬间就会出现成群结队的应征者组成的新部队。



而高尔察克-邓尼金政府是永远也不能以此来炫耀的。

“正是应该在这里寻找苏维埃俄国在紧急关头所常常表现出来的惊人力量和坚不可摧的根源。

“正是应该在这里寻找协约国有教养的术士们所不能理解的对下述事实的解释：‘反革命部队进入到一定的地方(进到俄国内地)就必然遭到毁灭……’”(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4—288页)

让我们注意一下以上斯大林有关布尔什维主义民族特性的思想，这是非常有趣的。

此外，俄国中部地区(“内地”)是农民村社土地所有制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集体主义精神最旺盛的地区。

对此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情况：这里农村剩余人口最多；数百年间，正是在这个地区进行着帝国的土地开垦。

也不要忘了思想斗争：平民罗斯为了获得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真理和正义，打败了圣彼得堡俄国。

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军事胜利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例如，应当说一说斯大林领导的瓦解邓尼金后方的艰巨工作，其结果使大批被白军征召的农民或被俘虏的红军战士回到了红军这边。(在高尔察克战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A. П. 斯米尔诺夫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

正如邓尼金所承认的：“双方的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精神决定了胜利。”(邓尼金 A.，《俄国混乱时期笔记(1919年1月—1920年3月)》，明斯克，2002年，第307页)

1919年以红军的凯旋告终。顿河地区和库班又是苏维埃的顿河和库班了。

此外，已整编成骑兵第1集团军的布琼尼骑兵取得的胜利，以及斯大林本人与骑兵第1集团军的领导(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夏坚科、铁木辛哥等)的紧密联系，巩固了斯大林在军界的地位。

总的来说，1919年教给斯大林很多东西，这是流血和胜利的经验。

1919年12月9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再次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0年初，斯大林被指派重建乌克兰经济，任命他为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主席。这样，煤炭产区顿巴斯进入了他的视线。

2月7日，他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制度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将与列宁的主张发生分歧，开始重新审视世界革命必然性的观念。)

3月17日至23日，斯大林参加了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在会上四次发言，其中包括做了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他算什么经济学家？

不过，根据他发言的内容来判断，他掌握燃料工业、冶金工业、铁路和农业等领域现状的一切必要信息。不仅如此，他还建议任命党的顿涅茨克省委员会主席担任煤炭工业政治部主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矿井要转到党的委员会的管理之下。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各企业成立了党组织，这与革命前巴库时期斯大林关于依靠生产部门党组织来建设党的想法是吻合的。他还做出了对煤炭工业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决定。

工业和铁路军队化是托洛茨基的主意，得到了列宁的支持。

当然，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们要提醒一下，邓尼金的非军人政府就未能解决煤炭问题。

4月4日，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在第二天当选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委员。

4月16日，他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顿巴斯煤矿工业情况的报告。

3月，邓尼金战线战事结束。白军在一片混乱中在由新罗西斯克赶来的英国军舰分队的帮助下得以撤退。这一事件作为“新罗西斯克溃退”被载入流亡史。

他们中有相当一批人，包括志愿军和顿河哥萨克，将基地转移到了克里米亚。

高尔察克的军队被击溃，2月7日，这位海军将军在安加拉河畔被枪毙。

国内战争已近尾声。

因此，党的九大依照政治局早在1919年做出的关于建立当地基层党组织来加强党的影响和监督各项工作的十二月决议，着手选拔适合的干部。代表大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为此寻找适合的人选并编制他们的名册，上报给党的书记处。

这样，就向建立类似于新彼得官僚体系的党内官职名录迈出了第一步。

正是在这里播下了后来共产党精英分裂的种子，这个分裂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革命前“移民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对立。截至1920年3月，已有75万党员，其中只有1.2万人是“老近卫军”的代表。

继党内冲突之后，在工程师群体和军界也发生冲突。

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以及与谁一起去建立国家管理体制。

1917年所发生的统治精英的更替引发了平息“地狱之河”的问题。

下面就是И. А. 布宁在其小说《末日》中的描述：

声音低沉粗重、有点原始的感觉。妇女们有着楚瓦什人的面孔，而男人们是莫尔多瓦人的面孔，所有人都和罪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萨哈林岛人的模样。



罗马人在其囚犯的脸上刺上“Cave furem”(拉丁文,当心小偷的意思——译注)烙印。而这些人脸上什么都不需要刻,因为即使没有任何烙印,一切都一目了然……(布宁 И.,《末日》,伦敦,加拿大,1974年,第30、31页)

换言之,新精英与旧精英甚至在面貌特征上也有了差异。

另外一个非常冷静的作家 M. M. 普里什文这样评价 1920 年布尔什维克面对的形势:“俄国革命作为一个自发事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正当的,但一个有意识的人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件事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俄国的无意识”本是该抑制的。

这就是斯大林处于这一建设过程开端时的情况,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他还没有把军大衣穿破,而这应该加强了他的管理能力。

而我们身佩勋章的主人公在这片广阔的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上看到了什么?他曾在共和国的所有战场上胜利作战。

按照共产主义思想,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进程积极展开了。截至 1919 年 10 月 1 日,有 2500 家企业收归国有。1920 年 11 月,国有化扩大到所有企业,甚至是使用“机械发动机”的小企业,这样的企业约有 3.7 万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些企业中有 3 万家企业未被列入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登记册,即这些企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

在农业方面,实行了严格的余粮征集制:每个农民村社课以实物税。此税可与农奴制时代的代役租相提并论。对上交的粮食发放领取日用工业品的票证。而对日用工业品的需求只能满足 15%—20%,这样一来,农民实际上就失去了进行商品交易的可能性,因此播种面积急剧减少。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余粮征集制的思想失败了。1919 年计划征收 2 亿 6 千万普特粮食,然而费了很多劲仅收到 1 亿普特粮食。

是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幸福,反而是高尔察克、邓尼金废除了苏维埃土地国有化的法令,这让农村的大多数人更无法接受。要知道,布尔什维克是“自己人”,而白军是“外人”。

到 1920 年 4 月,国家的局势还算稳定。

4 月 23 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以庆祝党的领袖的 50 寿辰。文中他向受庆贺者表达了应有的敬意,在文章结尾他预言:

“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了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314 页)

他说的理论家指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但那些“新人”是指谁呢?

同一天,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的庆祝寿辰大会上,斯大林突然发言,提到列宁勇

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并回忆了1917年9月预备国会的历史。他再次提及：在“我们这些实践家”看来，不应当驱散预备国会，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人是前线战士的代表。但列宁建议“驱散和逮捕”。

结果，没有听取列宁的意见并“坚持至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列宁真诚地承认“实践家”是正确的。

党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在一片赞扬声中做了这样的发言，这至少是令人奇怪的。

斯大林向他的同事们发出了某种信号。不，他并没有贬低列宁的作用，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明知领袖不喜欢过生日，他选择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告诉“理论家们”以下内容：“你们不完全明白发生转变的特性。我在国内战争的所有战线上打过仗，看到了你们没能看到的。历史的胜利将属于我。”

当然，斯大林在此时此刻未必是这样想的。但他已经预感到正在临近的领袖地位之争。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战争正在迫近。它以前就发生过，而且在21世纪还将继续，这就是与波兰的战争。

按照一系列西方理论家(A. 马汉、X. 麦金德等)和俄国的斯涅萨廖夫将军(他是斯大林在察里津前线的战友)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争霸决定着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并且谁控制东欧，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而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全世界。

因此，历史已经注定了俄国和波兰的对立：乌克兰空前残酷的、带有宗教战争性质的哥萨克战争，俄波战争、波兰人杀害大牧首赫尔莫根，混乱时期俄国的分裂、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民族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波兰的被击溃和俄德奥三次瓜分波兰，还有1917年后复兴的波兰对衰弱的俄国加以控制的觊觎。

在西方战线时，斯大林已经认识到了波兰的侵略行径并经受了失败的痛苦。此外，作为过去的神学院学生，他完全记得，波兰人怎样在克里姆林宫里饿死了激励抵抗波兰军队的精神领袖大牧首赫尔莫根。

现在，命运正是安排斯大林来参与新的战斗。

让我们提醒一下，波兰军队从1919年2月开始向东推进，是想获得尽可能多的领土。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哥萨克军队被派去试探波兰人，他们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三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中一些人的肚子被割开并把活猫缝在里面。(梅里丘霍夫 M.，《苏波战争》，莫斯科，2001年，第25页)

苏维埃政府向波兰人建议签订和约。莫斯科最后一次提出签订和约的建议是1920年1月28日，但没有得到回复。



华沙布置的任务在它 1920 年 3 月 1 日发给沃伦战线指挥官们的通报中就有陈述,当时华沙方面根据波兰总司令和元首 IO. 毕苏斯基的指令正在为沃伦战线做准备。通报中说:“……国家元首和波兰政府均支持必须削弱俄国的立场……现今,波兰政府准备援助乌克兰的民族运动,以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从而大大削弱俄国,把拥有粮田和自然资源的最富饶的边陲从俄国分离出来。建立独立自主的乌克兰的主要意图是在波兰和俄国之间设立屏障,把乌克兰归入波兰的影响之下,并通过这种途径保障波兰在经济上(为自己开辟销售市场)和政治上的扩张。”(引自:梅里丘霍夫 M.,《苏波战争》,莫斯科,2001 年,第 29、30 页)

3 月 5 日,B. 西科尔斯基将军率领的波兰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于 3 月 6 日占领了莫济里和卡林科维奇。

3 月 10 日,红军总指挥部通过了与波兰人的作战计划:计划对明斯克方向的西方战线发动主攻,接着用骑兵第 1 集团军去加强西南战线。骑兵第 1 集团军当时正在邓尼金的失败之地——北高加索。

至 4 月 20 日,从两方的力量对比来说,尤其是在西南战线,华沙是占优势的。

对此必须补充的是,毕苏斯基与彼得留拉签订了条约。按此条约,要把沃伦割让给波兰并确认 1772 年时的边界,同时把两个乌克兰师转交给波兰人指挥,而在乌克兰的波兰军队获得了由盟友提供供给(粮食和马匹)的权利。

4 月 25 日,苏维埃军队在从普里皮亚季河到德涅斯特河一线受到进攻;4 月 26 日,苏维埃军队撤离日托米尔、科罗斯坚和拉多梅什利;5 月 6 日,撤离基辅。

但是,西南战线的军队在战略布局上是成功的,保存了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

尽管苏维埃政府是高举国际主义大旗的,在这场战争中,它第一次不得不转为提倡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精神。

5 月 1 日,布鲁西洛夫将军向人民委员会提出要支援红军,有几百名前沙皇军官跟随其后。为了与波兰反革命侵略作斗争,成立了隶属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加强兵力和资源特别会议。由布鲁西洛夫领导该会议。这也是第一次向俄国的旧精英们严肃地提出了是否有可能为新政权效力的问题。

这个问题因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而灼伤着每一个不愿俄国遭到进一步削弱的人的心灵。

而像斯涅萨廖夫这样刚刚在红军任职 2 年的将军们,获得了更加不辞辛劳效力的又一个理由。

斯大林不可能不参与这场战争。而且,他是西南战线领导层中主要的政治人物,这条战线应该经乌克兰在利沃夫战线上对侵略者给予重击。第二波攻击是由 M. H. 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西方战线发动的。图哈切夫斯基曾指挥过东方面军的第 5 集团军,并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

根据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计划,骑兵第1集团军前来增援西南方面军,它刚从北高加索地区调遣过来。

首先发动攻击的是西方面军。进攻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命令所有部队投入作战,没有留下任何后备部队。后备部队原本是应该立刻赶去支援西南方面军的。

后来,后备部队的缺失以最悲惨的方式表现出来。

5月14日清晨,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发动进攻。进攻过程中困难重重。请注意,在波洛茨克和列佩利地区的战斗中,由B. И. 崔可夫指挥的第五步兵师的第四十三团脱颖而出。22年后,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将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主要的英雄。

接下来的战斗时胜时负。一开始,红军向前推进了110—130公里,然后波兰人调来了后备部队,企图包围他们并逼迫他们后撤了60—100公里。

最后,西方战线的五月攻势并未获得完全成功,重要的是阻止了波兰人,迫使波兰人从乌克兰境内调来后备部队投入战斗。

这样一来,西南战线的军队就比较容易发起进攻了。

5月25日,骑兵第1集团军在乌曼地区集结。它是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4个骑兵师和1个特种团。

5月26日,斯大林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是A. И. 叶戈罗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清除后方的众多匪帮,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战线后勤部长,随同他一起抵达的共有1400名肃反人员和内务警卫队士兵。就像1919年初在东方战线那样,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又一次合作。

当谈及苏波战争时,我们还必须强调一个情况:这场战争的地理分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完全得以再现,这场战争对于后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而言就是一场实战演练。

5月23日,西南战线指挥部签署一项命令:对基辅波兰集团军发动主攻并摧毁在乌克兰的波兰军队。

红军在步兵人数上不到敌人的三分之一,但骑兵却拥有绝对优势(2.7:1)。

5月26日,骑兵第1集团军开赴战场。

在最初的战斗中,红军的正面进攻未能突破波兰人的防线。

此时,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干预了军事行动。斯大林致电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要求放弃正面进攻,并建议绕过居民点。

6月3日,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骑兵第1集团军对敌人的后方进行打击。

6月5日黎明,骑兵战士在雨雾中穿过铁丝网秘密进入前沿阵地,突破了波兰人的防线。

进攻迅速展开。6月7日,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被攻克,红军骑兵释放了7千名被俘虏的红军战士,并击败了由萨维茨基将军指挥的波兰骑兵。



红军向前挺进了 120—140 公里。在乌克兰的波兰方面军被一分为二。6 月 12 日基辅被解放。

7 月上旬,苏维埃军队进入乌克兰西部,并为西方面军进攻白俄罗斯创造了有利条件。

7 月 4 日至 7 日,苏维埃军队由乌克兰西部发动进攻,强渡别列津纳河,7 月 11 日,解放明斯克,粉碎了波兰第 1 集团军的主要力量。波兰人全线溃退。

至 7 月中旬,红军突破了波兰在原德国战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坚固防线,7 月 14 日,攻克维尔诺,7 月 17 日,夺取利达,7 月 19 日,占领了格罗德诺和巴拉诺维奇。

此时,莫斯科正在着手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1920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7 日)。俄国代表团主席团成员有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加里宁、季诺维也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不在其中。

而且,也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对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认知与公认的认知是有些不同的。

宣布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后,季诺维也夫做了一些修正:“也许,我们专注的,不是用一年时间,而是用两年或三年时间使整个欧洲成为苏维埃国家。”(皮亚特尼茨基 B.,《历史天平上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明斯克,2004 年,第 72 页)

在代表大会宣言中说道:“共产国际宣布俄国的苏维埃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在苏维埃俄国未成为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组成部分之前,国际无产阶级不应该刀枪入库。”(皮亚特尼茨基 B.,《历史天平上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明斯克,2004 年,第 83 页)

俄国领导人把这场战争看成是革命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在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组建了由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特种步兵独立旅(“斯巴达克旅”),还建立了波兰红军第 1 集团军。共产国际在俄国西部地区招募了超过 18000 名波兰共产党员。

红军是在“为全人类劳动者的利益”而战。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中有这样的语句:“向西方前进! 向华沙前进! 向柏林前进! 我们的刺刀将给全人类劳动者带来幸福与和平!”

任务的双重性让红军扮演了危险的角色:民族和国家任务要求理性地去解决,而共产国际的任务则推动着部队满怀浪漫主义精神义无反顾地向前进。

原则上,整个苏联历史就是在这种双重星光的照耀下发展的。

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波兰战线移回到躲避在克里米亚的白军身上。这支白军是由 42 岁的中将 П. Н. 弗兰格尔率领的,他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母系的远亲。按

其父系的血缘关系，他属于已经俄化了的瑞典人，他的堂祖父曾在高加索地区打过仗，接受过沙米尔的投诚。弗兰格尔本人是近卫骑兵团的军人，他拥有两个高等学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二世矿业学院和尼古拉总参军事学院），参加过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过南俄武装力量的志愿军和库班军队；“新罗西斯克溃败”后，他接替邓尼金将军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一职。他邀请了标志性人物——斯托雷平的战友 A. B. 克里沃舍因和经济学家 П. Б. 司徒卢威院士任职于他的文官政府；颁布了非常重要的两部法令《土地法》和《地方自治法》，根据这些法令，土地变为“在该土地上劳作者”的私有财产，而地方自治会掌握了地方的政权。

大不列颠政府拒绝支持弗兰格尔，但法国政府在迫使弗兰格尔签署了苛刻经济承诺之后，承认了他的“事实存在”。

经过重新部署，6月6日，弗兰格尔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出发，向北塔夫里亚发动进攻，并获成功。

从战略上看，这像是波兰的“第二条战线”，尤其是他和毕苏斯基拥有同一个西方盟友。但这里同样具有双重性：白卫军的爱国主义绝不可能与波兰领导人反俄罗斯的政策结合在一起。

必须承认，俄国和西欧这种悲剧式的分裂性一直伴随着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当然，还包括整个 20 世纪。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都摆脱不了。

弗兰格尔军团的军事行动击溃了由 Д. П. 日洛巴指挥的红军突击队，该突击队由一个骑兵军团、一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组成。

“弗兰格尔占领北塔夫里亚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胜利，但白卫军没有足够的军力把这个胜利扩展为战略意义上的胜利。其计划是准备先包围和歼灭第 13 集团军，紧接着在后方对西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发动进攻，但该计划是无法实现的。生力军和武器装备在战斗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且战线绵延 300 多公里的白卫军，在不进行重新部署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按原计划继续向顿巴斯方向发动进攻，所以转为防守。”（《苏联时期的国内战争》，2 卷本，莫斯科，1986 年，第 2 卷，第 276 页）

尽管白军表现出无比的英雄主义，但他们其实并没有进攻顿巴斯的可能。弗兰格尔进攻的经济目的是夺取粮食，战略目标是法国政府提出来的。为此，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弗兰格尔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后勤供给。

当时的克里米亚报纸生动地描述了克里米亚地区人们的精神状况。

土地改革、自治、合作社、食品和粮食在市场上要便宜出售、要依法办事、允许鞑鞑人在当地学校用鞑鞑语进行教学、宣布与机关作风（按弗兰格尔的话，这是与“传统的俄罗斯的恶习”）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最真正的上层革命的风向标。

它成功的机会多吗？很可能是，它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投机倒把增多，合作



社尽可能多地购买粮食并把它们运往国外换取硬通货。卢布贬值到了农民拒绝接收而要求用商品来支付粮食产品的地步。但是，部队负责军需的人从哪里去弄商品？他们按照低廉的国家定价与农民结算。农民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把粮食卖给合作社的人，换取火柴、布匹或窗户玻璃，或者支持弗兰格尔的改革，非常便宜地出让给负责军需的军人。

《夜话报》在社论《劳动与投机》中写道：

历史将会说：俄国灭亡与其说是因为革命，不如说是因为投机……劳动与投机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不流血但可怕和真正致命的决斗。必须停止买卖外汇……

不要指望合作社的员工和商人会有什么爱国主义。价格不断上涨。政府对商界的呼吁在口头上得到了充分的理解，但在行动中却体现为婉转的请求：请求政府签发出口粮食到君士坦丁堡的许可证。

《夜话报》还写道：

许多人说：不管怎么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组织结构还没有调整好，没有合乎实际的工作，社会无所作为，政权的基层代表不会也不愿执行总司令有效的措施，群众还有敌对情绪等等……

难道我们不明白获得拯救不是靠别人的虚弱，而是靠民族的凝聚力吗？

我们不再是诚实、敏锐的人了，没有多少人敢直视自己的良心。

……

如果我们逐个读完弗兰格尔将军的所有命令，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命令里贯穿着俄罗斯的准则，一个严整的、坚实的发展和信仰体系。似乎，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它，但实际上他的指导思想常常被置若罔闻，遭到顽强抵抗，有时还被彻底否定。

还是那伙在5个月前就完全漠视和“唾弃”祖国的国际投机掠夺分子；还是那群抵制和破坏俄国重整的人。而且和从前一样，俄国人及其观点就如同不值一文和受到歧视的什么东西，被弃于遗忘的角落，压在最下层。

俄国人没有长进，但所有敌视俄国，漠视它或是不相信它的势力却大幅度发展、很有市场……人民和体制完全偏离了。

银行界的财团在玩俄国卢布和有价证券贬值的游戏。值得仔细观察一下的是，随之出现的汇率的升降。

例如，作为对英国和苏维埃俄国就恢复贸易关系开始谈判的反应，所有利安

诺佐夫的、巴库的(股票——作者注)等等均大幅上涨。而作为对俄国军队开始反攻的回应,是俄国的有价证券和卢布的大幅贬值。

一切都是在按经过深思熟虑的预谋进行。所有这些从俄国抽走黄金和珠宝、大量收购罗曼诺夫家族的和其他珍品的行为,都是在各种希夫、福特之流的指挥棒示意下进行的。旨在造成俄国一定程度的失血,以后不费大力气就能奴役俄国人民。(雷巴斯 C.，《库捷波夫将军》，莫斯科，2000 年，第 190—193 页)

在此背景下,苏维埃军事工业的发展成果就是给这个“克里米亚国家”下了死刑判决。

1920 年 4 月,苏维埃俄国生产了 17649 支步枪、121 挺机枪和 39 门大炮;而在 5 月生产出 26300 支步枪、500 挺机枪、94 门大炮。

在 1920 年 7 至 8 月期间,苏维埃指挥部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可以集中兵力,对波兰军队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也可以冒险,不顾一切直接攻向华沙。

当然,莫斯科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是谁站在毕苏斯基后面,但它没有害怕西方。

解放全人类的美好形象符合莫斯科的战略需要。

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欧洲教派,那么在某一方面,这次面临的选择甚至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而现在这个神秘的革命历程遇到了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能遇到的难题。任何对华沙和柏林的进攻行动都会受到弗兰格尔将军和来自罗马尼亚方面的军事威胁,以及已经从法国回到波兰的由 Ю. 加列尔将军指挥的有 7 万人的波兰军团的阻挠。

如果分析一下所有在苏维埃战线上能够做出决定的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行动,那么就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头脑最为清醒的一位。

后来,在图哈切夫斯基兵败华沙后,以托洛茨基和部分苏维埃将军为首,开始加深了一种想法,认为这次失败的责任在斯大林。因为他没有批准骑兵第 1 集团军及时援助西方面军,因而造成了波兰人的“维斯瓦河奇迹”。

6 月 24 日,在西南战线取得重大胜利之时,斯大林在哈尔科夫《共产党人报》上刊登了《关于西南战线的情况》。在文中,他仿佛是个有超常洞察力的人,指出了一些很快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但是,如果以为在我们战线上的波兰人已经完结,那就错了。

要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和波兰人作战,而且是在和动员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切黑暗势力并且不断供给波兰人各种给养的整个协约国作战。

此外,不要忘记波兰人还有后备队,这些后备队已经调到沃伦斯基新城,毫



无疑问，它们的行动在最近几天就会看出来。

还应当记住，波兰军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瓦解。

毫无疑问，前面还有战斗，而且是激烈的战斗。

因此，我认为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

我不想来证明，这种骄矜和自满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线敌人力量实况的。

我必须很肯定地指出，如果后方和前线不全力以赴，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不这样，我们就战胜不了西方的敌人。

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尤其证实了这一点，这次进攻像“晴天霹雳”一样，并且它的规模是惊人的。（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32、333页）

这里一切都说得非常坦率。他警告会有危险且不相信世界革命会以奇迹般的方式提供援助。

7月1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重复了这些想法。但他的警告没有被总指挥部采纳。

英国政府向莫斯科提出的与波兰签订停战协议（“寇松照会”）的建议被拒绝，莫斯科还决定加速进攻。

7月19日，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告知托洛茨基，波兰人的左翼被完全摧毁。7月21日，总司令 C. C. 加米涅夫来到明斯克的西方战线指挥部，并下令在8月12日前占领华沙。

7月23日，加米涅夫电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重要的是，部队要热情高涨，以保证有可能继续前进，不能降低士气……不排除三个星期内完成任务的可能性。”（梅里丘霍夫 M.，《苏波战争》，莫斯科，2001年，第74页）

胜利即将到来的气氛冲昏了头脑。总司令坚信西方面军有能力在没有邻近方面军支持的情况下完成下达的任务，而且为此只需出动西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这里并没有斯大林的责任。

因考虑到总指挥部和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原战略计划被改变：用两个方面军对华沙进行集中进攻的计划被对华沙和利沃夫进行分头攻击的计划所取代。后来，在占领利沃夫后，骑兵第1集团军本是应该“从后面向华沙”发动进攻的。

此外，罗马尼亚也影响了战略的变化，按照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罗马尼亚应该会向侧翼发动突袭。

这样，各方面军要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他们互相远离，独立作战。

军事史学家认定是总司令加米涅夫“犯了战略性错误”。（梅里丘霍夫 M.，《苏波战争——1918 年至 1939 年间的军事政治对抗》，莫斯科，2001 年，第 76 页）

但把所有过失都推到总司令身上是不正确的。我们强调：总的立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1920 年 7 月 15 日

斯摩棱斯克。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密。仅送温施利希特：
请告您和其他波兰的同志们对这种战术的评价。

我们非常庄严地声明，我们会保障波兰工人和农民得到比寇松和协约国赋予的边界更向东的国界。

我们在集中一切力量彻底歼灭毕苏斯基。

我们在波兰本土只做最短期的停留，以便武装工人，然后立即从那里离开。
您认为在波兰是否有可能和有多快会发生苏维埃变革？

列宁

致总司令加米涅夫：

抄送：斯克良斯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列宁，第 707 号，1920 年 7 月 17 日。

寇松勋爵的照会说明，协约国的各资本主义政府认为我们在波兰战线的胜利是对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建立起来的并不稳定的国际和国内机制的严重威胁。协约国的代理们疯狂使劲，想让罗马尼亚卷入战争。对波兰和弗兰格尔的军事援助正在全面展开。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认为有必要拒绝英国的调停。因为这是一种手腕，一方面，它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面前，掩盖了正在进行针对我们发起新攻击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这将给波兰和弗兰格尔恢复实力以发动新的进攻赢得时间。

从对局势的这一总体评估出发，总指挥部和所有军事部门的其他机关必须采取措施，全面确保我们快速有力地向前推进，紧追正在撤退的波兰白卫军。在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派去反对资产阶级贵族波兰的力量的同时，筹备好预备部队以防罗马尼亚昏了头，重蹈波兰的覆辙……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JI. 托洛茨基



1920年7月23日密电

哈尔科夫。致斯大林：

共产国际的形势一片大好。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我都认为，应该鼓励立刻在意大利发动革命。我个人认为，为此应该使匈牙利苏维埃化，或许，同样也要使捷克和罗马尼亚苏维埃化。需要仔细考虑。请告您的详细结论。

列宁

致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斯大林，致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斯米尔加。第213号，密电。1920年7月23日

可能你们已经知道，得到了波兰人签订和约与停战的建议，及同时将派来军使的消息。这一问题将于5时至6时在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军使你们要接待，但同时也要采取措施，使得他们的这一请求完全影响不到我们向前推进。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随后传达。

托洛茨基

(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年，第303、306、313页)

8月4日，斯大林在发给列宁的电报中报告了西南战线中弗兰格尔战线的情况，并谈到(请注意!)把“所有西部的军队转归西方面军”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斯大林预见到指挥部有分裂的危险。这种分裂两周后便以不幸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还是在这封电报中他写道，不能低估弗兰格尔的威胁。

此时，从斯大林的通讯中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担忧。相反，在7月24日的电报中，他报告说：“在这种前景下，不鼓励在意大利发动革命应该是一种罪过……应当提出在意大利及在像匈牙利、捷克(对罗马尼亚只能是打败它)这样一些还未巩固的国家组织起义的问题。”(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特维尔，2004年，第122、123页)

8月5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托洛茨基告诉列宁，红军将于8月16日进入华沙。全会批准在西欧进一步行动，并通过了斯大林将西南方面军部分集团军转调给西方面军的建议。

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某人的过错或是恶意蓄谋。

总司令加米涅夫考虑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红军已经强渡纳雷夫河并占据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向各个战线下达新的指示，调西南方面军的两个兵团——骑兵第1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转归西方面军指挥。

叶戈罗夫下达了一些必要的相关命令，但本应接收已归他指挥的新部队的图哈

切夫斯基，却在西南战线战地指挥部的部署区留下专门的作战管理站之后，向总司令建议暂时由西南方面军负责这些部队的编制和后勤。也就是说，图哈切夫斯基多多少少在拒绝承担责任。

叶戈罗夫和斯大林认为，这样将破坏在北塔夫里亚和弗兰格尔作战军队的可控性。他们的理由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这场争执中，总司令加米涅夫是支持图哈切夫斯基的。这里还在协调立场，那里西方面军已从北边以半圆型包围了华沙并向它挺进。但这时，包抄部队的左翼因驻扎着莫济里集团军而处于危险状态。

为防止发生危险，8月11日，加米涅夫下令叶戈罗夫停止对利沃夫的进攻并派遣尽可能多的队伍前往西部。8月13日，要求在这一天转交第12集团军，8月15日前转交骑兵第1集团军。然而，有总司令指令的电报在译成密码时出错，发到叶戈罗夫手上时已经无法阅读。

正确的电报直到8月13日才收到。

这个延误被证明是悲剧性的。

此外，在其他任何一个文件中，都未提及总司令下令停止进攻利沃夫的军事行动。

此前一天，即8月12日，第12集团军奉命夺取维斯瓦河和桑河渡口，在那里差点与聚集在卢布林地区的波兰突击队的右翼发生冲突。同一时间，骑兵第1集团军已经解除预备状态，出发去强渡布格河和占领利沃夫。

因此，最终收到加米涅夫指令的叶戈罗夫已经无法立即执行指令。他报告说，前线军队“在执行占领从利沃夫至俄罗斯拉瓦地区的主要任务，并已经开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不可能的”。

8月13日下午，加米涅夫要求叶戈罗夫把指定的军队转交给西方面军，叶戈罗夫也准备好了必要的指令，但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别尔津拒绝签字。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出面调停此事。

“在当天与托洛茨基的直通电话交谈中，别尔津告之：

“——‘斯大林同志拒绝签署指令的理由是，这会破坏两个集团军所在地区业已形成的力量布局。他认为，转交骑兵集团军应该或是在三天前，当它还处在预备状态时，或是在其占领利沃夫之后。’

“——‘如果斯大林同志不愿签字’，托洛茨基说道，‘那么您应该来签。’

“——‘但是我绝对不了解最近的作战计划和方案，因此我不能盲目签署指令。’

“——‘莱因霍尔德·约瑟福维奇，我命令您签署它，因为刻不容缓。’

“8月14日凌晨1点，别尔津执行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指示。三个半小时后，指令分发到各集团军指挥部，但已错失良机。”（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



《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年，第319页）

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在发生转变的。斯大林无可指责，因为从战场上撤出像集团军这么大的兵团，远非易事。托洛茨基后来指责斯大林由于自负想要占领利沃夫，想抢在图哈切夫斯基之前夺取华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如果要找罪人，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托洛茨基、列宁、图哈切夫斯基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

8月14日，波兰军队袭击了西方面军第3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的交汇处，并转为进攻。

骑兵第1集团军到了8月20日才从争夺利沃夫的持久战中解放出来，未能来得及赶往华沙。

前往维斯瓦河的苏维埃军队已经疲倦不堪。一些师减少到只有500人了，一些团只剩下连的人数。

此外，图哈切夫斯基忽视了加米涅夫关于莫济里集团军会造成主要威胁的指令，因为他认为波兰人的主力集中在北方。

“在谈话结尾（与图哈切夫斯基），加米涅夫表示：‘您如此强烈坚持波兰人的主力在布格河以北，根据总部掌握的材料，我对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意。但是，考虑到您在这个问题上了解得更为详细，我授予您行动的自由。不过我要提出尽快击溃波兰军队的任务，不要醉心于战略深入，因为在这方面我担心我们不会有作出这种决定所必要的时间。’事实上，正是总司令本人拱手让出了这场至关重要战役的指挥权，而这场战役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战争的结局。”（梅里丘霍夫 M.，《苏波战争——1918年至1939年间的军事政治对抗》，莫斯科，2001年，第87页）

战争以10月12日签订里加和平条约结束。根据这个和约，苏波边界划定到了比“寇松线”向东得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都划归波兰了。（这种划归一直延续到1939年红军实施“解放远征”之前。）

根据里加和约的条款，波兰放弃支持弗兰格尔和彼得留拉。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白卫军在北塔夫里亚的作战行动，波兰才能够从俄国得到重大让步，因为俄国需要立即消除在南方不断增加的威胁。

“应该补充的是，弗兰格尔为了换取法国的支持，被迫与之签订条约，担保承认革命前俄国的债务，允许法国人管理俄国欧洲部分的铁路，在黑海和亚速海所有港口收取关税和港口费，获取乌克兰和库班的所有余粮、获得四分之三的石油和汽油及顿涅茨克采煤总量的四分之一。”（梅里丘霍夫 M.，《苏波战争——1918年至1939年间的军事政治对抗》，莫斯科，2001年，第94页）

尽管波兰战线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这里从未有过真正的和平：“冷战”与在波兰领土上进行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的相互袭击一直交替进行。

波兰领导者最大限度地削弱俄国的行动,以及在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实行波兰化时的残暴行径,不可能不引起斯大林的回音。

波兰人对待苏联战俘的态度非常差。只在图霍尔这一个集中营里,就有 22000 名被俘红军战士死亡;总共死亡的战俘有 60000 人。对特别旅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波兰人当场枪毙。

斯大林永远没有忘记这些。

尽管共产党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但莫斯科红场上十月革命前就矗立着的象征着 17 世纪俄国人抵抗波兰入侵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在斯大林时期并未摧毁,就很能说明问题。

根据里加条约,波兰得到一块约有 1400 万人口的领土、3000 万金卢布、300 辆蒸汽机车、435 节客运车厢和 8100 节货运车厢。

顺便说一句,1921 年 2 月 21 日,波兰与法国签订反俄德军事同盟。波兰希望建起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由它控制的反苏维埃统一边界,从而成为与法国、英国和德国平等的大国强国。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战后和约的参与者之一劳合·乔治在《和平条约的真相》(1938 年)一书中是这样表述波兰的奢望的:“没有人像波兰人那样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事。因为当普鲁士还是一个弱小的公国时,波兰已经是中欧最有威胁的军事强国了。在中欧辽阔的土地上,省份很少,居住着各种民族。波兰不可能不对这些民族提出自己的继承要求,认为这些是从它这里抢走而历史上又是属于它的遗产。波兰被盟国提供给它的新酿的自由之酒陶醉了,又一次以为自己是中欧唯一的主人。民族自决的原则不符合它的追求。它要求得到加利西亚、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部分领土,但这里的居民在表决时断然拒绝来自波兰的统治。波兰的领袖们立即否定了人民自己决定自己民族从属关系的权利。他们断言,这些不同的民族都属于波兰人,根据是他们的祖先曾经征服过这些民族。这就像年迈的法国诺曼底男爵,当你请他出示他的领地证时,他就拔出剑一样。波兰挥舞着自己好战的国王们的剑,尽管这剑早已在他们坟墓里锈蚀几百年了。”(引自:《空间帝国》,莫斯科,2003 年,第 88、89 页)

后来,波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它对于俄国和德国而言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本是可以任何手段解决掉的。

此外,波兰要求得到更多的领土,超过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与德国的边界,要求得到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的领土。

1920 年 9 月 9 日,波兰将军日里戈夫斯基佯装叛乱,占领了根据凡尔赛和约并不属于波兰的维尔诺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使之并入华沙。

对于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冯·西克特将军而言,波兰对维尔诺的占领是他作出



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他认真地思考着与俄国结盟的问题,认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借助俄国来修正凡尔赛和约。俄国是凡尔赛和约的第二个受损国。不管是俄国,还是德国,都是世界新格局中的被压迫者。俄国甚至根本就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

“波兰问题成为德国国防军和红军结盟的教母,这个问题对于德国军官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格尔利茨 B. ,《德国总参谋部》,莫斯科,2005 年,第 225 页)

1921 年 3 月,俄德已经开始了把在德国境内被禁止生产的包括坦克和飞机制造在内的军工企业搬到俄国的谈判。

稍微超前说几句话:1923 年,当斯大林已是党的总书记时,苏联做出保证,一旦波兰进攻上西里西亚,它将对德国提供军事援助,并根据这一点集结了两个集团军(第十七师和第九师、3 个骑兵军团)。华沙把这一举动看做是当头一棒。

第十九章

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

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斯大林冒犯
列宁、“克里米亚国家”的终结

8月17日，斯大林离开西南战线返回莫斯科。他想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失败的原因，并向政治局递交了正式声明，但没有任何人支持他这一举措。因为大家都犯过错。

在1920年9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承认出现“重大失败”，但未深入具体分析原因。（“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能够争取到波兰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不同意成立委员会。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分别发言。这是两位真正对手之间的冲突。

斯大林说道：“那时在我们面前摆着几个事实。第一个是寇松照会，第二个是英国和德国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第三个是在西南和西方战线上我军向前推进。因此，从各方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如果我们接受寇松的建议，则会冒险给波兰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以喘息的机会。无疑，中央委员会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我们战线的状况。中央委员会发出咨询，并于8月中旬收到电报，说我们将于8月16日攻克华沙。这条源于主管负责人的消息成为额外的砝码，比中央委员会继续进攻的意见更有分量。我必须声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其他政策，那么它将不是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当查明战线司令员对前线的评估有误、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出了错、中央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战略拖累时，说‘要是嘴里长



豆该有多好’是可笑的。豆子从来都不会长在嘴里。如果中央委员会制定出了任何一个别的政策都是反动的。因此,我认为它的逻辑是绝对正确的。”

托洛茨基也为自己的领导责任进行了辩护:

“的确,我们的侦察机关并不很出色,尤其是情报机关。我们这里工作着一批注重热情和忠诚的最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他们提供了出色的政治情报,但是提供给我们的军事情报是非常不详尽的,从军事目的上来说是不合格的。我们得到了多得不能再多的关于彻底瓦解和普遍恐慌的消息,说在那里尝试巩固军队将一事无成,并且,如果说是因为某人使中央委员会陷入困境,不如说是当我们接近华沙时所获得的党政情报造成的。现在有一种不同意见。我要问,你们事先知道波兰军队的生力军并没有被粉碎吗?同志们,我敢说,我比许多其他同志更持怀疑态度。因为正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比别人更加关注,即波兰军队的军事力量到底有没有被粉碎。就此我曾与斯大林同志交谈过。我说,不能满足于各种各样有关波兰军队已被击溃的消息,因为波兰的部队还没有被击溃,原因是与我们的成功相比,我们的俘虏太少了,我们夺取的物资也太少了。斯大林同志说:‘不,您错了。我们所抓的俘虏与我们的胜利相比要少,但那是因为波兰士兵害怕投降被俘,都四散逃到森林里去了。波兰军人的临阵脱逃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它瓦解了波兰,而且这是我们胜利的主要原因。’怎么说呢,我必须说,斯大林同志骗了我和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是打击白色波兰的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一个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同志犯了错,并把这个错误带给中央委员会,而这个错误信息同样成了中央委员会确定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正是这个时候,斯大林同志说,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骗了中央委员会。我说,对这一点中央委员会是有评价的。斯大林同志把事情说成是:我们有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但指挥部让我们上了当,说是将在某日要攻克华沙。这是不准确的。一些同志说:当要攻占华沙时,我们上当了。如果中央委员会由说这种话的同志来制订自己的政策,那么它就将是极个极为草率的机构,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和我们所掌握的是一样的。我们得到的任务是从侧面摸清白色波兰的情况,要了解得非常清楚,以便从中搞出一个苏维埃波兰来。我们的部队是在什么状态下行军,这是所有过去见过战争的同志想象得到的。在40天里,部队像出膛的炮弹一样不间断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行。而装备和其余物品常不合需要,因为它们拨发得十分匆忙。将士们疲惫得如同进入了催眠或梦游状态。然而,波兰工人阶级、雇农阶级、波兰农村基层群众能够主动起义的希望没有实现。这些情况集中在一起,导致当我们在梦游状态下接近华沙时,那里并没有出现革命高潮,而是组建了法国人领导的反革命兵团,它精确、灵活地袭击了我们,成了我们在自己军事史上所经历过的最大灾难之一。这是无可争辩的。低估这次失败的影响无异于犯罪,特别是面对党的代表大会……”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对红军的状态作这样奇谈怪论般的解释。很显然,托洛茨基

想竭力为自己开脱部分罪责，避免谈论自己的失算和他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该承担的责任。

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均遭到批评。

比如，K. B. 拉狄克指出：“我们错误的根源是过高估计了中欧革命的成熟度。如果需要对确定的革命进行援助的话，刺刀是管用的。但要是只是为了弄清楚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情况，我们还有另一个武器——马克思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不需要派红军战士去。”

对于托洛茨基的催眠状态击败了红军战士的论断，K. K. 尤列涅夫提出了自己极其尖锐的意见。他强调：“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最高统帅部脱离了地方机关。否则，托洛茨基同志不会发出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使用‘后方在前面’的表达？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但，是什么样的后方——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的？后方没有出现在向波兰进军的前面，也不在这里。我们犹如滚雪球般前进，可一遇到尖钢锐铁，就不可避免地散落开来……”（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 年，第 325—327 页）

这是一幅丑陋的画面，两位最高层领导争吵起来。列宁被迫在结束语中对斯大林提出意见，说他“做得过火”。

然而，这没能阻止斯大林。他向代表大会主席团递交了含有包括冒犯列宁内容的声明。

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1920 年）9 月 23 日。斯大林同志的声明。

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昨天讲话的一些地方可能会给与会同志们理由，怀疑我歪曲了事实。为了澄清真相，我必须做如下声明：

（一）托洛茨基同志宣称，说我粉饰了我们各战线的形势，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嘲笑过“向华沙进军”的流行口号、公开在报刊上警告同志们不要迷恋成就、不要低估波兰人兵力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只要读一下我在《真理报》上的几篇文章即可。

（二）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对攻取利沃夫的预计没有成功的声明，也是违背事实的。8 月中旬，我们的部队行进到了距利沃夫 8 俄里的地方，他们显然是可以攻克利沃夫的，他们没有攻下它，原因是更高一级的指挥部在我们部队距离利沃夫只有 8 俄里时，有意识地放弃了攻打利沃夫。指挥部把布琼尼的军队从利沃夫地区调到西方战线去营救后者。这与斯大林的预计有什么关系！

（三）列宁同志声称，说我对西方战线有偏见，且其战略并没有使中央委员会上当，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没有人否认，中央委员会持有指挥部关于 8 月 16



日攻克华沙的电报。问题并不在于8月16日没有攻克华沙,这是一件小事;问题在于,由于士兵疲惫不堪、后勤保障不畅,西方面军处于灾难的边缘,但指挥部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也没有察觉到。假如指挥部把前线的这些实际情况如实地报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当然会暂时放弃进攻,就像它现在做的那样。至于华沙没能在8月16日被攻克,我重申,这是小事。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灾难,我们有10万战士被俘、200门大炮被夺,这就是指挥部的巨大过失了,就不能不予以关注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求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场灾难的原因,目的是保证我们免遭新的失败。看来,列宁同志顾惜指挥部。但我认为,更应该顾惜的是事业,而非指挥部。9月23日。И. 斯大林(斯大林 И., 《斯大林全集》,第17卷,特维尔,2004年,第135、136页)

为什么斯大林要求进行调查?

因为他的确还在6月的时候就预告过临近的危险,但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却忽视了。

因为列宁息事宁人的愿望和托洛茨基把过错推给别人的虚伪侮辱了他。

斯大林不愿意圆滑地保持沉默。

后来,当他成了总书记,而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一些卑躬屈膝的历史学家提出“巨大灾难”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行动,这其实是谎言而且给斯大林帮了倒忙,他的原则立场被降到无谓争吵的层次。这就使后来在公众心目中的一种想法得以加强,认为实际上事实与那些吹拍过度的蹩脚作家们的描绘大相径庭;而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他断言罪魁祸首是狂妄自大的斯大林。

很难说清,为什么斯大林处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想不到实施自己的成立委员会的建议。大概,他不愿与过世的已成为崇拜对象的列宁发生争执?或者是他不想把国家的注意力分散到悲伤的失败往事上,或是根本没能顾得上?

斯大林没有参与击溃弗兰格尔军队的战斗。

红军集结了巨大兵力,包括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攻克了彼列科普的防御工事,冲入克里米亚。说实在的,并没有出现混乱不堪的景象。

10月16日,白军乘坐126艘船只秩序井然地离开克里米亚。他们留下了未炸毁的军用器材仓库和粮食仓库,认为这些东西能造福俄国人民。同样还留下了重伤员。约2万名军官不愿撤离。很快,按托洛茨基的命令他们被枪决,托洛茨基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敌人。

克里米亚的这段光辉历史(更广泛点说:志愿军的光辉历史)产生了许多传奇,并被写进俄罗斯文学的许多优秀作品之中。

我们只引用一首由杰出的俄国白军侨民诗人尼古拉·图拉维洛夫写的诗歌。他

以一个 18 岁青年人的身份参加了国内战争，战争结束时是 21 岁的哥萨克大尉（少校），后来移居巴黎，作为法国外籍军团的成员在非洲打过仗，出版过几本诗集。

克里米亚

我们离开了克里米亚
在烟雾和火花中，
我始终在船尾
对着自己的战马徒劳射击。

而它游啊游，疲惫不堪，
跟在高高的船尾后，
它不曾怀疑，也不曾知道
将与我永别。

多少次在战斗中
我们期待同生共死。
战马游啊游，筋疲力尽，
依旧相信着我的忠诚。

我的勤务兵命中目标，
水流微微泛红……
正在远去的克里米亚海岸
我将永远铭记。

第二十章 在北高加索

在北高加索、为石油而斗争、东方政策、格鲁吉亚成了苏联的格鲁吉亚

应该注意一个历史学家们通常忽略的事件：从1920年10月16日至11月20日，斯大林到高加索地区出了一趟长差。

总的说来，较之对西方事务的发展，苏维埃俄国向东的推进总被看做是次要的。事实上，由M. B. 伏龙芝指挥的突厥斯坦战线的胜利、远征印度的准备、波斯革命、在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对新国家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很明显，斯大林参与了这些事件。

按照俄国政治的常规模式（西方防御、东方进攻），伏龙芝和托洛茨基赞成为“军事打击印度”作好准备。因此，当邓尼金的进攻正如火如荼时，托洛茨基往莫斯科发了一封信：

致俄共中央委员会：

作为对我8月5日报告的补充，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问题。

根据某些资料，阿富汗和英国停战之后可能会转向对付我们。据我们的突厥斯坦人的报告，英国正积极促进波斯、布哈拉、希瓦和阿富汗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突厥斯坦。如果它不这样做，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在东方，英国试图立刻建立一条国家链条，就像它已在我们的西部边陲所建立的那样。在东部这项工

作本身要比在西方障碍小得多。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谁能赢得先机。

我们在突厥斯坦胜利推进,高尔察克南方集团军被粉碎,这为我们赢得先机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我们在西部奉行等待、虚与委蛇、避免摊牌和让步这些完全正确的政策的同时,我们应在东部转为执行毅然决然的政策。

我们现在可以立即破坏英国纠集亚洲国家反对我们的图谋,在突厥斯坦建立重要军事基地,为此已具备足够的条件。必须立即选择出一条可行的打击路线,并从英国用来对抗我们的这个国家链条中选定一个国家作为直接打击对象,向它提出关于缔结和约的最后通牒,它如不服从我们的意愿,就给予坚决打击。

由此可得出结论:

(一) 必须派遣一个拥有全权的人到突厥斯坦去,并下达一道指示,保证该同志在东部将不片面采取我们在西部一贯被迫实行的那种传统的躲避政策。

(二) 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书面命令,要求在突厥斯坦集中物资和人力,以便我方有可能从突厥斯坦进攻南方。

1919年9月20日

托洛茨基(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年,第364页)

伏龙芝也主张“打击苏维埃俄国最凶恶的敌人英帝国主义”。

1919年12月底,突厥斯坦战线的部队越过阿姆河左岸,进入希瓦汗国。他们干涉了部落斗争并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接下来是布哈拉酋长国,它幅员辽阔,占据着相当于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部分吉尔吉斯的土地。

1920年8月28日,布哈拉市开始发动革命,得到了突厥斯坦战线部队的支持,在使用了大炮和飞机的情况下,经过3天激战,占领了旧布哈拉要塞。

斯大林与这些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与阿塞拜疆和波斯事件有直接关系。

1920年4月28日,苏维埃第11集团军占领巴库。而土库曼斯坦正好起到了向波斯方向发展的“革命浪潮右翼”的战略作用。

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就波兰前线失败原因发生争执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向印度推进,“原则上认可必须为此提供武器和黄金”。

总之,占领油田地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苏维埃最高领导层的通信中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20年11月28日。密电。致斯米尔加和奥尔忠尼启则:

我们极其需要石油,请斟酌一份给居民的文告:我们将杀死所有敢于烧毁和破坏石油和油田的人,相反,如果能将迈科普,特别是格罗兹尼完好无损地交出



来,我们将宽恕所有的人。顺便说一句,请告诉我,现在粉碎邓尼金是否有保障。波兰的威胁越来越大。

列宁

列宁的这个提醒起了作用。3月22日,北高加索游击队攻下了迈科普,1天后高加索方面军第11集团军占领了格罗兹尼。

3月17日,斯米尔加和奥尔忠尼启则收到了列宁的新电报:

1920年3月17日。密电。致北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斯米尔加和奥尔忠尼启则:

攻克巴库对我们非常、非常必要。请全力集中于此,而且在各种声明中一定要极其巧妙并确保最大限度进行为建立巩固的地方苏维埃政权而做的准备工作。这同样适用于格鲁吉亚,虽然我建议对它要更加谨慎。有关调配之事请与总司令协商。

列宁

列宁的意见很快就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3月21日,他致电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委托斯大林来监督调遣增援部队到高加索战线的情况:

哈尔科夫。致斯大林的直达电报:

我向图哈切夫斯基提出以下询问:

在我们占领新罗斯斯克和格罗兹尼后,打算向您借3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只是通航后才能给您提供补给。请您答复,您认为是否有可能在这种条件下立即发动进攻去占领和守住巴库?请考虑用格鲁吉亚来支持阿塞拜疆的可能性。

3月21日

对此,我有一点补充:最好能与格鲁吉亚签订协定,承诺它完全不受侵犯和给它提供石油。我认为,为增援西方战线,比较可行的是从高加索战线撤回4个师,而不是6个师。

请告知您的意见。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请求您在当夜回复这封急电,无论如何不得迟于3月22日11时。

特派员 M. 格鲁申

莫斯科,3月21日

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莫斯科。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密电收到。高加索方面军至少有 25 个步兵师和 10 个骑兵师。在我看来，可以按您的原计划从那里借 6 个师去对付波兰人。留下的部队完全可以守住巴库地区。如果我们承诺中立，格鲁吉亚人并不危险。

斯大林(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 年，第 366、367 页)

占领巴库后，红军借助里海舰队的军舰在波斯湾地区的港口恩泽利登陆，与部署在那里的由印度人组成的英国步兵师作战并迫使它投降，从而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指望依靠一个叫库丘克汗的地方分立主义者，他控制着吉兰省。

里海舰队司令员 Ф. Ф. 拉斯科利尼科夫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委员、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都认为，是“炸毁波斯的阿塞拜疆”和开始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时候了。

印度人不想与苏维埃军队作战。

由 9000 名哥萨克组成的波斯哥萨克旅保障过德黑兰的波斯中央政权的稳定，现在准备转向红军方面。库丘克汗宣布成立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开始组建波斯红军。

不过，莫斯科对德黑兰的政策需要考虑波兰战线的局势。因此，拉斯科利尼科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接到了不要过于投入和限于暗中支持库丘克汗的指示。

然后，局势在朝必须作战的方向发展。从巴库赶来了 П. Г. 姆季瓦尼和 А. И. 米高扬。库丘克汗退出政府。在苏维埃特使们的影响下，成立了艾斯哈图雷汗新政府，新政府开始效仿“老同志们”的政策：对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进行国有化，开展反对伊斯兰教的宣传。结果，导致当地居民对共产党执政者非常失望。

此外，高加索问题与国际石油市场是直接联系在一起。英荷皇家壳牌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收购了法国罗特希尔德家族在俄国的主要石油资产。另外一个巴库大资产方是诺贝尔家族，他们建议壳牌公司的所有者亨利·德特丁购买他们在阿塞拜疆的油田。德特丁相信，苏维埃政府将在 6 个月后垮台，但为保险起见他请求外交部给予政治支持。英国外交部拒绝了他的请求。外交部意识到，在 1920 年，布尔什维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苏维埃的政府人员进入巴库后，立即实施石油工业国有化。购买诺贝尔家族资产的人是在冒可怕的风险。但还是出现了愿意冒险的人——1920 年 6 月，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极低的价格(650 万美元)购买了诺贝尔家族在俄国的半数石油资



产。美国人遵循了一个简单的意图：不向来自“壳牌”的竞争对手让步。此外，“汽油时代”已经来临：从1911年至1918年，美国对石油的需求上升了90%，1914年至1920年间，汽车的数量从180万辆增至920万辆。

但是，“新泽西”公司白买了。就在此时，外贸人民委员克拉辛正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进行恢复经济关系的谈判。没有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援助，俄国无法发展自己的工业，也包括采油工业。1920年11月，人民委员会向西方提出建议，把一部分经营权出售给外国投资者。

因此，莫斯科一只手在波斯与英国作战，而另一只手却向伦敦伸出橄榄枝，而且还成功了。

1920年9月20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做出决议：决定不在波斯建立苏维埃政府，相反，撤回部队，只保留恩泽利港归自己控制，并与沙赫(某些阿拉伯国家，如伊朗国王的称号——译注)签订友好条约。

这就是斯大林启程出长差时高加索的局势。他之所以长时间留在那儿，只能解释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极富战略重要性。

高加索地区是通向中亚和近东的地缘政治桥梁。消灭了弗兰格尔、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在高加索地区巩固俄国地位的任务立刻被提到了首位。

斯大林的行进路线是：罗斯托夫、弗拉季高加索、巴库、达吉斯坦。

在他对地方积极分子的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此行的政治任务。此外，他还宣布达吉斯坦自治，这应该可以缓解这个车臣人从未间断过起义的边疆区的复杂局势。

但是还有另一个任务：在即将合并格鲁吉亚前进行实地视察，因为在格鲁吉亚掌权的是敌视莫斯科的斯大林的宿敌——孟什维克。

1920年9月，第二国际的代表团来到格鲁吉亚，而第二国际被布尔什维克认为是妥协的、不忠的。莫斯科无疑把这些西欧社会党人的到来看成是西方地缘政治的野心。

政治局面临一个问题：“在高加索地区，协约国有什么样的机会，革命又有什么样的机会？”斯大林返回莫斯科后在与《真理报》记者谈话时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次谈话中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首先是对本地区地缘政治的准确评价，这表明斯大林透彻地理解，国家面临的不是革命任务，而是战略任务。

其次，分析了所有高加索国家的情势。

关于格鲁吉亚，斯大林如是说：“我记得在1905年至1917年期间，外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中间呈现出一片兄弟般团结的景象，当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工人，兄弟般地团结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而现在，我到达梯弗利斯之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外高加索各民族工人之间过去的那种团结已

经没有了。民族主义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增长了,对其他民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绪加深了:反亚美尼亚的、反鞑靼的、反格鲁吉亚的、反俄罗斯的和种种民族主义现在极其盛行。旧的兄弟般信任的关系破裂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削弱了。显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阿塞拜疆(木沙瓦特党人)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三个民族主义政府存在3年之久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民族主义政府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政策,向劳动者灌输挑衅性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致民族主义的仇视气氛包围住了这些小国中的每个国家,使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得不到俄罗斯的粮食和阿塞拜疆的石油,使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得不到经过巴统运来的商品。至于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战争)和互相残杀(亚美尼亚和鞑靼的互相残杀),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奉行民族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毒素的环境里,原有的国际主义关系破裂了,工人的意识遭到了民族主义毒素的侵害,这是不足为怪的。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残余在工人中间还没有被铲除,这种情况(民族主义)就成了使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活动方面联合起来的极大障碍。我已经说过,没有这种联合,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格鲁吉亚在经济上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因此,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当前的任务就是: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恢复孟什维克民族主义政府出现以前原有的那种兄弟般的国际主义关系,从而造成一种使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得以联合起来并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得以恢复所必需的相互信任的健康气氛。”(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95—97页)

当然,从斯大林的谈话中还不能直接得出不久格鲁吉亚将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结论,但明白事理的读者们应该能产生这种念头。

格鲁吉亚是从黑海通往高加索的钥匙。作为德国的盟友,土耳其在塞夫勒和约之后沦为世界弃儿的角色,但却得到为了迅速占领高加索的俄国的支持。鉴于土耳其被削弱的地位,斯大林完全有理由认为,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没有能够帮助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现实力量。

很快,格鲁吉亚爆发起义,组织了革命委员会。1921年2月16日,斯大林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指出:“俄国的集团军司令员、师长和旅长们不允许谈论我们对格鲁吉亚的进军以及由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方展开的军事行动。”(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139页)

原因在于,1921年1月26日,在政治局就格鲁吉亚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准备与格鲁吉亚开战的指令,因为格鲁吉亚对俄国非常不友好,包括它支持车臣和达吉斯坦的反苏维埃起义。

2月6日,斯大林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中说,由于受格鲁吉亚局势的影响,巴库地区受到威胁。他还说:“格鲁吉亚终于变成全世界反革命在近东地区的总部。法国人在这里活动(见沙因曼的信),英国人在这里活动,安哥拉政府的代表卡津姆贝也



在这里活动。无数黄金运进山区,在我国的边防地带组建用来攻击我们边防哨所的劫匪,出现过哨所被铲除的情况……”(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年,第384页)

2月16日早上,第11集团军的部队转为进攻。2月25日,攻入梯弗利斯。

此前,苏维埃政权已在亚美尼亚建立。现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几乎与俄罗斯帝国的边界重叠了。

斯大林可以心满意足了:那些曾经把他逐出梯弗利斯、开除出党的人,现在自己要被驱逐出去了。

他的母亲和儿子生活在格鲁吉亚。这是他的故乡,他与这块土地有着神秘的联系。格鲁吉亚回到了统一国家的怀抱中。在这片土地上,他——柯巴,前梯弗利斯神学院的学生,达到了任何一个格鲁吉亚人都不曾达到的强势地位。可能,这引发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可怜的漂泊者,如同寓言中迷失的儿子回归故里了。

正是通过在格鲁吉亚和高加索的交往,斯大林对集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C. M. 基洛夫充满友情,因为基洛夫领导的第11集团军对这两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了巨大作用。

他与奥尔忠尼启则早已认识,但1920年至1921年间发生的事件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正如察里津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结盟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彼尔姆在他与捷尔任斯基结盟中所起的作用那样,高加索给了他新的盟友。

但在谈到他的故乡时,我们要强调,他始终处在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关于这一点有他的文稿作证。比如,在1921年12月2日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他在谈及支持阿富汗起义者时,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个直接影响印度起义运动的重要任务。

故乡虽是故乡,但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是如棋盘一般的世界,在这张棋盘上,他正在思考彼此敌对的力量的发展态势。

第二十一章

废墟中的国家

废墟中的国家、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党内的反对派、喀琅施塔得叛乱、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的失败

国内战争结束了，苏维埃俄国取得了胜利。取得胜利这一方的三位领袖大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两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如果说列宁在战前就已经是领袖了，那么其他两位获得这一地位就得归功于他们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我们看到，有人认为斯大林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党内官僚，他利用自己的总书记一职夺取了权利，事实并非如此。就算他在1920年年底像斯维尔德洛夫那样牺牲了，他的名字也会被载入共产党的圣徒名单中。

举个例子，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的结果是：“列宁，262票；托洛茨基，219票；季诺维也夫，255票；斯大林，258票；加米涅夫，252票；克列斯廷斯基，235票；捷尔任斯基，241票；拉柯夫斯基，171票；布哈林，258票；斯塔索娃，155票；穆拉诺夫，164票；谢列布里亚科夫，125票；斯图奇卡，128票；托姆斯基，226票；别洛博罗多夫，218票；斯米尔加，135票；加里宁，152票。”（卡普琴科 H.，《斯大林政治传记(1879年—1924年)》，第1卷，特维尔，2004年，第546页）。

斯大林与列宁的差距仅仅几票而已。这儿必须说明一下的是，反对托洛茨基的是支持斯大林的“军事反对派”。但“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们，看来也投了斯大林的赞成票。



战争给了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他的政治欲的坚实基础。

托洛茨基把这种经验定义为:“军事工作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挑选需要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部署,建立监督,挑出可疑者施压,再施压,直至给予惩罚。斯大林完全能够胜任所有这些机关性质的事务,而且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因个人的计谋复杂化。但工作中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对士兵和指挥员进行鼓励,激发他们性格中好的一面,强化他们对领导人的信任。在这方面,斯大林完全没有能力,他和群众根本没有联系。比如说,很难想象斯大林会出现在露天面对一个团的战士发表演讲,在这方面他缺少天赋。值得注意的是,他大概从未尝试过向士兵做哪怕是书面的报告,至少没有见过一篇这样的文章、命令或呼吁。他在前线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种影响是无个性的、官僚式的、警察式的。”(托洛茨基 JI.,《斯大林评传》,第 2 卷,1985 年,第 129、130 页)

在某种意义上,托洛茨基说的是对的。斯大林不是喜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的人物,他对“群众”的影响力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大体上,他直接向人民演讲总共只有两次:1941 年 7 月 3 日作的以《兄弟们和姐妹们》为题的著名演说和同年 11 月 7 日在阅兵式上对即将开赴前线的队伍的演讲。他演讲的效果是令人吃惊的。

与克拉辛交好、与列宁及其家人也很熟悉的 Г. А. 所罗门有个评论,我们就用他的这个评论作为对斯大林这一军事鉴定的回答:“如果在托洛茨基的周围没有斯大林,没有这么一个尽管不是才智非凡,但勇敢刚毅且大公无私的人,他早就逃跑了。是斯大林托起了他,事实上,整个保卫苏维埃俄国的工作是由他主持的。”(所罗门 Г. (依谢茨基),《在红色领袖之间》,莫斯科,1995 年,第 121 页)

所以要强调指出,列宁始终将斯大林放在与托洛茨基同等的位置上,这绝不是偶然的。

到 1920 年年底,俄罗斯已处于千疮百孔的状态。

工业生产规模只有 1913 年水平的 12%,生铁和钢的产量只有原来的 2.5%,距离崩溃仅一步之遥。

国家的经济管理体系一无所成:收归国有的企业不受监督,大家各行其是,靠出售生产出的一星半点的东西换取粮食和原料为生的黑市自发势力而生存。

1920 年,共生产出 1.5 亿金卢布价值的商品,而同期的农业产值是其 20 倍多(达到了战前水平的 64%),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商品产值是多么微乎其微。

客观地说,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了自己的基地——大型工业生产部门,国家依靠向半封建的农民经济的回归来维持。“战时共产主义”已经过时。余粮征集占了国家预算的 80%,它超过 1913 年税收的一倍,沉重得难以负担。

所以,在白军被平定之后,已没有失去土地威胁的农民们便开始了反对政府的战

争。占领几个村子的小范围起义不计其数，大规模的起义也已经席卷几个省份。

从 1918 年夏天开始，农村出现了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组织，农民对查抄和征用粮食的反抗也同时开始，此后发展到反对参军的动员。这种反抗遭到无情镇压。随着双方冲突的加剧，出现了如同中世纪惩罚“魔鬼”时带有宗教仪式特征的杀人和用刑场面。

由社会革命党人提出，并被布尔什维克采纳和实施的土地纲领，本身是建立在平均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可是这却损害了大规模的商品经济。

“土地的分配导致了农户向自然劳动回归，赋予了他们实用主义的特性。总数达 1500 万的农民中，完全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占了 1050 万。而且就算获得了土地（增加的土地微不足道，每户仅 0.5—2.2 俄亩），也不能形成商品经济，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农具、牲畜和种子。如果没有国家的救助，贫农无力来耕种得到的土地。数百万农民常年依赖国家赡养，被免除了交税、缴粮的义务，并以优惠条件获取了其他的救济。但国家没有任何多余的储备用于供养穷人，所以就鼓励他们去掠夺富人和富裕农民，让后者也变成贫农，这就让内战爆发具备了条件。但既然富裕农民的比重在俄国农村并不大（平均占 15%），国家自然应该从自己赡养的这些人身上得到回报，因为国家给了他们重返土地劳动的可能以及拥有与村社居民一样的地位。国家义务，首先是上缴粮食、劳役、提供运输、兵役以及许多其他的义务，就成了共产主义政府掠夺政策下所有农民的义务的总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为大多数农民进行反国家的斗争提供了客观条件。”（奥西波娃 T.，《国内战争中的农民战线——俄罗斯农民的命运》，莫斯科，1996 年，第 94、95 页）

当然，农民造反并不意味着农村会跟随白军走。大部分对共产主义专政的反抗，是在对立的情况下选择的一种消极形式。多数反抗并不想消灭，而只是想“修正”苏维埃政权，减轻负担和赋税。而这些要求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列宁号召人们对富农展开“歼灭性的和无情的”斗争，这从政治关系来看是对的。但从经济关系来讲，它在摧毁经济的根基。

左派社会革命党正是在农民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了根本分歧，并导致了所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左派社会革命党就其纲领的本质而言，最容易被生活在宗法传统中的农民阶级所接受，也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了众多的起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第 9 骑兵师的指挥官 A. C. 萨波日科夫就领导了在外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的大规模起义（所谓的“萨波日科夫起义”），他曾因在高尔察克战线立有战功被授予红旗勋章。

而“安东诺夫起义”的领导人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坦波夫省警察局前局长 A. C. 安东诺夫。

当然，对这些起过义和正在起义的人来说，经济动机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个具



有不小意义的是他们对建立自己政权的渴望，而这样的政权源于人民有关公正的概念和农民把国家视为异己组织的观念。萨波日科夫把自己的军队命名为“红色正义军”，就很可能说明这个问题。

1905年到1917年间农民村社瓜分和抢劫作为另一种文化中心的地主庄园的尝试，得到了强劲的发展。发生了一年前歼灭高尔察克军团的事。

于是，西伯利亚的起义农民建立起了根据村社民主行使权力、既不支持白军，也不支持红军的农民共和国。

后来斯大林也遇到了这种心理认知。1928年当斯大林视察西伯利亚时，一位老农直接向他表示：农民们如果不愿意，粮食就上交不了国家。据说，就是这件事情促使斯大林加速了农村集体化的进程。

无独有偶的是，斯托雷平在1910年去过西伯利亚后也讲过一句话：“农民的民主可以毁了我們。”

所以，1920年至1921年间，国内战争一结束，农民马上最大限度地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国家干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尽管这场国内战争可以跟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相比，即战争双方在技术和军费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是一样的。但实质上，国内战争却成了“战时共产主义”国家的坟墓。

整个1918年共爆发了245起农民起义。到1919年，整片整片的区域，甚至一些省份都被总数达几万的农民队伍所控制。1920年，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的部分地区、伏尔加河流域、西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这些行动的思想根源在1920年5月各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安东诺夫起义”纲领中反映了出来。主要条款如下：推翻共产党的政权，举行立宪会议代表的普选，和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各党派代表共同组建临时政府，将土地分给耕种它们的人，终止余粮征集制，废除按阶级和党派来划分社会阶层。

绝不能说坦波夫农民提出了什么独创的想法。代表乌克兰农民的马赫诺人分子曾提出过“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这表明，他们想保留十月革命的成果（首先是土地法），但不要布尔什维克政权。在西伯利亚也是这种情况。

在政权和人民的这种连续不断的战斗中，政权注定要耗尽力量、逐渐瓦解，最终遭到失败。

但此时苏维埃领导层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性。

通常都说，是农民起义，特别是由最忠诚的革命队伍、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发动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促使列宁去考虑转变政策方针、作出让步。但这种观点只对了一部分。

随着与二月革命继承者白军战争的结束，共产党内部开始出现了持有不同改革

理念的各种各样的派别。很多人都明白，国家正处于悬崖边上，谁也不想让它掉入深渊。

所以党内出现了一个“工人反对派”，这个“工人反对派”是由一些著名的党务工作人员领导的：施略普尼柯夫、柯伦泰、米亚斯尼科夫、卢托维诺夫和基谢廖夫。他们要求将工业管理权转交给工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专门的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其实质就是，党委不应该在工厂施加自己的影响，应该把管理工作转交给工人委员会，而这个工人委员会只隶属于其上一级的工会委员会。此外，“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中提到了劳动者可以从任何党派的党员中自由地选出自己在工会基层委员会的代表。

托洛茨基单方面引发了“关于工会的争论”。他建议将工会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扩大工人特权阶层在军事化工业领域的比重，并按照军队的模式来加强党的中央集权和强化生产纪律。

托洛茨基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方案。所有这些都证明，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危机已不可避免。

但那些提出要进行变革的人，还在坚持已经失去意义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强硬立场。

斯大林没有加入到这些反对派中。由于将“按照立场”选举出参加即将召开的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那么在地方的党代会上让持“正确路线”的人获得投票支持就变得至关重要了。1921年1月25日，斯大林写给在乌克兰的伏罗希洛夫的信中做出指示：“拿下顿巴斯，拿下各工业城市和军队”，并要求一个席位也不能给“不管是托洛茨基派还是工人反对派”。

不难理解，斯大林是站在列宁这一边的。

后来，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自己是不对的。

“同时，经过三年国内战争的工人群众越来越不能忍受军事命令的方式。列宁凭着他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感觉到紧急关头已经来临。而在此时，我出于纯经济的考虑，根据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则，竭力使工会进一步鼓足力量，而列宁则出于政治考虑，主张减轻军事压力。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对抗性冲突。党内爆发了一场争论，但争论的内容却不着边际。当应该讨论迫切需要解决的粮食、燃料和工业原料的问题时，却在争论应当以什么速度实行工会国家化。在应该讨论已迫在眉睫的经济崩溃问题时，却在就‘共产主义学校’进行狂热的争论。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省的起义对争论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列宁起草了非常谨慎的关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提纲草案，我立即表示赞同。对我来说，这些提纲不过是重申了我一年前所提出的建议。关于工会的争论顿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托洛茨基Л.，《我的生平》，莫斯科，2001年，第453页）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明白，事实上党内的斗争并非如此友善。其实，在辩论的过



程中,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是团结一致的,他们的方案是把工会和经济组织合并在一起。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Л. П. 谢列布里亚科夫、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 X. Г. 拉柯夫斯基的支持。

1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对派的不同意见,即“十人纲领”。10位签名人中有9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斯大林、Г. И. 彼得洛夫斯基、Я. Э. 鲁祖塔克、М. П. 托姆斯基、Ф. А. 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还有一位就是 C. A. 洛佐夫斯基。

1月19日,《真理报》刊登了斯大林写的与托洛茨基观点针锋相对的长篇文章《我们的意见分歧》。列宁的拥护者们不打算放弃自己在党内的阵地,也并不特别指望民众在革命变革中有多大的积极性。

列宁和他的拥护者们完全不占优势地位。此时,由托洛茨基的拥护者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正在着手第十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并从各方面施加影响,企图将托洛茨基推上权力的巅峰,不过没能成功。

喀琅施塔得叛乱开始了。

2月,彼得格勒关闭了数十家工厂,粮食定量配给不得不又一次被缩减。看不到出路的工人们向当局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在农村自由购买粮食,而不用担心因“投机倒把罪”被抓起来。当局拒绝了此项要求。作为回应,工人们开始游行,然后开始罢工(莫斯科也发生了类似情况)。2月24日,彼得格勒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下令全城戒严,并以涉嫌煽动工人暴动将所有没有被关起来的孟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抓了起来。

为了安抚民心,中央委员会撤销了个人到农村购粮的禁令,但已经迟了。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们已听到传闻,说在彼得格勒有示威工人遭到开枪射击(需要补充的是,1920年秋天喀琅施塔得刚到了一万名来自农民家庭的新兵)。水兵们向城里派了一个代表团打探消息,回来的人分别在“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号”两艘战列舰的全体船员集会上,讲述了他们打听来的工人提出的要求。要求的实质是这样的:“实施自由贸易,允许自由出行,撤换彼得格勒市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解除狙击部队,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重新选举苏维埃。”

水兵们通过了一个情况通报,但季诺维也夫却电告莫斯科,说战列舰的船员们“通过了由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提出的24小时最后通牒的决议”。

到此刻为止,喀琅施塔得事件还谈不上是暴动,但却表明了军队内部令人忧虑的局面。

2月28日,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阿尔乔姆。会议决定:起草一份用于公开刊登的官方声明、逮捕孟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增加对彼得格勒及其驻防军的粮食供应、拨

款一千万金卢布为工人采购生活必需品。

3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喀琅施塔得向水兵们作了讲话,但他并没有给予任何具体的答复,只有抽象的声明,这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当天晚上,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并于第二天在工程技术学校校舍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作了正式宣布。“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一等文书 C. M. 彼得里琴科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他自 1914 年起便在舰队服役。成立了由原上校 E. H. 索洛维亚诺夫领导的要塞防御指挥部和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成员是一些军事专家,其中包括战列舰指挥员、原海军少将 C. H. 德米特里耶夫和原将军 A. H. 科兹洛夫斯基。他们提出了一个很主动的战术:向彼得格勒和奥拉宁鲍姆方向进军。

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纲领包括:在对工人和农民开展自主的、初步的宣传后,立刻举行不记名投票改选苏维埃;赋予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党人言论和出版自由,并给予他们集会、成立工会和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所有在押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农运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不迟于 3 月 10 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的无党派代表会议;撤销政治部和共产主义战斗队;立即解除狙击部队;给予农民耕作自己土地的全部权利;对全体劳动者均等供粮,在有害健康条件下工作的劳动者除外。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向水兵们呼吁:“统治国家的共产党已经脱离了群众,而且已无力带领群众摆脱全面的崩溃。”

叛乱开始了。

为什么它会发生?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海军司令员、原海军少将 A. B. 内米茨就此问题提交了报告。

他认为,仅仅因为不能保障粮食供应是不足以引发起义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有关工会的争论及其形式激怒了水兵,在于司令部政治观点的分裂。

西方把这一事件看做是全民起义的开始。法国总理 A. 布里安接见了俄罗斯帝国大使 B. A. 马克拉科夫,承诺给予援助,一些银行往喀琅施塔得汇了巨款。

但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的起义者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对自己行为的正义性深信不疑(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存在类似的在军事上消极等待的特性)。

3月5日,托洛茨基、总司令加米涅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 П. П. 列别杰夫和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一行抵达彼得格勒。他们应该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平定暴乱。托洛茨基如是说:“中央委员会委托我来恢复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的政府职权和正常秩序,我将不惜做出任何牺牲完成这个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



政治局作出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决定,托洛茨基表示自己将对此承担责任。而斯大林则表示反对,他声称如果让叛乱者安静一段时间,过两三个星期他们自己就会主动投降。(多伊彻 И.,《被驱逐的先知(1929年—1940年)》,莫斯科,2006年,第440页)

这是一种可以说是原则性和战略性的区别。

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此次军事行动的直接指挥官。

但他们没能够在3月8日党的代表大会开幕前平定起义。

党的领导处境艰难。

列宁在发言中提到喀琅施塔得时,还是老一套:白匪将领,社会革命党人、国外的白匪分子的活动,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

然而并非所有的代表都赞同这个评价。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大胆地说道:“很少有人会满意昨天的报告。同志们想要听到的,是对发生在我们苏维埃劳动者俄罗斯的这些可怕的、会酿成恶果的事件的应对措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回避了喀琅施塔得的问题,回避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问题……”(引自: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第336页)

喀琅施塔得是最后一滴水。应该改变方针了,但政权掌握在政府和党的手中。几乎全是由农民组成的红军不可能长期保持对共产党的忠诚。

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众多批评和激进的建议,从实行全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到实施所有党员(指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在生产部门义务劳动三个月的规定。

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工作也受到严厉批评,于是,列宁及其拥护者们便利用这一点对这两个机构的干部进行更换,从而将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排挤出这两个机构。

代表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作出了四项决定:

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

关于党的统一;

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上面临的首要任务。

列宁有责任向党提出一个战略性方案。他提出来了:尽量满足农民的需求、给予农村自由贸易的自由。

这个方案意味着偏离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但暂时看不到其他出路。况且,从二月份开始,坦波夫省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已有一个月了,却仍未能平息农民的起义(事实上,起义的领导人是被邓尼金部队击溃后逃到这里的哥萨克军官们:马塔雷金少尉、A. B. 博古斯拉夫斯基上校、И. M. 托克马科夫中尉、科列斯尼科夫中尉和古巴列夫大尉)。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新经济政策(耐普)。当桀骜不驯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依然威胁着彼得格勒时,还有什么可争吵的呢!

相反,所有人都期待着变革。

没有解除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也许是更加困难和危险的方案。

导致实际分裂并引起社会新的战争的党内辩论结束了。但随着这场论战的结束,党也失去了最后一点民主。

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做出了选择:今后禁止党团和派系的存在。从现在起,对于继续从事派系斗争的党员,中央委员会可采用任何惩罚措施直至将其开除出党。这份议案是由列宁向大会提出的。

他和其他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是否明白,这个决议使党与它的过去一刀两断了,并给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提供了基础。

看上去,好像是明白的。不管怎么说,列宁甚至涉及了这个话题。他说,这些措施只是预防性的,将来未必会实施。

是的,恐怕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过去的那个布尔什维克政党,曾经是民主的、有活力的,能够借助内部的自由度迅速得到恢复并迅速去接替那些被逮捕、被流放的积极党员。而现在,它却开始害怕这些特性。

托洛茨基和其拥护者的积极活跃不仅激怒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激怒了列宁。

从今以后,党应该只有一个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

根据投票的结果,托洛茨基很有影响的支持者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三人都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今后控制不了书记处了,也失去了在组织局里占大多数的优势。

组织局的新一届成员中只剩下一位他的老战友——斯大林。同样的,他自己保住了政治局委员一职。

3月18日凌晨两点,在重火力扫射和第二次强攻(第一次强攻以失败告终)之后,喀琅施塔得被攻克。

由集团军指挥官卡赞斯基签署的一份指令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应该有俘虏出现。”

其实,有很多人被俘。革命法庭和特别三人小组审判了共10001人,其中2103人被判处枪决,6447人判以期限不等的监禁,1451人被释放。在北极还为这些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囚犯修建了一个“惩戒营”。

但胜利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已失去了特殊的意义,虽然这听起来十分奇怪。他输



掉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3月18日,图哈切夫斯基向加米涅夫报告了这次军事行动的胜利完成,并说他“在这里的巡回演出结束了”,请求允许他离开并重返西方面军。

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轻松幽默的表达让托洛茨基颇为惊讶。这对于前近卫军的少尉是一次军事散步,但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说却是日暮途穷的开始。

现在,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和基洛夫这几位斯大林的公开拥护者都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而在组织局里,莫洛托夫、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B. M. 米哈伊洛夫代替了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位子。

第二十二章

新经济政策——“第二个布列斯特”

新经济政策——“第二个布列斯特”、全俄电气化计划、坦波夫起义、儿子瓦西里出生

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国家发生了很多变化：出现了私人贸易，国家开始将经营权转让给私人业主，允许创办小型私营企业，对工作人员少于 21 人的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一年里有超过 1 万的企业成了私营的，而作为交换，它们的新业主必须在 2—5 年内将自己产品的 10%—15% 上缴给国家。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外国资本参股的企业。

从“战时共产主义”回到市场经济，是非常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1921 年 3 月，燃料工业失去了国家订单、转为经济核算制。顿巴斯煤田因为缺少支付工资的资金而解雇矿工，国家的粮食供应也中断了。结果，煤炭开采量和工业需求量之间的平衡得由市场来确定。一些矿场关闭了，许多矿工及他们的家人因此而饿死。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行业也有发生。许多工厂缺少周转资金，不得不半价抛售商品，彼此竞争而压低价格。1921 年 1 月 1 日时，1 俄尺（1 俄尺相当于 0.71 米——译注）印花布值 4 俄磅（1 俄磅等于 409.5 克——译注）黑麦面粉，而到 5 月 1 日只值 1.68 俄磅了。而到 1922 年 5 月，棉布的销售价低于成本价的 2.5 倍。1921 年 9 月，一项特别法令将企业与社会隔开。至于工资，流行的话是：“任何关于平均分配的想法都应该扔掉。”（卡拉-穆尔扎 C.，《从起始到伟大胜利的苏联文明》，第 370 页）



紧随这些经济新政之后，是军队的快速裁减遣散。从 1921 年初到 1923 年初，军人总人数从 530 万下降到了 61 万。

“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以“第二个布列斯特”而终结的。国家机器在开倒车，党被这些变革所震动。

在共产党员中间出现了一场退党、自杀、失去社会地位的真正恐慌。

想想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的小说《贼》的主人公——红军指战员、勋章获得者、后来却成了刑事犯的德米特里·韦克申。这部小说反映了现实生活：犯罪率急剧上升。

另外，为了评述那个时代，我们还要提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犯罪集团的卷土重来。一些破产农民、复员的红军战士、因缩编而被解雇的公职人员，还有以前的白军士兵和军官纷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随着一些白军军官的加入，犯罪集团里增加了一批善于制订行动计划、熟练操作武器、强悍顽固的骨干。在以前，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的。这些人制订出独特的行为准则，即所谓的“帮规”，并且给这个罪犯的“虚幻世界”引入了非常严格的纪律。最重要的“帮规”有：不许拥有任何财产，必须六亲不认，只能通过偷盗的方式获取生活所需，不许在军队服役，不许从政府处获取武器，不许参与任何政治组织和活动。

这像是某个对社会怀有敌意，且不想在任何方面依赖于它的封闭、半军事化秘密团体的规章。

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反抗，是建立在庞大的(700 万)无家可归者大军基础上的“白匪罪犯的喀琅施塔得”。

当局很快就对这一新的威胁做出了反应，这绝非偶然。1921 年 1 月 21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提高儿童生活水平委员会，并任命捷尔任斯基担任其主席。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必须摧毁这个虚幻世界和它存在的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起各种劳动教育公社，而国家的宣传则把问题提到了对全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高度。

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化，那么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党同样着手调整自己的管理体系、加强对基层组织的监督和展开“清洗”了。党的机关的作用不可能不加强。仅从 1920 年 4 月到 1921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专门管理干部的部门，即组织部和干部登记分配局就新任命了 4 万名干部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

1921 年，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的人员达 600 名，是 1919 年时的 120 倍。

书记处变成了不仅是党的干部，而且还是国家干部的制造场所。这样，谁控制了书记处，谁就成为幕后的实权人物。

3 月，斯大林差点死掉：他患了化脓性阑尾炎，手术进行得很艰难。如今人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医疗条件，但是就凭那时还没有抗生素这一点，就能认识到斯大林健康

状况的恢复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他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当时，他才 42 岁。这个年纪的人对死亡还没有准备，也不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的确，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国内战争时期，很多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

从各方面来看，1921 年 3 月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国内战争以获胜结束，新经济政策出台，而他自己活了下来，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得到巩固。

他不久前才想到的命运之神保佑了他，这一年，他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儿子瓦西里出生了。

新的生活极具象征意义地必然地又从格鲁吉亚开始了，这时术后康复中的斯大林离开在纳尔奇克的疗养院来到了格鲁吉亚。当然，我们所说的必然性不是指现实意义上的，而是带有神秘主义的，仿佛真是命运之神决定让斯大林重新踏上那条格鲁吉亚少年朱加施维里走过的路。

问题是，这位政治局委员对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那种纯粹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渴望毫无敬意。

在去完成构建伟大的共产主义强国的任务之前，他首先应该解决自我认知的问题。后来，在成为“伟大领袖”之后，他曾笑着说自己是“格鲁吉亚族的俄罗斯人”。

他儿子瓦西里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向自己的妹妹斯维特兰娜说过：“我们的爸爸曾经是个格鲁吉亚人。”

斯大林曾亲眼看到俄罗斯帝国按民族疆域被分解，也参加过建立统一的苏维埃国家，他对所有民族主义都深恶痛绝。

回到家乡后，他对这里发生的种种变化震惊不已。关于这一点，他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梯弗利斯党组织全体会议上说道：

“第一，毫无疑问，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各苏维埃国家极端仇视，因此无论从军事方面或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苏维埃格鲁吉亚和其他一切苏维埃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各苏维埃国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互相支援是这些国家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很明显，格鲁吉亚缺少食品，它需要俄罗斯的粮食，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第三，格鲁吉亚没有液体燃料，为了维持运输业和工业，显然需要阿塞拜疆的石油产品，没有这个也是不行的。

“第四，同样毫无疑问，格鲁吉亚产品出口总额不足，它需要俄罗斯用黄金来帮助它弥补商品预算的赤字。

“最后，不能不考虑到格鲁吉亚居民中民族成分的特殊情况，亚美尼亚人在格鲁吉亚居民中占很大的比例，而在格鲁吉亚的首府梯弗利斯，甚至约占全部居民的半数。毫无疑问，这就要求格鲁吉亚在任何管理形式下，特别是在苏维埃制度下，要同



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同亚美尼亚保持无条件的和平和兄弟合作。

“无需证明,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条件要求苏维埃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彼此间在经济方面共同行动,在经济活动方面联合一致。比如说,共同加强运输,在国外市场上一致行动,布置土壤改良工作(灌溉、排水)等等。至于一旦需要抵御外国侵略时,外高加索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和这些共和国同苏维埃俄罗斯之间必须互相支援和联系,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无可争辩的。我之所以又提到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是因为近两三年以来,有一些情况妨碍着这种联合,并且有使这种联合遭到破坏的危险。我说的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近年来在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内极为猖獗,妨碍着联盟事业。”(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94、95页)

但是他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取消格鲁吉亚的独立?完全不是。独立应该保留,但要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把经济运作统一起来。

需要向国家联盟的方向迈出第一步。

其实,斯大林有关民族自决权的立场早在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有阐述:“自决权不是给予资产阶级的,而是给予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也就是说“自决原则应当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72、373页)

他的格鲁吉亚之行是游击式的,也没有经过列宁同意。列宁因此发了电报,表示对斯大林健康状况的关心,而潜台词则是在责备他的这次格鲁吉亚之行。

斯大林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他已经病愈了。

这一年发生的事件里值得注意的还有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制订和镇压坦波夫起义。

对于前者斯大林是热烈支持的。3月(手术后),在给列宁的信中,他写道:“这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尝试,要给经济落后的俄国的苏维埃上层建筑奠定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现实而唯一可能的技术生产基础。”

他接着解释了为什么是“唯一的”:“您还记得去年托洛茨基提出的在战前工业的废墟上依靠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农民工(劳动军)使俄国‘经济复兴’的‘计划’(他的提纲)吧。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真是一个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使命的易卜生剧作中的主人公……”(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0页)

把托洛茨基的建议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加以否定,斯大林是清楚地知道列宁对其建议的态度的,也反映出了政治局里进行的有关未来经济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值得强调的是,列宁的计划与革命前的纲领是绝对一脉相承的: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打算在第聂伯河和沃尔霍夫河上建立水电站；同样，B. И. 韦尔纳茨基关于核能的工程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我们要提醒一下，韦尔纳茨基的“铀矿勘探队”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组织起来了。）

所以，全俄电气化计划一方面继承了国家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产物。

尽管全俄电气化计划在 12 月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得到认可，但被批准却是在一年后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1921 年，为了对整个经济领域作出规划，专门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第一年，首先进行的是国家机关的建设，这个建设在苏联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电气化的讨论中同样提到了原子弹，这远非偶然。

在论及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哲学原理时，我们举出 20 世纪 20 年代在俄罗斯工作过的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乔治·凯恩斯的见解：“列宁主义是宗教和生意这两种事物的奇怪结合，而对这两种事物，欧洲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把它们放在自己内心不同的两个角落的。”（引自：卡拉-穆尔扎 C.，《从起始到伟大胜利的苏联文明》，莫斯科，2004 年，第 271 页）

1921 年 3 月 21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的法令。这样一来，赋税总量下降了一半，从原先的 4.23 亿普特粮食下降到了 2.4 亿普特。还计划通过与农民进行贸易另获取 1.6 亿普特粮食作为国家储备。

各级政府机关急于安抚农村，但暴动不可能一下子就停止。要想使之平息，必须使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为发展的思想来取代报复的思想。

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了坦波夫起义的平定，他采取了真正的作战行动。

坦波夫叛乱军有 3.75 万步兵、近 1 万骑兵、9 个炮兵旅、5 个装甲汽车队、4 辆装甲车、6 辆装甲抢修车和 2 个航空队。（《苏联时期的国内战争》，2 卷本，莫斯科，1986 年，第 2 卷，第 324 页）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至 1921 年 4 月全国境内共有 165 支较大的农民部队在打仗。大部分农民部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组建的当地的劳动农民联盟在领导，而社会革命党人所指望的就是推翻苏维埃政权。

他们领导了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库班、北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中部地区的起义。在 140 支队伍里大约有超过 11.8 万名社会革命党人的拥护者。

“1921 年 2 月 8 日，坦波夫省取消了余粮征集制。但农民没能立刻得到这一消息。起义军封锁了苏维埃消息传达到农村的所有途径。与此同时，省政府开始实施更严酷的镇压手段。在 1920 年 9 月和 1921 年 3 月，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A. C. 拉夫罗夫和省军队司令员 A. B. 帕夫洛夫下令就地枪毙任何拒绝放下武器的人。与部队对抗的村庄被立刻烧毁。在再次爆发起义的地方，所有 17 至 50 岁的男性都被抓并关



进集中营。惩罚措施被扩大到暴动者的家人和藏匿他们的人。对村庄强行征收巨款,不缴纳者将被没收土地和全部财产。因未执行命令被烧毁的村庄有维尔霍则尼耶、谢列迪诺夫卡、大斯巴斯科耶、科布捷沃和依沃谢礼捷沃。超过 250 名农民被枪决。

“类似的这些做法收到了与预想完全相反的效果:村庄没被吓怕。在坦波夫省里和毗连的萨拉托夫省的巴拉绍夫县与沃罗涅日省的新霍皮奥尔斯克县,起义者们组建了 300 个劳动农民联盟委员会替代苏维埃。这是农民们自己的无党派政权机构,为游击军提供了物质援助,调整了农村生活在军事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政策……” (奥西波娃 T.，《国内战争中的农民战线——俄罗斯农民的命运》，莫斯科,1996 年,第 147、148 页)

为了镇压起义还使用了毒气,使用了如集体枪毙人质、焚烧农民房屋等恐吓手段。

仅在帕列夫斯卡亚乡一地,6 月至 7 月间就有 3000 农民被杀。在有 8000 村民的尼科利斯基村,在俄日战争中仅 1 人阵亡,在和平时期有 50 人死亡,而 1920 年至 1921 年间却有 500 名农民死去。

尽管起义军对付正规军是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的,但坦波夫省和其他很多省的对抗却一直持续到 1921 年末,此后势头渐渐衰退。

但总的来说,农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农村回到了自己传统的村社生活中,回到了那种远离全俄电气化计划、计划经济和世界革命的生活。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革命之所以为革命,是因为它对发展中的所有矛盾只给你提供了一种选择:或是生存,或是灭亡。”

政府与按照小商品生产法则生活的多数民众缔结了和约,更确切地说,是休战。

为了对历史的分界线做个比较,我们要提起坦波夫起义中一位受害者,也就是围剿行动中被打死的神甫彼得·科斯莫杰米扬斯基,而他的外孙女卓娅和外孙子亚历山大后来都成了苏联英雄,他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为国捐躯。

第二十三章

俄国流亡者对苏维埃政权未来的预测

俄国流亡者对苏维埃政权未来的预测、饥荒、没收教会财产、“伊里奇的看门狗”、当选党的总书记、列宁第一次中风

现在不妨想象一下越过俄罗斯的西部国境，去巴黎的俄罗斯驻法大使馆探访一下，在那里当大使的是由临时政府派来的 B. A. 马克拉科夫。他代表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不过他本人确实不失为一位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他与俄罗斯共和国驻美国大使 B. A. 巴赫梅季耶夫多年的书信是反映国内战争中战败一方观点的极好的文献资料。

比如，喀琅施塔得兵变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马克拉科夫写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的信中，就对时局做了评说，而主要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前景作了展望。

我现在认为，并且早在战争开始之时就已经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国家政权得到巩固，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即国家主义得到强化。它因战争期间的必要性而开始，但不可能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这种国家主义在战时多么让人厌烦，也不管对它的滥用招致了多少罪恶，它仍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了它就不可能进行战争。德国的势力，至少是临时性地参与其中的。我很清楚，当人类



还面临着同样尚未解决的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人们共同努力，需要一些国家团结一致，特别是国家内部一些阶层的团结一致时，国家主义是不可能战后就结束的。在这场不啻为共同灾难的战争中，不可能让一部分人受苦，而另外一部分人发财；不可能让残疾人变成乞丐，被战争摧毁的地区要靠受害者自己去重建。这些是不可能被允许的，特别是当有些人在这场破坏本身和破坏的重建中继续积累私有资本的行为。很显然，战争最后的结果靠的是不分阶级和地位的整个民族的共同努力来决定的；但这首先要要求国家政权的高度强化，能够把所有不愿沿着这条轨道行进的人的脑袋砍掉。而且，国家政权在强化的同时，应该伴随着该政权的民主化。政权不仅应该是有力的，在制订自己的任务上也应该是民主的，从民主制度已习惯了某些常规和要弄清某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的那一刻起。战争时期，大家亲眼看见，国家缺少了它们变得多么无力，它理应在人员构成上也体现出民主。总之，这些就是人类在战后的基础建设中首先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政府在其目的、组成上是民主的，但在权力的规模和使用方式上却是专制的。

这些基本起点构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是符合这一点的。而让它无法完成甚至遭到失败的是其改革的纲领，是实现能够解决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那种团结一致的方法。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过早，它还没有从老一套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桎梏中走出来，认为斗争就是要消灭；它不合理地用其他问题代替了民族团结问题，它将民主放在资产阶级分子的位置上，又要将资产阶级分子转化成劳动无产阶级，而失败之处正在于此。但如果它用这种方式能让一系列的人、思想和方法达成妥协，那么就不会损害未来继续走这条专制的民主政治道路的客观必然性。但在我们推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尝试中，我们用什么思想体系去与它对抗呢？一方面，我们要用自由主义理念与之抗衡，不用管是谁来实现的，是米留可夫或是克伦斯基。这种理念就是担心国家的强权，要为人权和公民权，为自由和人身权利不可侵犯等等与这种强权作斗争。对这些理念的尝试完全应该是在正常的国家生活中，但我们竟愚蠢和罪过地要通过战争来尝试，这就导致了毁灭。而现在，可以尝试用这些理念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要么掀起农民起义，要么从事恐怖活动，都可以找到拥护者。人民渴望自由，对于俄罗斯来说自由已成为某种不可实现的理想。但目前所给的自由是如此不符合当今的客观需要，以至于可能引起暴动，而无法建立国家生活秩序。在这些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发生碰撞中，历史的真理都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而不是这些思想一边，所以布尔什维主义能够获胜。我们本能地懂得，自由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最终将导致政权的瓦解，瓦解发生的时刻就在斗争需要加强，在我们尝试通过其他途径，通过用白色专制对抗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之时。这个方针使得军事

独裁一时盛行,在这一点上高尔察克比阿夫克先季耶夫有优势,或者说弗兰格尔比巴黎立宪会议更有优势。但连这些潮流也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他们虽然建立起了国家专制的雏形,即有着强有力政府的俄罗斯,但在自己的机构和思想上却没有实现第二个要求——民主主义:这些专制统治无论在机构还是在目的上都不是民主的,尽管具有民主的假象;而当他们感觉有必要加入民主主义体系时,哪怕是在机构方面,他们就诉诸所谓的社会团体,而帮助他们的社会团体正是旨在捍卫人权和公民权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载体,并对国家政权的强化怀有敌意,但正是这种强化使他们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处于弱势。白色专制与政治自由的结合只是将两者的弱点结合起来,无法指明出路。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们内在的软弱性,有了这种软弱性就不可能不被布尔什维主义战胜。这就是您的内在的哲学思想,而现在的出路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出路还是我在给您的每一封信里重复强调的那个出路。能拯救布尔什维主义的只能是布尔什维主义本身,需要那些人在保持现阶段的,即民主专政政权的客观任务不受侵犯的同时,能够给它注入完全不同的内容,即民主的社会政治。这种政治眼下当然纯属资产阶级的政治。布尔什维主义内部一定会产生斗争,并将以正确的理念战胜不正确的愚蠢的盲动而结束。但这场斗争应该由最终理解这个任务的布尔什维克自己开展。布尔什维克从那时起就能够实现我们所不能实现的,也就是能够摆脱自由派教条主义的偏见,学会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当他们真诚和全身心地理解了必须实行强制性的阶级团结来重建被毁坏的国家时,最终会将政权用于争取俄罗斯的幸福。当这一点变得清楚了,并且布尔什维克中出现能够从事这项事业的一批人时,他们就能够推翻这个愚蠢的布尔什维克专制。这个专制就像我不会拉大提琴一样,不会运用权力。但如果认为完成这项事业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什么移民,如米留可夫、克伦斯基、阿夫克先季耶夫之类的民主自由主义派的代表或是马尔科夫、弗兰格尔等反动分子,又或是什么极端势力的联盟,那就是在指望奇迹,指望违背所有的自然规律。像我和您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是不相信奇迹的。(《绝对私密和可信:Б.巴赫梅季耶夫与B.马克拉科夫1919年至1951年间的书信集》,3卷本,莫斯科,2003年,第1卷,第365—367页)

这封信里对托洛茨基和许多来自“列宁近卫军”中人物的命运作出了惊人准确的预测。

一旦布尔什维主义走上改善遭到了破坏的经济生活这条路,那么那些为了俄罗斯或者是为了它的无产阶级阶层、希望按照共产主义原理建立生活的人,与



那些有意识地牺牲了所有这些，只是为了给第三国际和世界革命争光的人之间就会爆发纷争。俄罗斯内部将出现一条分水岭。一边是养尊处优的共产党员，坐国际专列、给妻子穿金戴银；而另一边则是不追求权力，不争辩管理形式，只讲求对他们而言显而易见的东西：政府剥夺了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又不提供必需的东西，而这并非因为政府仅致力于合作社或不让资本流通。

客观必然性将使第二类人获得胜利。那些出于共产国际利益而阻碍改善经济生活的人将通过恐怖行动，或者交付法庭审判等被清理或消除；也有可能，他们会自己离开，以免首当其冲地罹难。（《绝对私密和可信：B. 巴赫梅季耶夫与B. 马克拉科夫 1919 年至 1951 年间的书信集》，第 1 卷，第 347 页）

事情正是这样进展的：一些人遭到恐怖行动，另一些人送上法庭，还有一些人则流亡国外。马克拉科夫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很清楚，历史的发展终将把人分成明天的和昨天的。

苏联上层精英内部的对抗不仅局限在人事、经济和国家建设这些问题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激进的共产党员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的斗争。此时的教会有 14.5 万神职人员和 4 万座教堂。这个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后马上就开始了，多数情况源于一种冷漠，农民对神甫怀有一种敌视的态度，因为农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被推翻了的旧制度的保护者形象。早在 1919 年春天，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列宁和加里宁就签署了“第 18666/2 号指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甫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改成仓库，并“毫不留情地枪决”神甫。

但这份指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共产党人还有另外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国内战争结束后，发生了 1921 年的大饥荒。因干旱导致的大饥荒席卷了半数以上的粮食生产省区，波及居民达 3350 万人，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从哪儿去获取额外的资金？灾害的规模是极大的。7 月 21 日，政府同意了一些社会活动家关于成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提议（马克西姆·高尔基、薇拉·菲格纳、伯爵夫人索菲娅·帕宁娜、经济学家 C. H. 普罗科波维奇和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库斯科娃，还有许多著名的医生、作家、农学家）。按列宁的指示，以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为首的 12 位苏联领导人也进入了该委员会。

美国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响应了高尔基的请求。由他创建的战后欧洲粮食和药品的保障组织（美国救济署）着手在俄罗斯展开工作。

苏联政府也为此拨出 1130 万美元，资金来源于出售黄金的收入。

美国救济署在俄罗斯共花了 6160 万美元（折合 1.232 亿金卢布）。

在与饥荒作斗争的同时，莫斯科在德国下了金额为 1000 万金卢布的购买步枪和

机枪的订单,并且,令人惊讶的是,还将几百万吨粮食出售到国外。(派普斯 P.,《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莫斯科,1997年,第495页)

由于缺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政府将此解释为工业和农业设备的所需,这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

渴望提供帮助的吉洪大牧首提出给挨饿的人们捐出教堂器具中“非神圣的”物品,而“圣物”仍留在教堂。列宁对教会的这一提议未作回应,但不久后,按托洛茨基的建议,展开了一场诋毁教会并没收教会所有贵重物品的运动。2月26日,颁布了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的法令,指示各地方苏维埃没收教会的全部金、银、宝石器物,并上交以帮助挨饿的人。以无神论者协会主席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专门委员会负责领导这场运动。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政权向教会发出了挑战,以求彻底镇压教会。相应的,吉洪大牧首声称,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若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而神职人员则将失去教职。

吉洪因反抗遭到软禁,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

这样一来,当局又开辟了一条国内战线。许多信徒试图阻拦这些没收行为,时有流血事件发生。

弗拉基米尔州的舒亚市便发生了这样的对抗事件。该城的信徒保卫着自己的教堂,不让政府派来的人闯入。3天之后,3月15日,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他们向信徒开了火,有四、五人被打死。

3月16日,政治局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缺席(我们要强调这一点)的情况下投票决定,停止进一步的没收工作,并向地方党组织分发了暂停这项行动的指示。

但列宁不是这样考虑的。3月19日,他给政治局委员们发去密函,其中写道:

正是现在,也只有现在,正当饥荒地区在人吃人、路上横着数以百千计的饿殍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最无情的强力去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不能停止对任何对抗的镇压。

正是现在,也只有现在,最大多数农民群众将是拥护我们的,或者至少不可能去积极支持那一小撮黑帮神职人员和反动的城市市民,这些人是能够并且希望以暴力来对抗苏维埃法令的。

无论如何,我们务必以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保障自己获得几亿金卢布的储备金(应该记住,某些修道院和寺院拥有巨大的财富)。没有这笔储备金,从整体上来讲,就没有任何一项国家工作,任何一项经济建设;从局部讲,特别是在热那亚坚持我们的立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这几亿金卢布(有可能是几十亿)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只



有现在才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其他情况都不会给我们广大农民群众现在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或是使群众同情我们,或者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在这场没收珍宝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完全属于我们。

……因此我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正是现在应该最坚决、最无情地向黑帮神职人员开战,要对他们的反抗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让他们几十年间都忘不了。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我是这样考虑的: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的官方公告,只应当由加里宁同志来发布。而托洛茨基同志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应该在报刊上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向公众发表言论……

我们据此能够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数越多越好……(《政治局和教会(1922年—1925年)》莫斯科、新西伯利亚,1997年,第140—144页)

收到列宁这封信后,政治局的行动更加坚决了。3月23日,托洛茨基提出的对没收行动提供宣传保障的建议得到批准。为了掩护托洛茨基,表面上是由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加里宁来负责。

1922年4月25日,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据列宁的指示,最高法庭巡回庭判处帕维尔·斯韦托扎罗夫、伊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两名神职人员和一名信徒彼得·亚济科夫枪决。不过判决没有执行,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了许多赦免请求。于是,加里宁推迟了死刑的执行,向政治局请求撤销判决。5月2日,斯大林给政治局有关委员发去便函:

致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并抄送政治局各位委员征求意见。

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革命法庭巡回庭判处两个牧师枪毙;加里宁同志建议撤销革命法庭的判决。

斯大林同志、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正好相反,建议不撤销革命法庭的判决。

中央委员会书记И.斯大林(《政治局和教会(1922年—1925年)莫斯科》,新西伯利亚,1997年,第197页)

同一天,有了表决结果: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莫洛托夫赞同判决,李可夫、托

姆斯基、加米涅夫赞同撤销判决。

正如我们所见，斯大林的一票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

5月10日，三名犯人被枪毙。

多年之后的1943年，当对德战争已经进入白炽化的时候，斯大林求助于教会，并被迫与教会结为同盟。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没什么奇怪的：这时候整整一代苏联人已经成长起来，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教会已不是毫不妥协的敌人。不过，1922年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

（顺便提一句，在反教会运动中受难的不仅有东正教的，还有天主教神甫。以从事反革命活动和抵抗没收贵重物品的罪名，波兰大主教扬·采普里亚克被判处10年监禁，而彼得堡的圣叶卡捷林娜天主教堂的神父康斯坦丁·布特克维奇被枪决。）

反教会运动中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教会根本没有什么“上十亿”的资产。美国救济署确信，没有必要去筹措额外资金，因为“美国救济署在所有通往俄罗斯的港口和道路上配置了大量的粮食，粮食多到超过了苏联的运输能力”。（派普斯P.，《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莫斯科，1997年，第423页）

1921年发生的这些悲剧性事件（迫害教会、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逮捕和流放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使“战时共产党员”发生急剧转变，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应，最终导致了执政高层的深度分裂。

斯大林内心也经历了这种分裂。要知道，实在难以想象的是，一个由信教的母亲抚养长大，在各种困难时刻都得到神职人员帮助的人，心里会不留下任何有关教会的烙印。

1921年，在斯大林的生活中，还有着一系列委托和任命。

按列宁的指令，他开始从国家计划委员会收到所有经济方面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开采金矿和巴库石油工业”的材料。

他被委托负责领导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这使他控制了“第二强力资源”——报刊，明显提高了他在政治局的地位。

他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鼓动宣传通报》的编审之一。

他还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再次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

这一年要结束了，这一年的主要总结是：斯大林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从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到和平建设的转折期，他的拥护者（“战友们”）在几个重要岗位上取代了托洛茨基的拥护者。



1922年3月,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仍然受到不少批评。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远非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能接受新经济政策;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的严重饥荒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党的反对分子尚未被从政治舞台上清除。

1921年8月,被“工人反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的顽固不化激恼的列宁建议将其开除出党,但中央委员会没有支持这个意见。不过在1922年2月,以要求言论自由载入史册的米阿斯尼科夫终于被开除出党了。

总体上来说,在提到中央委员会从事平息反对立场的所作所为时,必须承认,中央委员会书记B. M. 莫洛托夫领导的党机关在这方面未能取得多大的成绩。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派使列宁极为生气,他在盛怒之下甚至提出要枪毙持不同政见者。针对这个言论,还是那个施略普尼柯夫在发言时转身面对主席团,冲着列宁说:“就是这些机枪手!”他断言,新经济政策的执行靠的是工人。这个争吵事件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可以证明党内的统一没有了。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组建党的机器。

克列斯廷斯基不合适,莫洛托夫则显得不够果断。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的这一次正常升迁还不能看作是决定性的,这是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对托洛茨基在党的十大之前企图占据书记处和组织局要职的一种回应。

不管后来托洛茨基在回忆录里怎么肯定地说,列宁对斯大林持批评的态度,而与他托洛茨基非常亲密,事实上却是,从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党的机构反复折腾,一直延续到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却被推上了一个新的职位。

斯大林强有力地开始了工作。他从上至下建起了党的权力机关,采取了不断监督和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决定的原则。短短几个月后,他就使机关听命了。

此外,从1921年年底起,政治环境增添了新的因素:列宁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搬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并开始在那里长期居住。3月份,他感觉更糟糕了,头痛加剧。不用说,这个因素在促使列宁做出决定。

他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现有的矛盾中,首先是要巩固自己的领袖和统帅地位,同时不让事态发展到决裂的地步。

他在选择时,必须考虑到以下情况:“毫无疑问,多数情况下,列宁在处理日常工作中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者加米涅夫往往要比依靠我更合适一些。列宁一贯注意节省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他力求消耗最少的精力来消除内部的摩擦。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以及自己执行决定的手段。对此列宁相当了解并给予尊重。也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清楚我不适合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任务时,他就去找别人。”(托洛茨基Л.,《我的生平》,莫斯科,2001年,第464页)

说得相当明白了。

所以列宁不可能不明白,托洛茨基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个危险得多的竞争者,而斯大林并不觊觎统帅的角色。

列宁的一位亲属(M. 乌里扬诺娃)还有一种观点:

“这件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事情极具代表性。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称伊里奇‘流氓’。弗·伊(列宁名字和父称的缩写,指列宁——译注)脸色一下变得煞白,但还是克制住了,‘某人的神经似乎有点不大正常’,似乎他是这样回应托洛茨基的粗话的,这些话是将此事转告给我的同志说的。即使没有这件事,他对托洛茨基也没什么好感——这个人身上有太多妨碍与之共事的毛病。但他是一个要员,是有能力的人。我要重复的是,为此,弗·伊以事业为重,为了这份事业尽力维护他,尽力为今后可以与之共事创造可能。至于为此他要付出多少代价,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要在托洛茨基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之间,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保持平衡是极为困难的。他们两个都是极度虚荣且偏执的人。

“他们把个人的机会看得比事业还重。他们的这种关系早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就形成了,从保存下来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从前线发给弗·伊的电报中就能看出来。

“弗·伊的威望遏制住了他们,不让这种敌意上升到后来弗·伊去世后达到的那种程度。我想,由于一系列的个人原因,弗·伊与季诺维也夫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但他再一次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克制了自己。”(《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7页)

这里还有一个陈述。这个陈述来自 A. И. 米高扬,事件发生在 1920 年 9 月,当时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他被调去任下诺夫哥罗德州党委主席。动身前,米高扬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找克列斯廷斯基寻求指导,但克列斯廷斯基的官僚作风让他非常失望。除了官僚作风,此人甚至无法告诉新被任命者下诺夫哥罗德的有关情况。到达目的地后,米高扬大吃一惊,当地的党组织竟拒绝接受中央委员会的使者。

从这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克列斯廷斯基领导的书记处的工作作风。

而且,这段故事在一年后,也就是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夕才有了续篇。当时,正是这个米高扬来到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从斯大林那里接受了一桩秘密使命。

“在中央委员会时,有人告诉我说斯大林想见我,说我该去克里姆林宫他的寓所找他。他就住在现在是代表大会大会堂的那栋楼里。斯大林占用二楼的两间房。

“他亲切地接见了。他说是受列宁的委托请我来谈话的。我们的话题跟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有关。斯大林说,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条件与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有着根本的差别。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分歧,没有公开的小集



团或者不同的政治纲领。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目前他们表现得很安静。不过托洛茨基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离代表大会还有两个月时间。他可能会耍出什么政治花招来，尽管根据一切情况判断，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性不大。可以认为，他来参加会议，不会提出不同意见、不会提出纲领，而是会显示完全一致。

“即使没有纲领和异议，这些代表也不会忘记过去原则性的分歧，只会从他们个人的自尊角度考虑把票投给哪一位候选人进入到中央机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有很多原先的托洛茨基分子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么将对中央委员会未来的工作造成威胁。以后，托洛茨基就可以用各种方法为难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了。斯大林说：‘所以我们很关心哪些代表将来参加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他们中是否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最担心西伯利亚。那里还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拥有一定的信任度和影响力，所以他们中要是有很多人出现在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里就危险了。’他总结说：‘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委托我找您谈谈的原因。如果您赞同这种看待党的处境的观点，那么请您去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米高扬注）找一下拉舍维奇，以列宁的名义转告他我在这里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1999 年，第 198、199 页）

在这段不复杂的叙述里其实讲出了许多东西，但最主要的是，列宁是和斯大林结盟来反对托洛茨基的。

因此，当托洛茨基说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是出于季诺维也夫的加压，列宁本人并不愿意时，他没有明白，其实列宁玩了一个很巧妙的手腕。领袖并不准备彻底地清除托洛茨基。

周围的人很快就知道了斯大林是怎么抓工作的。让我们读一下斯大林革命前工作中的熟人 A. M. 纳扎列强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一封信（1923 年 8 月）中的内容：“柯巴把我彻底征服了。我正在经历着一段重要却枯燥的磨炼。目前我正被培养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办事员，使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决议得以执行的检查员。我们的关系似乎并不坏。他很狡猾。他像核桃一样坚硬，很难一口咬开。但我现在对他的看法和在梯弗利斯时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了。尽管他具有，如果能这么表达的话——理智的野蛮性情，他仍是个温和的人，有良心并善于发现人们的优点。伊里奇有了他，无疑如同有了最可靠的看门狗，毫无畏惧地看守着俄共中央这扇大门。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大大改观。以前我们在这儿遇到的事别提有多糟了。而以前我们在地方上是怎么看这些中央机关的？现在一切都变了样。秋天你过来就能看到了。”（引自：卡普琴科 H.，《斯大林政治传记//1879 年—1924 年》，第 1 卷，第 601、602 页）

后来的事态发展极其迅速。5 月 25 日，列宁第一次中风发作（当时称为脑溢血），出现言语功能障碍，身体右侧轻微瘫痪。

托洛茨基是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才得知这个消息的,这说明局势是由其他人在控制着。

“伊里奇的看门狗”没有辜负信任。这一点体现在一个很难处理且罪恶的(从基督教传统的角度来看)局面中,即列宁请求斯大林帮助他自杀。

1922年5月30日,就在第一次中风之后,列宁与斯大林在哥尔克村有过一次交谈。关于这次谈话,列宁的妹妹 M. И. 乌里扬诺娃写到了回忆录中。

关于这次谈话还有一段前因。

列宁已经预见到自己会死于中风,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在55岁上死于这种疾病的。所以还在1920年冬天,在感到有了剧烈头痛的征兆后,有一回他便对斯大林提出请求:如果有一天他彻底瘫痪,为了不至于凄惨地苦熬时日,就让斯大林给他一些能够让人迅速和无痛苦死亡的氰化钾。斯大林也应诺了。

5月30日,列宁要求斯大林来哥尔克村。

他们的交谈很简短,没有旁人,仅五分钟。列宁提醒了斯大林对他的承诺。

很难想象他们是用什么言辞进行交谈的。列宁可能会回忆起1917年斯大林给他剃了胡子,送他到谢斯特罗列茨克附近拉兹利夫车站的情景。很可能,列宁是以轻松幽默的口气说出了这件交办的事。但他还是把斯大林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M. И. 乌里扬诺娃是这么转述这件事的:

在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弗·伊就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

弗·伊当时认定,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便要求用最快的时间把斯大林叫到他这里来。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他。斯大林在弗·伊那里确实谈了不到5分钟。当他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请他为其提供毒药,因为,他说履行以前承诺的时候到了。斯大林答应了。斯大林同弗·伊告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在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身边。他告诉弗·伊,他与医生商谈之后,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完成他请求的时候还没有到。弗·伊明显地愉快起来并表示同意,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他。此后他们便分手了,直到弗·伊渐渐好转才又见了面,虽然那时弗·伊并未被允许与同志们会面。

这段时间,斯大林到他这里来得比其他人都频繁。他总是第一个到弗·伊这儿来,伊里奇友好地接待他,说了笑话,还笑了起来,并要求我招待斯大林,我拿来了葡萄酒和其他吃的。这次和后面几次斯大林来时,他们都谈到托洛茨基,当着我的面谈的,看得出来,此时伊里奇是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的。例如商量了要请托洛茨基来伊里奇这里的问题,这里有点耍手腕的意味。同样,向托



洛茨基提议,让他成为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职一事也带有这种意味。这段时间到弗·伊这里来的还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但季诺维也夫一次也没来(这里M. И. 乌里扬诺娃记错了,季诺维也夫曾两次到哥尔克村来探望列宁——卡普琴科注),而且,据我所知,弗·伊一次也没有说过希望见他。

与列宁在哥尔克村会面之后,斯大林应《真理报》编辑部的请求,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探望列宁和讲述自己感受的札记。这篇札记的目的,我认为有两个:一方面,对广大党员和全国民众为领袖健康状况忧虑进行安慰;另一方面,斯大林用自己的文章似乎强调他与列宁特别亲近的关系。(引自:卡普琴科 H.,《斯大林政治传记(1879年—1924年)》,第1卷,第620、621页)

如果抛开情感因素,列宁只可能向非常亲密和忠诚的人提出需要毒药的请求。

不稳定的时期来了。这种不稳定不是水兵的暴动、不是协约国的阴谋,也不是反对派的攻击。前途完全是未知的。如果领袖真的很快永远走了,那么谁准备好了去接替他的职位?

毫无疑问是托洛茨基。他虽失去了在党的机关中的支持力,但仍保留了一个胜利者、一个共和国军事领导人的感召力。

政治局里还有谁有此意呢? 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

这里有这么个问题。三驾马车中没有任何单独的一个人在1922年拥有去追逐领袖毫无争议的继承人这一角色的分量。

如果说托洛茨基的特点在于其明显的独立性,而且实际上他已经是幕后的领袖了(他被称为“军事统帅”),那么其他人只不过是他的战友。而他们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明白,需要团结一致来对付强大的竞争者。

这就是托洛茨基在争夺列宁继承人斗争中落败的原因。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学家在归纳了这些进行人身攻击的阴谋之后,都是持这一观点的。

我们在赞同这一观点的同时,还要补充一些情况。

如果国内战争在继续,如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持续,那么尽管党机关中有反对者,托洛茨基仍有成为苏维埃俄罗斯领袖的可能。斗争的客观规律本身就会将他推上权力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犹太人的民族属性未必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正是他的民族属性使他未能成为这个绝大多数居民是俄罗斯族的国家的领导人。但这是不现实的观点。对于共产主义的精英来说,民族属性没什么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这一点,Л. М. 卡冈诺维奇就曾带点夸张地坚决回复道:“我不是犹太的社会活动家,我是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也可以重复此话,而且,人们都会认为他是正确的。

但由于国内战争结束了,世界革命也没有爆发,且经济变革时代到来了,就使得

托洛茨基最终还是没能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随着新经济政策一天天地推行,红军战士一个个地复员,国家正在发生一些不经意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很快就会成为更能适应新时代的人们的主要任务。

列宁一直到1922年10月都未来过自己的办公室,在这4个月里斯大林经常去探望他,承担起保障照料和治疗的职责,虽然病人并未受到与人接触和获取信息的限制。斯大林甚至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的文章(1922年9月24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列宁的温情和对其康复的渴望。

第二十四章

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成立苏联的 争论

列宁与斯大林关于成立苏联的争
论、奥尔忠尼启则与格鲁吉亚领导人的
冲突、列宁第二次中风

在这4个多月里发生了很多事件,其中一件就是在热那亚(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和海牙(1922年6月15日至7月20日)召开了旨在探讨西方与俄罗斯相互关系前景的国际经济会议。会上要求莫斯科偿还战时和战前债务、归还外国业主被收归国有的私有财产、在苏维埃设立有产阶级代表处等等。俄罗斯没有接受这些条款,相反,却在拉帕洛与德国代表团签订了合作协议。

但在热那亚会议筹备期间,各少数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便授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它们的代表。此后这一过程逐步发展: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联合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草案。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委员会,这不只是一个委员会,它是新生国家的一个组织形态。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一场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斗争。

“联盟委员会”成立之前,斯大林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一项关于各少数民族共

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案。这个提案在基辅、明斯克、巴库、埃里温都得到了赞同,但在梯弗利斯却没有被通过。9月15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投票否决了斯大林的提案,认为为时过早,尽管此前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专门来到格鲁吉亚首都做说服工作。

9月22日,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主持召开了讨论“自治化”计划的委员会会议,此后将材料递交给正在康复中的列宁过目。从材料中可以看到,格鲁吉亚代表П.Г.姆季瓦尼投了弃权票。

其实,在这么一个牵动了所有民族精英利益的复杂政治运作中,新的因素(新经济政策)引发了一大堆问题。最大的麻烦出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在1922年年中,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许奥斯曼银行在梯弗利斯开设分行,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银行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异议,于是中央委员会下令禁止开设分行。因为如果支持靠山是西方银行家的土耳其银行的话,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土耳其里拉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坚挺,还会削弱苏维埃的地位,何况苏维埃和格鲁吉亚的货币原本就已经受到了里拉的挤压。结果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就掀起了抗议的浪潮。

虽然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为实现联合而作出的努力弥补了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在法律上的不详尽这一缺失,但仍有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危险。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出了一个建议:在不设立统一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行政中心的前提下,成立一个共和国联盟。

为了协调这些问题,8月11日,组织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斯大林、古比雪夫(任主席)、拉柯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和各共和国的代表。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拟订了《关于共和国联盟问题的议题草案》,提出了建立共和国联邦的必要性。

斯大林的提议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即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独立的民族共和国是革命的必然延续,但若是再进一步分离,就会造成“最后一点资源”的耗尽,招致可能发生武装干涉和遭受殖民的危险。

斯大林的结论是:“必须以合并成一个联邦的结果来完成使各共和国更加亲密的运作,实现军事、经济 and 外事(外交和外贸)的统一,同时保留各共和国内务的自治权。1922年8月。”(萨哈罗夫B.《列宁的政治遗嘱》,莫斯科,2003年,第647页)

列宁赞成这个“草案”。

此后,斯大林的观点向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内实现各共和国“自治”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建立起一套能够更加有效管理的更为稳定的规则。

斯大林在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到了这样的地步,中央和边疆区之间关系的现状,缺乏任何规章,处于完全混乱状态,正变得忍无可忍,



产生着冲突、怨恨和愤慨，把所谓的统一联邦国民经济变得有名无实，在全俄范围使一切经济活动受到阻碍，趋于瘫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形式上对于各独立的共和国并不是必须要执行的，而同时这些机构又经常撤销那些独立共和国中央机构的决定，这就会引起后者对莫斯科中央机关‘非法行动’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中央委员会一般是在地方中央机关已经下发了自己的命令，而这些命令随后又被莫斯科的中央机关废止后才进行干预，这就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拖延和停顿，而且在地方上引起非党员群众的困惑和共产党员们的愤慨。”从这种现象中，斯大林得出结论：“两者必选其一：要么真正的独立，那样的话，没有中央的干预，有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自己的租让委员会，自己的铁路，而且共同的问题通过对等的谈判，根据协议解决……要么把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统一成一个经济实体，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正式扩大到各独立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即以各共和国在语言和文化、法律、内务、农业等方面真正的内部自治来取代有名无实的独立。”

信中用很大篇幅对阻碍各共和国统一的反作用进行了分析：“在4年国内战争期间，由于我们受到武装干涉，莫斯科不得不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自由主义的态度，但是却意外地在共产党人中培养出了一批真正彻底的社会独立主义分子，他们要求全部意义上的真正独立，认为俄共中央的干预是莫斯科的欺骗和虚伪……我们正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形式、法律和宪法不能不理睬；另一方面，地方上新一代共产党人不把闹独立看做投机，固执地把关于独立的文字当作真凭实据，还固执地要求我们一字不差地落实独立共和国的宪法。”从这里斯大林做出了应采取坚决进攻策略的结论：

“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努力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转变为地方应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对中央无条件服从的实质关系，即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用正式的（也是切合实际的）自治来取代非正式的（名义上的）独立，那么一年之后，要想完成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统一将会困难得多。

“现在的话题是可别‘得罪’民族主义者，一年以后，话题很可能是可别因此引起党的分裂，因为在地方上工作的‘民族主义’的自发势力不利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而正式的自治则有利于此项工作。”（萨哈罗夫 B.，《列宁的政治遗嘱》，莫斯科，2003年，第230、231页）

在信的结尾，斯大林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计划。

出乎意料的是，列宁反对斯大林的这一构想。9月26日，他请斯大林到哥尔克自己这边来，在这里两人谈话持续了2小时40分钟。同一天，列宁给加米涅夫发去一封信：

明天我会见到姆季瓦尼(被认为闹独立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依我看,问题极为重要。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需要您好好考虑一下(您曾经打算研究这个问题,甚至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季诺维也夫也一样。斯大林已经同意作一些让步了,在第一条中把“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这一让步的精神实质,我希望,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并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即欧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结尾处也有同样精神实质的话:“这是我的初步方案。我将根据与姆季瓦尼和其他同志的谈话再补充其他一些修改。务请您也这样做,并回复我。”

您的列宁(《列宁全集》,第45卷,第211—213页)

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并从加米涅夫处得到相关的消息后,就在同一天给政治局委员们分发了下述信件:

列宁同志对第二条的修改,即建立一个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列的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我看,不应采纳。因为如果在莫斯科出现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个将相当于“下院”,而另一个将相当于“上院”,这除了制造摩擦和冲突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

对第四条,依我看,列宁同志“操之过急”了,他要求把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各人民委员部都并入联邦的人民委员部。毫无疑问,这种“操之过急”将“助长独立分子”去损害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

依我看,列宁同志对第五条的修改是多余的。

И. 斯大林(《列宁全集》,第45卷,第558、559页)

从这两封信的基调中可以看出,政府主席和总书记两人都有着战斗情绪。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可能有好几个。

第一,列宁确信为了国家结构更加稳固,必须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联盟这样的联盟国家。斯大林同样致力于此,但靠的是体系的强压。

第二,列宁病重,并且感觉到不管是权力杠杆,还是战友们,甚至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他,这完全是将要离开世间的人才会有感受。

第三,他不可能不注意到,最高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并不是趋向平衡,而是趋向分裂。而他,列宁,总是能对战友们的能量和权势欲加以控制的,如果它们能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的话,他并不害怕分裂,而现在他正在失去对权力进程加以控制的可



能性。

那么列宁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

幼年时接受过东正教洗礼、青年时放弃了宗教信仰且不相信存在天堂的列宁，在感到死亡步步逼近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失去了。对于他，死亡意味着一无所有，况且他还没有孩子。

9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写便条告诉斯大林：“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他建议我会见格鲁吉亚人。他甚至不接受昨天的修正案……”

斯大林回复：“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就能影响到格鲁吉亚共产党，而后者又能影响到伊里奇，那么请问，还有什么‘独立’可言？”

请注意这两句话：“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和“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

第二天，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加米涅夫建议斯大林作点让步：“我想既然 B. 伊里奇坚持，抗拒会更糟糕。”斯大林回答：“不知道。让他自己看着办吧。”（可以感觉出来斯大林并没有打算让步）。（引自：雅科夫列夫 H.，《斯大林：上升之路》，第 157、158 页）

10月18日，列宁重新投入工作。

10月22日，斯大林给奥尔忠尼启则写信：“我们打算结束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争吵并严惩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告诉我，除已召回的 4 人外，还应把谁调出格鲁吉亚？我认为，应该采取坚决的方针，从中央驱逐出一切民族主义的残余势力。你收到列宁的电报了吗，他被激怒了，对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极为不满。”（引自：雅科夫列夫 H.，《斯大林：上升之路》，第 158 页）

列宁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指示中央委员会派一个委员会去格鲁吉亚。斯大林就让奥尔忠尼启则当了委员会的领导人。

当列宁知道捷尔任斯基在自治化问题上的立场与斯大林相似后，就请自己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 A. И. 李可夫也去一趟梯弗利斯，并对局势作出自己的判断。

11月底，梯弗利斯，奥尔忠尼启则的住处。当着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的面，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 A. 科巴希泽指责奥尔忠尼启则收受了“一匹白马”的贿赂。因为贿赂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这匹马明明被列入供给名单饲养在军队马厩里，奥尔忠尼启则大光其火，扇了科巴希泽一耳光。

于是，政治辩论演变成了“莫斯科官员对地方的少数民族干部大打出手”。

听完了捷尔任斯基汇报的列宁恰恰就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很自然地，列宁发怒了。

12月12日，捷尔任斯基向列宁做了一个客观的出差报告。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前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称赞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活动，根本就没有提及耳光之事，好像这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事件那样。

列宁不同意这个报告，并令捷尔任斯基再次前往格鲁吉亚调查清楚奥尔忠尼启则和科巴希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病中的列宁在这一小事件中看出了尚未结成的共和国联盟已经存在分裂的危险：“大帝国民族”的代表侮辱了“受压迫民族”的代表。

这件事通常被认为是列宁对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一次表现。时至今日，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仍指责列宁，说他个人提出的各共和国之间平等并拥有自由退出权的方案，在这个统一国家的根基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实际上，列宁的方案旨在循序渐进和责任均等，使地方上的同志不至于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斯大林却不认为自由退出权是巩固因素。看来，两人对立的实质正在于此。

列宁可以援引自己在欧洲所见的实际经验，比如说瑞士。众所周知，在瑞士联邦居住着三个民族群：日耳曼民族、法兰西民族和意大利民族，而国家稳定的保障来自于权利的平等。

同样的，斯大林可以依据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依据自己在高加索的经验来判断：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制止在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阿扎里人之间挑起争端的企图。对于故乡格鲁吉亚的局势，斯大林比列宁了解得更清楚。就在前不久（1922年2月22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致全世界劳动者》的宣言中是这样描述时局的：“在不是根据民族特点而是根据阶级因素从俄罗斯分裂出来的外高加索内部，在孟什维克的领导下形成了剥削者统治劳动人民的独裁……更糟糕的是，他们使格鲁吉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极度紧张。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政策，才不止一次地发生了植根于民族主义土壤的流血冲突……他们用火与剑镇压了阿布哈兹人、阿扎里人、奥塞梯人的民族渴望……红色团队像救星一样进入到这个被革命起义席卷了的国家……”（引自：雅科夫列夫 H.，《斯大林：上升之路》，第 153 页）

可以想象斯大林会提出怎样的论据。第一，孟什维克统治下的格鲁吉亚一直是站在极其敌视俄罗斯的立场上的，甚至曾试图攫取索契。第二，它引发了车臣与达吉斯坦反对苏维埃的起义。第三，格鲁吉亚有唯一一个能够把巴库石油运到国外的运油港口。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列宁才批准苏联军队于 1921 年 2 月进入格鲁吉亚。

这些论据无可辩驳。是的，格鲁吉亚的确至关重要。但是一一定要对苏维埃的格鲁吉亚施以重压吗？如果能采用更委婉的政策不是更好吗？

列宁可能回忆起，为了合并阿塞拜疆，俄罗斯与土耳其人凯末尔-帕夏（阿塔土克）进行了谈判，向他承诺提供资金和武器，而对格鲁吉亚的承诺则是巴库的石油。当然，承诺的 800 万金卢布中莫斯科向土耳其人兑现的是 300 万。

所以，在劝说斯大林时，列宁可能会讲：不要急，让果子熟了再说。



争论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论据,这些论据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欧洲的”和“亚洲的”。(高加索地理上属亚洲。)

所以,这种在党的实践中常常发生的观念的碰撞本不应该带来消极影响。但这种影响还是出现了。

疾病使列宁变得暴躁和多疑。没有人民委员会,他就丧失了自己的大权,徒有精神领袖的威望。对于将权力当做实现自己宏伟目标不可缺少的工具的人来说,失去它无异于从高处摔下来。坚强的、无私的、对自己的敌人毫不容情的列宁突然落入一种屈辱的境地。

1921年到1924年间因列宁生病,在政治局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没有列宁的未来”运作程序,历史学家B. A. 萨哈罗夫通过对这一时期原有阐述的认真重新审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建立联盟这个问题上,领袖并没有战略上的依据来反对斯大林,他们的争执是战术上的。

当然,萨哈罗夫补充说,对于为什么列宁在1月份不反对“自治化”并同意建立强有力的中央,却在9月改变了观点的问题,他没有答案(即没有“对历史学家解禁的材料”)。

但包括新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党内的人事动荡、基辅和梯弗利斯对“自治化”的公开反对等等事件的客观性迫使列宁做出让步。

他明白,事情的关键不在政治层面的表述上,而是在管理实践之中。政治局把握着军权和党权,所以他不担心将措词由“自治化”改成“权利平等”,认为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

不久后由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主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变动就证实了这一点,列宁也未反对。

1922年11月30日,斯大林给这场关于联盟的争论打上了句号。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做了《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报告。政治局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并确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权“批准统一的苏联国家预算”。结果就使联盟的中央政府获得了实权。(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的是: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的解体始于199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建立纯俄罗斯税收体系的那一刻。)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列宁缺席。不过列宁事先就知道决议内容,并未表示反对。

争论似乎平息了。

12月16日,列宁第二次中风。在讨论过他的健康状况之后,12月18日,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隔离,不管是与工

作人员的来往,还是书信来往。

这个决定是由医生提出来的,而对此制度的执行,使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的眼里成了一个善于保护伊里奇健康的人物。

对于这个决定,美国历史学家亚当·乌兰姆注意到,列宁总是不厌其烦地关注着同事们的健康,所以有一天落到他们的监管之下也就毫不奇怪了,他讽刺道:“列宁陷入了自己编织的网中。要知道,说党的领导人的健康不仅关系到领导本人,也关系到全党的正是他自己。”(乌兰姆 A.，《布尔什维克——1917 革命的前因后果》，莫斯科，2004 年，第 496 页)

列宁的手、脚再一次麻痹,也不能写字了。人们想把他转移到哥尔克,但他执拗着不肯去,声称这绝不可能:坐雪橇去对他来说太疲劳了,而因积雪堵塞又不能坐汽车去。他没有妥协。

12 月 21 日,列宁开始向速记员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

12 月 24 日,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与医生商量后,允许他每天口授 5 到 10 分钟,但不得有任何书信往来,同时也禁止他接待来客和谈论任何政治话题。

我们注意到,列宁的 6 个秘书中有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

他的第一秘书 Л. А. 福齐也娃回忆,12 月 22 日,他重提毒药的事,派她去找斯大林。斯大林以医学预测的结果是好的为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当列宁明白斯大林不想在这件事上帮他时,对斯大林的回复是极为愤怒的。

第二十五章

政权的两个中心——列宁和斯大林

两个权力中心——列宁与斯大林、“家族”与总书记的冲突、反对斯大林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托洛茨基——继承人

虽然提到毒药,但列宁未必就想要自杀。自杀有许多其他方法,包括使用火枪。

所以,列宁要氰化钾主要还是为了验证一下最亲密的战友对自己的态度。看来,他开始重新衡量局势了。

1922年下半年,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甚至难以写出清晰的字来。他的右手与右脚彻底瘫痪了。

但他还不准备就此归西。正是这段时间他口授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遗嘱》的短文。

《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抄》、《论合作社》、《我们怎样改组工农监察院》——这些便是列宁在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间克服愁闷、冷漠情绪和让他痛得痉挛和呻吟的头痛,抓空口授的最后的著述。

一般认为,这些文章里的批评重点多数情况下是指向斯大林的,甚至可以说在揭发他。换句话说,这位共产主义的上帝临终前豁然省悟,看透了自己最亲密战友是真

正的撒旦。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忘了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做对谁有好处？

让我们研究一下列宁第二次中风以后的情况，不过不是从衰弱下去的领袖、或是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他们的角度，而是从出人意料形成的新的信息行政中心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心由列宁身边最亲近的人构成：他的妻子 H. K. 克鲁普斯卡娅、妹妹 M. H. 乌里扬诺娃，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福齐也娃、格利亚塞尔、沃洛迪切娃这几个秘书。

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是这一群人决定了哪些文件需要呈报给病人，哪些文件不需要呈报。而且，克鲁普斯卡娅完全有理由认为，她作为妻子，谁也无权限制她去保障丈夫拥有更加舒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管是政治局，还是总书记都不应该规定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谁又能指责克鲁普斯卡娅不服从党的决定呢？

于是很快，“家族”的首领和党的领袖，即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

现在我们只掌握一个关于他们关系危机的证据。其实，日常生活里充满了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构成了生活本身。正是这些没有被目击者和参与者记录下来的细节孕育了一种趋势，而积累起来则形成了推动历史进程的新的动因。

因此，整个 1922 年，斯大林一直被各种难题所困扰，包括“格鲁吉亚事件”和外贸垄断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在寻求托洛茨基的支持，因为斯大林不认为有充分理由因近期的经营不善而给对外贸易部门以全权。

克鲁普斯卡娅只是增添了一些个人感情因素。

下面是她从“家族”的角度展现场景的一封信：

H. K. 克鲁普斯卡娅致 JI. B. 加米涅夫，12 月 23 日。

列夫·鲍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 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即季诺维也夫——卡普琴科注）、弗·伊最亲密的同志提出请求，请保护我不受别人对我私生活的粗暴干涉，以及无端的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能做出一致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H. 克鲁普斯卡娅（引自：卡普琴科 H.，《斯大林政治传记（1879—1924 年）》，第 1 卷，特维尔，2004 年，第 649—650 页）



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很明显，她违反了医生的禁令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斯大林能默不作声，就这样承认自己无力承担起交给他的保证病人安宁的责任吗？而且，这封信是写给托洛茨基的。

也许他可以，或是他应该更尊敬、更友好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进行商谈。不过，根据 M. И. 乌里扬诺娃的陈述：他让她接了电话，并严厉地要求她遵守医嘱，不要与列宁谈政治，不然就传她去中央监察委员会。

克鲁普斯卡娅大为震惊。想必，她的神经确实已紧张到极点：她大哭起来，失控地倒在地上满地打滚。

第二天斯大林再次打电话给她，试图缓和自己前一天的尖刻。这时克鲁普斯卡娅已经平静下来，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表面上的和解。关于此事她什么也没有对列宁说（到了 3 月份才说了出来）。但她的精神状态肯定让病人有所察觉。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第二天列宁就开始向秘书 M. 沃洛迪切娃口述可认为是政治遗嘱的文字。克鲁普斯卡娅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和列宁开始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注明的日期都是 12 月 23 日。

12 月 24 日，在进行新的口授之前，列宁警告沃洛迪切娃，所有口述内容均是绝密的，但已经迟了：有关列宁信件一事，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奥尔忠尼启则都已知道了。

被可能出现的麻烦吓坏了的福齐也娃向加米涅夫求助，让他防止机要信息的扩散。而后者立即将一切告诉了斯大林。

其实，这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因为列宁在自己的信中给了负面评价的主要当事人已经都知道了。

他们明白，列宁在着手策划新的权谋，也许，就像他在 1906 年撤销党的实际领导者克拉辛与波格丹诺夫的职务一样。

信中提到的这些人了解列宁的权谋、智力和意志，他们应该好好地想了想。

那么，列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给党的最高机关的信里都写了什么呢？下面就是信的内容。

“我强烈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做出一系列的改变。”——列宁写道。

为了巩固党的稳定性，他建议增加几十名甚至百名新的委员到中央委员会中，并采取措施防止分裂。换句话说，列宁建议削减现有精英阶层的权力。

此外，他对当前的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做出了评价：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威胁，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本是

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 50 人,甚至增加到 100 人,就应该可以避免分裂。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利,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如他在就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证实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 B,《列宁全集》,第 45 卷,第 344、345 页)

在此,我们要指出“杰出领袖”的这一评价,列宁其实没有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推荐为继承人。

就“当了总书记”这个表述,又出现一个问题:难道不正是列宁自己把斯大林提拔到这个位子上的?当然是列宁。

我们举出莫洛托夫关于此事的一个生动回忆:

1921 年我意外地当上了中央委员会书记。书记处由三位书记组成: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就像公布的那样,莫洛托夫是责任书记。那时还没有第一书记和总书记一说,只有责任书记。接待日也被公布。我与列宁见了面。我们商谈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在克里姆林宫里漫步。他说:“只是我要建议您,您作为中央书记应该从事政治工作,所有的技术性工作应由副书记和助理来抓。迄今为止,我们的前任中央书记克利斯廷斯基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而不是中央书记!他抓的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是政治!”

一切发生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所谓的“十人名单”,是一份内定的中央委员的姓名,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在斯大林的名字旁边列宁亲笔写上了“总书记”几个字。列宁召集了这“十人”内部会议,他在克里姆林官斯维尔德洛夫厅旁边找了一个房间,事先商量好,这是内部会议,托洛茨基分子不得参加,工人反对派也不能参加,民主集中派同样不在邀请之列,参加的只是坚定的“十人”拥护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我记得,召集了 20 人,他们都来自在表决中占多数票的各个团体。斯大林甚至有些埋怨列宁,说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召开秘密或者半秘密的会议有点搞派别活动的味道,可是列宁说:“斯大林同志,您是老道的、有经验的派别活动分子!请不要怀疑,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希望大家都能为表决作好准备,应当提醒同志们,要坚定地投票赞成这份名单,不做任何改动!‘十人名单’应当整体地通过。如果逐个表决就会有很大的风险:这是一个好的文学家,应该有他,那是个好的演说家,也应该有他,这样就降低了这份名单的价值,我们会又一次失去多数。而那时我们又



怎么去领导呢!”

可是要知道,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是禁止出现派别的。

于是,表决通过,包括括号里的那个注。斯大林成了总书记,列宁为此费了很大的力气。但他显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周密考虑,同时也是在告诉大家应该向谁看齐。看来,列宁认为我是个不完全的政治家,但把我留在了书记处和政治局,而让斯大林当总书记。他当然是对自己的病情有所察觉并做出准备。他是否把斯大林看作是自己的继承人?我想,是有可能这样考虑的。不然干吗要设总书记呢,从来都没有过这一职务。但是,斯大林的威望逐渐上升,并上升到比列宁所设想的,或者甚至比他所希望的要高得多。不过,想预测到一切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尖锐的斗争条件下,斯大林周围越来越紧密地形成了一个活跃的集团:捷尔任斯基、古比雪夫、伏龙芝和其他一批形形色色的人。(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莫斯科,1991年,第180、182页)

从莫洛托夫的这些话里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的快速上升是列宁没有意料到的。原则上,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列宁对其他一些觊觎最高权力者评价很低: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此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过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列宁 B.,《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5页)

那结论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有能力,但不合适,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靠。

布哈林——只是个繁琐的哲学家,并不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

为何这批人里出现了皮达可夫,令人费解,不过他也不适合。

(想必,列宁起初想给所有重要的中央委员都做个评价,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这个念头。)

如果将列宁对这六个人的评价做个比较，斯大林的位置看上去是最巩固的。

“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那又如何呢？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领导者，这不是什么罪过。

看来，列宁看到了他的这个分析将把斯大林抬高到超过其他人的地位，因此认为必须给自己的“信”做些补充。

对 1922 年 12 月 24 日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Л. Ф. 记录。

1923 年 1 月 4 日。（列宁 B.，《列宁全集》，第 45 卷，第 346 页）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列宁最主要的靶子正是斯大林。

但列宁像以前一样，没有提出严肃的政治上的指责，都是一些个人品质问题：粗鲁、没有耐心、任性、不关心同志。

列宁自己也明白这些理由有些微不足道，因而强调“这不是小事”。

从《信件补充》中政治局委员应该能够明白，现在列宁倾向于支持托洛茨基。

这就使一切变得错综复杂了。他丢弃了自己的战略盟友，有保留地向一个从未完全信任过的人伸出手去。

列宁有意无意地迫使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联合起来反对托洛茨基。

从这三个人占据的职位看，他们总的潜力是巨大的。

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执行主席；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这里还应加上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捷尔任斯基的潜在力量。（我们补充一下，正是斯大林把国家政治保卫局每月就党内上下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做出报告引入到实践中，从那时起，他就对党组织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了。）

再考虑到政治局还控制着军队机关，那么所有大权其实都掌握在“三驾马车”手中。



但目前站在国家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的仍是列宁。

不过在 1923 年初,最希望得到领袖继承人之位的并非不急于从半幕后走向前台的斯大林,而是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

很有可能是这位总书记那时尚未得到必要的党内领导层的支持,看不到自己可能达到权力的顶峰。难道,他的功绩大到了有资格去竞争这个位子的地步了吗?

因此,斯大林客观地估计了自己的可能性,并未急不可待。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想成为一号人物,他都支持,只要不是托洛茨基就行,因为托洛茨基当选对斯大林来说将是一个灾难。

只要列宁还活着,列宁就存在着在“家族”帮助下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可能性。

斯大林在列宁的秘书里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福齐也娃。她偏向于服从党的纪律,也不隐瞒列宁的秘密动向。因此,“三驾马车”可能认为自己能应对突发事件。

至于托洛茨基,他突然托病避开了列宁的建议,转而支持了格鲁吉亚人,结果是政府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之间可怕的关系并未得到缓解。

为什么这位既不天真,也不胆怯的托洛茨基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呢?

可以说,他是个革命浪漫主义者,这一点便可以解释所有问题。

但如果我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他是在切合实际地分析了力量对比和列宁病情的发展状况之后,才未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

托洛茨基自己谈到“格鲁吉亚事件”时写道,列宁展开的进攻不止是针对斯大林的,“还针对了他的司令部,首先是他的帮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也就是第比利斯的那场冲突本身是改组中央委员会的借口。

“列宁发动的这场战役,除了要达到总的政治目的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意图,即为我的领导地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他能康复的话,就同他一起工作;如果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就由我来接替他的位子。但是,这场没有进行到底、甚至还没有进行到一半的斗争却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列宁事实上只来得及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而且知道这一情况的也只是少数直接的有关人员,而不是全党。斯大林集团,即当时的‘三驾马车’集团在受到第一次警告以后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托洛茨基 JI.,《我的生平》,莫斯科,2001 年,第 475 页)

没有列宁,即使是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的列宁,托洛茨基是不可能夺取最高权力的。他很清楚这一点。

归根到底,他能对“格鲁吉亚事件”说些什么呢?说奥尔忠尼启则接受了白马礼物,或者是没有接受?要知道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地方上的争吵。列宁因为生病夸大了它的意义,但所有人明白这不过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当然,托洛茨基和列宁还有一个机会:尝试发动军事政变。

我们不从技术可行性上去分析。也许,军事人民委员能找到许多忠诚于他的指

挥员和士兵。但是打出什么旗号呢？就是为了推翻有点粗鲁、轻率的总书记？

那将是愚蠢的。这样的政变可能比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起义更容易被瓦解。

（苏联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政变：1953年针对 JI. II. 贝利亚、1964年针对 H. C. 赫鲁晓夫和 1991年针对 M. C. 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三次都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如果设想托洛茨基也使用了军队，那么与其他三次相比，他的处境将是最可悲的。）

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的克里姆林宫上层，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但所有人都曾是政治上的战友。他们是在后来，在另一个历史时期才成了敌人的。所以如果将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风气拿到 1923 年来，那将是特别的大胆之举。也就是说，所谓斯大林毒死列宁的说法，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这位斯大林最主要的指责者自己也间接地承认过，当时的局势并非极其尖锐。

“斯大林的权力来自它的机关（党的中央机关——作者注），与之密不可分。对群众、对事件、对历史，他没有其他的控制途径，只能通过机关。只有当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社会矛盾激化、官僚主义在社会上重新抬头以后，斯大林才开始凌驾于党之上。刚开始他本人也被自己的高升搞得有点不知所措。他环顾四周，走得不那么自信，总是准备后退。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将他作为对我的制衡加以支持和推进。只是谁也没曾料到，有一天斯大林会超越他们。”（托洛茨基 JI.，《斯大林评传》，第 2 卷，第 145 页）

换句话说，病中的列宁对总书记的指责没有得到政治局其他同志的认同。

因此，他们对领袖的呼吁持合理的乐观态度。

这一点可以从对列宁 1922 年 12 月 31 日口授的另一封信《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反应上（包括斯大林的反应）看出来。这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常常被斯大林的对手拿来引用。正是在这封信中，斯大林被称为“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的名字——译注），并把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责任归咎于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然而，请注意，就在几天前，在 12 月 26 日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做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的报告，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批准了联盟成立宣言，宣言确定了各共和国享有平等权利和自愿结盟的原则。

看来，列宁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本人提出的要求已经被斯大林考虑进去了。

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列宁要如此激烈地批评总书记以及这两个格鲁吉亚人和一个波兰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就好像他不清楚俄罗斯民族是这个国家的基石一样？

这样的矛盾没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列宁称俄罗斯族为“伟大的民族”，但强调这



个伟大民族“不过是因为实行暴力才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其实像“大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废物”等等这样的措辞，就算在辩论中也是过分的，更何况是进行客观分析。

所以出现了一种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列宁，而是他人的说法，就没有什么奇怪了。(萨哈罗夫 B.，《列宁的政治遗嘱》)

不过，当时参与政治运作的人们都没有怀疑此信作者身份的真实性。他们更担心的是列宁发起的这场战役的后果，更何况此信的副本已经递交给了托洛茨基。

这样一来，继《给代表大会的信》之后，党的高层又得到一个列宁与现存体系作斗争的证据。

那么“三驾马车”是如何回应的呢？

他们建议托洛茨基担任政府第三副主席(主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方面)的职务。这已经是第二次提议了。第一次是列宁在 9 月份提出来的，当时被托洛茨基拒绝了，认为如果接受了这个新的职务他将遭受“政治毁灭”，变成官僚中的一员。

对于这第二次提议，他同样予以回绝(而这很快就被当作他不愿从事具体工作的证据)。

列宁那篇关于“自治化”文章的命运便很能说明问题。

3 月份，列宁第三次中风，几乎彻底瘫痪，说不出话来。这时，福齐也娃才将这篇文章发送给斯大林，并对延迟的原因作了可笑的解释：“我没能更早一点这么做，因为一开始还不十分清楚到代表大会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还是否有表达自己在这方面观点的意愿，而最近两周我生病了，今天是第一天上上班。”

这个便条签署的日期是 1923 年 4 月 16 日，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十二大起初是计划在 3 月中旬召开的，但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推迟了整整一个月。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延期对斯大林是最有利的，因为列宁在第三次中风前似乎还有能力罢去他的总书记一职。

这一设想完全是讲道理的。但为什么托洛茨基也同意延期呢？

据说，他不想争斗了。这是有可能的，他不想或者是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但应该考虑到一个事实：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次代表大会是具有特殊性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权力将被重新分配。各方势力都在认真准备着。

托洛茨基本人回忆道，斯大林建议他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托洛茨基回答说不想扮演列宁继承人的角色，并建议斯大林来做这个报告。而斯大林也有足够的智慧拒绝了这个荣耀。

最后，季诺维也夫做了这个报告。

关于此事，莫洛托夫是这么记载的：“季诺维也夫觊觎着领袖的地位，觊觎着列宁的地位。1923 年，列宁还活着时，在他争取下，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政治

报告。”(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莫斯科,1991年,第183页)

注意这几个字:“列宁还活着时”。甚至过了数十年之后,莫洛托夫这样的年迈的老人还记得这一事实。而且,大概不只莫洛托夫一人被“继承人”在讲台上的出现所触动。不过,我们在此可能有些过急地在讲述事件。

那么,斯大林在收到附带着福齐也娃便签的列宁的信后,是如何反应的呢?

斯大林拒绝接收此信,说“他不干预此事”。

看来,他从各种可能中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他无疑是知道信的内容的,但他选择由代表大会来裁夺这个问题,看它如何处理这些烫手的文字。

临终的领袖这封重磅炸弹般的信到了一批现实政治家的手中。他们给了临终者应有的尊敬,只在代表的小圈子里介绍他的信件。

仅此而已。

当然,这是个纪念性的姿态。列宁试图改造这个由他自己创建的体系的努力不了了之了。任何人也不会花大力气去削弱已形成的国家管理体系。当然,我们说的“任何人”并不是指意见无足轻重的个别人物,而是指被列入了中央书记处高级干部名录的、参与了剩余产品分配的上百上千位不同等级的管理者。

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已经太晚了。

第二十六章

党的十二大：斯大林强化了自己的地位

党的十二大：斯大林巩固地位、季诺维也夫想抵制“斯大林独裁”、红色将领们、德国的革命

在列宁的政治生命因第三次中风而彻底结束之后，4月17至25日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表面上看，这次大会给人一种观望的印象。季诺维也夫做了政治报告，托洛茨基谈了经济问题，斯大林讲了民族问题并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托洛茨基没有将列宁在“格鲁吉亚事件”问题上对斯大林等人的抨击公布于众，因为这明显是与党保持团结的意向相抵触的。

必须注意的是，与会代表都是按照各省党委的指令无差额选举出来的，而这些党委都是在1922年夏天，即斯大林成为党的中央机关的领导之后，依照莫斯科的推荐选举产生的。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中，斯大林把各省的党委称为党的“主要支柱”，并强调：“没有它们对苏维埃和党的工作的领导，党就会失去基础。”根据他的报告，党已经实现了对包括军队和工会在内的各个政治领域的监控。

在结束语中，斯大林借用列宁的威望点名抨击了来自格鲁吉亚的自己的反对者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

他很隐晦地就奥辛斯基对季诺维也夫的批评做了辩护，同时确立了我们所熟知的“三驾马车”为“党的核心”。

从这些发言来看，他显得很自信。

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这种信心得到了肯定和加强，可以说，是一种以革命实践和理论为基础的较高水准的信心。在提到联盟的民族构成（7500万“过去的统治民族”和6500万非俄罗斯族人）时，斯大林说，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建设的正确性，将关系到东方革命的发展进程。

他谴责了大国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着重提到了高加索地区，讲述了格鲁吉亚地理位置的地缘政治优势（拥有黑海上的港口、铁路枢纽），但格鲁吉亚的“机会主义分子们”不愿意和邻居们平分这个优势的利益。他没有忘记声援自己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斗争的战友们——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

如果列宁能听到这些讲话，他就会明白，斯大林不仅保住了，而且还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不过，在这次大会上他也有自己的成就，他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极为出彩，他提出了把实现工业化作为首要任务，然后是发展规划。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高质量的规划指导下，进行工业的技术设备更新和提高劳动效率才会有前途。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业》的决议中通过了他的提议。在各方面看来，列宁的继承人已经确定了。

1923年4月25日，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和莫洛托夫当选为候补委员。

很明显，托洛茨基被对手们包围了。

在“三驾马车”里，私下里，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第一号人物，加米涅夫是第二号人物，而斯大林仅排名第三。

与此同时，斯大林开始进行新一轮的人事调整。1923年6月，他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意，将政治局的专职秘书，同时也是列宁秘书的玛丽娜·格利亚塞尔替换下来。格利亚塞尔非常精干，并对列宁忠贞不渝。

斯大林任命了自己的两个助手纳扎列强和托夫斯图哈来接替她，不过斯大林遭到了托洛茨基的非常合理的反对，因为新任命的两人工作不如格利亚塞尔，所以他不得不用组织局的秘书鲍里斯·巴扎诺夫来换下这两人。（巴扎诺夫后来逃到国外，出版了关于斯大林中央机关秘密的回忆录。）他在书中证实了一个细节：每当政治局会议前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会聚到一起（起初是在季诺维也夫的寓所，后来是到斯大林的办公室），讨论决议草案，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国家的领导机构。秘密会议地点的变化也表现出斯大林在“三驾马车”里角色的转变。毫无疑问，办公室的主人在客人面前更具心理上的优势。



斯大林还有一个优势,他本人可以监听克里姆林宫自动电话交换台所有用户的通话。(巴扎诺夫 B.，《一个前斯大林秘书的回忆录》，圣彼得堡,1992年,第54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巴扎诺夫,没有其他人可以证实这一说法。假定斯大林的确曾监听过同事的电话,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能抽出多少时间干这个?很显然,非常少。

监听克里姆林宫里80位电话用户,除了有实际操作的困难之外,还有一点让人对此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在由H. C. 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揭发运动中,在动用苏联情报机关资料的情况下,却没有提到或是暗示监听一事。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技术角度和领导层之间关系看,斯大林是有可能对同事们进行监听的,但他放弃了此事,把这事交给了专业人员。

让我们看一眼位于老广场一座建筑物第五层的斯大林办公室。1923年夏,中央委员会也搬到这座楼里。到1991年之前,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都在这里办公,1991年之后成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

要进入总书记的办公室,首先要经过他的秘书梅赫利斯和坎涅尔的房间,然后是经过通信员的房间,最后才到斯大林的办公室。

从这个办公室里可以进到一个宽敞的与莫洛托夫办公室相邻的房间,在这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一天要见好几次面,讨论各种问题。

有着橡木墙板、大书桌、若干书柜和会议桌的斯大林办公室就坐落在这个特殊的城堡里面。要想进入到这里,只有事先与主人电话预约才行。

政治局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民委员会大楼里召开的。托洛茨基会在10点前准时来到这里,而“三驾马车”通常会迟到3分钟。

一般,季诺维也夫进门的时候尽量不去看托洛茨基,而后者也同样做出正在阅读文件的样子。不过斯大林会走向托洛茨基,像老朋友那样豪放地握手。当然,这不过是做戏罢了。

会议由加米涅夫主持,斯大林时常站起来,沿着桌边踱步,抽几口烟斗。

托洛茨基,这位在国内最有声望的人(仅次于列宁)在这里成了孤家寡人,他有时会摆出一种高傲的姿态,佯装读读英文字典。

其实,在政治局里,斯大林也应该感觉到自己是孤单的。他身边圈子里的都是一些与他完全不同的人。

当时主持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的Л. М. 卡冈诺维奇对这段时间有这么一段回忆:

他是个刚毅、坚强、沉着的人,我还要说的是,是一个城府深、随时待机而动的人。未经深思熟虑的话他从不说出口。对我来说,这就是斯大林。我看到的

他总是在思考。他和你在交谈，同时也在思考。还有目标明确。他是个目标明确的人，一直如此，所有阶段和不同时期都是这样。不过，随着条件和局势的变化，他的情绪、态度、行为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对我来说，我们关系最愉快，嗯，最友好的阶段是1922年到1925年我在那里工作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我常常在他那里，经常过去。他总是很紧张地从事着组织工作。我是他的左膀右臂，可以说，这一点在我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已经很详细了。

那段时间，起初我们是在沃兹德维任卡街办公，后来搬到了老广场。我们经常在这里逗留到夜里12点，12点半，甚至到1点钟，然后沿着伊利因卡街走到克里姆林宫。我、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和另一个什么人一起走。我们一起沿着马路漫步，记得那是个冬天，他戴着有护耳的皮帽，护耳不停地摆动着……我们大笑着，开着玩笑，他说着什么，我们也在说，互相取笑着，就像一群游民。不相干的人看了这一幕会想：“这是一伙什么人？”几乎没有警卫。非常少。最多就跟着一两个人。甚至警卫队的人数都很少。这段时间就是这样，是人生中一段愉快的时光。斯大林的情绪也很好。我们有时候会在饭桌前坐很久……（丘耶夫Ф.，《卡冈诺维奇如是说》，莫斯科，1992年，第190、191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周围的“自己人”越来越多，而“异己”者的数量则越来越少。他充分使用了总书记的职权，不与同志们商量，也不经过“三驾马车”，就直接批准干部的任命，这很快引起了季诺维也夫的愤怒，季诺维也夫找了加米涅夫筹划防止“斯大林独裁”。

不久以后，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一群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伏龙芝、拉舍维奇、叶夫多基莫夫等）在山里散步时，在一个山洞里讨论了如何撤销组织局、重组书记处以便缩小斯大林的职权。

只有伏罗希洛夫一人表示坚决反对。其他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为了“和解”而准备赞同改组的主意。其实，远非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书记处里只有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三人，那将开始新一轮的斗争。

斯大林通过奥尔忠尼启则转去了一份简短、颇含嘲讽的信作为对此的回应：

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你们的信我收到了。我与谢尔戈谈过了。但不明白，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才能不被你们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认为，为了事业的利益需要隐瞒什么。要是能捎来一张清楚、明确的便条就好了。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能当面谈谈就更好了。所有这些，当然，都建立在你们认为今后还有可能友好共事的基础上（因为从与谢尔戈的交谈中，我开始懂得，你们看来不反对准备决裂，就好像它是不可避免似的）。如果你们不认为我的提议是



可行的,那随你们怎么做吧,在俄国应该是可以找到能够评判这一切,并给罪犯判罪的人们的。

过8—10天我要去休假了(我累了,疲劳过度)。祝一切好。

И. 斯大林 1923年8月3日

附:你们是幸福的,可不是吗,你们有空编造各种谣言,并讨论它们等等,而我却在这里干着重活,像条被拴着的狗。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不知怎么成了“有罪的”。这样是可以把任何人都折磨坏的。你们吃饱了就没事找事了,我的朋友们。《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第201、202页)

看得出,斯大林相信自己的实力,对季诺维也夫的立场感到非常惊讶,要知道此时的托洛茨基还很有势力,他担任着陆海军人民委员这个关键的职务。稍后斯大林收到了季诺维也夫的来信,并较平静地做了回复,解释说不会占着总书记的位子不放,反驳了说他独自“决定问题”的指责。

这封信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触动了斯大林——德国局势问题,德国的共产党人正准备发动革命。他带有怀疑地评价了其可能性。

这里,原则上他似乎重申了自己对1920年俄波战争时期中央委员会盲目乐观态度作出的结论。

事实上,德国的局势高度紧张。起因是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做出了认为德国没有履行战败赔偿义务的决议(1923年1月9日)。到了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始占领德国的经济中心鲁尔。对此德国政府呼吁民众采取消极抵抗和怠工予以回应。事实上,一场“非军事手段”的战役打响了。占领当局采用了镇压手段,设立了一整套的押解站,将13万人驱逐出鲁尔(这个经验后来被Ф.罗斯福和斯大林使用过)。结果,德国陷于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边缘。

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德国共产党应该做好“明天就战胜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

莫斯科内部认为,德国这场新的革命可能将并无此准备的苏联也卷入战争。但在俄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世界革命的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不惧怕为伟大理想而献身。

同时还应该考虑到,红军正处于改编阶段,在侨民的报纸上已经出现了俄国“没有军队”的意见。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下面的情况。B. A. 马克拉科夫在1923年5月23日写给B. A. 巴赫梅季耶夫的信中对此作了十分准确的表述:“当地的君主主义者同俄国、同一些红军代表有联系。他们肯定地说,作了一切推翻布尔什维克的准备,就等着一个必

要的借口了。这个借口可以是俄国与哪个邻国的军事冲突，从这个理由可见，这些君主主义者并不反对挑起这种冲突。很显然，这样的冲突唯一可能与立陶宛发生，已经吞下了维尔诺的波兰，还想吞并科夫诺，这也符合欧洲一些强国的规划，他们希望波兰把德国与俄国全线隔开。诸如此类，如果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俄国内部存在着教唆俄国打仗的军事团体。”（《绝对私密和可信：B. 巴赫梅季耶夫与 B. 马克拉科夫在 1919 年至 1951 年间的书信集》，3 卷本，第 2 卷，1921 年 9 月至 1923 年 5 月，第 563 页）

不久前的希腊、土耳其战争的结局证实发生类似的事件是有现实可能的。1922 年 9 月 9 日，希腊军队彻底惨败，9 月 11 日希腊军方发动政变，国王康斯坦丁让位给了儿子。11 月 15 日，以总理大臣 Π. 古纳里斯为首的 5 位大臣和总司令哈吉阿涅斯季斯被定罪，并遭枪决。

因此，在开始援助德国革命的时候，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必须考虑到所有的风险，包括本国发生军事政变的风险。

从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明白这一点。

很可能，这里正是斯大林主张从全球战火中脱身出来，并认为在“无产阶级首先取得政权的一个国家里”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思想的根源所在。

为什么在 1923 年夏天，他的战友们离决定撤换他仅一步之遥的时候，斯大林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这个问题我们仍然没有答案。

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害怕托洛茨基的势力得到加强，而如果罢免了斯大林，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有战争的威胁，军队的影响本身就在加强）。

斯大林有较强的心理素质。他敢于冒失去一切的风险，不怕采取攻势，而其他人则犹豫不决。结果，由季诺维也夫挑起的对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只留下了为斯大林在今后的争论中放肆地用来戏耍的“山洞”窘境。

可见，对 1923 年夏天冲突起到决定作用的有三个因素：军方干预的威胁，托洛茨基的疾病和斯大林的强硬态度。

而斯大林一直认为最主要的正是军队的因素。这也使他对军队领导人一直特别关注、永远不信任，这一点后来又扩大成了对军方高级指挥人员的镇压。

这里，西方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斯大林的视线中心，围绕在这个人头顶上的光环始终是与“红色波拿巴”的革命战争分不开的。而目前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关系根本谈不上友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告称这位司令员的立场是“反托洛茨基”的、是“民族主义”的。有一个情况对于理解图哈切夫斯基的重要性极为关键：他聚集了一批“红色将领”在自己周围，而这些将领一直在与托洛茨基的“军事专家”相竞争。几个月以后“红色将领”就把托洛茨



基从政治斗争中排挤出局了。

为了说明图哈切夫斯基那时的分量,我们列举一篇 1923 年 7 月出版的周刊《军事通报》的报道:“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收到如下电报。致第 5 集团军领导人、把乌拉尔从白卫军和高尔察克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解放者:在红军夺取乌拉尔 4 周年纪念的日子里,米阿斯市苏维埃向他致以无产阶级的敬礼。为纪念这一天,米阿斯市更名为您的名字——图哈切夫斯克市。”(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莫斯科,2004 年,第 284 页)

托洛茨基也有一个“自己的”城市,从前称加特契纳;季诺维也夫也有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位于乌克兰的原名叫伊丽莎白格勒的城市。

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关注可以追溯到 1922 年 12 月 13 日,那天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别处的工作人员逮捕了西方面军第一副参谋长 H. E. 瓦尔福洛梅耶夫和方面军参谋部征召处处长 И. Т. 阿列克谢耶夫。

瓦尔福洛梅耶夫是图哈切夫斯基最亲近的同事之一。

1923 年 3 月 15 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方面军司令员一职,不过没过多久,3 月 29 日又官复原职。

就这样,在参谋部、密码科、司令员秘书处展开了一场“清洗”。

在乌克兰军区司令员 M. B. 伏龙芝的指挥部里同样也进行了这样的“清洗”。

那么军事反间谍人员在担心什么呢?

他们在担心托洛茨基的政变。即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采取了预防措施。虽然没有发现有什么密谋,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很多解除了监禁的指挥员调到了教学岗位上。

1923 年 6 月 2 日,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对军事部门展开调查的决议。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由 B. 古比雪夫(斯大林的人)担任,后来换成了 C. 古谢夫(同样是斯大林的拥护者)。受到检查的有西方面军、乌克兰军区、莫斯科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

除此之外,这次“清洗”还波及了第 5 独立集团军(在远东地区)、骑兵第 1 集团军和工农红军空军部队,莫斯科军区的全部军团指挥官和乌克兰军区的部分指挥官被撤换。

“值得注意的是,1923 年 9 月,此前一直主管军区参谋部情报部门的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委员 P. 隆格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军区副参谋长(接替被解职的 H. 马赫罗夫)。1923 年底,隆格夫已经成了军区代参谋长,这样一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表就打入了军区管理部门的‘心脏’。这一点意义非常深远:军区司令部实际上已处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控制之下。”(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莫斯科,2004 年,第 251 页)

同时，图哈切夫斯基被提议派去柏林组建“德国红军”，但他拒绝了，这可以看成是他对中央委员会的挑衅。

不过在欧洲巨变前夕，最高当局决定不去动图哈切夫斯基，还需要他率领部队进军柏林。

这样一来，1923年秋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布局首先取决于德国事态的发展。确切地说，取决于“德国十月”的胜利。这也将决定托洛茨基和“三驾马车”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在《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意见》里表达了总书记对临近事件的态度。

他看到的主要问题如下：

“应该在提纲中直接和明确地指出，德国的工人革命意味着法国和波兰（也许还有别的国家）有可能同德国开战，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封锁德国（不让从美国运进粮食等等），对此现在就应该拟定对策。这个问题在提纲中含糊不清。

“应当在提纲中明确和清楚地说明，德国发生革命和我们向德国人提供粮食、武器、人员等帮助，就意味着俄国将与波兰，也许还将与其他边境缓冲国爆发战争。因为，显而易见，不进行一场胜利的战争，至少战胜波兰，我们就不仅不能运去食品，而且也不能保持与德国的联系（期望德国发生工人革命时波兰会保持中立并让我们能够从波兰通道和立陶宛过境，就是在期望发生奇迹。关于拉脱维亚也应该是这样，更不要说英国了，它是不会允许我们从海上运输的）。我就不去说我方要给革命的德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其他理由了。如果我们想真正帮助德国人，而我们是愿意帮助也应当予以帮助的，我们就需要准备打仗，而且要认真和全面地准备，因为事情最终将关乎苏维埃联邦的存亡和近期世界革命的命运。这个问题在提纲中同样也是含糊不清的。”（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176、177 页）

没有，斯大林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行动，但他对《意见》充满着怀疑的态度。此外，他还指出，德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否能够守住政权还难以预料。

9月23日，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体会议批准了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即将发生的德国革命和俄共的任务》，还成立了政治局国际形势常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拉狄克、契切林、捷尔任斯基、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起义的时间定于11月9日，是德国十一月革命五周年的日子。还通过红色工会国际拨出100万金马克用于支持德国罢工的工人，并宣布组织募捐。

9月21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Γ.布兰德勒在莫斯科宣称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队伍已组织好、武装好。但是Э.台尔曼和Γ.埃伯利不同意他的乐观主义态度。

按照政治局的决议，开始为作战进行大规模的准备。以骑兵为主的几大兵团推



进到了苏波边境。一支准备派遣到德国的 2 万人的共产党员队伍在准备之中。当局拨出了大笔资金和 6000 万普特的粮食。贸易人民委员部必须通过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来建立一个 2 亿金卢布的额外基金。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由未来的德国人民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成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温施利希特、皮达可夫和 3 名契卡人员亚戈达、别尔津、彼得斯。拉狄克任共产国际全权总代表。也讨论了托洛茨基的候选资格,但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是的,这样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会影响行动的保密性的。

具有代表性的是,季诺维也夫任命了一个外号叫“托马斯”和“詹姆斯”的冒险家雅科夫·萨姆埃洛维奇·莱克来掌管德国革命的财务。经此人之手花掉了(或者说消失了)几百万马克。1924 年,斯大林开始与季诺维也夫争斗时还提到了这一事实。(引自:皮亚特尼茨基 B.，《历史天平上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明斯克,2004 年,第 14 页)

似乎,德国革命取得胜利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国内强烈的社会和民族的骚动、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的资金和人员、苏联红军作好了干预的准备。

但就连拉狄克本人都显得有些不满。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分子(按照俄国分类属孟什维克)有些顾虑,认为他们“剥夺了我们给予明确的、阶级性的坚定革命发展路线的可能性”。

“拉狄克对德国共产党是否适合承担领导者的角色抱有很大的疑虑。他害怕德共的高层过于软弱,无法形成足以控制革命情绪的组织圈子,而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正在高涨。拉狄克还担心,莫斯科那些倾向于每次革命都按俄国道路前进的同志们不能够下达符合德国局势的指令。在这一点上,他特别为那些从莫斯科过来的未来德国人民委员会委员们担心。他花很长时间谈了俄国工人文化程度较低,谈了这一情况对俄国共产党,甚至它的领导层的影响。”(别谢多夫斯基 Г.，《通往热月政变之路》，莫斯科,1997 年,第 90 页)

10 月底,拉狄克来到华沙,此后转至德国。他的出现惊动了德国人,德国驻俄国大使布罗克多夫-兰普伯爵要求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将其召回。契切林不知怎么办,要知道拉狄克是政府的成员,不能在他国从事反国家的活动。

共产国际的活动给契切林带来很多麻烦,这位不知所措的人民委员只好求助于政治局。

斯大林想出了一个拜占庭式的回应当答那位伯爵:在报纸上刊登一条消息,称拉狄克正在高加索治病,他还将在梯弗利斯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报告。

但是,斯大林的高招没起作用。德国共产党员是糟糕的秘密工作者,竟然把警察引到了这位“梯弗利斯报告人”的藏身之所。拉狄克不得不赶紧脱身。

第二十七章

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第一案

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第一案、希特勒的慕尼黑暴动、德国革命失败、红军留在了家里

对 1923 年的德国革命历史,存在一种观点,它解释了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上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为何能够如此反常地团结。

德国人在与占领了鲁尔的法国人对抗时,主动向莫斯科伸出手,建议保持两国的军事经济合作。

这只手被接受了,因为克里姆林宫正在为协约国可能发动新的武装干涉感到担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综合报告反映了这一可能性。法国把部队开进德国,也就更接近了苏联边境,这意味着,苏联军事处境恶化了。

所以,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并非忙着“输出革命”,而是与德国展开军事合作。若德、法和德、波之间爆发战争,那苏联红军与德国国防军将面临共同的敌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西克特上将以及受到他支持的总理 B. 古诺满怀期望地将东方看成唯一可能的盟友。

莫斯科却计划将军事行动变成革命战争,并支持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

但局势突然之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承受不住来自法国的压力和国内总罢工威胁的古诺内阁辞职,Г. 施特雷泽曼成为总理,并于 8 月 13 日与社会民主党人组建了联合政府。一般谈到斯大林及其对德政策时,都会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总书记个



人一念之间的好恶,对德关系在斯大林的全球政策中并不是占第一位,甚至不是第二位的。正如劳合·乔治回应俄国侨民批评英国与苏联签订贸易协定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可以与食人野兽做买卖。”

所以,如果不去考虑那时能够作出重要决定的德国领导人的立场,就很难去理解“德国的十月”。这首先当然是看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西克特的立场。

在配备了坦克和重炮的法国部队进入鲁尔后,德国主要是靠军队做了些抵抗。德国人制定了武装抵抗的计划,打算由著名实业家弗里茨·蒂森和冯·沃尔特将军的志愿部队来实施这个计划。

这或多或少意味着要与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开战了。而对这场战争,德国的军队并未做好准备。

不过德国人并不愿意投降。西克特对各方的政治立场进行了试探后,开始清楚哪些力量是他可以依靠的。他和鲁登道夫,甚至和希特勒都进行了会面。鲁登道夫答应若战争爆发将出任最高统帅。3月11日,西克特与希特勒会谈,这次见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希特勒对德国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职务的觊觎让他有所警觉。但不管怎么说,在纳粹分子通过国会进入国家政权10年前的1923年,军队领导和这位未来元首的这次接触见证了德国军方精英情绪的深刻变化。希特勒向冯·西克特保证,如果与法国发生武装冲突,他的CA部队(军事化组织“冲锋队”)将予以援手。

在德国,空气中弥漫着军事政变的前兆。但是,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出任总理一职和他用和平手段协调与法国矛盾的方针似乎止住了德国陷入政变的泥潭中。

结果,整个局势发生了转变。11月8日,希特勒在充满分裂主义情绪的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宣布实施国家社会主义专政。鲁登道夫从他手中接过了国家军队的指挥权,慕尼黑步兵军官学校发动起义并宣布转到希特勒一方。

11月8日晚,德国总统和内阁总理把一切大权交给西克特。后者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被查禁,叛乱被扑灭。

但这正是必须特别注意的。“西克特向自己的副官坦言,如果那些被他开除出军队的、参与了造反的青年军官都袖手旁观,‘他就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格尔利茨B.，《德国总参谋部》，第234页)换句话说,这位将军意识到了民族抵抗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军方继续支持德国与苏联结盟,而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则主张与西方结盟。德国国内的分裂状态已经非常明显了。

原先的“东方”政策现在变成了寻求与法国达成协议。尽管国防军的领导层表示反对,但政府还是给驻莫斯科大使馆下令暂停正在进行的军事政治谈判,谈判范围仅限于经济问题。

“特洛伊战马”终于散架了。

但是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威胁仍未消除。相反地，国家政治保卫局称，这种危险反而增加了。

所以苏联支持德国革命的方针得到延续，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计划中，那些富有爱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将会成为共产党人的盟友，特别激进地代表着他们利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那时还不可能预料到国家社会主义后来的蜕变）。1923年，极端对立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似乎可以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

但是，德国人走了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党人的道路，并成功避免了大动荡。苏联的“输出革命”令人失望地结束了。

拉狄克担心的事件还是发生了：德国无产阶级没有发动起义。工人们仅仅在汉堡进行了巷战。

那时的战争气氛可以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窥见一斑：

10月5日。星期五。

第一，政治事件。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被彻底粉碎，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过境逃往南斯拉夫。逃跑的人中有他们的头头科拉罗夫和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政府（赞可夫政府）要求引渡他们。据绝对准确的消息，断送这些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因为这些起义者肯定是布尔什维克）的是弗兰格尔和他的部队……

《消息报》发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社论说，到处都不安定，白卫军分子又有了搞武装干涉的念头。托洛茨基给西西伯利亚军区炮兵部队的信说得更生动。信中他直白地说，若发生那种情况，‘他就指望着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委们了’……

10月18日。星期四。夜。

现在已毫无疑问，我们处于波澜壮阔、很可能是十分沉重的事变的前夜。空气中笼罩着“战争”二字。第二天，整个莫斯科到处都张贴了征召青年人入伍的命令（最近一次是在1898年）。这里指的是“地方民兵的招募”。这虽然是临时性的，带有训练性质的，但还是引发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传闻和对骚乱的担忧……

事件的关键就在于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波兰也掀起了骚动。德国的巴伐利亚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中心，而萨克森成为共产主义的中心。哦，当然，那根本谈不上是我们的这种共产主义，不过萨克森政府中有三位共产党员部长：黑柯尔特、布兰德勒和别特赫。《消息报》用了“流血冲突”等标题。马克暴跌。几天前说1美金可换数十亿马克！今天没有收到关于马克的电报，也许涨了一点。

根据《消息报》的报道，波兰栋布罗瓦地区爆发的矿工罢工已经扩散到了全国。当局采用恐怖手段对付工人组织等等。



也许,这个世界的确处于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总决战的前夜。

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第一步将发生布尔什维克与波兰的战争。(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叶莲娜·布尔加科娃,《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日记》,莫斯科,2001年,第30、31页)

在德国试图发动革命的同时,波兰的克拉科夫省也发动了工人起义。在巷战中,他们击溃了骑兵团,解除了整个克拉科夫驻防部队的武装,缴获几万支步枪、加农炮和机枪。波兰处于国内战争的边缘。但铁路工人的罢工阻碍了总起义的举行。结果,克拉科夫起义仅局限于提出了经济要求,此后起义便平息了下去。

1923年9月,保加利亚也发生了“九月起义”,起义同样以失败告终。而且,白卫军侨民积极参与了这次镇压。

总的说来,这是共产国际的惨重失败。这一失败结束了这个遍地烽火的时代,同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得以保全了。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不信任德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托洛茨基主张在德国动用红军部队,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他认为他们“胆怯了”,不敢派红军骑兵打开突破口。

事实上,尽管政治局通过了向德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八月决议,但很明显,某个非常有影响的人一直在阻挠此事。

这人是谁?既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托洛茨基。看来,正是斯大林是不动用红军的倡议者。因为,如果他认为应该是另一种情况,那么他是有足够的分量让苏联军团越过波兰边境进入东普鲁士的。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他呢?

除了德国政府政策本身的变化之外,原因在于对无法控制的军事行动的担忧。

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情况,中央委员会开始调查图哈切夫斯基一案,并且继续对西方面军指挥人员进行撤换。图哈切夫斯基的对手、前第5独立集团军司令员И.乌博列维奇被任命为他的副手。虽然对图哈切夫斯基没有采取任何处罚措施,他的“罪孽”(他的女人们利用在斯摩棱斯克的父母的领地)也微不足道,但高层领导对他身边人的注意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这意味着,领头的“三驾马车”对自己信心不足,不知道如何在军界加强自己的地位,以至在即将来临的权力决战(在所期待的列宁去世之后)前夕做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举动。

8月28日,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决定将几个反对托洛茨基的中央委员纳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托洛茨基现在成了少数派。在这些被推荐进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选中就有斯大林,这样托洛茨基不可能再有什么幻想了。当然,托洛茨基挡回

了这个决定，但这对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骑兵第1集团军被解散就极具代表性。

为什么政治领导层要走这一步，不太清楚。或是为了提防布琼尼，或是不得不对斯大林过去的勇士们一刀切？

如果考虑到战争威胁正日益逼近，那么作出这样的变动必须具备非常严肃的理由。

必须注意到，在白卫军移民内部将布琼尼，还有图哈切夫斯基，称为阴谋的可能的领导者。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三驾马车”在为发生重大事件做着准备，预防出现意外的不测。

苏维埃俄国军队第一次承担起了本不属于它的政治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是否符合实际或仅仅是强加于它，好像并不重要。反对尼古拉二世和彼得格勒预备兵营的军事密谋此时还记忆犹新，它们恰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力量基础。

总体说来，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从士兵叛乱、近卫军政变到1991年推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未果的尝试，可以说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军队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有时，为追求高尚的理想，军队进行了破坏性的行动，如在1915年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与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的那场冲突中就是这样。那场争斗的结果是被军事情报机关逮捕并被军事法庭按间谍罪处以绞刑的米亚索耶多夫上校（而事实上他是无辜的）成了贪赃枉法的沙皇政权的一个象征。而苏霍姆利诺夫被免职，这也是军人的功劳。但这件事给社会舆论造成了这样的影响，使它不久以后成为古契科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为反对皇权进行密谋的道德依据。也就是军人们放出了一只吞食一切的猛兽，而自己也深受其害。

政治局也完全有理由估计到，图哈切夫斯基会成为“红色将领们”的首领，这些将领赞同与主张世界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参与世界革命。

况且，此刻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热血尚未冷却。

1924年2月28日，俄国民族委员会白俄移民会议的一份记录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能够反映出当时克里姆林宫高层局势的画面：

“A. И. 古契科夫关于来自俄国的信息的通报。可以断言，分裂巨大且无法挽救，除了采取暴力政变之外没有任何出路。政变只可能是军事政变，或者是宫廷范围内的，或者在更大的范围。这个政权本身太脆弱，不可避免要被推翻。取而代之的将是红色专政，而典型人物就是在斯摩棱斯克的图哈切夫斯基。据一位德国消息灵通人士的情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在群众中有很大的感召力。一段时间之前，他受到猜疑并被召回莫斯科。当局打算给他一个有荣誉但没有影响力的职位。

“他拒绝应召回去。在斯摩棱斯克，反共产党人和反犹太人的情绪很大。在驻防



军里进行着公开的宣传工作(最符合俄国切身利益的,是李可夫、克拉辛、索柯里尼柯夫集团。托洛茨基可能会加入其中。李可夫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德国人对俄国局势的评估最近发生了改变。过去他们相信会慢慢演变,而现在他们认为如果有什么不可避免的,那多半是军事政变。所指之人还是图哈切夫斯基。他们不去预测谁将注定接管大权,只认为苏维埃政权将面临完全的经济崩溃。随着权力中枢的弱化,民众将骚动起来。

“但权力中枢仍然是很强势的,现在说它要瓦解还为时过早。甚至托洛茨基对它也构不成威胁。军队里可疑分子已被消灭了。”(引自:季亚科夫 Ю.、布舒耶娃 Т.,《法西斯之剑在苏联打造》,莫斯科,1992年,第57页)

斯大林及其盟友选择不冒险,在最后一刻踩了刹车。尽管按惯性,这辆共产主义装甲车还将长期沿着“全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方向行驶,但在它的指挥员之中走另一条道路的思想已开始酝酿。

苏联领导层斗争的决胜阶段已为期不远了。

第二十八章

新经济政策反对工业

新经济政策是反工业的、托洛茨基
呼吁保护工业、军队威胁要干预、在政府
机关中进行清洗

新经济政策是浪漫而残酷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农民利益方向让步的一次不得已的转变。首先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和罗斯托夫等城郊开始，全国各地富裕起来，向市场供应产品，总体上能感觉到不符合共产主义理论的经济规律已经发挥作用。但是，农民越是远离破产，工业生产就越是接近灾难。

在维特时期就有的被称为“内部殖民”，即从农村抽取资金的过程几乎中断了。

可是除了从农村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得到发展所需的资金。所以，养活了城市并解决了一个难题的新经济政策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1922年，农产品收成达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一年之后又是个大丰收。但与此同时，因各大小工厂拨款不足导致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而农业的快速增长又大大降低了农产品价格。托洛茨基将这种脱节称为“价格剪刀差”。

工业商品短缺且价格昂贵，而只能以低价卖出粮食的农民们无法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农民们并不需要重工业。表现在耕地面积增加、经济作物（大麻、向日葵、油菜）恢复、牲畜头数增加方面的农村经济的增长只是满足了经济的局部需要。对于这种倾斜应该做点什么事。1923年夏秋时节，在准备“德国十月”的同时，苏联领导层还遇到了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



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实行“超级工业化”，即优先发展工业。而“三驾马车”并不认为可以停止对农民的支持。

但是，以农业生产逐步提高为基础的经济自然增长是没有丝毫希望在与西方国家竞争中胜出的。

“三驾马车”也不是对托洛茨基的意见置若罔闻，但想要和这个农业国再进行一场新的斗争暂时还没有这个可能性。要知道《土地法典》才通过，局势就开始稳定。对于将4年时间花在战争上的6岁的新生政权，这已经是较大的成就了，也在较大程度上完成了革命的既定目标。

苏联领导人正处于十字路口。他们经受住了反对帝制的斗争、三次革命、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但前途是完全不清楚的。

承担着在斗争中为人民谋取幸福使命的党的高层还没能意识到，当他们成为开创新生活的人间上帝之后，他们就没有权利停滞不前了。

即使在处于和平环境下的斯托雷平都未能以其改革战胜封建贵族精英，现在党的高层就更无哪怕一点点正常推动的机会了。

但只能前进！没有其他路可走。

从1923年8月到12月，全国共爆发了213起罢工，其中莫斯科有51起。工人们的政治倾向开始令人担忧。同时农村再一次出现人口过剩，这种曾是十月革命导火索的潜在失业给当局造成很大压力，必须尽快解决。

空气中都能嗅到一种说不出的革命并未彻底完成的感觉。波尔塔瓦省的一位区契卡人员说：“我们确信，我们的敌人认为苏维埃政权会投降的妄想很快就会消失，在战无不胜的共产主义战略面前，他们脸上愉快的窃笑将变成一副受惊的野兽般恐惧的丑相。”（引自：莫佐欣 O.，《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之剑》，莫斯科，2004年，第23页）

但是为什么“窃笑”会消失呢？

为此，党内及更大范围内，在军队和工人中，需要有一个有判断力的群体。

工人的不满迫使克里姆林宫寻求新的出路，但对军队的控制一分钟也不能放松。

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决定向“三驾马车”发起进攻。1923年10月8日，他致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指责党的官僚层应对已经出现的危机负责，因为他们还在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行事，领导层里“形成了文牍主义心态”，选拔出来的干部不在行，必须终止这种“文牍主义的官僚作风”。

不难看出，托洛茨基的指责其实就是向工人和党员发出的直接宣言，正是他们应该了解谁才是他们的保护人。此外，他还谈到了制订高质量规划的必要性，实际上是提议自己担任这项工作组织者的角色。

托洛茨基没有忘记将自己的对手列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宣称这对于中央

委员会来说就是一个“文牍主义心态”的实例。

“三驾马车”能作何回应呢？

紧随其后的是 E.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封批评当前政策的信件。至 10 月 15 日，有 46 位著名的党员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十月革命的最著名的参加者布勃诺夫、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皮达可夫和穆拉洛夫。

这封信向党表明，党的领导层内的原则性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局势的异常严重性迫使我们（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公开向你们声明，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灾难。今年 7 月底开始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及由此产生的全部的包括党内的政治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党内关系方面，党领导层是不称职的。”（《苏共中央通报》，1990 年，第 6 期，第 189 页）

如果考虑到托洛茨基掌握着军队的控制权（尽管不是全部的），那么他的拥护者对广大党员群众的号召应该算是给了他一张决胜的王牌。

1923 年 10 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压倒多数（102 票支持对 2 票反对，10 票弃权）谴责了托洛茨基和 46 位签名人的行为。

在中央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回信中直截了当地说道：

……托洛茨基同志的一切不满、一切愤慨、已经持续几年的反对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言行，以及他动摇党的决心，这一切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即托洛茨基同志想让中央委员会委任他和科列加耶夫同志来领导我们的经济生活。列宁同志为反对这个任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且我们认为他是完全正确的。

托洛茨基同志是人民委员会委员，也是改组后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列宁同志还建议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在这些职位上，如果他愿意的话，托洛茨基同志本可以用工作向全党证明自己的能力，使党可以把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也是他在力争的无限全权托付给他。但托洛茨基同志更乐于选择另一种行动方式，一种在我们看来与对党员职责的通常理解不相容的方式。不管是列宁同志直接领导的时候，还是离开工作岗位之后，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他一次也没有给不管是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过任何经济、财政、预算等方面的建议。他断然拒绝担任列宁同志副手一职。看来，他认为这降低了他的身份。他按照“要么全部，要么什么也不要”的信条行事。在党面前，托洛茨基同志事实上把自己摆在了这样一个位置：要么党授予他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实际上的独裁权，要么他就拒绝参与经济领域的工作，仅保留经常不断地扰乱中央委员会繁重事务的权力。（《苏共中央通报》，1990 年，第 7 期，第 179 页）



12月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红普列斯尼亚区的党员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上回答问题时指出:“十月全会面对的问题是,超越一定的辩论界限,就意味着建立派别,意味着分裂政府。而分裂政府就意味着毁灭苏维埃政权。”(《苏共中央通报》,1990,第12期,第165页)。

但是这个全会的决议是不公开的。所以,12月8日,(按托洛茨基的说法)政治局做出决议,指出斯大林将文件公之于众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不得不同意这一意见,因为托洛茨基的确抓住了他的话柄,于是就请政治局就斯大林是否有权“向党员们讲述我信中的内容”做出决定。(《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67页)

如果斯大林此时不想办法给予对手迎头反击,那他就不是斯大林了。就在12月8日那个政治局会议上,他声称自己“是迫于谣言的压力才这么做的,党内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和破坏分子在党员中大肆散布损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威信的谣言”。按斯大林的说法,有流言称托洛茨基因要求党内民主遭到监禁;而事实上,尽管中央委员会下了禁令,但托洛茨基和46位签名人的信件还是在党员里广泛流传。

所有这一切“造成一种假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害怕说出实情,他们问心有愧”。(《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67、168页)

在形式上,斯大林的确不对,因为他违反了禁令。但他是在按照政治斗争规律的本质防止托洛茨基的声明传向“街头”,即传向青年人、军队和普通党员。

托洛茨基想越过同事们,获得党对这种大规模对抗的道义上的准许。这个威胁有多么严重,从季诺维也夫在那次会议上写给斯大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的便函中可见一斑:

他们完全是按照派别技巧的全部规则在行动。如果我们不立刻组建起自己的真正团结一致派别,一切就完了。

我建议做出这个决定是首要的。我建议明天(星期日)就此问题专门开会,可以到斯大林的郊外住地,也可以到我这儿来。

延误就是灭亡。

Г. 季诺维也夫。(《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68页)

所有收到这张便函的人都同意“延误就是灭亡”的观点,并一致同意利用礼拜天在小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星期日,托洛茨基又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坚决主张“严厉、明确地谴责党的机关内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要求党的方针“向工人民主的方向”转变。他没有打算让步。相反,他的对手们只能被迫迂回应对。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冲突扩大了。

12月11日,《真理报》刊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新方针》。读了这篇文章的布哈林认为这如同一份“宣战书”,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可以随便怎样批评全党和它的最高机关,但即便是打着批判传统的幌子也不能损害我们党的根本基石。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H. 布哈林。”(《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74页)

也是在12月11日,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递交了一封极其严肃的报警信,信中引用了一位年轻军人的发言:“我们军人对中央委员会同样咬牙切齿,我们将证明我们能够消灭自己内部的老一套形式主义,能够废除任何委派制。”(《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71页)

雅罗斯拉夫斯基警告党,危险正在逼近。

12月14日,“三驾马车”召集了10个莫斯科市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开会,以支持政治局多数派的立场。但事先发表的《八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声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和托姆斯基),语气似乎分成了劝告和控诉两部分。

《声明》的作者们说:托洛茨基不懂经济问题;他会将国家推入军事冒险;他不了解党内生活;他低估了农民阶级的作用;他丢开了由最优秀的“军方的中央委员们”管理的军事工作。而最主要的是:“如果党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实行党内民主,那么党就会分裂,就会变成某种类似第二国际的孟什维克党,分化成各种联盟、团体和派系。”(《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79页)

紧接着,意想不到的,他们寄希望于托洛茨基同志能够改变立场。

政治局这种明显的立场的双重性,原因很简单。12月中旬,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发出警告称,大部分地方党组织的大多数党员不支持中央委员会,军队里也存在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据巴扎诺夫证实:斯大林解决了部分问题,手段虽不光彩,但很有成效。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斯大林在做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发言之后声明:“我认为,党内由谁来投票和怎样投票完全无关紧要;而由谁来计票和怎样计票,这就极为重要了。”

第二天,斯大林将纳扎列强叫到自己办公室并与之商量了很久。纳扎列强走出办公室时一脸闷闷不乐,不过他是一个相当顺从的人。同一天,根据组织局的决议,他被任命为《真理报》党务处主任,并于当天走马上任。

《真理报》通常会收到党的各级组织会议和表决结果的报告,特别是莫斯科地区的党组织。纳扎列强的工作很简单,譬如说,某个支部会议上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投票表决,支持的有300人,反对的有600,那么纳扎列强就做点改动:赞成中央委员会



的有 600 票,而反对票为 300,并登载在《真理报》上。对所有的组织都是这样操作的。当然,看到《真理报》上对投票结果虚假报道的那个党支部会抗议,会打电话到《真理报》,打到党务处。这时纳扎列强会有礼貌地应答,并允诺立刻核查;然后根据核查结果答复说:“您完全正确,出现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印刷厂搞错了。您知道,他们工作是超负荷的;《真理报》编辑部向您表示道歉,会刊登修正声明。”每一个支部都认为这是唯一的,只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错误,并不知道大多数党支部都经历了此事。这样就逐渐造成了这么一种普遍的局面,好像中央委员会开始全线获得胜利。地方各省变得谨慎起来,开始跟随莫斯科,即支持中央委员会。(巴扎诺夫 Б.,《一个前斯大林秘书的回忆录》,圣彼得堡,1992 年,第 76、77 页)

这里明显表露出斯大林天生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后来被称为“实用主义”。虽然在这个特性中能够找到对彼得大帝的坚定不移和不拘小节、涅恰耶夫的革命传教精神和列宁对时局转变作出快速反应的天才经验的传承。如果确实“宣了战”,而且“延误就是灭亡”,那么斯大林的这种解决办法应该认为是情有可原的。在战争中,对待敌人的道德标准,完全是人为规定的东西。

让我们摘录一段引文来证明道德评判的标准是变幻莫测的,这段引文实际上也对斯大林明显的权术做了辩解:“夸大的假象破灭了,廉价的粉饰剥落了,夸夸其谈的道德力量发觉自己有点儿傻里傻气,无能为力了,完蛋了!”

这是托洛茨基关于 1918 年 1 月 5 日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时的一段讲话(托洛茨基 Л.,《俄国革命史》,莫斯科,1990 年,第 212 页)。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传统道德的蔑视。

其实,如果仅听信背叛者巴扎诺夫的回忆录,未免过于天真了。除了采取这种“真理报式”的动作之外,斯大林还把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 Л. 卡冈诺维奇派到莫斯科市委去与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作斗争。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卡冈诺维奇承担了莫斯科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工作。

斯大林这个时期的想法之一是吸收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参与到对更高层次的企业和托拉斯事务的讨论中来。这样一来,“自下而上的批评”针对的就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更贴近和更能被普通共产党员理解的经济问题了。

斯大林抓住了这个新的领域,并通过向群众呼吁来对抗对手采用的党内小圈子的手段。这一策略间接触动了一些老党员,因为他们革命先驱者的角色开始被弱化。不过他们被激烈的辩论吸引住了,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危险。

党内论战的结果,托洛茨基给了“三驾马车”沉重打击,但未能实现党内的政变。他离领导全国仅差一步之遥。

1923 年 12 月 27 日,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 B. 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给政治局写了

一封带威胁的信：“我们将呼吁穿着红军制服的农民群众一起要求冒进的领袖们恢复秩序。”他承认：“在军队的共产党员中已经流传这么一种说法，说应该同心协力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3期，第207、208页）

军事局势确实是非常紧张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 H. 穆拉洛夫是支持托洛茨基的。

苏联空军管理总局、工农红军参谋部、工农红军军事教育院校管理总局和部分特种部队的党支部均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

这显然是与政治局的路线相对立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都未曾产生过用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的念头那才是反常的。时至今日，有一个问题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莫斯科盛传的军事政变并未发生。官方的说法是：托洛茨基生病了，打猎时得了严重感冒。

但根据最新的研究，是不想支持托洛茨基的图哈切夫斯基阻止了这场“宫廷政变”。

“这样一来，Л. 托洛茨基‘陨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斗争，放弃了在斗争中运用由他指挥的像红军这样的有力工具。想必，各主要军区的司令员，首先是西方面军司令员 M. 图哈切夫斯基，像这样一些军方精英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提醒一下，早在1923年3月，И. 季拉克托尔斯基上校就提到过关于广为流传的 Л. 托洛茨基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信和巨大影响的虚假印象，相反，‘潮流’是倾向 M. 图哈切夫斯基这边的。再加上有关领导着‘在红军中谋反’的‘图哈切夫斯基集团’具有‘反犹太人’和‘反托洛茨基’倾向的消息，有关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 B. 吉蒂斯和高加索独立集团军司令员 A. 叶戈罗夫参与‘谋反’的消息，有关 И. 乌博列维奇的立场，还有 Л. 托洛茨基与乌克兰军区司令员 M. 伏龙芝之间众所周知的不和等消息，我们可以得出确实存在使托洛茨基寸步难行的‘将领们的谋反’这样一个结论。

“以上提到的‘革命将领们’的立场实际上让 Л. 托洛茨基丧失了把红军当作政治斗争工具的可能性。这样，可以说 M. 图哈切夫斯基事实上成功地实现了自己‘集团’的政治目的，实现了‘在红军中谋反’——打倒 Л. 托洛茨基。能够判断出自己败局的‘红军领袖’本人，在这样的军事政治形势下，宁愿借口个人有病而‘离开战场’”。（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莫斯科，2004年，第311页）

1924年1月14日至15日，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党内辩论的结果。“三驾马车”获得胜利。此外，全会还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检查红军的状况”。军事委员会由斯大林的拥护者古谢夫（德拉布金）挂帅，成员包括伏罗希洛夫、伏龙芝、温施利希特、安德烈耶夫和什维尔尼克。

1月14日，托洛茨基的坚定拥护者、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 C. 姆拉奇科夫斯基被解除职务。

紧接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会上斯大林做了关于



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安东诺夫-奥弗申科被免去了军队政治部主任一职。

从斯大林的报告中可以对不远的将来做个预测,前景将是不容乐观,甚至是艰难的。总书记注意到,计有百万人且主要是由各异党代表组成的官僚政府机关,对人数少得多(约3万人)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党的机构构成了很大的压力。斯大林的结论是,在这种条件下民主远非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实行。他还公布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秘密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搞派别活动者可以被开除出党。最后,斯大林说了一段长期决定了国家未来,但同时也引爆了全国范围灾难的话:

“托洛茨基硬说,小集团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没有官僚主义制度,也就不会有小集团了。同志们,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我们这里之所以有小集团出现,而且将来还会有小集团出现,是因为我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从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到中世纪的形式,这是第一。其次,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容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容许私人资本及其相应思想的存在,这种思想也渗入到党内来了,这是第二。第三,因为我们党内有三种成分,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小集团的原因,这些小集团我们有时应当用外科手术来切除,有时却应当通过争论从思想方面来消除。

“这里问题不在于制度。如果我们有极端自由的制度,那么小集团就会多得多。因此,罪过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在于我们国家现有的环境,在于党本身发展的环境。”(斯大林斯 II,《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页)

这里值得提醒的是,斯大林在报告里批判地评价了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结伙”的冯·西克特。针对德国社会妥协的这个抨击并不是偶然的。

总之,因为社会的多成分性和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集团,那么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动用“外科”手术刀了。

全场向斯大林鼓掌。对于经历了革命和国内战争(正是由这一代人领导的)的这些党员来说,他的话里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他们明白了,重重光环下的托洛茨基只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斯大林报告中的说法),而他号召的把党的积极分子交给青年学生惩治的民主,不过是企图欺骗大家。(看来,这里要提一下中国毛泽东所进行的“文化革命”。)

但是,如果运用我们的历史知识去分析党领导层内部的斗争,就应该想起马克思的一个关键思想:任务不在于去解释世界,而在于去改造它。

这些给斯大林鼓掌的人没有料到,他们这个组合在一起的团队对改制问题会存在本质的分歧。

他们是革命暴力(“历史的接生婆”)的辩护者,他们不曾想到,但很快会见到,伟大的十月革命会在胜利者内部重复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对抗。外科手术刀的形象没让

他们想到断头台上的大砍刀。他们是文明勇士和黑暗势力大决战的参与者。

斯大林对影响着党的政治的主要社会团体所采取的手段,第一步就是将“社会有害分子”赶出莫斯科和各大城市,驱逐到北方的拘留营或流放地。从1923年12月到1924年3月15日,莫斯科共有2092人被捕。此外,包括人民委员在内的各人民委员部和各委员会工作人员均受到审查。

工作人员的免职由法庭和党内审判讨论决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了一个经济管理处,以承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指派的与“新经济政策的尘垢”作斗争的专门任务。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捷尔任斯基是党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基础”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党的战士。新经济政策并未终止,但受到监控。

第二十九章 列宁之死

列宁之死、新领袖的成人仪式、斯大林再次当选总书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不喜欢布尔什维克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1月21日,列宁去世。就在逝世之前,1月19日至20日,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决议中谴责了“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宣告托洛茨基的“新方针”为“分裂宣言”,而反对派的立场是“小资产阶级倾向”。

很难确定能否把此决议的宣读和列宁的第4次中风联系在一起,但事情发生的顺序正是这样。

列宁的去世合上了这个苏维埃国家里列宁历史时期的短暂一页。从此开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谁都说不清楚。

托洛茨基没有出现在葬礼上。原定按东正教传统在第三天安葬,但后来因为前来吊唁的人太多就推迟了下葬。没想到会这样的斯大林事先曾打电话给在苏呼米治病的托洛茨基,告诉他就留在原地,因为反正是来不及赶到了。

托洛茨基于是留了下来。但当得知葬礼被推迟之后,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故意欺骗了他,好不让对手出现在葬礼上。

尽管托洛茨基的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但后来他的这个指责常被用来印证斯大林的阴险。

1月26日,在大剧院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的发言成了这位新领袖成人仪式的重要一部分。索索·朱加施维里毕竟在神学院学过布道术,其语言具有经典演说的一切特征,并带有强烈的情感。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这个党的党员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的。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人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同时也称为工人阶级的党。”(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6页)

这个以6次重复(“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的发言表达出这一刻的悲痛和沉重。斯大林归纳了列宁标志性遗嘱的重点:保持党员称号的纯洁性,保持党的统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和扩大苏维埃联盟,巩固和扩大全世界劳动者联盟——共产国际。

这篇简短的发言里表明了党和国家的战略,而斯大林实际上已成为已故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其实用这篇发言否决了列宁“关于总书记”的那封信,使之成为过去。

随着列宁的离去,托洛茨基的作用和机会降低了。国家各个领域都开始了干部的重新调整。

此前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А. И. 李可夫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对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所有经济部门的人民委员部均归它管辖,由加米涅夫领导。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保留了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职位。

这些调整使政府领导人的地位下降,同时加强了执法机关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性格平和、善于施政治国的李可夫有一个特点,爱喝酒。

进入了经济决策圈的“三驾马车”成员之一加米涅夫并不是斯大林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不热衷于权力,既不搞阴谋,也不要花招。

因此,“三驾马车”内部的均衡不易觉察地发生了变化,这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会是一个相互争斗的新阶段。

而现阶段,在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之后,大批的“机床工人”被吸收入党,并将之称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1924年初,党员人数只有30万左右。而这新一轮的吸收一下子就增加了24万,同时导致了其成分的质变。如果说列宁看到的党是一支修养有素的队伍,那么这种向群众性政党的转变就使其性质发生了巨变。

但如果断言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有明显的界线,那是不正



确的。这个时期,各苏维埃机关中有 53%的党员,而红军中只有 27%。

党成为执政党并且不断地将越来越多的新人吸收进来,因而越来越陷入大众(不高)文化的层次里。

如果说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经济实力足够保证它迈进共产主义,缺乏的是共产党员管理者的文化程度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时并未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的批评者完全有理由在这过渡到群众性政党的进程中,看到新哲学的特征。

“很自然,越是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革命党,它就越是被更多地被西方的政党理论所冲刷,就越是接近群众的思想认知、神话传说和民俗文化。这一点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列宁神圣地维护着一个小规模的政党,这使得一些常用抽象概念和抽象范畴来表达的精英思想得以保持。他的去世号召了国家相当一部分人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追求最高真理之中,其表现就是有大批的人入了党。斯大林组织了所谓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就把党员的人员组成猛然推向了传统的另一端。这个更新过的党的群众意识得到充实,这种群众意识排斥了抽象思维的能力,转变了原先党内占主导的适中观念,消除了保留下来的浪漫主义成分,为实用主义铺好道路,为实行极权主义和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阿希耶泽尔 A.，《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意义》，新西伯利亚,2002年,第 53、54 页)

但除此以外,如果不是从克里姆林宫或者老广场的角度,而从某个工厂的党支部看这个情况,那么“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意味着承认党和它的领导层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现在,掌握基层权力的是那些用传统的“正义与公平”来衡量世界,而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衡量的人们。这些人曾通过各苏维埃组织和工厂委员会参与了管理,但这种管理体系被证明效率不高,而现在,他们大量涌到这条新开辟的以党治国的道路上来了。

我们要提醒一下,农村村社的思想意识一般禁锢于自身利益的小圈子里,将国家政权视为一种敌对力量。根据这种认识,布尔什维克摧毁了旧的国家体制的基础,并用同样的这些人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但在国家建设中采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失败,而世界革命的思想差点导致战争的失败。

因此,现在需要新的思想,新的领导人,党的高层也正进行着这方面的探索。列宁去世不过是划出了一条转向不同时期的界线。

按照自己内部的规律性,调动了群众空前积极性的布尔什维主义,必须找到一个与这样的群众相适合的领袖。一方面,人口过剩的俄罗斯农村不仅孕育出了像叶尔马克或叶罗费·哈巴罗夫这样的无畏的发现新土地的勇士,而且还从被斯托雷平未完成的改革激发起来的农民群众中产生了“红色领袖们”和“红色波拿巴们”。另一方

面,这些留在原地的居民中的生产者要求恢复秩序和巩固政权。

这两种趋势的对立也就决定了由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基于俄罗斯“普世精神”和犹太救世主说的共产主义的浪漫主义,遭到了来自内部的阻力。

最终,这种内部的阻力推出了斯大林这个名字,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更有才华或者更有学问的竞争者,只不过是更符合已经形成的现实规则。

也许,大家还能想起那场约瑟夫·沃洛茨基与尼尔·索尔斯基这两位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之间因确立教会发展定向标而进行的不妥协的争斗。此外,在1504年教会会议上,约瑟夫·沃洛茨基在对“犹太异端邪说”的揭露过程中,造成了让几个异教徒被处烧死的结果。“一些被判了死刑的异教徒声称自己悔过了,但他们的忏悔没有被接受,因为约瑟夫认为,恐惧之下的被迫悔过是不诚实的。”(索洛维约夫 C.，《从古至今的俄国史》,莫斯科,1989年,第5卷,第186页)

沃洛茨基强化修道物质生活基础的道路,决定了此后几个世纪的教会政策。

回忆了16世纪的那场冲突,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传统可能给我们的这位原梯弗里斯神学院学生的政治理念造成的重大影响。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初,投向斯大林喜爱的安东·契诃夫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社会宗教信仰的断裂,我们会得出作家的这样一个想法,一个乍一看有些不高尚的想法:“电灯比道德更重要。”但把这些话与遭到瓦解的贵族帝国的现实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弄明白这些作品的真正意义。

总之,对列宁去世后俄罗斯1924年的实际情况需要重新认识。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定于5月底召开。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将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等已故者的最后一批文献移交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并要求将这些文献作为列宁遗嘱予以公开。

就像秋天的那场辩论一样,克鲁普斯卡娅现在是作为托洛茨基的保护人出现的,也就是说,她做好了再一次向斯大林进攻的准备。如果斯大林不是盲目自信,他就会明白,辞世的领袖不希望把权力交给他。

但列宁已成为过去。

5月18日,中央委员会的列宁文献征集委员会决定将克鲁普斯卡娅呈交的文件通告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签署这份决议的有季诺维也夫、斯米尔诺夫、加里宁、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决议对代表大会代表了解列宁的这些文件没有做出任何限制。

5月21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决定“按各代表团”宣读“该信”,也就是说不在全体会议上进行宣读。这明显限制了这些文件的广泛传播,它们就像被盖上了“仅供党内使用”的标签。

关于代表们是如何讨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以下几份文件给了我们详尽的



展示：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伏尔加河流域和中部工业区代表会议决议。1924年5月25日。

在了解了 В. И. 列宁的札记后，伏尔加河流域和中部工业区代表会议认为：

1. В. И. 列宁对一些人作出评价的信，在那个时候，即 В. И. 列宁生病写信时党所处的形势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2. 在对个人的评价方面，党过去的工作经验，特别是通过党内争论表明，除了托洛茨基之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完全正确地主导了党的政策，并使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3. В. И. 列宁对党的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因其性格原因可能不当行使自己权力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

4. 鉴于党已按 В. И. 列宁的指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扩大了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鉴于党已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吸收了新党员入党，鉴于党已通过党内争论使党更团结并避免了 В. И. 列宁所关注的危险的发生，党目前的状况要求中央委员会内部要以列宁主义为基础无条件团结一致。

5. 这封对个人进行评价的信不论是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还是在报刊上，或是在党内都不应该进一步公开。

这次会议共有 107 位代表出席。会议主席菲利普·戈洛谢金和下哥罗德代表团主席 H. 乌格拉诺夫签署了该会议纪要。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巴什基尔和维亚特卡代表团联合会议纪要。

拉舍维奇同志当选会议主席，并宣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些未公开的书信。

参加讨论的有：马卡罗夫、扎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哈里托诺夫、拉舍维奇等同志。

交换过意见之后，对库比亚克同志起草的决议(意向)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决议案的第一条，除一票弃权外一致通过。

第二条，全票通过。

否决了提交的个别修正案。

决议。

在了解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公开的札记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巴什基尔和维亚特卡代表团联合会议经过交换意见作出如下决议：

1) 认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过去一年所奉行的党内路线是正确的，并将力求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及今后的时间里，在继承传统的列宁策略精髓的基础上保障党的坚强领导。

2) 我们注意到，尽管斯大林同志存在着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的不足，但他比任何人都好地完成了在伊里奇不在的情况下落到总书记肩上的那些极为艰难和复杂的任务，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斯大林同志的评价是伊里奇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做出的，而从那时开始至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并未得到证实。我们认为在今后必须保障斯大林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所从事的工作。（引自：萨哈罗夫 B.，《列宁的政治遗嘱》，第 582、583 页）

一些历史学家将事件的过程说成仿佛《给代表大会的信》仅对各代表团的领导进行了公开，而绝大多数代表并不知道它的内容似的。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代表都了解了该《遗嘱》的内容，并做出了无需对此进行讨论的决定。

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以全票被选为总书记（同时也以全票入选政治局和组织局）。

他赢了。现在他可以不必瞻前顾后了。

在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不得不承认：“我们谁也不想反对自己的党，而且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当然，他声明，在一月党代会上所做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的决议中对他的指责是“不正确和不公平”的。他也当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但远非一致通过，仅得到微弱多数票。

当选政治局委员的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候补委员有莫洛托夫、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和伏龙芝。

既然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党的中央机关对托洛茨基抱有明显的敌意，为什么他还是进入了领导层呢？

答案很简单，列宁时期的惯性还在发生作用，远非所有的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都已经臣服。对此还要补充一点，在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开除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不赞成他们的提议。

这种观点分歧的原因是斯大林不愿就此失去制衡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向拥护“三驾马车”统治模式的中低层领导干部指出了事实上是谁在想篡党夺权。



斯大林仿佛在说：“我反对分裂，我拥护团结。”

此外，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表们觉得这个人无意争夺列宁继承人的位子。相反地，他还提出辞职，不掩饰受到领袖批评之后的不安。我们很难判断，他的这些不安的真实程度，但他保住了党内的最高职位，彻底清除了顾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未觉察出他有什么威胁。

不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受过良好教育又曾长期与列宁一起侨居国外的人，会拿自己的威望和水准与斯大林作比较，而会认为，上天创造出这个顽强的格鲁吉亚人只是为他们的胜利做了准备，他将只是一名不会有任何机会上到舰长驾驶室的底舱机工。

有一个远离政治的旁观者，从他的角度记录下一个有趣的细节：“8月4日。周一。著名讽刺杂志《红辣椒》好几次大出风头。其中包括在上一期刊登了一幅题为‘十三大总结’的漫画(女清洁工捆住了一个肥胖的女耐普曼——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译注)，而这个女耐普曼大约是在说‘你干吗勒我，要知道十三大才给我们做出限制’。内容大概就是这样。这引起莫斯科市委的一片哗然。《红辣椒》及其姐妹版《刺头儿》被上面敲打了一阵之后，这一切才收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叶莲娜·布尔加科娃，《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日记》，莫斯科，2001年，第40页)

总之，国家生活是艰难的，是复杂的。大街上和莫斯科几个火车站里满眼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穿着破烂的群众。这许许多多的人是从有失业危险的农村跑出来寻找幸福的农民。他们对任何工作都感到高兴，于是建筑包工头便支付给他们很少的钱无耻地剥削他们。而在城外，来自梁赞的农民每七八个人搭伙组成一个劳动小组，住在同一个窝棚里。他们编扫帚，然后到城里去卖。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女管家，也住在窝棚里。按照《莫斯科晚报》的描述：她们在“履行大自然与野蛮的生活条件赋予她们的一切义务”。(安德烈耶夫斯基Г.，《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1920年—1930年)》，莫斯科，2003年，第39页)

小偷、妓女、街头修鞋匠、小商贩、旧货商人在街上逛来逛去，看上去简直就是新巴比伦城。布尔加科夫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大街上行驶着带黄色窗框的褐色新公共汽车(非常好的公共汽车)。”

不过作家并没有被这一点迷住双眼，很快他就言简意赅地总结道：“莫斯科陷在泥潭中，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其中有两种现象奇怪地并存着：一边是安顿好了的生活，另一边是完全的坏疽。在莫斯科市中心，从卢比扬卡开始起，水道管理局在钻地基测试能否修建地铁，这就是生活；但地铁是建不起来的，因为没有这样一笔钱，而这就是坏疽。当局给街道交通做了规划，这是生活；但谈不上有什么街道交通，因为电车根本不够，让人可笑的是整个莫斯科只有8辆公共汽车。住房、家庭、学习、工作、便利和公益，这一切都在坏疽之中。所有一切都在原地踏步。苏维埃办公机关凶

残的大嘴吞噬了一切。苏维埃公民每走一步、每一项行动，都是一种要消耗数小时、数天、有时是数月的折磨。商店开门营业，这是生活；但里面空空荡荡，这是坏疽。到处都是这样。文学界糟糕透顶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叶莲娜·布尔加科娃，《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日记》，莫斯科，2001年，第46页）

很快布尔加科夫的命运就会与斯大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将是一次有象征意义的接触。

“斯大林-布尔加科夫”，这是代表着惩罚与复兴力量的沃兰德的主题，沃兰德是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主人公，他在新经济政策最高潮时出现在莫斯科。

《大师与玛格丽特》卷首题词引用的就是歌德《浮士德》的题词，这不是偶然的：

你到底是何许人？
我属于那种力量的一部分，
它总想作恶，却又总是施善于人。

这位作家在邓尼金的部队中服过役，参与过国内战争，并不是苏维埃政权拥护者，在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询问时他直截了当地说了这些问题。

不过，他对斯大林却是另眼相看，认为斯大林在苏维埃的领导人中是一位具有不同品质的人物。

因此有理由推测，对于布尔加科夫来说，由“上面”（即上帝）派来的魔鬼的形象与总书记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关联的。这种想法常萦绕着文学研究者们，而我们只是指出这一事实而已。

斯大林对作家布尔加科夫做了评价，还用他的作品里的例子来教育自己的儿子们——亲生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阿尔乔姆的父亲费奥多尔·谢尔盖耶夫（党内别名为阿尔乔姆）牺牲于1921年。

我们再回到文学家与领袖两人的相互关系上，暂时先只关注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关老的文化精英与新政权干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从机制上得到解决，它还会经常引发残酷程度不同的冲突。

共产党作为推翻了沙俄帝国的革命家的政党，理应也确实成了苏维埃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的政党。此前不久的传统被切断了。

正是沿着这条线产生了断层，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对德战争开始之前。

这位作家知道的远非全部，但他非常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本质。现实政治斗争的戏剧性源于渐离舞台的托洛茨基和新的官僚们。总之，布尔加科夫作为非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将被挤到生死的边缘，并且只有斯大林的干预才能救他一命。

第三十章

斯大林又提出辞职

斯大林再次提出辞职、托洛茨基被免职、布哈林建议采用斯托雷平的经验

刚刚在党内风暴中站稳的总书记竟然批评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几乎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在中央举办的县委书记训练班上，斯大林做了《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在谈到列宁主义时，他举了加米涅夫的例子来说明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加米涅夫说党当前的口号是把“耐普曼的俄国”(其实列宁说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按照加米涅夫的说法就成了国家现在掌握在耐普曼的手里，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季诺维也夫也受到了指责。斯大林不点名地批评了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党专政”的论点(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未经政治局的同意，斯大林就在《真理报》上分两期发表了这份报告(1924年7月19日和20日)。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觉受到了伤害，他们向中央委员会申诉了自己战友的这种独断专行的举措。

在8月份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了长达2天的调查。出席会议的有鲁祖塔克、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伏罗希洛夫、乌格拉诺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彼得罗夫斯基、哈里托诺夫等。从讨论的持续时间上就可以看出大家对可能发生分裂的共同关注。

斯大林被要求做出解释。他说,他想通过发表报告打破认为中央委员会的“三驾马车”独揽党、政领导权的无稽之谈,说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拓宽核心,因为它的范围变得狭小了”。

很难评判他的辩解里蛊惑成分占多少。无论如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接受了这些理由,但并没有取消对擅自公布报告的指责。同时季诺维也夫还证明,党专政的命题是列宁确定的。最终同志们“认为斯大林同志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并在党专政的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斯大林的威望受到了打击。他提出辞职,理由是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能开诚布公地进行协同的政治工作”,请求派他到雅库特、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或者国外从事“随便什么不显眼的工作”。辞呈没有被接受。

会议认可了季诺维也夫《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的问题》的文章(发表于8月23日的《真理报》上)。

“三驾马车”被扩大为“七人小组”,即全体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新的“核心”应该能够预防领导层内的对抗行为,它的成员理应服从这种严格的共同纪律。

1924年9月起,“七人小组”每个周二便聚集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对周四政治局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达成共识,实际上就是对关键问题提前做出决定。

这一阶段,斯大林明白了,不能太冒进。

早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讲稿《论列宁主义基础》,出乎大家意料地担当起了列宁思想继承人的角色。这一点不可能让“大理论家”季诺维也夫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明显越过了那条心照不宣的界限。

“三驾马车”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某些历史学家将这一分裂的起源归咎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的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好像这与世界革命的思想是对立的。对立是当然有的,但这是不明显的。

“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在几个国家内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已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存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6卷,莫斯科,1953年,第107、108页)



只要愿意,就能够认识到这隐藏在我们熟悉的全球革命精神后的努力探寻的思想。不过,想必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关口,未必会有人去注意这些。

这时,托洛茨基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惊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24年6月,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十月的教训》的演讲。秋天,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1917年》的第三卷,《十月的教训》作为序言收录于此书中。

在这本书里,他提出自己才是十月革命的主要负责人。他重点抨击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醒他们谁曾是“革命的工贼”,列宁曾要求把谁开除出党。托洛茨基公然宣称,他们不值得信赖,在1917年“退缩”了的他们,在1924年还是会“退缩”的。另外,托洛茨基将十月革命与德国不成功的革命作了比较,并从中得出结论,就是因为有了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领导,德国共产党人才遭到失败。

斯大林因他在1917年3月的“护国主义立场”同样也受到了托洛茨基的批评,当然,并未点名。

看来,托洛茨基认为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希望打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他错了,“三驾马车”重新团结起来。李可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布哈林、莫洛托夫、索柯里尼柯夫先后发表了驳斥他的讲话。托洛茨基在1913年的讲话也被公布出来,在这个讲话中他严厉地指责了列宁(“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现象的职业利用者”)。他们还翻出了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和“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的用语(犹杜什卡是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主人公的绰号,一个伪君子——译注)。

既然托洛茨基的攻击是针对具体的个人的,那么他得到的回应也是同样的。“犹杜什卡”受到痛斥。原来他还是列宁的敌人。

斯大林的战友在回忆录中的一段描述刻画了这场争论的某些风格:“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考虑到,有毒的铁锈会毒害健康机体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这个大沼泽、大丛林中匍匐着各种各样敌视无产阶级、敌视党组织的野兽。”(卡冈诺维奇 И.,《备忘录》,莫斯科,2003年,第351页)

斯大林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发言并提出:“有关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说法是喜欢拍马屁的‘党的’长舌妇所散布的奇谈。”(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6卷,莫斯科,1953年,第329页)

斯大林在指出了十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是一名依附于党的“政治孤立者”之后,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任务。

如果将这一次颇有文学色彩的争论与1923年那次党内论争相比较,那么会发现现在局势明显变得对斯大林有利。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已没有了托洛茨基的忠实拥护者 Э. 斯克良斯基,他和安东诺夫-奥弗申科一起被开除了;军队领导层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动,其中包括曾经独当一面的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已被调至莫斯科任

工农红军第二副参谋长。“红色将领”发动难以预料行动的危险得到预防。现在，图哈切夫斯基被调离了军队作战管理部门，从事行政和组织工作了。

不过，图哈切夫斯基没有受到任何指责，他“红色波拿巴”的军事声望依然很高，但关键甚至不在此，而在于他所代表的那种自发势力已不复存在。

伴随着斯大林地位的缓步上升，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经济的增长。尽管8月份有些地区发生了旱灾，但1924年还是一个农业大丰收年。对农业生产者扶持的政策结出了果实。

根据1923年12月中央全会关于“价格剪刀差”决议的计划，按道理，现在可以利用农村的资本来着手恢复重工业了。

但还是出现了早在维特时期就存在的老问题：农村的经济实力要有多强才能承受住工业化的重荷？

政府指望农民能够按指定的价格出售大部分收成。不过期望落空了。国家只收购到数量微乎其微的粮食。谷物的主要持有者富裕农民和中农更倾向于在未涨价之前把粮食暂时存起来。富农甚至从贫农那里收购粮食，以便囤积居奇。1924年的最后几个月，物价果然迅速上涨，工业化的拥护者们失算了。与此同时，粮食市场上的投机倒把行为盛行一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层该做些什么呢？

经济的任务促使他们想到“战时共产主义”和没收土地的这些经验，但喀琅施塔得和“安东诺夫人”起义，以及可能会导致农民放弃农产品生产的风险阻止了他们改变政策。

斯大林持中间立场。

争论变得激烈起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最为极端，1924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作《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时援引马克思的话来论证“不剥夺农村和手工业的部分剩余产品”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得以发展。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等价交换的思想被否决了。

1924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里描述了农村的形势：“农民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唯恐把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到极点，你们害怕外国商品蜂拥而至，为此你们筑起重重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我国年轻的工业不受竞争的侵袭，但是你们的工业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廉价的商品，不管这些商品从何而来……你们害怕提高粮价，唯恐破坏工资制度，为此你们增设了各种收购机关，建立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等等，但是你们的壁垒与杠杆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提高粮价。”（斯大林Ⅱ，《斯大林全集》，第6卷，莫斯科，1953年，第316页）

他提到了不久前发生在格鲁吉亚的起义，并解释了起义的要求是提供廉价商品、以高价收购玉米。



不过他提出的解决措施却是纯政治性的：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数量、派城市积极分子去农村、与投机商人和富农作斗争、吸引有觉悟的农民特别是过去的红军战士参加从事反对富农的苏维埃工作。

斯大林准确地评判了时局：苏联正处于新一轮基于传统的农村地方主义的农民反抗新版的余粮征集制的边缘。从这一评判中，不可避免地应该得出相应的结论，那就是国家即将发起新一轮现代化的组织工作，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自身已经滋生出一种阻碍发展的力量。

就本质而言，维特与斯大林对俄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20世纪初，伴随着国家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遭受到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多种成分和发育不良的碰撞，而现在社会主义经济遇上的同样是这个困难。

这种被劈成两半的国家经济，要求强力的解决办法。

历史传统预示了一些方向。

“不管这听上去有多么不可思议，但布尔什维主义确实是俄国大国沙文主义、俄国帝国主义的第三次显现。第一次显现是莫斯科公国，第二次显现是彼得大帝的帝国。布尔什维主义拥护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渴望社会公正的意志与渴望国家强盛的意志连接到了一起，而后一种意志更加坚强。”（别尔佳耶夫 H.，《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120页）

斯大林要在两种矛盾的经济倾向间保持平衡，最后做出了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所以，他成了苏联时代的伊万雷帝和彼得大帝。（我们要指出，对于俄罗斯这三位伟大而残暴的英雄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不可能得出任何积极的思想，只能是对俄罗斯历史的否定。其实，很少有人能公平地去评判俄罗斯国家制度的代价问题。）

1925年1月，中央全会对托洛茨基的命运做了判决。他本人因病缺席了这次会议。

在全会上，托洛茨基的文章《十月的教训》遭到斥责，并被斥为“共产主义的冒牌货”。

他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不过仍被留在政治局中。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加米涅夫试图提议让斯大林接任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职位，不过提议没有被接受。因为接任新职，斯大林就必须放弃总书记一职。加米涅夫的这一试探表明，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

1月25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M. B. 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后者并不是他明显的拥护者。

这里我们需要谈一谈在军队内对这次全体会议所做的一些准备。鉴于托洛茨基与在工农红军参谋部是同事关系的图哈切夫斯基接近这一威胁（不管这是现实的还

是假设的,都并不重要),承诺给图哈切夫斯基恢复西方面军司令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此外,他运用西方面军的兵力准备为在近期打一场进攻型“革命战争”而做准备的想法也得到了支持。

正如我们所见,党的领导层一直监控着军队的精英,从来没有完全信任他们。即便在托洛茨基被免职后,这种监控也不曾放松。但产生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在完全有可能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情况下,却决定把这位敌人留在领导层?何况开除托洛茨基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坚持的,而且列宁格勒党组织也做出了该决议。

通常的答案都指向斗争策略:斯大林想利用托洛茨基来对付“三驾马车”里不久前侮辱了他的两位伙伴。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措施,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加米涅夫有关调整斯大林职务的那个建议的话。

但斯大林真能指望得到托洛茨基的长期支持吗?这不可能。他们是不可调和的对手,和解意味着其中一个的失败。

有资料显示,1925年4月底他们曾秘密会面以讨论开展联合行动。(瓦谢茨基H.,《清理//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1989年,第47页)但究竟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并不清楚。

4月,发表通告,托洛茨基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电气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主席和总租让委员会主席。

也许,这是将托洛茨基“安置”在捷尔任斯基手下?

但没有捷尔任斯基本人的同意,这项任命未必能兑现。斯大林没有任何必要与自己的拥护者去争吵。

况且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对捷尔任斯基在经济舞台上工作的挖苦讽刺。

还有一些事实仿佛也能说明斯大林有恢复托洛茨基地位的意图,比如他免去了托洛茨基批评者、罗扎日-西蒙诺夫区委书记扎哈罗夫和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法伊洛维奇的职务。

不过这也不足为信。党员职务的调动难道还少吗?大多数任免都需要得到斯大林的同意。而像这样的托洛茨基的批评者何止成千上万。

关于斯大林支持托洛茨基恢复地位这个问题,人们没有看到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此时主要的竞争者相互间还无需作出残酷的决定。就连像安东诺夫-奥弗申科这种差点发动政变的反对者也没有被彻底清除出政治圈。并且,提早一点说,甚至在1929年将托洛茨基逐出苏联的决定也证明,斯大林并不愿采取极端的手段。

因此,如果抛开斯大林心怀叵测、存心报复的观点,而只看事实,那么可以看出斯大林并不打算将这位败下阵去的对手置于死地。

1925年4月10日,按照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察里津市改名为斯大林格



勒市。

1925年4月,在市场粮食价格上涨了一倍的时候,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农村政策又成了会议的主要议题。

似乎,党正在蓄积力量以便采取最终的方案。会议提出了三条建议:减轻农业税、允许雇佣劳动力、允许土地出租。

布哈林倡导农业生产者致富的发言最为激进:“我们应该向全体农民阶级,向这个阶级的各阶层说:发财吧,积蓄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傻子才会说我们这里应该有贫农存在。”

代表会议通过了对农民的优惠政策,也通过了投入3.5亿的冶金工业三年发展规划。

在政治方面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决议,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得到了支持。

其中包括,斯大林谈到的可以迅速从恢复战前工业向实现工业化迈进。这就意味着向以运用电气和冶金为基础的第三种技术类型的加速转变(此时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第四种技术类型的基础: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有色冶金工业、耐用商品生产业、合成材料和无机化学等等)。

“现在我们大约有400万工业无产者。这个数目当然很小,但毕竟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起我国的国防,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发抖。然而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1500万到2000万工业无产者,我们要使我国各主要地区实现电气化,我们要有合作化的农业和高度发达的金属工业。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危险了。到那时我们就一定会在国际范围取得胜利。”(斯大林И.,《斯大林全集》,第7卷,莫斯科,1953年,第132页)

这个夏天是大丰收,是1917年以来收成最好的一年。

而去年的情况重又出现:农民们不按规定价格出售粮食。他们看不到家中持有钞票有什么意义,尽管汇率稳定,但市场上工业品却很稀少。

对于政府,农村成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农民们无意中经济推回到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即整个西方社会开始发展第三种经济类型的那个时期。

但俄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一难题还没有想出办法。是的,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应该发展合作社的规划,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合作社也是基于市场基础的。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从1924年6月18日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济管理局要求地方各局上报粮食收成的评估综合报表,而从1925年5月21日开始要求上报粮食市场的类似信息。

当然,如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席同时也领导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话,那

么契卡对经济信息的监控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但是事情不在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综合报表,而在于这场反新经济政策的缓慢但坚定的运动。新经济政策在成为过时的东西。它其实称得上是回到了用“强力”做赌注、以“人民富裕则国家富裕”为理念的斯托雷平的改革之路。但有可能让 1925 年的苏联回到 1906 年的沙俄帝国吗? 斯大林温和地修正了提出此建议的布哈林:“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它是不正确的,它会引起一系列的疑问和误解,在《共青团真理报》的指导性文章中是不应该有其容身之地的。我们的口号是社会主义积累。”(斯大林 H.，《斯大林全集》，第 7 卷,莫斯科,1953 年,第 153 页)

换句话说,经济状况引发了克里姆林宫新的争论。

这场争论始于夏天。先是季诺维也夫,然后是克鲁普斯卡娅,两人都反对布哈林向富农让步的思想。

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支持布哈林。

总之,政治局里形成了两个“三驾马车”,老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新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则独立行事。

季诺维也夫证明,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性的退让;当对农民的支持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方式的基础上时,就不可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

除了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的小册子以外,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列宁格勒真理报》对中央委员会也提出了尖锐批评。季诺维也夫确信,只有其中包括传统共产党员的列宁格勒的工人是“第三次革命的缔造者”、“无产阶级大地的精华”,而莫斯科无产阶级正相反,很不稳定,里面有很多来自农村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党组织是列宁最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其他组织都应该追随他们。

当中央委员会免去季诺维也夫的助手扎卢茨基的职务时,事态就失去了控制,列宁格勒对此的回应是免去所有拥护莫斯科的书记们。

9 月 5 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签署了“四人纲领”,重申了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的主要思想。

12 月 10 日,选举参加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列宁格勒党代表会议给莫斯科党组织发去一封信,指责后者“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怀有取消主义分子式的不信任”。冲突进一步尖锐起来。

为了不至于在代表大会上暴露这种矛盾,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委员向列宁格勒方面提出了折衷方案:恢复被免职的列宁格勒书记们的职务,但会将列宁格勒的代表纳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季诺维也夫断然拒绝了这个方案,他认为接受就意味着投降。

党的高层的思想分歧折射出一些比权力斗争更深刻的东西。这场冲突的所有参与者都抓住列宁遗产,虽然这里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摆脱工业发展需求和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指示。

无论左派(季诺维也夫),还是右派(布哈林)都没有明确的定向标。唯一的历史定向标——斯托雷平和他的进化经济学——却因其反革命性、因其对 1905 年革命的残酷镇压和设立军事战地法庭而不可能得到认可。

并且,若是在这国内战争的创伤尚未完全愈合的时候去借鉴彼得大帝的经验,那是可怕的。

尽管如此,反对者们还是在为今后的搏击积蓄力量。

第三十一章 伏龙芝之死

伏龙芝之死、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侦查监视、“三驾马车”统治的瓦解、叶赛宁自杀、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新经济政策过时了

1925年10月31日发生了一件事，它改变了各方力量的均衡——伏龙芝去世了。他死于胃溃疡手术失败：未能经受住麻醉药。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这个死亡经常被描述成一段阴暗的历史，如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在其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中反映的那样。

托洛茨基写道：“伏龙芝表现出了过于强烈的独立性，使军队免于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控……军事部门这位新领导人的反对派立场对斯大林构成了巨大的危险……”（托洛茨基 JL，《斯大林评传》，第2卷，第258页）

巴扎诺夫表达得更明确：是斯大林安排谋杀了伏龙芝。他这样写道：

还在1924年，作为中央委员会红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伏龙芝就向政治局报告说，红军在目前状态下根本没有战斗力，更像一群不守纪律的匪帮而非军队，应该全体遣散。还真是这样做了，不过是在特别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干部——军官和士官。新军队到了秋天才得以组建，军人来自被征召入伍的青年农民。事实上整个1924年苏联是没有军队的，不过好像西方并



不知道此事。

伏龙芝带来的第二个深刻的变化是，他废除了军队中的政委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负责政治事务和起政治宣传作用、但无权干涉作战决定的副指挥员。1925年，伏龙芝通过调动和任命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机制，这样就使得各军区、军团和师团的领导都是优秀和有能力的军人，对他们的选拔是以他们军事技能的高低为原则，而不是按照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度。

那个时候我已是潜在的反共分子。在看了伏龙芝拟定的高级指挥人员名单之后，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像我现在这样是一个反共分子的话，我会把什么样的干部安排在军队高层？”我一定会回答自己：“就是这些人。”这些干部正是在发生战争时发动政变最适合的人选。

当然，表面看起来，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

我没有机会就此与斯大林进行交谈，也根本不希望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问题上。但有一次我顺便问了梅赫利斯，他可曾听到斯大林对军队新人事任命的看法。这时我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斯大林总是对军队的事务很感兴趣。”

“斯大林怎么想？”梅赫利斯问道，“没有什么好看法。你看看这份名单，尽是一些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乌博列维奇、阿夫克先季耶夫斯基这样的人，他们算什么共产党人？这些人适合搞雾月18日（1799年拿破仑推翻政府自任首席执政官之日——译注）政变，但不适合领导红军。”我开始感兴趣了：“这是你自己的看法还是斯大林的看法？”梅赫利斯骄傲起来，煞有介事地回答说：“当然，既是他的，也是我的。”（巴扎诺夫 B.，《一个前斯大林秘书的回忆录》，圣彼得堡，1992年，第134、135页）

巴扎诺夫没有给出证据说明是谋杀。

这件事的另一参与者，更了解详情的米高扬证实的却是另一种情况：

我很清楚地记得跟伏龙芝的手术和死亡有关的一些情况。1925年10月20日，我来莫斯科办事，去了斯大林的住所，从他那里得知伏龙芝即将做手术，斯大林明显感到很不安，这种情绪也传给了我。“也许，最好不做这个手术？”我问道。斯大林回答说，他同样不能确定是否有必要做手术，不过伏龙芝本人坚持要做，而治疗他的那位全国著名的外科医生罗扎诺夫认为手术“并不危险”。

“那我和罗扎诺夫谈谈吧。”我向斯大林提议。他同意了。很快罗扎诺夫就来了，我和他一年前在穆哈拉特卡就认识了。此外我还从他的一个直接助手、我的中学同学加尔季施扬医生那里了解到一些他的情况。加尔季施扬称赞罗扎诺夫是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极好的人。

斯大林请罗扎诺夫坐下并问他：“即将给伏龙芝做的手术真的不危险吗？”

罗扎诺夫回答说：“跟任何手术一样，当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一般说来这样的手术对我们不是特别复杂。虽然你们大概也知道，即使一些最普通的伤口都可能引起血液感染甚至更糟。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罗扎诺夫所说的这些话是如此自信，我有些放心了。不过斯大林仍然问了一个在我看来很挑剔的问题：“那，如果接受手术的不是伏龙芝，比如说，是您兄弟，那么您会为他做这种手术还是不做？”“我会不做。”罗扎诺夫回答。这个答案使我们感到惊讶：“为什么？”罗扎诺夫回答道：“不知您了解不了解，斯大林同志，溃疡这种病，如果病人能遵守医生的规定是可以不做手术就恢复的。比如说我的兄弟，是能严格遵守规定的。而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据我所知，不可能遵守这样的限制。他照样会在全国东奔西走，参加军事演习，也一定不会遵守饮食方面的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赞成动手术。”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动手术的决定仍然有效。

伏龙芝接受手术的那天我又一次去了斯大林那里。基洛夫也在，他是从列宁格勒过来办事的。我们决定不顾医生的禁止还是去探望一下伏龙芝，于是我们三人便动身去了博特金医院。医院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惊讶，因为医生不同意看望病人。除了罗扎诺夫，在场的还有马丁诺夫和普列特尼奥夫（后者在10年后因一件诉讼案成为被告，并因接受亚戈达下达的任务导致M.高尔基和其他人的死亡而被判刑）。

我们服从了医生的忠告，给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写了个不长，但热情友好的祝他早日康复的便条。便条由基洛夫执笔，我们三个人都签了名。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1925年10月31日伏龙芝再也没能起来。（米高扬A.，《事情是这样的——对过去的思考》，莫斯科，1999年，第284、285页）

的确，米高扬也说过，斯大林可能是在“捉弄”他，本来只要给麻醉师‘做点工作’就足够了。但米高扬所描述的整个画面以及斯大林的行为令人信服地表明，蓄意谋杀伏龙芝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一说法与后来托洛茨基的所谓是斯大林毒死了列宁的说法一样不可信。

伏龙芝的奇闻轶事大多是“文学太太们”的杜撰，所以，难怪皮利尼亚克的小说常常会当成有力的证据被引用；因为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这是斯大林的预谋。如果从特工部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那么很显然，清除一个不合意的人可以采取更简单的方法。归根到底，如果伏龙芝确有危险，政治局完全可以罢免他。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也都是投票赞成给伏龙芝动外科手术的。

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1925年的情况放到1937年的局势下去看，从心态上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角度这是无益的。1925年,整个政治领导层是按另一些法则在行事。至少卡冈诺维奇的观察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斯大林从不巴结任何人,他非常厌恶这种行为……他其实是一个独特的人。而且,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期他都是不同的,要分段去看待他。战后是一个斯大林,战前就是另一个,1932年到1940年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斯大林,他一直在变化中。我就曾看到过不少于5到6个不同的斯大林。”(丘耶夫Ф.,《卡冈诺维奇如是说》,第154页)

我们还可以对斯大林这位战友的话进行补充,苏联战前的历史同样应该按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目标、不同类型的人加以区别。例如当一位领导的愿望与历史规律相符合时,就使得红军采用了一长制(1925年3月2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日期。2月5日,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到一个月之后他签署了该命令。若没有政治局和斯大林的准许,即使他非常想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毫无疑问,伏龙芝头脑清醒,并具备很高的军事管理天赋。这位革命家曾服过几年苦役,也曾指挥过集团军和方面军。他凭借曾是前沙俄帝国军队总参谋部军事专家的经验,倡导了工农红军的改革。相应地,国内战争的经验,那种使经典的军事作战概念变了形的经验也就退到次要地位了。

当然,改革不可能只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人的事。考虑到托洛茨基已经退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三驾马车”便没有了遭到军方反对的危险,这一点在伏龙芝主导的提拔图哈切夫斯基为工农红军参谋长这一重要任命上就可以得到证实。

毫无疑问,关于这个任命,斯大林肯定与伏龙芝有过交谈。既然西方面军司令员获得了新职务,这就意味着两位领导信任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关于伏龙芝“密谋”的传言呢?

从8月27日至9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参观了德军演习,然后前往莫斯科。他明显没有进行任何反政府行动的时间,何况在伏龙芝在场的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当然,在伏龙芝死后,针对他的一连串猜疑立刻显得有根有据。

由此,监视他的人可能会得出一种印象,好像伏龙芝之死跟军事密谋有关。

同时,历史学家认为托洛茨基和巴扎诺夫的回忆录都是参与者的自传。

严谨的历史学家们,比如美国的亚当·乌兰姆教授,针对伏龙芝之死的那种说法写道:“这是诽谤,很可能是有人给皮利尼亚克提示了这个故事,以此来攻击斯大林。”

11月6日,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正是从这时起,正如苏联军事将领研究者C.米纳科夫指出的那样,原本暂停了的“对密谋的侦查工作”又启动了。

“第一,我认为,其结果是前面提到的免去B.吉蒂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的职

务。第二,是对 M. 图哈切夫斯基实施监视。还在 1925 年 12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密探奥夫相尼科夫向上司报告:‘现在,在骨干军官和将领中间出现了两派:保皇派……和聚集于 M. H. 图哈切夫斯基周围的波拿巴派。’很快,还是这个密探指认了工农红军中的一系列曾是旧军官的指挥员,说他们‘参与了图哈切夫斯基小集团’,是‘波拿巴派’。

“1926 年起展开了‘图哈切夫斯基案’的专项调查,并监视‘波拿巴派的小集团’。为了开展调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开始吸收 M. 图哈切夫斯基的一些同事为秘密间谍并与他们进行暗中合作。”(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莫斯科,2004 年,第 352 页)

伏罗希洛夫的任命一下来,最高指挥层立即就开始了人事变动,而图哈切夫斯基的职权开始削减。1925 年 11 月 13 日,工农红军司令部增设了监察局、作战准备局和第四局(情报局)。较晚一些,1926 年 2 月 18 日和 7 月 22 日,所有的征兵工作和作战侦察局都由工农红军参谋部移交给红军领导干部总管理局。一些与图哈切夫斯基走得近的军官纷纷被降职或撤职。

让我们再回到“三驾马车”的内部矛盾上来吧。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体大会上,情绪激动的捷尔任斯基向克鲁普斯卡娅表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您作为列宁的妻子,应该为在这样一个时刻与现在的喀琅施塔得分子走在一起而感到非常羞耻。这是现时一次真正的喀琅施塔得叛乱。”

性格耿直的捷尔任斯基在将列宁格勒的反对派们称为“喀琅施塔得分子”的同时,就准确地确定了所面临的斗争的性质。

斯大林以冷静和务实的态度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总结报告。他用很长篇幅讲述了经济问题,还注意到由于农民的立场,进出口计划需要重新制订。这意味着减少进出口。不过这位报告人并不建议加速向农村进军,他断定,党内有两种倾向:“右倾”,即向富农作让步;“左倾”,即与富农作斗争。虽然他说“两种倾向都不对”,特别强调了第二种,“将激化农村的阶级斗争,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政策,引发我国的国内战争,从而中断我们所有的建设工作,更主要的是可能导致对列宁将千百万农户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的合作社计划的否定。”(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336、337 页)

在谈到计划时,斯大林指出,保证苏联经济的发展、保证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国家独立和工业的大力发展是优先的任务。

尽管没有提名道姓,但不言而喻,正是季诺维也夫在鼓吹国内战争,并阻挠列宁的合作社计划。



不过季诺维也夫在自己的补充报告中也没有触及自己与斯大林的私人关系这一话题。然而，加米涅夫却忍不住了：

“我们反对制造‘领袖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

他说：“……我曾不止一次地亲自对斯大林同志说过这个问题……我也不止一次对列宁主义者同志们说过，现在我在代表大会上要再次重申：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布尔什维克阵营统一者的作用。”加米涅夫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可以根本扭转局势的建议：“我们主张，在内部，我们的高层领导要这样来组织，使政治局能够真正掌握充分权力，能够把我们党的全体政治家团结起来，同时要有一个隶属于它并具体执行它的决议的书记处。”他继续说道：“现在书记处将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一手统管，并且实际上对政治工作预先作出决定。如果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的话，我们不可能认为这是正常的，而是觉得这是对党有害的。”（引自：瓦谢茨基 H.，《清算——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第 50、51 页）

加米涅夫得到了什么？他得到的是大多数代表的猛烈抨击。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会场响成一片：“不对！”“胡说！”“摊牌了！”“我们不会把国家的命脉交给您！”“要斯大林！要斯大林！”“这才是我们党的团结之处，布尔什维克大本营应该团结起来！”“党高于一切！”“斯大林同志万岁！”“乌拉！”

大厅里的反应揭示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列宁格勒派孤立无援。挑起攻击的加米涅夫犯了无法补救的错误，但同时也揭示了，一场夺权斗争正在进行。

斯大林在结束语中甚至暗点了“列宁遗嘱”：“是的，同志们，我这个人直率且粗鲁，确实是这样，我不否认这一点。”他严厉批评了克鲁普斯卡娅，从她手里将对列宁思想遗产的解释权夺了过来，而最重要的是他解释了意见分歧的原因。附带着他还提醒反对派不要忘了 1917 年的“工贼行为”和 1923 年的“洞穴会议”，以及为了对抗分裂分子的活动而保持“党在列宁时期的铁一般团结”的必要性。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发言。托洛茨基的这种表现是因为斯大林使了一个狡猾的手段。代表大会前他通过谢列布里亚科夫转告说：“我提议您的派别帮助我们粉碎季诺维也夫集团”，并请他将这话转达给“老头儿”，即托洛茨基。

于是，托洛茨基果然没有发言为季诺维也夫辩护，看来他仍抱有与斯大林结盟的奢望。但众所周知，他们最终并未能结盟。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在斯德哥尔摩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也是少数，对此斯大林回答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与其他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凌驾于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之上呢？难道反对派的同志不清楚，对于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之物，而党的现实利益才是一切吗？”（斯大林 H.，《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383 页）

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559 票对 65 票）通过了党的正式路线。尽管“右派”坚持，

大会还是下达了“坚持国家工业化、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为经济发展建立储备”的指令。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联共(布)。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对政治局作出了调整，加里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当选为正式委员，Г. И. 彼得罗夫斯基和莫斯科市委书记 H. A. 乌格拉诺夫被选为候补委员，加米涅夫被降为候补委员，而索柯里尼柯夫则出了局。

1926年1月，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被撤销(并入人民委员会)。原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仅得到了一个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的职务，这是降职。另一个反对派索柯里尼柯夫由财政人民委员改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而加米涅夫只受到很轻的处罚，这些都说明斯大林并不想要他们的命。

很多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都错误地认为此时是布哈林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彼得罗夫斯基和乌格拉诺夫都支持他。不管怎么说，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但克里姆林宫这座巨大冰山的下面，主要的因素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军队中的机关和影响，是这个因素决定了未来，而在这里已经没有布哈林的位置了。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善于挖苦的托洛茨基把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表面的胜利看成是“农村民族主义局限性”的征兆。“工业化的代表大会”和农村地方主义这两者怎么能结合得起来？

然而，结合起来了。暂时的结合。

另一个人的去世也与执政的“三驾马车”的瓦解发生在同一时期。1925年12月27日，列宁格勒的“国际”宾馆(旧称“安戈列杰尔”)里，30岁的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上吊自杀。在一本叶赛宁的传记中，对他的死因做了奇特的暗示(伪装成自杀假象的他杀)。诗人曾向他的一位同伴承认，说他手上有一封1917年3月加米涅夫从西伯利亚发给署名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贺电的原稿。(库尼亚耶夫 Ст.、库尼亚耶夫 С.，《谢尔盖·叶赛宁》，莫斯科，1997年，第549页)

尽管20世纪80年代苏联总检察院对此展开过调查，但未能证明这是对诗人的谋杀。我们仅强调文学界其实是极其尖锐的政治矛盾的缩影这一事实。

1925年3月20日，在布特卡监狱里，叶赛宁的友人、诗人阿列克西·加宁和另外6位年轻的诗人以组织“俄罗斯法西斯秘密团体”的罪名被枪决。

其实，他们只是表达了内心对于现行制度的反抗，从加宁《和平与不受剥削的劳动属于人民》的提纲就可以看出来。



“所有社会的和个体的创造性都被束缚住了。哪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表露都会被视为反国家的造反，并像对待罪犯一样受到最残酷的惩治。所有的农村居民、公职人员，以及工人群众都饱受苛捐杂税的摧残，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家庭的支柱，被迫像动物那样勉强地活着。思想和信仰自由被完全抑制和扼杀。到处都是野蛮的、毫无道理的独断专行，到处都是对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以及对他们圣洁的精神传统的粗暴羞辱。这就是共产主义天堂，难怪包括所有阶层的整个俄罗斯仿佛大梦初醒般地像追忆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那样追忆过去的时光。因为这里到处是饥饿、废墟，而有人却在狂欢作乐……”（引自：库尼亚耶夫 С.т.、库尼亚耶夫 С.，《谢尔盖·叶赛宁》，莫斯科，1997年，第502页）

这些想法可以称之为反革命的，但绝非“法西斯的”。但是，由 Я. С. 阿格拉诺夫领导的审讯认为对这些人必须这样判刑。

为何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莫斯科竟会出现所谓“法西斯”的威胁？

在历史学的概念中，“法西斯”一词仅与1919年在意大利创建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那个政党的名称和纲领有关（在德国，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不同，是指A.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群残忍得多的纳粹分子）。同共产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的构想也是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区别在于，法西斯主义基于民族国家的理念之上，而共产主义则是以国际主义和阶级的思想为基础的。

当然，这些被枪决的可怜的诗人可以被称为阶级敌人，甚至黑帮分子。但他们绝非什么法西斯分子。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更具危险的是众多已成为侨民的沙俄国民。他们的总人数多达近两百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有文化的阶层，很多人还有战争的经验。

自从白军退出克里米亚和远东之后，俄罗斯流亡政府开始形成，他们是过去圣彼得堡社会文化核心的残余。最初是在达达尼尔海峡边的土耳其的城市盖利博卢和在爱琴海的利姆诺斯岛上集聚起一些新编部队。盖利博卢便如同新的城市基捷日一样成了白军移民的象征。在这里的营帐中，编入了由亚历山大·库捷波夫中将指挥的俄国第一军团的志愿军真的奇迹般复活了。在走下甲板登陆的最初日子里失去了生存希望的贫苦的侨民们现在却建起了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很多东西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除了常年备战，那儿有教堂、中学、各种培训班、科学团体、剧院、合唱团、手抄杂志、足球队（曾以3：1打败英国水兵）。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这些侨民没有瓦解，并且保留了军事组织。

1921年后，这些战争侨民在保持了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这个自己的组织的同时，分布到了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国。这个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也可以视为是一支已转为文职状态的大军了。

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下设作战机构,是由库捷波夫创建和领导的。这个机构也被称为民族恐怖主义分子联盟,在苏联境内从事积极的侦察和恐怖活动。在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情报机关的帮助下进行对恐怖分子的调派。

从总体上来说,白俄侨民的历史,是少数人,但确是具有世界声望的那些人的成功史,也是争取数十万人生存的艰难斗争史。

其中最著名的人有:歌唱家夏里亚宾、作家布宁、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电视发明人兹沃雷金、经济学家司徒卢威、飞机设计师西科尔斯基。还有就是 1921 年被驱逐出境的别尔佳耶夫、伊利英、弗兰克、斯特鲁韦等知识分子。

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就是,这批人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在国外的俄国人当中如同耶稣基督的亲兄弟。在巴拉圭的热带雨林中至今还矗立着伊万·别利亚耶夫将军的雕像,这位将军和众多侨民来到巴拉圭,做了一件让当地印第安人难忘的事:抵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要求,保住了印第安人自己的土地。印第安人敬仰他的先知先觉,把他当成基督的兄弟。

这跟“俄国法西斯主义”有关系吗?有的。

俄国的移民们寻求精神支柱,其实整个世界也是这样。难怪,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之外,20 世纪 20 年代,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法国、瑞典、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也都出现过法西斯团体。1924 年,在塞尔维亚曾试图建立一个俄罗斯法西斯党的组织。1926 年,“俄国工农哥萨克反对党”,亦即“俄罗斯法西斯主义者”成立。整个 20 年代在俄国侨民中出现了 15 个以上自称为法西斯主义或民族革命主义的大型政治组织(4 万多人)。

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尚远的 20 世纪 20 年代初,很多人都觉得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合适的替代品。就连 И. А. 伊利英、П. Б. 司徒卢威和 С. С. 奥尔登堡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将这股思潮称为“重要的征兆”。(奥科罗科夫 А.,《法西斯主义与俄国侨民》,莫斯科,2002 年,第 21 页)

说到法西斯主义的纲领,不妨提一提德国女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的评价:

法西斯主义的代表者已不是一小撮人了,而是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广大民众,直至无产阶级本身……

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中到了法西斯主义一方。法西斯主义成了既无立足之点,又看不到未来的所有政治上无处容身者和对政治失望的人的避难所。他们曾徒然地寄希望于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憧憬着他们可以从社会各阶层招募到忘我、刚强、果敢和英勇的成员……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按其社会成分法西斯主义囊括了可能对资产阶级社会造成极大不便甚至危险的成员。(乌斯特里亚洛夫 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莫斯科,1999 年,第 77 页)



这里该提一提被一些人称作“俄罗斯法西斯分子”的一位诗人，名叫阿尔卡季·涅斯梅洛夫(真名为阿尔谢尼·伊万诺维奇·米特罗波利斯基)。1889年6月8日，他出生于莫斯科州军事医疗管理局的一个文秘家庭，中等军事学校毕业，在奥地利战线打过仗、负过伤，曾四次被授勋。国内战争时期，在高尔察克的军队中服役，然后侨居中国，并在哈尔滨生活了很长时间。

涅斯梅洛夫的诗歌突出地表现了斗争的意志冲动和良好准备。所以，1945年8月苏联军队一进入满洲里他立即被捕，并于同年秋天死于格罗杰科沃站的监狱中。

涅斯梅洛夫有一首诗是献给俄国法西斯党领导人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的。诗名叫《集团军司令员爱克斯》。下面就是其中的几行：

无怪乎死亡之影，
笼罩着斯提克斯河岸。
上帝啊，请你给司令员力量吧，
给集团军司令员爱克斯。

我们提醒一下，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自由党人曾向“地狱之河”呼吁，希冀来轻松驾驭激进分子的挑衅。从阿赫隆河到斯提克斯河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

涅斯梅洛夫并不是法西斯党的党员，不过按照当时的说法，在“思想上很接近”。

总之在那个年代，包括列宁和斯托雷平在内的很多人都被称为“法西斯分子”。党的宣传员给法国和英国政府也贴上了这个标签。

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法西斯主义的关注，与其解释为对现实威胁的关注，不如说是对在苏联境内拥有很多同情者的俄国侨民巨大、敌对的潜能的关注。那些构成了获得立宪会议多数选票的俄国自由派政党根基的教师、医生、会计、统计员、兽医、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和护士们都不曾离开国家，也未曾消失。正是他们与白俄侨民一起构成了主要的反对势力。

《红色处女地》和《新世界》杂志的主编亚历山大·沃朗斯基的例子就很可能证明文学界已对政治构成了影响，他很乐意发表叶赛宁和其他所谓“同路人”的诗作。正是沃朗斯基出于政治目的告诉了皮利尼亚克有关伏龙芝之死的那个版本，于是后者“转瞬间写出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当然，与斯大林为敌的沃朗斯基打错了算盘。

让我们还是回到叶赛宁的话题上来。他的去世标志着俄罗斯历史中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农业的国家失去了逐步自然进入工业社会的机会。

正如叶赛宁在自己的诗作《四十日祭》中所写：

你们可曾看见，
那在草原上奔驰的，
穿云破雾的，
呼哧着铁鼻，
匍匐在铁爪之上的火车？

可曾看见在火车后面，
沿着一望无垠的草地，
如同在毫无畏惧的赛马节上，
撑着细腿向前的，
飞奔着的一匹红鬃小马驹？

这可爱的，这可爱又可笑的小傻瓜，
算了吧，它往哪里，往哪里追赶呢？
莫非它不知道，
钢铁骑兵，
已经战胜了活马？

叶赛宁说的是对的。这位“富农庄稼汉诗人”(布哈林给他下的定语)证实了一个“钢铁时代”的临近。

到1925年，重工业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战前四分之三的水平。而且，这是靠为数众多的占84.5%的国营企业的工人的劳动取得的。

这些企业的产值(以货币计)占总产值的92.4%，私营企业占4.9%，而合作社只占2.7%。

所以说并非耐普曼和手工业者决定了国家政策的路线。

不过此时在农村，这个路线却遇到了完全另一种境况：农民们不愿参与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抵制国家制度。可是当局在农村能依靠谁呢？1925年的时候，平均30个村才有1个党支部，三分之一的党员来自城市，但很少有人能够了解清楚农村生活。

由此可见，如果不与“足够的庄稼汉”联合，而只依靠那些有反宗教胡作非为行为的共青团员，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斯大林谈到吸引农民参与苏维埃工作的必要性时，他指的是，从1925年就已经实行的地方预算，对此的利用就使苏维埃有了实际的权力杠杆。

结果在1925年春的选举中，选民积极性明显增强，被选进苏维埃的贫农和共产



党员的人数大大减少,这证明了那些真正的农业生产者倾向的转变。不过这种积极性同时也表明,其时农村的权力是属于经济自主的阶层富农的,“政治体系的基础已经变成了一种与中央政权敌对的势力”(C. T. 卡拉-穆尔扎语)。

契卡人员常常直接干涉选举的进程,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试图自发组织劳动农民联盟。风平浪静在农村是不可能了。

那么斯大林和布哈林是否明白,他们“面向农村”的路线正在推进反革命情绪的蔓延?大概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相反,付诸实施的是将农村乡镇变为独立的财政单位,并将地方预算列于国家预算之外的思想,这必然促进地方自治的发展。

政府决定将部分农业税归入乡镇预算,征收一些乡镇自己的税收(不是向居民征收),并将地方企业及其资产(磨坊、锻造车间等)交给乡镇所有。

但是,由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实在太低,这个政策也失败了。老百姓没什么可上缴的。在村苏维埃这一级,存在的不是货币经济,而是半自然经济。

国家领导人实实在在地领悟到加快经济发展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正是这种情况给诗人叶赛宁的死蒙上了一层他已预感到的悲剧的色彩。

当然,表面上这种悲剧还没有表现出来。在押犯人总数这样的客观指标就能说明并未发生任何异常事件。1925年1月1日,在押犯有14.4万人,1926年1月1日,14.9万人(这个数字与沙俄帝国时代比是微不足道的。1905年,监狱里关押着71.9万人,而1906年是98万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苏联,约有70%“坐牢者”被提前释放。这一时期的政治犯有大约1500人,其中500人被关在监狱和拘留所,另1000人被剥夺了在两个首都居住的权利。

国内的局势可以称得上是平稳的。

1989年,在苏联自我毁灭进程的初期,继续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被模拟试验。结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拿不出前进的方案。

理论上,还可以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分享权力,并在一定条件下走一条“中国式”道路。但是如果考虑到上层统治集团的革命往事和国内战争的血雨腥风,类似这样的道路也是不可能走通的。甚至这种变革的想法都会被视作离经叛道。

托洛茨基对时局和统治精英内部整体关系的解释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久以后,这种关系就表现为经济工作领导人和党领导人之间的对立:

“1925年商品流通自由的显著扩大是最突出的热月政变的表现,犹如多年以前取消最高限价一样。然而在这种相似性的背后不能不看到其根本区别:这就是生产的国有化和土地的社会化。

“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新经济政策,尤其是它在1925年的蓬勃发展,不言而喻地

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经济政策的蓬勃发展意味着两种管理体制的冲突。在最初的几步中,这种冲突巩固了官僚们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性,首先是脱离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但事先已经清楚,商品流通的继续发展和扩大以及小资产阶级地位的加强必然直截了当提出一个列宁曾提出的问题:谁战胜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时已经获得了很大独立性的官僚阶层。按自己的生活条件、保守观点和政治好恶而言,很大一部分官僚属于新兴小资产阶级。然而,官僚经济是植根于新的所有制条件之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威胁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且还威胁到官僚阶层自身的社会基础。他们可以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但绝不会为新兴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这就导致了官僚阶层与富农之间的尖锐冲突。”(托洛茨基 Л.,《斯大林评传》,第2卷,第241、242页)

其实,托洛茨基只是部分正确而已。他没有指出时代的主要矛盾,仅仅将其归结为“官僚阶层”对绝对控制权的渴求,却没注意到国家的发展任务。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官僚阶层只顾自己的私利,它又能支撑多久呢?

第三十二章

在斯大林的世界地图上德国和中国位居第一

德国和中国在斯大林的世界地图上上升到首位、季诺维也夫失去列宁格勒、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力图报复斯大林、斯大林宣布工业化战略、捷尔任斯基之死

总而言之，在十四大获胜的斯大林现在处于十字路口。

十四大之后，列宁格勒党组织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莫斯科派去了一个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基洛夫，稍后还派去布哈林。但令人吃惊的是，两派之间的分裂已经深化到当基洛夫来到列宁格勒时，竟然没有给他一个栖身之处；对来自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也不提供与当地共产党员会面的场所。基洛夫抵达初期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沙波什尼科夫为他提供了住处，沙波什尼科夫还给这些莫斯科人提供了合适的讲演厅。来到列宁格勒的这些人召开了数十场群众集会，集会上宣传了十四大的决议，并谴责了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的行径（不过工人们，特别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们强烈反对来自中央使者的干涉，当局为了保障该厂的秩序甚至调去了军队）。接着召开了州的党代表会议，会上布哈林做了主要报告（而他正是季诺维也夫的主要反对者）。谢尔盖·基洛夫成了

列宁格勒党的新领导人。前任领导人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但已不再掌握他曾经拥有的列宁格勒党组织巨大资源的实权。像托洛茨基一样，季诺维也夫也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不过，这一胜利是否能让斯大林完胜呢？

此刻最主要的矛盾在于，虽然获胜了，可他仍不能确信，明天不会失去自己的权力，甚至性命。

阴谋？谋杀？战友的背叛？自然，他该好好想想这些了。不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地位的不稳固是由苏联所处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局势决定的。

确立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斯大林明白，反对这“一个国家”的是整个世界。如今，当世界革命已经稍稍卷起自己的旗帜之时，他能够用什么来自卫呢？

此时的欧洲，各派力量正在重新配置。德国接受了美国的“道威斯计划”，并得到了可稳定经济和支付赔款的贷款。敌对时期结束了。

1925年10月，各方在洛迦诺达成了所谓的洛迦诺公约，并于12月1日在伦敦签署了该公约。

这对于克里姆林宫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说过，洛迦诺不过是“凡尔赛的延续”。“如果认为日益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在指望出现奇迹。”他预言“洛迦诺孕育了欧洲的一场新战争”并指出了战争的焦点：“德国丧失西里西亚、但泽和但泽走廊，乌克兰丧失加利西亚和西沃伦省，白俄罗斯失去它的西部领土，立陶宛失去维尔纽斯。”（斯大林И.，《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3页）

斯大林的浓厚兴趣转向了国际事务，这是因为如果不清楚国外发生了什么，那么就很难对国内所出现的威胁进行与之相应的力量分配。

此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长长的一段时间，参与世界大战的士兵们此时还在咿呀学步，对洛迦诺公约的了解也等于零。

根据这些条款，英国、法国和德国保障了自己边境的稳固。

当然，这一保障并不包括德国的东部边境。

德国人已重返西方世界，而苏联仍处于孤立之中，正担心失去德国及其将军这些自己的主要伙伴。

在这方面，“德国十月”时期莫斯科温和派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导致红军未能攻入德国。

由于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没有中断，而且多亏于此，在洛迦诺公约签订和德国重返国际联盟之后，在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强力支持下，德国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德国在力求保持力量平衡。

于是，军火领域的合作项目得以继续。



当然,也不应当认为,只是苏联在重新武装德国。在克虏伯公司的帮助下,德国与荷兰、南美的一些国家也签订了各种火炮武器的供货合同,并在西班牙造起了潜艇等等。

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德国生产民用飞机的禁令在 1926 年被取消。但德国飞机制造公司“容克”、“亨克尔”和“道尔尼”的飞机,在很多年里仍然在苏联、瑞典和瑞士进行生产。在民用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的幌子下,生产出了整群的军用飞机。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把德国和苏联捆在了一起,即与它们敌对的波兰。这时毕苏斯基在波兰建立了军事独裁,并且拓宽了隔开德国与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

不管在今天看起来有多奇怪,1926 年时德国的将军们最害怕的就是波兰的进攻。

想必,斯大林脑海中关于与德国巩固长期地缘政治亲密关系的念头正是从 1926 年开始的。至于德国人瓜分俄罗斯帝国的计划,他宁愿暂不理睬。

已经获得了西方贷款和保证的德国人,仍然需要通过与苏联签订条约来提高保险系数,这说明了苏德构架的稳定性。

德国向苏联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贷款,也是苏联最大、最可靠的贸易伙伴。这与伦敦试图建立一个反苏同盟的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还应该考虑到,此时在中国,受共产国际支持的孙中山国民政府正与依仗英国人的北洋政府进行着革命斗争。早在 1923 年秋天,孙中山助手之一的蒋介石已在莫斯科就武器供应进行了谈判。而鲍罗廷-格鲁申贝格则从莫斯科去了广东,他应该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来。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了国民党,他出乎意料地开始奉行自主的政策,不再理会共产国际的指示。

斯大林给予了中国相当多的关注,希望能从东方给西方国家一记重击。因为希望能够扩大共产国际的影响,所以斯大林同意了鲍罗廷的一系列行动,这时鲍罗廷企图通过耍花样和贿赂来策反蒋介石的几位将军去反对蒋介石,不过这样不仅削弱了蒋介石的影响,也削弱了苏联的影响,因为尽管蒋介石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还是愿意与莫斯科合作的。

以下的事实可以说明斯大林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他在接见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参赞 Г. 3. 别谢多夫斯基时提及了中东铁路的问题。这条由俄国人修建的铁路由一个委员会(每一方各出 5 人组成)管理,不过主管是由莫斯科任命的,在铁路区内还设有苏联行政管理机关。1924 年 5 月签署的关于调整苏中关系的条约,一方面维护了苏联在中国北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与国民党关系的复杂化。由此可见,莫斯科一边在援助国民政府,一边在与之斗争。

其实,这样的矛盾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上几乎是如影随形。

关于中东铁路的商业运营和成立有中国人参与的股份公司的建议,斯大林是这么答复的(因为有失去这条铁路的威胁):

“如果要从当下的形势中寻找出路,那么最好别创办什么有我方参与的股份公司,直接把这条铁路卖给谁就行了。在卖的时候要尽量保全脸面,并要借此加深某些资本主义强国在远东的对抗。请不要忘记,我们继续留在中东铁路就扭曲了我们东方政策的基本路线。但如果我们能保住脸面抽身离开,并在这种情况下挣得足够多的一笔钱,而且,顺便还可以加剧日美的敌对,就是最好的出路。那我们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中东铁路?就是因为中东铁路可以带来收入,并且由于在中东铁路有我们苏联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保持了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势力基地。当然,当时的事态对于我们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在中国掀起新的革命高潮时,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东北与革命的北京政府建立联系。但是,卖掉这条铁路我们可以得到一笔足够的款项,足以抵得上中东铁路给我们带来的年息了。而一旦北京成立起革命政府,我们还是可以轻松通过北满洲里与它建立联系,就算没有了中东铁路也可以。需要作出决定的是把中东铁路卖给谁最合算。我认为铁路应卖给日本人。不过,您还是再和契切林谈谈这个话题吧。”(别谢多夫斯基 Г.,《通往热月政变之路》,第 251 页)

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苏联担心日本的进攻,因此斯大林就想方设法与日本签订了类似苏德和约的条约,并最终达成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在自己不具备足够军力的条件下,他竭力让对手之间产生碰撞。他预见到迟早会失去中东铁路,于是想趁早得到些补偿。

这就是政治大玩家的逻辑。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地缘政治、共产主义思想和财务上的计算。

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出售中东铁路的想法被外交人民委员 Г. В. 契切林搁置了。契切林、李维诺夫、加拉罕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比斯大林的观点更好或者更差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显示出总书记远未掌握充分的权力。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须进一步斗争以巩固权力。

1923 年至 1924 年间,斯大林就与日本谈判问题与 Г. В. 契切林和 Л. М. 加拉罕的来往信件就证实了他的这一极其合理的立场。

他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这样写道:“一秒钟也别相信那些日本外交官,他们是最阴险的一伙人。请你只相信事实。”

加拉罕回复:“……日本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们亟需跟我们达成一致,不过他们很难就这样放弃石油。我主张对他们要态度强硬,不要怕谈判破裂。谈判破裂对他们的危险比对我们更大。他们坐困萨哈林岛,无法展开石油方面的工作,因



为不可能明天就办妥手续,并且投入这么一大笔资金是有风险的,而搞石油行业需要一下子就投入很多钱,否则就得不偿失了……”(《远东问题》,2005年,第3期,第150、151页)

1925年1月20日,两国签订了缔结外交关系的协定。日本人从北萨哈林岛撤出军队,但获得了该岛北部每一个油田50%的开采权。

尽管别谢多夫斯基对总书记怀有敌意,并将他评价为“头脑简单”的人,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没能证实这个评语。(中东铁路到1934年才卖给了日本。两年后开始了中日战争,再之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所以苏联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掌握住中东铁路,出售是最佳的选择。)

斯大林也犯过错误,也有失败。他为自己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这种代价仍未消除。这里我们并不是要丑化,也不是要神化这位历史人物,而是要根据他从事活动时所处的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去描述他的生平。

当然,英国总罢工的失败、毕苏斯基在波兰的军事政变、共产国际因过高估计蒋介石的革命性而在中国犯下的策略错误,这些都没能使苏联得以巩固,斗争在继续。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在1926年也没有失败。考虑到他们只运用了最低限度的资源,这其实就意味着他们胜利了。当然,在中国犯下的错误在下一年里演化成了悲剧。

不过,此时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矛盾波澜再起:过去相互敌对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因复仇愿望的驱使联合起来了。他们并不明白,自己身后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他们仍然生活在不久以前的幻想中,以为只要联合起来对付斯大林,一切就还能改变。

其实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党的刊物和机关已不再由他们控制。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问题》的小册子里提出了“新反对派”所犯错误的理论根据。

斯大林拿出季诺维也夫反对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命题,指责他在“资本主义分子”面前犯有投降主义的错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没有信心。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还被指责存在“扭曲列宁主义”的错误。很可能,在这个过去的神学院学生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个离经叛道者的形象。不管怎样,斯大林的工作充满了与变革者斗争的激情。

然而斗争仍在继续。托洛茨基声称,官僚们背叛了革命,一场新的以无产阶级失败而告终的热月政变正在逼近。他建议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方针:快速发展重工业、使党民主化、改善工人的处境、与富农作斗争。其重点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其他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区别仅在于变革的速度。托洛茨基要求的是革命性的变革,而斯大林还寄希望于渐进性的变革。尽管这些分歧看上去很严重,但它们并不涉及党的权力构架的根本原则。对“官僚主义”进行攻击的托洛茨基显示

出了其对领袖地位的渴望。

1926年4月13日,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党组织作了《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已经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即“直接工业化”时期。

“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制造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生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1页)

但是从哪儿可以获得资金?斯大林指出有三种西方所熟悉的工业化方式:殖民掠夺、战争赔款和对外租让企业。但这些都合适。他说,第四种方法是靠自己的积累。

从这里到农业经济的集体化仅一步之遥,不过暂时他还寄希望于实现列宁的合作社思想。

而此时的反对派集团,按斯大林的话说,正“坠入冒险主义的泥潭”。

这时时局的特别之处在于,反对派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那样活动,他们着手成立秘密组织,并到处散发由小型印刷机印出来的呼吁书和文章。实际上在建立起一个与党平行的机构。季诺维也夫则是通过共产国际书记处来散发反对派的材料。

1926年6月6日,发生了可以视为密谋准备的事件: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党内积极分子们来到莫斯科郊区的森林里秘密集会,与中央候补委员、副军事人民委员 M. M. 拉舍维奇进行了会谈。拉舍维奇在内战时期曾任集团军政委和司令,是季诺维也夫安插的人。

反对派正式表示军队正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军队的指挥人员大多数是“由旧军官和农民中的富农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的影响正在减弱。

6月1日,斯大林前往梯弗利斯,因此他也就无法亲自控制首都的局势了,首都的事交给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捷尔任斯基来处理。

6月8日,他在梯弗利斯市的一些主要的铁路工厂的会议上做了报告,当年他正是在这座城市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演讲向听众流露出了一种难以觉察的善意的优越感。

“同志们,我应当告诉你们,凭良心说,这里对我的颂扬,我连一半也不敢当。原来我又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又是神奇的勇士,又是什么等等。同志们,这都是无谓的话,都是绝对不必要的夸张。这种话通常是在革命烈士灵前讲的。但是我还不打算死呢。”(斯大林 II,《斯大林全



集》，第8卷，第173页）

听众对他报以热烈的欢呼。

在梯弗利斯，斯大林欣赏了歌剧《塔马尔·茨比也利》，并与作曲家 M. 巴兰契瓦泽进行了交谈，指出俄罗斯作曲家尤其是 П. И. 柴可夫斯基对格鲁吉亚作曲家的影响。

音乐，不是政治，也不是党派斗争，但斯大林觉得自己有能力讨论它的特别的细微差别。他之所以对自己有信心，要归功于早在童年时代在教会合唱团的演唱经历和在神学院获得的音乐基础知识。

一般说来，斯大林的艺术品位是他一个很有意思的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谈及。这里，我们仅先让大家注意到我们主人公越来越显著增长的智慧。

斯大林离开莫斯科近一个月，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对那里所发生事件的关注。

梯弗利斯之行后他去了索契休假，在那里对吃鱼中毒进行了治疗。6月15日，他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在努力康复。”

其实，他对自己的健康关注得不多，更多的是为“格里沙（即季诺维也夫）的蛮横无理”和拉舍维奇的“秘密聚会”而不安。斯大林预言“他们打算同托洛茨基一起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破坏党”。

信的口气非常平静、自信。最重要的一句是：“如果我们想防止党出现意外情况，我们就必须对反对派的人进行重新调整。”

他说的这些话晦涩难懂。不过，斯大林马上就抛开外交辞令，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想，很快我们就能打托洛茨基、格里沙和加米涅夫一个嘴巴，使他们成为像施略普尼柯夫那样的背叛者。”（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230、231页）

6月25日，他再次回到这一话题。这封信揭示了斯大林思维的过程，因此格外有意思。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收信人的称谓：“致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其他朋友们”。

“朋友”一词是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亲近的标志。至少他是将团结的程度提到了最高。

第二点可以看到，他运用了象棋术语，仿佛正在考虑“下一步棋怎么走”：“关于‘拉舍维奇案’我思考了很久，一直举棋不定，我把这个问题同整个反对派集团的问题联系起来，几次得出的结论都不相同，最终形成了如下几点意见。”

第三点是对威胁的分析：

“在季诺维也夫集团出现之前，各反对派（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等）表现得还算是比较规矩，也还算是比较克制。

“随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出现，反对派开始变得蛮横无理，超出了奉公守法的范围。

“季诺维也夫集团成了反对派所有分裂活动的鼓动者，是党内分裂派的实际首领。

“季诺维也夫集团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a) 比起其他任何集团来说，它更熟悉我们的方式方法；b) 它比其他集团更强大，因为它手中握着拥有重要实力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c) 它表现得比任何其他集团更肆无忌惮，给其他反对派作出了‘勇敢’和‘果断’的榜样。

“因此季诺维也夫集团是目前最有危害的集团，在全会上应该给予打击的也正是这个集团。”

第四点体现在行动计划上：

“不仅要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也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同时还要警告他，如果他不停止分裂活动的话，就要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要么我们现在就进行这种打击，以期使托洛茨基和其他人重新变得循规蹈矩起来，要么我们就去冒让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变成没有工作能力机构的风险，而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党内就会闹出危害事业和团结的大麻烦；

“也许，在此之后季诺维也夫会提出辞去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职务，那时我们应当接受他的辞呈。无论如何，被开除出政治局之后的季诺维也夫不可能再当执委会的主席了。所有的党组织都会理解这一点，也都会自己做出必要的结论。届时我们将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主席领导制改为书记处领导制。此举将解除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武装，并肃清猖狂进行分裂活动的季诺维也夫路线（请想想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的那些话吧！）。”

第五点是在对未来的规划上：

“以前我想过，需要在全会上搞一个广泛的关于统一的决议。现在我认为，这样的决议最好推迟到代表会议上（做一些原则性的论证等等）或是代表大会上。在全会上可以而且也需要搞一个简短的有关团结的决议，援引列宁在十大上有关统一的决议，结合拉舍维奇案做一个概括的论述。这个决议里需要说明，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因为他与中央委员会意见不一（托洛茨基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同样严重，但并不存在要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是由于他（季诺维也夫）的分裂政策。我认为，这样做会更好，因为这样工人就能够理解了，因为他们重视党的统一，而对于其他反对派来说这将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取代季诺维也夫进入政治局的可以是捷尔任斯基。党可以接受这个方案。或者可以将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增至 10 人，把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都列入其中。至于在全会上搞一个广泛的决议（按此前的计划），会使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正式结为一个阵营，我就不说了，这样做可能还为时过早，而且从战略上也是不合理的。最好是将他们各个击破。让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为季诺维也夫辩护吧，我们洗耳恭听。在现阶段这样做总归要好一些。日后会见



分晓的。

“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再详谈。我想，我会在全会开会前3至4天回到莫斯科。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232、233页)

我们强调一下他所说的“最好是各个击破”这句话。这是政治上的特级国际象棋大师,一个新的马基雅维利。

信中还有一个想法可以证明上面评价的正确性:“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是认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拉舍维奇案折腾得够苦的了……”您难道感觉不到这字里行间传达出的对斗争进程的心满意足吗?

7月4日,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1926年7月14日至23日)上,另一场战斗正等着他呢。从第一个问题(粮食征购)起就展开了尖锐的辩论。就在会场上,捷尔任斯基的心脏病发作,他被送到休息室躺下休息。回到家中,他就死了。

空前的相互反驳说明了辩论的尖锐程度:捷尔任斯基突然提出要枪毙反对派的头儿们,对方回敬他:“是你该被枪毙!”

全会上的论战未必能够改变克里姆林宫的力量比例。不过反对派仍是在党内民主的框架内活动,他们没有想到,尽管他们主张加速工业化和增加对富农征税,但这些计划将是由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来实施的。

那么,除去权力斗争之外,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不大。或者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或者是等待世界革命,即慢慢投降。

机智的卡尔·拉狄克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作报告时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小说中的“孤家寡人的蓬帕杜尔”(昏聩刚愎的大官——译注)同样想在一个县里推行自由主义。

拉狄克所指的“蓬帕杜尔”是谁?是未来的胜利者。

所以,如果不谈胜利的代价,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斯大林与“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冲突里,并不存在一条对于国家来说是前进的道路。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人都倒向后来被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一方了。

也许,在“故土”、“祖国”这些词语被视为反革命标记的环境里,“爱国主义”一词显得并不合适,但历史事实就是这样。

路标转换派分子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将这一进程称为“十月革命的民族化”。而正是斯大林将这场战役从“德国十月”领入到了“十月革命的民族化”。

在捷尔任斯基的葬礼上,斯大林将这位逝去的战友视为英雄:

“不知休息,不辞劳苦,勇敢地 and 困难作斗争,克服困难,把全部气力、全部精力献给了党所托付给他的事业——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在工作

中燃烧并融化了自己。”(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3页)

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号召年轻人“效仿捷尔任斯基同志”。是斯大林塑造了捷尔任斯基的英雄形象。

很快就应该出现这样的苏联英雄了,他就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为了社会利益克服了个人痛苦的保尔·柯察金。

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将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

第三十三章

反对派被开除出政治局

反对派被开除出政治局、“克鲁普斯卡娅是分裂分子”、斯大林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乌克兰在斯大林的掌控中

7月全会的结果是季诺维也夫失去了在政治局里的位子。拉舍维奇也被军事人民委员部除名，被中央委员会派去担任中东铁路委员会副主席。

反对派的“翻盘”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在全会中，Я. Э. 鲁祖塔克进入改组后的政治局。Г. И. 彼得罗夫斯基、Н. А. 乌格拉诺夫、Г. К. 奥尔忠尼启则、А. А. 安德烈耶夫、С. М. 基洛夫、А. И. 米高扬、Л. М. 卡冈诺维奇和 Л. Б. 加米涅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托洛茨基保住了政治局委员一职，虽然斯大林集团完全可以也将其开除出去，对加米涅夫也是如此。

斯大林将撤换控制到最小的程度，结果是他的那些最热烈的拥护者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升迁。不过，还是有一些他的人得到了晋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安德烈耶夫。

В. В. 古比雪夫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此外，加米涅夫辞去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的职务，米高扬被委派担任该职。

在交接工作时，加米涅夫对继任者说：“我们正走向革命的灾难性结局。”米高扬

对他的想法感到惊讶，他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两年之后，米高扬与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同坐一辆车从祖巴洛沃别墅返回莫斯科。米高扬在谈干部问题时说出了设立总书记的意见：“您现在非常重视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并认为他们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人物。但很快我们将让您代替他们，而且您会做得更好。”（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第 289 页）

可能，早在 1926 年 7 月提拔新干部时，斯大林就预见他们的权力将扩大。目前，他正迈着坚定不移的舞步朝大权独揽、没有挑衅的绝对权力挺进。

全会之后，反对派试图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拉到自己一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告中央委员会书》中警告说：“斯大林帮”正在篡夺权力。

顺便提一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此时还没有独揽大权。

从 10 月 1 日起，反对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各级党组织中积极开展宣传。从 10 月 1 日至 8 日，两市共有 87388 人参加了集会。参加集会的党员中只有 496 人是支持反对派的，虽然根据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的数据，暗中支持反对派的占共产党员的 45%。

反对派的行动多数是受到党的机关的挑衅而自发形成的。比如，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只因几名工人想弄清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思想到底是什么，就把他们开除出党。

除了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外，他们的思想听起来颇为诱人，但却是抽象的。托洛茨基提出要“削减 5 亿因官僚主义造成的开支”，再从富农和耐普曼那里收取同样数目的一笔钱，而得到的 10 亿分别用于“工资和工业”。很难认真去领会这个计划，它只适用于群众集会。

在这些大会上，托洛茨基生平第一次被喝了倒彩，他的演讲天赋没能帮上忙。

以下就是托洛茨基本人所说的话：“初秋时，反对派在党组织会议上公然出击，机关给予了猛烈的回击。思想斗争被行政手段所取代。每当反对派登上讲台，党的官僚们就打电话把工人支部召进会场，疯狂地集中汽车，喇叭轰鸣，有组织地吹口哨吼叫。掌权的一派动用组织手段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施压，并以镇压相威胁。广大党员群众事先已经听到了什么，明白了，表态了，他们担心党的分裂和灾祸临头。反对派被迫撤退了。”（托洛茨基列，《我的生平》，第 515 页）

10 月 4 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政治局递交了声明，称愿意停止公开论战。这就是认输了。

斯大林向反对派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与共产国际里反对派的拥护者们决裂。多数派中有人建议缓和一下批评的口吻，并认可反对派有在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大会上通过辩论纸条申述自己观点的权利，但不能太多。



10月16日,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以及其他反对派都声明将停止论战,并部分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中央委员会中大部分人并不愿出现分裂,因为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机关中失去干部、削弱党的力量,甚至面临丧失政权的危险。

斯大林在这一时期还不是独裁者,尽管他已经大权在握。

冲突双方争夺的正是权力,这也是他们策略的目的所在。但是由于担心自己党内的派系斗争将使其他政党得以复兴,从而丢失革命成果,所以他们并没有走上极端。至于捷尔任斯基呼吁枪毙持不同政见者那件事,不过是他们争论得过了火。

但是在与反对派就保持党的统一获得共识并达成妥协之后,斯大林却利用了反对派对自己错误的承认。

在10月23日至26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审议了“关于派系活动和部分中央委员违反党纪的党内状况”的问题。

斯大林违背了互相妥协的约定,出其不意地来了一击。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赶出政治局,当然仍保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由布哈林代替了他。

这几位列宁的战友变成了人数众多的中央委员会的普通委员,失去了昔日的地位。

在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反映出了他对自己最亲密战友的态度,这是不带任何幻想的。比如他称奥尔忠尼启则是“小气的人”,并说“不再和他见面了”(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249页)。看来,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党内绰号——译注)的不稳重,甚至是任性已经让斯大林厌烦了。

很快他冷静下来,并要求不要伤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自尊心。

一般说来,斯大林有时会明显地感到精神上的孤独。这种情绪从他写给妻子的那些真挚的、关心的、洋溢着爱意的信中反映出来。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在这里提到它,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他对自己身边人的明显不满。

让我们来读一下他给莫洛托夫的信吧:

“至于那神圣的三驾马车(P. + Op. + B.),我暂时保持沉默,因为可以谈论他们的口实还不少。Op.是个‘好小伙’,但作为政治家却是个冒牌的,他一直是一个‘幼稚的’政治家。B.,简直就是‘心不在焉’。至于P.,他喜欢‘耍手腕’,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所在。”(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259页)

这些姓氏开头字母之后藏的是谁?可能就是李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

“而米高扬,在政治上是一只雏鸭,是一只有能力的雏鸭,但终究仅是只雏鸭。等

他长大了,情况才会好转。”(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263 页)

在斯大林的这些评价里不带什么情绪,多半是在摆事实。

如果环顾一下,他身边已经没有一位是老近卫军的真正斗士了。他们要不留在了过去,要不就是不理解他。

似乎斯大林正是在这时才意识到,为获得上升空间和绝对权力而付出的代价会是极为沉重的。

把他给妻子的信与给同事的信做个比较就能看出,他下意识地从小妻子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在她自杀后,斯大林很悲伤,并最终变得判若两人。

提到斯大林的内心世界和家庭生活,应该提到他的个人生活是异常俭朴的,简直可以跟苦行僧相比。在他与妻子的通信中,在回答妻子要求寄点钱去的请求时,他抱歉地说,寄去的钱少于自己想要寄去的,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钱了。当你读到这些时,就尤其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同时,斯大林知道,远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是这么恪守规矩的。

想必,他的一生中不断被这种道德准则的差异所触怒,并不止一次地爆发出对此的愤慨和怒气。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并描述了父亲对此的反应,那是在政府疏散到古比雪夫市时(1941 年秋),为领导人的孩子们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学校。

“父亲突然飞快地扫了我一眼,正如每当什么东西触犯他时他所做的那样:‘什么?专门的学校?’我看到他逐渐愤怒起来。‘瞧你们!’——他在寻找比较文明点的词——‘瞧你们,可恶的特权阶层!瞧,政府来了,莫斯科人来了,还给他们搞个单独的学校!弗拉西克,这个下流胚,这事准是他干的!……’他大发脾气,仅是另有一些急事,还有其他人在场,才引开了这个话题。”(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115 页)

所以,1926 年 11 月斯大林的岳父、老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列宁格勒“国营列宁格勒发电站联合公司”负责电网管理工作的 С. Я. 阿利卢耶夫向基洛夫寻求保护,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事情是这样的:阿利卢耶夫开除了几个接受顾客小费的电工,《红色报纸》为被开除者进行辩护,并指责阿利卢耶夫“带有偏见、办事马虎”。

斯大林这位沮丧的岳父抱怨说:“一位不诚实的工人通讯员常常在报纸上提到我的名字,这是因为我是行政官员,是管理人员,并且能够大胆地与腐败丑行作斗争。”(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15 页)

正如我们所见,总书记的亲戚并没有任何豁免权。

阿利卢耶夫的信还反映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无法解决的问题:不管怎么严惩“道德蜕化”、“唯利是图”、“钻营谋利”等行为,但是,无论是在世俗



大众之中，还是在党内精英之中，廉洁奉公的思想都没有被普遍接受。

看看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感受到的应该不仅是孤独，还有失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负荷变得越来越重。

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给了加米涅夫最后一击。他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一个事实：1917年3月从阿钦斯克市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大公安去一封署名加米涅夫的贺电。

尽管加米涅夫数次绝望地喊叫（“你说，你是在撒谎！你说，你是在撒谎！”），托洛茨基也即席反驳，用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措辞来暗示（“这是粗暴和不守规矩！”），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稍后，即12月26日，他写信给莫洛托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进行得不错。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获得一致批准通过（只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博尔迪加派分子投了弃权票）。我们的反对派是一群傻瓜，竟然鬼迷心窍，硬要较量一番，结果遭受重创。鉴于加米涅夫的流氓言论，我不得不在总结发言中向他提起给M. 罗曼诺夫发电报一事。加米涅夫‘反驳’说，‘这是谎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费奥多罗夫给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反驳声明’，并要求予以公布。我们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了这份声明，并附上了中央委员会的回复和一些足以在政治上置加米涅夫于死地的文件。我们认为，他已经离了队，不应该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了。”（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255页）

这番话有点不依不饶的意思。他没有想起年轻时与加米涅夫在梯弗里斯的初识、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共同流放，以及1917年在彼得格勒时两人的密切联系。

大概在他周围还留有一些可以谈谈这方面话题的人。但他未必会去同情或怜悯过去的同志，因为斗争已经越过了临界线。

以下就是他对“神圣的象征”——列宁的遗孀做出的残酷的、原则性的评价：“克鲁普斯卡娅是个分裂分子（请看看她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的那段谈话）。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党的统一，就必须像对待分裂分子一样打击她。绝不能在同一时间采用两种相反的方针：既与分裂分子作斗争，又与他们和平相处。这不是辩证法，而是无稽之谈和软弱无能。”（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249页）

就在过去的战友纷纷被击溃的同时，斯大林突然从实现自己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回到了老的价值观念上。

1926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文学和戏剧界的大事，一直到不久之前它还被公认为反革命事件：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布尔加科夫的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由《白卫军》改编而成）。

如果没有这场演出，布尔加科夫未必会那样死去。

1926年5月7日，他的住所遭到搜查，小说《狗心》的手稿和日记被没收。在接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问时他承认：“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苏维埃俄国批判的和不友好的态度……我的好感完全在白军一边，对于他们的退却，我是带着惊讶和困惑来看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叶莲娜·布尔加科娃，《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日记》，第65页）

但是，10月5日，正值与“新反对派”的斗争最紧张的时刻，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上演了！在此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禁止该剧上演的。9月30日，政治局批准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许可，并废除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禁令。

我们要指出，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主人公们是一群生活在大俄帝国情结之中的白军军官和他们的亲人。尽管他们最后失败了，但依然忠于祖国。

有这样的对白：

梅什拉耶夫斯基：够了！我从1914年起就开始打仗了。为什么？为祖国？为那个曾让我饱受耻辱的祖国？！而我还得去为这些大公拼命？！去他的吧。看见吧（做了个轻蔑的手势）？绝不！

斯图津斯基：请解释一下，说说看。

梅什拉耶夫斯基：我现在就解释，你们要给我保密。我难道是一个傻瓜吗？不是。我，维克多·梅什拉耶夫斯基，在此声明，我再也不会跟这帮恶棍将军们共事了！我不干了！

拉里奥西克：维克多·梅什拉耶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了。

梅什拉耶夫斯基：是的，可以这么说吧，我支持布尔什维克！……不，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漂浮不定的生活。让他们去动员吧！至少，我知道我在俄罗斯的军队中服役，人民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人民反对我们。

……

斯图津斯基：我们的俄国曾是一个伟大的强国！

梅什拉耶夫斯基：还会是！会的！（布尔加科夫 M.，《布尔加科夫八卷作品集》，第2卷，第509、511页）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要走这一步？

布尔加科夫的这部作品偶然间落入了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狂热碰撞的中心，并被各方（相当粗野地）利用了起来。

针对反对派的反大国主义的观点，斯大林表现出了自己大国主义的立场。这一进程曾影响极大、轰动一时。



此外，斯大林喜欢这个戏剧，他看了该剧 15 次，有时甚至带上孩子瓦西里和阿尔乔姆一起去看。

A. Ф. 谢尔盖耶夫(即阿尔乔姆，斯大林的养子——译注)与本书作者交谈时是这样回忆他们的剧院之行的。斯大林问孩子们：“你们认为这出戏讲的是什么？”他们很快回答：“里面有白匪，是敌人。”斯大林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解释说：“戏里并不全是白匪，也不全是敌人。总之人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中很少有纯粹的白匪和纯粹的红军。一些人十足的白匪，而其他只能算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匪。红军同样如此。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取决于他们的领导人。”

谢尔盖耶夫少将经历了整个国内战争，被俘过，从那里逃跑出来，受过伤。他没能飞黄腾达，1945 年时还是个少校，成为少将也是养父死后的事。

看完戏后的这段谈话让他永志不忘。

的确，这段孩童的认知实际上刻画出了斯大林评价他人的方法论。时间和人物变化了，那么评价也变了。

在对布尔加科夫的这部话剧做出这种评价时，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支持了它的上演。但允许上演的范围很有限：仅限于莫斯科，还仅限于艺术剧院。不过，这扭转了过去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大大扩展了“自己人”的范畴，把一部分以前的敌人也包括进来了。(很快对另一位伟大的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也有了类似的评价；他在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痛苦地承认了布尔什维克在农业俄国取得的胜利。)

为了证实我们对斯大林在《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事件中所持态度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引用侨民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关于布尔加科夫的一番叙述：

“他从能够俯视众生百态的高度，带着稍许冷漠和相当忧郁的讥笑看着我们。毫无疑问，其视点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他眼里红军和白军都融为一体了。总之，这些区别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引自：萨哈罗夫 B.，《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作家与政权》，莫斯科，2003 年，第 90 页)

“区别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这也是总书记在这位思想上异于自己的作家的作品里所看到的。

在《共青团真理报》和《工人莫斯科报》上，该剧马上遭到了党性批评的猛烈抨击，要求禁止上演该剧。莫斯科党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H. 曼德尔施塔姆声称，反革命分子正在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里筑巢。但是，背后有其他势力支持的教育人民委员 A. B. 卢那察尔斯基却对该剧予以支持。

此后，人们不止一次地试图封杀《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但从 1926 年到 1941 年，它还是得以上演了 987 场。

1929 年 2 月，在回答一位热衷于文艺队伍纯洁的文学家比里-别洛策尔科夫斯基

的来信时，斯大林论及了这一话题：

“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它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如果像土尔宾这样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对这些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

“当然，作者的这种显示是一点也‘没有过错’的。但这和我們有什么相干呢？”（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328 页）

在这部剧被禁演时，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不容许的，应该直接干预。1932 年 2 月，他去观看了 A. 阿菲诺格诺夫的话剧《恐惧》，并向剧院领导询问：“你们有部好戏《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什么不上演？”回答说该剧被禁演了。“胡说，”他表示反对，“一出好戏，应该上演！请演吧……”（《Ю. 斯廖兹金的日记》，引自：萨哈罗夫 B.，《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作家与政权》，莫斯科，2003 年，第 137、138 页）

与此同时，在读完了布尔加科夫的另一部话剧《逃亡》后，斯大林反对该剧上演。他的建议被转给了作者：“应该增加一些场景，塑造出苏联国内战争的国内社会动因，使观众能够了解，所有这些自称为‘诚实的’谢拉菲穆之流和各种各样的编外副教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们的任性，而是因为他们曾经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不管他们如何‘诚实’），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剥削的‘诚实’拥护者赶走是体现了工农的意志，因此是做得完全正确的。”（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327 页）

除了《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事件之外，还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B. B. 舒利金的著作《日子》和《1920》得以出版。舒利金是国家杜马的议员，曾与古契科夫一起接受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后来他参加了白军运动，跟随过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与库捷波夫将军交好。正如《1920》的序中所言，他是个“极右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

《1920》描写了弗兰格尔控制下的克里米亚和库捷波夫控制下的盖利博卢，即描写了白军运动的最后希望和最终垮台。尽管 C. 皮翁特科夫斯基在序中指出“舒利金还是未能为白军运动做出思想上的辩解”，但事实上这一思想在书中有着很好的表达。俄国的复兴要依靠意志坚强、精神纯洁的人。从如今白军的溃败中，他看到了不灭的种子，这颗种子将在苏维埃俄国发芽，并结出白色思想的胜利之果。

“其实啊，尽管是本能的，但他们浴血奋战只为了复兴‘受到上帝保佑的俄罗斯帝国’……他们将用自己的红军（按‘白军方式’组成的）四处扩张，直至受到其他国家顽强抵抗的牢固疆界。”

“这将是未来俄罗斯的天然边界……国际主义将‘悄然离去’，而边界将永存……”（舒利金 B.，《日子（1920）》，莫斯科，1989 年，第 527、528 页）



正如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体系的研究者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所注意到的，这类政治文献在苏联尚未出版过。

很明显，这说明党内高层存有严重的思想分裂，这种分裂甚至可以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教会分裂相比，而那场分裂的结果使约瑟夫·沃洛茨基关于强大的君主制度具有道义依据的思想获得胜利。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斯大林正是倾向于这种具有俄罗斯传统的“雷帝式的极端”（很快这便体现在对影片《伊万雷帝》上映的直接批准上了）。沙皇伊万四世，绰号雷帝，正如众所周知的，“他决定在莫斯科公国建立由挑选出来的少数忠诚的人——‘特辖军’为之效忠的独裁以维护国家的正义。”（阿列克谢耶夫 H.，《俄罗斯民族与国家》，莫斯科，1998年，第98页）

舒利金的另一本书《三个首都》在当时也得以出版，该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独特的，是作者从国外侨民聚居地到那时的俄国的旅行随笔。作者并不知道，他的旅行受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监视，是属于“托拉斯”反间谍行动（后面会说到这个行动）框架内的行为。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反对革命的”，充斥着各种恶毒抨击，但其中也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作者的结论是：在这段旅行之前他是没有故乡的，而现在有故乡了。要知道，故乡指的是苏联。第二，作者说道，尽管犹太人还在掌权，但“强大的俄罗斯人的潮流”正汹涌而来，并很快将成为主流。

尽管书中有对斯大林的轻微抨击，但书刊检查机关还是放行了该书。那段抨击是这样的：“的确，关于斯大林，有人说，‘找一头粉红的驴子都要比找一个聪明的格鲁吉亚人更容易’，但我还是没有失去希望。我们已经让列宁执行了‘新经济政策’……”（舒利金 B.，《三个首都》，莫斯科，1991年，第145页）

我们应该清楚，总书记没有在意这种揶揄。

结果出现了惊人的一幕：斯大林向大多数民众建议，在承认这些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与他结盟。

这个主张是不是太大胆了？

不，它是合理的。

我们再次回想一下“雷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经验。取得了平民阶层的认可后，他废除了“贵族世袭制”，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不复存在，世袭贵族失去了权力。

作为一个善于建立各种联盟和利用新生力量打击对手的行家载入史册的斯大林，如同伊万雷帝一般崇拜国家专制。

因为反对派还在，斯大林被迫周旋应对。招数多种多样，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他死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斯捷潘·米高扬说：“斯大林生平有两大恐惧：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和列宁格勒的反对派。”（瓦西里耶娃 Л.，《克里姆林宫的儿女

们》，莫斯科，2001年，第329页）

尽管和莫斯科及北方首都相比，乌克兰不过是一个省，但若没有这个省，国家也不可能存在了。

1926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推行“乌克兰化政策”，时任乌共总书记的是Л. М. 卡冈诺维奇。这样做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存在是植根于对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原始民主制度、基辅大学知识分子们的启蒙运动、地方自治制度与合作社经验的历史记忆之上的。此外，还应补充上彼得留拉和马赫诺的民族国家和军事实践的经验，尽管这是不成功的经验。与敌国波兰为邻的状况则面临战争频频发生的危险。

第二，乌克兰经济的发展造成乌克兰国家的民族状况处于两个不同的水平。在工业地区居住的主要是俄罗斯族人，而农业地区则是乌克兰族人。在国内战争期间，这些地区的交界处出现了分裂，甚至成立了转瞬即逝的国家——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

对此，我们需要补充一个并不遥远的往事：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在德国总参谋部瓜分俄罗斯帝国的计划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乌克兰。

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斯大林遇到了麻烦。这个麻烦的历史久远，如果不是从基辅罗斯开始，那么至少从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战争开始就肯定存在了。

在乌克兰的事情上，苏联时期的国家政策与苏联之前的国家政策其实并没有脱节，因为斯大林运用了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经验，后者在与赫梅利尼茨基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之后，迈出了激进的一步——修改了祈祷用书（用基辅版代替了莫斯科版）。这也引发了后来的尼康大牧首的全面改革。也就是说，出于政治和国家的目的，莫斯科当局站到了乌克兰政治阶级的一边（H. 特鲁别茨科依语）。

不过，“乌克兰化”在1926年尽管看上去表面光鲜，却引发了新的问题，加剧了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政治家之间的争斗。同时，在中小学、高等学校和政府机关强制推行乌克兰语，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居民强烈的不满。

到1927年，已有80%的中小学校改用乌克兰语教学，三分之二的公文采用乌克兰语，广播和电影已完全使用乌克兰语。（请注意，当时在乌克兰开展了广泛的文教工作，使居民中比例很高的文盲数量得以降低。总体上，投入到共和国经济上的资金占了苏联财政预算的50%。）

结果，对乌克兰语的人为扶持只使那些并无建设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得到了满足。很显然，这个问题是无法快速解决的。

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舒姆斯基从基辅来面见斯大林，抱怨卡冈诺维奇独断专行的领导方式和在实行“乌克兰化”中不够积极，并建议只有乌克兰族人才能被任命为共和国的领导人（舒



姆斯基忘了,或者本来就没有读过斯大林关于俄罗斯文化在民族边疆地区应起主导作用的著作)。结果,总书记给卡冈诺维奇和乌共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发去一封信,极其谨慎地批评了他们在“乌克兰化”政策上的冒进行为。

第一,他把我们党的机关和其他机关的乌克兰化跟无产阶级的乌克兰化混为一谈。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可以而且需要乌克兰化。但是绝不能从上面加压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决不能强迫俄罗斯工人群众放弃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而把乌克兰文化和语言认作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是跟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相抵触的。这不是民族自由,而是一种独特形式的民族压迫。无疑地,随着乌克兰工业的发展,随着乌克兰工人从城郊的乡村流入工业区,乌克兰无产阶级的成分将发生变化。无疑地,乌克兰无产阶级的成分将要乌克兰化,正像拉脱维亚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的成分一个时期具有德国化性质而后来也开始拉脱维亚化和马扎尔化(马扎尔人是匈牙利人的自称——译注)一样。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自发的、自然的过程。企图从上面以强制无产阶级乌克兰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自发的过程,这就等于实行一种空想而有害的政策,这种政策会在乌克兰境内非乌克兰的无产阶级阶层中引起反乌克兰沙文主义的情绪。我觉得舒姆斯基没有正确了解乌克兰化,而且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危险。

第二,舒姆斯基强调了在乌克兰争取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的新运动的积极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运动的阴暗面。舒姆斯基没有看到,在乌克兰本地共产党员干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这个往往由非共产党人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就会在某些地方带有使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疏离全苏联文化和全苏联社会人士的性质,带有反对整个“莫斯科”、反对整个俄罗斯人,反对俄罗斯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列宁主义)的性质。我不想证明这种危险在乌克兰是愈来愈成为现实的了。我只想说,甚至某些乌克兰共产党员也不免犯这种毛病。我指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即著名的共产党员赫维列沃依在乌克兰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赫维列沃依要求在乌克兰“立即使无产阶级非俄罗斯化”;他主张“乌克兰诗歌应当尽快地摆脱俄罗斯文学及其风格”;他说“即使没有莫斯科的艺术,我们也知道无产阶级思想”;他迷恋着乌克兰“青年”知识分子的什么救世主的作用;他怀着使文化脱离政治这种可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企图——现在这个乌克兰共产党员所唱的这一切和许多类似的调子,听起来是(不能不是!)非常奇怪的。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和他们的共产党都对“莫斯科”、对这个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堡垒深表同情的时候,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都怀着赞美的心情仰望飘扬在莫斯科的旗帜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员赫维列沃

依却号召乌克兰活动家“尽快地”摆脱“莫斯科”，除此以外竟没有讲一句拥护“莫斯科”的话。这也叫做国际主义！如果共产党员都开始讲赫维列沃依那样的话，而且不仅在口头上讲，甚至还在我们苏联报刊上写文章，那么，对其他非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乌克兰知识分子，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舒姆斯基不懂得，在乌克兰要掌握、争取乌克兰文化的新运动，只有反对共产党员队伍中的赫维列沃依式的极端行动才有可能。舒姆斯基不懂得，只有和这种极端行动作斗争，才能把日益增长的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变成苏维埃文化和苏维埃社会人士。（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151—153 页）

在斯大林的理解中，“苏联的”就意味着是“全国的”。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员作家 М. 赫维列沃依提出了“离开莫斯科”的口号，他呼吁不要模仿俄罗斯文学，而要遵循自己的民族传统。

尽管他的呼吁表面上局限于专业方面，但实际上在其背后蕴含着许多世纪以来的“小俄罗斯国家”问题，即部分乌克兰知识分子试图摆脱自己的外省人情结。但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用强力解决的。

“离开莫斯科！”这是要去哪里？去土耳其，德国，波兰？或者建立自己的“乌克兰星球”？从历史和事实看，离开就意味着向波兰和天主教会靠拢。这也意味着乌克兰的反苏维埃民族特性会增强，这是应当被视为动摇中央集权和叛国行为来对待的。

与此同时，“乌克兰化”触犯和侮辱了很大一部分构成了俄罗斯社会中坚力量的乌克兰人，他们在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和文化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与俄罗斯族人一样，生活在同样一个东正教的传统中。（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早在 16 世纪，正是在批准了波兰教会和天主教会与向基辅拓展的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之后，乌克兰与欧洲的文化联系被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东正教哥萨克人的起义切断了。）

所以，在接见舒姆斯基时（按常规他这样的人物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可能指望能够与总书记会面的），斯大林一定想起了立宪民主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按照民族原则划分俄罗斯的结果是“主权国家的自由联盟”，而后将是“俄罗斯的瓦解、国家统一的破坏和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按民族地域设立行政区的风气盛行于整个俄罗斯联邦，共计有 2930 个农村民族政权机构，110 个民族乡，33 个民族区和 2 个大民族区。而在一些少数民族共和国里，俄罗斯族区也被看做少数民族区。

原则上，在“乌克兰化”时期，斯大林感到他不可能很快地解决分裂主义的问题，于是刹了车。

不久，在哈尔科夫召开了乌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卡冈诺维奇在会上提出了“对俄



罗斯工人的乌克兰化要持谨慎态度和工业领域乌克兰族工人数量已经饱和”，同时还谈到“在民族问题上的各种倾向”。

在某种意义上，C. 米高扬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稻草人”的那番话是正确的，不过事件不仅仅局限在乌克兰。斯大林将确保国家统一视作自己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年复一年，他将越来越严厉地监控来自这方面的威胁，直至对此类罪行设立死刑。

第三十四章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白卫军”路线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白卫军”路线、发生在中国的危机、德特丁进行反对苏联的经济战争并资助白卫军恐怖活动、季诺维也夫谴责斯大林的错误国际政策

在回归俄罗斯国家观念这一问题上，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布哈林让斯大林的立场变得十分复杂。下面一段文字是很典型的，它能说明许多问题：

“布哈林对俄国的过去怀有真切的厌恶之情。也许，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所有领导人中，他是最能体现早期布尔什维主义中反民族主义思想的人物。难怪革命初期他是左派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之一。这并非因为他具有很强的能力，而是他身上带有某种存在主义的东西，带有某种民族的自我仇恨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阿古尔斯基 M.，《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巴黎，1980 年，第 207 页）

在评述布哈林时，还应该补充一点：他在 1926 年写的自传中承认，童年时在读过 B. 索洛维约夫的《三次谈话》之后，便渴望成为一名反基督者。

如果认为这个表面和善、面带微笑的“党的宠儿”是赢得了残酷内战的布尔什维克钢铁近卫军中的白乌鸦的话，那就是一种错觉。



1927年1月26日,在列宁格勒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布哈林不无焦虑地提到了民族问题中的主要危险:即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在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过多的民族主义的内容”。

他这是在指责谁呢?

至少,是在指责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什么都读,所以这一指向性是很清楚的。

作为政治局内最有影响力的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布哈林,在攻击俄罗斯历史上的传统诗人们(正是布哈林“消灭了”叶赛宁)时发现,他完全不了解总书记的立场。他也忘记了列宁在“自治化”问题上与斯大林的冲突。

不过,在已经到来的1927年里,有很多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斯大林所期望的那样。有时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脚下的大地在摇晃。

布哈林的抨击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但并不具有危险性。比这可怕得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此之前,苏联在中国的策略似乎都是非常成功的。欧洲局势稳定下来之后,中国革命便成了克里姆林宫在全球范围对抗西方的主要希望。

那么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早在1922年,孙中山就得到了莫斯科的建议:建立一个能够联合起各阶层民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同时创办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军事学校。广州(当时是南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孙中山政府的所在地)对此建议未作响应。不过,他们未能从美国和加拿大得到所要求的援助,转而向德国和苏联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一些德国志愿飞行员来到了广州,但德国拒绝提供武器。这样,只剩下苏联了。

1923年1月4日,政治局通过了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决议。在与苏联全权代表A. A. 越飞的上海会面中,孙中山表示计划在苏联的帮助下向北洋政府发动进攻(即北伐战争),并请求苏联给予资金援助并派遣顾问团。

1923年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曾长期在美国生活、并通晓英语的M. M. 鲍罗廷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由广州政府的总参谋长蒋介石(他与孙中山是连襟)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并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中国人被告知,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可以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和其他军官学校培训中国的军人。

此外,在9月26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转述了孙中山的提议,在革命胜利后,德国和中国应该与苏联结盟以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林德尔H. 丘尔金C.,《红色罗网——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情报机关的秘密》,莫斯科,2005年,第310页)

第二天,托洛茨基接见了中国人。他同样支持获得了解放的中国将很快成为俄罗斯和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员的想法。

9月份,为了参与将国民党改组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机构——国共联盟的

工作,苏联的一个政治和军事顾问组从莫斯科来到中国。1923年夏天,已经来过一批苏联军事顾问。

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孙中山在国民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加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孙中山借鉴苏联经验,组建起了自己的党和常设机关,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具有思想双重性的共产国际的思想家们不得不同意关于支持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民族革命力量”的纲领。这是国共合作的最大薄弱点,日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孙中山也远不像在莫斯科所介绍的那么简单。其中包括,他不接受土地革命的思想,主张与中国东北的“主人”张作霖结盟,而后者与苏联的关系极为紧张。而且,孙中山视外蒙古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认为在国民党取得胜利之后苏联军队应该从那儿撤出。不过,1925年孙中山就去世了。

1924年夏天,B. K. 布柳赫尔(化名加伦)担任国民党的苏联军事总顾问。伴随着他的上任,莫斯科也开始对国民党提供武器援助。仅在1926年10月,莫斯科就提供了24架飞机、157门野战炮、48门山炮、128门迫击炮、295挺机枪和73933支步枪,还有手榴弹、炮弹、子弹、炸药、汽油、煤油、煤炭和木材。同时,苏联还拨出巨款用于成立中国中央银行。

这其实就是对另一个大国内务的主动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完全符合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充满浪漫主义的世界革命的理念。

因此,中国东北的代理人张作霖元帅开始了反对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一系列动作。作为回应,1926年4月16日,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建议,决定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去奉天,“责成他要张作霖做出保证,并警告张作霖,他要对我们在北京的全权代表的专横行为负责。”(乌索夫B.,《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2002年,第237、238页)

后来,苏联将其情报员瑙姆·艾廷根得到的张作霖元帅准备在中国东北推动美国利益的情报交给了日本人。于是,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在张的火车经过的铁路桥上引爆了炸弹,致张作霖重伤身亡。

不过,除掉一个亲日的元帅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斯大林的整个战略地图上,在中国的危机已不可避免。

最终,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摧毁了匆忙搭建起来的全部结构。鲍罗廷在让中国共产党人快速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方面做得过于急切了。

似乎,一切都预示着将获得成功。蒋介石持左派观点,甚至提交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苏联军事专家很支持蒋介石,也多亏了这些专家,他获得了军队的控制地位,担任了包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在内的一些职务,拥有以这



所军校的毕业生为主的军官队伍的强力支持。

1926年1月,由于苏联顾问向希望获得更多苏联援助的国民党领导层做了积极的工作,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得到了国民党领导层及其机关的一系列关键职位。一切都按照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个人的指示精神进行着。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排挤和去除国民党领导层中的持不同政见者。

于是,在国民党的队伍中,对共产党员“专横派头”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只需一个急速的动作就足以让日益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

1926年3月20日,一批国民党的文职和军职干部组织了一次挑衅行动:由共产党员指挥的“中山”舰接到命令(假命令)开赴黄埔,而蒋介石被告知,这是准备逮捕他并将其送往海参崴。

蒋介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3月20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驱逐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其中一部分人还被逮捕,同时派部队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的总部和他们的住所。蒋介石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宣布自己为总司令,并且勒令B. B. 古比雪夫、B. П. 罗高寿、И. Я. 拉兹贡三位苏联军事顾问离开中国。

在苏联情报员(H. A. 舍瓦尔金)的报告里,有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内容丰富的评述:“这是个内敛、多疑且自尊心极强的人,绝不相信任何人。神经非常过敏,贪权。他是第一批与我们有着严肃工作关系的将军之一,在所有的将军里,他是最有造詣的,是一名出色的组织者。善于挑选出绝对服从他的人安排在身边。当他确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他能够相对容易地接受新办法。如果不表现出对他权力和领导地位的觊觎,是可以和他良好共事的。他政治上属于左派,走左派路线,至少容易受到左派人士的影响,一些人对他还是能够产生吸引力的。他的政治操守受限于他身边的人。他做出自己的决定时,隐秘而果决,不会特别顾及他人的意见,有时甚至会与所有的人对着干。”(乌索夫B.,《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2002年,第242、243页)

3月20日的事件让莫斯科当局陷入慌乱。此事被认为是苏联外交策略中巨大失算的一个证据,因此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该消息见诸报端。

此时,分裂成各省,且各省统治者(“军阀”)相互为敌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硬核桃。事情甚至已经不在于斯大林还是整个政治局犯了错误,而在于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没有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导力量。共产国际的战略是正确的:因为与国民党两党合作,中共(早先其队伍不到千人)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实力,而且共产党人的武装部队开始控制这个国家的一系列地区。

此外,苏联在当时的中国建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Я. 达夫强、H. 艾廷根、K. 斯托亚诺维奇、P. 佐尔格、И. 伊万诺夫-佩列克列斯特、Ф. 卡宁、B. 扎鲁宾和其他人等)。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获取了 1927 年夏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呈交给天皇的秘密奏折《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由共产国际交来的这份材料在中国被刊登发表,它的发布如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促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起来反对日本。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若我们能够征服中国,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和南洋诸国都将惧怕我们并将臣服于我们……当我们拥有中国的所有资源时,我们就转而去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和中亚,甚至欧洲。但将“满蒙”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第一步……日俄战争——田中义一写道——考虑到苏联武装力量的状况和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尽快进行。我认为,天皇政府采取尽快与苏联开战的政策是必要的。

无疑,我们需要推进至贝加尔湖。至于向西方的下一步进军,则应该取决于届时的局势。日本应当将占据的远东地区彻底纳入日本的领地……日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采取“铁血”政策。日本必须征服世界,为此必须征服欧洲和亚洲,而首先就是中国和苏联。(引自:乌索夫 B.,《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莫斯科,2002 年,第 144 页)

田中义一在该“奏折”刊登之后被迫辞职。

但在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中,1926 至 1927 年东方政策的失败成了反对派的一张王牌。斯大林由于外交政策的“破产”而受到了指责。

在 1927 年的中国,中国革命的危机确实剧烈显现出来了。国民党的民族民主主义原则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主义实践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同时,鲍罗廷与蒋介石的个人冲突进一步加剧,后者在 2 月底要求这位苏联政治总顾问返回莫斯科。

作为回应,中共领导层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决定采取带有巨大风险的极端措施,因为如果失败,两个革命政党之间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合作成果将毁于一旦。

3 月初,在鲍罗廷的施压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通过了决议,大大压缩了蒋介石个人在党和军队中的权力。同时使两名共产党员进入了政府(位于武汉)。

蒋介石表面上对此是同意的,他正忙于继续进攻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和南京。

但是事态还在发展。这场悲剧的下一幕上演了:政府在鲍罗廷的影响下下达了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然而布柳赫尔持另一种看法,不认为需要与蒋介石破裂。



攻下上海和南京后(在中共组织了总罢工和起义之后),蒋介石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上海度过的,在这里他当过交易所的经纪人,甚至还与本地黑帮头目相识。

此时,美国和英国政府进行了军事干涉:3月24日,美国“匹兹堡号”军舰和英国舰队炮击南京,并靠岸登陆。

3月29日,蒋介石参观了“匹兹堡号”,并与威尔逊上将会面,后者要求他与共产党决裂。同一天,上海的大企业家们向蒋介石提供了一千万元的资金。于是,蒋介石用这笔钱获得了犯罪团伙“青帮”和“红帮”的支持,以帮助他打击上海的工人纠察队。

4月11日深夜,美、英陆战队员和军队、警察(包括一些刑事犯)一起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拘捕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会领导。

与此同时,另外有5个省也发生了反共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惨遭失败。

托洛茨基是这样解释这些事件的联系的:

“1926至1927年的冬季有了某种喘息的机会,使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理论研究更为深入。

“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已经准备向斯大林投降了,如果不是一下子投降,也是分几个步骤进行的。但这时正好在中国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斯大林政策的罪恶昭然若揭。这使得季诺维也夫和所有追随他的人推迟了投降。

“斯大林的追随者在中国的指导意味着对布尔什维主义所有传统的践踏。中国共产党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并入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其军队纪律。建立苏维埃政权被禁止。共产党人被建议停止土地革命,并且没有得到资产阶级准许不得武装工人。在蒋介石破坏上海工人运动、把政权集中到军事集团手中之前很久,我们已经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提出了警告。1925年,我就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而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不仅为破坏中国革命做了准备和保障,而且动用了国家镇压机器使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免于遭到我们的批评。1927年4月,斯大林在圆柱大厅党的会议上还在捍卫与蒋介石联合的政策,号召对他予以信任。五六天后蒋介石就把上海工人和共产党淹没在血泊之中。

“党内掀起一股不满的浪潮,反对派抬起了头。反对派成员违反一切秘密活动的规则(这时我们已被迫在莫斯科以秘密的方式保卫中国工人的反蒋介石运动)数十人一起到总租让委员会的所在地来见我……”

“很快就发现,作为一个派系,我们的确强大起来了,即思想上更一致,人数也增多了。但我们与政权联接的脐带被蒋介石的利剑切断了。他那名声扫地的俄国盟友斯大林只能以摧毁反对派来掩盖蒋介石在上海摧毁工人武装的事件。反对派的核心

是由一批老革命者组成的,但我们并不孤独,在我们周围团结着数百名乃至数千名新一代的革命者。他们最初被十月革命唤醒投入了政治生活,参加了国内战争,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巨大权威心悦诚服,直到1923年才开始独立思考、批判,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发展中的新的转折点,更难的是学会担起革命首创精神的责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莫斯科,2001年,第516、517页)

托洛茨基没有写、也不可能写到共产国际失败之后,当代中国革命反而成熟起来,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创建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正是这些年在国民党的“屋顶之下”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洗礼。所以,我在这里用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可以说,从历史角度来看,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要大得多。

不过,人们从来不会超前70年去思考自己的行为。当时对这一对华政策失败的认识,好像都可以怪罪于斯大林,可以重新提起“列宁的遗嘱”。反对派就是这么做的。

从1927年7月9日斯大林写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本人是如何对待这一失败的:

我不认为脱离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能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就能“独立自主”。相反,这种脱离仅仅只是减少了对共产党员的屠杀,但国民党可以制造新的口舌,甚至有可能给某种分裂做准备。别无他途,我们最终总是应该走上这条道路的。这个阶段是需要,一定需要经过的。

但现在最主要的不在于此。最主要的在于,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挺直腰杆从这一新的阶段走出来(从事地下工作、被逮捕、被屠杀、被枪决、自己人的背叛与挑拨等等),能否在不分裂、不碾碎、不瓦解、不分化为一个或好几个派系的情况下,顽强地走出来。绝不能认为这种危险性是不存在的,如同不能认为这次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下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间隔是不可能的一样,类似的间隔就发生在我们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之间。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危险(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瓦解的危险)比某些充斥于当今中国的所谓客观实际更为现实。为什么?因为,很遗憾,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或者怎么说呢,强有力的共产党。如果排除了这些虽是良好的战士,却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中农共产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算什么呢?什么都不算,除了一个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路线联系,也没有任何领导思想的用马克思主义套话织成的“系统”。我不想过分苛求中共中央,我也知道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但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

他们执行这些指令了吗?没有。没有,因为要么是他们没有领会这些指令,



要么是不想去执行,要么是没有能力去执行,而在哄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269、270 页)

请注意,斯大林已预见到了新的失败,并且不打算改变方向。

他仿佛重新在经历自己革命的青春岁月。他简直就是在大骂中共中央的活动: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就骑在国民党的脖子上,享有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却没做将一个不应称为党的大杂烩(的确,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整合成一个有效政党的任何工作……”

接着,他做出了结论:

我们过多地忙于在中国军队里建立苏联的顾问体系了(而且这些顾问显得在政治上很不称职,因为有时不能及时提前向我们报告自己“上司”的越轨行为)。现在是在中共中央、在中央各部门、在各省的地方组织、在这些地方组织的各部门、在共青团、在团中央各部门、在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部门、在中央区、在中国工会联盟真正建立一个党务顾问体系的时候了。需要将鲍罗廷、罗伊和所有这些在那里妨碍工作的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需要向中国派遣好的工作人员,而不是那些我们不需要的人。需要让这些党务顾问在自己的工作中形成一个由在中央的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的统一整体。这些在现阶段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尚较软弱、不明确,政治上未成型且不成熟。他们将向这些党务顾问学习。党务顾问将弥补中共中央及其地方上层领导的严重不足。他们(暂时)能起到将目前党内各个散件连接在一起的铆钉的作用。

以上等等,就是这么回事。随着革命和党的发展,对于这些“保姆”的需求将会消失。(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272、273 页)

同时,斯大林应当考虑的还不仅是国内反对派们的反应,首先要考虑的是与西方爆发新战争的危险,毕竟他的对华政策极大触动了西方的利益。

5月12日,警察闯入设在伦敦的“阿尔科斯”英苏股份公司。5月27日,大不列颠政府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国际形势每况愈下。6月7日,白俄青年侨民鲍里斯·科韦尔达在华沙枪杀了曾组织枪决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的苏联全权代表 И. Л. 沃伊科夫。6月1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英、德、法、比、日五国外长未对外公开的会晤上,讨论了由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提出的反苏方案。只有德国一家没有卷入这场反苏战役。

英国与苏联在东方的冲突,并不能认为是受制于共产国际领导人愿望的一个偶然事件。

事实上，俄罗斯帝国向中亚、帕米尔、阿富汗、中国方向扩张要早得多，那时，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张伯伦都还未出生。从北边向“大英帝国的明珠”印度逼近的俄国在整个 19 世纪都让伦敦极为不快。

新的俄国势力在中国的出现(虽然是以共产国际的面貌)不能不引起英国人的强烈关注,况且他们并未忘记苏联对波斯苏维埃化的尝试。而且随着中国之后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印度了。

同时,在英苏冲突里还存在石油的因素。娶了白俄侨民利季娅·帕夫洛娃为妻,而且是一个坚定反共分子的“皇家壳牌公司”的所有者亨利·德特丁,竭力阻止其他西方石油公司与苏联石油部门进行合作。

不过他未能得逞。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两家子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和“真空石油公司”签订了购买巴库石油的大宗合同,以满足印度和其他亚洲市场的需求。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还在巴统建起了炼油厂并长期租用。

于是,德特丁在印度和“其他一些角落”展开价格战予以回击,以此降低竞争对手出售较便宜的“共产主义”石油产品的经济效益。他还资助各种反苏活动,其中包括制订军事干涉的计划。

在进行军事威胁的同时,开始了白卫分子的恐怖活动。1927 年 6 月 7 日,一伙越过苏、芬边界入境的“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的武装分子,向正在开会的列宁格勒党俱乐部会场投掷了炸弹,造成 30 人受伤。早在 3 月 7 日,在芬兰情报机关位于泰里约基市的一间秘密寓所里,该联合会召开了军官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其首领库捷波夫宣布必须“立刻展开恐怖活动”。

这个恐怖活动是针对斯大林本人的。

正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库捷波夫从芬兰回到巴黎后,“制订了在苏联境内实施恐怖行动的一整套措施,并把自己的计划提交给指挥部审议”(《俄罗斯对外情报机关史概述》,6 卷本,第 2 卷,第 127 页)。列在这份计划中的第一条就是刺杀斯大林。此外,计划还包括了引爆军工厂、刺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并在同一时间杀掉所有各军区的司令员。

如果我们综合一下计划实施和已经实施的打击,那么状况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苏联的情报机关认为英国已开始对苏联实行海上封锁,并且怂恿波兰加入这个已有罗马尼亚和芬兰参与其中的战事。

苏联能够凭借什么去对抗这一威胁呢?

工农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在 1926 年 12 月 26 日致政府的报告中做了如下结论:



1. 最大可能的敌人在西部边境,他们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高效的铁路运输能力。他们有望得到资本主义大国的物资援助。
2. 联盟的弱点在于它东部边境过长,且相对而言领土的纵深不足。
3. 若该联盟在战争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的话,其力量能够得到很大程度加强,因为其“西欧后方”能够给我们造成难以克服的威胁。
4. 若我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摧毁了哪怕只是其联盟的一环,失败的危险将会减轻。
5. 虽然我们的武装力量在人数上不如敌方,但仍然能够予以反击。
6. 我们所能动员的作战物资储备贫乏,只够战争第一阶段的消耗。接下来我们的处境将恶化(特别是在被封锁的情况下)。
7. 工农红军只有在武装力量、铁路运输和工业生产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保卫苏联的任务。
8. 无论是红军,还是整个国家都尚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引自: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第 375、376 页)

对工农红军的领导层紧急进行了人事调整,首要职务重新由职业军官来担任,而不是“红色指挥官”。

6 月底,工农红军的部队在西部边境开辟了军事阵地,修建了新的机场,提高了军工厂的劳动强度。图哈切夫斯基指示在柏林的苏联武官做好打一场将“红色武装力量”部队从德国转移到波兰的引诱战的准备。

总的说来,图哈切夫斯基主张“对波兰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但这并不符合双方实际的力量对比。况且,战争的预感席卷着苏联,政界和军界都感到了一场“蒋介石式的”军事政变即将来临。

1927 年 5 月 1 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前将军、时为军事学院教员的文章《未来战争中的军事艺术》,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图哈切夫斯基的华沙战役评价为“革命口号的滥用”。这可以解释为,党的领导层在警告军人不要受时局的诱惑。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B. 布柳赫尔主张加强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的作用(相应地缩减党务顾问的工作)。

而在巴黎的侨民报纸《复兴报》上,发表了邓尼金将军的系列文章《致红军指挥员的信》,其中就阐述了“红军具有双重任务”的思想:首先是保卫俄罗斯免受外国侵略,然后是推翻共产党政权,并建立“民族军事专政”。(尽管邓尼金的文章是于 1928 年初见报,但其主要思想的产生无疑要早一些。)

那时的政治和军事背景就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很有代表性的是,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通报》(俄国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描述了

在莫斯科对党和苏维埃热情的上升,这种上升加上沃伊科夫被杀之后民众的担忧和恐慌,促使人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彼得·司徒卢威在其发表于1927年6月25日《复兴报》上的文章中提到,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那就是苏联青年把“革命精神、民族主义与准备保卫制度以及学会尊重俄罗斯”结合了起来。

司徒卢威不无气愤地指出:“布尔什维克鼓动并千方百计地利用苏联这种民族主义,使之成为能为他们工作、与他们结盟的某种力量。”(司徒卢威 П.,《一位政治家的日记(1925—1935)》,巴黎、莫斯科,2004年,第301页)

司徒卢威明显地觉察到,被莫斯科抓住的爱国主义情绪可能毁掉白俄侨民的思想基础。

5月9日,季诺维也夫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发表纪念《真理报》创刊15周年讲话时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在苏联工会支持大不列颠总罢工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两方面犯有严重错误。他指责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纵容了蒋介石的政变。

季诺维也夫的讲话由广播播出,全国都听到了他的这番言论。

很快召开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全会讨论了共产国际在与日益逼近的战争进行斗争中的任务、英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和中国的革命问题。5月24日,斯大林做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在提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时,他说:

“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开展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战线’。

“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表明,这些‘战线’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决心和无比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11、312页)

第二天,由包括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内的83名反对派人士签署的声明就递交到了中央委员会。他们从对华的错误政策和与英国工会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对党的领导层提出指责。

按照这份声明,错误的根源在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情况“加快了‘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势力的增长”。声明人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否则将准备展开大规模辩论。此后,他们开始了声明的签名征集工作。

第三十五章

经济是如何发展的

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专家们”的双重性、基层党组织竭力追求利润、战争的警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纲领》、装甲车开进了莫斯科的街道、“集体化的代表大会”

在东方发动世界革命希望的破灭、国内的恐怖活动、反对苏联的全欧洲的战争、对苏联大使馆的攻击、反对派的积极活动，所有这一切又重新纠集在了一起。此外，农村又出现了大问题：农民们再次不愿低价出售粮食。不过，粮食危机是在9、10月份才完全暴露出来的。

俄罗斯侨民的观点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是极其悲观的：“苏维埃政权的末日来临了。”(П. 司徒卢威)

7月28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召开前夕，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时事问题简评》一文，直截了当地谈到新一场战争的威胁。其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从此刻起，最强大国之间的力量与利益对比问题对他而言变成了一个折磨人的问题。他将长期在这个封闭的圈子里寻找出口，但在1927年时还看不到任何出路。

“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兴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牌的国家(英

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妒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

“争夺销售市场、争夺输出资本的市场、争夺通向这些市场的海陆道路、争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疯狂斗争正在进行。美英之间、日美之间、英法之间、意法之间的矛盾正在增长。”(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22页)

就是在这种战争威胁的背景下,斯大林还是提及了苏联枪决20名曾是沙俄官员的地下保皇派人士一事。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建议,他们是在6月10日,即沃伊科夫被杀后的第二天被处决的。这就表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认,由于无法控制住库捷波夫将军的行动,他们进行了多年的遏制白俄侨民恐怖活动的“托拉斯”反间谍行动失败了。

7月11日,托洛茨基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写道,“这种不学无术的、无耻的徇私舞弊者们的政治路线,应该像对待垃圾一样被清除掉”,而谁清除了这个垃圾,谁就不是“失败主义者”,而是革命“护国主义分子”。

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布尔什维克(“失败主义者”)的路线就能明白,为什么托洛茨基的想法会让人联想到正面临着一场战争和利用这场战争来推翻现政权的危险了。

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发生。所以,这等于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必须团结全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作出让步(或是离职)。

那时还没有“第五纵队”的概念,但斯大林明白这个警告的实质在于,一旦发生战争,党内便会展开对他的打击。

此后,一场殊死的搏斗就开始了。了解尼古拉二世下台所有情况的斯大林在秘密运筹,他将敌对世界的一切行动、意图,甚至可能存在的意图加以综合考虑。

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称为“用电话的成吉思汗”(他套用了赫尔岑称尼古拉一世为“用电报的成吉思汗”的话)。他将总书记与蒙古帝国的缔造者相比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的确,这种称谓并不是侮辱性的,但正如托洛茨基所期望的那样,能造成心理影响。正是由于有着非凡的意志、勇气、残酷和能够遵循自己认定的正义和荣誉的目标勇往直前,成吉思汗才战胜了内外之敌。

高加索人的心态中同样充满着为贫乏的资源而争斗的血腥复仇和永无休止的威胁的记忆。

在西方,人们称反对派为“第四国际”,是以此强调反对派正在上升到全球性范围并正在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派别。

想必,正是1927年的这些情况成了斯大林处世哲学中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启动器。

8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确定了



党的任务：

“我们面临着两种危险：一种是战争危险，它已经变成了现实的战争威胁；另一种是我们党内某些环节蜕化的危险。为了准备防御，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建立铁的纪律。

“没有这种纪律，防御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巩固党的纪律，我们必须制裁一切正在瓦解我们党的分子。我们必须制裁一切正在分裂我们的西方和东方兄弟党内的分裂分子……”（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59 页）

但苏联尚未作好战争准备。所以，在提到要全副武装地迎接战争时，斯大林强调要力求“推迟战争，赢得时间，赎买资本主义”。

什么是“赎买”？是新“布列斯特”行动，还是与党内反对派妥协的一种尝试？

斯大林在 8 月 9 日全会上的发言，在回答会场上发出的决不与反对派休战的喊声时说：

“不，同志们，我们是需要休战的。这一点你们错了。如果要举例子的话，最好就以果戈理笔下的人物奥西普为例，奥西普说：‘小绳子吗？拿来吧，就是小绳子也会有用的。’

“我们最好也像果戈理的奥西普那样去做。我们的物资还不够充裕，我们的力量也还不够强大，所以不能够轻视一根小绳子。即使是一根小绳子，我们也不应当轻视。你们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在我们的武器库里绳子也是应当有的。”（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87 页）

这段来自果戈理《死魂灵》的引文充满了讽刺意味，这本身就证明了斯大林具有极高的自制力。

在短暂瞬间里，斯大林突然以一个拉着乞乞科夫（《死魂灵》的主人公——译注）行驶在俄国广阔土地上的朴实马车夫的形象出现在听众的面前。这条路漫无止境，它将消耗掉小绳子以及乞乞科夫本人，但好像奥西普是永恒的。此外，奥西普还是约瑟夫这个名字的通俗叫法。奥西普·斯大林仿佛是用这样一个永恒的马车夫的名字向反对派宣告：“我们可以用这根小绳子捆住你们的手，如果还不醒来，将用它勒住你们的脖子。”

于是，就有了一段非常文雅的对话：托洛茨基谈了“失败主义”的经验，而斯大林则谈了俄国文学的经典著作。

最后全会获得了这样的结果：斯大林以将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为威胁，要求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停止那些关于党内发生热月政变的“无稽之谈”，放弃“第五纵队”（我们这样称之）的念头，谴责国外共产党中他们的拥护者并与其断绝关系，“放弃派别活动和一切导致在联共（布）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政党的路线”。

相应地，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拉柯夫

斯基、穆拉洛夫等)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信函,承认自己有错误。

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再次违反党纪”的问题,全会通过决议:“取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问题的讨论,宣布给予他们严重警告处分。”

除此以外,全会还批准了 1927 年至 1928 年间的经济指标。

此时,苏联的经济已得到蓬勃发展。不过预算资金对实现工业化仍有较大缺口,拨款是依靠发行有价证券、在预算内重新分配资金和依靠当局以“义务强制的方式”迫使居民认购所谓的“工业化债券”。从 1925 年至 1926 年,债券数目达 8.3 亿;1928 年至 1929 年,分别为 20.73 亿和 16.16 亿。1926 年至 1927 年工业产值增长了 18%。

1927 年,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开始动工。此时的机械制造业的产值比 1913 年的水平提高了三分之一。

根据 B. П. 波列瓦诺夫“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系列指数”的估算,1913 年时,一份平均工资可购买供 2.55 个月所需的食物;而到 1924 年、1925 年、1926 年和 1927 年时,分别为:2.90、3.45、3.50 和 3.48(作者的资料)。由此可见,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修建了许多新的工厂和发电站。

1927 年 4 月,全苏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责成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制订出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此时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相应地,社会基础也得到发展,出现了一批突击工程和突击队。

十月革命后的十年里变化是巨大的:日常语言、信仰、历史、文学、地名、戏剧艺术乃至人名都发生了改变。出现了雷姆(由革命、电气化、世界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奥克佳布林(来自十月一词)等众多类似的奇怪名字。

不过,民众的主体当然还是那些以东正教和传统的处世态度为生活根基的农民。马克西姆·高尔基对他们的评价非常否定,认为他们是一群文化低、残忍和迟钝的人,但他并没有想到,正是这构成了即将到来的农村残酷变革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农村中出现了一些自然的变化。到 1927 年 10 月 1 日,已经有 38% 的农户加入了消费合作社;而农业信贷合作社的成员数量从 1925 年至 1927 年增长了一倍,即从 3 百万人增加到了 6 百万人。农民通过农业信贷体系获得了 7.7 亿卢布的贷款,这个数目可以与工业化债券的规模相比了。重要的还有一点:90% 的农民加入了遵循古老的、经过考验的传统的村社。

可以说,十月革命 10 周年之际的苏联是经济上的“黄金期”,如果没有下面的“但是”的话。此时资金来源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因为农村的主要生产者,即大地主和富农经济已经从农业中消失了。这种结构性的改变导致了 1923—1927 年间商品粮的



产量比 1909—1913 年几乎减少了一半。按照 B. 涅姆钦诺夫的统计数据(斯大林以此为依据作出了必须实施集体化的决定),正是这一情况成了评判新经济政策潜力的决定性因素。损失必须要立即得到弥补。

“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无论是在俄国的,还是在侨民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圈子里,有一种观点得到了强化:尽管运用了各种社会主义的华丽辞藻,但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涵来说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经济的基础是私营经济成分:农民经济、私营企业和贸易。革命的、现代化了的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君主制度。从俄国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是关税保护主义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重要的革新是外贸垄断。

“农民摆脱了余粮征集制的沉重负担,并保住了自己手中的地主的土地。对农民施加财政压力受到了限制,其结果是,与战前水平相比,农民自身的消费增长,而农产品出口的份额则缩减了……”(盖达尔 E.,《漫长的时间》,莫斯科,2005 年,第 296 页)

到 1927 年,国家减少酒精消费的方针政策在全国的生活中取得了明显的重大成果。新经济政策初期,生产和销售酒类产品是完全自由的,约 10% 的农户忙于酿制私酒,结果是在婚礼、丧宴上和宗教节日里,酗酒的规模急剧扩大。在全国范围内,用于酿酒的谷物超过了 1 亿普特。1925 年,国家实施了酒垄断。从 1926 年起,在中小学开设了禁酒教育的课程。1927 年,实行了不准设在影院和俱乐部等场所的小卖部,以及在休息日和节日向儿童出售酒类饮品的禁令。这种国家垄断极大地充实了国库,在 1927—1928 年间,此项占了国库收入的 12%。

国内存在着两种并存的经济进程,但它们又依赖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打个形象的比喻,组合成苏联国徽的无产阶级的锤子和农民的镰刀实际上是处于不同的空间里。

这两种进程催生出不同的政治决策,其结果必然会发生危机。

总之,那个曾给了国家一个喘息机会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了。从伊利亚·伊利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写于 1927 年的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中便能看出这一征兆。小说讲的是颇有魅力的骗子奥斯塔普·宾杰尔和一个类似《死魂灵》中乞乞科夫式的前县首席贵族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沃洛比亚尼诺夫寻找流失的财富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和平喘息”的社会共识已经结束了。尽管小说明显带有对体制的温和批评,但书刊检查机关还是准予放行,因为该小说被认为洋溢着社会主义乐观精神。最后的情节是沃洛比亚尼诺夫杀掉了宾杰尔,在他认为只离财宝一步之遥时,命运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宝藏被真正的英雄找到了,并用这笔财宝建造了一座非常好的文化宫。

“钻石变成了整块整块的玻璃幕墙和混凝土楼板,凉爽的体操馆也是用变卖珍珠

的资金建成的。钻石头饰变成了带旋转舞台的剧院,红宝石的坠子成了一座座枝形吊灯,镶嵌着绿宝石的蛇形金手镯化作了一流的图书馆,而项圈成了托儿所、滑翔活动室、象棋室和台球室。

“宝物被保存了下来,它不仅得以保留,甚至还增值了。可以用手摸到它,但却不能把它拿走。它摇身一变而为其他人服务了……”(伊利夫 И.,彼得罗夫 Е.,《十二把椅子》,莫斯科,1987年,第260页)

斯大林并不反对《十二把椅子》,他没有在作品对来自斯塔尔戈罗德市(老城之意——译注)的秘密“剑犁同盟”的可怜阴谋家和对旧体制下的大众的讽刺中发现什么罪过。其实,城市的名称是具有象征性的。这个城市并不是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俄国城市之母——基辅。

实际上,文学作品中的斯塔尔戈罗德市离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有跟计划和经济有些关联的人都明白,实施工业化的主要干部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旧学派培养出来的专家,尽管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不同。这些“专家”们过着双重生活。在自己的技术局和办公室里,他们享有权威、受到尊敬,党组织很少去干涉他们的业务。但在单位之外,他们又变成了“寄生虫”和“尚未消灭的资产阶级分子”。

瓦西里·斯普罗格就是这些受人尊敬的专家中的一员,这位年轻的铁路工程师在国内战争中曾为白军作战。后来他未能撤走,但却凭借在工程圈子里的关系在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勘探管理局(那时这个部门已在运行了!)获得了一份工作,后来又成为第聂伯河水电站规划部门的主要人员(总体规划设计师 И. Г. 亚历山德罗夫教授的副手)。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了当年专家们与党员干部之间相互竞争重要的另一面。

众所周知,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在著名工程师休·库珀尔领导的美国水利施工人员带领下修建的。库珀尔后来担任过俄美商会的主席,是罗斯福总统的拥护者,他还承担过密西西比河的凯尔库克水电站和田纳西河的威尔逊水电站的建筑工程。斯大林、李可夫和古比雪夫都曾接见过他。库珀尔说过,投入到这种水电站中的每1美元可以带动9美元的投资到工业上。

拥有广泛人脉的联共(布)党员、曾在德国“西门子”电子公司供过职的 A. B. 温特尔被任命为整个第聂伯河工程项目的总管。正如 B. 斯普罗格写的那样,温特尔“固执地试图”将西门子的子公司“西门子建筑联盟”塞进工程建设项目中,虽然这家公司并不具备在大型河流上施工的经验。多亏亚历山德罗夫和其他专家坚决反对,才使得原先的美国人的方案得以保留。

后来,第聂伯河上采用的“库珀尔方案”在苏联被称为“篮子”,并被采用到伏尔加河、安加拉河、叶尼塞河的所有水坝的建设上。工程师们提到温特尔时不称别的,总是说“这个傻瓜温特尔”。不过他还是设法对“西门子公司”的服务支付了一部分酬



金——金额超过 200 万卢布的黄金。(引自:斯普罗格 B.,《工程师笔记》,莫斯科,1999 年,第 366 页)

库珀尔在自己的施工报告中将这次工程比作胡夫金字塔的建造,劳动未能较好地组织起来。过了不久,被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再加上希望社会快速发展的人民群众的热情,就引起了党和契卡机关的警惕,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旧专家进行“破坏活动”的问题。因此,总要有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这样的破坏活动,当然是存在的,但其实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地球上持有两种不同世界观的人们之间的决裂问题。那个已经被粉碎了的圣彼得堡俄国还继续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而新的政权又不可能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

特别是在签订租让合同的时候,这种矛盾体现得尤为突出。一系列租让业务都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济局的监督下完成的,它发现在苏联专家和外国公司代表的相互关系上存在一种不由自主的利益交叉体系:为了得到酬金,专家们帮助外国人以最惠条件签订合同、泄露本不应该公开的信息、通报生产方面的经济技术数据、参与制订合同条款等。政治保卫总局认为这是一种破坏国家经济安全的新方式。全面掌握信息的承租人大大降低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预期的利润。

1927 年 3 月 6 日,苏联空军管理局租让处处长 Г. К. 林诺因从事有利于“容克斯飞机公司”的活动而被捕。在林诺的促使下,苏联空军以超出 30% 到 50% 的价格购买了劣质的航空技术设备。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容克斯飞机公司”得以以高价出售了 100 架无战斗力的飞机,他还促成当局做出了以高出 1.5 倍的价格订购轰炸机的决定。因为这些活动,林诺得到了交易金额 0.5% 的回扣,另外还有一些额外的奖励。1927 年 5 月 9 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林诺及其同案犯被判处枪决。(引自:莫佐欣 O.,《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卫经济安全和与恐怖活动作斗争》,莫斯科,2004 年,第 274、275 页)

在采矿、采油、采金及其他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而最让莫斯科感到不安的是那些承租人跟俄国侨民银行家、企业家的圈子关系密切,而这些人已经具有了对西方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施加影响的能力。

我们可以断言,斯大林对危机的认识是逐步积累起来的,而这种危机来自目前还不可缺少的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这一公民群体。

谁也不知道如何去系统性地应对这种危机,但来自社会底层的数百万民众给了领导层很大的压力。他们期待着,在与旧体制精英的斗争中能够得到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们的支持。他们期待着担任新职、分到住房、受到教育和出现新的思想。“我们是新一代,是青年人,我们理应征服世界!”这句话就印在他们的旗帜上。

老一代人的宗法强制意识,及其对一个地方、祖先和传说、耶稣圣诞、十字架受难和复活的福音轮回的眷恋,所有这一切对于青年人来说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基础。他

们的岁月平直开阔,而且是直线性的,像出膛的子弹永不回头。指责这莽撞的新一代是愚蠢且徒劳的,只会让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不过,不管这对于列宁近卫军是多么的沮丧,事业毕竟需要新型的、能克敌制胜的领袖。

为了弄明白当时的形势,需要了解此时党的人员组成。在十月革命过了10年之后,党员已达130万人,而“老布尔什维克”仅剩8000人。

工人只占党员的三分之一,60%的共产党员在国家和党的各种基层单位的初级岗位上从事着不需要专门知识的(也是非体力的)工作。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超过85%)是不足40岁的年轻人(只受过低等教育)。他们的政治经验微不足道,他们对于党领导层之间斗争的理解极为简单:斯大林想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而托洛茨基却不想。(引自:韦尔特H,《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莫斯科,1995年,第198页)

与此相对应,这样一个巨大的党员群体,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共青团员,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斯大林的身上。同时,在这种战争将至的形势下,斯大林在他们的眼里还具有另一重身份,他不仅是阻止党被分裂的保卫者,而且还是祖国的保卫者。

祖国,这是一个神圣的概念,特别是在俄国人的传统中。

而现在,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员的认知中突然出现了一种转变,即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对祖国的追求现在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

参与过巴拉赫纳水电站(下诺夫哥罗德州)和施捷罗夫卡水电站(顿涅茨克州)建设的德国工程师科连的报告就说明了这种干部问题的基本特征。

1928年2月26日20点,斯琼克尔工程师来了我这里。我们谈论了报告的一些细节。他向我介绍了当地工程师的情况。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里的工程师对现状并不满意。战前一个建筑工程师一个月可以挣到600到1200卢布,此外还能在工作所在地分到一套住宅、马车和整套生活设备。那时他们生活得像老爷一样,而我们的工程师却从未有过这样的享受。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并且也正因为此,他们不愿相信我所说的外国工程师们过得并不比他们更好的话。由于这些缘故,新一代的工程师就要好一些,他们没有经历过那种阔绰的生活。我们交谈了近3个小时,我向他坦诚地说了我对当地建筑工程的看法。这次谈话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有益和有趣的……

1928年3月7日我启程离开,并于3月19日到达柏林。

最后,我想简短地总结一下我的印象和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在我身处苏联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优秀和美好的东西,就实质而言,美好的方面甚至要超过不好的方面。不过因为遵循对美好事物无需关



注的原则,我几乎克制了对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的表达……这个国家的重建正大踏步向前迈进。尽管存在着众多妨碍其运行的因素,却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认为其原因在于,革命具有一种能够推动整个现行体制前进的庞大力量,虽然它也具有保守的一面。

如今在苏联,能够信赖的那些工程师,要么本身就是党员,要么就是向党靠拢的工程师……(引自:《祖国历史文选(1914—1945)》,莫斯科,1996年,第362、363页)

这份报告被呈交至人民委员会李可夫主席的秘书处,但这未必揭示出了什么新的问题。不过,这位细心的德国工程师倒是指出了不是政治的,而是日常生活的原因产生了这种对立的情绪。而为了与这种情绪作斗争,只能二者选择其一:要么给予更多的物质待遇,要么就狠狠地吓唬一下。

必须立即来解决这一问题。

用什么方式去解决,是不言而喻的事。既然迅速提高物质待遇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就只剩下了唯一一种可靠的办法了。此时距几十名工程师被指控犯有从事破坏和间谍罪的著名的“沙赫特案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此案的第一批人是在1927年夏天被捕的。

1927年8月,由于战争威胁的日益增长,军队征召了100万预备役人员入伍。而这个情况马上就在粮食市场上反映出来:粮食价格上涨,商店里的架子上变空了。粮食征购员奔走走在各村镇之间,劝说农民按国家采购价出售谷物,但等着战争爆发和需求增长的农民并不急于卖出。结果,工业化的计划受到了灾难性财政状况的威胁。

在农村,紧张程度加剧了,并且立刻表现为恐怖活动数量的攀升。

1924年为313起,1925年有902起,1926年711起,1927年901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1928年起,由于发生了粮食危机,克里姆林宫在农村采用了强力推行的政策,此时恐怖事件的数量上升至1049起(在7个月内),而1929年则达到了8278起。]

如果粮食问题不是党在农村全部政策的基础的话,那么也许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危险。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挡了工业化的路。并且在这一制度矛盾的内部,还存在另一个矛盾。

党的机关此时正致力于提高农户的产量,提高生产的积极性。而村苏维埃的主席和村支书自己,就像被他们监护的农民一样,跨越了社会阶层的障碍,与自己的村民打成了一片。他们同样拥有田地和家畜,也从事劳作。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和农业贷款机构都首先是以获取利润为目标的。

这种很快就得到了“道德堕落”这一可怕称谓的进程具有大规模的性质,也使国

家领导层深感不安。在地方上,各具特色的团体正在逐渐形成,富裕农民、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

1927年的秋天,还有一个特别之处:独立田庄农户(斯托雷平改革后的农户)获得了更高的收成,并且与公社的农户相比,他们更乐意并入生产合作社。(参见:《美国历史文献中的斯摩棱斯克事件》,E. B. 科金、迈克尔·希基编辑,斯摩棱斯克,2000年,第208页)

这就好像是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从基辅-别彻尔洞窟修道院的坟墓中走了出来,并对所有的反对者说:“你们看,怎么可以让俄国走到这一步,怎么可以让俄国自下而上地发展自己的实力!”

不过,斯托雷平的那些早在1917年2月就被击溃了的反对者们都遥不可及,有的葬在斯维尔德洛夫附近的墓地,有的流亡海外。

战争的威胁使党内开始用军事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也促使大家团结一致,调动所有的资源来组织防御。报纸上写满了动员人们“提高警惕、积极备战、勇敢斗争”的爱国主义号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国防周”,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青年军事小组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夏令营对青年男女进行了军事训练,开展了示范性联合演习和军分区与军工厂互访等活动。

然而,尽管运动声势浩大,广大的普通民众却显得无动于衷,不过这样就可以区别出,哪些人是将自己的命运与苏维埃国家连在一起的,哪些人是国家的异己,甚至与之之为敌。

这些“异己分子”在苏维埃社会里是无处容身的。他们必须得到“重新改造”,或者彻底消失。

“重新改造”这个任务比实现工业化更艰巨。这个问题初步得以解决,还是依靠了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社会空前团结。(保加利亚军队的代表、白俄侨民的儿子帕维尔·布特科夫就注意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1941年,布特科夫被暂时调到驻乌克兰的德军工作,并偶然地遇到了一组苏联情报员,布特科夫很吃惊,因为他们都带着一张坚毅的面容。(布特科夫 П.,《为了俄罗斯》,圣彼得堡,2002年))

是什么激励着动荡之后渴望平静生活的民众去为国牺牲和建立功勋?

只有崇高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被、也理应被斯大林用来当成武器。在浩瀚的农民的大海中耗尽了自己能量的革命,此时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向,或者只能回到二月革命了。

9月份,战争的威胁达到了最高峰。莫斯科认为,英国正竭力怂恿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进攻苏联,而它的舰队将从海上负责封锁。

9月17日,红军司令部在敖德萨地区举行了由乌克兰军区和黑海舰队的编队参



加的“大演习”。该演习的指挥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出席军演的有李可夫、伏罗希洛夫、布勃诺夫、布琼尼、叶戈罗夫、乌博列维奇、亚基尔、艾德曼、德边科等。

政府首脑和军事部门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次演习极不寻常。与此同时，列宁格勒、白俄罗斯和北高加索军区也举行了同样的演习。而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则进行了战备的调动和检查。

苏联在展示自己的实力。

那一时期的军政大事中还有一事值得注意：1927年5月，Б. М. 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他在一年前那场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的冲突中，曾全力支持过斯大林。

其实，苏联军队尚未做好迎战的准备，所要做的是应该尽量去避免战争的爆发。

这场并未爆发的战争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促使图哈切夫斯基给伏罗希洛夫提交了一份《关于彻底重新装备工农红军》的报告书。这份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军备应该与“国家的工业、交通及其经济能力”相符。

“我们军队在技术装备和发展上落后于欧洲的军队。”工农红军参谋长向人民委员写道。“应该立即着手实施全面的装备更新……必须完全以新方式达到发展和重组工农红军的目標。只对军队建设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进行局部的调整和增加是不行的。必须对工农红军的结构进行改造，使之与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相匹配……”

“如果从生产的条件，而不是从将工农红军现有的空军和装甲部队扩大多少百分比来考虑，那航空和坦克部队的发展是能准确无误地确定下来的。”（引自：米纳科夫 С.，《斯大林和他的元帅》，第385、386页）

军方通过自己的参谋长要求国家领导人改变经济和国防政策。这是报告的主要意图，相应地，也就间接表达了对伏罗希洛夫和国家领导人之前工作的不满。

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报告巩固了拥护加快工业化的人们的地位。

这样一来，1927年底，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就面临着几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而经常性的白卫军分子的恐怖袭击有可能随时夺去总书记的生命。

尽管有这些危险，斯大林还是只带一名警卫在莫斯科市中心四处徒步巡视。这时只需开一枪就可以给他的生命画上句号。如果真是这样，苏联的历史就将完全是另一种进程。

同时，反对派遵守休战承诺的时间并不长。

9月3日,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13位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议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纲领》,并要求印刷和散发这份文件。但他们的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这份纲领里都写了些什么呢?断言“斯大林集团对党进行瞎指挥”,隐瞒了敌人的实力,并且不允许客观地分析问题。按照反对派的意见,这些问题如下: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不够快;劳动者工资提高得更慢;失业增加;富农阶级在壮大,他们在经济上控制了农村,并掌握着大部分商品粮。

从整体上来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并且不能说斯大林不知道这些情况。但问题在于在现有的经济模式框架内,农业部门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斯大林集团“通过活跃苏维埃来培养党外农民积极分子”的口号越发加强了富农的政治作用。但正是这个不大的阶层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国家预算能否完成也依赖于他们。因此,斯大林是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他们都认为对经济能力强的农户的支持是唯一可行的方针政策。

左派要求彻底改变这一方针,要依靠贫农,给他们以贷款和免除税赋的帮助,并在集体经济中把他们联合起来。

也就是说,这就如同要回归到1918年夏天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那时,农村成立了贫农委员会,由余粮征集队征收粮食,并有意识地利用民众的对立打破了农村的平静。特别危险的在于“农场主经济”(即“斯托雷平式”的独立农庄经济)的顺利发展和“农场主”联合组成自己的合作社。

此外,左派提议回到世界革命的政策上来,并拒绝在对外经济上作出让步。显然,在现实的战争威胁下,这种提议显得太过激了。

为了达到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的目的,左派建议扩大国营经济成分的比重,剥夺“私营企业的超额利润”,从富农(占农户总数的近10%)手中没收不少于1.5亿普特的粮食储备;还建议实行“禁酒法令”,增加对国防、工业、电气化、交通运输、住房建设、集体化等方面的财政拨款。

这个纲领的草案使社会意识到:是可以选择另一条发展道路和更换领导人的。

这是这些政治家们的战斗纲领,为了胜利他们既不怕牺牲个人的平安,也不怕牺牲国家的安全。

所以,对于“这些人是否是英雄”、“他们对国家是否具有危险性”这样的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9月7日,托洛茨基及其同盟者要求在9月15至20日召开中央全会。他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代表大会前辩论的时间。

斯大林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写到了所出现的情况:“反对派不仅没有消停下



来,相反,他们的派系活动加强了。就在两周前,他们编出了整整一本小册子(他们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纲领》),还要求印刷(这是9月3号的事)并立刻展开辩论。这其实就是一个新政党的新纲领。在临近的全会研究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拒绝和禁止该文的扩散。‘纲领’与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其的答复,已经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但是反对派却以不合法的方式在扩散该文……9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搜查军事密谋者时,偶然抓到了一个叫谢尔巴科夫的人(党外人士,工厂主的儿子),在他那里发现了反对派的地下印刷厂(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反对派成员都直接参与在内)。于是,对某些小反对派分子(不知名的或小有名气的)进行了搜查,而党外人士(知识分子)遭到逮捕。两天以后,收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沙罗夫写的一封信措辞蛮横的来信。信中他们承认自己就是‘印刷厂的组织者’,并‘要求释放被捕者’(被捕者都是党外人士)。这不就成了诸如‘米亚斯尼科夫小集团’或是‘工人真理报’了。我们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下发了《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地下印刷厂被揭穿的通告》,并决定开除所有与印刷厂事件有关的‘反对派小人物’出党,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两位的问题暂时先放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事要干。不过这件事在报纸上尚未产生反响。对此你怎么看?”(斯大林Ⅱ,《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276、277页)

从地下印刷厂到建立第二个共产主义政党仅一步之遥。代表大会前的这份纲领的名称本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说明布尔什维克非列宁主义者的存在。斯大林已经不会向对手们妥协了。临近收局了。

9月27日,托洛茨基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指责性讲话之后,被开除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0月21至23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召开。此时斯大林已经不再谈论什么妥协了(“就是小绳子也会有用的”)。在发言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反对派分子。而对于普通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反对派反对实施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宣言形式批准了的7小时工作制。

斯大林不无讽刺地说,工人阶级“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份宣言,而反对派们却投反对票,他们与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家们沆瀣一气。

不过,在谈到经济问题时,斯大林收起了尖锐的棱角。按他的话说,农村得以安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工业也已有所上升,正用“工业本身的积累”积极进行设备更新。

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知道,此时粮食危机正在加剧,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已就没有粮食可以出口发出了警报。但谁也不想去纠正斯大林的说法。

总体上,斯大林是对的。而且此时战争的危險被推后了,英、法两国更倾向于谈判。

很快,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众就看到了一份独特的、绘有插图的全会材料。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的时候,反对派组织了自己的拥护者走上街头。

局势严峻。克里姆林宫担心可能有人试图发动政变。

莫斯科军区司令员沙波什尼科夫把全副武装的装甲车调上了街头。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大学生也被召集起来对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而其中的一位组织者就是高等技术学校的大学生、国内战争的参与者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在他组织的积极分子里还有马雷舍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这三位未来的人民委员,也是未来实施斯大林工业化的主要人物。

正是他们表现出了当时年轻一代的激情。

在激烈的冲突中,胜利在斯大林拥护者这一边。反对派并没有能够把游行引到起义这条路上来(毫无疑问,他们脑子里想的是1917年7月3日起义的经验)。

当沙波什尼科夫的装甲车驶进营房、烟消云散之时,才发现莫斯科并没有保护那些反对派的丝毫动静。“老年近卫军”输给了“青年近卫军”。

意识形态之争宛如游走于刀刃之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斗争会越过这个界线。根据M. П. 托姆斯基儿子的回忆,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曾试图杀害他的父亲:

“1927年,一伙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巴卡耶夫的带领下靠近了车厢。他们用各种难听的话大声谩骂中央委员会和我父亲,并试图钻进车厢。火车开动了,父亲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这时传来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进了窗框。我的哥哥此时就端着毛瑟枪站在车厢门口做着准备。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引自:巴兰金P.,米罗诺夫C.《争夺权力的阴谋与斗争:从列宁到赫鲁晓夫》,莫斯科,2003年,第66页)

一周之后,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清除出党,而加米涅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11月10日至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来自43个国家的947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向全世界劳动者发出的呼吁:“用所有手段和一切方法进行斗争,捍卫、保卫苏联——劳动者的故乡、和平的支柱、解放的家园、社会主义的堡垒!”在这个口号里,可以感觉到斯大林的风格。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12月2日至19日),反对派“大势已去”了:又有12名参与反对派活动的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75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和15名不同意官方方针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政治局还做出将托洛茨基和30名他最亲密的战友调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无足轻重的岗位上去的决定。多数人表示同意。但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决定,被按刑法的反革命活动罪判以从莫斯科流放至阿拉木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不具危险性,被发配到了离首都仅180公里的卡卢加,这里就是混乱时期伪德米特里被杀和被埋的地方。



在十五大的工作报告中，斯大林描绘出了苏联和整个世界所期待的未来蓝图。他说，战争的威胁依旧存在，所以应该竭尽全力保持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睦关系。

在国内生活方面，他强调了取得的主要成就：与战前水平相比，工业产值增长了100.9%，而农业产值的增长达到了108.3%。

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11.4%，是全世界最高的增长率。

斯大林简直就是在给国营经济的优越性唱赞歌，他提出要巩固已经达到的发展速度并进一步加快这一速度的任务，以便赶上和超过西方。

他列举了那一时期的一些大工程：沃尔霍夫河建设工程、第聂伯河建设工程、斯维里河建设工程，突厥斯坦铁路线，伏尔加-顿河运河以及一系列超大型工厂。

对于农村，斯大林也布置了任务：逐步将个体经济联合起来，并将它们工业化。

在这份报告里释放出了几个“信号”：必须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减少伏特加酒的生产、补贴电影制造业的预算损失，以及要与官僚主义、宗教和反犹太主义作斗争。斯大林需要发出同反犹太主义作斗争这一“信号”，是为了开脱在这方面针对他的指责，因为“反对派”当中很多都是犹太人，不过党的领导层、特别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层中犹太人要多得多，同时斯大林最亲密的几位战友的妻子也是犹太人。

在结束语中，斯大林宣布了革命新时期的任务。恢复时期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

十五大作为“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被载入史册。也可以把它称为是“新经济政策的终点”，不过那时还看不出新经济政策时期已经结束了。相反，米高扬说，必须把所有的商品调拨到农村去，甚至不惜使城市里商店的货架变得空空荡荡，以使用经济刺激促使农民出售粮食。莫洛托夫强调，实现农民向集体化经济的过渡需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谁要是建议强制性征收“1.5亿—2亿普特粮食”，“他就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人说完这段话后，斯大林高声说道：“对！”

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派（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右派（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还在瞞着与反对派（已经是被击溃的反对派）作斗争，但却没有料到，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距离他们仅一臂之遥了。

尽管在代表大会上李可夫和布哈林都谈到了关于资金过快地从农业部门投入工业部门的危险性，斯大林也用了“逐渐过渡”的字眼，然而粮食征购的情况很快就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某些重大措施。在为代表大会之后的全会准备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议案时，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出人意料地对斯大林提出的宣布集体化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的想法表示了反对。斯大林把这一冲突带到了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央全会上，全会上他的人明显占了大多数。他

做出声明：“请求解除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我声明，我再也不能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我没有能力在这个职位上继续工作。”

他的辞呈被拒绝。他得到了全会的认可，但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一次可怕的打击始自 1928 年 1 月。尽管收成很好，但国家只收购到了 3 亿普特粮食，远少于 1927 年的 4.3 亿。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层沉迷于与反对派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之中，而低估了粮食威胁。

显然，农民不打算支持国家的政策。

考虑到红军装备水平落后（飞机的机型陈旧、炮靠马来拉动、装甲设备数量极少），此时说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正如伏罗希洛夫在代表大会上所说，看到这样的装备让他都“惊慌起来”。

毋庸置疑，这让整个政治局都大为震惊。是的，战场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第三十六章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农民暴动”、新经济政策的终结、雅科夫·朱加施维里试图自杀、“沙赫特案件”、布哈林反对工业化

我们已经接近斯大林命运中决定性的那条分界线。越过这条界线，他必然或是灭亡，或是跃居众人之上，成为领袖。这条界线就是千年来的农民制度的变革，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对这个国家大部分居民已习惯了的经济自主权的剥夺。

但斯大林并不知道，一旦越过这条鲁比孔河（古罗马的一条河流，恺撒曾不顾禁令越过该河进入意大利，引起 3 年内战——译注），他将失去个人生活中所有的天伦之乐。

表面上看，总书记的家庭生活在他的战友们看来还是非常幸福的。两个孩子，瓦西里（1921 年生）和斯维特兰娜（1926 年生）的出生使这种生活更为幸福。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先后工作于列宁的秘书处和《真理报》下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编辑社。1929 年，她进入工业学院纺织系学习，同时还是一家专门接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子女的幼儿园的共同创办人。

据 A. Ф. 谢尔盖耶夫回忆：“他们决定：为了不把孩子培养成小贵族，幼儿园在接收 25 名在世或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孩子的同时，再接收 25 名孤儿。”进这个幼儿园的有：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

儿子热尼亚、秋鲁帕的孩子们、伏龙芝的孩子塔尼娅和铁木尔等等。每到星期天小家伙们就被父母接走。去接瓦西里和阿尔乔姆的是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因为阿尔乔姆的母亲身患重病。而伏龙芝的孩子们则是由伏罗希洛夫去接的。

这个幼儿园里的教育形式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比如，会对那些不愿接种疫苗的孩子说：如果不再给他们打针了，将来也不会接收他们参加红军。“于是，男孩女孩都立马竞相飞奔过来打针，并喊着‘给我打针，给我打针’，问他‘为什么要给你打针’，回答是‘我想参军，想当红军战士’。”（谢尔盖耶夫 A.，《明天》杂志，2005 年，第 30 期）

1927 年，这个幼儿园被解散，阿尔乔姆重新回到斯大林家里，一直生活到 11 岁。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性格沉闷，好妒忌，易激动，对小朋友们态度冷淡。

她要丈夫不断地关爱自己，而她的丈夫每天要工作 16 到 18 个小时，因此她常和他争吵。正如她的侄子 B. 阿利卢耶夫所写的那样：“不过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显然，她的童年过得很艰难，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娜杰日达患有重病——颅缝骨化症。她的病情伴随着抑郁和头痛不断加重。所有这些都显然对她的精神状况造成了影响。她甚至去了德国，向德国一流的精神病专家进行咨询……娜杰日达还不止一次地威胁要自杀。”（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30 页）

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与娜杰日达的关系：

“有一次，在参加完自己就读的工业学院里举办的一场晚会之后，娜杰日达回到家里。因为此前喝了一点葡萄酒的缘故，她完全像个病人，感觉很不舒服。斯大林扶她躺下，并开始安慰她。这时，娜杰日达说：‘你毕竟还是有点爱我的。’她的这句话，大概可以当成理解这两个亲近的人之间关系的钥匙。我们家里都知道，娜杰日达和斯大林是互相爱着对方的。”（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33 页）

这句“还是爱我的”表露出她对他的感激、爱意，也承认了自己对丈夫的猜疑是错误的。

有时候，斯大林仿佛开玩笑似地会当着孩子们的面拥抱她，并亲吻她的面颊。就是并非心理学家的人也能够明白这是爱的语言。在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写给他的信中，有时会流露出暧昧的语气：“没有你，非常非常寂寞”，“深深地吻你，深深地，像离别时你吻我的那样”。她称他为“亲爱的约瑟夫”，而他则叫她“塔季卡”（娜杰日达的昵称——译注）。

在家庭生活中，斯大林富有魅力（他拥有非凡的感召力，也很会吸引人）、热情好客，喜欢与孩子们玩耍和说笑话。

也许，在这些短暂的休息中，他可以从困难的重负中放松一下。

在克里姆林宫，在圣三一大门旁共产主义街 2 号的楼里，斯大林一家有一套不大



的住房，住房里所有的房间都是打通的。有趣的是，在外厅立着一只盛有腌黄瓜的桶，主人很喜欢这种腌黄瓜。瓦西里和阿尔乔姆合住一间房，长子雅科夫以餐厅作卧室。

A. Ф. 谢尔盖耶夫记得，住房里没有可供斯大林独自办公的地方。那里的家具很平常，食物也是一样。“午餐是固定不变的。先是厨娘安努什卡·阿尔布希娜神色庄严地在餐桌中间放上一个大汤碗，里面是每天都同样的东西——白菜肉汤。第一道是汤，而主菜就是熬肉。餐后点心是甜食和新鲜水果。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和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在午餐时会喝点高加索葡萄酒，斯大林喜爱这种饮料。但对孩子们来说真正的节日，是奶奶(斯大林的母亲)偶尔从阳光充沛的格鲁吉亚寄来核桃酱的时候。斯大林一回到家，就把包裹往餐桌上一放，然后将一个个装有美味的罐子拿出来，说：‘这些是咱们奶奶寄来的。’随即就笑得短胡子都抖动了起来。”(谢尔盖耶夫 A.，《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004 年 8 月 3 日)

应该认为，这核桃酱是通向 he 私密生活的一根线索。同任何远离故乡的人一样，斯大林也有一份游子的情感，并想与人分享这种感受。

不过我们应该指出，格鲁吉亚官员送来的丰富的礼物：葡萄酒、水果和糖果，他都未曾收过，并气愤地退了回去。

总而言之，斯大林对待日常生活如僧侣一样清心寡欲。他穿着朴素，衣柜里只有两三条裤子，几件旧制服，一件图鲁汉斯克流放时期的西伯利亚皮袄，以及常见的军大衣和靴子。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同样也不喜欢奢华。她偏好端庄的英式服饰：盖过膝盖的深色裙、白色短衫、深蓝外套和中跟鞋。她不喜欢也没有什么饰物和珠宝。

她每天早上会制订出一天的计划，并会严格按计划行事。

在党的领导人如此朴素生活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也都不便张扬了，尽管远非所有人都喜欢这种清心寡欲的生活。他们当中有贪图享受和喜欢饮酒作乐的人，比如监督物资供应和管理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韦利·叶努基泽，还有与女芭蕾舞演员们放纵寻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M. 加里宁，允许自己在国外散心解闷的政治局委员 Я. 鲁祖塔克，以及同样喜欢和女演员们寻欢作乐的 C. 基洛夫。但斯大林不得不原谅战友们的这些过错。

尽管工作繁忙，他从未忘记孩子们。在这方面，他对孩子们的关怀和风趣盖过了性格中的老成持重。他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业，但不会为得了“两分”就惩罚他们，也从未因得了“优秀”而表扬过。正如 A. Ф. 谢尔盖耶夫说的：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明白了问题的实质。

对于孩子们的调皮捣蛋他也很宽容。孩子们并不惧怕他。

有一次小托米克(阿尔乔姆的小称——译注)往汤里撒了烟丝，斯大林尝了一口

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问:“这是谁干的?”

阿尔乔姆承认了。这时,斯大林问道:“那你自己尝过没有?你尝尝。要是喜欢的话就去找卡罗利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女管家),让她每次都往白菜汤里加点烟丝。要是你不喜欢,以后永远也别这么干了!”

这则小故事体现出他的宽厚和不拘虚礼。只有相信自己能力和感到幸福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止。

甚至当瓦西里明显在胡作非为,而不得不对其严厉制止的时候,斯大林也能找到其他的处理办法。

A. Ф. 谢尔盖耶夫写道:“我记得,有一次瓦西里·谢尔盖耶夫跑回家,他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走去,边走边夸:‘爸爸,伙伴们在放学回来的时候看到几个老太太在画着十字祷告,就朝她们脚下扔了玩具炸弹。’斯大林蹙起双眉:‘为什么?我问你,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瓦西里慌忙说:‘那为什么她们要祷告?’父亲回答他:‘那你尊敬奶奶吗?爱她吗?她也做祷告。因为她懂那些你不懂的事情!’”

这一场景令人惊讶。斯大林并未一味训斥,而是将谈话上升到某种神秘主义的高度。信仰上帝的奶奶能知道什么?如果她真的知道,那就意味着上帝是存在的。那么这位父亲也是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吗?

不管如何,斯大林提出的这个论据已经超出了人们对他这位超理性之人一般认知的范围。

据说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常去教堂。加米涅夫的女媳加林娜·克拉夫琴科就说过这件事(瓦西里耶娃 Л.,《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莫斯科,2001年,第156页)。很难说这句话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斯大林对待教会的态度很特别,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在这场与儿子意外的争论中他突然间向“神秘主义”求助。

在其他情况下,他都是在世俗认知的框架内去思考问题。例如,他在1928年阿尔乔姆生日时送给他一本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他在上面写道:“赠给我的小朋友托米克,祝你成长为自觉、坚强和勇敢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句带有指令语气的话,后来成为一名军官的小男孩理解为就是一道命令。

从斯大林写给女儿斯维特兰娜的书信中,很明显可以看到爱心和理智的结合。当然,爱心还是更多一些。

这些信是他在女儿长大之后写给她的。而眼下,按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的话,他与女儿“非常友好”。

他还有一个家庭圈子——亲戚的圈子。

他的母亲生活在梯弗利斯,没有搬来莫斯科住。经常给她去信的是娜杰日达·



谢尔盖耶夫娜。这些信措辞礼貌、恭敬,但并不是那么亲切。在信中,她会转达来自非常忙的“约瑟夫”的问候,并告知孩子们的健康状况。这些信里从不牵涉任何政治话题。

偶尔斯大林也会给母亲写信,但非常简短。

显然,除了表达儿子的问候,他没有什么好告诉母亲的。信尾,他会署上自己儿时的小名“索索”。

其他的亲戚,还有他前妻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姐妹和弟弟:亚历山德拉(萨希科)、玛丽娅(玛丽科)、亚历山大和妻子玛丽娅。亚历山大(家里人都叫他阿廖沙)参加过格鲁吉亚革命活动,曾侨居国外,1920—1921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局长助理,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财政人民委员,此后先后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苏联驻外机构等部门工作过。1935—1937年为苏联国家银行海外业务管理局副主席。

另一系亲戚是可以称得上大家族的阿利卢耶夫一家。

斯大林的岳父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是一名电气技术员和机械师,在党内享有较高威望,参与过高加索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坐过牢。十月革命之后他当选为彼得格勒第一座水电站的政治委员,然后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派到乌克兰的经济领导岗位上工作。

早在斯大林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他尊重斯大林,但不崇拜他。1917年,列宁在C. Я. 阿利卢耶夫家避过难,租了一间房。他是一个廉洁无私的人。

奥莉加·叶夫根尼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婚前姓费多连科)是斯大林的岳母。她16岁时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家出走,嫁给了自己爱上的当时已27岁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娜杰日达也步她母亲早婚的后尘(而且,当母亲听说娜佳要嫁给斯大林时也是反对的)。

下面就是斯大林岳母的肖像画:“外婆是个自尊的人,不想依靠任何人。早在1928年就因病退休,经济上不宽裕,处境艰难,勉强能维持收支平衡,为此她曾要求提高非常微薄的退休金,但遭到拒绝,理由是她是斯大林的亲属。她写信回应道:‘每一个党员理应知道斯大林同志生活简朴,他根本没有从物质生活方面给任何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把我看成斯大林的亲戚,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是不公平的。姻亲关系完全是小市民的概念。’”(阿利卢耶夫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年,第117页)

阿利卢耶夫家有四个孩子:帕维尔、费奥多尔、娜杰日达和安娜。

帕维尔(1894年生)是国内战争的参与者,后来领导过诺里尔斯克的地质勘察队。1926年底,根据他非常尊敬的斯大林的提议,他被派到德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担任军事代表,1932年春回国后担任苏联工农红军装甲坦克局军事委员一职。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心胸开阔、严谨庄重。遇到不平总能挺身而出，但从不放弃原则。也许正因为此，帕维尔的威望很高。”（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25 页）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1898 年生）也是国内战争的参与者，常年患病，未对斯大林产生过任何影响。

安娜·阿利卢耶娃（1896 年生）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军事处工作过，还在乌克兰第 14 集团军特别处当过译电员。1920 年，成为捷尔任斯基的秘书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的妻子。

1920 年，列坚斯被任命为敖德萨契卡主席，此后又担任哈尔科夫契卡的主席；1922 年，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委员；1922—1924 年，任克里米亚政治保卫局主席和黑海舰队特别处处长；1924—1925 年，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任捷尔任斯基的秘书；捷尔任斯基去世后，他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共事；1929 年起，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高加索全权代表和外高加索政治保卫局主席。

列坚斯本性很像捷尔任斯基，都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作为斯大林的亲戚，他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层里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还在 20 年代末，就与 Л. П. 贝利亚有过冲突，列坚斯与之相互敌视。列坚斯的儿子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讲述了贝利亚及其亲信使其父亲在格鲁吉亚有损威信的一件事：“贝利亚和他的人把父亲灌醉，脱去他的衣服，并这样让他走回了家……”（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85 页）

这位不喜欢、也不会喝酒的外高加索契卡领导人的名声被玷辱。他被调至乌克兰。

（无法忍受贝利亚的阿利卢耶夫的家人们与贝利亚本人之间的对立，对于这个家族，应当认为，也是对斯大林，最终是以悲剧收场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亲戚们经常聚到位于祖巴洛沃的别墅（沿鲁布廖沃-乌斯宾斯基公路开出莫斯科不远），这时的气氛总是友善的，有着一种世纪初俄罗斯庄园里的古风旧习：家庭的几代人和朋友们、仆人们、孩子们的老师友好相处。

祖巴洛沃别墅的第一位主人就是巴库石油工业家祖巴洛夫，是他在巴库的产业让斯大林获得了革命的经验。1919 年，斯大林占据了这栋空置着的、有两米高砖墙环绕的带有哥特式塔楼的红砖楼房。

这栋别墅共有两层，斯大林的书房和卧室在二楼。一楼还有两间卧室，另有一间餐厅和一个大阳台。离房子 30 米远处是附属建筑，有厨房、车库、警卫室。从这里到主楼有长廊相通。



邻近住着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

阿利卢耶夫一大家子就住在斯大林这里。亲戚、亲戚的妻儿和战友在这里聚集成了一个大家庭。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这个大家庭的圈子成了父亲“可靠和不偏不倚的信息来源”,但在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死后,这个圈子就散掉了。

不过,除了信息以外,这个大家庭还给了斯大林一种生活的充实感。

而他的日常爱好同样增加了这种感觉。

他女儿对此有细致入微的记述:“我们的宅院在不断地改建。父亲很快清理出了房子周围的树林,一半的树被砍掉,开辟出一些小道,整体变得更明亮、更温暖、更干燥了。收拾好树林以后,给予了养护,春天时还把干枯的叶子扒到一起。房子前面是一片美妙洁净、闪烁着银光的小白桦林,我们这些孩子们总是在那里采摘蘑菇。不远处建起了一个养蜂场,为了产蜜每年夏天在它旁边的两块空地上种下荞麦。匀称干松的松林旁边的自留地也精心清理了一番,在上面种了草莓和黑果,空气中有一种特别的清新和芬芳。我长大之后才理解了父亲对大自然这种特别的兴趣,这种劳作的兴趣从骨子里具有深厚的农民情结。他不可能只是去旁观大自然,他需要的是去经营它,去不断地改变它。大片的自留地上都种上了果树,栽下了很多草莓、马林果和穗醋栗。离房子较远的地方,用栅栏隔出了一块不大的灌木林地,里面分养了野鸡、珠鸡和火鸡,小水池里还有鸭子在游动。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是逐渐地兴盛和扩大起来的。而我们这些孩子,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带有农村氛围的小地主庄园的环境下长大的:割草、采集蘑菇和野果,还有每年‘自制的’新鲜蜂蜜、‘自制的’腌菜和泡菜,以及‘自养的家禽’。

当然,所有这些活爸爸比妈妈干得多。妈妈需要操心的仅是在春天让房子旁边开出大片的丁香花来,并在阳台旁种上了一整条的茉莉花。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在那里我的保姆教我翻土,并撒下金莲花和金盏花的种子。”(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莫斯科，1990年，第25页)

补充一句,斯大林位于索契的别墅也开出一片果园,种有梨树、桃树和杏树。

按 A. Ф. 谢尔盖耶夫的话来说,斯大林“要么翻翻地,要么除除草,要么扫扫雪”。看到父亲这么做,瓦西里也迷恋上了田间劳作。

斯大林每逢星期天才到祖巴洛沃来(星期六晚上过来的情况很少,星期六是工作日)。亲戚和邻居们会聚在一起共进周日的午餐。消遣活动有打台球、弹奏经典钢琴曲,有时也会唱歌和跳舞。斯大林喜欢也擅长唱歌,是一位好客的主人。总之,在祖巴洛沃的生活当时看上去是轻松愉快的。1928年,斯大林49岁,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28岁,瓦西里7岁,斯维特兰娜只有2岁。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党的十五大粉碎了左倾反对派之后,斯大林集团就需要直接面对另一个无法

解决的问题了。新经济政策下受欢迎的贸易自由满足不了经济更快发展和军队更新装备的需求。如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政府的垮台。

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用强制手段使农村屈服。这正是左派的建议,而对此建议不久前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都表示过反对。

不过,这个方法还是被采用了。当然,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其目的不是为了延续世界革命,而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强国。

这样的选择当然有它的道理。甚至那些所谓的“农民思想家”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就因多种结构的经济体制而遇到了巨大困难,“要比那些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超过俄国的主要盟友和主要敌手遇到的困难大出好几倍”。(康德拉季耶夫 H.,《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粮食市场及其调控》,莫斯科,1991年,第43页)

简而言之,斯大林又回到了以前沙俄帝国政治阶层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上了。这个帝国的政治阶层不愿彻底施行斯托雷平的改革,并被农民的“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所瓦解。

学术理论界关于这一点是怎么说的呢?

斯大林熟读市场行情研究所所长康德拉季耶夫教授的著作。后者早在1922年时就出版了有关粮食问题的奠基之作《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粮食市场及其调控》。

1923年,农业人民委员部计划委员会着手制定历史上第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农林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1923—1928年)。康德拉季耶夫积极参与了该规划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农业五年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农业人民委员部计划委员会的赞同,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也得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认可。这位教授的出发点是:“农业经济的健康成长是工业巨大发展的前提。”

康德拉季耶夫没有想到,很快Г.季诺维也夫就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第13期)上发表文章,把他的思想称为“富农党宣言”。

当然,康德拉季耶夫警告说,不应对于那些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民进行斗争(“富农化”),对富农概念的扩大化“正在变成与农村整个中坚阶层的斗争”,而只有这个阶层可以出售农产品,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密切关注着所有新事物的斯大林应该知道康德拉季耶夫的下述结论,这一结论似乎是在预言为获取大量粮食而开展的农业集体化的失败:“余粮征集制是不符合个体农户经济利益的,有时还要向农户征收比他们自己通常投向市场的粮食还要多的余粮,这个制度若要顺利执行,就需要具备非经济方面的很多先决条件,就需要以不符合私人经济利益的动机为前提并克服来自私人经济利益的阻力。这就需要有着强烈国家意识、高度文化修养的民众,这就需要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并准备好作出



自我牺牲。但实际上这些先决条件都不具备。政府本身至今仍不允许民众自发组织的存在,这就铲除了孕育这些先决条件的土壤。由于这些条件并不存在,由于尽管如此政府还是要以它们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那么这些措施将不可避免地会以失败告终。剩下的只有或是承认这种失败,或者采取最后一种方法——征用。”(康德拉季耶夫 H.，《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粮食市场及其调控》，莫斯科，1991年，第203、204页)

1928年时,农民们具备了“强烈国家意识”、“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和“准备好作出自我牺牲”了吗?很值得怀疑。

但这一赌注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

斯大林已不得不将这样的农村状况称之为“农民暴动”了。

1928年1月15日,他启程前往西伯利亚,正如官方的大事记所表明的,是因为“边疆区的粮食征购进程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解西伯利亚农民是怎样的农民,提到下述一点就足够了:这里从来没有实行过农奴制,而且,按斯托雷平的说法,只有过“农民的民主制”,西伯利亚人在国内战争时期成立了一个既不听命于红军也不听命于白军的自己的原始森林中的共和国。

在一次与西伯利亚人的会见中,斯大林要求上交粮食,但他突然听到一个上了年纪农民的嘲讽建议:“那么你,这个高加索佬,就跳个舞吧!这样说不定我们会给你点粮食的!”(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年，第179页)

可以想象,这个庞大的农民阶层在这一时刻正在向他展示自己的力量。这就成了斯大林情感世界的鲁比孔河。

在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鲁布佐夫斯克和鄂木斯克四市,斯大林与边疆区领导、党的积极分子和收购机关代表进行了几次谈话。

他的语言果断坚决:要不惜一切代价克服粮食短缺。为此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根据刑法第107条追究富农的投机倒把罪,并没收他们的粮食。

近期的目标则是:在另一种基础上完成粮食征购,建立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

2月6日,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

安德烈耶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波斯特舍夫和柯秀尔则分别去了其他产粮区——伏尔加河流域地区、乌拉尔地区、北高加索地区。

斯大林的出行路线在这些人当中是最长的,行程的区域也是最广的。

这里我们注意到,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没有参加这次紧急动员行动。但当参与者从各地回来之后,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次就对富农采取强硬措施是否过头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2月13日,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给各级党组织下发了一封信函。他强调,党现在没有可能运用经济手段去影响当前的形势(“例如,向市场投放几千万普特的

粮食,并以此战胜不肯将余粮投入市场的农村富裕阶层”),因为储备贫乏,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斯大林写道,这并不意味着要废除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仍是“历史性”的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

为此建议继续“打压富农”(按刑法第 107 条,可剥夺 3 年自由)、以长期贷款形式将没收来的粮食的 25% 转给贫农,继续实行“自愿捐献”(即剥夺富裕农民的存款),地方领导人要继续“坚决肃清”“异己和混入党内的分子”。

这实质上是在执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政策,尽管斯大林竭力予以否认,似乎他还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总共有 3 万名共产党员被动员前往“粮食征购战线”。

结果,国家很快就收集到了所需的粮食,情况似乎有所好转。3 月份,李可夫宣布危机已解除。

实际上,这些措施简直就是给新经济政策和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判了死刑。

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朱加施维里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这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可怕预兆,必将使斯大林的生活发生彻底变化。

母亲死后,雅科夫由姨妈亚历山德拉·斯瓦尼泽抚养,后来他搬来莫斯科,考上了交通工程师学院。还是大学生的他喜欢上了牧师的女儿卓娅·古尼娜,并想娶她为妻。斯大林和亲戚们都不同意,建议他先完成学业。斯大林对这个儿子十分严厉,可以说是过于理性了,像任何一个没有亲自抚育过孩子的父亲一样。他总是批评儿子。

家庭纪事中是这样记载发生在斯大林寓所里的这一悲剧的:“还在上学的雅科夫决定要结婚。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但雅科夫还是自行其是,这引起了父子间的争吵。”(阿利卢耶夫,《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50 页)

雅科夫的这一枪促使斯大林写信给妻子:

请帮我转告雅沙,他的所作所为像个无赖和恐吓者,我和这种人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点了。他愿意去哪儿,愿意和谁在一起,随他的便吧。

И. 斯大林。1928 年 4 月 9 日。(《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莫斯科,1993 年,第 22 页)

受伤者本应获得同情,斯大林却只给予了鄙视。他认为儿子的这一行为是企图向自己施压。而斯大林不会忍受任何的压力。

不过,雅科夫还是娶了卓娅,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但不久孩子因肺炎去世。



1929年,这场婚姻就解体了。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外也发生了一些极为重大的事件:农民同样对来自国家的压力作出了回应,他们减少了粮食的播种。

当然,如果认为这是斯大林集团“仇恨俄国农民”,而农民在以牙还牙,那就过于简单化了。

说到与列宁合作社制度对立的农业集体化,斯大林指的是要建立配备技术机械的大规模的农业商品生产。这是农业发展的世界性趋势。

但在农村居民中很少有人准备接受这种想法。相反,他们从中看到的是敌对势力企图掠走农村主要财富的一个圈套。要知道,农民就像“富农歌颂者”康德拉季耶夫教授警告的那样,并不是“有着强烈国家意识、高度文化修养的民众”。几百年间,他们从自己不喜欢的国家制度中赎身出来,一直是自由的,甚至在农奴制时期也是这样,他们已经习惯于此。

这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斯大林是否了解俄国农民?

既了解,又不了解。

因为不断地自学,斯大林增加了对农民的认识——他的智力水平是相当高的。尽管如此,他对农民生活的认知还是有限的。

要想判断这种认识的程度,正确的做法是读一读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做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的一个片段。在谈及富农进行粮食投机倒把(即不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而以市场价自由出售粮食)时,斯大林提到了1921年那场为了与饥饿斗争而没收教会珍宝的反宗教运动的尝试,并将那次运动的大众接受程度与此次运动作了比较。

我们不再谈他教育儿子瓦夏要尊重信教者感受的那段谈话了。

斯大林重提1921年的事件,就是想最大限度地合理依靠这一强硬的经验。他明白在农村和过去一样,主要的精神力量并非在共产党员这里,而是在教会。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信徒,甚至红军中有一半以上的战士也是信徒。

斯大林是以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眼光看待农民生活的,他相信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并不需要那种自由的农户,这些农户经营着自己的小农经济,并且与自己变得似乎不可战胜的上帝打着交道。

那斯大林是否敬畏上帝呢?

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他与上帝维持着自己的联系。

而且,粮食征购本身绝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在1928年9月26日写给米高扬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谈论了这一点。

“不管粮食征购进行得有多顺利,它都不能从我们困难的议事日程上取消。它可

以减轻困难(我想,今年可以减轻),但只要我们的耕作技术、我们的农田产量不走出僵局,不以新的基础去组建农业,那么它就不能根治痼疾。很多人认为,取消紧急措施、提高粮食价格就是消除困难的基础。这是布尔什维克队伍里无聊的自由主义分子的空想!”(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283 页)

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但为什么他要在信中谈论这个呢?要知道米高扬是了解这一想法的,有关这一点斯大林在之前的全体会议上和给党组织的信中都已表达过。想必,这是因为,甚至连他的亲密战友米高扬都充分意识到了前景是什么。

后来,斯大林将农业集体化比作从社会的旧质状况到社会的新质状况的革命性飞跃,“其影响等同于 1917 年 10 月的那场革命性的变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45 年,第 291 页)

这个革命的第三阶段(新经济政策时期是第二阶段)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需要排除,或者自己退出历史舞台。斯大林结束了党内关于未来方针的理论争议。

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建议通过人为提高工业品价格的方法攫取农业的资源,维特在着手实现工业化时就是这样做的。

布哈林反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这种政策是在“威胁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也就是说布哈林在用抽象的概念来对抗经济学的论据和经验。“而且,布哈林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建议:没有严重剥夺的工业化,即走无痛苦的社会动员之路。”(科恩 С.,《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莫斯科,1988 年,第 252、253 页)

其实,对于斯大林反对者的“道德”无需按照字面去领会。我们在他讨论农民诗人们创作的《邪恶的标记》一文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道德的特性,并且很快会在“沙赫特案件”中他对死刑的态度上再见分晓。

关于“沙赫特案件”,斯大林是在 1928 年 4 月 13 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提到的。在他的这个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那句著名的话——“世界上没有劳动人民和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58 页)

这句话可不是演讲中漂亮的老生常谈!斯大林向来很少使用套话,他总是说得很具体。在这里,斯大林的意思是要使旧体制的专家干部服从领导,并开始提拔苏维埃的新生干部去取代他们。

资产阶级仍怀着十月革命前的心态,对社会主义持冷漠或敌视的态度,并准备着



随时以前国家主人的面目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但专家们的不可替代性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斯大林决定下手的地方。对他来说已经有了通过强制手段解决问题的理由:自去年5月起,就对破坏行为(对“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罗斯托夫州、沙赫特和白卡利特瓦地区)展开了调查。

事实上,所有问题不仅仅在于专家们,而具有多层次的性质。

自内战以来,由于恢复工作不足、电力缺乏、地下排水系统功效甚微和设备磨损等原因,采煤量增长缓慢,甚至低于工资增长的速度。

当要求以设备和矿工的满负荷运转使劳动效率提高时,就造成了事故频发、工伤上升,甚至引发了工人的骚动和不满。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产生背景。

而它的政治背景是:由于资金匮乏,72个原先是属于外国公司或俄国私营主的矿井开始租让经营权。为此矿场的领导与国外有了工作上的通信往来。

总的来讲,租让的情况是含糊不清的,经常会出现经济间谍活动和受贿行为。但这种现象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

然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却从中发现了与巴黎、柏林、伦敦的商界勾结在一起的盘根错节的阴谋活动。被捕的工程师们公开供认,他们不接受苏维埃政权,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建成,并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持否定态度,他们也不隐瞒与前矿场所有者有联系。所有这些都判定为破坏行为。但被捕者们既不承认犯有破坏行为,也不承认从事间谍活动。

1928年2月18日,第一批案件材料被送交政治局,并引起了政治局的极大关注。

为此甚至成立了由李可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组成的委员会。很快伏罗希洛夫也加入进来。实质上,所有高层领导都进入了该委员会。

3月5日,当局逮捕了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工作过或与其有过接触的一些德国工程师。

3月8日,根据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提议,中央委员会把《关于南方煤炭工业地区的经济反革命》的报告下发给联共(布)的所有机构、所有经济部门的党员领导、所有工矿企业的负责人以及教授、所有工农检察院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人员。

危险的程度被提至最高级别,虽说这些旧的工程师其实并不是实际的敌人。当然,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

但是,他们并没有为任何阴谋而组织到一起。对于当局,他们的过错就在于他们已不适合加速现代化的需要,所以从理论上讲他们有可能制造阴谋。

国家的领导人需要严厉打击这些专家,并用惩罚措施加以威胁,同时向年轻人展示,他们飞黄腾达的前景敞开了。

此外,也需要开始与经营不善的现象作斗争。

参加此次调查的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明仁斯基和亚戈达,还有副司法人民委员 H. B. 克雷连柯。

“沙赫特案件”开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根据此案的调查结果,国家安全机关开始对经济组织的活动进行监控,认为这些组织带有危险倾向。

1928年夏,在 A. Я. 维辛斯基的主持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了该案。在法庭上,一些被告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另一些是部分承认,还有一些被告则完全认了罪。53名被告中有4人被宣告无罪,4人被判以缓刑,11人被判以极刑(其中5人被枪决)。其余的判决较轻,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德国工程师们则被释放。

(如今,总检察院已对当年判决提出了异议,“沙赫特案件”的参与者被恢复了名誉,因为“此案中针对被告人破坏煤炭工业、进行间谍活动和危害活动的指控没有足够证据”。)

当时,从“沙赫特案件”很快衍生出了其他部门的“案件”,其中包括在一战期间为组建煤炭和冶金工业做了很多工作的彼得·帕尔钦斯基都死在了它的磨轮之下。4月21日被捕后,他交给侦查员一份带有挑战意味的书面报告,这样他的命运就彻底被决定下来了。

他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查员普罗科菲耶夫、莫洛奇尼科夫、塔尔努耶夫所下的定义说,经济反革命,就是旨在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给正在实现十月革命任务的苏维埃政府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旨在为推翻苏维埃政府做准备的活动。他分析说:“在全球有1.3亿人口、占1/6的土地上,都有经济反革命的活动,而执行者则是一小撮知识分子,他们处于联共(布)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政权的统治下,面对着交通不畅、资源垄断、国境封闭的环境,并受到联共支部网络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网络的监视。很显然,一小撮知识分子是无力从事经济反革命活动的。但进行经济反革命活动的可能性是有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联共(布)自身的活动为它的存在提供了条件。”

接着,他罗列了这些条件的“美妙之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互不信任、任人唯亲、告密行为、耍奸溜滑、卑躬屈膝,以及最不适合当领导的人受到任命,无权的专家在他们手下扮演着参谋的角色。与领袖的错误决定作争论是徒劳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联共(布)的工作人员享有特权。盯梢和告密行为大行其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直接或间接介入各种事务,“用对拘留的恐惧控制着所有的人”压制实干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剽窃别人的思想和劳动成果,不断更换部门负责人。所有的工作效率都很低下。“国家领导层里的缺陷多到不用外力相助就足够毁掉任何经济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联共(布)有意无意的破坏性非



常之大，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应该向他们问责。”帕尔钦斯基就是这样写的。
(加拉耶夫斯卡娅 И.，《彼得·帕尔钦斯基》，莫斯科，1996年，第160页)

1929年5月24日，《消息报》和《真理报》刊登了一则通告：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务委员会的判决，“前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1917年10月期间的冬宫卫戍司令、现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教授 П. А. 帕尔钦斯基”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被处以枪决。

就这样，斯大林俄国工业化的思想先驱、著名民粹主义者尼古拉·柴可夫斯基的外甥、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的亲戚（而柯罗连科还是科学家韦尔纳茨基的表兄）帕尔钦斯基离开了历史的舞台。

提到“沙赫特案件”一事不应该放过一个细节：斯大林反对判处被告们死刑，而布哈林则坚持要这样判决。

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算得上是1928年的一出大戏，有时表现为冷酷无情的柯巴和天使般的布哈林之间的激烈斗争。但实际情况是，尽管两人在文化和精神上存在差异，这两位政治局委员都是布尔什维克，都是“革命启示录中的天使长”。

就在调查“沙赫特案件”的同时，党的监察人员也对“斯摩棱斯克案件”展开了调查，该案对于作为农业国的俄国来说意义重大。该案的实质在于，以斯摩棱斯克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五角堡垒”，这里的地方领导人非常适合“农民共产党员”这一概念，他们扶持的是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并常常将自己的利益与这些农民连在一起。

简而言之，斯摩棱斯克在反抗上层为解决粮食危机而对农村展开的新一轮压制。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农业主要定位在对外出口方向上，即输出亚麻。因此，斯摩棱斯克的领导人对废除新经济政策以便实行政采措施并不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重复参与汉萨同盟（14—17世纪北日耳曼的汉堡等城市以垄断北欧商业为目的的商业及政治联盟——译注）的诺夫哥罗德商人的历史，这些商人在伊万三世时期不愿屈服于莫斯科的军事管制制度。

为了查清“斯摩棱斯克案件”，中央委员会派去了利亚克苏特金和蔡特林两位监察员。叶菲姆·蔡特林是布哈林的私人秘书，被认为是一颗正在上升的知识分子明星，也正是他支持了清洗斯摩棱斯克领导层的建议。

这就证明了“布哈林的人”和布哈林本人是支持斯大林路线的，原因是这个边疆区领导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准明显下降了。

美国历史学家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斯摩棱斯克案件”上的结盟提出了新的

见解：

人所共知，布哈林在领导方面的弱点在于他政治上不够灵活和不懂算计。对于斯摩棱斯克案件，较为确切的结论是：他自己的新经济政策纲领使党的干部表现出了独具个性的政治特点，而这是布哈林完全反对的。从斯摩棱斯克案件的供述来看，可以得出关于新经济政策政治生命力的两个结论。很显然，农村干部经过努力，从他们个人角度来说，成功地实现了党的农业政策。他们是农村新制度下的一支典型的队伍，那些在红军队伍里作过战、入了党的农民被充实到农村的干部群体中。他们中可能有很多像布哈林一样大公无私、自我奉献的革命者。他们很多人对待生产经营、社会关系和政权机关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革命前俄国的政治理念。在新的党的领导体系形成之时，新经济政策的措施提供了动力，而且它的实施主要是依靠地方上的主动性。这种新经济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建立起了一种能够满足农民需要和利益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果戈理笔下的那种家族圈子和营私舞弊现象不可能不兴旺起来，这是新经济政策派的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症状。这种亚文化的成长既有来自农业政策和政治压制的原因，也有来自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原因。总之，新经济政策措施在俄国农村导致了新经济政策派的出现。

这一趋势引申出了第二个重要的结论。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后果之一——存在于省级党组织中的严重的（尽管不是不可避免的）不稳定性和软弱性，还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发生冲突前就已经将党搞得四分五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狂热分子和革命纯洁主义者对新经济政策派怨恨十足。他们的这种敌对态度既有列宁主义理想和党员责任心的影响，也有想实现个人野心的因素。他们对富农阶层和滥用职权的仇视给省级组织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斯摩棱斯克的情况说明，他们清洗苏维埃和党的机关的意图是能够被阻止的。但布哈林和斯大林支持了这些反新经济政策团体的合力，结束了农村共产主义小团体的相对稳定性，并造成了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右派领导人的没落。斯摩棱斯克的清洗事件是党内动员消灭“150%的耐普曼”长期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把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合到一起，以清除在两人眼里都是威胁着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脓包”。如果我对新经济政策派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派别就是布哈林走向社会主义温和道路探索过程中一个意外的副产品。他坚定的信念使他成了党的这种领导方式的反对者，而他个人所持的政见在很大程度上也使他本人对这种方式负有一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想主义注定了他的灭亡。（布劳尔 П.，《斯摩棱斯克丑闻和新经济政策的终结——美国历史文献中的斯摩棱斯克事件》，斯摩棱斯克，2000年，第226、227页）



同时,在四月全会上才说过“没有攻不下的堡垒”的斯大林被迫作出退让。

全会的决议否定了新农业法草案。草案中规定了只有集体农庄成员才享有土地的终身使用权,明确了市场关系的重要性,谴责了针对富裕农民的极端行为。

1927年的十二月冲突之后,斯大林已经提出过辞职,这是第二遍铃声。

然而,全会刚一闭幕,4月25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即下达了加强粮食征购工作的指令。5月16日,通过了中央委员会《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呼吁书。该呼吁书允许剥夺富农,即打击富裕农户,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农,并把富农驱逐出去。

但此时斯大林尚未预见到当权集团内将出现彻底的决裂。早在3月,李可夫请求辞职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们应该聚一聚,稍微喝点酒”,并在与李可夫交心后解决了所有的“误会”。

他在政治局里拥有微弱的优势,站在他这一边的有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和伏罗希洛夫,站在对立面的是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而加里宁则摇摆不定。此外,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乌格拉诺夫也支持反对派,同样支持反对派的还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亚戈达、特里利瑟尔)。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布哈林的拥护者在所有的党刊机关、在教授群体、在工业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的领导层中都占有优势,他们还占据着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里的重要职位。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主席、《真理报》主编、党的主要理论家。他实际上拥有斯大林-布哈林双头政治中平等成员的全权。

同时布哈林身后还有莫斯科经济区地方利益的支持。“纺织业的莫斯科”与工业的列宁格勒相反,它面向的不是农民市场。

当然,这种支持还是明显不如斯大林背后的整个苏联企业经济领导人的力量。对于这些经济领导人来说,工业化方针与自身关系密切且清楚易懂。

5月6日,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布哈林隐晦地批评了斯大林领导的工业化速度过快。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7月4日至12日),两人再次发生冲突。

(突出的背景是大规模农民游行示威的数量不断增加,4月份有36起,5月份185起,6月份225起。)

斯大林直接谈到“为了服务于全国(包括农民在内)的工业的上升,要向农民征收额外税”。他称这种税收“类似某种贡赋”,并认为农民能够承受这一负担。

有趣的是,斯大林将在“纺织”基础上的与中农的“结合”,跟在“冶金”基础上的“结合”对立了起来,提出要扩大农业生产基地,而不是仅满足于农民自己的需求。

对布哈林集团来说,“纺织”模式的所指是很清楚的。

接下来斯大林说,在处理粮食征购危机时采取紧急措施是正确的,但要把这些紧

急措施变成既定方针，就是在玩火了。不过这里他马上引用了列宁的“贫农委员会的方法”作了补充，即在新的紧急情况下，这种强制手段可能会再次被采用。

在讨论决议案的时候，布哈林集团赢得了对方的妥协。用布哈林的话来说，他本人“感到了恐惧”，因为他认为斯大林的想法将引发一场新的内战。

这种妥协很快便在国家机关的决策中体现了出来。7月16日，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禁止继续采用紧急措施（包围院子搜寻粮食、非法搜查和逮捕、关闭市场等等）。停止所有根据刑法第107条对中农和贫农展开的诉讼案件。

不过，克雷连柯作了警告：若出现新的阻碍粮食征购的情况，将恢复采用刑法第107条。

7月19日，人民委员会也宣布禁止采用紧急措施。同时粮食的收购价被提高了20%，并希望以此吸引农民将粮食投入市场。

这时斯大林还不知道，7月11日，布哈林已与加米涅夫会过面，并探讨了是否有条件结盟来共同反对总书记。（斯大林知道此事时已是冬天。加米涅夫记录下了两人的谈话，有关记录又被传到了托洛茨基那里。而托洛茨基以此为基础印制了传单，想借此让布哈林派与斯大林彻底决裂。）

加米涅夫：这场斗争真的严重么？

布哈林：我想说的正是这一点。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行动路线已把整个革命置于危险之中。

我们有可能和革命一起被葬送。我们和他之间存在的分歧比以前我和您之间的分歧要严重得多。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均认为“目前在政治局里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比有斯大林好”。有关这一点，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曾开诚布公地谈过。我已经有几周时间没跟斯大林说话了。他是个毫无原则的阴谋家，为了掌握权力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他根据当前谁应该被排除而改变自己的理论。在“七头政治”里（七人政治局——编注）我们竟到了互骂“骗子”、“投机分子”等等的地步。现在他作了让步，是为了更好地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明白，他在耍手段，要将我们打成搞分裂的罪人。决议案（全会上通过的那个决议案——编注）被一致通过，那是因为他否定了莫洛托夫，并说会采纳我读过的那份声明中十分之九的内容，那份声明他没有交给“七头政治”（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交到它手上）。现在他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真理报》，并想用卡冈诺维奇接替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乌格拉诺夫。至于他的政治路线，是这样的（是根据他在全会上的讲话作出的判断）：

1. 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么是靠殖民地，要么借助贷款，要么剥削工人阶级。殖民地我们是没的，贷款别人也不会给我们，因此，我们的立足点是：从农民那



里收取贡赋(你知道,这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一模一样)。

2. 社会主义越发展,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句话在决议案中有的)。这真是愚蠢的盲目主义(指不学无术——编注)。

3. 既然必须收取农民的贡赋,而阻力也将增大,那就需要强权。自我批评不应该触及政权,而应仅限于它的执行者。

批评实际上是针对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两人的。但结果是,警察制度正在形成。现在谈的不是寻找替罪羊,要决定的实际上是革命的命运。按照这种理论进行下去,什么都完了。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国外却执行着右倾政策:他将共产国际赶出了克里姆林官。他建议在沙赫特案件诉讼中谁也不要枪毙(我们投票反对)。他在所有谈判中都在让步。托姆斯基这样说:我(托姆斯基)比你(布哈林)右 30 公里,可是我(托姆斯基)比斯大林左 100 公里。我们遵循的这条路线是危险的,但他却不允许讨论。他攻击我们,并迫使我们退却。他说过一段话,说只有地主才会这样去议论,其实是一字不差地摘抄乌格拉诺夫的讲话。他要扼杀我们。

加米涅夫:你们的实力如何?

布哈林:我,然后是李可夫,然后是托姆斯基,然后是乌格拉诺夫(绝对没问题)。列宁格勒从总体上讲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当说到要搞掉斯大林时,那里的人们就害怕了。科马罗夫否认了斯捷茨基的讲话,但就在那个晚上,乌加罗夫就跑到我这里替科马罗夫道歉。安德烈耶夫也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打算把他赶到乌拉尔去。斯大林现在收买了乌克兰人,因为他把卡冈诺维奇从乌克兰撤走了。我们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但是,1)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编注,下同)的一位折中派委员还不明白分歧的所有深刻内涵。2)所有人都惧怕分裂。这也是为什么在实行紧急措施问题上我对斯大林作了让步,为的就是增加他攻击我们的难度。我们不想作为脱离者来行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把我们摧毁。托姆斯基在全会上的最后一次讲话中已经暗示,是斯大林在搞分裂。亚戈达和特里利瑟尔同样和我们在一起……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在最后关头背叛了我们。我想,斯大林抓住他们什么特别的把柄了。我们的任务是逐步揭露斯大林的危险作用,并促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折中派委员们赞同免去他的职务。组织局在这方面也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加米涅夫:可他也在要搞掉我们。

布哈林:那能怎么办?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必会接受他的离职。可夜里我有时会想:“我们是否有权保持沉默?是否缺少了勇气?”得出的结论是:要谨慎行事。周五,有李可夫的报告。到时我们做个了结。我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需要让党明白,他正把党领向何方。

除此之外,要有很多关于“七人统治”的“揭发”材料作为补充。要造成一个对斯大林的极端憎恨和与他完全决裂的氛围。即使此时也会出现犹豫不决:该不该公开行动或者该不该行动呢?如果行动,他会用搞分裂的罪名扼杀我们。但如果不行动,他会狡猾地设局压制我们,并用我们摆脱困境。如果到10月份还没有收购到粮食,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

加米涅夫:他们指望靠什么来搞到粮食?

布哈林:这就是问题所在。面对反复出现的困难时,将回归紧急措施。也就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压制政策。

加米涅夫:那您呢?

布哈林:可能需要采取相当高超的策略才能与中农达成和解。对富农怎么整治都可以,但应该与中农和解。但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些还想教我马克思主义的木头疙瘩,被我们称为“死脑筋”的人在,我们就什么也不可能干成。

加米涅夫: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布哈林:斯大林吹嘘,说您是他的囊中之物,说你们的人到处都在支持斯大林。这要是事实就太可怕了。当然,您的政治行动路线是由您自己决定的,但我请求您不要帮着斯大林用你们的支持来摧毁我们。看来,斯大林正设法同您接触。我想让您知道,事情是怎样一个情况。

谁也不应该知道我们的这次交谈。你不要跟我通电话,因为我的通话被监听,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监视我,也在监视着你。有消息要通知我可以通过秘书,或者直接联系。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我和你交谈了。你同样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此事,不过请告诉你的人,让他们不要再攻击我们了……

加米涅夫: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的信给你看了?

布哈林:没有。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封信。

加米涅夫:他们准备对我们做什么?

布哈林:不知道。跟我们是不会说这些的。或者斯大林打算用高官来“收买”您,或者任命什么职位来束缚您,确切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再见了。代表大会前我很忙,也不能再与你见面。总之需要秘密行事。

加米涅夫:我们和索柯里尼柯夫要约一下,在我们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再会晤一次。

对布哈林叙述的补充。7月11至12日夜。

1. 总体的印象是他像一头被困的野兽。他的说法是:所有我们的“忙乱”难道不是纯粹的自慰吗?我(布哈林)对叶菲姆(就是布哈林的秘书蔡特林——编



注)说:难道我们的情况不是悲观无望的吗? a)如果国家灭亡,我们会跟着灭亡;b)如果国家摆脱了困境,斯大林正好使出他的手段,我们还是要灭亡。怎么办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对手——一个成吉思汗、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垃圾……

2. 斯大林对共青团员说,关于工厂里青年工人的就业数量问题,取决于布哈林是否能够停止自己卑鄙的政策。

3. 如果我们开始辩论,他们就会因此扼杀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害怕辩论。

4. 如果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离开呢?

5. 也许,我应该暂时(两个来月吧)不参与和不干涉当前的政策,而等危机到来时,再真正地和公开地行动?

我们不能主动展开辩论,因为这会立即变成一场混战。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我们宣告:就是这个人导致国家走到了饥荒和毁灭的地步!

而他会回答:他们在保护富农和耐普曼分子!

6. 党和国家不分,这就是不幸之所在。

7. 索柯里尼柯夫:您要采取更积极的策略,您至少该要求撤掉莫洛托夫。

8. 斯大林只知道报复。他会在背后下刀子。我们要记住甜言蜜语复仇的理论。

9.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者注)表现得不够忠诚。他到我这里,用最难听的话辱骂斯大林,可是在关键时刻却背叛了。

10. 全会上通过那个决议案之事是一场混战:

1) 我要求把问题摆出来讨论。斯大林回避说:需要制定一个工业和财政等方面的计划。

2) 我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对总的问题展开讨论。他跑到我这里说,“布哈林卡(布哈林的昵称——译注),你甚至可以使大象精神失常”,但他就是不同意展开辩论。

3) 我写去第二封信。他把我叫了过去,开口就说“我和你都是喜马拉雅山,而其他人无足轻重”。

4) 我们参加了“七头政治”会议。那是一场粗野的争吵。他开始朝我大喊大叫。我说出了他讲过的关于喜马拉雅山的话。他喊道:“你撒谎!是你自己杜撰的,以便让政治局委员们反对我。我们素来有意见分歧。”

5) 我宣读20页的声明,一直没有松手。莫洛托夫宣称声明是反列宁的。斯大林说:“我认为,十分之九是可以接受的。”莫洛托夫起身走了。这份声明作为一个基础被采纳。我离开去写决议案了,他们也去写了。突然他们拿来一份

剥夺了我的观点的决议案，其内容照抄了我的声明。我作了3处修订。李可夫改了一处。其他各点都被一致通过。斯大林是这样推断的：“由于采取了非常措施，我保障了粮食供应；我及时调整了政策，并亲自起草了这一宣言；当需要采取措施时，我一个人就能实现这些措施。”可实际上他在导向毁灭。

11. 瓦尔加是报告人，因为斯大林不想让李可夫来作报告。我还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报告。瓦尔加将阐发在工业化体制下饥饿不可避免这一思想。

12. 至于共产国际，塞马尔是支持斯大林的，台尔曼也是支持斯大林的。埃韦特不是右派，但他正被推向右派。

13. 斯大林绕过了政治局的决议。决议决定先把弗鲁姆金的信分送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再予以答复。斯大林等不及了，自己写了回复并发了出去。“答复是正确的，然而是不全面的”（这就是我能从他那儿争取到的一切）。

14. 关于此事或者其他的事件，我（布哈林）对斯大林说过：“您不要认为政治局是总书记下属的一个咨询机关。”

15. 斯大林的政策会导致内战。他将不得不血腥镇压起义。（《祖国历史文选（1914—1945）》，第364—369页）

从这份记录中可以推导出几点结论：

第一，这是一种可能向“成吉思汗”投降的征兆。

第二，承认斯大林的路线受到了党员群众的支持。

第三，试探了搞掉斯大林的方案。

第四，布哈林承认，他过去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分歧并非原则性的，主要是为了保住权力。

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在文中对斯大林的路线提出批评，他是寄希望于用这种公开分歧的方法保障在下次党的全会上自己能够得到支持。他揭露了计划方案中的缺陷、价格制定中的错误、农业政策中的失败，还有最主要的是与农民阶级之间已形成的脱节。他认为，力量对峙已经极度紧张，再加快速度已绝不可能，应该放弃“疯狂的紧张状态”，而这种紧张状态是当时正在制订的五年计划草案所造成的。他建议通过向农民作出经济让步并回到新经济政策上来以纠正错误。

斯大林一切都明白了。

斯大林进行了反击，在党内展开了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终极目标的反“右倾”运动。

这是对问题的一个原则提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多半是理论上的，因为在近期



尚看不出会出现什么复辟。

《札记》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猛烈抨击。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也加入了这一批评运动中，因为他们把斯大林的新路线看成是采纳了札记的思想。

政治局谴责布哈林的文章。斯大林要求布哈林停止“阻碍集体化”，而布哈林则暗自责骂总书记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随即前往高加索休假。

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宣传家，布哈林既不具备自己对手的意志，也不具备对手的组织能力。列宁在《政治遗嘱》里称他是一个“学究”。在他与斯大林的个人冲突中，胜利注定是属于斯大林的。但要知道，冲突并非仅是个人之间的！

在俄国历史的数百年进程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还处在与西欧国家有极大差异的气候条件下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上。

在俄国中部平原上，一年中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暖和的月份只有5个月，从5月份到9月份；而在西欧则有7到9个月。这一自然界的差异造成俄国在地缘政治的竞争中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农产品的种植成本要高出市场价格的数倍以上，也就是说，以集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农业劳动首先得养家糊口，用于国家需要的只能是从自己有限的收支中挤出来的一点点。

难怪在俄国直到农业集体化之前都一直保存着农民村社，即一种在自治、互助、互相监督基础上解决困难的群居方式。

同样也难怪沙皇政府和地主会把农民村社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保留下来，而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利用了村社的力量。在这个最北边国家（按照气温指标）恶劣的条件下，不管是从管理的角度，还是从生存的角度，农民村社都是一种后备和补充的资源。

正因为这个原因，K. 马克思把村社看成是俄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现实情况为他提供了依据。

不过除此以外，俄国的历史也有过加速现代化的例子：在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自我牺牲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原则上我们可以重复 B. B. 罗扎诺夫的话，“气候和历史状况”迫使俄国统治阶级接受唯一的执政公式——经由自我牺牲之路。甚至在东正教的教规中也把“为自己的朋友而献身”视为信徒的责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过，西方在特别的情况下也会在短时间内采取非常措施。

1928年，Ю. 拉林的《德国战时国家资本主义（1914—191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一书出版了，该书分析了一战时期德国对农业的国家调控经验。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帝国的粮食部门强制性地给地方农业生产者联盟作出了播种什么、播种

多少、如何饲养牲畜的规定；同时按自己的需要来支配这些庄稼和牲畜，并对价格作了硬性规定。其实，这一经验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被列宁以余粮征集制的形式运用过了。

如今，这一经验重新被人们记起。

如果以传统的观点来分析后列宁时代的这三位中流砥柱，各自依靠的是哪些历史阶层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依靠的是最古老的村社阶层，布哈林依靠的是孕育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阶层，而托洛茨基依靠的则是古老和叛逆阶层的综合体。

也许，这种联系过于大胆了，但历史在选择未来的模式时，总是要依据过去发生过什么，具有生命力的根茎保留下来了什么。俄国共产党人是以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人的身份起家的，而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传承人和继承人。

第三十七章

斯大林戴上桂冠

斯大林迂回前行、集体化的开端、兴凯湖军事事件、50 岁寿辰、农村中的内战

今天，随着苏联加速现代化的壮丽而悲惨情景的远去，最高领导层是否有权选择像集体化如此冷酷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即 21 世纪初，被认为是最为人道的康德拉季耶夫和布哈林的理论曾受到侨民知识分子的支持。巴赫梅季耶夫在 1928 年 8 月 16 日写给马克拉科夫的信中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支配下，认识到苏维埃政权应该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并取代富农成为“生产粮食的工厂”，以保障政权不受“农民群众的无理要求和情绪”的牵制。巴赫梅季耶夫预言，两年之后这一政策将遭受挫败，因为农民将减少播种以作回应（后来果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但该政策却没有因此而废除）。

巴赫梅季耶夫的此番推论是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

“所以我认为，俄国为未来着想应该让自己先富裕起来。如果同时能保留住帝国建设与管理中的民族天赋和才能，那么其余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至于这种天赋能否保存下来，布尔什维克的这段历史回答了我們。从令人厌恶的《消息报》的每一页上，您都能感受到人民生活正经历着新的震荡，因为它受到了从下面激发和膨胀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干扰。俄国应该经历一个能让人民收入增加一到两倍的财富急剧积累的阶段。因此它需要的是一个廉洁的政府，需要赋税越低越好，需要把大部分的国

民收入再投入到事业的发展中去。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经济国家主义政策搞到了荒谬的程度。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和其他耗资巨大的建筑用的都是农民的收入，而农民是当代俄国唯一独立的生产者。这种经济政策，是适用于金字塔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利用对农民的政治奴役来建设经济国家主义，恰如埃及法老利用奴隶的劳动才得以建成金字塔。我首先推崇的是经济个人主义，这是因为我确信，首要的和主要的民族需要，是要使国家富裕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蓬勃发展的、半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外国资本和创新精神的广泛影响。我们要迅速地消化和吸收资本，就像战争初期美国从英国人和荷兰人手中买回了自己的铁路、矿业等一样。外交上，接下来的20—30年将是一个喘息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能力采取侵略政策，即使是某个政府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俄国可以不用左顾右盼，而专心从事建设了，并可以实行松散的中央集权，松散的程度甚至可以超过一般正常思维的认知。再过30年，我们的人口将不少于2.5亿。要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如果国民收入平均增长一到两倍的话。而这完全是可以达到的，哪怕仅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绝对私密和可信：B.巴赫梅季耶夫与B.马克拉科夫在1919年至1951年间的书信集》，第3卷，第384、385页）

但这位临时政府大使的话有多少是正确的呢？要知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只剩下11年了。

而且除了农民的耕地之外，留给克里姆林宫用来重建工业和军队的还有什么呢？就只有维特的经验了，那种利用农村不丰富的资源实行工业化的政策（布尔什维主义没能想出新的收入来源，只是使获取资金的机构变得更加严格）。

从中期目标来看，这种做法是有前途的，也奠定了苏联军事力量的物质技术基础。

不管怎么说，所有斯大林的反对者，出发点都是苏联将有无穷的时间用于自己的发展。但实际上，时间所剩不多了。

1928年9月初，斯大林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人事调整。在中央宣传机关工作的布哈林的支持者被纷纷免去了职务：有《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И.彼得罗夫斯基，还有《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工作人员斯列普科夫、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扎伊采夫和蔡特林。

此外，针对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展开了一场批判运动，结果使他失去了对下级党组织的管理权，并迫使他开除了两位自己最亲密的拥护者——区委书记柳京和佩尼科夫。

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



其主要思想是：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基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

“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拨款给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拨款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打着‘苏维埃’招牌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大大加强。而我 国资本主义成分加强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复辟可能的增多。

“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25、226 页）

斯大林不点名地指出，“右倾”的支持者在各个阶层都存在，包括在中央委员会内。

不过他又强调，在政治局里“既没有右倾分子，也没有左倾分子，更没有与他们站在一边的‘妥协分子’”。

他在迂回前进，稳住布哈林及其拥护者。但他的这个结论是严峻的：右倾的危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内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这种危险是严重的。

此时，布哈林正在矿水城无忧无虑地休假，当得知斯大林施加的压力大到让李可夫不得不在工业化规划问题上作出让步之后，他才回到莫斯科。

从这一刻起，斯大林与布哈林开始有了正面冲突。不过起初斯大林曾试图让对手回心转意，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即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想把冲突上升到不可调和的权力斗争的地步。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政治局讨论工业发展控制指标的辩论中迈出了极端的一步：他们提出了辞呈。斯大林集团不得不长时间去劝说他们不要公开争执，以免削弱党和国家的团结。最后“右派”同意了这些控制数字，但提出条件：停止反“右倾”的斗争，并给他们提供公开宣传自己立场的可能性。

在 11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李可夫做了主要报告。他在公布了控制指标之后，马上就对数字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按照他的意见，国家无法承受“这种工业化

的进度”。

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继续了先前的争论。除了以前提出的论据，他又补充了俄国的历史经验，提到了彼得一世试图“跳出落后圈子”的现代化。如果回想一下彼得改革的残酷性及其在俄国编年史中的伟大形象，那应该把这一态度看成是斯大林的新定位。

同时，他又一次放弃去批评布哈林，而是转而对副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人曾不断写信给中央反对加速工业化。其实，批评对象的更换并没有改变斯大林对问题实质的批判，而是放开了总书记的手脚。他在明确无误地表示，他的友好立场是负责任的和旨在维护统一。

斯大林认为，若不接受工业化计划，就会出现威胁，而这种威胁是可能发生的，为此他将列宁的两点思想结合了起来：没有电气化（即工业化）就不可避免地会回到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对待农民阶级的正确态度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受“20年到40年白卫军恐怖活动的痛苦”。

换句话说，斯大林任意地运用了这些引文，让问题变成在他的工业化计划与白卫军的复仇之间的一种选择。

很可能的是，对1927年“战争危机”记忆犹新的全会参加者，正如斯大林希望的那样领会了他所说的话，并没有注意到他对已逝领袖论述的任意运用。

全会批准了控制数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和所有人一起谴责了“右倾”，也因此深化了自己思想的失败。

10月21日，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号召全世界共产党人与斯大林的计划作斗争。

在12月的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托姆斯基发言批评了工业化的前景，但未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他提出了辞职。

这次，斯大林还是表现出了宽容：没有接受托姆斯基的辞呈。不过，有关人事变动仍在继续：乌格拉诺夫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新增加了以卡冈诺维奇为首的五名斯大林的拥护者。

此外，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他证实，工业化的实施必须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这就明显违背了党的方针。1月21日是列宁的忌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刊登了这份报告，并做出重要结论：不应该发生“第三次革命”。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提出反驳，因为此时莫斯科已经处于从乌克兰调来的卡冈诺维奇的严密控制之下，托姆斯基失去了在工会系统里的威望，而贪杯的李可夫本人并不具备什么特别的能量。

可以说，如果不是1月22日托洛茨基爆出了信息：即斯大林从托洛茨基分子出版的小册子里得知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有过秘密会面，那么他将“右倾分子”从领导



岗位上进一步排挤出去的行动就要缓和得多。斯大林明白了，这是政治对手企图夺权的阴谋。

斯大林不可能产生另外的想法，因为“左倾”的托洛茨基与“右倾”的布哈林之间在思想领域的隔阂，远比中派分子的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隔阂来得大，这是显而易见的。清除斯大林及其集团的愿望是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动因。

1月30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公开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谈的记录。布哈林和他的拥护者声称，目前实行的“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终将破产，并导致共产国际的瓦解和官僚主义的滋长。

布哈林请辞自己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职位。

联席会议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月9日。

2月7日，斯大林建议布哈林在接受以下条件的基础上达成和解：

1. 承认与加米涅夫的会谈是一个错误；
2. 承认自己1月30日声明中的主张是“在激烈辩论时的气话”，并放弃这些主张；
3. 承认在政治局内齐心工作的必要性；
4. 撤销辞去共产国际和《真理报》职位的辞呈；
5. 撤销1月30日所作的声明。

布哈林予以拒绝。

2月9日，斯大林决定走出极端的一步。他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行为称为是粗暴违反中央委员会决议和明显形成“反党机会主义纲领”的罪行。

他把自己与他们这些人的私人关系说成是“过于纵容的”关系，并花言巧语地反问：“难道不是该结束这种纵容态度的时候了吗？”

紧接着，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会谈被定性为“策划组建联盟来改变党的方针、代替党的领导机关的分裂步骤”。

如果把这一表述换成普通的语言，那么所有被告知了党内的状况并被要求谴责“右倾”的党组织就明白了：布哈林分子是阴谋者和背叛者，他们不愿意国家强大起来。

1929年4月16日至23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就这种对立作了总结。

“派别活动”这个词本身早在列宁时期就已经是很可怕的指控了，现在它变得更可怕了。

苏联步入了对一切进行国家垄断主义的时期，从农户到党的领导都被国家垄断了。这是为了资源的积累、管理的效率和力量的集中。国家进入了战前动员状态。历史时期被分为过去和未来两部分。

斯大林在全会的讲话中将党的领导层分为“老的布尔什维克”和“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他公开承认了政治局内部存在分裂。他发言的风格是激情、愤怒和不妥协的。他相信自己的正确性，并准备坚持到底。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他所受过的宗教教育，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传教士在布道。

斯大林谈到了“沙赫特案件”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类似案件，谈到了“红色专家”的培养、产品成本的降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的推进，还谈到了要与官僚主义作斗争、改善工会的工作和清党等。

在自己威严的布道中，我们的主人公运用了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一段戏剧性的经历：

“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河那样的大河上遇到暴风雨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暴风雨来临时调动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暴风雨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再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的队伍精神沮丧：‘真倒霉，暴风雨来了，弟兄们，躺在船舱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上去。’（大笑）

“布哈林集团的方针和行动同在困难面前惊慌退却的第二种渔夫的方针和行动一模一样，这还用得着证明吗？”（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7、18 页）

斯大林未提及布哈林没有这种类似的经历，而且布哈林对俄国外省的生活也不甚了解，因为在革命前他侨居国外，但在他的潜台词中还是有所指的。

当斯大林说到阶级斗争将因经济矛盾的出现而加剧时，从中可以感觉到这是他在号召人们做好经历一场新的考验的准备。

斯大林在发言中用了一些章节来揭露拥有党的理论家头衔的布哈林。他也没有忘记批评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在结束语中，斯大林建议谴责反对派的派别活动、解除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职务，但仍留在政治局里。

这番人事震动尚未波及李可夫。

从此时起，失去了实权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还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回忆往事了。在“光明的未来”已经没有这些党的领导人的位置了。现在开始，他们的名字只有在称颂胜利者时才会偶尔被提及。

布哈林这位多年来喜欢采集蝴蝶标本、喜欢年轻姑娘的“经院哲学家”，在个人斗争中输给了有着铁一般意志的禁欲主义者斯大林。

至于党内斗争，结局是由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一些最大组织的书记们的选择所决定的。如果当时他们选择追随布哈林，那斯大林的前程也就终结了。

但是他们选择了跟斯大林走。



谈论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应该从俄国历史的规律谈起。当政权总是渴望将经济上自由的民众置于“国家掌控之下”的时候,这些规律就明显反映在政权和经济阶层相互关系的特征上。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依附于鞑靼蒙古的那 300 年历史,回忆一下大公们和大贵族之间的同室操戈,那么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民族统一所作出的选择是付出了痛苦和血腥代价的。反之,大公政权,以及后来的沙皇政权,都从来没有对人民客气过,并且在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两者之间宁愿选择统治,因为统治最能保障有限资源的集中。

我们在彼得一世的父亲、绰号最安详者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执政时期,就找到了一个选择失误的令人信服的例子。众所周知,彼得是俄国海军的缔造者,但是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却要求把船只都毁掉。

这段历史的根子源于诺夫哥罗德贵族共和国,这里过去是为了收集皮货和“海象牙齿”而在俄国北部建立的一个商业和殖民基地。通过德国汉莎贸易同盟与欧洲市场紧密相连的诺夫哥罗德的贸易行会几乎控制了罗斯的所有对外贸易,并经过特维尔把莫斯科和欧洲连接起来。正如一位当代研究者证实的那样:“存在着一个环绕‘莫斯科公国贸易包围圈’的现实威胁。莫斯科的军政精英与大诺夫哥罗德的商业精英之间的对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诺夫哥罗德人完全有机会取得胜利:在对抗最高峰时,诺夫哥罗德人占据了相当于今天从卡累利阿和斯匹次卑尔根到鄂毕湾的大片领土,他们的贸易周转额比莫斯科保障国家运转需要的支出高出数倍之多。”(库图佐夫 M.，《俄国历史上的精英和经济战略:似曾相识的综合症》，《经济战略》杂志,第 5—6 期,莫斯科,2004 年)

在伊万三世征服诺夫哥罗德之后,当地的商业精英被粉碎。莫斯科人第一次将行政流放作为控制领土的政治手段予以运用:将留下的流民从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迁至莫斯科公国,而把忠于沙皇的莫斯科贵族家族迁了过去。(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指责斯大林时,应该想想伟大的“俄国领土扩张者”伊万三世的政策。)

由阿尔汉格尔斯克、凯姆、梅津的商人建造的、独一无二的极地船队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被烧毁,因为通往东方的商业和狩猎的航线未受政府控制。莫斯科不能允许这样一种类似公国的独立的贸易行会的存在。克里姆林宫无情地剥夺了商人们的对外贸易垄断,留给他们的只有国内市场,并逐步完成了俄罗斯帝国的创立。

在与“右倾”作斗争,并垄断了粮食市场之时,斯大林是否知道自己前辈们的动机?

毫无疑问,他是知道的。他之所以会对伊万雷帝和彼得这样的人物感兴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就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

1917 年 2 月在工商资产阶级积极协助下被摧毁的俄罗斯帝国,通过斯大林又使

大家转向了它的根源。从穷乡僻壤挣脱出来的斯大林以苦难为己任,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方法打造出了工业生产的实力。所以“商人”布哈林在他们的对抗之中无法坚持下去,最终屈服于帝国的意志。

莫斯科,曾经的第三罗马,从1929年开始成为具有边疆区和州的保护人新面孔的共产主义的延续体,而约瑟夫·斯大林则成为沙皇和皇帝们的继承人。

四月全会之后,总书记成了整个国家的“总经理”。当然,党内、军队系统和经济领域一些异端思想的源头仍然存在,不过它们将要么被分解,要么被清除。

仔细研究一下斯大林的个性,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1929年时他还不是一个独裁者。他的生活是朴素的(直到去世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家庭矛盾,他爱妻子和孩子。在智力方面,他正处于上升期:他有一个很大的由他自己编排的书库;每天他都会读上几百页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不同书报;他关注着所有的进程,从技术新发明到国际信息。他有一个自己的技术机构——特别部。在政治局和政府中支持他的有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基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军队中有伏罗希洛夫。他的敌手已被击溃。1929年1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

此刻是否能够预料到,很快一切都将改变,并且他预言的“阶级斗争将加剧”会在取得了伟大成就的背景下,造成对他和对整个国家都无法弥补的损失呢?

他当然不可能预料到这些情况。

不过,他宣告的“第三次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吞噬旧的时代。(这一表达我们取自作曲家格奥尔吉·斯维里多夫对自己作品《时间啊,前进!》的阐述,他说:“时间正吞噬一切。”)

一个极为乐观的新时代开始了。

早在1928年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集体化委员会就制定出了农户集体化的五年计划,计划到1933年将110万农户(占总数的4%)联合起来。同年夏天,农业合作社联盟将这个�数字提高到300万农户(12%)。1929年4月,五年计划里所写的已经是400万到450万农户(16%—18%)。也就是说,一年时间里计划增长了4倍。

这是怎么引起的呢?

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通过,并经1929年4月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五年计划呼吁书足以充分回答这一问题。

该五年计划预计拨出195亿卢布用于工业企业(包括电气化企业)的基本建设,这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拨出的资金高出了4倍。

正如我们所见,集体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是完全相符的。

按计划整个工业产量应该增长2.8倍,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应为3.3倍(机械制造



业为 3.5 倍)。计划要建造 42 座发电站。1929 年 5 月,确定了建造 102 个农机站的计划,以此来确保农业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到 1933 年,苏联应该完成改造,一跃改变工艺落后的状况。

所以,党的各级领导这种不可动摇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时间啊,前进!”——他们处于与农村不同的技术层面之上,相信自己的正确性,并全力催马加鞭向前挺进。

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基础,更准确地说是主要的资源,应该就是联合起来的农户、国外的债务(德国)和斯大林集团实现工业化的决心。第三个因素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同样远非百分之百,因为社会的紧张状态(“阶级斗争”)加剧了,而激进变革的拥护者有可能无法承受这种状况,并要求重新制定政策。正是要从这一威胁的角度去看待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执政高层内部的所有镇压手段。

集体化于 1929 年开始实施,11 月,斯大林已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均发生了转变。被他放在第一位的成就是劳动效率的提高、创造主动性的发展和“千百万工人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掀起的巨大劳动热潮”。然后是“我们农业发展中从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到集中先进的集体农业的根本转变”。

通常这篇文章被看做是政治局对农村(正是在农村!)进程不了解的一个证据,然而并未注意到这就是斯大林主要的政治经济原则。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很难理解他全部的经济政策。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规模谷物工厂是扎不下根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差别。

“在资本家那里,因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购买许多土地或不缴纳绝对地租,就不能建立大规模谷物工厂,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使生产者负担很大的开支。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既没有绝对地租,也没有土地的买卖,这就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资本家那里,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或者至少是获得相当于所谓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一般说来,不这样资本家就没有兴趣去建立谷物农场。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大规模谷物农场同时又是国有农场。它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可以没有任何利润。这又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大规模谷物农场无论是在信贷上或者是税收上都没有特别的优惠,而在旨在支持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制度下,现在和将来都有这种优惠。”(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29、130 页)

斯大林挥舞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如果没有利润,在西方概念中就没有经济生活。但也存在以满足需求为目的的非市场的、“非自然”的经济。

这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虽然现在说这个还有点为时过早,但这样举例是有它的道理的,更何况始于1929年底的“大萧条”也对俄国的集体化速度造成了影响。

1932年的冬天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工农业经济趋于崩溃,生活水平下降了300%,资本从国内外流,城市里犯罪分子猖獗一时,1.5亿居民中有1500万人失业。大量无家可归和一贫如洗的人涌入华盛顿,并搭起了帐篷。

1932年11月,20世纪20年代曾领导过美国救济署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被罗斯福取而代之。胡佛曾提出了三项救国措施:达到财政预算的平衡,使用一切方法制止通货膨胀和保持美元的金本位。

罗斯福拒绝了这些“正确”的经济手段,而采取了非市场性的方法。其主要思路是:“如果我们一部分公民的饿死和贫困造成我们必须追加导致财政预算失衡的额外开支,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在美国人民说出一切真相,并请求他们划出补充资金。”

受他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领导了负责实施3万个工程项目的公共事务管理局。在10年时间里,10%的新修公路、35%的新建医院、65%的市政大楼、70%的学校及其他许多工程都是由该局完成的。而给该局带来光环的是为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做好了工程技术上的准备和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总动员的准备。

当然,罗斯福是给美国垄断资本家们套上“紧箍咒”的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子,是一个来自政治特权阶层的人,他与斯大林是不一样的。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能将两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对于经济危机的看法是类似的。罗斯福是借用了苏联的方法来解决危机的。

但这里我们应该记得,斯大林这位纯理性主义者在集体化的最初阶段大大失算了。《大转变的一年》中他说道:“广大的农民群众即使有什么强烈的不满”,那也是因为我们没能保证提供所有集体农庄所需要的农业机械和拖拉机。

关于这一点,布哈林在四月全会(1929年)上指出过:“如果一切拯救都集中于集体农庄,那么用于农村机械化的钱从哪里来呢?”

斯大林谈到的仅是问题的皮毛。其实,实施集体化的条件尚不成熟。一场冲击正朝着传统的农村而来,而其结果却是无法预料的。

以下是下伏尔加边疆区霍皮奥尔区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指导员巴拉诺夫的一封信:“地方机关采用了搞突击和运动的办法。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在‘谁干得多’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地方上,边疆区的指示有时就变成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



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了……甚至出现过慷慨许诺提供拖拉机和贷款的情况：‘什么都给，只要是加入集体农庄’……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就使得集体化程度表面上达到了 60%，也有可能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高达 70%。集体农庄的质量怎样，我们还没有研究过……因此，就出现了大规模生产组织在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上的严重脱节。如果现在不采取巩固集体农庄的措施，那将自毁声誉。集体农庄已经开始瓦解……所有这一切都将把我们置于困境。”(伊夫尼茨基 H.，《30 年代初的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俄罗斯农民的命运》(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材料》，莫斯科，1995 年，第 252 页)

这封信在中央全会(1929 年 11 月)上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С. И. 瑟尔佐夫进行了宣读。

斯大林只简短地反驳了一句作为回答：“您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能预先安排好吗？”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曾允许集体农庄成员在某一时段进行自我安排，但他脑海中始终保持着一幅他一年前描述的景象：联合收割机在广阔的麦田里不分白天黑夜(在灯光照明下)地收割着。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如果能够马上给村庄配备上新的机器，这一切是可以成为现实的。集体化未来的象征是“铁马”，但到 1929 年秋天全国仅有 3.5 万台拖拉机，而且主要都是美国生产的“福特森”牌。1929 年，苏联自己生产的拖拉机总计只有 3300 台。

对于那些 40%的耕地仍用犁来耕种的农户来说，农业技术上的突破是不切实际的。不过，想要发展农业，首先就需要发展能够生产出拖拉机的重工业，而建设重工业的资金还得从农村获取。所以斯大林的社会盟友主要是城市，加速的主要功效都发生在城市里。农村只是供血者。

1929 年 8、9 月，大批党员积极分子和工人积极分子(主要为机械和五金工人)涌入农村，被派去采购粮食。从他们开始，到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组织者，再到当地的区委会委员和契卡人员，农村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各种代理人。

所以，6 月 7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利用囚犯劳动力》的决议就不足为奇了。到处都在实行“无休息日工作制”，过去一贯使用的劳动周被取消，引进了三班工作制。

其实，城市新工厂建设者的热情遭到了仍不愿按国家收购价出售“余”粮的富裕农户的消极抵制。1929 年 8 月，全国开始实行凭证配给制，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市场。农民被指令性地责成向国家上缴粮食。一开始粮食征购进展还是顺利的，但进入 9 月份之后采购量急剧下滑，农民开始把粮食藏起来。

在 8 月 21 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斯大林写道，“如果你们不准备严厉和坚定地全力执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话”，粮食征购将有受阻的危险。

斯大林在 8 月 29 日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信中写道：“粮食征购进展不错。请继

续保持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巴什基尔的强硬政策。不要向艾赫和其他企图逃脱重责的同志作任何妥协。如果我们确实是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夸夸其谈者，那么我们就应该，也能够收集到 1 亿普特的紧急备用粮。在特殊情况下，这个指标可以降低 500—700 万普特，但不能更多了，而且这还是在其他地区能够补上这一缺口的情况下。如果打赢粮食战，那我们就能打赢所有的战役，无论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外交领域。”（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303 页）

集体经济与那些未加入集体农庄，但在农民村社中享有威望的富裕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滋长。该拿这些独立的生产者怎么办呢？拉进集体农庄？但这样他们就会得到在集体农庄中决定性的表决权。不拉进来呢？他们就会继续自己的路线，并形成竞争。要么把他们赶出农村？

目前看来驱逐尚不可行，但很快就会发生。

1929 年夏秋时节，除了生产方面的问题，还展开了一场在报刊上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进行尖锐批判的运动，并且与中国的战事也日趋尖锐。

鉴于在工业快速飞跃的希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就应该将“右倾”从思想上粉碎。但布哈林仍是政治局委员，担任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主任的次要职务。不过他担任党内高级职务的日子也不长了。

1929 年 7 月 10 日，中国当局开始夺取中东铁路控制权，并逮捕了近 2 千名苏联工作人员，这个事件造成了后果难料的军事行动的威胁。这样一来，连接海参崴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有失去整个边疆区的危险。幸运的是，不希望中国强大的日本这回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英国和美国也是一样。

斯大林决定予以回击。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了局部动员，苏联军队在布柳赫尔的带领下开赴绥芬河和满洲里的铁路站。

原则上，俄国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已是习以为常，并且如以往一样，这导致了更加严格地执行既定方针。

每隔十天，报纸就会刊登集体化发展的数据：1929 年 10 月 1 日是 7.3%，12 月 1 日是 13.2%，1930 年 1 月 1 日为 20.1%，2 月 1 日为 34.7%，2 月 20 日则是 50%，3 月 1 日已高达 58.6%。

在这神奇的速度背后，可以窥见一部分人的决心和另一部分人的退却。

在中国的问题上，斯大林行事更为敏锐。在与“军阀”冯玉祥将军日益加剧的内部冲突中，中国的主要角色蒋介石被削弱了，这时斯大林发起了打击。苏联军队在空军的支援下，击溃了中国东北为数 2 万人的两个加强旅，俘虏近 1 万人。

11 月 17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结束之际，苏联军队向兴凯湖以西地区发动进攻，到 11 月 18 日晚，包括至穆稜河的区域上的满洲里驻军（一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团）均被清除。



1929年12月22日,即斯大林5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双方在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了备忘录,承认军事行动至此结束,被俘的苏联公民得到释放,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恢复到1924年协议里规定的状况。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个小小的,但却非常重要的胜利。

“中国事件”之后,政治局的口气,具体地说是负责农村工作的莫洛托夫的口气变得更自信了:“我们应该在经济和集体化领域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而十一月全会宣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

在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的十一月全会之后,集体化计划被重新修订。从1930年春天开始,已有300个地区实现了“全盘集体化”。计划规定对耕地、农具、畜力实现完全的公有化,全盘集体化的地区比例将达到80%。

1929年12月5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

“1. 粮食征购的工作在进行之中。今天我们决定将紧急粮食储备额提高至1.2亿普特,并提高对像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等这样的工业城市的供应标准。

2. 集体农庄运动迅猛发展。汽车和拖拉机当然是不够的(不管是在哪儿!);但仅是将农民的农具简单联合起来就已经大大提高了播种面积(在一些地区高达50%!)。在下伏尔加河边疆区转到(已经转入!)集体农庄轨道的农户达60%。我们的右派吃惊得目瞪口呆了……”(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327页)

有关中国的事务,他骄傲地宣称:“美国、英国和法国连同他们进行干涉的企图都被猛击出中国。我们不可能另行其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布尔什维克!我想,中国的地主是不会忘记我们远东人给他们的这场直接教训的。我们决定在我们的条件未得到保证之前,暂不从中国撤军。”

在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在讨论由下伏尔加河边疆区区委提出的关于宣布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共和国为集体化试点示范区这一建议的同时,斯大林提出了提案:建立以农业人民委员 А. Я. 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会来制定全国集体化速度的决议。

12月8日,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负责集体化的速度、对待富农的态度、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管理和结构体系、集体农庄的类型、干部任命、物资保障、农具的征用及集体农庄文化政治工作保障等问题的各专门委员会。

斯大林想了解清楚整个过程的所有细节。

在第一次会议上,还听取了下伏尔加河边疆区区委书记 М. М. 哈塔耶维奇和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书记 А. А. 安德烈耶夫的报告,并要求党的各区委员会上报各地

集体化进程的材料。然后,委员会根据所获得的这些资料拟定出提案,供政治局制定出关于集体化规划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措施的决议草案。

最后,建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集体化,而产粮区则为半年到一年半的期限。这么一来,十一月全会的目标就又翻了一番。

很有点标新立异的是,委员会得出了不容许操之过急的结论。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在对各专门委员会主席做报告时说:

“这件事里最大的危险性是表现出一种好发号施令、离奇失常和过分匆忙的作风,如果放任这些作风或多或少得以蔓延,那么就会造成官僚主义盛行的危险,就会把中农和贫农阶层吓得远离集体化,就会用一种我们不需要的虚假的、形式上的集体化代替真正的集体化。

“从另一方面说,这场运动表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后于自然的增长。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于全方位领导这种自然增长,使之与整个工作机制的调整相符。

不过,党的地方领导人(舍博尔达耶夫、哈塔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却从农业领导人的建议中感觉到了对自己特权的某种限制,他们在雅科夫列夫的警告中听出了可能甚至是“右倾”的东西,于是便对警告提出了异议。后来,这种争议再次出现。

总的说来,在整个苏联时期,党的领导人和专家对事务的不同见解导致了从一般争吵到判处枪决的不同程度的冲突。而在斯大林时代,党的领导人的使命中还包含了要达到一个无法实现的成就的任务。

党员们“实施挤压”,而专家们则按传统的计算法行事。而为种种失误负责的却是专家,完全可以指控他们有反革命和阴谋破坏的企图。所以,党的领导人要是想出人头地的话,必须时刻谨记:上层会原谅他的过分压制,但不会原谅他对专家的“放任纵容”。而且在情操高尚和别有用心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一界限最终还是要由最高领导层来确定的。

最忠诚于斯大林的一位官员、他的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Л. 3. 梅赫利斯的上升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鲜明实例,他在内战时看似为了崇高的目标而欠下了不少血债。而在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梅赫利斯。

其实,事情不取决于梅赫利斯们和舍博尔达耶夫们,而取决于斯大林。

难道斯大林已经如此远离客观实际,竟允许自己违背他一贯的谨慎原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有预计到,会爆发瞬间使原料和粮食的价格崩溃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

此时在大洋彼岸发生了这样的事件。1929年10月中旬,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崩溃,而到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二”的10月29日股市到了毁灭性的程度:这一天被抛售的股票达1290万股,第二天又有1600万股被抛出。一个月内,市值下跌了近160



亿美元,美国一下子陷入了赤贫。中小股民的损失尤为惨重。危机持续升级,企业被迫停产,数百万人失业。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这样轰然倒塌了。

当然,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德国幸免于难,但斯大林对德国人是有戒备的,知道他们企图利用这一新的局势谋求自己的利益。早在8月28日写给米高扬的信中,斯大林就警告说,德国人“想看到我们完全被孤立,以便迫使我们在与西方(也包括美国)交往之中承认德国人享有特权”。他号召“不要屈从于德国人”。

现在,美国的经济破产打乱了斯大林国际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砝码。他陷入了进行艰难选择的困境:或是加速本身就风险重重的集体化进程,快速度过这一危险时期;或是刹一刹车,并开始与“右倾分子”进行和谈。如果采用第一种选择,等待他的是来自农民的反抗;而采用第二种选择,等待他的则是来自他的战友和大部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反抗。

农民的反抗可以镇压,况且农民很快也能看到情况的好转,对此斯大林毫不怀疑;而自己人的反对可能会产生混乱,甚至整个方针的破灭。

1929年,斯大林已经成为领袖。他的50寿辰是作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来庆祝的。《真理报》上刊登了卡冈诺维奇的《斯大林和党》、加里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舵手》、米高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钢铁战士》、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和红军》和其他众多身居高位者的文章。工厂、院校和部队还为此举行了各种群众集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许多贺信与贺电,大家还坚决要求授予斯大林红旗勋章(1930年2月13日斯大林被授予该勋章)。

斯大林在答谢所有这些祝贺时写道:“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斯大林Ⅱ,《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0页)

他说出诸如“献出热血”这样的词句绝非偶然。这些话可以说明,此刻他已经明显地认识到了危险的存在,并抱定了付出任何代价都不妥协的决心。

1929年底,在列宁逝世5周年之后,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大权独揽的管理者,是他的拥护者们簇拥他到了这种非理性的天才领袖的高度的。有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斯大林是明白自己新地位的重要性的。斯大林看了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和红军》一文的初稿,就其中一句“И. В. 斯大林的错误要比其他人都少”回复作者说:“克利姆!我没犯过错误!这一节需要删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报刊上就不再以他的职位总书记称呼他了。这不是偶然的。如今他只有一个职位——领袖。获得了这一巨大的权限之后,他在党的日常民主程序中就不可撼动了。现在只有靠谋反和政变才能撤掉他。由此,类似于

(1916年)12月反对尼古拉二世皇帝那样的阴谋的危险,就日益增加了。况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右派”“影子内阁”,尽管他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已经悔过,不过他们就算不在组织上,在思想领域还是有实力的。

1930年1月8日,A. M. 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

这几乎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比党之前所做的一切更广泛,也更深刻。那种存在了几千年的、使人被无理性的保守和私欲变得严重畸形的制度正在被摧毁。而这样的人有两千万。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去改造他们,这个任务是极其艰苦的。不过,这一任务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解决。

很自然,这千百万人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陷入了真正的疯狂无理智状态。他们甚至不明白这种变革的深层内涵,但他们本能地、彻骨地感觉到,他们几个世纪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根基已经断裂。毁坏的教堂可以重建,也可以再把任何一个神灵供奉进去,但如果土地从脚下消失了,那就永远无法挽回了。也就是这些人,机械地了解了一点革命语句和革命词汇,便疯狂地大骂起来,其实这些语句之后隐藏着的是“行将就木”的那些落伍者的报复心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7期,第215页)

高尔基一直对农民生活习惯中的“污秽”持批判态度,也就成了斯大林的拥护者,并希望成为斯大林的思想指导者。他的确从斯大林那儿得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生前就成了经典作家,但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没能成为指导者。

是的,作家中,甚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无论谁在与斯大林的交往中,都未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高尔基这封信早半年,1929年6月8日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从维奥申斯卡亚村往莫斯科发了一封信,收信人是叶夫根尼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列维茨卡娅。

当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贫农和中农向富农施压后粮食就运了出来的简短和乐观的报道时,脑海中就不经意地浮现出并不让人得意的对比!从前在国内战争时期,白军的报纸也是如此兴高采烈地宣告着在各条战线上的“胜利”,以及与“获得解放的哥萨克”的紧密联盟的。

中农已经垮了,贫农正在挨饿。

他们给加里宁发去电报,央求着,低三下四地央求着,可从那里得到的就是一句简短的套话:“您的事情已交区里研究。”在给加里宁的电报中,他们干脆地说:“现在我们受到的破坏,比1919年白军对我们的破坏更糟糕。”

阿尔乔姆诚实地说:“应该用细筛子筛一下直至加里宁在内的所有人,所有



那些伪善地假装大喊着要与中农结盟,但同时却在摧残中农的人。”我给边区检察长写了信,这家伙默不作声,是条毒蛇。(奥西波夫 B.,《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莫斯科,1995年,第12页)

列维茨卡娅是“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的一位处长,是位老党员,出身于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舅舅阿列克谢·巴赫是著名的民意党革命家,是苏联生物化学学派的创始人、科学院院士。列维茨卡娅的兄弟们也都参与了革命,她的丈夫于1919年牺牲。因在中央委员会共事,列维茨卡娅与斯大林是相识的。在稍作删节之后,她将肖洛霍夫的信转交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未直接答复此信,但在1929年12月27日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道:“例如,拿前顿河区霍泊尔的集体农庄来说吧。从表面上看,这些集体农庄在技术方面似乎和小农经济没有区别(机器很少,拖拉机很少)。其实,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转入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30%、40%以至50%。为什么会有这种‘冲昏头脑’的效果呢?因为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4页)

这番话完全可以认为是对肖洛霍夫那封信的回答。不仅如此,斯大林提到了要对“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对富农采取决定性的进攻。紧接着他又补上了一句谚语:“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这里的“脑袋”,他指的是传统观念中的农村。

国家进入了一场新的内战。

1929年,有1307次农民反抗,近30万人卷入其中;而在1930年1月至3月间,大规模的行动超过2700起(这还不包括乌克兰),参与人数超过了100万。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富农们被分成三个等级发配到集中营和流放地。紧接着就开始了富裕农民的大规模镇压。

在少数民族地区(北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有数百乃至上千人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为了镇压他们,当局派出了正规军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队。

2月7日起,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政治局委员开始收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通报。

但局势出现了意外的逆转。1930年2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集体化和展开与富农的斗争》的决议。决议中谴责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冒进行为和机械地生搬硬套全盘集体化地区的集体化方法的行为。不过,

在俄罗斯族人的地区,并未刹车。

但是,如果把农村重建的过程看成存在一条统一的对抗路线,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在农村内部,贫农跟富农和富裕农户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斗争,政府站在了贫农一边,并把没收来的财产转给了他们(这些财产被当作贫农缴纳给集体农庄基金的费用,而衣服、家具则给贫农个人使用)。至于富农的房子,要么充了公,要么分给了贫农居住。这就好似“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贫农委员会收缴粮食后会留一部分给自己。

所谓的“富农恐怖活动”此时滋长起来。1929年,共发生了9137起恐怖案件,其中包括978起杀人案、2745起斗殴案、3021起纵火案等。

由于农民的分裂,集体农庄从一开始便有了一些积极的拥护者,他们甚至做好了进一步拥护党的路线的准备。但人们远非立即就能明白,从今以后,他们就应当去替代这些“富裕的主人”。

农村反抗的滋长让莫斯科感到不安。2月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实施反对富农行动中享有不经法庭审理而进行当场判决的权利。

2月中旬,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和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分赴各地考察。当他们返回莫斯科后,在C. И. 瑟尔佐夫的主持下召开了政治局集体化问题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区党委和州党委的书记们。委员会得出结论:除了存在个别冒进现象之外,集体化进展正常。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受政治局委托于1930年2月28日发表的反对冒进的讲话就显得有些难以解释了。显然,斯大林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从目前的局势中看到了体制正在受到现实的威胁。

一般认为,3月2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那篇《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是领袖阴谋狡诈和不择手段的一步棋,以便让自己和自己的战友在如此严峻的危机中逃脱指控。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大林需要对自己的机构进行制约,与此同时,他也要对作为这一机构主要的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自己进行制约。

斯大林不能说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理由:1930年初,过去小批量生产拖拉机的“红色普梯洛夫工厂”完成大订单的速度急剧下滑,所以此时需要暂停一下集体化的进程,但在暂停的同时还不能使自己的集团招致谴责和指控(尽管基洛夫和古比雪夫严格监督着,但一直到年底,政府的订单也未能完成,只制造出了8935台机器。按计划,1932年应生产出3.2万台拖拉机和2万套备件)。(德米特里·韦尔霍图罗夫在《斯大林的经济革命》(莫斯科,2006年)一书中就指出了集体化与拖拉机生产速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

斯大林在文章一开始首先谈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集体化计划完成超过一倍,粮食征购计划顺利完成,还采购到2200万普特的种子。但作者



随后就谈起了骄傲自满、冒险主义和成就未得到巩固等现象。接下去又谈到“决不能施加强力建立起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依靠农民基本群体的积极支持”。谁不能理解这一点，谁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并丧失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必须要与“落后分子，也需要与冒进分子”作斗争。

看起来，这就像一个伟大的乌托邦：在一个全国主要居民只能生产出微薄剩余产品的地方，一下子就把数百万小农户变成了工业化的基础。不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两位政治局里最主要的“大地主”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家。他们注意到两个进程：一是，1928年，在农村出现了一种预购的方法（国家在谷物未收割的时候就预购了农民的粮食）；二是当年春天在乌克兰的塔拉斯·舍甫琴科国有农场建立了由10台拖拉机组成的苏联第一个拖拉机站，这些拖拉机以适当的费用为250家农户耕作了田地。这样一来，国家给农业生产者们提供了两大要素：有保证的销路和动力装备，而这种装备是封建社会早期的木犁无法相比的，不过至今还有四分之一的农民使用木犁耕种。

所以，斯大林立即抓住了这一新方法，在农村得到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供应的情况下，这种方法预示着将消除农业的所有不足之处。

1928年秋天，预购实践开始广泛推广，农户合并成销售合作社（便于结算）。

1929年6月5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组织农机站的决议，为此还成立了“全苏农机站中心”。

7月29日，斯大林签署了中央委员会责成“红色普梯洛夫工厂”生产1万台拖拉机的决议。此时，集体化已取决于为农村提供技术设备的进程了。

这是一些关键的决策，它们决定了斯大林今后的政治生命。

农业的工业化计划所依据的是这样的考虑：开始实行集体化，争取到1930年秋天可向集体农庄输送第一批拖拉机，第二年春天就可用这些“铁马”来耕地和播种了；很快就应该提供产品和制造农业机械的新厂房；预计到1931年将生产出5—6万台拖拉机、1—2万台联合收割机和同样数量的载重汽车。

另外，斯大林认为有必要整治一下那些“从拆除教堂的钟”开始建立集体农庄的人：“拆除教堂的钟，想想看吧，这算什么革命精神！”

这里，我们不能说斯大林在惺惺作态。

尽管他立刻就收到了地方党务工作人员的来信，责怪他把“冒进”的责任推给了他们。而这正好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把人们的批评视线从莫斯科引开。

1930年3月10日和14日，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谴责了集体化进程中的冒进和行政干预行为。此后，出现了从集体农庄退出的潮流，人们纷纷要求把牲畜、农具和种子返还给他们，但是什么也没有还给他们。

比如,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驻中央黑土区科兹洛夫区全权代表给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写信说:“在区委会上卡冈诺维奇同志给我们下达了如下指示:需要竭尽全力在播种期结束前种完田地里的集体份额;清除反对集体农庄的分子,给他们单独划出土地,不予贷款等。”(引自:伊夫尼茨基 H.，《30 年代初的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俄罗斯农民的命运》,第 274 页)

雅科夫列夫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斯大林,建议他给地方下达相应的指令。而斯大林在这位人民委员的信上所作的批示给人一种矛盾的感觉:“无需下达任何指令。”

斯大林明白,不能去破坏刚刚开始春播工作,所以他本人私下也在阻止对自己《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所下达指令的执行。跟他关系要亲近得多的卡冈诺维奇自然比雅科夫列夫更明白这一点。

坦率地说,他又一次耍了手腕。事实上,此前的方针还在继续执行,因为此时“红色普梯洛夫工厂”的情况开始好转。

从奥尔忠尼启则由克里沃罗格区寄给斯大林和 C. B. 柯秀尔(乌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充满戏剧性的局面:“这里乱成一团。很少有人愿意去改正:一些人顽固不化,对失败心怀怨恨;而另一些人则惊慌失措。所有人都想把这些解释成是富农的问题,却没意识到这是他们在胡搅蛮缠,过快地集体化所造成的……他们对通过施加更大的行政压力来扭转局势抱着很大的希望,表示要在区里枪毙 25—30 人以完成自己的百分比。”(引自:伊夫尼茨基 H.，《30 年代初的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俄罗斯农民的命运》,第 275 页)

斯大林的文章只在很短一段时间起了一些作用。1930 年春天,农民的反抗重新爆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通报:

Г. Г. 亚戈达和 Е. Г. 叶夫多基莫夫提交给 И. В. 斯大林的关于西伯利亚地区在集体化和没收富农财产运动中的政治情绪的报告。

1930 年 3 月 20 日。绝密。

根据近期来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处的情报分析,我们认为必须对以下几点基本因素加以注意:

在集体化和剥夺富农运动中的消极因素。

在西伯利亚许多个区的集体化和剥夺富农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冒进和偏离到了令人可怕的规模。这种停不下来的偏离使中农和贫农群众的情绪产生严重波动,这正好给富农进行煽动和扩大富农在部分中农甚至贫农中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结果是在西伯利亚由富农带领的大规模反抗一直没有停止(甚至



有增长的趋势),并逐渐发展为匪帮……

我们举出这一系列的事实来说明领导层所犯的严重错误……(《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编者:B. H. 豪斯托夫、B. П. 璠莫夫、H. C. 普洛特尼科娃,莫斯科,2003年,第236、237页)

1930年4月2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通过了一封题为《关于在党的路线遭偏离情况下集体农庄运动的任务》的内部通报。其中重复了先前认为地方领导负有责任的观点,但也承认了已经转变成反苏维埃运动的农民起义和反集体农庄行动的存在。“集体化事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威胁之下。

4月3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的又一篇文章《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其中写道:

他们忘记了:在和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时,暴力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对待作为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时,暴力就是不可容忍的和极端有害的了。

他们忘记了:在解决军事性质的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解决集体农庄建设任务而且是联合中农来进行的建设任务中,骑兵式的突袭就是不适当并极端有害的了。(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3页)

不过文中提出了全新的经济方面的建议:不管是对属于集体农庄的,还是对属于集体农庄庄员私有的牲畜,一律免税2年;延长偿还贷款的期限,并取消4月1日之前被判处的所有罚款和法院处罚;给集体农庄提供新的贷款。

“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做错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斯大林提出了反问。

已经没有退路了。

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系列其他事情,使斯大林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除了工业化本身的问题以外,他还面临着以下诸多难题:要保持现有的粮食、石油、木材、亚麻等的出口水平,以便获得购买设备的资金;要撤换高层人士和在军队中进行清洗,因为军界和政界存在各种各样的谋反企图;法国和波兰存在发动战争的威胁;右派的“影子政府”依旧存在,随着局势对克里姆林宫的复杂化,他们的势力愈加壮大;斯大林领导的“第二梯队”代表人物中的怀疑在上升;专家们的缺点,还有包括国家的贫困、严寒的气候和大部分居民世界观中传统的地方主义等众多问题。

空气中似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前途未卜。所以1930年开始的针对军事专家的审查行动并不是偶然的。这项行动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统称为“春天”案件,共有近

3000名前沙俄军官被定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春天”案件是“沙赫特案件”的延续，说得再深入一些，这是终止新经济政策和加速向现代化过渡的结果。

1930年1月27日，自1918年起为布尔什维克服役的前任沙皇中将A. E. 斯涅萨廖夫被捕。从1918年5月起，他是北高加索军区的军事领导人，那时该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斯大林。1919年起，他担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然后成了学院的教授，此后当了东方学研究所的所长。1928年，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授予他当时所颁行的“劳动英雄”称号。这里要提醒一下，除此之外，斯涅萨廖夫还曾是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同事，是他孩子的教父。这位65岁的教授是因涉及席卷莫斯科一系列高校的“民族中心案”而被捕的。同时还要提醒一下，1918年7月19日在察里津，斯大林逮捕了斯涅萨廖夫指挥部的所有人，并发配到作为浮动监狱的驳船上，而3天后斯涅萨廖夫本人也遭到逮捕。

1930年8月13日，斯涅萨廖夫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判处枪决，不过在1931年1月8日枪决改为监禁10年。

还是在这个1931年，斯涅萨廖夫又被直接卷入“春天”案件，因为一些因此案而被逮捕的人称他为谋反的主要领导人，是军事君主主义军官组织的“独裁者”。斯涅萨廖夫认了罪，被判处枪决。但在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干预下，判决又一次改成了10年监禁。1934年，斯涅萨廖夫患了病，被释放出来，1937年12月4日死于莫斯科。

作为75名投奔到布尔什维克一边的沙俄将军中的一员，他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全部过程。1929年的“第三次”革命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认为是危险的，按照统治集团的看法，他们准备与白俄侨民一起支持法国和波兰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正是在1930年，斯大林十分担心法、波入侵苏联。

一旦爆发武装侵略，在苏联国内就能找到支持侵略的从沙俄旧军官到知识分子的广阔社会基础。

至于科学界，从1929年10月起开始了在科学院系统里进行拘捕。有包括E. B. 塔尔列、C. Ф. 普拉东诺夫、M. K. 柳巴夫斯基、H. П. 利哈乔夫这些科学院院士在内的100多人被捕。

稍早一些时候，科学院迫于压力吸收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推荐的人为院士：H. 布哈林、И. 古布金、Г.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M. 波克罗夫斯基、Д. 梁赞诺夫、A. 德波林、H. 卢金、B. 弗里切。但他们被捕并不是由于旧体制学者们身上的顽固不化，而是因为科学院里收藏着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比如说，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诏书），而科学院院士们却以“苏维埃政权尚不稳固”为由不急于把这些资料转交给苏维埃档案馆。这些知识分子预计新政府将迅速崩溃，而在崩溃到来前夕他们就有关国家的前途举行了磋商。



无疑,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权威学者的消极反对立场就能成为政治上更为积极的一些势力联合起来的基础,并能推出多数人可以接受的领袖人物。

难怪能从“科学院院士”那里牵出针对斯涅萨廖夫之类军事学者的调查线索。

现在已经清楚,被判定的那种谋反是不存在的,但一些由共同意识形态而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却无疑存在。1931年8月8日,院士们受到了较“轻”的判决——流放5年,但对那些参与了有关俄国问题讨论的同案军官们,惩罚却是残酷的:有6个人被枪决。

第三十八章

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 围绕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冲突

图哈切夫斯基和伏罗希洛夫：围绕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冲突、十六大——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西方经济危机遏制了工业化、斯大林的干部们

1930年1月26日，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主席库捷波夫中将在巴黎被包括法国共产党员和白军分子在内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和情报人员劫持。库捷波夫认为：“俄国现在的心态要比国内战争时期好得多”，并且认为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是“群情激奋的农民大众”的领导核心。

根据契卡人员的计划，库捷波夫本应被移交给莫斯科（他的继任者 E. K. 米勒就是被移交的），以便利用他与国内的反对派作斗争。但库捷波夫将军对劫持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以致在汽车里被刀刺死，随后他的尸体被带到巴黎郊区，在酸池中被销尸灭迹（另一种说法是，用混凝土封死在车库里）。负责这次行动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法间谍头子雅科夫·谢列布良斯基。

清除掉不屈不挠、准备坚持到底的库捷波夫之后，斯大林集团的任务简化了不少，但这只是蔓延中的悲剧的一段插曲而已。



此时，图哈切夫斯基再次被提了出来。在反间谍的“托拉斯”行动中，契卡人员曾经在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领导层面前，把图哈切夫斯基描绘成准备发动军事政变的“红色拿破仑”。但这一次，图哈切夫斯基似乎成了真的敌人了。

1929年12月16日，图哈切夫斯基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军事部会议上做了题为《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看现代战争的特点》的报告。报告的主要思想是：“只要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按照工业化的政策进行相应的准备，并在“外来革命”的概念之外补充了“摩托战争”的概念。

1930年1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给伏罗希洛夫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阐述了在国家战略任务和地缘政治环境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纲要和计划。他提出了要在军事工业发展、“农村取得好转”、各兵种均有发展的基础上，采用“作战艺术的新形式”。这实在是一幅宏伟的画卷：由于坦克和飞机数量的增加，可以进行由150个师在坦克兵和空降兵的配合下，在长达450公里、纵深100—2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一场总体战。

他建议到五年计划末，红军应拥有260个步兵和骑兵师，50个师的配有重炮和迫击炮的总司令部预备队、4万架飞机、5万辆坦克和225个机枪营。

图哈切夫斯基同时建议对整个工业体系进行改造，使之能够生产出按照我们现今的话说是“双重用途”的产品。他写道：“国家快速调动所有工业经济资源的能力是其军事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些建议是建立在苏联工业政策基础上的，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工农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的反对，后者属于一直与“革命将领”竞争的“总参谋部官员”一派。

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过于极端，伏罗希洛夫也同意他的看法。结果斯大林收到了一份改变了数据的图哈切夫斯基建议。斯大林对建议持否定态度：

1930年3月23日。

绝密。

致伏罗希洛夫同志。

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说明报告和参谋部的“意见稿”等两份文件均已收到。你知道，我非常尊重图哈切夫斯基这位才华横溢的同志。但我没有想到，一位不应该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竟会坚持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他的“计划”没有最主要的东西，即没有考虑到经济、财政、文化方面的实际能力。这份“计划”根本违反了所有合乎思维逻辑和能够允许的匹配，作为国家一部分的军队与国家这一整体之间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最高限度的匹配。该“计划”堆积罗列了一些常常忘记军队是国家经济和文化产业的衍生品的“单纯军

事”人员的观点。

在一位经历过国内战争洗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脑里，怎么会产生一份这样的“计划”呢？

我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是陶醉于时下流行的“左的”言论的结果，是陶醉于纸面形式上的最高纲领主义的结果。所以应有的分析被一种“数字游戏”替代了，红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被幻想替代了。

“实施”这样的“计划”就意味着要断送国家经济和军队。这比任何反革命都要更糟糕。

令人高兴的是，工农红军参谋部尽管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明显和确定地与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这一“计划”划清了界限。

1930年3月23日。你的И.斯大林。（斯大林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333页）

这封信透露出一种深深的不安，因此出现了“左的言论”、“比任何反革命都要更糟糕”等语句。斯大林要阻止这位冒进的“幻想家”。

在1930年4月13日举行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宣读了斯大林的这封信件，还有伏罗希洛夫对此的批注。

图哈切夫斯基被工农红军参谋部对自己想法的批注激怒了。1930年7月19日，他直接给斯大林本人写了一封信：“我不打算怀疑沙波什尼科夫同志有什么个人阴谋，但我必须声明，您被导入歧途了，他们对您隐瞒了我的估算，在打着我的建议的幌子下，他们给您提供的都是虚假、荒谬和疯狂的数据。”

在驳斥沙波什尼科夫对自己报告批注的同时，M.图哈切夫斯基重申，他谈的是为进行战争所应动员的军队，并且考虑到了军事和民用工业动员能力的潜力和损失。

“根据我的估算，要组织一场新型的纵深战役，必须动用8000至12000辆坦克，这些是在我还不知道您的回信的情况下，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

“必须指出，在坦克问题上，我们迄今为止对坦克的设计都过于保守了，要求所有的坦克都是军事专用……对于行驶在第二和第三梯队的坦克，可以对它的高速度和大体积放低要求……而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坦克也可以是装甲拖拉机……”（引自：米纳科夫С.，《20世纪20—30年代的军事精英》，莫斯科，2004年，第382、383页）

图哈切夫斯基强调，他并不想增加开支用于新的军工厂的建设，正相反，是为了节约和以民用工业为基础。

在与沙波什尼科夫的这场争论中，图哈切夫斯基是正确的，但这是到了后来才弄清楚（斯大林甚至给他捎去一封信，为自己过去咨文中的尖锐粗暴而道歉）。



1930年8月18日,在调查“春天”案件的过程中,图哈切夫斯基的老同事、前上校H.卡库林遭到逮捕。他“承认”自己倾向于“右倾”,并且指望图哈切夫斯基“借助右倾势力掌握权力,实现军事独裁”。

如果这些都是真话,那么图哈切夫斯基剩下的时日就屈指可数了。

其实,我们为了突出描写这一事件,又一次超前了,放过一件事——党的十六大。现在离战争爆发还有10年时间。

斯大林提出要达到最高的建设速度。

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此事对于他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他也有东西要向党提出来。

他从一个有利的角度开始了报告,首先拿陷入了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的情况与苏联的工业增长作了比较。

然后,他谈了国际形势和战争威胁。法国被他称为“最富侵略性和军国主义的国家”,让人们明白有受到西方国家侵略的可能。他同样提及了和平合作的话题。

从他的讲话中,不可能不得出苏联对国际形势深感不安的结论。

至于国内形势,斯大林列举了一系列经济增长的数据:农业经济达到了战前水平的113%—114%,工业的增长则是180%，“3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5%，是真正创纪录的”。

他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按他的意见,五年计划可以在2.5至3年内完成。当然,在列举西方国家和苏联电能和生铁的具体生产数据时,他指出了其中的巨大差距,并强调“我们太落后了”。

报告中所列集体化形势一片大好,超额完成了集体农庄建设计划的1.5倍。而对问题却只字未提。

事实上,问题是被间接提出来的:

“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在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的幼稚公式中寻找出路。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发展的。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是我们打垮、压倒他们剥削者,还是他们打垮、压倒我们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镇压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但它是辅助的,不是主要的……

“任何一次进攻,即使是最顺利的进攻,也不免在战线的个别地段出现一些缺口和失常。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说进攻终止了或进攻失败了,那就是不懂进攻的实质。”(斯大林H.，《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5、309、310页)

不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热情讴歌,是谈普通人的成长条件、接受教育,谈把劳动变为“高尚的、光荣的、忘我的和英雄的事业”。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线已经开始直达运行(1930年5月);列宁格勒“电力”工厂里新的涡轮发

电机组开始发电；生产石油工业用的无缝管道的工厂在马里乌波尔提前投产，使国家不用再进口该产品；6月14日（比预定期限提前1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农业机器制造厂建成；6月17日（比预定期限提前5.5个月），斯大林格勒Ф.Э.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厂投产。

至1930年夏，社会主义竞赛已扩展至200万人，而在突击队工作的人数有近100万。共青团组织开展了提高劳动效率的运动，组建了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队，提出了各种响应（扩大了）计划，组织突击队的观摩活动。社会主义竞赛的形式之一是公社，在公社里大家都拿相同的工资，和每个人的职业技能无关。

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是现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政权中最稳固的政权。”

他号召大家用4年时间来完成五年计划，并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

第一，在东部建立第二个煤炭冶金基地，并于此框架内在乌拉尔和库兹巴斯建造冶金联合厂。对库兹巴斯的开发已经开始，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起了拖拉机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起了机器制造厂，在下诺夫哥罗德建起了汽车制造厂，在新西伯利亚和萨拉托夫建起了联合收割机厂等等。（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与乌共中央关于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经济区作为苏联唯一工业基地的发展问题，正是这一决议的实施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创立大型农业企业。

第三，解决干部问题。

第四，与官僚主义作斗争。

第五，系统性地提高劳动效率。

第六，解决供应问题。（“粮食供应可以认为已经有保障了，但肉类、奶制品和蔬菜的供应仍较困难。”）

第七，对整个信贷业务的整顿（实行财政国有化）。

第八，建立“可观的”储备。

斯大林宣布了党的总路线：展开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实现全盘集体化。

然后他谈到了托洛茨基和“左倾”问题。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个思想：现在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竭力将我们党的事业通报给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和反苏维埃的反革命集团”。这意味着隐晦地指控他们在从事间谍活动。他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仍未从党内清除掉”。

关于“右倾”，斯大林说得要稍稍缓和一点，强调他们已经承认了在俄罗斯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已不是“反革命分子”，但他们却否定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陷入了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

听到这番话，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许还没有感到特别的不安，斯大林没



有拿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完全同等看待。但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虽有悔过，在思想上却未被击溃。而正是这一情况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危险，这不仅威胁到他们自身，同样也威胁着斯大林(在“结束语”中斯大林重又提到了他们)。

在报告的末尾，斯大林谈了很多有关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问题，这里他谈得有些枯燥乏味。这一段里新的东西很少。

当然，应该考虑到几乎所有的民族边疆区都存在着对集体化突击运动的普遍反抗。所以，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党的宣传员理应明白这层寓意。

今天，在俄罗斯创建社会主义的第一代建设者早已长眠地下之时，当我们读到这份至关重要的报告时，仍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炽热：基层杰出人士爆发出来的热情、突击手们的光荣和幸福、被消灭和被推翻的人们的痛苦，以及时间齿轮吞噬过去的咯吱咯吱声。

未来，斯大林还要参加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但这一次是最重要的。

当然，他远没有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阐述，甚至连暗示和隐喻也没有。比如：苏维埃政权绝不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他预感到战争正在逼近，以及为在境外开展行动准备军事人才而于1929年开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开设专门的培训班(1929年至1935年在6个语言班里培养了541人)。

即使关于自己的对手，斯大林也不可能讲得面面俱到，而巴赫梅季耶夫大使却完全公正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没把他们称为对手，而是称为后继者，不过事情的本质并未改变。他们是“在斯大林集团被推翻后将掌握政权的富农、耐普曼和专家”(《绝对私密和可信——B.巴赫梅季耶夫与B.马克拉科夫的书信集》，第3卷，第434页)。

要知道这位临时政府的大使说得可是对的！

富农开始被清除，耐普曼受到税收、被剥夺选举权(和“购货本”，即购买食品的证件)的压制，专家们暂时还用得着(但对他们充满了保留和顾虑)。

补充一点，在1929年时，全国还有其他一些专家：有约几千名美国工程师在从第聂伯河水电站和顿巴斯到下诺夫哥罗德和库兹巴斯区域，从事着工业企业的建设。

此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是斯大林连任了所有职务，而托姆斯基却被开除出了政治局。“右派”里只有李可夫仍留在最高领导层，但感觉也呆不长了。

成为领袖并提出了宏伟计划的斯大林，此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的艰难。在他的军队中缺乏需要的干部，他的士兵也不合要求并未受训练，他的计划也与实际的资源不符。

围绕着工业化计划，还存在着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为首的“红色职业革命家”和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员专家之间的矛盾。

国家计划委员会所遵循的方法是注重所有经济部门之间的综合性和相互关系的原则，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注重有力的市场，依靠市场挣脱经济现实中牢不可破的枷锁。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和解释斯大林对待“右派”的容忍了，让他们和从前一样继续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而布哈林也仍是他的邻居），而且对待旧体制专家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克制和宽容的，要知道这些专家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右派。

十六大之后，斯大林的任务是与“右派”的现实存在和全新的实际问题作斗争。这是一场没能取得战略胜利的斗争，尽管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胜利和成就。每建成一座工厂、每采出一吨石油、每造好一栋住宅、每多一位工人成为技术员或工程师，在苏维埃社会都会发生一些不易觉察，却在慢慢积累起来的变化：新的政治阶层成长起来，形成了一些集团和宗派，在他们的理念中，为社会主义无私奉献并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今后的活动就是要与这些经常能够逃脱镇压的内部敌人进行不间断的斗争。

其实，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中盛行着反对个人利己主义的强烈的国家意志。这种精神表现为国家主义，从莫斯科、罗马、柏林到华盛顿，这种精神以各种形式纷纷显现。

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却是以最混乱的方式开始实施的。涌出农村的农民（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为了逃避集体化）成为建筑工地上的主要劳动力，仿佛来自彼得时代前罗斯的大胡子一样，一下子聚集到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企业中（按计划将新建1200座工厂）。然而工程任务和施工人员之间的不协调是显而易见的。同彼得大帝一样，斯大林面临的是要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自己的知识分子。

十六大上，古比雪夫宣布每年都需要大力增加投资额，每年也需要将产量提高30%。规划变成了各部门、工厂、生产队、突击手之间火热的竞赛，人们都是真诚的，英雄气概也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上百项工程到了年底都停顿了下来，因为资金不能满足所有工程的需要。“到1930年底，投入到工业上的40%的资金被冻结在未完成的工程项目中了。”（韦尔特H.，《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莫斯科，1995年，第217页）

随之，对计划行政干预的规模变得更大了，目的是缓解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一方面在经济领域产生了权力集团和宗派团体，另一方面使指令性的计划和管理成为苏联经济的主要特征。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到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计划。在1929年12月底，苏联虽然费了劲，但还是向欧洲卖出了2500万吨粮食，并用卖粮的资金购进了8500台英国“维克斯”公司生产的拖拉机。一台拖拉机值多少公斤的粮食是可以算出来的，但谁也不知道，为这一台拖拉机俄罗斯农民付出了多少血汗。在接下来的1930年，西方市场整体萎缩。但此时急需向美国“凯特皮勒”公司支付350万美元，用于为车里



雅宾斯克和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厂,以及罗斯托夫和萨拉托夫的联合收割机厂购买设备。仅在 5 年时间里,苏联就应向美国公司支付 17.5 亿金卢布(3.5 亿美元),还要加上 7% 的贷款年息。国家要支付这么一笔庞大的金额才能得到这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拖拉机厂、联合收割机厂、炼油厂、钻井装置和管道、汽车厂,以及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库兹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三个冶金联合厂都需要的机器和设备。

这还远不是苏联必须从西方获取的东西的全部。还需要购买别列兹尼基冶金联合厂、莫斯科市和乌拉尔地区的轴承厂所需的设备,以及铁轨、橡胶等。

大部分苏联居民对于冲击一切的经济危机感觉并不明显,他们只能从报纸上的简讯中看到一点有关危机的报道,但这场危机已经使实施五年计划感到非常吃力了,且给斯大林集团设置了又一难题。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工作不力,拨款系统充斥着马尼洛夫习气的现象越发明显: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然后由对外贸易委员部去寻找外汇的来源,由此产生了资金分散的情况和一种“贷款无度”的总体感觉。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无限度贷款的情况,存在的是完全现实的即将来临的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有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办法都使用上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 1930 年两次(3 月 30 日和 5 月 10 日)接到政治局的任务,分别要求从居民手中没收 250 万和 200 万卢布的外汇,而且只给了非常短的期限来完成任务——2 天和 10 天(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中就有对契卡人员完成这一任务的讽刺描写)。这只能表明一件事:国家的领导人正处于无望的困境之中。

为了拯救工业化,国家甚至允许出卖由俄国沙皇、达官显贵和企业主收集起来的珍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最好的博物馆里的艺术瑰宝。波提切利、委拉斯开兹、拉斐尔、伦勃朗、鲁本斯、提香、提也波洛、佩鲁吉诺、普桑、凡埃克、凡戴克、鲍茨和其他艺术家的绘画共 1450 件,另外还有首饰、家具、地毯、壁毯、青铜器、餐具、钱币和成套的武器收藏品等都被相继出售。因为危机中西方的支付能力不高,所以卖出这些珍品仅得到 1250 万美元,远远低于预期。

这场对文化遗产的没收行动表面上与 1922 年抄走教会珍宝的那场运动较为相似,但这一次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背景的。只不过牺牲品的总数上又增加了一倍,虽不多却在一定程度上稍稍缓和了国内的局势。

同样,与狂热的收藏家、石油工业家 K. 久利别基扬的成功签约也起到了帮助作用,久利别基扬以自己“乔尔基什石油”公司“为掩护”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苏联的石油和石油产品。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德特丁发动的针对巴库石油的那场战争还余波未尽,而最主要的是此时的石油市场已经饱和。

除此之外,在伊拉克的油田和美国的东得克萨斯州也钻出了新的油井。在美国、

苏联和罗马尼亚，石油开采量不断攀升。新的价格战再次打响，石油不再是“金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久利别基扬的协助是对苏联财政预算的一种挽救。

（顺便提一下，这时一位印度国家官员哈里·菲尔比正在沙特阿拉伯工作，他与伊本·沙特国王交好，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就是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苏联间谍金·菲尔比的父亲。）

总之，在1930年，斯大林不得不缩减他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把经济转入另一种管理机制。

当斯大林明白任用工人干部们也出现了失败时，马上来了个大转弯，并做出指示：加强企业的劳动纪律；取消公社的平均主义；食品、纺织品和住房优先提供给突击手，其他人都放到第二位；禁止提升一线工人到“任何机关”。关于这些，他在1930年9月28日已写信告诉了莫洛托夫，而同年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就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向国民经济提供劳动力和与劳动力流动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

在各级党委、契卡人员和先进分子的帮助下，这种对经济的“手动”使已经出现的危机得以缓和，但也进一步加深了“新”、“旧”俄罗斯之间的隔阂，并逐渐导致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步入国有化。

不过在1930年，青年人的提升、工农速成中学的增加（从1928年至1932年，这些教学机构的名额从5万增长到28.5万）、把党员工人调进领导层或送去培训（这样的人有66万），所有这些措施保证了干部储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干部已达100万人。他们与青年学生一起成为新的知识分子，“斯大林的”知识分子。他们替代了已被客观规律逐渐挤到历史边缘的旧体制专家和老一辈革命者。

从1930年起，全国开始了民族大迁移。社会阶层的电梯向上急升。昨天还生活在永恒感中的农民，今天就必须掌握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的所有基本的一切，并要服从工业竞赛的残酷法则以求生存。他们仍然是K. П. 波别多诺斯采夫曾说的那种维持时期工业竞赛中的“半个人物”，不管如何要求，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快速地去适应纪律、技术标准和社会需要。

在这些过去的庄稼汉里，无赖行为、无政府状态、工伤、生产出次品、旷工和干部忙于鸡毛蒜皮等等现象在增长。作为社会地位转型的后果，1928年至1930年间的劳动效率下降了28%。

这些状况很快就迫使斯大林重新审视自己只能用思想意识去影响工业化新兵的观点。

直到这时，所有的工人领到的工资，就像同一个公社的成员一样是均等的，这就产生了坐享其成的依赖思想，并妨碍了社会主义竞赛的开展。

第三十九章 需要一部俄国史

俄国的历史是用得上的、图哈切夫斯基案、瑟尔佐夫案、“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

看来，对于所出现的“刁民”问题，设想过几种解决方案。

今天很难想象那时的国家文化政策究竟是怎样一个总路线。消除传统的俄罗斯文化，这就是该路线的精神实质。按照“权威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副教育人民委员 M. П. 波克罗夫斯基的说法，甚至连“俄罗斯历史”这一专有名词本身也是沙文主义和“反革命”的术语。

事实上，国家过去的一切都被视为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格格不入的。但在这种政策中却潜藏着新制度的不可改变的弱点，即它的稳固必须要依靠按其本质是所谓“反革命的”人民群众。

从所有的文化裂缝中都流露出了这一矛盾。1929年，青年诗人杰克·阿尔陶津（1942年在战争中牺牲）写下一首诗，其中有几行是这样的：

我建议
融化掉米宁，
还有那波扎尔斯基。
为什么要给他们树碑立像？

对这两个开店铺的人，
我们说点好话
也就够了——
十月革命爆发时
他们是躲在柜台后面的。

我们没有扭断他们的脖子，
算是他们走运。
我知道，这本该如此。
你认为，
是他们拯救了俄国！
也许，不救会更好？

可以说，那时整个俄国被视为“一堆废铁”，而以此一观点为根据制定的政策使斯大林集团处于困难的境地：这个集团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持。

这种矛盾已经公开地表露出来了：1930年10月，斯大林对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杰米扬·别德内的讽刺短诗《从热炕上下来吧》予以猛烈抨击，这就间接地敲打了称赞这一讽刺短诗的莫洛托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Ⅱ. 别德内是广受赞誉的布尔什维克诗人，革命前就是《真理报》的撰稿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代表。而斯大林对他的抨击，犹如晴天霹雳。这篇讽刺短诗被斯大林评价为“是对我们人民的诬蔑”。

12月6日，公布了一份中央委员会决议，其中说道：“这种不加以分辨地给他们（人民）贴上‘懒汉’、‘爱呆在热炕上的人’标签的尝试，不可能不带有粗糙的矫揉造作的气息。”

Ⅲ. 别德内向斯大林做了解释，但受到了斯大林不留余地的驳斥。斯大林说：“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俄国工人心里产生了（也不可能不产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政权和文艺界知识分子》，莫斯科，2002年，第136页）

从这一刻起已经清楚，斯大林想依靠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他还需要依靠整个俄国的历史。如果回忆一下他与列宁关于“民族自治权”的争论，那么与杰米扬·别德内的这段小插曲就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了。

更早一点，在1930年1月，斯大林废止了由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将俄语文字转为拉丁字母的方案（该委员会认为基里尔字母是“18至19世纪有着阶级性的书写法的残余”）。



接着这个话题,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30年3月,作家布尔加科夫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允许他出境或是给他提供工作的请求,因为“此时他一贫如洗、无家可归、濒于死亡”。4月底,就布尔加科夫的请求,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决定,责成莫洛托夫“指令”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司司长Ф.Я.科恩予以解决。突然,斯大林亲自给这位作家打去了电话,看来,他没有指望权力机关能解决问题。他建议布尔加科夫向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提交一份工作申请,并表达了想亲自与作者会晤的愿望。很快,这位作家就成了先前不愿接收他的艺术剧院的导演助理。至于两人的会晤,则未能举行。也许,斯大林关于会晤的话不是说给这位《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作者听的,而是说给自己的机关听的,让他们不要把布尔加科夫交给狂热的“无产阶级评论家”去处理。

总体上说,与这两位作家的故事表明,斯大林心中始终保留着回归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的想法,而且随着战争的迫近这种想法日益清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思想宝库里,彼得大帝、列宁、共产国际实现“世界革命”的思想,以及对经典文化的热衷都能够和睦共处。当需要的时候,他会从中拿出有用的东西来驳斥反对者。

十六大之后,有很多事情要斯大林去操心,其中粮食问题最为突出(国家要从集体农庄获得粮食来保证有利可图的粮食出口),同时还有安全问题。也许,他在担心军人们会谋反?不像是这样。如果他有此担忧,他就不会在代表大会之后前往高加索,而把事情留给莫洛托夫处理。

来自法国和波兰的战争威胁让斯大林不得安宁,关于这一点他甚至给高尔基写过信,而后者不无戏谑地回答说,一方面武装干涉似乎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到底还是不能相信这会成为现实”。但生活在卡普里岛并接受苏联资助的高尔基,其实是在与斯大林玩游戏(他甚至在领袖的要求下着手创作关于破坏分子的话剧)。

不过,斯大林有着比高尔基更有权威的信息来源。

应当注意,1930年8月18日,图哈切夫斯基的战友和密友、参加苏波战争和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的西方面军前参谋长卡库林被捕。初步调查结果是,卡库林的情人、吉卜赛美女梅利霍娃-莫罗佐娃与西方情报部门有联系,她经常举办一些有许多军人参加的晚会。接受审讯时,卡库林承认,他“理论上是同情右倾的”。(“我那时明白,当右倾取得胜利时,苏联存在的某些形式会发生变形,随之,专政制度在整体上保留其基本方针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变形。”——引自:米纳科夫С.,《20世纪20—30年代的军事精英》,第395页)

尽管在审讯的过程中排除了他与国外间谍有接触的嫌疑,但卡库林后来的供词却揭露出了一幅颇为令人不安的景象。他供认,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讨论政治局势时谈到了发生军事政变和建立军事独裁的可能性,而对于国家领袖则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前景:挑动右倾分子的狂热之手是不会停下来的,直至对

斯大林同志本人进行谋杀。”

在获得了这一供词之后，侦查人员就开始寻找图哈切夫斯基的罪证，而卡库林则发表了如下声明：“现在，当我有时间深入思考所有这些已发生的事件时，我并不排除下述情况：图哈切夫斯基在预言狂热分子有可能向斯大林开枪射击时，他就是在掩盖他本人事实上在谋划的这一未来行动。”（引自：米纳科夫 C.，《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军事精英》，第 396、397 页）

9 月 10 日，明仁斯基写信向斯大林报告说：“我向莫洛托夫同志报告了这一案件，请求准予以间谍案件逮捕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并获得您支持这一请求的指示。要逐个逮捕这个集团的成员是有危险的。可以有两个办法：要么立即逮捕最狂热的集团成员，要么暂时采取内控措施等您回来，以免我们措手不及。我认为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所有这些反叛集团发展非常迅速，所以以后一个决定是有某种风险的。”（引自：米纳科夫 C.，《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军事精英》，第 399 页）

斯大林没有立即做出反应，这证明他对此没有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迹象。

9 月 24 日，在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斯大林说出了自己对此事的想法：

尽快读一读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口供吧，并想一想消除这种丑陋事件的措施。你看到的这些材料是高度机密的：知道此事的有莫洛托夫、我，现在知道的还有你。我不知道，克利姆是否清楚这件事。可见，图哈切夫斯基原来做了反苏联分子的俘虏，并被右倾分子队伍中的反苏联分子彻底说服。这是根据材料得出来的结论。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既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那当然就是有可能的。看来，只要能摆脱中央委员会、摆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工业发展速度，右倾分子甚至准备搞军事独裁。你可以看见，奥尔洛夫与斯米尔诺夫的供词（关于查封政治局）和卡库林与特罗伊茨基的供词（关于托洛茨基的计划和“构想”）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右倾分子的阵营。这些先生明显是想让军人投靠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苏哈诺夫一伙。康德拉季耶夫-苏哈诺夫-布哈林的党派，这就是平衡。就是这么回事……

用通常的程序（立即逮捕等）了结此事是不行了了。需要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最好是暂缓对明仁斯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做出决定，推迟到 10 月中旬，当我们大家都集中到一起的时候。

你到了莫斯科，就和莫洛托夫谈谈这件事。（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369 页）

任何一个处在斯大林的位置上的分析者都会从获得的材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党的领导层中的“右倾分子”与“右倾的”经济学家们(已被捕)已经结成联盟,并在准备军事密谋。

让我们关注一下斯大林 1930 年 9 月 1 日写给莫洛托夫的那封信。信中他写道,“波兰人无疑会组织”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联盟,目的在于向苏联开战,他建议扩编军队 40—50 个师,还建议最大限度地提高伏特加酒的产量以获得补充的资金。

这里的重点当然不是伏特加酒,因为 1929 年至 1932 年期间货币发行量增加了 4 倍,同时酒精饮料的赋税和生产均有提高,重点在于武装入侵的实际威胁与内部敌人的威胁交织在一起。这成了斯大林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给莫洛托夫的其他信件中,斯大林催促他:要保障粮食的采购和出口,“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新的冶金和机器制造厂了(汽车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等)”。

从 1930 年 8 月到 10 月这一阶段的信件中可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焦虑,而他对现实的洞察又是多么深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信息都汇总到了他这里。他关注着一切。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领导人,甚至是英明的领袖,哪里是他能力的极限呢?要知道,他也是难免一死的普通人。没有组织有序的机关和精明强干的战友和他一起管理,他一个人是应付不了的。

从这些信的风格可以看出,斯大林明白,他比他们在工作能力、责任意识和对细节的洞察力上要略胜一筹(他甚至指出了,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冲击式的还是旋转式的方法在西乌拉尔山脉地区打油井,以及何处可以为乌拉尔矿山弄到铁轨)。

对,这就是“主人”,人们也开始在背后这样称呼他,而他却生气地表示反对。由他独揽国家控制体系并非总是富有成效的,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性。

斯大林对被捕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格罗曼、苏哈诺夫的供词做出的反应,就很可能说明问题:“我认为,对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萨德林一案侦查需要有根有据、不急不忙地进行。这个案件非常重要,关于此案的所有文件都需要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我不怀疑,这些先生(通过索柯里尼柯夫和特奥多罗维奇)与右倾分子(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之间的直接联系将被揭露出来。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和另外两个坏蛋一定要枪毙。”(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341、342 页)

他毫不怀疑存在着这么一个密谋(“直接联系”),并考虑对他们的判决。但很快就清楚了,这种联系并不存在。这些可怜的“坏蛋”并未被枪毙。

翻阅当时的这些文件,你能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异乎寻常,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荒诞不经。

世界各地的资源争夺日益尖锐。一些像德国那样原本已失去地位的国家突然实力大增,而另一些如英国这样昨天还是令人生畏的大国却在逐渐衰败,还有一些像美

国这样的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而日本、中国、波兰、意大利等，所有这些国家正在准备进行新一轮的冒险行动。在他们之中就有俄罗斯，这个昨天还只能勉强支撑的国家，今天却在红色苏维埃的大旗下迅猛地发展起来，而在其内部发生的这些事件，就像罗马重步兵与蛮夷的一场残酷会战。

莫斯科曾经充当过第三罗马。而现在它在世界性危机的背景下又成了“红色罗马”。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此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出炉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300万起来反抗的农民在1930年有可能获得一位领袖。斯大林已做好了“将这位军事长官关进驳船”的准备，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1930年10月8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任命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C. M. 基洛夫为列宁格勒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样一来，图哈切夫斯基身边就有监管人了。与此同时，在军事刊物上出现了一系列批评图哈切夫斯基的极其尖锐的文章。并且，斯大林为了应对军方发生意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他通知莫斯科说10月底返回，虽然他已安排月中就回首都。

不过这一预防措施其实是不必要的。10月14日，斯大林在返回后立时会见了明仁斯基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处处长K. 奥里斯基。两人向他介绍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反国家阴谋的新的供词。斯大林希望详细地把情况弄清楚，所以奥里斯基也被找来了。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信任明仁斯基，而是体现了斯大林的工作方式。

奥里斯基并不支持明仁斯基关于逮捕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他对那些被捕者供词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

结果做出决定，在10月22日至26日，即原定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过去一年的战争准备进行总结的全会期间，安排一次被逮捕者与被怀疑者的对质。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三人参加了对质会。

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确认了自己的供词，而图哈切夫斯基则对他们进行了反驳。

为了能够做出一个确切的决定，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找了几位熟识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长官И. 杜博沃伊、И. 亚基尔和Я. 加马尔尼克了解情况，而他们消除了斯大林的所有怀疑。10月23日，他写信给莫洛托夫说：“至于图哈切夫斯基，他其实是百分之百纯洁的。这非常好。”

不过，针对军官的逮捕行动仍在继续。10月25日，22位前谢苗诺夫近卫军团的军官在列宁格勒遭到逮捕（图哈切夫斯基也曾在这个军团任职）。

与“图哈切夫斯基案”同时，斯大林还受到“瑟尔佐夫案”的困扰。1930年10月



21日,《真理报》的编辑B.列兹尼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对工业化感到失望的37岁的C.И.瑟尔佐夫组织了一个反对派集团,企图恢复新经济政策、创立农民党并罢免斯大林。该集团计划由布柳赫尔出任陆海军人民委员。

11月5日至12月7日,对“工业党”案件进行了审判,牵涉该案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被指控与侨民有联系,并为有侨民参与的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侦查证据在很多方面是捏造的,但一些事实和这一倾向本身是合乎实际的。

然而,图哈切夫斯基不顾既定大局,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12月30日,他给斯大林发去一封措辞大胆的信,指责了工农红军的参谋长。以下就是信中的一段: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您的信件,这封信中的措词完全排除了让我把一系列问题提交大会进行广泛讨论的可能性,而这些问题涉及我国国防力量发展中的问题,例如,我作为战略学的导师被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除名,而我在那里主持这门课程有6年时间了。同时,我仍像从前一样坚定地确认,工农红军参谋部毫无原则地歪曲了我报告中的建议……”

“总之,我在这些问题上的处境现在极为尴尬……”(引自:米纳科夫C.,《20世纪20—30年代的军事精英》,第404、405页)

这位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的固执迫使斯大林重新审视他的建议。很快,1931年1月9日,他接见了图哈切夫斯基,并总体上对他的计划表示了支持。这位军事长官被列入了为实现他的建议而成立的坦克制造委员会。而沙波什尼科夫则离开了工农红军参谋长的职位。(1931年的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工农红军装备部部长。)

军队中的这些人事调整说明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重大改变。看来,他已经明白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其中说道: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呀,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这些先生们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

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8、39页)

不管他是预见到了或是猜到了,但距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正好还有10年。

政府中同样出现了人事变动:古比雪夫替代奥尔忠尼启则出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并成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奥尔忠尼启则领导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莫洛托夫替代李可夫担任政府主席,李可夫被任命为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正如斯大林就莫洛托夫即将被任命一事写信给他时说的:“这将会从总体上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因为党和苏维埃是交织在一起、彼此不可分割的。”

现在,斯大林终于组建好了权力的体制。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都服从于一种思想、一个号令。这时的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和奥尔忠尼启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是 A. A. 安德烈耶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为 H. M. 什维尔尼克。

但斯大林最主要的支柱还是在地方党委、州委和区委,它们已经成为苏维埃政权的骨架和神经。斯大林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完善自己的这一创造,希望给它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消除(记起了他的话“用外科手术来切除”)不断出现的各个宗派团体。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此时领导核心的组成已经得到确定。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卡冈诺维奇。对于包括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米高扬在内的自己班子的其他成员,斯大林会经常批评他们的官本位主义和自命不凡的官僚习气。有意思的是,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一封信中(1931年8月14日),斯大林这样谈论了米高扬:“从现在起再也没有任何欺骗的机会了。”

即使是对忠诚的莫洛托夫,他也有所不满。这与莫洛托夫妻子波林娜·热姆丘



任娜的行为有关。热姆丘任娜曾指责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认为她似乎对斯大林照顾不周。

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1930年9月24日),斯大林写道:“因关心我的问题而对你有所埋怨的,只可能是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这样的人还是有的,莫洛托夫夫妇就在其中。”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同样有点负面地评价了热姆丘任娜:“她举止傲慢,仿佛是‘国家的第一夫人’(在斯大林妻子去世后就成了这样);远离俭朴,在当时应算穿戴奢华。教育女儿也是按贵族的那一套。”(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第299页)

总而言之,无须对当权者们的紧密团结抱有幻想。这是一群文化和教育背景各不相同的人。是斯大林的意志,更是无路可退并需要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刺的局势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当局势发生变化时,这支队伍里的相互关系也将发生变化。

很可能,正是在这几年,斯大林产生了拓展苏维埃政权和自己个人权力基础的想法。他就高加索局势写给卡冈诺维奇(1931年8月26日)的信中讲的“几乎所有人都在撒谎和耍滑头”这句话,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斯大林明白,他在干部问题上远未得心应手。

他所考虑的一切是宏伟的。他需要改组党,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提拔一批新的苏维埃的将军和教育新一代青年。他必须开始整个民族的更新换代,并且必须立即开始!

当然,这不可能很快完成,但他开始做了。

1931年至1940年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所有的巨大成就和对各阶层居民的镇压,都与实现斯大林社会改造的计划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文献中,在任何地方,我们找不到证明这一计划存在的提示,但对主要历史事件的复原使我们可以认为,在领袖的脑海中,这样的—个革新战略无疑是存在的。

总体上这一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它不仅涉及生产和政治上的更换,如同彼得大帝时期进行的那样,还牵涉到人类生活最传统的根基。

相应地,随着困难的增加,斯大林集团的内部也出现了更多矛盾。在瑟尔佐夫一案的调查中就显露出了这种严重的矛盾。瑟尔佐夫的同伙、中央委员会外高加索局书记维萨里昂·洛米纳泽与奥尔忠尼启则关系十分密切。洛米纳泽简直就是自己这位老朋友的影子,和他一样暴躁、直爽、粗鲁和容易轻信。他和瑟尔佐夫都能够被列入正在谨慎应对国内社会状况恶化的党内精英的第二梯队。

洛米纳泽在与瑟尔佐夫对质时承认,斯大林“有些经验主义,预见能力不足”,“对于有时候(特别是在庆祝50寿辰的那些日子)在报刊上和—些演讲中几乎将斯大林同志与列宁相提并论的现象,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

奥尔忠尼启则听说后感到很难堪,要求采取党内最严厉的处罚措施,将洛米纳泽

开除出党。但斯大林却做出轻得多的决定：把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派到经济部门工作。这一决定说明，斯大林集团内的矛盾还未尖锐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具有代表性的是，甚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得到了原谅，在党内得以再生。

从1929年起，加米涅夫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下的总租让委员会主席，而季诺维也夫任喀山大学校长，然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会委员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会委员。他们的殉难还在此后。

但洛米纳泽这位分量不重的人物的事件倒是提醒了斯大林，甚至他身边最亲密的战友中也充斥着不可靠的人。而此后奥尔忠尼启则为洛米纳泽说情更加深了领袖的这一猜疑。

有意思的是，这时斯大林的信件中开始出现对Л. 贝利亚的评语，而且他得到了斯大林最高的评价：他不撒谎。

(1931年3月，32岁的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高加索全权代表，10月，他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同时也是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而从1932年10月起，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虽然贝利亚传统上被描述成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和阴谋家，但他无非是一个过于理性和强硬并瞄着升官的人(这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Ф. Д. 博布科夫对贝利亚的评价)。

所以，自认为已经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的奥尔忠尼启则开始让领袖感到失望就不奇怪了。1931年8月17日，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总书记对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还有他的一举一动，给人造成一种沉重的感觉，似乎他在逃避工作。另一方面，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表现也越来越差。后者看来并不清楚，他的行为(激烈反对莫洛托夫同志、古比雪夫同志)客观上造成了对正与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作历史性斗争的我们领导集体的削弱，使之有被破坏的危险。难道他还不明白，在这条路上他得不到我们这方面的任何支持？简直是荒谬绝伦！”(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389页)

这些字里行间表露出斯大林选择干部时的优先考虑：他的队伍的团结一致是最重要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是每一个组织的法则，这个法则把组织的完整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将处罚所有企图违背它的人。

至于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他们向新任政府主席(和向斯大林)施压的企图落空了。

改组政府后，斯大林集团大大降低了原来定高了的五年计划指标。还有一点也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废除了过去的拨款程序：不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签订合同



了,而是先由对外贸易委员部去找钱,然后由政治局确定资金的来源和建设的规模。

斯大林在批驳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个总局争夺外汇和大量购买苏联可以生产的东西的企图时,简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指示卡冈诺维奇(1931年8月21日)“最大限度地削减各人民委员部对美国的付款和订购,不管他们怎么咒骂和歇斯底里大发作。您可以看到,到时各人民委员部是能够找到渠道,用向欧洲订货和我们国内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394页)

他指出,奥尔忠尼启则领导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唯利是图”。

1931年4月,顺利完成了与德国的艰难谈判,达成了一笔3亿马克的优惠贷款,而且它比美国人开出来的条件更有利。所以斯大林严厉斥责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官僚机关,指责他们不去转向寻求更有利的德国订单。

“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努力都是旨在将我们的外汇储备抢劫一空,并彻底损害我们的外汇状况,而美利坚合众国是当今金融界的主要力量,也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本应催促自己的机关干部并迫使他们炼出更多的铁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却在压榨国家的现款(即压榨国家和工人阶级),迫使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无能、保守和官僚主义买单……决不能姑息任何为了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安逸而企图挥霍工人阶级外汇储备的人(和单位)。”

但当斯大林从卡冈诺维奇那里得知德国公司企图向苏联提供劣质设备时,他对德国也没有客气。他下令取消部分订单,让对方有所感觉。他也曾这样对付过意大利企业家们。

斯大林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可以想象,官员们是怎么想他的。他们肯定是怕他的。但同时他们又通过组建自己的小集团、在报告中弄虚作假和恣意妄为来构建保护自己的多棱碉堡。

1931年8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轻蔑地拒绝了波兰大使帕杰克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这遭到了斯大林的驳斥,他认为尽管存在着“总体上反波兰主义的庸俗之风”,但与波兰的条约却能保障未来两至三年的和平。所以,他要求重新回到这个议题上,并“用所有可行的方法使之得以完成”。(1932年7月25日,苏波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更早一些时候,1931年8月10日苏联与法国也签订了条约,这些间接地说明德国强盛起来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央机关所形成的状况迫使斯大林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明仁斯基此时已身患重病,1929年他得了心肌梗塞。Г. Г. 亚戈达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并且明仁斯基也支持他出任此职。但副主席 С. А. 梅辛格、秘密行动局局长 Е. Г. 叶夫多基莫夫、行政组织局局长 И. А. 沃龙佐夫、驻莫斯科州全权代表 Л. А. 别利斯基等其他该总局的领导很少有人对这种安排是感到满意的。

亚戈达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被认为是由斯大林提拔到卢比扬卡来的叶夫多基莫夫，他不久前经办了“沙赫特”案、“工业党”案和“孟什维克联盟局”案。

梅辛格和别利斯基也支持叶夫多基莫夫。他们不乐意看到残忍的亚戈达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

斯大林清除了这一严重影响契卡人员工作的对立状况。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梅辛格、别利斯基、沃龙佐夫被撤职。叶夫多基莫夫调任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中亚全权代表，特别处处长 Я. К. 奥里斯基也被开除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亚戈达则被降了一级，成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同时，向卢比扬卡安插了‘党的空降兵’，原苏联副工农监察人民委员 И. А. 阿库洛夫(他成了明仁斯基的第一副手)和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教导处处长 Д. А. 布拉托夫(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部处处长)。”(图姆什斯 М.，《全俄肃反委员会：宗派之争——不加粉饰的卢比扬卡》，莫斯科，2004年，第100页)

而斯大林的连襟列坚斯基被派去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克兰的代表，他的前任、刚刚破获了军人“密谋案”的巴利茨基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那些对总局方针的正确性表示过怀疑和在私下谈话中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是“夸大其词”的人也纷纷被免除了职务。

这些决定与斯大林对干部情况的总体评判是完全吻合的。契卡人员与党和政府的官员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时，斯大林应该没有忘记，布哈林在与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说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上层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不过精力充沛，但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在这时期登上莫斯科政治舞台的，他得到了卡冈诺维奇的引见。他们是在顿巴斯认识的，赫鲁晓夫在那里担任尤佐夫卡市(现在的顿涅茨克)彼得罗沃-马林斯基区委书记，在1923—1924年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中的一员。此时，竭力要摆脱托洛茨基主义并在悔悟认错的赫鲁晓夫结识了卡冈诺维奇(时任乌共中央总书记)，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成了指导员，然后当上了乌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基辅区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他被派到工业学院学习，但在与校方的座谈中被认定才疏学浅，未被录取。于是赫鲁晓夫又去找了卡冈诺维奇，并在他的过问下成为该学院一年级普通教育班的学生。И. 阿利卢耶娃也是进入这个班学习的。赫鲁晓夫表现非常积极。1930年5月30日《真理报》发表了他的一封揭发有隐蔽敌人潜伏在工业学院里的信。卡冈诺维奇读了这篇文章，加上有感于自己熟悉的干部严重不足，于是指示选举赫鲁晓夫为学院的党组织负责人。赫鲁晓夫学习不好，但他“为队伍的纯洁性”而进行的积极斗争弥补了这一点，他组织了对40名学员进行党性调查，其中许多人因此被开除出党和学院。从1930年1月起，赫鲁晓夫任莫斯科市鲍曼区党委书记。在这个职位上，赫鲁晓夫



继续着自己的“斗争”，并且似乎这也是卡冈诺维奇所期待的。他首先解散了氮气研究所和“莫斯科毛纺厂”的党组织，又猛烈抨击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党组织，这个出版社由于失职，出版过意识形态“有害”的书籍。1931年6月，赫鲁晓夫出任红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而在1932年1月，担任莫斯科市党委第二书记。他看上去是一个朴实和善良的人，经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深灰色西服和缎纹织布的立领衬衫，脚蹬一双靴子。但在这35岁仍如“浑金璞玉”的外表下，却掩藏着残酷无情和精于算计的个性。这一时期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智商极低、但水平极高的马屁精”。（多年之后，命运深深地嘲弄了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它借赫鲁晓夫之手把卡冈诺维奇开除出党，并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是赫鲁晓夫开始了对斯大林体制的摧毁。其实，若不是这些最亲密的战友的反对和自己的个人过失，斯大林是可以改造自己的体制的。）

对赫鲁晓夫的这一刻画表明，就连忠于领袖的卡冈诺维奇和难以操纵的奥尔忠尼启则这些人的身边，也存在具有严重缺陷的工作人员。但赫鲁晓夫的文化程度不高（例如，他直至去世前批写“阅”字时都是写成“Азнакомица”，而正确的写法应是“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只是他最不起眼的的一个缺点。不过，我们暂且让这位赫鲁晓夫去完成他的上级领导给他下达的所有指示吧，我们还得回到斯大林面临的问题上来。

还没有来得及修正对外经济事务，又出现了新的灾难：旱灾和歉收。乌共中央总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向卡冈诺维奇报告说：“收成的恶化已经席卷到了一系列产粮地区，如济诺维耶沃（即现在的基洛沃格勒——作者注）、克里沃罗格、赫尔松、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等地区，总产量的缺口将达到1.7亿普特。”（《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年—1936年）》，莫斯科，2001年，第41页）

卡冈诺维奇在将这些情况汇报给斯大林的时候，他还未能意识到灾害的巨大规模。一些地区已经请求降低粮食交售额，但他不准备这么做，以免发生“共振效应”。

几天后，卡冈诺维奇承认：“8月上半个月的粮食征购进度令人有些担心。”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肉类供应的危机，因为在农村到处都在屠宰牲畜，这是人们不愿将牛羊交给集体农庄所引起的。卡冈诺维奇写道：“肉类交售情况也极为糟糕。”

总体趋势是这样的：牛的总头数从1928年的7050万下降到了1933年的3840万头，猪从2600万下降到1200万头，绵羊和山羊数从1.467亿下降到5020万头。很快，居民肉类供应定额就被缩减了下来。

接下来就如同在滚雪球：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西西伯利亚，到处都在闹旱灾，地方领导人纷纷恳求缩减粮食征购计划。卡冈诺维奇也承认：“不做一些降低是不行的。”

斯大林同意了部分缩减计划，但旱情强过了他的意志。最终采购到的粮食只有地方领导人建议的那么多。这次是他输了。

但是斯大林明白粮食很快就会涨价,于是他提出降低商店里的粮食价格,并“立即开设”百货商店,来向登记由这些商店负责供应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投放商品(到1932年1月,已开设了83家百货商店)。

与此同时,在出现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之时,斯大林被一个与布哈林有关的小插曲激怒了:后者在索科利尼基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发了言,不避风险地承认,“我们对粮食问题和轻工业这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处理得太迟了”。布哈林是对的,但他的正确性也仅仅表现为确定了事实,而这些情况斯大林比他知道得更清楚。

触犯他的是这种无效的批评,要知道不管怎样早已没有退路了。现在他就和基督耶稣一样,没有面包,没有鱼,也没有奇迹去给所有挨饿的人。

但在其他领域却出现了一些奇迹:莫斯科红场上的伊韦尔小教堂(复活门)的拆除工作已经开始,这将为群众游行和举办阅兵开辟出宽广的道路;在“猎围”的商铺开始拆除,为修建“莫斯科宾馆”腾地方;而最重要的是开始了高层住宅楼施工,对地铁建设的控制系统开始运作。白石之城的首都莫斯科很快会面貌一新。

斯大林没有挑错人,他选择了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为自己的助手。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1931年6月,根据卡冈诺维奇《关于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改建》的报告,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破土动工(同时进行的还有用于保障内河运输线路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

这时,梁赞区、图拉区、卡卢加区、特维尔区被并入莫斯科州,而卡冈诺维奇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党委领导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其中包括莫斯科改建委员会也归他领导。

这个委员会否决了实际上是拆除城市的提案(清除历史形成的似乎是封建城池特有的圆轴环形街道系统),也不赞成让首都保持那种不可侵犯的“贵族商人”的风格。

正是卡冈诺维奇对众多的“莫斯科创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他与顿涅茨克矿工相识,并听取了他们的建议,最终选定了开凿地下深层地铁线的方案,而不是在“浅层”或是在地上。

当然,所有一切都须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按照卡冈诺维奇的回忆,从斯大林那儿他得到了“建议和指示,也有时是训斥”。

老莫斯科城和它的教堂、贵族的庄园和花园、苏哈列夫塔楼、红门和各个修道院注定难逃厄运。它们面对来势汹汹的工业化根本不可能保持原样。工业化给这些地区引进了成千上万的新市民,他们给城市的面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只有将从旱灾和互不侵犯条约到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修建地铁等等所有这一切联系起来,才能表现出1931年的时代特征。

1931年9月,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给斯大林写信说:“莫斯科的街道状况良好,



有些地方甚至已经非常好了。从特维尔大街看红场的景色特别美丽。教堂拆除缓慢,但教堂顶的‘辉煌’已经消失不见了。”(《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莫斯科,1993年,第36页)

这里说的是哪一座教堂呢?看来应该是藏有被视为古都保护神的伊韦尔圣母圣像的伊韦尔小教堂。

1931年12月5日,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这一献给1812年卫国战争英雄的纪念建筑被炸毁。计划在此地按建筑师鲍里斯·约凡的设计方案建立一座宏伟的苏维埃宫。卡冈诺维奇后来说,他曾怀疑拆除大教堂的必要性,斯大林同样也犹豫不决。但政治局会议上,激进的观点占了上风。有这么一种无稽之谈,说是卡冈诺维奇亲手转动了爆炸装置的把手并宣布“让我们掀开这个俄国大妈的裙摆吧”,但事实上那一天他根本就不在莫斯科。

莫斯科市的主要干线——花园环线也同样果断地被修复一新,环线上原来生长着能够让人回想起亚历山大一世的高大的橡树。电车轨道线也把环线通行车辆的部分给隔开了。因此,坐落在环线上的苏哈列夫塔楼和红门这两颗莫斯科古老建筑艺术的璀璨明珠必定要遭到毁坏。当然,当局也尝试过要保留苏哈列夫塔楼,想从它旁边绕行或是在它下面开凿地道,但如果是绕道修路就必须拆除另一个古建筑——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医院,而若是挖地道则会导致地面上塔楼的自我毁坏。所以,永别了,非凡的苏哈列夫塔楼!

自此,莫斯科作为一个有着“千顶”(喻教堂之众)、“波列诺夫式小庭院”、宽阔花园和贵族庄园的欧亚城市,永远离开了我们。

斯大林也曾几次巡视过这些街道,亲自检查建筑师们的方案。第一次是在白天,按照他的警卫 A. T. 雷宾的话说:“当时人群就聚集起来了,让我们完全无法前行,然后还一路跟在汽车后面奔跑。”以后斯大林就不得不将视察改在夜里。

说到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就无法回避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关于干部问题的一场不大,但却很深刻的冲突,这是因解除 M. 兀. 鲁希莫维奇的交通人民委员职务而引起的。鲁希莫维奇 1913 年入党,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组织局的委员。鲁希莫维奇是有功之人,在顿河和乌克兰参加过国内战争,镇压过喀琅施塔得叛乱,领导恢复了顿巴斯的煤矿工业,从 1926 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0 年 6 月,他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但却无法应对巨大的运输规模。斯大林坚决主张换掉他,并派到外省去管理“经济事务”。奥尔忠尼启则对这一意见置之不理,决意把鲁希莫维奇召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莫洛托夫同样不想流放这位人民委员。斯大林立即火冒万丈。他在 1931 年 10 月 4 日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写道:

我对莫洛托夫同志提议任命鲁希莫维奇同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与之相应地就是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感到震惊。鲁希莫维奇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是失败的，并且进行过（现在还在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实际路线（关于速度等问题）的最卑鄙的鼓动，现在要让他当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还要提拔他！胡说八道什么呢？！难道可以这样培养干部吗？好样的“培养”，真是无话可说了。

谢尔戈把鲁希莫维奇调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提议也是同样一个道理。这些人不明白，鲁希莫维奇就是第二个弗鲁姆金，不同的地方在于鲁希莫维奇更加危险，因为很遗憾，他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关于这些我已经给谢尔戈写了信。

鲁希莫维奇应该降职，派到莫斯科之外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系统的工作岗位上去。到那时所有人就会明白，中央委员会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空谈基本路线。他们会明白、会规矩起来的。（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453 页）

得到这一指示的卡冈诺维奇做了相应的决定：鲁希莫维奇被派去掌管库兹巴斯的采煤联合工厂。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斯大林的一个新的更年轻的宠臣卡冈诺维奇，能冲破老干部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阻挠，反过来驾驭他们。

但亲信们的阻力并不危险，对此可以容忍。真正危险的是其他一些干部。

这年夏天，在柏林一家大百货商店里，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和管理着“萨拉托夫联合收割机制造厂”托拉斯的管理者 И. Н. 斯米尔诺夫会了面。这两位都是引人瞩目的人物。

谢多夫是托洛茨基派刊物《反对派通报》的主编，进入过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少年时他已经充满着革命斗争的气概，跟随着父亲转战于各条战线。

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位英雄人物，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从 1899 年起，他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参加过 1905 年的莫斯科起义，是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正是他（而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在战胜高尔察克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20 年至 1921 年，在担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时，他毫不留情地镇压了西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的农民起义。在这之后，历任彼得格勒州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书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军事工业管理局局长，1923—1927 年任邮电人民委员。他是托洛茨基反对派领导层的成员，后因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遭到流放。他具有倔强、勇敢的特征，在列宁去世后他公开主张要斯大林辞去总书记一职，此后一段时间还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不过在 1930 年 10 月“与托洛茨基



主义决裂”，并恢复了党籍。

除了И. И. 斯米尔诺夫之外，和列夫·谢多夫保持接触的还有很多其他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他们与斯大林集团进行的避人耳目的隐蔽斗争从未停止过。

很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就将自己的间谍打入了谢多夫的身边，斯大林开始获取到国内反对派活动的必要信息。

为了阐述当时的局势，还必须先说一下日本9月18日在中国东北发动的军事行动一事。正如精明的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此事让在那里有利益关系的西方国家吵成了一团。斯大林很关注边境的安全，派由布柳赫尔指挥的远东独立集团军在东边进行守卫。尽管日本人尚未重整军备，这对苏联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们早就在觊觎东西伯利亚了。

斯大林随即下达了报纸对日本的侵略应做何反应的原则性指示：《真理报》应“竭力痛斥日本侵略者”，而《消息报》则须保持其一贯的“节制和极为谨慎的调子”。

我们不要忘了，《真理报》是党报，而《消息报》则是政府的报纸。对外交官来说，这一区别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莫斯科、伦敦或是巴黎未必有人知道，新的世界划分开始了。

1931年10月1日，莫斯科的汽车制造厂和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制造厂投入了生产。汽车制造厂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不过这一喜事无法掩盖新的烦恼。

11月13日，斯大林签署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命令，其中包括要求改组中央委员会机要处，并直接归斯大林领导（当斯大林缺席时，则服从于卡冈诺维奇）。这么一来，总书记实际上就设立了一个自己的特工机关。

1931年11月18日，被捕的英国情报机关驻苏联间谍头子的副手、自称奥加廖夫的博戈莫列茨·普拉东诺夫-佩京受到审问。他供认已准备对斯大林实施谋杀：

绝密。11月16日下午3点半左右，当我和多布罗夫一起从红场朝伊利英大门方向走去的时候，在人行道的左边离商场不远处我遇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穿着军大衣，戴着带保护色的便帽。他的左手边跟他并肩而行的是一位穿深色大衣、戴着便帽的先生，这张脸引起我注意的是那棕红色的大胡子。刚把眼光移向左边，我就发现斯大林只离自己三步之遥。他跟我见过的肖像画很像，我一下就认出来了。他比我想象的矮一点。他行走缓慢，注视着我。我的眼光也没有离开过他。我发现他身后紧跟着8个人。我们在人行道上（相当狭窄）擦肩而过，我的手甚至碰到了他旁边的人（那个有棕红色大胡子的人）。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拔枪射击，但因为那天我穿的不是夹克而是件大衣，而左轮手枪又放在大衣里面的裤子口袋里，所以我清楚，在我开枪之前就会被制服。

这一想法阻止了我，何况遇到斯大林纯属意外。走出几步后我又想，要不要

返回去开枪。但有 8 个人跟在斯大林后面,这种情况立即让我收手。

这整个插曲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原来以为斯大林总是在层层警卫围绕之下乘车出行,而且会以最快时速行驶。正是这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出行方式的认知一直给我们设计恐怖活动带来了最大的困难。我很懊悔,竟然错过了这样一次机会。我对多布罗夫说:“真怪了!当你遇到了却什么都没干,而当你想遇到他的时候却又遇不上。在国外的那些人谁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这些。”(《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1936年)》,第 286 页)

斯大林读完审讯记录后在上面标了“存档”两字。看来,他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的阴谋。他就是生活在这种时常受到谋害危险的状况下。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只带着一个警卫在莫斯科市内四处行走巡视(在基洛夫被杀之后斯大林的保卫才得到加强)。

引起他更大兴趣的是另一份情报。

1931 年 12 月 19 日。第 41083 号。

请求您亲自过目有关与苏联开战的极其重要和真实的日方资料。向您提供的文件有日本驻莫斯科武官笠原幸雄中校起草并以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的名义向日本总参谋部长官反映意见的备忘录,还有笠原幸雄武官向被日本总参谋部派到欧洲执行特别任务的原田少将提交报告的摘要。此报告与日本计划进攻满洲里的准备工作有关:原田将军今年 7 月来过莫斯科,并会晤了广田弘毅大使和笠原幸雄。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巴利茨基

绝密(日语文件译文)。

1. 广田弘毅大使与原田少将的谈话摘要(1931 年 7 月 1 日)。

广田弘毅大使请求将自己关于日本国策的意见转达给日本总参谋部长官:

关于日本是否值得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战争问题,我认为必要的是,日本应该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

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防止日本受到共产主义的侵害,不如说是为了占领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

2. 笠原幸雄中校提交给原田少将阁下的报告摘要。

I. 苏联的总体状况

苏联现阶段正在积极地实施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苏维埃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该计划的核心在于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那些与提高国防能力密切相关的工业领域。而那些直接关系到居民需求的工业领域则被放在了



第二位。苏联不惜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积极发展重工业,今年是实施计划的第三个年头。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该计划制定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但我认为今后该计划的实施将遇到一系列障碍,未必能够成功完成既定规划。尽管被国家政策牺牲了的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但应该考虑到苏维埃国家的以下特性:

苏联的政治管理体系是真正的专制独裁,因此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缩减经济生活的次要部分,将所有财政和人力资源投入到完成规划的核心方面去。

苏联的生产效率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十分低下,但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资源的运用要考虑到个体的利益,而苏联的资金投入只需要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去考虑。

苏联居民盲目地服从于政府,并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剥夺。

苏联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鉴于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当落后,它反而能够以最小的努力实现工业的有效发展……

苏联的保卫和监督体系的设置相当严格,这就排除了反政府行动集结起来的可能性。

撇开五年计划的作用和对民众意味着什么(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这两个问题不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

但是绝不能认为,实现这一计划之后,居民的生活水平就将开始快速提高。

当我们从对经济前景的评价转向意识形态的展望时则需要注意到,如今在苏维埃国家处于重要岗位的人们都曾经历过严酷的锻炼,但在未来,当这一代退出舞台的时候可以认为,共产党的英勇精神将开始减弱。当然,10年后走上舞台的将是革命后在共产主义环境下受过教育的一代,他们可以在国家发展经济实力的计划已经完成的条件下向右或向左推行苏维埃的政策,但国家的总体形势将是稳定的。

但未来在内政方面,将会出现分裂主义运动(乌克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和党内分歧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是苏维埃国家的坏疽,在战时可能会起到极为致命的作用。

II. 苏联的武装力量

a) 原则上说来苏联完全不具备进攻性。其武装力量的组建基于自卫原则。苏维埃联盟饱受着外国武装干涉的威慑。有一种推论认为,当局不断鼓吹外部威胁是一种内政措施,其目的在于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种推论是完全合理的,但其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动因确实还是因为担心来自外国的武装侵略。

b) 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军事实力。苏联政府领导人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公开地谈论外来威胁。强化军备的主要发起者就是苏联共产党。

自1927年以来新组建了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红军在加速发展武器装备。

c) 军队武器装备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摩托化。

现拥有500辆坦克,其中有100辆是在过去的半年里新增的。

有5个摩托机械化兵团:4个独立坦克旅和1个步兵师。

红军的化学武器令人十分惊讶。军队里和民众中进行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效率极高。

d) 空军力量:有1700—2000架飞机。初步目标要组建200个飞行中队。

据我的推算,现阶段已经拥有了180个飞行中队。侦察机和歼击机的航空技术已经达到了所需要的水准;看来,现在正全力集中在轰炸机上……

较之1929年,军事预算增加了一倍。但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情况,即军事工业的开支在苏联财政预算中是列在工业总体支出项目中的,而军事装备的开支又是列在军事工业支出项目中的,另外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属的部队的开支是不列入陆海军军事部门预算的;还有军营的维护费和练兵场的建设费等等,都是列在地方财政里的。因此,官方的军事预算和实际的数字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依靠私人捐款,正在制造大量的飞机。仅去年一年,就这样制造出了330架飞机。

居民的军事化。

当局集中了很大精力在军事化上。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成员的数量在增加:

1929年1月有300万成员;

1930年1月有500万成员;

1931年1月达900万成员。

军事化甚至普及到了幼儿园里……(斯大林批注:“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暂时还只是一个政治宣传。”)

III. 结论

毋庸置疑,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武装力量的增长,苏联将开始从消极防御的原则转向积极进攻的政策。

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总体状况,我们可以断定,现阶段苏联无力发动战争。(斯大林批注:“是这样。”)

现在是我们帝国着手解决远东问题极为有利的时机。与苏联接壤的西方国



家(波兰、罗马尼亚)现在有可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将逐渐减弱(这一段被斯大林标了出来)。

如果做好战争准备的我们现在着手解决远东问题,那么我们可能不必开战就能达到目的。即便一旦爆发战争,那对我们也不是问题。(斯大林批注:“就是说,我们已经对外来侵略恐惧到只能忍气吞声的地步了?”)

……在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日本与其落在英国和法国之后,不如针对红军采取最强硬的立场。

在莫斯科的外国武官们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日本理应相信自己的正确性,并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与海军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如果我们从视红军为我们敌人的观点出发提出我们的要求,那些强国未必会表示反对。(《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年—1936年)》,第291—295页)

从斯大林的这些批注判断,他对这份文件非常重视,并且从中看到了挑战。另外,日本人认为,他指出的历史所赋予苏联的工业化的10年期限是正确的,当然,在看待这个时限上,日本人的想法是苏联会一代接一代干下去的。

但是斯大林此时仍亲自控制着自己的干部,并能够指望,在10年里他能挑选出新的战友。他对于远东的战局不抱幻想,认为日本“将把手伸向我们的远东,也可能伸向蒙古”。

他在1931年11月27日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并预测日本将“在大陆上建立一个广阔的经济和军事基地”,并将(请注意!)以此基地为支撑展开对美国的战争。

斯大林提前10年预见日本和美国的战争。甚至,他还预料到了1939年哈勒欣河的那场战斗。

他向这位人民委员阐述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如果不在中国建立基地,“就会觉得自己像在捕鼠器里——夹在军事化的美国、革命化的中国与迅速成长、冲向大洋的苏联之间(我觉得,日本人认为再过两年,当苏联在远东做好了一切必须的准备,那就迟了)”。

这封信写于11月底。在获得了那份日本大使馆的文件后,斯大林在其中没有看出有多少新的东西,仅是强化了自己对未来的预见。

战争不可避免。必须加快与西欧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时的西欧,法国和正在积聚力量的德国之间的对抗在明显增强。

12月13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会晤中斯大林谈到了苏联对德国人的好感,以及计划与波兰签订条约并不意味着改变与德国的关系,也不意味着与波兰的边境就得到了保障。此外,他拒绝将自己与彼得一世相

比,并称自己只是“列宁的学生”。不过,这里主要的是向柏林发出信号,其他都是次要的。

(1932年1月,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关于法国情报机关活动的呈报中,斯大林读到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希特勒在德国有可能会掌握政权,以及德国总参谋部确信,如果欧洲军队武装干涉苏联,必将遭到彻底失败。)

12月,莫洛托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做1931年的总结时,发出了“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在增长”的警告。

现在,不得不将军事预算扩大到1931年的1.5倍,这就更加勒紧了民众的腰带。那些与之相关的人们应该明白:苏联知道你们的阴谋,并准备好投入战斗。这可以称之为新一轮的国际范围内的赌博,因为大家都在虚张声势,彼此密切注视着,寻找能够获胜的套路和联盟。

正如1932年初国外处上报给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份文件说的那样:“再过10年,当第二个五年计划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的军事力量加上辽阔的领土、大量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变得极其强大。”这段文字出自日本武官笠原幸雄中校。

战争,这一让斯大林最担心的事情在1932年并未爆发,却发生了饥饿农民的暴动和他妻子的自杀。

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要事件。1932年4月,共青团杂志《青年近卫军》开始刊登27岁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中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成了新时代的福音书。日本间谍所说的新一代,已经在获取自己的话语权。

在给编辑部的附函上,奥斯特洛夫斯基强调:“我是抱着要给我们的青年人留下记忆的强烈愿望而进行创作的,这种记忆是以书籍的形式出现,它既不能称为中篇小说,也不能称为长篇小说,而仅仅是告诉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名国内战争的参与者、一个瘫痪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突然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斗士。

“这是怎样的一个精神胜利呀!”高尔基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

小说中的一段话成了十几年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里的重点内容:“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1932年4月,与这一新英雄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当时因歉收引起了粮食危机,而3月23日政治局取消了对2000万工人凭证供应粮食的保证,这些工人属于所谓的“第二批”和“第三批”名单,即都不是突击队员。

饥荒也重创了农村。农民纷纷脱离集体农庄,阻止采购上去的粮食向外运出,并抢劫了大小粮仓。这种骚动又蔓延到城市。最严重的暴乱发生在伊万诺沃州的一些



城市里。在维丘加市，诺根纺织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随后全市所有工厂都加入了进来。4月10日，数千人冲击了警察局办公楼，占领了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区党委的大楼。工人一死一伤，数十名警察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4月12日，卡冈诺维奇抵达维丘加，随即展开了逮捕行动，紧急运来粮食，并撤换了3个城市的领导班子。

克里姆林宫必须对已出现的政治危机的明显征兆作出快速反应，革命浪漫主义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况且，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于那些挨着饿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及其家人又能知道多少呢？

1931年10月16日，亚戈达提交给斯大林的报告数据显示，1930年间共驱逐了77795个富农家庭，而在1931年则是162962个（共计1158986人，其中儿童有454916人）。农业生产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劳动者。

旱灾和强行改变农业技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而大幅缩减休耕地）更加深了这种危机。

必须急速调整方向盘。这时人们想起了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于是上缴粮食的定额被缩减，允许集体农庄庄员出售余粮。“新喀琅施塔得”和“新安东诺夫”起义的例子迫使斯大林让自己的铁石心肠变得温和一点。

在西方和乌克兰历史学家的文章中，1932—1933年间的这场饥荒常被认为是当局为了镇压库班、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沿岸德国人居住区的民族反抗而“人为”制造的。这离真相太远了。

1932年5月6日，根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粮食征购的定额被削减了30%，也减少了其他产品的采购量。

苏联领导层对利用个体市场解决城市粮食供应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估计。

也许，本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正如公布的数据所表明的，领导层采用了明显虚高的产量数据，他们掌握的是称之为生物产量（未收割之前的产量）的初始依据，这个数字根据天气条件的影响程度要比实际产量高出20%到40%之多。

我们来列举一些数据：

“乌克兰学者И. И. 斯雷尼科公布了保存在档案中的文献，上面对1931年乌克兰粮食总产量的估算是1400万吨，这比官方宣布的1830万吨要低很多。他补充说，当年夏天的天气状况又使粮食总收成下降了30%—40%。乌克兰侨民学者弗谢沃洛德·卡卢布尼奇在1958年发表的关于大饥荒的文章中写道，正式的数据表明，乌克兰1931年有近30%、1932年有近40%的粮食在收获季节损失掉了。”（塔乌格M.，《1932年的收成和1933年的饥荒——俄罗斯农民的命运》，第304页）

其他研究人员也提供了一些当年严重歉收的证明：在乌克兰和库班的很多集体

农庄里,有时每公顷的收成竟低于3公担。

这场饥荒波及的不只是有乌克兰和德意志居民生活的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甚至北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等地的居民都在忍饥挨饿。关于收成和悲剧覆盖的广阔地域的统计数据,足以驳倒有关人为原因造成饥荒的说法。

旱灾、歉收、错误的统计方法和虚假的统计数字,所有这些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但造成饥荒的还有一个不能告知民众的情况。

苏联政府必须做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放弃已签署的出口粮食的外贸合同,要么放弃帮助挨饿的人们。

克里姆林宫尝试过第一种可能,但遇到了他国的不能理解。

例如,1931年底,大不列颠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相当充分地阐述了本国政府的观点:“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我国不仅会拒绝今后提供贷款,而且所有苏联今后的出口、所有驶入国外港口的苏联船只、所有苏联境外的财产都有可能被没收以抵偿债务。承认财政没有支付能力将使所有与五年计划有关的愿望的实现受到威胁,甚至可能危及政府本身的存在。”持有同样立场的还有德国。1932年初,德国总理布吕宁在柏林对英国外交官说:“如果苏联以任何方法不予支付账目,那么对其贷款将永久取消。”(引自:塔乌格 M.,《1932年的收成和1933年的饥荒——俄罗斯农民的命运》,第331页)

1932年10月,英国撕毁与苏联的贸易协定,而1933年4月更宣布在英国境内全面禁止进口苏联的商品。

斯大林不可能放弃工业化。其时连提及饥荒都受到了查禁。

1932年1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C.柯秀尔发去电报:

我们认为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情况令人担忧。在联共(布)中央已获知的数据基础上,乌克兰的工作人员擅自制定了减少完成7千万至8千万普特的计划。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不能接受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认为,乌克兰在今年集体化程度提高、国营农场数量增多的情况下,1月1日就准备比去年少收购2千万普特的粮食,这是一种耻辱。这是谁的过错?是高度集体化的原因还是收购工作中低水平的领导?

我们认为您必须立刻前往哈尔科夫,把所有粮食征购工作抓到自己的手里。计划必须全部地、无条件地完成。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必须得到执行。(引自:伊夫尼茨基 H.,《1932—1933年的大饥荒:谁之过?俄罗斯农民的命运》,第335、336页)



整个1932年斯大林都在忙于解决粮食问题。根据斯摩棱斯克档案馆保存的文献来判断,各级党组织一开始并不想采取惩罚和征用的手段以获得用于出口的额外的粮食,但其中几乎已经没有剩下富农的农民并不急于响应此号召。苏维埃机关也试图镇压,甚至以无力解决问题为由逮捕了一些农村党员干部。但中央委员会在这些举动中看出了一个先例:行政当局爬到了党的头上,竟审判和指责党的成员。

1931年9月,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决议案中谴责这一做法。而且,采取了措施,以停止把集体农庄的庄员看成是富农(或潜在的富农),并且尝试通过采取经济刺激的手段从庄员那里获取所必需的粮食。

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斯大林集团还是寄希望于与农民达成共识的。当然,这种希望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留出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总要有所牺牲。

尽管整个夏天,当局从国库里给受灾地区拨出过粮食,但总体上这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不止一次在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最密切注意的就是乌克兰。1932年7月24日,他在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信中说:“我们在全苏境内无条件执行粮食征购计划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但你们要考虑,需要把乌克兰的几个重灾区作为例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公正的考虑,更是由于乌克兰与波兰交界等特殊位置决定的。我认为,可以减去重灾区集体农庄的一半指标,而对个体农民减去三分之一的指标。这将使我们失去3千万或4千万普特的粮食。现在不需要这样做,要等到8月中旬或是8月末,好让农民更积极地投入秋播劳作。很可能对外高加索地区也需要采取这种特例,但是减免数量不应超过一百万普特。”(《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241、242页)

斯大林明白,他正在跨越极限,并在竭力降低风险。各地都在请求和要求缩减粮食征购计划。

乌克兰及其领导人让他极为不安,以致他想要换掉柯秀尔。但用谁来换他呢?

他在7月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只有卡冈诺维奇能够替换柯秀尔,别无其他候选人了。米高扬不仅不适合于乌克兰,他甚至不适合留在供给人民委员部(此人笨手笨脚,是个无组织性的‘煽动者’)。”斯大林在其他一些信件中还谈到了自己对乌共中央总书记的不满:“一批第一书记(乌克兰的、乌拉尔的)没有给予农业应有的重视,他们忘了,如果没有农业的不断增长,我们的工业就不可能增长。顺便说一下,在这方面暴露出了书记们与农村是脱节的。而这些错误的结果就反映在现在的播种上,特别是在乌克兰,而且,有成千上万乌克兰集体农庄的庄员还在苏联的整个欧洲部分东奔西走,用他们的抱怨和牢骚去瓦解那里的集体农庄。”(《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179页)

“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其实就是那些不幸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突破了对城市的军事封锁，为了避免饿死逃了出来。

发生过许多吃人和吃死尸的事件。

他对 1917 年以来的乌克兰各种往事记忆犹新：分裂主义、德国的分割计划、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俄国的领土要求、苏维埃俄国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彼得留拉在 1920 年的苏波战争中向波兰一方的倒戈。

1932 年 8 月 11 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发去一封信，该信对了解当时的时局至关重要：

……现在最主要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情况糟透了。党的系统方面也不佳。据说乌克兰的两个州（好像是基辅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有近 50 个区党委表示反对粮食征购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不现实。其他区党委的情况，可以断言，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像什么呢？这不是政党，这是议会，是对议会的滑稽模仿。本应好好管理这些区党委的柯秀尔，却一天到晚周旋于联共中央的指令和各区党委的要求之间，结果陷入了绝境。列宁说得对，没有勇气在必要的时刻逆流而上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

苏维埃系统的工作也不行。丘巴尔根本不是个领导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也不好。列坚斯无法胜任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庞大和特殊的共和国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领导工作。

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改善乌克兰的状况，我们就有可能丢失乌克兰。您不要忘记，毕苏斯基可没在打瞌睡，他的间谍机构比列坚斯或柯秀尔想象的厉害得多。同时也不要忘记，乌克兰共产党（50 万党员，嘿嘿）里藏有不少（是的，真不少！）腐化分子、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彼得留拉分子，还有毕苏斯基的间谍。一旦局势恶化，这些分子将毫不犹豫地党内（也在党外）开辟战场来反对党。最糟糕的是乌克兰的上层领导没能看到这些危险。（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 17 卷，第 571、572 页）

我们要强调斯大林的一个想法：“内部战线”。他担心“第五纵队”。

后面他再一次提出要在保留卡冈诺维奇联共（布）中央书记一职的情况下，由他来替代柯秀尔，同时（过几个月，以便不造成乌克兰人的恐慌）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B. Я. 丘巴尔调至莫斯科，而代替他的可以是苏联财政部长格里尼科（也是乌克兰人）。

列坚斯被降了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委员 B. A. 巴利茨基成了他的顶头上司。斯大林很了解这位巴利茨基：出身于卢甘斯克，在与波兰作战时任西南方面军后勤部长和前线法庭庭长。



对柯秀尔和丘巴尔,斯大林提出给予高位——联共(布)中央书记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很清楚,这些人在莫斯科是会完全听命于他的。

很快,斯大林的部分提议得以执行。丘巴尔调到首都,成了莫洛托夫的副手。而柯秀尔留在了哈尔科夫,但分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波斯特舍夫将被派去担任他的第二书记。

上面引用的这封信中还写道:“要给自己定下在最短时间内将乌克兰变成苏联真正的堡垒、真正的模范共和国的目标。为此不要舍不得花钱。”

斯大林承认,要是没有这些措施就可能“丢失乌克兰”。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思考的,一方面在竭力避免引起这些不合格的领导人的猜疑,另一方面并未顾及他连襟列坚斯的面子。

斯大林准予缩减计划,但坚持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新的计划。

但是,粮食征购的计划普遍没能完成。农民不相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终于失去了耐心。经济未能如他希望的那样发展。刚刚成为工人的昨日的农民还不具备应有的技能,常随便地离开自己的现有岗位去找新的工作。这类琐事极其繁多。有很多的职位空闲着。1928年全国有460万工人,而到1932年时已经有1000万人了。尽管城市里尚未发生饥荒,但也出现了粮食供应的短缺,整个环境中弥漫着混乱无序、动荡不安、缺乏永久精神目标的情绪。犯罪率在上升。

工厂里因工人的操作水平低下,一些进口设备受到损坏。农村里盗窃现象屡禁不止。交通运输线上有成群土匪在活动,他们抢劫货车,而国家政治保卫局运输处对此无能为力。

7月20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发去信件,此信可以看出他处于愤怒之中。

首先他指出,由于资金紧缺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减所有预算开支(甚至国防预算的开支),然后建议采取严惩措施:

最近一段时间盗窃猖獗起来:第一是对铁路运输物资的盗窃(损失达几千万卢布),第二是对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财产的盗窃。组织这些盗窃的主要是富农(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和其他企图破坏我们新制度的反社会分子。按照法律,这些先生会被当成普通小偷来审查,被判上2到3年监禁(形式上的!),而事实上上过6到8个月就被赦免了。对于这些先生的这种惩罚措施根本不能称为是社会主义的,仅是纵容了他们实质上的真正的反革命“工作”。不能继续容忍这种局面了。我建议颁布一项法律(暂停或废除现行法律),其中包括:

- a) 将铁路运输物资、集体农庄的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视为国家财产;
- b) 对于抢劫(盗窃)上述范围财产的惩处至少是10年监禁,通常应以

死刑；

c) 废除对这些“工种”的罪犯采用特赦。

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残酷的社会主义措施,就不可能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没有这样的秩序,就不可能维护和巩固我们的新制度。

我认为,对这一法律的颁布不能拖延。(《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235页)

8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出台了关于保卫国家和集体农庄财产的决议。

从1932年8月31日明仁斯基呈报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可以看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立即作出了反应:“……8月份逮捕了640人,其中打碎玻璃和向火车投掷石头的有67人,设置路障的有11人,堵塞火车制动阀和中断火车运行的有16人,殴打列车乘务人员的有181人,在车站打架滋事的有340人,还有一些因其他不良表现被抓,共计640人。”(《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第317页)

整个8月份因上述犯罪行为判了43人枪决,86人10年监禁,17人8年监禁,61人5年监禁。

明仁斯基指出,与上个月相比,8月份在运输线上的盗窃行为减少了58%。

9月8日,政治局批准了《社会财产保护法》,9月16日,则出台了该法律的实施细则。细则对按照该法治罪的犯罪行为划出了等级。国家宣布,所有的社会主义财产都受到该法的保护。

这一法令的思想源自斯大林7月24日(大约的日期)写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信中的建议:“如果有人反对我关于颁布反对抢劫合作社与集体农庄财产和运输货物法令的建议,那就请你们做出如下解释。资本主义如果不宣告私有制原则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如果它没有让私有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制,破坏这一所有制的利益将受到严惩,并为保护这一所有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那么它就无法打倒封建主义,也无法发展起来和壮大起来。而社会主义如果不宣告公有制(合作社的、集体农庄的、国家的)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也不可能打倒和埋葬动摇新社会基础的资本主义成分和唯利是图的习气、惯性和传统(这也是偷窃的根源)。如果它不全力去保护集体农庄、合作社和国家的财产,如果它不打击反社会分子、富农—资本主义分子侵占公有财产的企图,那么它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新的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我们需要一部新的法律。这一空白必须要补上。”(《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240、241页)

这样一来,斯大林等于承认了,工业化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已经结束,私有企业



经济的传统根深蒂固,必须以围剿的方式铲除它们。与此同时,已经采取措施来打击那些从农民手中购得粮食然后在私人市场高价卖出的粮食投机倒把分子(非农民出身的商人)。

该法律的实施细则渗透出一股国内战争时期的气息,让人觉得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条款。在《第二章》中划分出了“盗窃的类别和必须采取的社会防范措施”:

1. 对于通过纵火、爆炸和大规模损坏财物的方式有组织地破坏国家、社会和合作社财产的组织和集团的案件,应对涉案人采用社会防范的最高标准——枪决,严惩不贷。

2. 对于在国家的(工业的、农业即国营农场的)企业或机关里工作的富农、过去的商人和其他社会异己分子,以及这些国家机关和企业的负责人员,如被发现犯有侵占财产或盗用这些企业或机关大额公款的,一律采用极刑;在罪行较轻的情况下(初犯或侵占数量不多),可判10年监禁来代替极刑。

对于上述社会类型人员犯有的盗窃行为,如果虽然数量不大,却造成了国家企业生产的紊乱或是中断的(偷窃机组和机器的零部件、蓄意报废或损坏国营农场的用具等),也应处以极刑。

3. 对于渗透进供给、贸易和合作社机构的富农、过去的商人和其他社会有害分子,以及商品运销网的负责人员,如发现犯有盗窃商品或是将其投放到私人市场出售和盗用大额公款的,应处以极刑;在罪行较轻的情况下,如盗窃数量不多时,可判10年监禁来代替极刑。

对于尽管没有直接参与盗窃,但明知货物是从国家单位和合作社盗窃而来,却仍进行商品和原料倒卖的投机商人,应处以同样的惩罚。

4. 对于被发现犯有盗窃运输物资罪的人员,应处以极刑;情节轻微者(初犯或侵占数量不多),可判处10年监禁。

如果运输盗窃活动中有铁路职工参与,对他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惩罚。

对于渗透进集体农庄和不在集体农庄的富农,如组织或者参与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和粮食者,应严惩不贷、处以极刑。

对于被发现犯有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和粮食罪的个体劳动者和集体农庄庄员,应处以10年监禁。

对于情节恶劣者,也就是经常性地盗窃集体农庄粮食、甜菜及其他农产品和牲畜的,从事有组织的盗窃的,盗窃数额巨大的,伴以暴力、恐怖、纵火等行为进行盗窃的,即便是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劳动者也应处以极刑。

5. 对于参与盗窃国家和公有财产的集体农庄主席和管理委员会委员,必须处以极刑;只有对情节轻微者,可处以10年监禁。(《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

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第322、323页)

可以认为,在这个细则中,该法律被称为“法令”,并再次使用了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文件语言。这并非偶然。

这样一来,国家就建立起了合法镇压的机制,其重要性明显超出了刑事立法的范围,其目的在于彻底消灭阶级敌人。

资源的有限性也促使斯大林去建立一个最简单也最易监控的管理机制。但用严惩进行恐吓的方式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各地的集体农庄里,主席、农业专家和当地共产党员都在阻挠粮食征购员和检验员的工作,隐瞒收成的核算,以帮助受穷的同乡们。对一些落入惩罚机制齿轮的不幸而大胆的人的审讯记录被呈交给了斯大林。从这些记录中可知,这些人明知逃不过惩罚,但仍继续履行着自己的信仰和义务。

斯大林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是极为典型的。例如,在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附函中他写道:“现将对‘列宁遗嘱’集体农庄簿记员(会计)、公民佩罗夫的审讯记录发给你们,这是众多材料中的一份。这些材料表明,在缺乏来自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情况下,集体农庄运动中反社会分子在有组织地抢劫集体农庄的财产和有组织地欺骗国家。”(《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第336页)

事实上,从这份审讯记录中可以得出结论,集体农庄的管理人员无非是出于怜悯之心,想减少一些不幸而已。

斯大林不愿意(或者已经不可能)看见受苦民众的悲剧一面。射出的子弹已经无法回头了。

从乌克兰、库班、伏尔加河沿岸和其他地区不断传来粮食征购受挫的报告。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了。

1932年10月22日,政治局决定为了加强粮食征购工作派出两个全权委员会进行为期20天的视察: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委员会开赴乌克兰,卡冈诺维奇率领另一个委员会前往北高加索边疆区。这两个地区至关重要,几乎整个粮食征购计划的一半要在那里完成。从委员会的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些拥有特命全权的政委。卡冈诺维奇的委员会里有米高扬(供给人民委员)、M. A. 切尔诺夫(来自采购委员会)、T. A. 尤尔金(国营农场人民委员)、Я. Б. 加马尔尼克(工农红军政治部)、M. Ф. 什基里亚托夫(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亚戈达(国家政治保卫总局)、A. B. 科萨列夫(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11月2日,抵达顿河畔罗斯托夫后,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召开了农村区党委书记会



议,而在11月4日则召开了边疆区国营农场经理会议。并在同一天的边疆区党委会与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库班地区粮食征购和播种的进程》的决议。决议中写道:“鉴于库班地区粮食征购计划和秋播工作遭到了极其可耻的失败,库班各区党组织现在就面临着—个战斗任务:要摧毁由富农反革命分子组织的对粮食征购和播种的暗中破坏,要消灭实际已成为暗中破坏行为向导的部分农村共产党员的对抗行为,并清除与党员称号不相符的对怠工者的消极和容忍态度。要保障快速、完全和无条件地执行粮食征购计划,并实现党员队伍的团结和集体农庄的巩固。”

在这之后,各地便采取了严厉措施来对付“怠工者”:新罗日杰斯特文斯卡亚(季霍列茨克区)、梅德韦多夫斯卡亚(季马绍夫斯克区)、铁米尔戈耶夫斯卡亚(库尔加宁斯克区)等镇被列入了“黑名单”。对这些镇采取了以下措施:“a)立刻停止对它们的货物运输,停止国家和合作社与之的贸易往来,并运出所有的货物;b)禁止这些镇的集体农庄,以及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进行贸易活动;c)终止一切贷款,提前清还已贷资金;d)建议对‘各种形式的异己分子’展开排查和清洗;e)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受命‘清除反革命分子’。”(引自:伊夫尼茨基 H.,《1932—1933年的大饥荒:谁之过?》,第340、341页)

除此之外,委员会还以发配到北方地区相威胁,禁止民众将日用品运到10个落后地区,而对于另外10个地区,则作出决定,运出所有商品。

对试图逃脱这种痛苦的命运,不耕种和不纳税而让自己土地荒置的个体农民,决议提出迁往北极。对这些人运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61条加以处罚(“拒绝履行义务和国家的任务”)。

该决议建议边疆区法院和检察院要让隐瞒粮食统计结果的仓库管理员和会计受到法律制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各机关部门应该逮捕所有类似的人。

这份决议报给了斯大林,他表示赞同,在对其做了一些改动之后,下令地方报刊予以公布。

11月5日,卡冈诺维奇写信告知斯大林自己的印象:

在库班地区书记会议上,我们在他们脸上看到了所有表情,唯独看不到书记应有的表情。这就是那些要对党负责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庄稼汉的辩护人。在这种氛围下,不得不羞辱、痛骂和训斥他们。

昨天我们召开了国营农场的经理会议,场面更沉重。一方面,一些人表现得像祈求基督恩赐的乞丐一般,另一方面有些人表现得放肆,甚至在反党。如果真要撤职,那么需要被撤掉的人超过了半数;某些人是必须要撤换掉的,而其他人需要加以改造。在镇上没有人致力于粮食生产和播种。法院作出了判决,但决定却得不到执行。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遭受到的只是挖苦,他们割下穗

子,然后说打出的谷物量说明收成不好。而一个又一个的新手工磨坊却在建立起来。

反革命分子泰然自若。而且局势和我们糟糕的工作(地方组织的工作)、自由主义、无所事事、机会主义等作风也给反苏维埃组织的成立创造了条件。现在需要弥补过去的损失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过火的行为。我们会竭力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但因为这一切来得很突然,想彻底避免是困难的。不管如何,现在在这边最主要的任务是结束这些无疑是由一个核心策划和领导的暗中破坏行为。

好了,这封信到此结束。我马上从克拉斯诺达尔出发去各个村镇。我想去情况最恶劣的波尔塔夫斯克看一看,那里有400位教师、医生、技师、上校、大尉之类的人。(《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莫斯科,2001年,第299页)

11月4日,通过对北高加索农村党组织进行清洗的决议,而且首先是拿库班开刀:“这次清洗应该从党的队伍中清除掉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奉行富农政策和无力在农村推行党的政策的人。将这些入作为政治危险人物驱逐出去。”(引自:伊夫尼茨基H.,《1932—1933年的大饥荒:谁之过?》,第342页)

1932年11月间,在库班,有43%的共产党员遭到“清洗”,有5000人被捕。而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共有1.5万人失去了自由。

11月21日,政治局批准了卡冈诺维奇和舍博尔达耶夫发来的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作出的关于在两天内驱逐“拒不耕作和阻挠播种”的2000户家庭的决议。

库班14个区45个镇的家庭遭到驱逐,在北方边疆区和乌拉尔地区各有1000个家庭遭到流放。(这样一来,某些库班的哥萨克人遭到了历史的惩罚,他们在1919年至1920年间表现出分裂主义的立场,拒绝了给主张为“统一的和整体的”俄国而战的邓尼金部队以支持。不过,大多数被驱逐的人并未参与过国内战争。)

1932年12月,“图谋不轨”的波尔塔夫斯克镇的所有居民共9187人被迁至乌拉尔。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从干旱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迁来了红军战士、农村的党员和共青团员,来填补“教师、医生、技师、上校和大尉”的位置,也就是说,像伊万三世时期那样,用可靠的居民代替了不可靠的居民。

1932年12月5日,舍博尔达耶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汇报,全年计划的80%得以完成。

这个指标的确是好不容易才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敲打出来的。在该边疆区,有1193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边疆区法院根据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法律给949人判了罪,其中175人被判以极刑并被枪决。而人民法院判6206人有罪(根据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 61 条和 1932 年 8 月 7 日的法律)。

舍博尔达耶夫还另外向政治局请求批准驱逐 5000 户家庭；从集体农庄中清除出“富农分子”(2%—3%)，并将其中“最恶劣的分子”予以流放；清洗地方经济机关人员；继 11 月份派来 1500 人的基础上，再增派 150 名农业局和集体农庄农机站的工作人员；另外，请求中央委员会通过特别动员，再派 50 人来巩固区委党和区执委。

对于这场撤换不需要和有害之人的实践，其发起者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够预料到，几年之后这种撤换会突然变成政治精英的“枪决名单”。尽管落入这份名单的人后来查明均是无辜牺牲者，但在那个残酷无情的时期即将到来时，如同波尔塔夫斯克镇的哥萨克人，或是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和哈萨克斯坦饿死的人一样，他们也是有罪的。

所有人都是有罪的！

在乌克兰，莫洛托夫行动的高效与残酷也毫不逊色。

1932 年是一个属于他的“特命全权政治委员”的年份，是一个西方国家持强硬立场的年份，是一个因饥荒有数百万人饿死(据不同的说法有 300 万至 700 万)的年份，是一个党中央和政府机关中出现预算和干部危机的年份。而正是在这一年，组成了“自己人”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

斯大林受到了来自老布尔什维克 X. P. 拉柯夫斯基的沉重一击。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 1873 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一个富商家庭，真名叫克勒斯秋·斯坦切夫。从日内瓦大学毕业之后就投身到了保加利亚、瑞士、德国、法国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他于 1917 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参加了国内战争。1918 年成为乌克兰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担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外交部长。曾担任驻英国、法国全权代表。

1927 年，他因属于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他是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战友，《反对派纲领》的合著者。1928 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此后又到了巴尔瑙尔。拉柯夫斯基走过了一条真正革命家的道路，他坐过牢，可以说，闻过被征服的敌人的血腥味。乌克兰肃反委员会行事残忍，关于这点有着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证据。

即使成了流放犯，他在思想上也“没有被解除武装”，在搜查中被没收的一封信写给某位“B”的信就能够证明这一点：

在 1932 年完成工业化计划的过程中，未能长时间地制止“工作队在增加，劳动率在下降”这种现象。这句话是对当时工业状况最好的注解。报纸上对“成就”的大吹大擂今后已不可能骗得了谁了。而且，无数完不成计划现象的信号足以说明正在日益崩溃的事实……

其实,工人阶级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感到恐惧。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将是一次新的力所不能及的牺牲。他们并不相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日常生活条件会得到改善的保证。他们把这些保证称为有关天国的牧师布道。是的,如果斯大林的领导层有能力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那么他们早就会这样做了,并不会等着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这个政治生活压抑、劳动群众毫无权利的国家里,而且是在一个居民分布在广阔国土上的农业国家里,其腐化霉烂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久,会是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成百、成千、成百万的劳动者将死于饥饿和瘟疫,将陷入无知和野蛮的境地,而与此同时,在两个首都,却会繁荣昌盛,精心装饰的文明会发展。把首都工人与外省工人隔绝开来的不只是良好的供给,还有高薪,专供上层官僚和少数高级技术工人的内部供应商店也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我们的领导们可以在莫斯科举办各种军事和体育盛会,可以搞得沸沸扬扬、愚民不止,可以安排“显要的”外国人来参观游览,让他们受尽荣耀和关注,然后这些外国人会为他们对俄罗斯工人和农民的“乐观情绪”做出“证明”。但就在同时,在乌克兰、在乌拉尔、在中亚和西西伯利亚,红色警察会在马路上收拾那些被狗吃了一半的饿死者的尸体……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程就是这种“日新月异”的最好例证。不用一个月,我们的共产党头号官僚就无法再向工人阶级和农民宣布又取得了什么拯救国家的新发明或新创造了。这个“时代”被称为“大转变”的时代。无休息日的工作制、突击运动、工作队、紧锣密鼓的集体化、与平均主义的斗争、全新的历法、币制的改革、垄断经营的改革、行政的改革(计划制),牲畜的公有化运动,现在都被一句“共产主义的口号”替代了——“每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将有自己的牛、自己的羊、自己的鸡。”已经一年多了,那位曾经指出过六个历史条件的德尔斐演说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他的崇拜者坚信,他正在思考该说些什么新的东西。神奇的口号与护符已经不管用了……

但有一点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不能放弃的,即镇压的本事。

这一技艺他们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这不奇怪,因为在运用自己独断专行的天赋时,他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但镇压和统治并不是一回事。这两种技艺甚至具有某种反比。镇压,从阶级诞生的那一刻起,任何一个专制政体都会使用。而统治这门技艺斯大林却未掌握,这一点在他早期独裁的最初几年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为了维护他的权威,他和他的拥护者就需要采取夸大他过去和现在的“功勋”和围绕着他的名字组织广告宣传的手段……

正是因为党已经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正是因为党不再是领导而只是下令,正是因为任何对共产主义的批评都会受到压制,也正是因为工会和苏维埃都是虚



架子，所以这一切就堵死了走出危机的合理合法的道路，斯大林的政策正这样地增加着地下反革命组织的机遇……(《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第329、330、332—334页)

读到这封信，斯大林未必会感到高兴。不过拉柯夫斯基并未因此受到处罚，在流放地呆到1934年后返回了莫斯科，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部中等医校局局长，1935年重新入党，担任苏维埃红十字会主席。

对这位反对者之所以如此容忍，只能解释为拉柯夫斯基的这些观点对于很大一部分党内精英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而这位59岁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构成不了严重的威胁。在这封信的第一页上斯大林写下“存档”、“哈哈，不务正业的家伙”，在第二页上写了“老糊涂虫。И. 斯大林”，并未给契卡人员下达任何指示。他不打算为这些已被击溃的托洛茨基分子分散精力，以后再收拾他们。

很有可能，斯大林原本是乐意在与农民的关系上找到一种平衡的。但他明白，眼下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顾自己的政策，去帮助那些被他本人击溃的和他身边的“敌人们”。受到作家肖洛霍夫关心的维奥申斯卡亚镇的哥萨克人正是这种情况。

早在1931年1月16日，肖洛霍夫就给斯大林发去极为坦诚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原顿涅茨克州各区的状况毫不夸张地说是糟透了。这样经营是不行的！区里的报刊谨慎地默不作声，地方党组织也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尚存牲畜的饲养工作。每耽搁一天国家就要多花费上千的卢布。

如果不改变现状继续这样“经营”下去，是无法向个体户证明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优越的。集体农庄庄员精神上感到压抑，真该看看他们拖着马的尸体经过个体户院子时的表情，那些个体户的牲畜不但没死，还挺健壮……

再写几行关于肉类收购的事情。牲畜从边远的几个区被调拨到一个站点，怀了犊的母牛、公牛和绵羊都在同一个群里。途中公牛踢了母牛，导致母牛“早产”，小牛犊就在道路上、在草原上，常常在离有住户10—20俄里的地方就出生了，不言而喻，有不少就死在半路上……在奥利霍维罗格和新巴甫洛夫卡两个村庄之间(相距30俄里)，我就看到了3具母牛的尸体。而在新巴甫洛夫卡村里，一头被公牛扎伤了的怀着犊子的德国优种红牛，就从早到晚躺在那里等死。

牛犊在农舍是与孩子们一起长大的，农民会把喂孩子的奶分出来喂小牛犊，或是正好相反。您一定清楚，路边死去的牲畜的景象会对集体农庄庄员的心理

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令人痛心呀！每当你亲眼看到这一切，每当你走过集体农庄的马厩看到那些趴在地上的马；每当你与集体农庄庄员交谈，却看不到他盯着脚下的眼神时，心就在流血。

各个村庄里都游荡着肥得可怕的狗，大路上却东倒西歪地横着一具具马的尸体。可冬天还没过半呢。

斯大林同志！如果给每匹马或每头牛供应 10 普特谷物，甚至不用谷物，糠麸或是剩渣就能拯救这些苟延残喘着的牲畜。但在边疆区，人们忘记了算账，没有算出 10 普特的谷物只值 10 个卢布，而一匹马却值 150—200 卢布。

请派一个委员会到原顿涅茨克地区来吧，到时候您就会确信我告诉您的都是实情。（引自：《作家与领袖：M. A. 肖洛霍夫与 И. В. 斯大林通信集（1931—1950 年）》，尤里·穆林编辑，第 22、23、24—26 页）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退让一步了。1931 年 6 月，斯大林会见了 26 岁的肖洛霍夫。这次会面是由高尔基安排的，前不久他刚给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写信说：“肖洛霍夫非常有才华，可以把他培养成极为出色的苏维埃文学家，应该重视这一点。”

在高尔基寓所里的这场会见谈到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分，这部分描写了发生在俄国南部地区的国内战争，其中所描述的全部详情（对哥萨克的剥夺，枪杀人质）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都是不愉快的。

肖洛霍夫的传记作者瓦连京·奥西波夫记下了这位作家与斯大林的这次谈话：

大家围着桌子坐下。高尔基越来越沉默，抽着烟，一面在烟灰缸上划着火柴。这场谈话下来他用掉了整整一堆火柴。

斯大林发问：“为什么您如此温和地描写科尔尼洛夫将军？应该让他的形象更加残酷。”

我回答：“科尔尼洛夫的行为谈不上温和。但他的确有一些举止和言论符合人们对在军官荣誉准则下培养出来的人和对德战争中的勇士形象的理解，这些人主观上是热爱俄国的。他甚至从德国战俘营中逃跑了出来。”

斯大林大声回应：“这算什么忠诚？！他是反人民的！杀人无数、血流成河！”应该说，这一被揭露的事实说服了我。之后我修改了手稿……

斯大林提出新的问题：“说联共（布）顿河局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待哥萨克中农有过激行为，你是从哪里得来的事实？”

我回答说，小说所描述的恣意妄为是严格的文献记录式的，依据的是档案资料。我说，但历史学家回避了这些材料，对国内战争的反映并不符合生活真实。



他们隐瞒了对哥萨克人进行大肆镇压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独断专行。托洛茨基分子破坏了苏维埃政权与中农的联盟。托洛茨基自己背信弃义。这正是哥萨克的悲剧所在……

会见的最后，斯大林说：“有些人觉得，小说的第三卷让我们的敌人，移居国外的白卫军感到很满意。”他问我和高尔基：“对于这一点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高尔基说：“他们甚至能够把最美好、最正面的东西都曲解为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我也回答道：“白卫军在小说里好的方面很少。我是在表现他们在顿河和库班地区的全面溃败……”斯大林于是说：“是，我同意。《静静的顿河》第三部里对事件的进程描写是为我们、为革命在工作。”（奥西波夫 B.，《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莫斯科，1995 年，第 39、40 页）

尽管小说多处流露出对哥萨克人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同情，但这次与斯大林的会面对于肖洛霍夫却是结果很好的，并且救了他一命。也许，斯大林也是为了要获得一种个人的印象。其结果是，他相信了这个作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亚戈达就在 1931 年仿佛开玩笑地告诉作家：“米沙，你终究还是个反革命。你的《静静的顿河》，与我们相比更倾向于白军。”）

1932 年 1 月，《真理报》上刊登了肖洛霍夫的新小说《通向那里的唯一之路……》的片段。编者按说：“这是一部新小说的一个片段。故事发生在集体化初期北高加索的一个哥萨克村庄里。”（很快小说定名为《被开垦的处女地》。）

报纸上没有说的是，斯大林看过了这部新作品的手稿，并予以认可。

在此之前，手稿一直放在《新世界》杂志社悄无声息：因为其中有剥夺富农的场景，手稿未能发表。

斯大林读完《被开垦的处女地》之后问道：“我们的人在那里闲呆着干什么？我们不怕剥夺富农，那现在把它写出来有什么好怕的！小说应该发表。”

需要着重指出，肖洛霍夫给自己作品起的名称并不是活泼乐观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而是悲剧式的《洒汗流血》，但它随即被改掉了。对于这个新书名肖洛霍夫的评价是“嘿，这真叫人恶心”。

1932 年 6 月 7 日，斯大林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写道：“《新世界》发表了肖洛霍夫的一部新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本有趣的书！看得出肖洛霍夫对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的情况是熟悉的。依我看，肖洛霍夫这个人有很高的艺术才能。另外，他还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作家，所写的东西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不像‘我们’那位不稳定的巴别尔，尽写一些自己完全不清楚的东西（比如说《骑兵军》。”（《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 年）》，第 149 页）

斯大林在日理万机之中挤出了讨论文学问题的时间，这就说明，斯大林赋予了该

问题极其重要的意义。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宣传工作部分借助广播,但主要还是依靠出版物进行的。文学和艺术无疑在发挥宣传优势上占有特殊地位。所以献给“哥萨克的旺代”(旺代,法国省名,18世纪末法国革命时,该地曾发生反革命暴动——译注)悲惨事件却从精神上解除其武装的英雄史诗《静静的顿河》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评价,尽管其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形象具有双重性(其实,麦列霍夫的原型哈尔兰皮·叶尔马科夫1928年已被枪决)。

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的巩固(《被开垦的处女地》),在斯大林看来犹如消除了过去的悲剧一般。因此,他读后的感觉与亚戈达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在这种悲剧性的叙述中看到的首先是政治威胁,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那么读者要问了:“那巴别尔呢?”我想,巴别尔之所以会在这封信中出现,是因为他的小说讲述的是由骑兵第1集团军的顿河哥萨克人参与的国内战争。对于骑兵第1集团军,斯大林了若指掌,对其感觉不像作者写得那么平淡。或者他就是希望人们对骑兵第1集团军的理解不是这样平淡,不是这样生硬。

斯大林与文艺活动家关系的一些研究者说:“不应低估斯大林的文化修养。他不仅对艺术作品和历史深感兴趣,他还研究过对他来说是当代的哲学,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他对哲学已经相当内行了。”(格罗莫夫 E.,《斯大林:艺术与权力》,莫斯科,2003年,第39页)

斯大林对苏联作家作品的态度是一贯不变的,而且这一点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有些像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尼古拉一世,既忙于全面巩固自己的政权,也关注帝国的文化核心。

所以,斯大林及时感觉到了在文化界中由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里革命“狂热者”引发的一场危机。

领导“拉普”的是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亚戈达的连襟(他们娶了斯维尔德洛夫的两个侄女)。

1928年,高尔基在自己60诞辰前夕回到了苏联。斯大林认为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承认了社会主义俄国,并加入到它建设者的队伍中来了。5月28日,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迎接了作家。在作家到来之前,所有的媒体都掀起了一场歌颂高尔基的行动。3月30日,《真理报》刊登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其中高度评价了作家的伟大功绩:“他就是一只光荣的海燕,他用自己的作品的鲜明形象激励工人阶级向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的堡垒发动第一轮猛攻,引导工人阶级进行了我们的第一次革命。”

显然,高尔基的到来必将改变全国文坛的局面。“拉普”的领导人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没有去考虑斯大林的立场,而是开始诋毁这位作家的声誉:“高尔基是一个失去了阶级意识的人,一个社会中间阶层的思想家,这些人是跟在我们后面走进



十月革命的。”(引自批评家 И. 特奥多罗维奇发表于《在文学岗位上》杂志的文章。)

6月和7月,应人民委员会的邀请,高尔基参观了莫斯科许多工厂,去了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第聂伯河水电站、扎波罗热、克里米亚、塔甘罗格、顿河畔罗斯托夫、梯弗利斯、埃里温、弗拉季高加索、斯大林格勒、萨拉托夫、喀山、下诺夫哥罗德。他的这次旅行仿佛是将社会主义建设神圣化了,没有发出任何类似《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批评。

在高尔基这次凯旋之后,斯大林难道能不重新考虑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前途?何况阿韦尔巴赫和他的拥护者还对马雅可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普里什文和众多其他“异己分子”、“敌人”及“资产阶级文学代理人”进行了抨击。

1932年4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不久就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所有文学团体的代表都参与了进来。8月,成立了全苏筹备委员会(名誉主席是高尔基,主席是伊万·格隆斯基)。共青团员、诗人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满怀热情地喊出了一个反映出大部分作家心声的口号——“粉碎拉普的领导!”

斯大林使作家生活民主化,实际上就是决定结束革命不容异说的时期,并撤销这个“文学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32年10月26日,在小尼基茨科街上那个革命前属于列布申斯基的高尔基的寓所里,斯大林再次与肖洛霍夫会见。这次会见是领袖与作家们的一次集体会面,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瓦连京·卡塔耶夫、利季娅·塞富林娜、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弗拉基米尔·扎祖布林、萨穆伊尔·马尔夏克、费奥多尔·潘菲洛夫等。

对于此次会见没有任何报道,只有文学研究家科尔涅利·泽林斯基对此留下了一些记录。

在高尔基和斯大林请大家发言后,作家们开始相继发表了意见。

“斯大林同志从眉毛下飞快地打量了一圈所有在场的人……”

塞富林娜突然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政治话题上。“她以一种出乎众人意料的尖锐语气,表示反对高尔基提出的将几位前拉普的领导人列入筹备委员会的提议……”。(这里说的是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此时的拉普,这个由亚戈达那位“狂热”的连襟 И. 阿韦尔巴赫领导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已被解散。)

这一下引起纷纷议论,大家试图让塞富林娜安静下来。不过斯大林允许她把话说完,然后发表了自己对拉普的看法:“散布恐怖”,随便地排挤他人,而又难于将人们吸引到自己的一边来。我们为什么解散了拉普?正是因为拉普脱离了无党派的人士,因为它不再干文学方面的事。他们只是在“散布恐怖”。而“散布恐怖”,这是卑微

的,应该“散布信任”。

辩论之后用了晚餐。斯大林谈到了《静静的顿河》,谈到了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还是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高尔基建议肖洛霍夫也发一下言,但后者拒绝了,什么也没有对领袖说,一句话也不曾说。但这种谦逊(或者说是自尊)却令斯大林高兴,他提议干杯:“为肖洛霍夫!对了,我忘了还要对你们说的是,生活本身在淬炼人。而你们在帮助改造人的灵魂。人的灵魂,这是重要的产品,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作家们和为他们当中最谦虚的一个,为肖洛霍夫同志而干杯!”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会见时斯大林竟说了两起不寻常的事件,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内心的感受。

斯大林继续说:“列宁,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有一次,只有我们两人时,他请求我拿些氰化钾给他。‘您是党内最冷酷无情的人’,列宁说,‘您能做到这一点。’”

领袖还说道:

“有一些人反对旧的事物,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切老传统都不好呢?是谁这样说的?你们认为,在此之前的一切都是坏的,一切旧的都需要消灭,而新事物只能从新的当中创造?”

“这是谁告诉你们的?伊里奇一直说要我们提取旧事物中的精华并从中创造出新事物。我们要净化旧事物,并为新事物而有所提取,为我所用。我们有时会借助传统的外衣,好让我们暖和一点。请勇敢些,别急于一下子全都消灭掉……”(奥西波夫 B.《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第 57 页)

为什么斯大林竟承认了列宁对他“冷酷无情”的评价?

也许,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了他对死于饥饿的那些农民的悲惨命运的反思,如同普希金的“双眼带血的男孩”的悔过。但更可能是他想对列宁的评价提出异议,以证明他非常了解自己所奉行的政策的多重意义。

为什么他开始维护“旧事物”?与大多数民众一样,他的艺术品位是传统的。与作家谈论这个,斯大林是给他们指出要以文化的继承性为方向。

同时,他表面上的平易近人是不足为信的。尽管听到了塞富林娜对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构成的意见,斯大林还是将“散布恐怖”的 Л. 阿韦尔巴赫和 B. 叶尔米洛夫留在了其中。这样的人是需要的。

就是对为肖洛霍夫干杯一事也无需感到迷惑。作家 B. 韦列萨耶夫的日记里有一段肖洛霍夫讲述 1932 年与斯大林会面的记录:当这位《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作者开始谈论集体化的暴行时,斯大林默默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所以,报刊上未登出斯大林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次会面的任何消息:这次斯大林的表现实在太复杂了。



1933年初,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发去一封极为开诚布公的信,信中谈论了1932年秋派到顿河全权代表的众多工作实况。他得到了两次回应。第一次是一个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什基里亚托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被派到了顿河地区(1932年秋,他曾是赴北高加索的卡冈诺维奇的那个委员会的成员)。

作了这番补救之后,斯大林给肖洛霍夫发去第二封信,可以称之为毫不留情的一封信。肖洛霍夫与斯大林的对话充满着悲剧性。

下面是肖洛霍夫举出的一些实况。

我看见了一些至死都不可能遗忘的景象:在列比亚任斯基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晚,寒风凛冽,连狗都冻得躲了起来。几户被扫地出门的人家在小胡同里燃起篝火,围坐四周。孩子们被破布片裹着,放在篝火边暖和的地上。小胡同的上空回荡着孩子们连续不断的哭叫声。难道可以这样侮辱人吗?

……之后,这个地区执行了一条更加强硬的路线。被赶出家门的人们有冻死的了。在巴兹科夫斯基集体农庄,一位带着吃奶孩子的妇女也被逐出家门。整夜她都在村里来回奔走,求人放她和孩子进屋取一会儿暖。但没有人敢放她进去,大家都怕自己因此也被赶出家门。清晨时分,孩子冻死在母亲怀中,母亲本人也被冻伤了。逐出这位妇女的是一个预备党员,他是巴兹科夫斯基集体农庄的工作人员。孩子冻死后,他被悄悄地抓进监狱。抓起来是因为“过激行为”。为什么要抓他?如果抓得对,那么为什么济明同志还逍遥法外?被冻死的人的数量无法确认,因为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统计感兴趣或会感兴趣,同样也没有任何人对饿死的人的数量发生兴趣。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量的成年人和“生命的花朵”在街上过了两个月的严冬之后,在雪中过夜之后,将随着最后一场雪一起离开人世,而那些活下来的人也将成为半残废。

但这种逐出家门还不是最主要的。下面是他们搞到593吨粮食所采取的种种方法:

1. 大规模拷打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
2. 关“看守所”。“有地窖吗?”(即藏有粮食的地窖——作者注)，“没有。”“去,去仓库呆着吧!”集体农庄庄员被脱得只剩下内衣,赤脚坐在仓房或板棚里。处罚时正是一二月份。常常整个生产队的人都被罚坐在仓房里。
3. 在瓦夏耶夫斯基集体农庄,往女庄员的腿上和裙子下摆上浇煤油,先点着,然后扑灭火苗问:“说,地窖在哪儿?不说我再点上!”还是在这个集体农庄,让受审人站在一个坑里,埋上半截土之后继续审问。
4. 在纳波洛夫斯基集体农庄,区委特派员、区委候补委员普洛特金在审问时,强迫受审人坐在滚热的炕上。被迫坐下的人大叫,说太烫不能坐,这时就用

杯子往他身上浇水，然后把他拉到寒风中“乘凉”，再锁进仓房。从仓房里拉出来时，再次上火炕受审。就是他(普洛特金)逼得一位个体农民开枪自杀了。他把左轮手枪递到那个农民手中说：“开枪吧，如果你不动手，我就亲自开枪！”农民扣动了扳机(他不知道手枪上了子弹)，砰地一声，他昏迷倒地……(引自：《作家与领袖：M. A. 肖洛霍夫与 И. B. 斯大林通信集(1931—1950年)》，尤里·穆林编辑，第48—52页)

斯大林做出回复：

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

正如您所知道的，您的两封信都收到了。您要求的援助，已经提供。

为了了解情况，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将前往约奥申斯卡亚区去找您，我恳请您对他给予协助。

情况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全部，肖洛霍夫同志。因为您的信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片面。对此我想给您写上几句话。

为了这些信，我向您表示感谢，因为它们揭露了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痛处。揭露了这样的现象：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摧毁敌人，却无意地打到朋友身上，甚至到了暴虐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看到了一个方面，看得不错。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件不是散文，通篇都是政治)，应该去观察，应该学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恰是你们区的(也不只是你们区的)尊敬的庄稼人在“耍滑头”(暗中破坏!)，他们才不在乎让工人、红军没有粮食吃呢。

这种暗中破坏是平静的，从外表上看是不伤人的(没有流血)，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尊敬的庄稼汉实质上是在与苏维埃政权进行着“无声的”战争。这是向饥饿宣战，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

当然，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如您确认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所犯的种种胡作非为是正确的。

对这些胡作非为负有罪责的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尊敬的庄稼汉们并非是远看感觉到的那种不含恶意的人。祝一切都好，握您的手。

您的 И. 斯大林。(引自：《作家与领袖：M. A. 肖洛霍夫与 И. B. 斯大林通信集(1931—1950年)》，尤里·穆林编辑，第68、69页)



一切都讲得很清楚:这是“向饥饿宣战”。从斯大林的笔调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失望和傲慢。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位他寄予厚望的著名作家,原来和其笔下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个样。

在这里,斯大林并没有获胜。

虽然肖洛霍夫没有像安德烈·普拉东诺夫那样受到惩罚(关于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贮备》,1931年5月斯大林写道:“这是我们敌人的代理人讲述的故事……”),但之后他一直作为不十分可靠的苏联文学经典作家处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监视之下。

说到1933年春天肖洛霍夫与斯大林之间的通信,就必须说一说发生在1932年11月8日的斯大林个人生活的悲剧——他的妻子开枪自杀了。正如很多回忆录的作者说的那样,在妻子去世后,斯大林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基督教的观念里,自杀是极可怕的罪孽。自杀者脱离了上帝的庇护,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撒旦,并向尘世复仇。“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就是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卷首关于自杀者的题词。

斯大林明白,这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惩罚他。从此时开始,他将忍受这个惩罚带来的痛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无力改变。对于知道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斯大林来说,承认自己对挽救妻子无能为力让他倍加难以忍受。她把他抛到了生存的最底层。他刚才还是半人半神,是精神、军事和政治的领袖,而转眼间一切成空。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1月7日,一整天娜杰日达头痛得厉害,好几次痛得大叫。

11月7日,这是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是一个和往常一样的寒冷和阴沉的秋日。室外寒气逼人。从早晨开始,娜杰日达就参加了工业学院的节日游行,并与大家一起向站在刚刚落成的国家领导人大理石陵墓的观礼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和自己的约瑟夫致敬。游行之后她走到列宁墓右边的看台,两个孩子,瓦西里和阿尔乔姆就站在那儿(斯维特兰娜留在了祖巴洛沃的别墅里)。她在与孩子们谈过一阵后,就决定带着他们一起出城。

第二天,斯大林和妻子在伏罗希洛夫家吃晚饭,就在用餐时两人之间突然爆发了争吵。

对于这次争吵,存在着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娜杰日达因丈夫向军事长官叶戈罗夫(未来的元帅)的妻子(或是政治工作人员古谢夫-德拉布金的妻子)献殷勤而猜忌起来;第二种说法是,因斯大林粗鲁地说“喂,你!喝一杯”,她感到受辱;第三种是说他把一个面包团向她扔了过去(有时候他就是这么和孩子们一起玩的,朝他们或是扔糖果或是扔果壳);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扔了烟头。

斯大林的警卫员对所发生的这一场景做了补充。

聚到一起的人们讨论起了反对派的动作,有人提议为即将到来的战胜反对派的胜利干杯。但阿利卢耶娃却没有喝酒:由于头疼她喝不了红酒。正是这时,斯大林“粗暴地”问:“你怎么不喝呢?”(雷宾 A.，《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莫斯科,1992年,第7页)

娜杰日达勃然大怒,离开了晚餐现场,但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追上了她,并陪着她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一直到娜杰日达平静下来。

次日早晨,人们在她卧室里发现了胸口带着弹伤的她,旁边放着一把她哥哥帕维尔送给她的精巧的“女士”手枪。

关于她的死亡流言四起:有说是斯大林开枪打死了她,有说是她支持“右派”、成了他的敌人。谣言终究是谣言,但这些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一个年仅31岁的美丽少妇、两个孩子的母亲,的确神秘地死去了。

所有那个时代的人都说她是迷人和美丽的,都说照片没有能够表现出她的美丽。

她的死亡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有太多状况一起累积到了1932年的秋天,其中因吃醋而神经反常或是受到羞辱,肯定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不可能猜出这个谜底,但可以列举出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一系列的个人问题。

这些问题如下。

不利的遗传基因:她的家族里出现过心理脆弱的人。长期身体不适:严重的头痛和胃痛。学业上的困难。逐渐加大的她与丈夫之间在精神、家庭和政治上的距离。以及被农村的饥荒和斯大林集团的政策搞得惊惶不安的党的高层出现的分裂。

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补充一个长期隐瞒在家中的秘密:斯大林的妻子经常无法自控,会为一些琐事与丈夫争吵,争吵时甚至有外人在场也口无遮拦。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就证实,娜杰日达好几次说过要自杀。

11月8日晚,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突然感到,一切充实着她生活的东西都破裂了。

据说,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一封绝笔信,此后这封信被斯大林销毁了。

还有人说,那不是信,而是通常所说的指责斯大林使国家陷入崩溃的“柳京纲领”。

是的,信和“纲领”都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但这不足以改变总的情况。

阿利卢耶娃深陷孤境。如果她眷恋着孩子,那她也永远不会扔下他们。但是,据我们所知,她对孩子比较冷淡。

在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回忆录里鲜明地描绘出了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的形象:



妈妈对待我们这些孩子是严格的，铁石心肠，难于接近。这并不是她生性冷淡，不是的，这是出自她内心对我们、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记得妈妈非常美丽，而且想必不只我一个人这样认为。我已经记不清她准确的面容，总的印象是美丽、优雅、步履轻盈、气味芳香。这是我童年潜意识的记忆，这就是她的外表和她的气质给我留下的感觉。她很少爱抚我，而我的父亲总是把我抱在怀里，大声说爱我，清脆地吻我，温柔地一声又一声地叫我“小麻雀”、“小苍蝇”。有一回，我用剪刀把新桌布剪了个口子。天啊，母亲打得我手好疼！我大哭起来，以致把父亲都引来了，他抱起我，安慰我，亲我，好不容易让我安静了下来……有几次，他也是这样使我免受了拔火罐和贴芥末膏药之苦，他听不得孩子的哭叫声。妈妈却是哀求不动的，总是责怪父亲对我们的“娇惯”。

这是唯一一封得以保存的妈妈给我的信，写于1930年或是1931年。

“你好，小斯维特兰娜！”

“瓦夏写信来，说小姑娘有点过于吵吵闹闹。收到这样一封讲小姑娘的信实在是太让人郁闷了。我认为，留在家里的是一个懂事的大姑娘，谁知她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主要的是还不能像大人那样生活。小斯维特兰娜，我请你和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谈一谈，看怎样把你的一切事情安顿妥当，让我今后不要再收到那样的信了。一定要谈谈，然后和瓦夏或是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给我写封信，说说你们关于这一切是如何商定的。当妈妈离开时，小姑娘承诺了很多很多，但结果做到的却很少。

“你一定要回答我，你决定今后如何生活，是像以前一样，还是换一种方式。

“好好想一想，小姑娘已经长大了，能够思考了。你在读什么俄文书呢？我等着小姑娘的回答。

“你的妈妈。”

这就是全部。没有一句温存的话。那个“大姑娘”（那时我只有五岁半或六岁）的过失想必是无足轻重的；我是一个安静和听话的孩子，但对我的要求却是严厉的……

妈妈和我们相处的时间极少。她总是忙于学业、工作、党委托的事务和社会活动，她常不在家……

所有的一切原因在于妈妈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并倔强地捍卫这一原则。妥协不是她的性格。她属于革命新生代，是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热心拥护者和劳动者，他们是新生活坚定的建设者，他们是全新的人，并坚信着自己的新的理想，这是被革命从市侩习气和以往一切恶习中解放出来的人的理想。妈妈带着革命理想主义的热情信仰着这一切，而且当时她身边的确有很多人都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她的信仰。

对她来说,在这些人当中父亲是新新人类的最高体现。

他在当时这位年轻的女学生眼中就是这样的人:一位刚从西伯利亚归来的“坚强的革命家”,她父母的朋友。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的,但不是永远这样……

我的保姆告诉我,妈妈在去世前异乎寻常地忧郁和烦躁。有一次,她的中学女友来做客,她们在我住的小房间(那里一直是“妈妈的会客室”)里坐下来聊天。这时保姆听到妈妈反复在说:“一切都让人厌烦”、“一切都让人反感”、“没什么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情”。于是女友问:“那,还有孩子,孩子们呢?”“所有一切,包括孩子。”妈妈重复道。

我的保姆明白了,既然如此,那就说明她确实已经厌倦生活了……但是我的保姆和其他人一样,再也想不到,几天之后她会自杀……(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79—81, 86、87 页)

女儿强调了她的“自我克制”、“异常的内在的自律和压力”,以及“犹如弹簧那样绷得越来越紧的不满和烦恼”。这些,当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谜底在哪里?

谜底在于这些情况的综合,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革命新生代”已死——革命结束了。

她和丈夫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但从左轮手枪射出的子弹穿透了两个时代,也刺伤了斯大林。

按照女儿的回忆,斯大林不明白这种自杀背后的玄机,他问身边的人:“难道我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 难道我没有像对妻子、像对一个独立的人那样去爱她和尊重她? 难道我不能多陪她去一次剧院就那么重要?”

即他完全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在像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

从另一方面说,要求他摆脱这种幻境也是不公平的,这需要站在很高的高度。他毕竟身处其中,终究只是一个试图改变历史然也难免一死的不幸之人。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思考母亲之死时,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意见:“在那个时代,人们真是特别地充满情感、真心实意——如果他们觉得活不下去了,他们就自杀。”(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93 页)

这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她还举了一个不久前(1930 年 4 月 14 日)36 岁的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的例子,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位“革命的代言人和歌颂者”之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谁能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就是因为那不可割舍的爱情呢? 托洛茨基就准确地看出,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对待历史随随便便,而对待革命则以‘你’称呼的人”。但革命已经结束了。



11月10日,几个男人把装殓着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遗体的棺木从斯大林的寓所抬到游戏宫。那天寒风刺骨,斯大林跟在棺木旁前行,他用裸露的手托着棺木的边缘,泪水沿着他的脸颊缓缓而下。他是如此悲痛欲绝,以至亲友们都为他感到担心。

追悼会在以前曾是召开贵族会议的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里举行,乐队奏着哀乐。逝者平躺在鲜花环绕的棺木中。她的面容安详而美丽。

政治局的全部委员都陪着斯大林,一旁站着孩子们和所有的亲戚。6岁的斯维特兰娜被人抱着走近棺木,可她吓坏了,哭了起来,于是被抱走了。

斯大林也哭了起来。瓦西里扑进父亲怀里叫喊着,让父亲别哭了。

这片刻令人伤心落泪。

但更为沉重的是棺木合上前告别的那一幕。斯大林突然托起妻子的头,开始边痛哭边轻吻着她。

莫洛托夫的回忆则有所不同:“我清楚地记得,在出殡前永别的一刻,斯大林走到棺木前,两眼含泪,非常悲伤地说了一句‘没保护好’。我听到了,并记住了这句‘没保护好’。”

卡冈诺维奇致了悼词:“我们,斯大林的朋友,认为自己有责任减轻妻子之死给他造成的痛苦。”

虽然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过,斯大林自己从未去过新圣女公墓,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去过那里,并与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作了告别。

斯大林的警卫员在自己朴实的回忆录里给了一个重要的证明:“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会夜里驱车去墓地,走进小亭子,呆在那里,沉默地一袋接一袋抽着烟斗……”(雷宾 A.《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莫斯科,1992年,第7页)

我们可以想象,寒冷的冬夜,修道院旁墓地一片寂静,坟墓上和十字架上落着闪着银光的积雪,一个鳏夫孤独的身影。他的痛苦没有人能够看得到。他在为她向上帝祈祷吗?他在忏悔吗?

将妻子埋进墓地(而不是当时通常的火葬),斯大林没有违反东正教的传统,东正教的传统认为放入“地狱的”熔炉里焚烧是撒旦的做法。

为了做个比较,我们举出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弟弟、漫画艺术家鲍里斯·叶菲莫夫的一段叙述,正是他通过专门的小窗口观察到了马雅可夫斯基遗体的火化过程:敞开的棺材被传送带送入熔炉,诗人的头发刹那间燃烧起来,转眼间火焰吞噬了一切。斯大林不想把自己的娜杰日达送进这样的火焰之中。(1939年,列宁的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去世后,她的遗体随即被火化。)

妻子的死亡是斯大林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而且很快整个国家都感受到了这一变化。刚开始仅是一些表面的改变。他不想住在原先的住

所,那里满是已逝者的气息,他与布哈林交换了寓所。

“这套房子相当不适合居住,处在枢密院大楼的附属二楼,是由卡扎科夫建造的。过去这里仅是一条长廊,长廊的一边建有一些房间。这些房间单调乏味,毫无个性,有着一米半的厚墙和拱形天花板。

“把这原先的设施改建成父亲的寓所,仅是因为他的办公室——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官方办公室就在同一座楼里的第二层,从这里回去非常方便,只要一下楼就直接‘回到家里’吃饭了。晚餐一般在晚上 6、7 点到夜里 11、12 点之间吃,晚餐后他会坐车去近郊别墅。而第二天下午 2 到 3 点,他又回到了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里。这种作息制度他一直持续到战争开始。晚餐时,他能够在寓所看见我们这些孩子,这时他会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查看我的成绩册的分数,有时还让我们出示练习本给他看。直到战争爆发前,如同所有的家长那样,他亲自在我的成绩册上签字,也会在哥哥的成绩册上签字(直至 1939 年他去空军特种学校上学为止)。那时我们总是经常见面,几乎是天天见。

“那时他还继续带我们去索契度夏。外祖父、外祖母、帕维尔舅舅和舅妈、列坚斯和斯瓦尼泽两家依旧来看望他。大家一起到父亲的近郊别墅给谁过生日或是过新年,也一起去索契度假。

“但这一切已经从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父亲。家也变了样……”(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98、99 页)

斯大林的生活中突然出现的这一空缺逐渐地由契卡指派的女服务员弥补上了,她是由亚戈达和行动局局长卡尔·保克尔挑选的。

斯大林开始很少去祖巴洛沃了。位于孔策沃的木栅栏里带有七个房间的简朴别墅就成了他的官邸,那儿不时能够听到由基辅货站传来的挂钩的叮当声和汽笛的长鸣声,以及从邻村达维特科沃传来的手风琴声。这座别墅被称为“近郊”别墅,在那儿,在情报部门的照看和守护之下,斯大林度过了此后的时光,而这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新的影响力。

斯大林未必能认识到,他与阿利卢耶夫和斯瓦尼泽两家亲戚的疏远会导致什么结果。面对这些亲戚,斯大林会觉得自己有罪,但正是这些亲戚构成了他家庭堡垒外层的防护带。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拉夫连季·贝利亚很快就有了巨大的影响,若是不喜欢他的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还活着,他是不可能到达这一地步的。

而斯大林孩子们的失去常态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的个人悲剧就是始于 1932 年 11 月 8 日,并随着他们的长大成人,残酷无情地横在斯大林的面前。

下面是一段有关斯大林新生活初期的富有表现力的描述:



这套有 7 个房间的单层别墅是日以继夜赶建出来的。斯大林的卧室大概有 20 平米。大厅的墙壁上贴有油漆过的橡木板，房间里基本上都是贴着麦秸，接合处也用这种材质的木板盖住。从某处运来了一张双人木床，我们轮流在上面睡过觉，后来被斯大林要过去了。别墅里没有什么游泳池或桑拿房，没有任何奢侈的东西。只有客厅里漂亮的镶木地板显得有些气派。

别墅建成时来查看的有 И. В. 斯大林、К. Е. 伏罗希洛夫和 С. К. 奥尔忠尼启则。年迈的设计师梅尔扎诺夫按照旧俗摘下帽子，并用左手持帽贴在胸部、而右手向客人们致意。最后大家登上宽敞的露天阳台，陪同他们的 Г. 亚戈达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因此他留在了下面，站在自己的车边。卫戍司令叶菲莫夫和他的助手莫茹欣验收了别墅。而我和戈隆达耶夫开始承担斯大林贴身警卫的任务。他来这里次数越来越频繁，后来就固定住到了这儿。他总是乘坐那辆黑色的“帕克德”来克里姆林宫。有时在工作之余，他会在阳台上休息一下，下雨时会躲到小木亭中避雨。（雷宾 А.，《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莫斯科，1992 年，第 4 页）

在这里什么东西惹人注目？斯大林身边一个亲近的人也没有。

他依旧时而与亲戚们来往，但次数越来越少。

早在 1927 年，侨民作家马克·阿尔达诺夫就这样描述了斯大林：“对于斯大林来说，不仅仅别人的生活无足轻重，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也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有着明显的不同。”

而这个刚刚失去自己生命另一半的人必须回到国家大事当中去。

有一种说法，有那么一刻，他支持不住了，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要辞去职务，但他的同志们理解他的情绪，并没有讨论这一话题。

葬礼是在 11 月 11 日举行的，第二天斯大林就已在克里姆林宫工作起来了。根据来访者接待登记簿的记载，当天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和莫洛托夫从 16 点至 19 点 25 分都在他这里。除此之外，到他这里来的还有李维诺夫、加拉罕、马努伊尔斯基、拉狄克、来自塔斯社的记者伊霍克等人，不过他们在斯大林办公室的时间要比政治局委员们短得多。

以后的日子里，斯大林一直在满负荷地工作。他接见政治局委员、中央和各州委的书记、契卡人员和人民委员们。基洛夫常常到他这里来。（《历史档案》，莫斯科，1995 年，第 2 卷，《И. В. 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来访者》，第 128 页）

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娜杰日达。她的身影常常浮现在他的眼前，在亲近的人面前，他时不时责怪自己“没保护好”。他的内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忆：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当她落入大海时，他把她救了上来；当她是中学生时，他给她朗读契诃夫的小

说；然后她成了他年轻的妻子……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道：“他从未去过她在新圣女公墓的墓地。”事实是，斯大林对谁也没有说过此事。他长期独自承受着痛苦，差不多直至离开人世。

用女儿的话说，只有到了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斯大林才开始和她经常谈起母亲的死亡，“这让我感到极为惊讶。”

他在寻找有过错的人。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其中就包含着自责和忏悔。

1933年的冬天，是艰难的1932年秋天的延续。

乌克兰持续饥荒，有2000名集体农庄的主席和该共和国数十个区的普通干部被捕，党内分裂加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给人民委员、1907年起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H. B. 爱斯蒙特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交通运输总局局长、1904年入党的老党员、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B. H. 托尔马乔夫两人因谈论关于打倒（撤掉）斯大林的问题而相继被捕。1933年1月，爱斯蒙特与托尔马乔夫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处监禁三年。同时，与此案有牵连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前中央委员会书记A. П. 斯米尔诺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与此案有关的还有M. H. 柳京一案。1914年入党的柳京曾是击毙A. B. 高尔察克将军的伊尔库茨克布尔什维克（省执委和省委）的领导人，参与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镇压，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据说，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临终前读的正是这份“柳京纲领”（“国家变得穷困潦倒，被抢劫一空，一贫如洗，到处光秃秃，一片饥荒，领导和支付能力被彻底摧毁，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心，处于恐怖、凶险之中，完全就是一个火药桶，一切越来越在走向绝境……”）。1932年10月，在第聂伯河水电站盛大起运之际，柳京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处以十年监禁。

斯大林毫不怀疑，所有这些发生的事件从国外是来自托洛茨基，而从国内则是来自中央委员会本身，关于撤掉他的谈话，也就是有关国家政变的讨论和计划。他现在的敌人都经过地下斗争、革命政变和国内战争的磨练，这些人可以比之为毫不留情的武器，会思考的武器。（我们记得，司徒卢威就曾称列宁是“会思考的断头台”。）

有趣的是，在已经对爱斯蒙特和托尔马乔夫的案件展开调查之后，1932年10月13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会见了爱斯蒙特，并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从13点30分一直到14点30分。斯大林应该是想亲自弄清楚这位人民委员持反对立场的原因何在，何况这位人民委员与米高扬的关系密切，是米高扬在苏联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副手。

爱斯蒙特没能让斯大林相信自己是无辜的，11月24日他被逮捕。



12月17日,斯大林在给伏罗希洛夫的电报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爱斯蒙特-托尔马乔夫案件与柳京案件类似,不过不是那么明确,并且从头至尾充满了酒精味。正在爱斯蒙特-李可夫的伏特加酒的周围形成一个反对派集团,要猎获的是托姆斯基的野猪,我重复一下,是托姆斯基的,而斯米尔诺夫的咆哮和莫斯科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不过是甜点而已。

我感觉身体还是不好,睡得少,恢复得也差,但在工作中是看不出来的。致意。12月16日。斯大林。(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596页)

字里行间透露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钢铁般的意志。

谁能帮助他呢?没有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基洛夫可以,他与基洛夫早在1925年就彼此交好了。

紧随着“爱斯蒙特与托尔马乔夫案件”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破获一批新的案件:拖拉机制造中心的破坏活动、乌克兰的反革命地主组织,以及把“富农分子”从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州驱逐的案子。

斯大林埋头于日常事务中。当时对他最为重要的是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他应该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

问题在于未能实现“四年完成五年计划”,尽管总体上生产高速增长,也建起了一些采用新生产设备的工厂。

毕竟1932年的主要经济指数只达到了如下所示:原计划要生产1000万吨生铁的,结果只炼出了620万吨;原计划要产出1040万吨钢,只完成了590万吨;而开采7500万吨煤的计划实际只完成了6440万吨。

斯大林明白,如果列出这些具体的数字会被看成是半失败的标志,于是报告的基础部分就变成了用苏维埃经济与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西方国家做比较,并且引用了欧美媒体上的有力数据来证实这一点。

这样一来,他借自己的批评者之口说出了真相,同时又借用还是由西方发出的另一个真相来驳倒了前一个真相。

确实,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制造厂、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的汽车制造厂、第聂伯河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的冶金联合厂、乌拉尔地区的几家机器制造厂和化工厂,这一切都是事实,全国共建有25万个新的大型企业。

斯大林引用了英国商人基勃逊·札尔维的话:“今天的俄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理想的国家。”这里说的同样是事实。

被引用的话还有:“俄国已开始‘用机器来思想’。俄国正在迅速地由木材的时代

转换到铁、钢、混凝土和电动机的时代。”他继续说道：从前我们没有黑色冶金工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化学工业，而现在都有了。煤、石油的开采量和电力生产方面，我们国家已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工业品的产量与1913年相比增长了两倍多，而与1928年相比超过了一倍。

同时，斯大林也承认，五年计划的总纲领还有6%没有完成。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邻国拒绝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远东方面发生了纷争，我们为了加强国防，不得不立刻改建一批工厂来制造现代化的国防武器。”

的确，1932年9月，日本拒绝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在中国一侧的苏联边境加强了兵力。苏联的指挥部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高。

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特种机械(坦克)制造托拉斯，同年就生产出了1754辆新型坦克(1933年2月，因在红军装备更新方面作出了杰出成就，M. H. 图哈切夫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1932年，还开始组建太平洋舰队，而1933年则开始组建北方舰队。航空工业也得到了质量上的更新。

危机后的德国失去了几乎一半的工业潜力，整个1932年其国内政治斗争激烈、政局动荡不定。这个国家在苏联的重建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它那里发生的变化使克里姆林宫深感不安。有可能失去德国援助这一前景使得苏联惊慌失措。此时德国的政治精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而另一派则是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两方势均力敌。11月，一群银行家和企业家给兴登堡总统上书请愿，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以平息全国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1933年1月初，在银行家施罗德于科隆市的家里举行了一场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蒂森、施罗德、菲奥格莱尔、科尔多夫)和右翼政客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决定将政权转交给法西斯分子(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斯大林在全会的发言中，既没有点德国的名，也没有点日本或是波兰的名。他有另外的任务：要让党的积极分子相信自己方针的正确性。

“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党仿佛在鞭策国家，督促它向前奔驰。”(斯大林Ⅱ，《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3页)

他不得不使用了一个并不是很激昂慷慨的词——“鞭策”。

但斯大林并未呼吁内部停战。相反，他说阶级敌人的“残余”“分散在我们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中”。他们憎恨苏维埃政权，憎恨“新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形式……并且他们当中某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斯大林不可能承认，他认为国内的局势是令人不安的。他的报告洋溢着胜利者的激情。

但是，在他那句“钻进了”党内的敌人人们的谨慎话语之下，战友们应该能够听出这



是一种警告。的确,1928年至1932年间,党员人数从150万上升到370万,正如去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工作过的卡冈诺维奇的委员会与莫洛托夫的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其中有很多“见风使舵者”和“机会主义者”。

在报告结尾,斯大林稍稍揭示出了一点真实的画面:

必须注意到,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剧。恰恰是因为他们正在死亡和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被历史淘汰的人用尽一切破坏和污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

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这当然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想迅速肃清这些分子以避免意外的牺牲,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一切。

正因为如此,革命警惕性是布尔什维克现在特别需要的品质。(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1、212页)

他没有承诺要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

国内战争其实并未结束,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很快,2月19日,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手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其中稍微透露出了一些现实问题的个别细节,不过总体上还是在宣传鼓动。他布置了让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的任务,说党已经纠正了“误解”,已将奶牛还给了集体农庄的庄员们。

这次代表大会理应起到巩固集体农庄和促进春耕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为什么要把农民集中到首都来,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从事自己的主要工作吗?

原因在于饥荒在继续,并且必须尽快摆脱它的后遗症。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肖洛霍夫写信给斯大林说,约奥申斯卡亚区在“走向灾难”。

稍早一些的时候,1月2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份《关于防止饥民大量出逃》的指令。饥民群体的离乡行为被看成是“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反革命企图”,目的是反对集体农庄。签署这份指令的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到3

月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各部门已经逮捕了 219460 人。

不知何故,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 1933 年 1 月做出的一项决议只字未提,即在农机站组建政治部,并派 17000 名党员(其中有很多契卡人员)去进行工作。这些政治部原本应该在农村建立起党的管理支柱。但是,除了强力压制之外,他们还应该做点什么来帮助受难的民众。

于是,政治局不得不采取了与“鞭策”工业政策相反的特别措施。

1933 年 2 月 25 日,人民委员会下令调拨给乌克兰 32 万吨粮食,给北高加索调拨 24 万吨。伏尔加河下游和其他一些地区也得到了相应的救助。到 1933 年 4 月,乌克兰得到的实际援助超过了 56 万吨,其中食品有 8 万吨。

如果将卖到国外的粮食数量与拨给内需的粮食数量相比,那么仅支援乌克兰一地的粮食就要超过出口粮食总量的 60%。1933 年上半年,受灾地区获得的粮食要比同期用于支付贷款而出口的粮食多出 2.5 倍。

尽管降低粮食出口量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但苏维埃政府还是走了这一步。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当各种商品的价格普遍暴跌,而苏联的债务却在可怕地增长时,斯大林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说实在的,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不停地做出艰难的抉择。正如我们所见,他试图保持一个平衡:稳住粮食的出口。但这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他不能做出超过他自己为这个国家设定的那个界限的事情。

除了全球性的危机,需要面对的还有一系列问题:1932 年的歉收、统计数据的错误、对外经济债务的增长、西方债权国要实施惩罚性制裁的威胁、新一轮的战争威胁、党内领导层出现的反对加快现代化方针的反对派……

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支付外国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根本不是粮食出口,而是石油、木材和毛皮的出口。

1932 年至 1933 年间,石油的出口额近 7 亿卢布,木材的出口额也是这么多,而粮食出口额是 3.89 亿卢布。1933 年毛皮的出口收入也超过了粮食的出口收入。

1932 年的粮食出口紧缩到 180 万吨(1930 年为 480 万吨,1931 年是 520 万吨)。

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过度地出口粮食,而在于建立了战略储备,这是苏联第一次引进这样的机制:将集体农庄的粮食储存在国有粮仓中。当政府了解到灾难的规模时,它已经无力有效地帮助民众了。正如 C. Г. 卡拉-穆尔扎所说的那样:“技术治国的社会工程出现了巨大的事故,这对广大群众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有人说 1932 年至 1933 年间,发生过一场政治大屠杀,这要么是误解,要么就是要破坏斯大林的威信。他的活动是如此的充满悲剧色彩,因此,这样的篡改只不过是使历史庸俗化,淡化了它的历史意义。



在一月全会上,宣布要再次在党内进行清洗。联共(布)党员的数量空前增加,达到了近 400 万人,但其新党员成分的纷繁复杂却让人忧心忡忡。4 月 28 日,中央委员会确定了哪些人是这次清洗的目标: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企图阻挠党的政策的两面派、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人、对党的决定持怀疑态度的人、蜕化分子、自私自利分子、道德败坏分子、不了解党的纲领章程和基本决策的政治上不合格的人。

本应在五个月内完成的这一轮清洗实际上持续了一年半时间。有 18% 的党员被开除,15% 的党员自动退党。

党理应清除掉犹豫不决和意志薄弱的人,回到原有的战斗状态。

历史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证实,即使是从指责斯大林的角度来看,得出的惊人事实是:“1933 年到 1936 年间,所谓的党内清洗其实是清除这种意志薄弱者(无能为力者——作者注),而非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格蒂 A.《斯摩棱斯克的党和清洗——美国历史文献中的斯摩棱斯克事件》,第 290 页)

斯大林的特使们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看到的地方上“行政机关的混乱”其实各地都存在,这就造成了莫斯科与各地区的冲突,并导致了 1937 年那场极端的大清洗。

在党内,斯大林也遇到了一些与在工业领域里一样的困难:缺乏精明强干又有责任心的干部。结果以言惑众者、小偷小摸者、营私舞弊者中不乏有人爬了上来,常常结成了一张张贪污腐败的关系网。

还有一种相当顽固的神话,说“掌管机关”的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建立了一档包括全体党务工作者的专案文件,以此在实际上控制全国所有的党组织。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当时甚至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登记,正因为如此,很多有理由不喜欢和害怕当局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居住地,以避免当局的监视。而地方干部的人事是由地方的党委管理的,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分配部只起到表面的监督作用。(格蒂 A.《斯摩棱斯克的党和清洗——美国历史文献中的斯摩棱斯克事件》,第 295 页)

正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明,当现实世界对他的热情洋溢的报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时,斯大林想到了什么。

到 1933 年,全国有 3 万党员被除名。这里面有多少是有教养和原则的人,我们只能去猜测。党并没有过快地去加速现代化。

比如说,在副重工业人民委员、有色金属业和黄金开采业管理总局局长 A. П. 谢列布罗夫斯基交给重工业人民委员 Г. П. 奥尔忠尼启则的关于对卡拉塔和克拉斯诺乌拉尔斯基两个铜矿联合工厂的工作进行调查的书面报告里就说道:“应该将卡拉塔的所有领导人予以清洗,现在我们就是在这样做。这种说谎、欺骗和弄虚作假的氛围应该被清除。真受不了他们的谎言,甚至连正式的工作登记簿都是不真实的。比如,烧结厂根本就未开工,但登记簿上却写着在正常生产等等。”(引自:《祖国历史文选

(1914—1945年)》，莫斯科，1996年，第408页)

谢列布罗夫斯基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举出的众多实例描绘出了一幅“明目张胆而厚颜无耻的欺诈”景象，必须“清除”它，“要把螺丝拧得更紧，要不然当地的民众就会松垮得不像话了”。

我们要指出，提出“拧紧螺丝”这一要求的不仅是谢列布罗夫斯基一个人，需要强调的是，他曾不止一次地被斯大林接见过，肯定也对局势做过详细的叙述。

1933年1月，斯大林得知了有关以И. Н. 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情况。正如托洛茨基的文献显示的那样，И. Н. 斯米尔诺夫确实是反斯大林集团的创始人。

托洛茨基于1932年在《反对派通报》上提出了与“柳京纲领”相互呼应的思想：“斯大林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除非消灭掉斯大林派，否则我们无法走入正途……必须除掉斯大林。”

在看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些材料后，斯大林明白了，有众多的党务工作者反对他的政策，其中既有老一代，也有年轻人。这么一来，地方的生产和党的干部的“厚颜无耻的欺诈”就与旨在撤掉领袖的日益成熟的阴谋重合在一起了。

总体上，国家的处境还是艰难的。不过1933年的春播进展顺利，可以期望，饥荒的后果将会被消除。

我们的主人公到底在指望什么呢？尽管他敢作敢为、不怕死亡，但在这时，这个历史人物的死亡就意味着实足的悲剧。他常常处于这种悲剧的边缘，甚至与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玩打棒游戏休息时也是如此。

国内的局势没有出现特别的希望，他的注意力常常转向德国。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他的欧洲防线中最重要的一环突然变成了主要威胁的来源，那该怎么办？如果苏联和党内出现像191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里出现的那种“失败主义”的思潮，又该如何是好？

由于经济危机，德国国内一下子掀起了两股强烈的抗议风潮——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和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分子。

在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录：“1932年8月5日。什么事情终于要发生了。恐怖中的恐怖。德意志帝国面临崩溃。”(勒热夫斯卡娅 E.，《戈培尔：日记里的画像》，莫斯科，2004年，第134页)

爆发国内战争的危险迫使总参谋部、一向否定希特勒的兴登堡总统，以及德国大企业们不得不一起支持希特勒。前总理冯·帕彭说：“我们简直就是给了他一份工作。”他们毫不怀疑，以“反对1918年11月”(即反对确立一战后欧洲框架的凡尔赛和



约体系)为主要口号的纳粹分子将坚持到底,为自己受辱的祖国复仇。

民族感情是一种惊人的力量。斯大林到目前为止都在与这种感情的衍生物碰撞,就是这些衍生物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和苏维埃俄国内部起着破坏性的作用。这位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对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分裂主义记忆犹新。而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是固有的,因为他们是以国家为载体形成的一个民族。但在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中,还有与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对立的白军。现在,斯大林也承担着双重职能:对内他是苏维埃爱国者,而对外则是可称为苏联海外军团的共产国际的领袖。

然而希特勒却战胜了该军团麾下的一个分队——德国共产党。而且这是怎样的一种胜利呀!是什么值得人们在柏林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反对根据Э. М. 雷马克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的美国电影的放映?警察用大棒驱散抗议的纳粹分子的队伍,他们在柏林到处行进着,没完没了。结果,国会因其“在全世界面前歪曲了德国人的形象”而禁止放映这部影片。此事发生在1930年12月。

而现在,上了台的纳粹分子行动一如既往地果断。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不过占据了他内阁中大部分职位的并非他的拥护者,而是保守党人。1月31日,他解散了由大部分是其他党的党员组成的国会。国会大选定于3月5日举行。2月27日,国会大厦起火。随即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被查禁,共产党领导人被捕入狱。2月28日,政府通过了反对德国共产党的决议,将对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人处以死刑。3月5日,戈培尔声称:“我们是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的主人,所有其他的人都该消灭,打入地狱……”纳粹分子获得了1700万张选票。

不过社会民主党人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700万张选票,还有500万人投票支持了已被摧毁的共产党。

然而,纳粹分子通过拘捕共产党议员的方法,很快成了国会中的大多数。不久之后,其他各党也被取缔了。

斯大林早在1918年就看透了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角色,因此他禁止德国共产党与其结成选举联盟,但后来这成了他的过错。

不过就算没有斯大林,德国总参谋部和大企业家们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德国摆脱了凡尔赛体系的枷锁,表现出真挚的热情。德国人相信现在他们可以使德国得到复兴了。

重整军备和制订战略被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军队管理局(该机构履行国防部的职能)接到了组编一个有21个师的集团军和建立一支配备重炮与战斗机的30万人军队的命令。1933年,开始了坦克的生产。鉴于此时凡尔赛和约依然有效,最初的坦克制造计划被称为“农用拖拉机生产计划”。

斯大林面临着对德国采取怎样的新政策的选择问题。暂时还没发生什么削弱苏联在西方地位的事件。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将军们仍然是与莫斯科结盟的拥护

者。所以对斯大林来说,最好的决定就是保持现状,而不是去做什么调整。

1933年,德国将军托马斯造访莫斯科,向苏联证实了德国军方的立场。

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可是在托马斯返回德国之后,对他必须继续之前的东方政策的结论,希特勒声称:“俄国有能力建立的只是‘波将金的村庄’,并且永远是一支破坏性的力量。”(格尔利茨 B.,《德国总参谋部》,第 268 页)

当然,那时斯大林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很快他就明白了,一个新的时期到来了。德国国防军不得不放弃“俄国方向”。

不仅如此,希特勒还认为俄国自古就是德国的敌人,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才是其理想的同盟军。他甚至在没有知会军方的情况下,就与波兰元首毕苏斯基进行了签订合作协议的会谈。

这份协议签订于 1934 年初,作为对与俄罗斯决裂的补偿,它应保障德国东部的安全。

“当我们谈论在欧洲征服新的土地时,我们当然首先指的就是俄国,以及那些依附于它的周边国家。

“命运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命运将俄国交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使俄国人民失去了那个将国家的存在支撑至今并使国家得以有某种程度巩固保障的知识分子群体。”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如是写道。

斯大林的书库中收有希特勒这一主要著作的俄文译本,他读过这本书。可他又应采取什么措施呢?

1933 年至 1934 年,有许多原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士加入了纳粹党的突击队,这样便建立起了纳粹突击队的“红色军团”。

为什么这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竟转到了敌人的一方?

对于这一问题未必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但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在国会大厦失火的第二天,斯大林会见了共产国际国际关系部的主任皮亚特尼茨基,他及和他同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中欧处处长 B. H. 克诺林,是共产国际情报机关的实际负责人。已经知道,还在 1930 年 7 月 18 日,斯大林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代表团的会议,谈到了要与纳粹分子作坚决和长期斗争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地说,苏联的领导人对于纳粹分子未存任何幻想。

当然,新的局势并未蕴含着瞬间即至的威胁,此时的德国还较软弱。

况且此时苏联与德国在经济利益上密切相连,必须是拥有超凡能力的人,才会看到在遥远的未来会发生一场不可避免战争。

一方面,希特勒宣称,“我给了自己 6—8 年的时间来完全消灭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德国扩张的目的将通过武装之手来实现”;而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只要莫斯科不再在德国展开共产主义的宣传,那就“什么也损害不了两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这位元首的所有观点斯大林都是清楚的。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斯大林看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遗憾的是,希特勒给出的那个期限(6—8年),与斯大林的预测并不矛盾。

1933年11月16日,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因为这一天苏联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同样有自己的理由要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新任总统,他承诺将改变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制定的以防止通货膨胀为首要准则的原经济方针。罗斯福为人要现实得多。他的主要原则包含在下面这句话里:“让我们集中我们的一切来做一件事:拯救国家和人民,如果为此我们不得不在一天内两次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也得这样去做。”

罗斯福本应于1933年3月正式就职,即美国几乎与德国同时,由具有新理念的新人来掌握政权。但1933年2月15日,罗斯福遇刺,一个声称憎恨所有官员和富人的来自意大利的失业侨民向他开枪射击,所幸罗斯福毫发无损。

2月,还有一件大事震撼了美国——银行业发生了空前的灾难。到1933年,有超过5000家银行倒闭,幸存的那些银行也无法满足对现金的滚雪球般的需要,一家接着一家地关闭了。存款达到了410亿美元,而现款只有60亿。2月14日,密歇根州州长下令关闭该州所有银行,导致全国陷入一片恐慌。3月初,美国所有银行关闭,资本主义处于死亡边缘,距离革命爆发仅半步之遥。

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他的第一步措施便是不惧怕引发通货膨胀,向银行提供国家补贴。他禁止了金美元的自由流通。谁不把黄金换成纸币,就判以10年监禁和10万美元的罚款。

紧急银行法的出台给危机画上了句号。在很短的时间内,陆续通过了其他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稳定了农业的局势、给失业者提供了工作、恢复了国有工业,也使工人们获得了签订集体合同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尽管有人指责罗斯福采取了这些社会主义的方法,但他还是继续推进自己的改革。接着他推出了发展田纳西河谷的一揽子计划,该河的流域覆盖了南方的7个州。在通过国会颁行了在盆地建立国有企业的法律之后,他还废除了私有电力公司在电能方面的投机权,他们通常用低价向国家购买电能,然后再高价卖给用户。总之,在广阔的经济发展地区实施了国家调控的原则。由罗斯福主导成立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如反对者们所说的那样,是“完全按照苏联计划体制的方式和模式建立起来的”。

提到运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原则的问题就应该强调,罗斯福通过公共工程署所做的,与斯大林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事情和将农民强行迁移到北方工地是相同的,两人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开发出了经济的潜力。

在这之后的10年间,全美10%的新建公路、35%的新建医院、65%的市政建筑、

70%的新建学校和许多其他工程都是由公共工程署完成的。“若是没有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这些国家运作,美国就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因为为此所必需的工程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乌特金 A. 语)

斯大林对北极区的开拓(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到科雷马金矿地)和罗斯福的国家调控,尽管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在道理上都是一回事,其背后都是体现的国家意志。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的这一特征典型地说明了当时的基本趋势,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跟斯大林和罗斯福相提并论。

不过若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他们却是各不一样的。美国人的新教伦理观念是建立在个人成功和个人责任的思想之上的,“红色计划”则是基于公平公正和集体主义的思想,而纳粹主义却是建立在民族复仇情绪和日耳曼民族优越感的思想之上的。

比如,纳粹分子立即宣布 5 月 1 日是“劳动节”,而在苏联 5 月 1 日是“劳动者国际团结日”。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是罗斯福、斯大林还是希特勒,有时都一样被称为民族主义者,而罗斯福甚至被称为“美国大沙文主义者”,那又怎么样呢?罗斯福在回应沙文主义的指责时说,这能帮助他解决国内难题。至于对外政策,他延续了美国一贯执行的利用他国矛盾的传统方针。所以在出现与日本和德国发生对抗的新危险时,他决定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1933 年 11 月 16 日,两国签订了相应的协议。但如果认为从此美国就成了苏联的盟友,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驻苏大使 V. 布利特在一份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表达出了美国对未来战争看法的实质:“如果日本与苏联之间爆发战争,我们不应该干预,而应该在战争到达尾声之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让它成为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并使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平衡不被打破。”

这里要强调一下,所有国家的领导人,罗斯福也好,斯大林、丘吉尔也好,都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考虑问题的。

其实在二战之后 V. 布利特就说过,罗斯福决定承认苏联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防止希特勒不受任何约束地发动战争”。

不管有多奇怪,他说的这两段话确实没有违背事实。

斯大林也明白这一点,他通过李维诺夫以他特有的强硬而又保持礼节的方式与罗斯福进行了交涉。关于交涉的内容有两种版本:一个苏联版,一个美国版。

李维诺夫对斯大林说:“总统建议我承担起对我们的宗教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的责任。但这超出了我的权限和我们的可能性。投降在东方国家正成为习惯,因而,我能够预计到总统会有将类似的东西强加给我们国家的企图。我们的国家正在强大起来,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现在要接受甚至 10 年前就拒绝了的东西。”(雅科夫列夫



H.，《富兰克林·罗斯福：人与政治家》，莫斯科，1981年，第173页）

关于自己与李维诺夫有关宗教问题的辩论，罗斯福是这样对自己的内阁说的：“你知道，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记得吗，马克斯，你善良的爸爸妈妈，两位笃信上帝的犹太人，他们总是在祈祷。我知道，他们也教会了你祈祷……这时马克斯脸红得像红菜头了。我继续说，你认为你是无神论者，但是，马克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会回忆起你父母亲对你的教导。马克斯面红耳赤，开始大声喘气，但我搂住了他。我相信，从他脸上的表情和他的动作来看，他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他也知道我是对的。”（雅科夫列夫 H.，《富兰克林·罗斯福：人与政治家》，莫斯科，1981年，第173页）

也许罗斯福并未虚构，很有可能他的确说过这些话。但他未能让对方作出让步。

还有一个难题是，战前俄国欠下美国1.5亿美元债务。斯大林是同意偿还债务的，如果能够获得新的贷款。罗斯福同意了，这个障碍被解除了。为了安排苏联和美国的商业贷款事项，很快成立了进出口银行，但在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约翰逊的禁止向尚未偿还一战时期欠款的国家提供贷款的法案，所以两国商贸往来没取得多大的发展。

其实，不管发生了什么，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全球的博弈就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就好比从森林的远处飘来了烟味，于是森林里所有的居民都戒备起来了。

从斯大林把美国看作有可能共同对付希特勒的盟友这一点可以说明，他并未被迷惑住。

正是这一时期他还去了白海。有关这次出行，苏联海军元帅И.С.伊萨科夫回忆道：“那是在1933年，就在军舰的第一小分队经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从波罗的海驶进白海之后。当开到波利亚尔内时，在驱逐舰的集会室看着玻璃窗外、仿佛在自言自语的斯大林突然说道：‘黑海是什么？是个大盆。波罗的海是什么？一个瓶子，可瓶塞并不在我们手上。这里就是大海，这里就是窗户！这里应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就是在这里！如果需要的话，从这里我们可以活捉英国和美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更好了！’”（西蒙诺夫 K.，《我这一代人的见证》，载于《旗帜》杂志，1998年，第3期，第77、78页）

伊萨科夫海军元帅还记住了斯大林的另一句话，这是他在回答大家表现出来的雄心时说的，我们要征服北方，我们要击溃所有敌人等等。

下面就是斯大林关于这一切所说的话：“大家在这里谈：我们要夺取、我们要胜利、我们要征服……战争，战争……现在还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打起来了，就是发生战争了！这是北方，应该了解它，应该研究它，掌握它，习惯它，控制它，然后才能谈到别的事情。”（同上，第78页）

这段话没有任何激情！当然人们会问，为什么与军人交谈就一定要带有激情？

他知道开拓北方的代价有多大。他曾在北极圈外的连上帝都遗忘了的库列伊克生活了将近6年；他同样知道，俄罗斯是冬之国、雪之国，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已经学会了在这种环境下去生存，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环境。但是难道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开拓北方吗？这得拥有多大的预算开支才够呀？

还需要什么样的干部？甚至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的学生们对北极修道院的开拓，即修建“北方的底比斯”这样的奠定了莫斯科公国经济和文化基础的过程，也是缓慢进行，一步一步来的，而且没有到达白海、没有到达索洛韦茨修道院，而这里现在建起了特别任务集中营，劳改犯们正在为工业化而劳动。正是索洛韦茨集中营囚犯的经验、过去开拓的经验，在20世纪30年代，从建造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始就被广泛运用起来。由于缺乏时间和应有的资金，开始利用囚犯、流放者和特别移民的劳动。这不由让人想到彼得大帝曾作出的决定，他把农奴赏赐给图拉军械师尼基塔·杰米托夫，让他们迁居到乌拉尔地区并在那里建立冶金厂。

你能说斯大林和彼得大帝有什么不同吗？两人都在全力利用国家的强力。

罗斯福也同样运用了，差别只是他的国家要比苏联温暖和富裕好几倍。

这也就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处境的差别。如果说美国总统面临的不是资源匮乏而是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那么斯大林要面对的问题就要复杂百倍了。而希特勒的出现，证明了他提出的要在短时期内实现现代化的正确性。

10年时间！不，现在没有10年了。

第四十章

斯大林的经济间谍

斯大林的经济情报部门、政治局内的冲突：莫洛托夫与奥尔忠尼启则、“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在为十七大做准备的时候，斯大林曾找过世界经济与经济关系研究所所长 E. C. 瓦尔加请教。瓦尔加经常主动向斯大林送去有关国际事务的各类报告。

1929 年 10 月，瓦尔加准确地对纽约股市的崩盘作出了评估，他写道，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开始了。自此斯大林开始信任这位前布达佩斯大学教授、1919 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并使他在与世界革命信徒的辩论中感到自己更有信心了。瓦尔加的研究所实际上成了斯大林的经济情报机关的一个部门：领袖确定下研究的课题，委托他们就他感兴趣的某些专题进行研究。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员后来甚至调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外处去工作，而一些契卡人员常以研究所的身份作掩护。例如，“剑桥五杰”（苏联的英国人间谍小组）之一的 P. H. 施托尔珀在从事间谍工作之前就是在这家研究所完成研究生学业的（由他指导了 Д. 麦克林）。其实，在管理系统中，间谍、宣传、强力和意识形态的人员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科技人员转为间谍并不奇怪。

后来，瓦尔加院士在自己的回忆录《二十五年后的揭露》中称斯大林为“东方的暴君”，说在他的统治下有大量共产党员死亡，但他坚决驳斥了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文化程度低、喜欢将别人的功劳占为己有的说法。瓦尔加证实说：

我确实知道,他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经典作家的著作,他读过很多东西,总之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在后来的赫鲁晓夫时期流传着一种谎言,说什么斯大林是让别人为自己的著作代笔的,但只要看一看他的报告和一些信件的风格就会明白,它们完全出自同一人之手。

当他引用他人的有关资料时,他总是公开做出说明。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就说过,对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的国家统计数据的核对工作是由我做的。在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前夕,我为他编写了一份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详细评述,并表达了与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相反的看法,我坚持这场大的经济危机即将告终,但会面临长期萧条的观点。斯大林吩咐将我的劳动成果印刷出来,并在他做报告之前分发到每位与会者的手中。说斯大林不能忍受任何反对意见是不正确的。按我的经验,他总能心平气和地听完不同的意见。李维诺夫也是这么说的。(切尔卡索夫 И.,《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时代背景下的画像》,莫斯科,2004年,第27页)

研究所这份材料的分发名单中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书记处、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等等,另外还有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可以肯定,在全球的实际运用中,斯大林和罗斯福都是利用科学界专家的首创者。

在苏联破译了截获的日本外务省致其驻中国大使的密电后,东方局势危机加剧的第一声警铃敲响了。早些时候,参加中东铁路出售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已对苏联是否拥有这条铁路的所有权提出了异议,并建议以一个荒谬的低价出售这条铁路。而现在日本人竟通知自己的卖家说要动用武力,并拘捕中东铁路的苏联工作人员。

此前,斯大林对日本的行动一向十分谨慎。现在,他的语调急转直下。莫斯科抛开了一切虚礼,宣布“日本政府负有直接责任”。这证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地位,首先是军事地位得到了极大巩固。

此外,法国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它(与波兰一起)是苏联的头号敌人,而现在,正如9月份来到莫斯科访问的以法国航空部部长皮埃尔·科特和巴雷斯将军为首的代表团所声明的那样:“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不想要战争——这就是苏联和法国。”法国人提出要在航空制造业方面与苏联开展合作,斯大林对此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这是对苏联成就的承认。当然,这也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肯定,因为正是他对航空业极为重视。

总之,整个1933年,苏联的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当年秋天,粮食取得了丰收。政府和人民的相互关系稳定下来,这一点表现在政治局禁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地方



上的“三人小组”做出极刑的判决,同时还禁止把农民大规模迁出(只允许迁出个别“猖狂的反革命分子”,全苏联要限制在 1.2 万农户的范围内)。同时,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司法人民委员部和警察总局两个系统监禁起来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从 80 万减到 40 万人)。所有被判处三年以下监禁的犯人均改为一年的劳役。

体制的明显宽松要归功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1933 年全年,重工业增长了 12%,预算赤字变成了盈余(从 1932 年负的 1.35 亿卢布变成了 1933 年的 1.48 亿卢布),而且该年每一季度苏联出口的商品量均比进口量要大。

人民的生活算过得去了。高尔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 1933 年 10 月 31 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在谈到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说:“美国人让我非常高兴。好极了!及时解决了问题。这回日本人大概不好受了。而我们的生活却越来越有‘成就感’了,每一天都能得到这种见证。”(《历史档案》,2005 年,第 3 卷,第 11 页)

高尔基说得没错,比起可怕的 1932 年,现在要轻松多了。不过,正如我们很快会看到的那样,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喘息,但就是这种在艰难上升中的短暂喘息,也被看成了最高领导的恩赐。

如果不算在 1932 年 8、9 月间被逮捕、1933 年 4 月被判刑的所谓“布哈林派”的成员、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们和右派的拥护者们,1933 年也没有进行什么拘捕。在他们那些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专业侦查员们定义为“非法会议”的会晤中,讨论了以强力搞掉斯大林的话题。布哈林躲开了他们,而被捕的人也没有提到他。

不过,这一年最主要的斗争并不是这个插曲,而是在政治局中斯大林集团内部的冲突。阻力来自奥尔忠尼启则,他作为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手上集中了几乎所有的经济管理权,并维护着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斯大林要求团结,即在团结互助的前提下实现各部门的目标。但奥尔忠尼启则和“红色厂长们”却只从自己部门的利益出发。

1933 年夏天,便发生过一次这样的冲突。7 月末,莫洛托夫收到了来自各州的电报,其中通报说,“公社社员工厂”(位于扎波罗热)装运给收货人的是不配套的机械。与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这个“部门集团”已有冲突的莫洛托夫于是就在这件事上使了劲儿。7 月 28 日,人民委员部以咨询的方式通过了《关于向农机站和国营农场不能容忍地发送不成套联合收割机》的决议。鉴于不久前粮食供应的悲惨状况和总体上的实际欺诈行为,应该能够推断,这是莫洛托夫在要求严惩。事实正如我们的推断。苏联检察长 И. А. 阿库洛夫被责成立刻逮捕“公社社员工厂”及相关企业的领导人,并追究他们的司法责任。

中央政府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地方当局的阻挠。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 М. М. 哈塔耶维奇就声明自己不同意这个决定,并解释说,不成套供应的原因是部分设备在铁路运输过程中由于开放式站台等原因而陆续遭到盗窃,因为一些配件是单

独装箱运送的。哈塔耶维奇大概有他自己的道理,的确,尽管保卫措施严格,但盗窃行为仍屡禁不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国营农场和农机站毕竟没有得到所订的成套设备。总应该有人为此负责。

莫洛托夫不可能因为这种丑恶现象不可克服而签署一个批示就作罢。

哈塔耶维奇把自己的信一下子分发给了所有的部门:乌克兰政府、中央委员会和检察院、苏联人民委员会、政治局、苏联检察院和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

但哈塔耶维奇的辩解丝毫未能打动莫洛托夫。他回信给哈塔耶维奇说:“‘公社社员工厂’取得的成就我们都很清楚,检察机关也是清楚的。法庭会考虑到这一情况。这个诉讼程序远远超出了工厂的层面,取消它无疑是不合适的。”(《И. В. 斯大林致 B. M. 莫洛托夫的通信集》,莫斯科,1995年,第248页)

斯大林此时正在索契休假,代替他行使职权的是卡冈诺维奇。

1933年8月16日,苏联最高法院刑法委员会开始审理该案,一系列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公社社员工厂”的负责人被指控负有刑事责任。公诉人、苏联副检察长 A. Я. 维辛斯基在总结中宣布,该诉讼程序给“苏联的经济组织”、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各共和国有关组织等机构解决“工作中的普遍问题”提供了依据。

从卡冈诺维奇写给斯大林的信(1933年8月26日)中,我们可以看出事态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

“由于发生了联合收割机不成套装运一案,我们不得不集中到一起,展开了无法不激烈争吵的讨论。原因是维辛斯基在他题为《纪律、核算、监督》的讲话的最后一段里,不仅对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还对这些部门的领导者进行了相当明显的‘含沙射影’。谢尔戈同志发来抗议信,要求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过程中查明,莫洛托夫同志在《真理报》刊印之前就已读过这份材料,且阿库洛夫在诉讼期间几次与他进行了协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次讨论的特点,虽然双方都在竭力保持克制。

“我们通过了一个简短的决议,承认维辛斯基同志的这段讲话是不正确的。”(《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315页)。

结果,这个批评深深触犯了易怒的奥尔忠尼启则和农业人民委员 Я. А. 雅科夫列夫,他们促使政治局重新讨论了该问题,并实际上修正了决议。

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情况是这样的:“我觉得谢尔戈对维辛斯基的反常行为是一种无赖的行为。你怎么能够对他作出让步呢?很明显,谢尔戈想用自己的抗议阻挠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解决配套性的意图。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卡冈诺维奇造成的吗?看来,是他造成的,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И. В. 斯大林致 B. M. 莫洛托夫的信件(1925年—1936年):文件汇编》,第247页)

这次冲突的结果是莫洛托夫被迫作出让步。政治局的新决议斥责了维辛斯基的



那段讲话,说他的讲话“给错误地指责重工业人民委员和农业人民委员提供了口实”。有四位政治局委员出席这次会议,他们是卡冈诺维奇、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

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斯大林感到满意。而且很显然,是捍卫全国利益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部门领导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了让步。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产品的不成套装运表明了生产部门的混乱,他们并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确定的计划行事。归根结底,这也是对斯大林本人的一种打击。

8月28日,他给莫斯科发去电报:

致联共中央,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和政治局委员。

我从卡冈诺维奇的信中了解到,你们承认维辛斯基有一个地方做得不对,指的是他暗指人民委员们应对有关事务和接受不成套产品负责。我认为这样的决定是不正确和有害的。供给和接受不成套的产品,是对中央委员会决议最拙劣的破坏。人民委员们不可能不为此负责。遗憾的是,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未能顶住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官僚主义的非难。(《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318页)

8月29日,斯大林再次提到了不成套联合收割机的话题:“非常糟糕和危险的是,你们(以及莫洛托夫)没有能够在不成套联合收割机一事上遏制住谢尔戈的官僚气焰,并让维辛斯基当了牺牲品。如果你们准备这样教育干部,那么你们在党内就再也找不到一位诚实的党员了。岂有此理……”(《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319页)

这是给了战友们一个难堪。

9月1日,政治局废除了之前的决议。奥尔忠尼启则未出席此次会议,其时他正在休假。

其实,这位人民委员缺席的原因多半不是因为休假,而是不想忍受屈辱。要知道,他刚刚取胜,可转眼又被当众打翻在地。

但是斯大林觉得仅仅恢复公正还不够,很快他用更严厉的措辞重提这一冲突:“谢尔戈(和雅科夫列夫)在‘产品配套’这件事上的表现只能称之为反党行为,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这种行为的客观效果是保护了那些反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反动分子。事实上,整个国家都为产品的不成套叫苦连天;党开展了保证成套性、公开披露和惩罚不成套现象的运动;蛮横和恶意违反党和政府决议的敌人已经受到判决,而对这些违章行为负有责任的谢尔戈(和雅科夫列夫)不仅没有为自己的罪行悔过,反

而对检察长反戈一击！这是为什么？当然，这并不是为了遏制那些反对党的决议的反动者，而是要在精神上支持他们、在党的舆论的注视下证明他们无罪，并以此诋毁党正在开展的运动，即诋毁中央委员会的实际路线。”（《И. В. 斯大林致 B. M. 莫洛托夫的信件》，莫斯科，1995 年，第 248、249 页）

如何理解“反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反动分子”这一表述？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主人公是极为理性的，那么在两周之后他又重提这一冲突事件，说明他从其中看到了对现行制度具有危害的系统性威胁。宗派之争的问题已经完全暴露在他的面前。他有可能自问：“为什么当我不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们竟会对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明显反国家的意图作了让步？”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但他的反应表明，他肯定提过，且不止一次。他面临着对战友们作出新的孰轻孰重的选择。任何一位领导人都知道，理想的工作人员是不存在的，所以斯大林对老战友谢尔戈的不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表现出来。

很快，苏联工业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冲淡了斯大林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负面印象。1933 年 9 月 30 日，苏维埃第一只热气球“苏联号”升空，升到了创纪录的 1.9 万米高空；就在同一天，由 23 辆苏联自己生产的汽车组成的车队从莫斯科到卡拉库姆沙漠再回到莫斯科的持续多日的汽车拉力之行也圆满完成。全世界理应都看到了，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如何征服天空和旷野！

不断增长的苏联的工业实力也得到了西方的承认。9 月 26 日，军情局局长 Я. К. 别尔津呈交了一份由谍报机关获取的德国将军博克尔贝格关于德国军人 5 月 8 日至 28 日苏联之行的报告：“1. 没有发现苏维埃政权有可能会因俄国境内发生的确凿无疑的饥荒而被推翻的迹象。2. 各地重建的工业企业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苏维埃联盟在近 10 年内就会实现其目标——彻底摆脱对外国的依赖。3. 考虑到苏联计划的规模庞大，我们与红军及苏联军事工业的合作，不仅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而且从军事技术的角度，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季亚科夫 Ю.，布舒耶娃 Т.，《法西斯之剑在苏联打造》，莫斯科，1992 年，第 315 页）

这些结论正好与斯大林掌握的由伏罗希洛夫提供的情报相吻合：德国人参观过的位于莫斯科、图拉、哈尔科夫三地的工厂和第聂伯河水电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克尔贝格还有其他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对苏联的羡慕”。

当然，在苏联的报告里还记有一个在德国人报告中没有提及的情况：客人们“喝得不省人事、烂醉如泥”。看来，主人是极为热情好客的。

不过，那时斯大林已经对延续与德国的互惠关系不抱多大的希望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博克尔贝格率领的代表团离开之后，苏联做出了终止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决定。德国人大失所望，并将此解释为苏联开始与法国接近。

在这些事件交替发生的过程中，托洛茨基一次次让斯大林想起他的存在。



1933年7月17日,以达拉第为首的社会党人和激进党派联盟赢得了法国选举的胜利,而法国政府允许托洛茨基到法国定居。这位“革命的魔鬼”立刻离开了土耳其,并迅速开展了自己的活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思想是:苏联完成了类似于拿破仑的热月政变,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化为官僚独裁统治。从其时开始,托洛茨基再也看不到进行体制和平演变的可能性了。

按照托洛茨基的想法,“疯狂地为自己的职位与既得利益,为自己的不受监督和独裁专横而斗争的冷酷邪恶的官僚主义恐怖”,有可能在西方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被消灭。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联合成一个新的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把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追随者团结了起来,截断了斯大林施加国际政治影响最主要的资源,并造成了在苏联党内精英中进行思想侵蚀的危险。工业化的不文明和残酷的现实明显输给了世界革命复兴的罗曼蒂克思想,这种革命不是要镇压自己人,而是要镇压西欧富裕的资本主义集团。

被放逐的托洛茨基,这个无畏地反对欧洲社会不公正、反对德国纳粹分子和反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人摇身一变成了“绝对公平”的圣徒。由他召开的会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加者。欧洲左翼自由知识分子们有了自己的领袖。

正是在1933年,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托洛茨基的活动逐渐成为还不算十分强大,但已是明显和突出的一极,并在其后的若干年内越来越让斯大林感到不安。当我们的主人公最终得出与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时,托洛茨基又阻碍了统一的反希特勒左翼联盟的形成,于是斯大林指示除掉列夫·达维多维奇。

但离这一步还很远。此刻的斯大林更关心的是石油开采、粮食征购、中东铁路、军队的装备和德国对涉嫌国会大厦纵火案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诉讼程序等问题。他在索契每天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并没有什么事情是涉及托洛茨基的。

不过此时,贝利亚的名字又一次出现了。他准备了几份书面报告并当面交给了斯大林,其中一份关于石油工业的报告受到了斯大林的大力支持。这位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建议,在1934年的年度计划里添加如下内容:建设炼油厂、铺设从马哈奇卡拉到斯大林格勒的管道、扩展从巴库到巴统的石油管道、扩大在阿塞拜疆的地质勘探工作和为里海航运公司建造一批新船。

贝利亚用这种方法积极地干预了这些本是奥尔忠尼启则职权范围内的事。而斯大林同意了他的建议(除了向斯大林格勒铺设煤油管道),并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1933年10月21日)痛斥了奥尔忠尼启则一番:“巴库油田的工作进展不佳。今年我们在巴库可以开采到1500万吨石油,而明年需要达到2100—2200万吨……石油总局的人在睡觉,而谢尔戈只会以虔诚的许诺敷衍了事。如果我们不能敦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立刻着手开展工作,并在每次政治局会议上向我们提交他们采取措施的报

告,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395页)

这位33岁的贝利亚是何许人也?如果抛开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不谈,只说一些“干货”的话,他是为数不多的、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党的契卡积极分子。“县里的土皇帝们”在他那里便丧失了自己的威风。他没有建立过像提拔过他的奥尔忠尼启则那样大的革命功勋,并且他也不追求“等同于领袖”的桂冠。贝利亚是莫斯科的一匹驮马,一位有力的行政主管人。说句超前的话,到1936年时,新的采油厂的产量已经达到差不多阿塞拜疆石油开采量的一半。斯大林死后由赫鲁晓夫塑造出来的贝利亚的“可怕”形象,与其真人很少相符。他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也不是什么恶魔。据B. H. 诺维科夫回忆:能在1941年成为伊热夫斯克机器制造厂厂长,此后又成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远非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粗浅”。特别是,在战争年代由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受到的镇压是最轻的。诺维科夫讲述了一个插曲:1941年7月末,贝利亚在莫斯科召开了一个有关增加步枪产量的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刚上任的副装备人民委员诺维科夫。贝利亚向他们施加了强压,要求伊热夫斯克机器制造厂把步枪的生产量增加到每天五千支,为此他给了三个月的期限:因为此时前线的情况是极为危险的。在这种强压之下,两位计委副主席均同意在相关决议上签字,而诺维科夫拒绝了,他认为比较现实的期限是七个月。贝利亚大发雷霆,但令人惊奇的是,他还是采用了诺维科夫的方案。

诺维科夫本人将此解释为贝利亚也害怕欺骗斯大林,因为斯大林“能原谅很多事,但对于欺骗行为却从不宽恕”。贝利亚究竟害怕到什么程度,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未曾欺骗过斯大林。

想必,正因为如此,贝利亚和像他这样的行政官员一样,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排挤“土皇帝”和地方上的“帮派”。斯大林站在这批新领导人的一边。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斯大林将贝利亚与奥尔忠尼启则的冲突视为体制性的冲突。外高加索地区在“石油、棉花和阿布哈兹烟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也将相应的成绩报告寄给了《真理报》编辑部,但长时间不能在报纸上得到反映,直到斯大林出面干预,这绝非偶然。

在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信中(1933年11月2日),斯大林表示:“是终结这种丑恶现象的时候了。应该采取措施,让《真理报》的领导岗位上没有左翼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科斯塔尼扬、洛米纳泽和其他人的身影。”

科斯塔尼扬和洛米纳泽同属奥尔忠尼启则是一派,洛米纳泽曾是1930年被粉碎了的瑟尔佐夫集团中的一员(有时称为“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小集团”)。

1933年8月,斯大林明显对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很大的让步:时任第24航空工厂党委书记的洛米纳泽被授予列宁勋章并晋升为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的市委



书记。这座城市已经完成了基础建设,并开始了冶金联合企业的开发。

但斯大林从未原谅反对派洛米纳泽,并且一直惦记着他的顶头上司的罪过。这种情况可以从上面援引的谈论编辑人员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插曲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斯大林将贝利亚的积极活跃与奥尔忠尼启则的拉帮结派、顽固不化,以及洛米纳泽的反对立场联系起来,就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这位最高勋章获得者同时也是“左翼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此时我们的主人公想起了托洛茨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起他反而让人感到奇怪了。不过,斯大林明显暂时不打算花力气去对付他,而且在1933年末,斯大林觉得主要的动荡都已经结束了。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定于1月召开,这次大会理应对这一最艰难也最英勇的时期做个总结。斯大林做了政治报告。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都调动了起来为斯大林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的发言准备材料。

苏联驻德国的全权代表处,在其1933年12月31日上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1933年是苏德关系发展的转折之年。德国法西斯的掌权把实现希特勒和罗森伯格早已形成的反苏联的计划提上了德国对外政策的议事日程。这些计划的终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由希特勒领导的西欧国家反苏维埃阵营来进攻苏联、瓜分苏联。而当前的任务是将波罗的海地区纳入法西斯的势力范围,并对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进行援助。1933年3月至7月间,由罗森伯格、戈林和胡根贝格进行的实施德国法西斯预定计划的第一次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苏联对法西斯的挑衅给予了回击:与邻国签订了界定侵略定义和互不侵犯等一系列条约,并巩固了与法国、波兰、意大利的关系……

如此一来,法西斯面对的不是一个被削弱的苏联,而是一个国际分量大大加重了的苏联,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的党、工人阶级、集体农庄的农民4年内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完成的……

德国武装力量的增长及其向欧洲西部和东南部扩张的困难将促使希特勒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苏德两国1933年前9个月的商品流通额与1932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5.7%……(季亚科夫 Ю.,布舒耶娃 Т.,《法西斯之剑在苏联打造》,莫斯科,1992年,第340、341页)

斯大林不喜欢别人当面称他“英明”和歌颂他,但也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威望也是维护政权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就在他周围最亲近的人当中

也有强势和个性独立的人，甚至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部也有这样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党的利剑”在 1933 年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派系，表面上完全服从于斯大林，但实际上随时都准备做出惊人之举。

所有的人都声称斯大林是“英明领袖”，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想。斯大林自己同样也不是这么认为的。所以驻德全权代表处工作总结里的这番评定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呈报给斯大林的 1933 年去世的德国将军汉斯·冯·西克特的遗嘱却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其中包含着与之不谋而合的对未来欧洲的构想。这位将军认为，英国和法国将是德国的长期竞争对手，“德国和波兰之间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存在友谊”，并且应该与苏联达成协议。布尔什维主义的“紧箍咒”——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恭维话吗？与此同时，据对外情报机关的通报，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西克特的这份遗嘱给予了“极大的赞许”。

1933 年 12 月 18 日，退出了国际联盟的德国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中所有的军事条款，并让自己的军队进入莱茵河非军事区。

现在离用决议将德国变成一个欧洲小国的巴黎和会，刚刚过了 14 年。

即将逝去的 1933 年还有什么值得人们关注的呢？西班牙左翼势力发动了起义、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掀起了针对日益增长的欧洲移民的抗议风潮、德国对其国家机关中的犹太人进行了清洗、德国国会授予了希特勒独裁大权。

1934 年到来了。1 月 4 日，《真理报》上刊登了斯大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采访的谈话。谈话中他强调：工业问题已经解决，农业问题也可以认为是解决了，当务之急是“扩大城乡的商品流通和提高运输能力，特别是铁路运输”。

对于研究经济的人来说，“扩大商品流通”意味着将逐步取消针对农村的镇压手段。

1 月 26 日，党的代表大会开幕。10 年前的这一天，斯大林在列宁的追悼会上发了言并向逝去的列宁“宣了誓”。现在，做总结的时候到了。斯大林在报告中是有东西可以展示的：在全球性危机的背景下，苏联工业产品的产量比 1913 年增长了近 3 倍（291%），而德国则下降了 75.4%，美国也只增长了 10.2%。罗列了这些数据后，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做了概述：苏联加强了与法国、波兰、美国的关系；日本拒绝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标榜自己的民族优越性的德国法西斯应该想想已经覆灭了罗马帝国的教训。在结束这一章节的时候，他承诺将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子伸到我们苏联的菜园子里来”。

在谈到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章节里，斯大林说：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彻底变了样，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



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地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广泛地设立了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来教学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

“创立了各种新兴的生产部门: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化学工业,发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联合收割机制造业,大型涡轮和发电机、优质钢、铁合金、合成橡胶、氮、人造纤维的生产等部门。(长时间的掌声)

“在这个时期内,数千个完全现代化的新工业企业建成并开工生产了。像第聂伯河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厂、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波布里克动力化学联合厂、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械制造厂这样一些大型企业建成了。数千个旧企业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在苏联各民族共和国和各边疆地区,例如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南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布里亚特-蒙古、鞑靼、巴什基里亚、乌拉尔、西伯利亚东部、西伯利亚西部、远东等地方,建立了许多新企业,创立了许多工业基地。

“成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五千多处国营农场,并为它们建立了新的区中心和工业区。

“在几乎是荒野的地方出现了居民众多的新的大城市。旧的城市和工业区也大大发展了。

“把库兹涅茨克的炼焦煤和乌拉尔的铁矿石结合起来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厂的基础已经奠定了。于是我国东部新的钢铁基地可以说已经由理想变成了现实。

“在乌拉尔山脉西面和南面的斜面区,即在乌拉尔区、巴什基里亚和哈萨克斯坦一带,新的强大的石油基地的基础已经奠基了。”(斯大林 II,《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06、307 页)

这也是他个人的胜利!至于为了这一胜利付出了多少代价,如今可以不必去提了(只有敌人才会这样做)。苏联用 4 年时间站了起来。

谈到农村时,斯大林没有掩盖存在的问题。他看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家畜总数要比战前低得多。(在推行集体化的那几年,即 1928 年至 1933 年间,共屠宰了 2660 万头牛、1530 万匹马和 6340 万只羊。)

这份报告给人留下了坦率和乐观的印象。

想必,最让代表们欣喜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在十五大上与反列宁主义集团进行了斗争,在十六大上“彻底击溃了反列宁主义的最后一批信徒”,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既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要打击的了。大家都看得见,党的路线胜利了”。这些话获得了“如雷的掌声”。

是的,这是一次“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他们的确称得上是胜利者,有理由为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牺牲者得到了补偿。正是他们建成了社会主义。

不过,几分钟以后代表们听到的内容就容不得人们喘口气了。

提到建设无阶级的社会,斯大林说它不会“自行”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取得并建成的。”(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50页)

斯大林重提了托洛茨基、“右派”和“左派”,然后他又警告那些“过去有过一些功劳而现在已成为政要的人”,还有那些“老实的但爱说废话的人”。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干部问题对于斯大林来说还是处于主要位置,干部的清洗还会持续下去。

在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的背景下,斯大林这种可怕的预言也许显得没有根据,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国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两条战线上现实的战争威胁迫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枕戈待旦”。

他在报告中称现政权的绝对拥护者有3600万人,其中包括党员、团员、工会、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会员、工人通讯员、农村通讯员。但是,在这一统计数字中,同一类人多半会同时归属不同的群体,并被重复计算了两三次。

比如说,党员可能既是工会成员,同时又是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会员和工人通讯员。

但不管怎么说,十七大代表了超过280万的党员和预备党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党领导着所有的国家机构。

在斯大林之后,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就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相继发言。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把工业产品的产值增加到战前水平的大约6倍,而且从总体上完成农业的机械化改造,并将把交通和通讯的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发展速度的辩论中,最终采纳了一个较适中的年增长率——16%,而不是政治局提出的19%。在这个问题上,来自地方的大部分代表修正了中央的指标。

为了强调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的辉煌,在十七大的讲台上还允许一些过去的反对派分子——李可夫、托姆斯基、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洛米纳泽等进行了发言。他们忏悔了过去的罪过,并歌颂了斯大林的方针。

未必有必要搞这么一场东方中世纪式的示威动作。如果他的敌手已被打败、并失去了一切翻盘的机会,那么有什么必要公开地羞辱他们呢?

或者,他们还有翻盘的可能性?

但并没有谁强迫他们开口说话。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斯大林称为“元帅”、“伟人”、“领袖”。譬如,加米涅夫说道:“这个新的时代将作为斯大林的时代载入史册,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用尽全力、劲头十足地反对动摇这一权威的任何尝试……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

在过去的战友(“高官显贵们”)忏悔之后,举行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



选举的结果给了斯大林一份极大的意外惊喜。

根据官方的选票统计数据,他只有 3 张反对票。但实际上,一些文献显示是 270 张(另一些资料显示是 123—125 张),而有表决权的代表共有 1225 位。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此前几个最大的边疆区党委书记——И. М. 瓦列伊基斯(中央黑土区)、Б. П. 舍博尔达耶夫(北高加索边疆区)、乌克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还有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奥拉赫拉什维利已经有过秘密磋商。

请关注一下这些领导们早先的联系:舍博尔达耶夫在 1918 年时曾任巴库公社军事和海军事务部的副人民委员,此后在高加索的其他几个地区工作了几年;瓦列伊基斯在 1921 年到 1923 年间曾任巴库苏维埃副主席;奥尔忠尼启则 1920 年曾是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重建局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主席,1921 年任外高加索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也是“高加索人”,1920 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委员,1921 年担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米高扬从 1919 年 3 月起担任俄共(布)高加索边疆区委巴库局主席,1920 年任阿塞拜疆工会委员会主席,1924 年至 1926 年期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彼得罗夫斯基 1917 年 11 月至 1919 年 3 月期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19 年任全乌革命委员会主席,并积极投入到了乌克兰的农业集体化进程之中。(被称为斯大林的秘密反对者的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 Р. И. 埃赫、哈萨克边疆区委书记 А. И. 米尔佐扬(也是“巴库人”)。还有一点不应忘记,斯大林和基洛夫同样都是“巴库人”)。

有关这些代表们的秘密磋商一事得到了赫鲁晓夫的证实,他说提议人就是舍博尔达耶夫。但是不是这样还很难说。不管谁是提议人(如果确有过密谋),带头人理应来自像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这样的联盟领导人才对。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任何关于此次磋商的可靠资料被保存下来,所有赞同这种说法的人都只是用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作印证。

所以,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阴谋家”都是严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不是一尘不染的白衣天使。他们非常清楚苏联政体的运作过程,也清楚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来罢免斯大林。

要是他们连这一点都不明白,那么早就丢掉自己的职务了。也许,这帮老战友在密谈中讨论了面临的选举和任命的各种方案。考虑到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有可能讨论过基洛夫会调到莫斯科上任的前景,比如说担任政府主席。奥尔忠尼启则与其时担任这一职位的莫洛托夫常常会发生冲突,而他与基洛夫之间则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在基洛夫被刺身亡和随之展开的肃反运动之后,还传出了一个关于反对独裁者

的大胆阴谋家的奇闻。是的，他们有可能投票反对斯大林，但并没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动作。

作为公认的党的领袖，斯大林得到了 270 张反对票（或者要少一些）。这意味着支持他的人占压倒多数。如果考虑到其中 80% 的代表是在 1917 年前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那么可以说斯大林得到了“优等”的党内精英的支持。但据莫洛托夫回忆，说舍博尔达耶夫告诉基洛夫，一些中央委员提议要推举他为总书记。基洛夫给予了拒绝，甚至将此事告诉了斯大林。这意味着，即使是由中央委员来选举总书记，斯大林也面临着风险。就算他不会输掉，也会不光彩地得到很多“黑球”（沙俄时代投票表决时用黑球表示反对——译注）。于是，斯大林取消了总书记的选举，现在他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四位书记之一（而且列宁在“政治遗嘱”中也提出不希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

不过，这也仅是一种说法而已。

2 月 10 日的中央全会上，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有 A. A. 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斯大林。Я. Б. 加马尔尼克、Н. И. 叶若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A. B. 科萨列夫、古比雪夫、斯大林、A. И. 斯捷茨基、Н. М. 什维尔尼克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当选为组织局候补委员的有 M. M. 卡冈诺维奇、A. И. 克里尼茨基。卡冈诺维奇还成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同时进入党的三个领导机构的只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基洛夫三人。基洛夫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被委任领导党和群众组织的工作。很显然，斯大林计划将他调到莫斯科。

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 29 人未能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他们都是一些与企图“除掉”斯大林的 A. П. 斯米尔诺夫反对派集团有牵连的人。

召开过这次“胜利者的大会”之后，斯大林完全有理由期待今后一个时期更进一步的稳定。因此，一些过去的反对派分子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被恢复了党籍。布哈林被任命为仅次于《真理报》的国家第二大报纸《消息报》的主编。顺便提醒一下，布哈林，还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此之后，在代表大会上确定的平衡经济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按照这一经济政策，“B”组部门得以优先发展，以便向市场提供充足的商品。以强力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已经成为过去。经济核算、物质激励、公民福利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等观点得到广泛宣扬。

经济管理机制发生改变的结果，就是惩罚政策相应地弱化了。比如说，对 1932



年8月7日颁布的最严酷法律之一的采用数量减少了几倍。

工农红军领导层的局势也稳定下来。伏罗希洛夫潜在的对手图哈切夫斯基在十七大会上与伏罗希洛夫一起做了报告,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基洛夫在大会上表达的“主要的困难已经成为过去”的想法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直接指出,攻坚阶段已经结束,对所取得的成就的“巩固”阶段开始了。

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第三次革命”(这是斯大林对农业集体化的说法)已经结束了。甚至整个惩罚机构都受到改组。可怕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从这一刻起被并入了新创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改名为国家安全总局。亚戈达接替了1934年5月10日去世的明仁斯基,成为苏联整个强力体制的主要领导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是Я. С. 阿格拉诺夫,另一位副内务人民委员是Г. Е. 普罗科菲耶夫,К. В. 保克尔担任了负责国家最高领导人保卫工作的行动局局长,而Г. А. 莫尔恰诺夫担任了负责与反苏联分子进行斗争的秘密政工局局长。

伴随着改组的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惩罚权(判处死刑的权力)被削弱,而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得到了加强。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国家的整个行政系统,此前都是由从1930年7月至1934年1月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波斯特舍夫监管的。1933年1月,他被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任务是“无条件地完成粮食征购计划”。

以极为残酷和坚决闻名的波斯特舍夫被调离了,而Г. М. 马林科夫由莫斯科党委宣传部长提拔为中央委员会党务机关工作部部长。从此,由卡冈诺维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马林科夫开始监管内务人民委员部。

卡冈诺维奇被重新启用。他的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交给了赫鲁晓夫,自己则去领导了隶属中央委员会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

从这一刻起,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开始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斯大林传 命运与战略 上

作者 = (俄罗斯) 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林娜·雷巴斯著; 吴昊, 张彬译

页数 = 580

SS号 = 13468622

DX号 =

出版日期 = 2014.02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